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约翰·克利斯朵夫
(2)



译者弁言

在全书十卷中间，本册所包括的两卷恐怕是最混沌最不容易了解的一部了。因为克利斯朵夫在青年成长的途中，而青年成长的途程就是一段混沌、暧昧、矛盾、骚乱的历史。顽强的意志，簇新的天才，被更其顽强的和年代久远的传统与民族性拘囚在樊笼里。它得和社会奋斗，和过去的历史奋斗，更得和人类固有的种种根性奋斗。一个人唯有在这场艰苦的战争中得胜，才能打破青年期的难关而踏上成人的大道。儿童期所要征服的是物质世界，青年期所要征服的是精神世界。还有最悲壮的是现在的自我和过去的自我冲突：从前费了多少心血获得的宝物，此刻要费更多的心血去反抗，以求解脱。

“这个时期正是他闭着眼睛对幼年时代的一切偶像反抗的时期。他恨自己，恨他们，因为当初曾经五体投地的相信了他们，——而这种反抗也是应当的。人生有一个时期应当敢不公平。敢把跟着别人佩服的敬重的东西——不管是真理的谎言——一概摒弃，敢把没有经过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统统否认。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见闻，使一个儿童把大量的谎言与愚蠢，和人生主要的真理混在一起吞饱了，所以他若要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少年时期的第一件责任就得把宿食呕吐干净。”

是这种心理状态驱使克利斯朵夫肆无忌惮地抨击前辈的宗师，抨击早已成为偶像的杰作，抉发德国民族底矫伪和感伤性，在他的小城里树立敌人，和大公爵冲突，为了精神的自己丧失了一切物质上的依傍，终而至于亡命国外。（关于这些，尤其是克利斯朵夫对于某些大作的攻击，原作者在卷四底初版序文里就有简短的说明。）

至于强烈犷野的力在胸中冲撞奔突的骚乱，尚未成形的艺术天才挣扎图求生长的苦闷，又是青年期底另外一支精神巨流。

“一年之中有几个月是阵雨的季节，同样，一生之中有些年龄特别富于电力...

“整个的人都很紧张。雷雨一天一天的酝酿着。白茫茫的天上布满着灼热的云。没有一丝风，凝集不动的空气在发酵，似乎沸腾了。大地寂静无声，麻痹了。头里在发烧，嗡嗡的响着，整个天地等着那愈积愈厚的力爆发，等着那重甸甸的高举着的锤子打在乌云上面。又大又热的阴影移过，一阵火刺刺的风吹过；神经像树叶般发抖...

“这样等待的时候自有一种悲怆而痛快的感觉。虽然你受着压迫，浑身难过，可是你感觉到血管里头有的是烧着整个宇宙的烈火。陶醉的灵魂在锅炉里沸腾，像埋在酒桶里的葡萄。千千万万的生与死的种子都在心中活动，结果会产生些什么来呢？...像一个孕妇似的，你的心不声不响的看着自己，焦急的听着脏腑的颤动，想道：‘我会生下些什么来呢？’”

这不是克利斯朵夫一个人的境界，而是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心灵在成长时期所共有的感觉。

“欢乐，如醉如狂的欢乐，好比一颗太阳照耀着一切现在的与未来的成

就，创造的欢乐，神明的欢乐！唯有创造才是欢乐。唯有创造的生灵才是生灵。其余的尽是与生命无关而在地下飘浮的影子…

“创造，不论是肉体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总是脱离躯壳的樊笼，卷入生命的旋风，与神明同寿。创造是消灭死。”

瞧，这不是贝多芬式的艺术论么？这不是柏格森派的人生观么？现代的西方人是从另一途径达到我们古谚所谓“物我同化”的境界的，译者所热诚期望读者在本书中有所领会的，也就是这个境界。

“创造才是欢乐”，“创造是消灭死”，是罗曼·罗兰这阉大交响乐中的基调；他所说的不朽，永生，神明，都当作如是观。

我们尤须牢记的是，切不可狭义地把《克利斯朵夫》单看做一个音乐家或艺术家底传记。艺术之所以成为人生底酵素，只因为它含有丰满无比的生命力。艺术家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模范，只因为他是不完全的人群中比较最完全的一个。而所谓完全并非是圆满无缺，而是颠扑不破地、再接再厉地向着比较圆满无缺的前途迈进的意思。

然而单用上述几点笼统的观念还不足以概括本书底精神。译者在第一册卷首的献辞和这段弁言底前节里所说的，只是《克利斯朵夫》这部书属于一般的、普泛的方面。换句话说，至此为止，我们的看法是对一幅肖像画的看法：所见到的虽然也有特殊的征象，但演绎出来的结果是对于人类的一般的、概括式的领会。可是本书还有另外一副更错杂的面目：无异一幅巨大的历史画，——不单是写实的而且是象征的，含有预言意味的。作者把整个十九世纪末期的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民族史、艺术史来做这个新英雄底背景。于是本书在描写一个个人而涉及人类永久的使命与性格以外，更具有反映某一特殊时期的历史性。

最显著的对比，在卷四与卷五中占着一大半篇幅的，是德法两个民族的比较研究。罗曼·罗兰使青年的主人翁先对德国作一极其严正的批判：

“他们耗费所有的精力，想把不可调和的事情加以调和。特别从德国战胜以后，他们更想来一套令人作恶的把戏，在新兴的力和旧有的原则之间觅取妥协…吃败仗的时候，大家说德国是爱护理想。现在把别人打败了，大家说德国就是人类的理想。看到别的国家强盛，他们就像莱辛一样的说：‘爱国心不过是想做英雄的倾向，没有它也不妨事’并且自称为‘世界公民’。如今自己抬头了，他们便对于所谓‘法国式’的理想不胜轻蔑，对什么世界和平，什么博爱，什么和衷共济的进步，什么人权，什么天然的平等，一律瞧不起；并且说最强的民族对别的民族可以有绝对的权利，而别的民族，就因为弱，所以对它绝对没有权利可言。它，它是活的上帝，是观念的化身，它的进步是用战争，暴行，压力，来完成的…”（在此，读者当注意这段文字是在本世纪初期写的。）

尽量分析德国民族以后，克利斯朵夫便转过来解剖法兰西了。卷五用的“节场”这个名称就是含有十足暴露性的。说起当时的巴黎乐坛时，作者认为“只是一味的温和，苍白，麻木，贫血，憔悴…”又说那时的音乐家“所缺少的是意志，是力；一切的天赋他们都齐备，——只少一样：就是强烈的生命。”

“克利斯朵夫对那些音乐界的俗物尤其感到恶心的，是他们的形式主义。他们之间只讨论形式一项。情操，性格，生命，都绝口不提！没有一个人想到真正的音乐家是生活在音响的宇宙中的，他的岁月就寄于音乐的浪

潮。音乐是他呼吸空气，是他生息的天地。他的心灵本身便是音乐；他所爱，所憎，所苦，所惧，有希望，又无一而非音乐...天才是要用生命力的强度来测量的，艺术这个残缺不全的工具也不过想唤引生命罢了。但法国有多少人想到这一点呢？对这个化学家式的民族，音乐似乎只是配合声音的艺术。它把字母当作书本...”

等到述及文坛、戏剧界的时候，作者所描写的又是一片颓废的气象，轻佻的癖习，金钱的臭味。诗歌与戏剧，在此拉丁文化底最后一个王朝里，却只是“娱乐的商品”。笼罩着知识阶级与上流社会的，只有一股沉沉的死气：

“豪华的表面，繁嚣的喧闹，底下都有死的影子。”

巴黎的作家都病了...但在这批人，一切都归结到贫瘠的享乐。贫瘠，贫瘠。这就是病根所在。滥用思想，滥用感官，而毫无果实...”

对此十九世纪底“世纪末”现象，作者不禁大声疾呼：

“可怜虫！艺术不是给下贱的人享用的下贱的刍秣。不用说，艺术是一种享受，一切享受中最迷人的享受。但你只能用艰苦的奋斗去换来，等到‘力’高歌胜利的时候才有资格得到艺术的桂冠...你们沾沾自喜的培养你们民族的病，培养他们的好逸恶劳，喜欢享受，喜欢色欲，喜欢虚幻的人道主义，和一切足以麻醉意志，使它萎靡不振的因素。你们简直是把民族带去上鸦片烟馆...”

巴黎的政界，妇女界，社会活动的各方面，却逃不出这腐化的氛围。然而作者并不因此悲观，并不以暴露为满足，他在苛刻的指摘和破坏后面早就潜伏着建设的热情。正如克利斯朵夫早年的剧烈抨击古代宗师，正是他后来另创新路的起点。破坏只是建设底准备。在此德法两民族底比较与解剖下面，隐伏着一个伟大的方案：就是以德意志的力救济法兰西的萎靡，以法兰西的自由救济德意志的柔顺服从，西方文化第二次的再生应当从这两个主要民族底文化交流中发轫。所以罗曼·罗兰使书中的主人翁生为德国人，使他先天成为一个强者，力底代表（他的姓克 拉夫脱在德文中就是力的意思）；秉承着古弗拉芒族底质朴的精神，具有贝多芬式的英雄意志，然后到莱茵彼岸去领受纤腻的、精炼的、自由的法国文化底洗礼。拉丁文化太衰老，日耳曼文化太粗犷，但是两者汇合融和之下，倒能产生一个理想的新文明。克利斯朵夫这个新人，就是新人类底代表。他的最后的旅程，是到拉斐尔底祖国去领会清明恬静的意境。从本能到智慧，从粗犷的力到精炼的艺术，是克利斯朵夫前期的生活趋向，是未来文化——就是从德国到法国——底第一个阶段。从血淋淋的战斗到平和的欢乐，从自我和社会的认识到宇宙的认识，从扰攘骚乱到光明宁静，从多雾的北欧越过了阿尔卑斯，来到阳光绚烂的地中海，克利斯朵夫终于达到了最高的精神境界：触到了生命底本体，握住了宇宙底真如，这才是最后的解放，“与神明同寿”！意大利应当是心灵底归宿地。（卷五末所提到的葛拉齐亚便是意大利底化身。）

尼采底查拉图斯脱拉现在已经具体成形，在人间降生了。他带来了鲜血淋漓的现实。托尔斯泰底福音主义的使徒只成为一个时代底幻影，烟雾似的消失了，比“超人”更富于人间性、世界性、永久性的新英雄克利斯朵夫，应当是人类以更大的苦难、更深的磨炼去追求的典型。

这部书既不是小说，也不是诗，据作者的自白，说它有如一条河。莱茵这条横贯欧洲的巨流是全书底象征。所以第一卷第一页第一句便是极富于音乐意味的、包藏无限生机的“江声浩荡.....”

对于一般的读者，这部头绪万端的迷宫式的作品，一时恐怕不容易把握它的真际，所以译者谦卑地写这篇说明作为引子，希望为一般探宝山的人做一个即使不高明、至少还算实忠的向导。

译者
一九四 年

约翰·克利斯朵夫（二）

第一部 松动的沙土

反抗

摆脱了！……摆脱了别人，摆脱了自己！……一年以来把他束缚着的情欲之网突然破裂了。怎么破裂的呢？他完全不知道。他的生命奋发之下，所有的锁链都松解了。这是发育时期的许多剧变之一；昨天已死的躯壳和令人窒息的往昔的灵魂，在发育时期都被强毅的天性撕得粉碎。

克利斯朵夫非常畅快的呼吸着，可不大明白自己有了什么改变。他送了高脱弗烈特回来，寒气凛冽的旋风在城门洞里打转。行人都低着头。上工的姑娘们气忿忿的和往裙子里直钻的狂风撑持；她们停下来喘着气，鼻子和腮帮都给吹得通红，脸上露着愤怒的神色，真想哭出来。克利斯朵夫可快活得笑了。他所想的并非眼前的这阵风暴，而是他才挣脱出来的精神上的风暴。他望着严冬的天色，盖满着雪的城市，一边挣扎一边走路的人们；他看看周围，想想自己：一点束缚也没有了。他是孤独的……孤独的！多快乐啊，独立不羁，完全自主！多快乐：摆脱了他的束缚，摆脱了往事的纠缠，摆脱了所爱所憎的面目的骚扰！多快乐：生活而不为生活俘虏，做着自己的主人！……

回到家里，浑身是雪。他高兴的抖了抖，像条狗似的。母亲在走廊里扫地，他在旁边走过，把她从地下抱起，嘴里唧唧啾啾的亲热的叫了几声，像对付小娃娃那样。克利斯朵夫身上全给溶化的雪弄潮了；年老的鲁意莎在儿子的臂抱里拚命抗拒，像孩子般天真的笑着，叫他做“大畜生”！

他连奔带爬的上楼，进了卧室。天那么黑，他照着小镜子竟不大看清自己。可是他心里快活极了。又矮又黑，难于转身的卧房，他觉得差不多是个王国。他锁上了门，心满意足的笑着。啊，他终于把自己找到了！误入歧途已经有多少时候！他急于要在自己的思想中沉浸一番。如今他觉得自己的思想像一口宽广的湖，到了远处跟金色的雾化成一片。发过了一夜的烧，他站在岸旁，腿上感觉到湖水的凉气，夏日的晨风吹拂着身体。他跳下去游泳，不管也不在乎游到哪儿，只因为能够随意游泳而满心欢喜。他一声不出，笑着，听着心中无数的声音：成千累万的生命都在里头蠢动。他头在打转，什么都分辨不清了，只啞摸到一种目眩神迷的幸福。他很高兴能感觉到这些无名的力，可是他懒洋洋的还不想马上加以试验，只迷迷忽忽的体味着这个志得意满的陶醉的境界，因为自己的内心已经到了百花怒放的季节，那是被压了几个月而像突然临到的春天一样爆发起来的。

母亲招呼他吃饭了。他昏昏沉沉的下楼，好似在野外过了一整天以后的情形；脸上那种光彩甚至使鲁意莎问他有什么事。他不回答，只搂着她的腰在桌子周围跳舞，让汤钵在桌上冒烟。鲁意莎喘着气喊他做疯子；接着她又拍着手嚷起来：

“天哪！”她很不放心的说，“我敢打赌他又爱上了什么人了！”

克利斯朵夫放声大笑，把饭巾丢在空中。

“又爱上了什么人！”他喊道。“啊！天！……不，不！那已经够了！你放心。嘿！那是完啦，完啦，一辈子的完啦！”

说罢，他喝了一大杯凉水。

鲁意莎望着他，放心了，可是摇摇头笑着：“哼，说得好听！还不像酒鬼一样，要不了一天就不算数的。”

“便是一天也是好的，”他很高兴的回答。

“不错！可是究竟什么事教你这样乐的？”

“我就是乐，没有什么理由。”

他肘子靠在桌上，和她对面坐着，把他将来要干的事统统告诉她。她又亲切又不大相信的听着，提醒他汤要凉了。他知道她并没有听，可也不在乎；因为他是说给自己听的。

他们俩笑着，互相望着：他说着话，她并不怎么听进去。虽然她有这样一个儿子很得意，可并不十分重视他艺术方面的计划；她只想着：“既然他这样快活，那就行了。”他一边对自己的议论听得飘飘然，一边望着母亲的脸色，头上紧紧的裹着黑巾，头发雪白，年轻的眼睛不胜怜爱的瞅着他；神气那么安静那么慈祥。他完全能看出她的思想。

“我说的这些，你都满不在乎，可不是？”他带着开玩笑的口气说。

“哪里？哪里？”她勉强否认。

他把她拥抱着说：“怎么不是，怎么不是！得了吧！用不着辩。你这么办也不错。只要爱我就行了。我不需要人家了解我，既不要你了解，也不要谁了解。现在我再也不需要谁，不需要什么了：我心里什么都有！……”

“啊，”鲁意莎接着说，“他现在又疯着一点儿什么了！……也罢！既然非风魔不可，我宁可他有这一种。”

让自己在思想的湖上飘浮，多甜蜜，多快乐！……躺在一条小船里头，浴着阳光，水面上清新的微风在脸上轻轻拂过，他悬在空中，睡着了。在他躺着的身子底下，在摇摆的小船底下，他感觉到深沉的水波；他懒懒的把手浸在水里。他抬起身子把下巴搁在船边上，像童时那样望着湖水流过。他看见水中映出多少奇怪的生灵像闪电般飞逝……一批过了又是一批，从来没有相同的。他对着眼前这种奇幻的景象笑了，对着自己的思想笑了；他不需要固定他的思想。挑选吗？干么要在这千千万万的梦境中挑选呢？有的是时间！……将来再说罢！等到他要的时候，只消撒下网去就能把在水里发光的怪物捞起……现在先让它们过去，等将来再说罢！

小船随着温暖的微风与迟缓的水波飘浮。天气温和，阳光明媚，四下里静悄悄的。

他终于懒洋洋的撒下网去；俯在到处起泡的水上，他瞧着网完全沉下。呆了一忽儿，他从容不迫的把网拉起来，觉得越拉越重了；正要从水中提出的时候，他停下来喘一口气。他知道有了收获，可不知道是什么收获；他有心延宕，想多咂摸一下等待的乐趣。

终于他下了决心：五光十色的鱼出现到水外来来了；它们扭来扭去像一窝乱蛇。他好不诧异的瞧着，拿手指去拨动，想挑出最好看的放在手里鉴赏一会；但才把它们提到水外，变化无穷的色彩就黯淡了，它们本身也在他手中化掉了。他重新把它们扔在水里，重新下网。他对于心中蠢动的梦境，极想一个一个的瞧过来，可一个都不愿意留下；他觉得它们在明净的湖中自由飘浮的时候更美……

他唤起各式各样的梦境，一个比一个荒唐。他的思想已经积聚了多少时候没有用过，心中装满的宝藏膨胀得要爆起来了。可是一切都乱七八糟：他的思想好比一个杂货栈，或是犹太人的骨董店；稀有的宝物，珍奇的布帛，废铜旧铁，破烂衣服，统统堆在一间房里。他分辨不出哪些是最有价值的，只觉得全都有趣。其中有的是互相击触的和弦，像钟一般奏鸣的色彩，像蜜

蜂般嗡嗡响着的和声，像多情的嘴唇般笑盈盈的调子。有的是幻想的风景，面貌，各种热情，各种心灵，各种性格，文学的或玄学的思想。有的是庞大的无法实现的计划：什么四部剧，十部剧，想把什么都描写为音乐，包括各式各样的天地。还有的（而且是最多的）是暧昧的，闪电似的感觉，都是突然之间无缘无故激发起来的，说话的声音，路上的一个人，滴答的雨声，内心的节奏，都可成为引子。——许多这一类的计划只有一个题目；大多数只有一二行，可是已经够了。他像小孩子一样，把幻想中创造的当做已经真的创造了。

然而他活泼的生机不容许他长时间的以这种烟雾似的幻梦为满足。虚伪的占有，他觉得厌倦了，他要抓住梦境。——可是从何下手呢？这一个跟那一个都显得一样重要。他把它们翻来覆去，一忽儿丢下，一忽儿又捡起……不，那是不能重拾的，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一个梦决不给你连抓到两次；它随时随地都在变，在他手里，在他眼前，在他眼睁睁的瞧着的时候已经变了。必须赶快才好，可是他不能；工作的迟缓使他惶惑。他恨不得一天之中把什么都做完，但连最小的工作他也觉得困难得不得了。最糟的是他才开始工作已经在厌恶这工作。他的梦过去了，他自己也过去了。他做着一桩事，心里就在懊恼没有做另外一桩。只要他在美妙的题材中挑定一个，就会使他对这个题材不感兴趣。因此他所有的宝藏都变成毫无用处。他的思想，唯有他不去碰它的时候才有生命；凡是他能抓握到的都已经死了。这真是当太尔式的痛苦：仰取果实，变为石块；俯饮河水，水即不见¹。

为了苏解他的饥渴，他想乞灵于已经获得的泉源，把他从前的作品来安慰一下……可是那种饮料简直受不了！他喝了第一口便连咒带骂的唾了出来。怎么！这不冷不热的东西，这种乏味的音乐，便是他的作品吗？——他把自己的曲子重新看了一遍，心里说不出的懊丧：他莫名其妙，不懂当初怎么会写出来的。他脸红了。有一次，看到特别无聊的一页，他甚至转过身去看看室内有没有人，又去把脸埋在枕上，好似一个害臊的儿童。又有几次，他的作品显得那么可笑，以至他竟忘了是自己的大作……

“嘿！该死的！”他叫着，笑弯了腰。

但他最受不住的，莫过于那些他从前自以为表白热情，表白爱情的喜悦与悲苦的乐曲。他从椅子上跳起来，仿佛给苍蝇咬了一口，用拳头打着桌子，敲着脑门，愤怒得直叫，用粗话来骂自己，把自己当做蠢猪，混蛋，畜生，小丑。最后他喊得满面通红的去站在镜子前面，抓着自己的下巴，说着：“你瞧，你瞧，你这蠢东西，你这蠢驴似的嘴脸！你扯谎！让我来教训你！替我去投河死了罢，先生！”

他把脸埋在面盆里，直浸到闭过气去，然后他脸色绯红，眼珠往外突着，像海豹一般直喘大气，也顾不得抹一抹脸，就奔向书桌，拿起该死的乐曲气冲冲的撕掉了，嘴里咕噜着：“去你的吧，你瞧，混蛋！该死的家伙！……你瞧，你瞧！……”

他这才觉得松了口气。

这些作品里使他最气恼的是谎话。没有一点东西出于真正的感觉。只是背熟的滥调，小学生的作文：他谈着爱情，仿佛瞎子谈论颜色，全是东掀西拾，人云亦云的俗套。而且不只是爱情，一切的热情都被他当作高谈阔论的

¹ 当太尔为神话中里第国王，因杀子殒神，被罚永久饥渴。

题目。——固然，他一向是努力求真诚的，但光是想要真诚还不够：问题是要真能做到；而一个人对人生毫无认识的时候，又怎么能真诚呢？靠了最近六个月的经历，他才能发觉这些作品的虚伪，才能在现在和过去之间突然看出一条鸿沟。如今他跳出了虚幻的境界，有了一个真正的尺度，可以测验他思想真伪的程度了。

既然痛恨从前没有热情就写下来的作品，再加上他矫枉过正的脾气，他就打定主意，从此不受热情驱策决不写作。他也不愿意再去捕捉自己的思想，发誓除非创作的欲望像打雷似的威逼他，他是永远放弃音乐的了。

他这么说着，因为他明明知道暴风雨快来了。

所谓打雷，他要它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发生就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发生。但在高处比较更容易触发，有些地方——有些灵魂——竟是雷雨的仓库：它们会制造雷雨，在天上把所有的雷雨吸引过来；一年之中有几个月是阵雨的季节，同样，一生之中有些年龄特别富于电力，使霹雳的爆发即使不能随心所欲，至少也能如期而至。

整个的人都很紧张。雷雨一天一天的酝酿着。白茫茫的天上布满着灼热的云。没有一丝风，凝集不动的空气在发酵，似乎沸腾了。大地寂静无声，麻痹了。头里在发烧，嗡嗡的响着；整个天地等着那愈积愈厚的力爆发，等着那重甸甸的高举着的锤子打在乌云上面。又大又热的阴影移过，一阵火刺刺的风吹过：神经像树叶般发抖……随后又是一片静寂。天空继续酝酿着雷电。

这样等待的时候自有一种悲怆而痛快的感觉。虽然你受着压迫，浑身难过，可是你感觉到血管里头有的是烧着整个宇宙的烈火。陶醉的灵魂在锅炉里沸腾，像埋在酒桶里的葡萄。千千万万的生与死的种子都在心中活动。结果会产生些什么来呢？……像一个孕妇似的，你的心不声不响的看着自己，焦急的听着脏腑的颤动，想道：“我会生下些什么来呢？”

有时不免空等一场。阵雨散了，没有爆发；你惊醒过来，脑袋重甸甸的，失望，烦躁，说不出的懊恼。但这不过是延期而已；阵雨早晚要来的；要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它爆发得越迟，来势就越猛烈……

瞧，它不是来了吗？……生命的各个隐蔽的部分，都有乌云升起。一堆堆蓝得发黑的东西，不时给狂暴的闪电撕破一下——它们飞驰的迅速使人眼花缭乱，从四面八方来包围心灵；尔后，它们把光明熄灭了！突然之间从窒息的天空直扑下来。那真是如醉若狂的时间！……奋激达于极点的原素，平时被自然界的规律——维持精神的平衡而使万物得以生存的规律——幽禁在牢笼里的，这时可突围而出，在你意识消灭的时候统治一切，显得巨大无比，莫可名状。你痛苦之极。你不再向往于生命，只等着死亡来解放了……

而突然之间是电光闪耀！

克利斯朵夫快乐得狂叫了。

欢乐，如醉如狂的欢乐，好比一颗太阳照耀着一切现在的与未来的成就，创造的欢乐，神明的欢乐！唯有创造才是欢乐。唯有创造的生灵才是生灵。其余的尽是与生命无关而在地下飘浮的影子。人生所有的欢乐是创造的欢乐；爱情，天才，行动，——全靠创造这一团热火迸射出来的。便是那些在巨大的火焰旁边没有地位的：——野心家，自私的人，一事无成的浪子，——也想借一点黯淡的光辉取暖。

创造，不论是肉体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总是脱离躯壳的樊笼，卷入生

命的旋风，与神明同寿。创造是消灭死。

可怜的是不能生产的人，在世界上孤零零的，流离失所，眼看着枯萎憔悴的肉体与内心的黑暗，从来没有冒出一朵生命的火焰！可怜的是自知不能生产的灵魂，不像开满了春花的树一般满载着生命与爱情的！社会尽管给他光荣与幸福，也只是点缀一具行尸走肉罢了。

克利斯朵夫受着光明照耀的时候，一阵电流在身上流过，使他发抖了。那好像在黑夜茫茫的大海中突然出现了陆地。也好像在人堆里忽然遇到一双深沉的眼睛瞪了他一下。这种情形，往往是在几小时的胡思乱想，意气消沉之后发生的，尤其在想着别的事，或是谈话或是散步的时候。倘若在街上，他还因为顾虑而不敢高声表示他的快乐。在家里可什么都拦不住他了。他手舞足蹈，直着嗓子哼一支欢呼胜利的调子。母亲听惯了这种音乐，结果也明白了它的意义。她和克利斯朵夫说，他活像一只才下了蛋的母鸡。

乐思把他渗透了：有时是单独而完整的一句；更多的时候是包裹着整部作品的一片星云：曲子的结构，大体的线条，都在一个幕后面映现出来；幕上还有些光华四射的句子，在阴暗中灿然呈露，跟雕像一样分明。那仅仅像一道闪电；有时是接踵而至的好几道闪电；而每一道光明都在黑暗中照出一些新的天地。但这个捉摸不定的力，往往出其不意的露了一忽儿脸，会在神秘的一隅躲上几天，只留下一道光明的痕迹。

克利斯朵夫一味体验着这种灵感的乐趣，对其余的一切都厌弃了。有经验的艺术家当然知道灵感是难得的，凡是由直觉感应的作品必须靠智力完成；所以他尽量挤压自己的思想，把其中所有的神圣的浆汁吸收干净，（甚至还常常加些清水）——可是克利斯朵夫年纪太轻，太有自信，不免轻视这些手段。他抱着不可能的梦想，只愿意产生一些从头至尾都是自然而然流出来的作品。要不是他有心不顾事实，他不难发觉这种计划的荒谬。没有问题，那时正是他精神上最丰富的时代，绝对没有给虚无侵入的空隙。对于这源源不绝的灵感，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引子；眼中见到的，耳中听到的，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一瞥一视，片言半语，都可以在心中触发一些梦境。在他浩无边际的思想天地中，布满着千千万万的明星。——然而便是这种时候，也有一切都一下子熄灭的事。虽然黑夜不会长久，虽然思想的缄默不致延长到使他痛苦的程度，他究竟怕这无名的威力一忽儿来找着他，一忽儿离开他，一忽儿又回来，一忽儿又消灭……他不知道这一回的消灭要有多久，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恢复。——高傲的性格使他不愿意想到这些，他对自己说着：“这力量就是我。一朝它消灭了，我也不存在了：我会自杀的。”——他不住的心惊胆战；可是这倒反给他多添了一种快感。

然而即使灵感在目前还没有枯竭的危险，克利斯朵夫也已经明白单靠灵感是永远培养不起一件整部的作品的。思想出现的时候差不多老是很粗糙，必须费很大的劲把它们去芜存菁。并且它们老是断断续续的，忽起忽落的；倘使要它们连贯起来，必需闯入深思熟虑的智慧和沉着冷静的意志，才能锻炼成一个新生命。克利斯朵夫既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当然不会不做这一步功夫；但他不肯承认，而硬要相信自己仅仅是传达心中的模型，其实他为了使它明白晓畅起见，早已把内心的意境多多少少变化过了。——不但如此，他有时竟完全误解思想的含义。因为乐思的来势太猛了，他往往没法说出它意义所在。它闯入心灵隐处的时候，还远在意识领域之外，而这样纯碎的力又是超出一般的规律的，意识也无法辨认出来，使自己骚动而集中注意的究

究竟是什么，它所肯定的感情又是哪一种：欢乐，痛苦，都在那独一无二的，因为是超乎智力而显得不可解的热情中混在一起。可是了解也罢，不了解也罢，智慧究竟需要对这种力给一个名字，使它和人类孜孜矻矻砌在头脑里的，逻辑的结构，有所联系。

因此，克利斯朵夫相信，——要自己相信，——在他内心骚扰的那种暧昧的力，的确有一个确定的意义，而这意义是和他的意志一致的。从深邃的潜意识中涌跃出来的自由的本能，受着理智的压迫，不得不和那些明白清楚而实际上跟它毫不相干的思想合作。在这种情形之下，作品不过是把两种东西勉强放在一起：一方面是克利斯朵夫心中拟定的一个伟大的题材，一方面是意义别有所在而克利斯朵夫也茫然不知的那些粗犷的力。

他低着头摸索前进，受着多少矛盾的，在胸中互相击撞的力的鼓动，在支离灭裂的作品中放进一股暗晦而强烈的生命，那是他无法表白，但是使他志得意满，非常高兴的。

自从他意识到自己有了簇新的精力，他对于周围的一切，对人家过去教他崇拜的一切，对他不假思索而一味尊敬的一切，敢于正视了；——并且立刻肆无忌惮的加以批判。幕撕破了：他看到了德国人的虚伪。

一切民族，一切艺术，都有它的虚伪。人类的食粮大半是谎言，真理只有极少的一点。人的精神非常软弱，担当不起纯粹的真理。必须由他的宗教，道德，政治，诗人，艺术家，在真理之外包上一层谎言。这些谎言是适应每个民族而各各不同的：各民族之间所以那么难于互相了解而那么容易彼此轻蔑，就因为有些谎言作祟。真理对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谎言，而且都称之为理想；一个人从生到死都呼吸着这些谎言，谎言成为生存条件之一；唯有少数天生的奇才经过英勇的斗争之后，不怕在自己那个自由的思想领域内孤立的时候，才能摆脱。

由于一个极平常的机会，克利斯朵夫突然发觉了德国艺术的谎言。他早先的不觉察，并非因为他没有机会常常看见，而是因为距离太近，没有退步的缘故。现在，山的面目显出来了，因为他离得远了。

他在市立音乐厅的某次音乐会里。大厅上摆着十几行咖啡桌，——大概有二三百张。乐队在厅的尽里头的台上。克利斯朵夫周围坐着些军官，穿着紧窄的深色长外套，——胡子剃得很光，阔大的红红的脸，又正经又俗气；也有些高声谈笑的妇人，过分装做洒脱；天真的女孩子们露着全副牙齿微笑；胡髭满面，戴着眼镜的胖男子，活像眼睛滚圆的蜘蛛。他们每喝一杯酒总得站起来向什么人举杯祝贺健康，态度非常恭敬，虔诚，把脸色与说话的音调都变过了：好似念着弥撒祭里的经文，他们扮着庄严而可笑的神气互相敬酒。音乐在谈话声与杯盘声中消失了。可是大家把说话和饮食的声音尽量压低。乐队指挥是个高大的驼背老人，挂在下巴上的须像条尾巴，往下弯的长鼻子架着眼镜，神气颇像一个语言学家。——这些典型的人物，克利斯朵夫久已熟识。但这一天，他忽然用着看漫画的目光看他们了。的确，有些日子，凡是平时不觉察的旁人的可笑，会无缘无故跃入我们眼里的。

音乐会的节目包括《哀格蒙序曲》，华特多弗的《华尔兹》，《坦华塞巡礼罗马》，尼古莱的《风流妇人》，《阿丹丽进行曲》，《北斗星》杂曲。

《哀格蒙序曲》为贝多芬作品，《坦华塞巡礼罗马》为华葛耐歌剧《坦华塞》中的一段，《阿丹丽进行曲》为孟特利尔所作，《北斗星》为曼伊贝所作的喜歌剧。

贝多芬的《序曲》奏得很照规矩，《华尔兹》奏得很激昂。轮到《坦华塞巡礼罗马》的时候，台下有开拔瓶塞的声音。克利斯朵夫邻桌的一个胖子按着《风流妇人》的音乐打拍子，挤眉弄眼的做着法斯太夫的姿势。一位又老又胖的妇人，穿着天蓝衣衫，束着一条白带子，扁鼻梁上夹着一副金边眼镜，皮色鲜红的胳膊，粗大的腰围，用宏大的嗓子唱着舒芒和勃拉姆斯的歌。她扬着眉毛，做着媚眼，着眼皮，忽左忽右的摇头摆脑，满月似的脸上挂着个肥大的笑容，穷形极相的做着哑剧：要没有她那副庄重老成的气息，简直像咖啡店里的歌女。这位儿女满堂的妈妈，居然还扮做痴騃的姑娘，想表现青春，表现热情；而舒芒的歌也就跟着像逗弄小娃娃的玩意儿。大家都听得出神了。可是南德合唱班的人马一出台。听众的注意简直到了庄严的程度。合唱班一忽儿唧唧唔唔的，一忽儿大声叫吼的，唱了几支极有情致的歌。四十个人的声音等于四个人，似乎他们有意取消真正合唱的风格，只卖弄一些旋律的效果，凄凄楚楚的自以为极尽细腻，轻的时候像要咽气，响的时候又突然震耳欲聋，好似敲着大铜鼓；总之是既不浑厚，又不平衡，纯粹是柔靡不振的风格，令人想起鲍东的妙语：

“让我来装做狮子罢。我的叫吼可以跟嘴里衔着食物的白鸽的声音一样柔和，也可以教人相信是夜莺的歌唱。”

克利斯朵夫听着，一开头就越来越诧异。这些情形对他绝对不是新鲜的。这些音乐会，这个乐队，这般听众，他都是熟的。但突然之间他觉得一切都虚伪。一切，连他最心爱的《哀格蒙序曲》在内，那种虚张声势的骚动，一板三眼的激昂慷慨，这时都显得不真诚了。没有问题，他所听到的并非贝多芬和舒芒，而是贝多芬和舒芒的可笑的代言人，而是嘴里嚼着东西的群众，把他们的愚蠢像一团浓雾似的包围着作品。——不但如此，作品中间，连最美的作品中间，也有点儿令人不安的成分，为克利斯朵夫从来没感觉到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不敢分析，以为怀疑心爱的大师是亵渎的。他不愿意看，可是已经看到了，而且还不由自主的要看下去；像比土的含羞草一般，他在指缝里偷看。

他把德国艺术赤裸裸的看到了。不论是伟大的还是无聊的，所有的艺术家都婆婆妈妈的，沾沾自喜的，把他们的心灵尽量暴露出来。有的是丰富的感情，高尚的心胸，而且真情洋溢，把心都融化了；日耳曼民族多情的浪潮冲破了堤岸，最坚强的灵魂给冲得稀薄，懦弱的就给淹溺在它灰色的水波之下：这简直是洪水；德国人的思想在水底里睡着了。像孟特尔特仲，勃拉姆斯，舒芒，以及等而下之的那些浮夸感伤的歌曲的小作家，又有些怎么样的思想！完全是沙土，没有一块岩石。只是一片湿漉漉的，不成形的黏土……这一切真是太荒唐太幼稚了，克利斯朵夫不相信听众会觉得。但他向周围瞧了一下，只看见一些恬然自得的脸，早就肯定他们所听到的一定是美的，一定是有趣的。他们怎么敢自动加以批评呢？对于这些人人崇拜的名字，他们是非常尊敬的。并且有什么东西他们敢不尊敬呢？对他们的音乐节目，对他们的酒杯，对他们自己，他们都一样的尊敬。凡是跟他们多少有些关系的，他们心里一概认为“妙不可言”。

克利斯朵夫把听众与作品轮流打量了一番，觉得作品反映听众，听众也

法斯太夫为莎士比亚喜剧《风流妇人》中愚蠢可笑的男子，亦见于《亨利四世》。

鲍东为莎士比亚名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丑角。

反映作品。克利斯朵夫忍俊不禁，装着鬼脸。等到合唱班庄严的唱起一个多情少女的羞怯的《自白》，他再也抑止不住，竟自大声的笑了。四下里立刻响起一片愤怒的嘘斥声。邻座的人骇然望着他，而他一看到这些吃惊的脸更笑得厉害，甚至把眼泪都笑了出来。这一下大家可恼了，喊着：“滚出去！”他站起来走了，耸耸肩膀，笑得浑身扭动。全场的人看了都气愤之极。从此克利斯朵夫就慢慢的跟他城里的人处于敌对的位置。

有了这次经验以后，克利斯朵夫回到家里，决定把几个“素受尊重的”音乐家的作品重新浏览一遍。结果他大为懊丧，因为发见他最敬爱的某些大师也有说谎的。他竭力怀疑，以为自己看错了。——可是不，没有怀疑的余地……一个伟大民族的艺术财富中竟有那么些平庸的作品与谎言，他真是大吃一惊。经得起磨勘的乐曲实在太少了！

从此，要去看别的心爱的作品的时候，他就免不了心惊肉跳……可怜他像中了妖法似的，到处都碰到同样的失意！他为了某几个大师简直心都碎了，仿佛失掉了一个最爱的朋友，也仿佛突然发觉自己那么信任的朋友已经把他欺骗了多年。他为之痛哭流涕，夜里睡不着了，苦恼不已。他责备自己：是不是他不会判断了？是不是他完全变了傻子？……不，不，他比什么时候都更能看到太阳的光辉，更能感到生命的丰满：他的心并没愚弄他……

他又等了好久，不敢惊动他认为最好最纯粹的作家，那些圣中之圣。他唯恐把自己对他们的信心动摇了。但一颗事事讲求真理的灵魂，本能上对一切都要追根究底，看透真相，即使因之而惹起痛苦也有所不顾：对这种铁面无私的本能，又有什么方法抗拒呢？——于是他打开那些神圣的作品，看看像军中的禁卫队似的最后一批精华……不料才看了几眼，就发见它们并不比别的更纯洁。他没有勇气继续了。有时他竟停下来，阖上乐谱，仿佛诺亚的儿子用外衣把父亲裸露的身体给遮起来似的。

这样以后，他对着这些废墟丧然若失。他恨不得牺牲一切，不让他神圣的幻象破灭。他心里悲痛极了。幸而元气那么充足，他对艺术的信仰并不因之而动摇。凭着年轻人天真自大的心理，他似乎认为以前谁也没经历过人生，还得他重头再来。因为沉醉于自己新生的力，他觉得——（也许并非没有理由）——除了极少的例外，在活生生的热情和艺术所表现的热情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以为自己表现的时候更成功更真切，那可错了。因为他充满着热情，所以在自己的作品中不难发见热情；但除了他以外，谁也不能在那些不完全的辞藻中辨别出来。他所指摘的艺术家多数是这种情形。他们心中所有的，表现出来的，的确是深刻的感情；但他们语言的秘钥随着他们的肉体一齐死了。

克利斯朵夫不懂得人的心理，根本没想到这些理由：他觉得现在是死的一向就是死的。他拿出青年人的霸道与残忍的脾气，修正他对过去的艺术家的意见。最高贵的灵魂也给他赤裸裸的揭开了，所有可笑的地方都没有被放过。而所谓可笑，在孟特尔仲是那种过分的忧郁，高雅的幻想，四平八稳而言之无物；在韦勃是虚幻的光彩，枯索的心灵，用头脑制造出来的感情；列兹是个贵族的教士，马戏班里的骑师，又是新古典派，又有江湖气，高贵的

诺亚为《旧约》中救人类于洪水的希伯莱族长，醉后裸卧，其二子萨姆与耶弗为之以衣覆蔽。

列兹于一八三九年曾受奥皇册封为贵族，于晚年（1865）在罗马入圣·芳济会为修士。马戏班骑师与江湖气，均指其卖弄技巧。

成分真伪参半，一方面是超然尘外的理想色彩，一方面又是令人厌恶的卖弄技巧；至于修倍尔脱，是被多愁善感的情绪淹没了，仿佛沉在几里路长的明澈而毫无味道的水底里。便是英雄时代的宿将，半神，先知，教会的长老，也不免虚伪。甚至那伟大的罢哈，三百年如一日的人物，承前启后的祖师，——也脱不了诳语，脱不了流行的废话与学究式的唠叨。在克利斯朵夫心目中，这位见过上帝的人物，他的宗教有时只是没有精神的，加着糖的宗教，而他的风格是七宝楼台式的，繁琐纤细的风格。他的冈大大中，有的是牵惹柔情的老虔婆式的调子，仿佛灵魂絮絮不休的向耶稣谈情，克利斯朵夫简直为之作恶，似乎看到了肥头胖耳的爱神飞舞大腿。并且，他觉得这位天才的歌唱教师是关在屋子里写作的，作品有股闭塞的气息，不像贝多芬或亨特尔特有那种外界的强劲的风，——他们以音乐家而论也许不及他伟大，可是更富于人性。克利斯朵夫对一般古典派的大师不满意的，还因为他们的作品缺少自由灵动的气息，而差不多全部是“建筑”起来的：有时是一种情绪用音乐修辞学的滥调加以扩大的；有时只是一种简单的节奏，一种装饰的素描，循环颠倒，翻来覆去，用机械的方式向各方面铺张，发展。这种对称的，叠床架屋的结构，——朔拿大与交响乐——使克利斯朵夫大为气恼，因为他当时对于条理之美，对于规模宏大，深思熟虑的结构之美，还不能领会。他以为这是泥水匠的而非音乐家的工作。

他的批评浪漫派，严厉也不下于此。可怪的是，他最受不了的倒是那般自命为最自由，最自然，最少用“建筑”功夫的作家，像舒芒那样在无数的小作品中把他们的生命一点一滴全部灌注进去的人。他尤其恨他们，因为在他们身上认出他自己少年时代的灵魂，和所有他此刻发誓要摆脱干净的无聊东西。当然，虚伪的罪名决不能加之于淳朴的舒芒：他几乎后来不说一句不是真正感觉到的话。然而他的榜样正好使克利斯朵夫懂得，德国艺术最要不得的虚伪还不在于艺术家想表现他们并不感到的情操，倒是在于他们想表现真正感到的情操，——因为这些情操本身就是虚伪的。音乐是心灵的镜子，而且是铁面无情的镜子。一个德国音乐家越天真越有诚意，就越暴露出德国民族的弱点，动摇不定的心境，婆婆妈妈的感情，缺少坦白，伪装的理想主义，看不见自己，不敢正视自己。而这虚伪的理想主义便是一般最大的宗师——连华葛耐在内——的疮疤。克利斯朵夫重读他的作品时，不禁咬牙切齿。《罗恩格林》于他显得是大声叫嚣的谎言。他恨这种粗制滥造的豪侠的传奇，虚假的虔诚，恨这个不知害怕的，没有心肝的主角，简直是自私与冷酷无情的化身，只知道自画自赞，爱自己甚于一切。这等人物，他在现实中只嫌见得太多：有的是这种德国道学家的典型，漂亮而没有表情，无懈可击而刻薄寡恩，把自己看作高于一切，不惜牺牲别人来供养自己。《荷兰飞人》的浓

罢哈每作一曲，必先称：“耶稣佑我！”一曲完成，必于纸尾附加一笔：“荣耀归主！”其虔诚为音乐家中罕见。“见过上帝”一语尤指罢哈所作圣乐而言。

冈大大（Cantata）与朔拿大，托卡大等同为曲体名称。冈大大为歌唱体。有时为一人独唱，有时为数部合唱或大合唱，往往由乐队伴奏。性质或为圣乐，或为俗乐。

罢哈曾任来比锡圣·多玛学院歌唱教师二十七年。

华葛耐所作《罗恩格林》歌剧中的主角罗恩格林（天神），营救人间被冤的女子哀尔撒，并与之结为夫妇，条件为新娘绝对不能问其为何许人，从何处来。婚后哀尔撒向其追问，罗即飘然远引，一去不返。当时华葛耐自比为罗恩格林，要社会爱他而不问其为何许人，从何处来。

厚的感伤情调与忧郁的烦闷，使克利斯朵夫同样不能忍受。《四部曲》中那些颓废的野蛮人，在爱情方面完全枯索无味，令人作恶。西格蒙劫走弱妹的时候，居然用男高音唱起客厅里的情歌。在《神之黄昏》里，西葛弗烈特和勃罗希特以德国式的好夫妻的姿态，在彼此面前，尤其在大众面前，夸耀他们虚浮的，唠叨的闺房的热情。各式各样的谎言都汇集在这些作品里：虚伪的理想主义，虚伪的基督教义，虚伪的中古色彩，虚伪的传说，天上的神，地下的人，无一不虚伪。在此自命为破除一切成规的戏剧中间，标榜得最显著的就是成规。眼睛，头脑，心，决不会不发觉这种情形，除非它们自愿。——而它们竟甘心情愿要受蒙蔽。对于这种幼稚而又老朽的艺术，野性毕露的粗人与装腔作势的小姑娘的艺术，德国人居然非常得意。

可是克利斯朵夫的厌恶是没用的：一听到这音乐，他照旧被作者恶魔般的意志抓住了，和别人一样的激动，也许更厉害。他笑着，哆嗦着，脸上火刺刺的，心中好似有千军万马在奔腾；于是他认为，在那些有这种飓风般的威力的人是百无禁忌的。他在唯恐幻梦破灭而战战兢兢的打开的神圣的作品中，发见自己的情绪和当年一样热烈，什么也没有减损作品的纯洁：那时他快活的叫起来了。这是他在大风浪中抢救出来的光荣的遗物。多运气啊！他似乎把自己救出了一部分。而这怎么不是他自己呢？他所痛恨的那些伟大的德国人，可不就是他的血和肉，就是他最宝贵的生命吗？他所以对他们这样严，因为他对自己就是这样严。还有谁比他更爱他们呢？修倍尔脱的慈祥，罕顿的无邪，莫扎尔德的温柔，贝多芬的英勇悲壮的心，谁比他感觉得更真切？韦勃使他神游于喁喁的林间，罢哈使他置身于大寺的阴影里面，顶上是北欧灰色的天空，四周是辽阔无垠的原野，大寺的塔尖高耸天际……在这些境界中谁比他更虔诚呢？——然而他们的诳语使他痛苦，永远忘不了。他把谎言归咎于民族性，认为只有伟大是他们自身的。那可错了。伟大与缺点同样是属于这个民族的，——它的雄伟而骚动的思潮，汇成一条音乐与诗歌的最大的河，灌溉着整个欧罗巴……至于天真的纯洁，他能在哪一个民族中找到而敢于对自己的民族这样苛求呢？

可是他完全没想到这些。仿佛一个宠惯的孩子，他无情无义的把从母亲那边得来的武器去还击母亲。将来，将来他才会发觉受到她多少好处，发觉她多么可贵呢……

但这个时期正是他闭着眼睛对幼年时代的一切偶像反抗的时期。他恨自己，恨他们，因为当初曾经五体投地的相信了他们。——而这种反抗也是应当的。人生有一个时期应当敢不公平，敢把跟着别人佩服的敬重的东西——不管是真理是谎言——一概摒弃，敢把没有经过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统统否认。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见闻，使一个儿童把大量的谎言与愚蠢，和人生主要的真理混在一起吞饱了，所以他若要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少年时期的第一件责任就得把宿食呕吐干净。

克利斯朵夫到了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厌恶一切的关头。本能逼着他把满肚子不消化的东西一齐淘汰。

第一先得摆脱那种令人恶心的多愁多病的情绪，那在德国人心中点点滴

华葛耐所作《罗恩格林》歌剧中的主角罗恩格林（天神），营救人间被冤的女子哀尔撒，并与之结为夫妇，条件为新娘绝对不能问其为何许人，从何处来。婚后哀尔撒向其追问，罗即飘然远引，一去不返。当时华葛耐自比为罗恩格林，要社会爱他而不问其为何许人，从何处来。

滴流出来的时候，像是从潮湿的地道里来的，有股霉烂的气息。来点儿光明吧！来点儿光明吧！像雨点一样多的歌，涓涓不绝的流出德国人的心情，散布着瘴气，臭味，必须来一阵干燥峭厉的风把它们一扫而空才好。歌的题材永远脱不了什么欲望，思乡，飞翔，请问，为何？敬月，敬星，献给夜莺，献给春天，献给太阳；或是什么春之歌，春之快乐，春天的旅行，春夜，春讯；或是爱情的声音，爱情的圆满，情话，情愁，情意；或是花之歌，花之敬礼，花讯；或是我心殷殷，我心如捣，我心已乱，我眼已花；还有是跟蔷薇，小溪，斑鸠，燕子等等来一套天真而痴騃的对白；再不然是提出些可笑的问句：——“要是野蔷薇没有刺的话，——燕子筑巢的时候她的配偶是老的一个呢还是新结合的？”——总而言之，全是春花秋月，触景生情，无病呻吟的靡靡之音。多少美妙的东西给亵渎了，多少高尚的感情被滥用了！而最糟的是，一切都是浪费掉的，老在公众前面把自己的心赤裸裸的拿出来，只想亲热的，楞头楞脑的，向人大声诉说衷曲。明明无话可说而偏偏絮絮不休！这些唠叨难道没有完的吗？——喂！池塘里的青蛙，你们静静行不行！

克利斯朵夫觉得最难堪的，莫过于表白爱情时的谎言，因为他更有资格拿它和事实相比。那套如泣如诉而循规蹈矩的情歌的公式，跟男子的情欲与女人的心都不相干。可是爱情这回事，写作的人也经历过来，一生中至少有过一次的！难道他们就是这样恋爱的吗。不，不，他们是扯谎，照例的扯谎，对自己扯谎；他们想要把自己理想化……而所谓理想化就是不敢正视人生，不敢看事情的真相——到处是那种胆怯，没有光明磊落的气概。到处是装出来的热情，浮夸的戏剧式的庄严，不论是为了爱国，为了饮酒，为了宗教，都是一样。所谓酒歌，只是把拟人法应用到酒和杯子方面去的玩艺，例如“你，高贵的酒杯啊……”等等。至于信仰，应该像泉水一般从灵魂中出其不意的飞涌出来的，这里却是像货物一样故意制造出来的。爱国的歌曲仿佛是写来给一群绵羊按着节拍咩咩的叫的……——哎！你们大声的吼罢！……怎么！难道你们竟永远的扯谎，——永远的理想化，——连喝醉的时候，厮杀的时候，疯狂的时候也要扯谎吗！……

克利斯朵夫甚至恨理想主义。他以为这种谎言还不如痛痛快快的赤裸裸的暴露。——骨子里他的理想主义比谁都浓厚，他以为宁可忍受粗暴的现实主义者，其实这些人是他最大的敌人。

但他给热情蒙蔽了。缥缈的雾，贫血的谎言，“没有阳光的幽灵式的思想”，使他挥身冰冷。他进着全部的生命力向往于太阳。他一味逞着青年人的血气，瞧不起周围的虚伪或是他假想的虚伪；他没看到民族的实际的智慧在那里逐渐造成一些伟大的理想，把粗野的本能加以驯服或加以利用。要使一个民族的心灵改头换面，既不是靠些专横的理由，靠些道德的与宗教的规律所能办到，也不是立法者与政治家，教士与哲学家所能胜任：必须几百年的苦难和考验，才能磨炼那些要生存的人去适应人生。

然而克利斯朵夫照旧作曲；而他指责别人的缺点，在自己的作品中就不能避免。因为创作在他是一种抑捺不住的需要，不肯服从智慧所定的规律的。一个人创作的动机并不是理智，而是需要。——并且，尽管把大多数的情操

此处所谓的歌（Lied）为德国特有的一种歌唱乐曲，有纯粹的民间歌谣，亦有音乐家以著名的诗歌谱成的。自无名作家以至贝多芬，修倍尔脱，舒芒等均制作甚伙，而庸俗作家的产量尤为丰富，在德国为家家户户歌咏的最通俗的音乐。本书中凡用仿宋体排的“歌”字，均指此种体裁的歌。

所有的谎言与浮夸的表现都认出来了，仍不足以使自己不蹈覆辙，那主要是得靠长时期艰苦的努力的。在现代的社会里，大家秉受了多少代懒惰的习惯之后，更不容易绝对的守真返朴。而有一般人，有一些民族，尤其办不到；因为他们有种不知趣的痼癖，在极应当缄口的时候，偏偏让自己的心唠叨不已。

克利斯朵夫还没认识静默的好处：在这一点上他的精神是纯粹德国式的；同时他也没有到懂得缄默的年纪。由于父亲的遗传，他爱说话，爱粗声大气的说话。他自己也觉察到，拚命想改掉；但这种挣扎反而使他一部分的精力变得麻痹了。此外他还得跟祖父给他的另外一种遗传斗争，就是要准确确的把自己表现出来极不容易。他是演奏家的儿子，卖弄技巧对他有很大的诱惑，当然是危险的诱惑：——那是纯粹属于肉体方面的快感，能够把肌肉灵活运用的快感，克服困难，炫耀本领，迷惑群众，一个人控制成千成百的人的快感。虽然追求这种快感在一个青年人是可以原谅的，差不多是无邪的，但对于艺术对于心灵究竟是个致命伤。那是克利斯朵夫知道的，是他血统里固有的，他竭力唾弃而结果仍免不了让步。

因此，种族的本能与自己天赋的本能都在鼓动他，过去的重负像寄生虫般粘着他，使他无法摆脱，他只能摇摇晃晃的前进，而结果已经和他深恶痛绝的境界相去不远。他当时所有的作品，全是真实与夸张，明朗的朝气与口齿不清的傻话的混合品。前人的性格束缚着他的行动，他的个性难得能突破包围透露出来。

并且他是孤独的。没有一个人帮助他跳出泥洼。他自以为跳出的时候，实际却是陷得更深。他暗中摸索，屡次尝试，屡次失败，糟蹋了许多精神与时间。甜酸苦辣的味道他都尝过了，创作的骚动使他心绪不宁，也辨别不出自己的作品中哪些是有价值的。他想着些荒唐的计划，轮廓庞大而宣传哲理的交响诗，把自己难住了。可是他又太真诚，不能长此拿这些妄想来骗自己；他还没有动手起草，已经不胜厌恶的把那些计划丢开了。或者他想把最没法下手的诗歌谱成序曲。于是他在那个不属于自己的园地中迷了路。等到他亲自动手写脚本的时候，（因为他自以为无所不能，）那就完全是荒谬绝伦的东西：他又想采用歌德，克拉斯脱，赫白尔，或莎士比亚的名著，可是把原作的意义都误解了。并非因为他缺少聪明，而是缺少批评精神；他不了解别人，因为太想着自己；他到处只看见自己那个天真而浮夸的心灵。

除了这些根本没法长成的怪物以外，他又写了许多小品，直接表现那些一刹那的——实际是最永久的——情感，写了许多歌。在这儿，跟别的地方一样，他竭力一反流行的习惯。他重新采用别人已经谱成音乐的著名的诗篇，狂妄的要跟舒芒与修倍尔脱作法不同而更真切。有时他把歌德笔下的富有诗意的人物，把弥依或《威廉·曼斯脱》中的竖琴师等等，刻划出他们明确而骚动的个性。有时他也制作一些爱情的歌，灌输入犷野而肉感的气息，把贫弱的艺术家与浅薄的群众素来心照不宣的蒙在情歌上的感伤色彩，一扫而空。总而言之，他要使人物与热情为了他们本身而存在，不让那般星期日坐

克拉斯脱（1777—1811）和赫白尔（1813—1863）均为德国戏剧家。

歌德所作小说《威廉·曼斯脱》，述一意大利伯爵洛泰利因奥女儿弥依自幼被奇泼赛人拐走，乃扮作行吟诗人，手弹竖琴，周游各地寻访，卒获团聚。弥依卒与大学生威廉·曼斯脱结为夫妇。十九世纪法国音乐家托玛采用此故事谱成歌剧，题作《弥依》。

坐啤酒酒店，找机会随便发泄一下感情的德国家庭当做玩物。

但他往往觉得诗人的作品太文雅，宁愿采用最简单的题材，什么古老的歌，在善书里读到的年代悠久的敬神的民谣；他特意不用它们原有的赞美歌性质，而大胆的用世俗的，活泼的手法去处理，或者他利用一些成语，甚至随便听到的几句话，民众的对白，儿童的感想：这一类笨拙而平淡的语言倒反透露出最纯粹的感情。在这等地方，他是得其所哉了，他自己不觉得，可的确达到了深刻的境界。

好的也罢，坏的也罢，——坏的居多，——他所有的作品都充满着生命力。当然不是全部新鲜的东西，那还差得远呢。克利斯朵夫往往就因为真诚而显得平凡；有时他不惜采用人家早已用过的形式，因为他觉得这种形式能够准确表现他的思想，而且因为他的感觉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无论如何不愿意求新奇，以为只有平庸之极的人才操心这种问题。他但求说出自己的感觉，决不问前人有没有说过。他很骄傲的相信，这才是求新奇的最好的办法：世界上不是永远只有一个克利斯朵夫吗？凭着青年人目空一切的气概，他认为古往今来还一无成就，一切还得开始或是从头再做。因为觉得内心这样的充实，人生这样的无穷无极，他就处于得意忘形的，欢欣鼓舞的境界。时时刻刻都在欢欣鼓舞。这种心绪也用不着快乐来支持，便是悲哀它也能够适应：他的力是他欢欣鼓舞的泉源，是一切幸福，一切德性之母。生活罢，尽量生活罢！……凡是感觉不到自己有这种力的醉意，这种生的欢欣（哪怕是极痛苦的生活）的人，便不是艺术家。这等于一块试金石。必须不问欢乐与痛苦都能够欢欣鼓舞的，才是真正的伟大。孟特尔特仲或勃拉姆斯，仅仅像十月的雾，像淅沥的细雨，从来没有这种神通。

这种神通克利斯朵夫却是有的；他以天生的憨直冒昧的性格，尽量在人前显露他的快乐。他不觉得这种举动有什么恶意，只是想跟旁人分享他的快乐。他没想到这种快乐会伤害大多数没有这快乐的人。同时他也不管别人高兴不高兴；他就是极有自信，认为把自己的信念告诉人家是挺自然的。他把自己的丰满和一般音符制造家的贫弱作了一个比较，觉得要人家承认他的优越是极容易，太容易了。只消把自己拿出去就行。

于是他就把自己拿出去了。

大家等着他。

克利斯朵夫并不隐瞒他的感想。自从明白了德国人的虚伪，为什么都不愿意看到真相之后，他就决意要表露自己的真诚，绝对的，不稍假借的真诚，对任何人任何作品都不留余地。又因为他做什么事都不能不走极端，便说出许多荒唐的话骇人听闻。而他的小孩子脾气也真是可惊。只要碰到一个人，他就马上说出他对德国艺术的感想，好似一个人有了奇妙的发见，不愿留为独得之秘。别人听了会对他不满意，那是他万万想不到的。一发觉某一部名作里头有什么荒谬的地方，他就一心想着这个问题而急于逢人便诉，不管听的人是音乐家或是业余的爱好者。他得意洋洋的发表他的怪论。旁人先还不当真，听了他的胡说八道笑笑。可是不久他们发觉他老说着这一套，一味坚持的作风未免趣味恶劣。克利斯朵夫的那些怪论，显而易见不是嘴上说说而是深信不疑的，那时大家就不觉得有趣了。并且他肆无忌惮，公然在音乐会里叫叫嚷嚷，发表他刻薄的议论，或者明白表示瞧不起那般声名显赫的大师。

在小城里，什么都会不胫而走的传播开去的：克利斯朵夫说的，一句也没有漏过人们的耳朵。他去年的行为已经惹动公愤。大家没有忘掉他和阿达

那种招摇的无耻的行动。他自己倒是记不起了：岁月递嬗，往事都成陈迹，现在的他和从前的他已经渺不相关。但别人替他一一想起：所有的小城市自有一般人把街坊邻舍的过失，污点，悲惨的、丑恶的、不愉快的事件，全部牢记在心，仿佛这是他们在社会上的职务。克利斯朵夫的案卷中，在過去的话柄之外，如今又加上一批新的。两相对照，事情给衬托得更明显了。从前是触犯礼教，现在又伤害了风雅。最宽容的人说他是“标新立异”，大多数却肯定他是“完全疯了”。

还有另一种更危险的舆论在外边开始传布；——因为是从最高方面来的，所以更轰动一时：——据说克利斯朵夫在继续供职的宫廷中，胆敢对大公爵本人也不成体统的，毁谤德高望重的大师；他把孟特尔仲的《哀丽阿》称做伪善的牧师的废话，把舒芒的一部分歌也同样加以侮辱；——而克利斯朵夫这种话还是正当威严的亲王们表示尊重这些作品的时候说的。大公爵冷冷的回答说：“听你的话，先生，有时人家竟会疑心你不是德国人。”

这句报复的话，从那么高贵的人嘴里吐出来，直流传到街头巷尾。凡是妒忌克利斯朵夫的名声，或为了其他的私仇而和他过不去的人，立刻补充说，他的确不是一个纯粹的德国人。大家记得他父系方面是法兰德族。外方来的移民毁谤他所在国的荣誉当然不足为奇。这一下可把事情解释明白了，而日耳曼民族除了看不起敌人以外，也更有理由抬高自己的声价了。

至此为止，大家只是对克利斯朵夫作些精神上的报复，可是他还要提供更具体的材料。一个人自己要被人批评的时候去批评别人，是最不智的事。换了一个聪明一点的艺术家的，一定会尊敬他的前辈。但克利斯朵夫认为别人的庸俗是应当瞧不起的，自己的力量是应当得意的，没有理由把他的轻视别人和自己的得意藏在肚里。而他的表示得意又是忘形的。最近一些时候，他非常的需要发泄。他一个人消受不了那么些欢乐，要不是分一些给别人，他竟会快乐得爆裂的。既没有朋友，他就把乐队里的一个青年同事，叫做西格蒙·奥赫的，当做心腹。他是韦登堡人，在乐队里当副指挥：脾气很好，城府极深，一向对克利斯朵夫很尊敬的。他对这位同事毫不提防；他怎么会想到把自己的快乐告诉一个闲人或是敌人有什么不妥呢？他们不是应该反过来感谢他吗？他这是不分敌友，使大家一齐快乐啊。——殊不知天下的难事就莫过于教人家接受一桩新的幸福；他们几乎更喜欢旧的苦难，因为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咀嚼了几百年的粮食。一想到这个幸福是得之于别人的，他们尤其受不了。这简直是一种侮辱，直要无法避免的时候才肯容忍，而且他们是要设法报复的。

因此，克利斯朵夫的心腹话尽管有一千个理由不会受任何人欢迎，但有一千零一个理由可以受到西格蒙·奥赫的欢迎。乐队指挥多皮阿·帕弗不久就要告老，克利斯朵夫虽然年纪很轻，可大有继承的希望。奥赫既是纯粹的德国人，当然承认克利斯朵夫有这个资格，既然宫廷方面这样宠任他。可是奥赫自命不凡，以为倘若宫廷方面多了解他一点，他自己更有资格当指挥。所以看到克利斯朵夫高高兴兴而故意扮着正经面孔跑进戏院的时候，他就堆起一副异样的笑容，来接受克利斯朵夫倾箱倒篋的心腹话了。

“哦，”他狡猾的说，“又有什么新的杰作吗？”

克利斯朵夫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回答：“啊！朋友！这一件作品可是登

峰造极了……要是你听到的话……该死！那太美了！唉，将来能听到这个曲子的，简直是天赐之福！大家听过以后连死也甘心的了。”

听到这种话的可不是个聋子。奥赫并不一笑置之，也不拿这种幼稚的狂热嘻嘻哈哈的打趣一番。克利斯朵夫的脾气是倘使有人指出他的可笑，他自己就会先笑的。可是奥赫假装听得出神，逗克利斯朵夫多说一些傻话；等到一转背，就赶快添枝接叶的把这些话柄传播出去。大家先在音乐家的小圈子里把他挖苦一阵，然后好不心焦的等机会来批判那些可怜的作品。——可怜的作品，不曾问世已经被判决了。

作品终于露面了。

克利斯朵夫在乱七八糟的稿子里，选了一阕以赫白尔的《于第斯》为题材的《序曲》，那种粗犷有力的作风，和德国人的萎靡不振对照之下，使他特别觉得可取。（可是他已经讨厌这作品，认为赫白尔老是不顾一切的喜欢卖弄天才，多所做作。）其次是一阕交响乐，借用瑞士画家鲍格林的浮夸的题目，叫做：人生的梦，又加上一个小题目：人生是一场短促的梦。还有是一组歌，和几阕古典作品，再加奥赫的一支欢乐进行曲：那是克利斯朵夫明知平庸但为了表示亲热而放进去的。

几次的预奏会还平静无事。虽然乐队绝对不了解所奏的作品，各人心里对这种古怪的新音乐非常骇异，但还来不及有什么意见；尤其在群众没有表示的时候，他们决不能有何主张。看到克利斯朵夫那么自信，他们也就俯首帖耳的接受了。一般音乐师都很能服从，很有纪律，像一切良好的德国乐队一样。唯一的困难倒是在女歌唱家方面。她就是上次音乐厅中穿蓝衣服的太太，在德国很有声望，曾经在德莱斯特和巴哀埕脱扮演华葛耐剧中的主角，肺量的宏大是没有话说的。她虽然学会了华葛耐派最得意的咬音的艺术，把子音唱得高扬，母音唱得沉重像击锤一样，可是就因为此，她没有懂得自然的艺术。她对付一个字有一个字的办法：所有的音都加强，所有的音节仿佛穿着铅底鞋子在那里重甸甸的拖，每一句都带着悲剧的气息。克利斯朵夫要求她把戏剧化的成分减少一些。他先还乐意听从，可是天生笨重的声音和卖弄嗓子的习惯使她无法控制。克利斯朵夫变得心烦意躁，告诉这位可敬的太太，说他是叫人类说话，而不是要巨蛇法弗奈大吹喇叭。她听了这种不客气的话当然大不高兴。她回答说谢谢上帝，她已经知道什么叫做歌唱，她也很荣幸的唱过勃拉姆斯的歌，就在那位大人物面前，而他也听得津津有味。

“那可糟了！糟了！”克利斯朵夫喊道。

她傲然笑着，要求他把这句谜一样的惊叹语解释明白。他回答说勃拉姆斯一辈子也没有懂得什么叫做自然，他的称赞简直是最难堪的责备，虽然他克利斯朵夫有时不大有礼貌，——就像她刚才指摘的，——可也不至于说出像勃拉姆斯那种唐突的话。

两人继续用这种口吻争执下去；那位太太始终依着她慷慨激昂的方式唱，——结果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冷冷的说他看明白了，那是她的天赋如此，没法改的；但既然他的歌唱不好，还是干脆不唱，从节目中删掉得了。——那时已经到了音乐会的前夜：大家都知道音乐会中有他的歌，她自己也在外边提过；并且她不无相当的音乐天才，很能赏识那些歌里面的某些优点；克利斯朵夫临时改变节目等于是侮辱她。而她想到明天的音乐会也许会奠定青

法弗奈为《西葛弗烈特》歌剧中守护尼勃仑指环的巨龙，以女歌唱家善唱华葛耐作品，故以此讽之。

年音乐家的声名，也就不愿意跟这颗将升的明显伤了和气。所以她突然让步了，在最后一次预奏会中，完全依照了克利朵斯夫的指示。可是她打定主意，在下一天的音乐会中非用她自己的作风唱不可。

日子到了。克利斯朵夫一点不着急。他脑子里装满了自己的音乐，没法加以批判。他知道他的作品有些地方要给人笑。可是有什么相干？一个人怕闹笑话，就写不出伟大的东西。要求深刻，必需有胆子把体统，礼貌，怕羞，和压迫心灵的社会的谎言，统统丢开。倘若要谁都不吃惊，你只能一辈子替平庸的人搬弄一些他们消受得了的平庸的真理，你永远踏不进人生。直要能把这些顾虑踩在脚下的时候，一个人才能伟大。克利斯朵夫居然这样做了。大家很可能嘘他，他有把握不让他们安静的。想到熟人们对曲子里某些大胆的部分会装出怎样的嘴脸，他暗暗觉得好玩。他预备受一番尖刻的批评，先在肚里好笑了。无论如何，除非是聋子，他作品中的力量是谁都不能否认的，——至于这力能否讨人喜欢是另一问题。并且那有什么关系？……讨人喜欢！讨人喜欢！……只要有力量就行了。让它像莱茵河一样把什么都卷走吧。

他碰的第一个钉子是大公爵不到场。爵府的包厢里只有几个不相干的人，在府里当随从的太太们。克利斯朵夫愤愤的想道：“这混蛋跟我怄气，他不知道对我的作品怎样表示才好：他不来就是怕为难。”他耸耸肩膀，假装不在乎这些无聊的事。但别人看了很注意：这是对克利斯朵夫的第一个教训，同时对他的前途也是个威胁。

听众也不比主子殷勤：三分之一的座位是空的。克利斯朵夫不由得心酸的想起他童年音乐会的盛况。要是他稍有经验，一定会懂得演奏上品音乐的时候，听众的数目自然比不上演奏平凡音乐的时候：因为大部分人感到兴趣的是音乐家而非音乐；而且一个跟普通人没有分别的音乐家，显然不及一个穿着短裙的儿童音乐家那么好玩，那么动人，能够教傻瓜们开心。

克利斯朵夫空等了一回听众，决意开场了。他硬要自己相信这样倒是更好，以为“朋友虽少，都是知己”。——可怜他这种乐观的心绪也维持不了多久。

一曲又一曲的音乐尽管奏下去，场子里寂静无声。有种寂静无声是因为大家感情冲动到极点，快要涌出来的缘故，但眼前的寂静简直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大家仿佛睡着了。每一句音乐都掉在漠不关心的深渊里。克利斯朵夫背对着听众，全神对付着乐队，可是依旧感觉到场子里的情形。凡是真正的艺术家都有一种精神上的触觉，能够感知他演奏的东西是否在听众心里引起共鸣。他照常打着拍子，非常兴奋，可是从池子和包厢里来的那股沉闷的空气，使他心都凉了。

终于《序曲》奏完了，大家有礼的，冷冰冰的拍了一阵手，就静下来了。克利斯朵夫宁可受人嘘斥一顿……便是怪叫一声也好！至少得有点儿生命的表示，对他的作品表示一点反响！……——可是完全没有。——他瞧瞧群众，群众也彼此瞧瞧。他们互相在目光中探求一些意见而探求不到，只能又扮起那副漠不关心的脸。

音乐重新开始，轮到那曲交响乐了。——克利斯朵夫几乎不能终曲，屡次想丢下指挥棒，掉过头来就走。他也传染到了大众的麻木，结果竟不懂自己指挥的东西了；他明明觉得掉入了烦闷的深渊。连他预料在某些段落上群众会交头接耳说的俏皮话也没有，大家都在一心一意的翻阅节目单。克利斯朵夫听见众人同时哗啦啦的翻纸张的声音；然后又是一片静默，直到曲子完

了；然后又是一阵有礼的掌声表示懂得一曲已经奏完。——大家静下来以后还有两下零星的掌声，因为没有回响，也就不好意思的停住了：空虚显得更空虚，而这件小小的事故更显得听众是多么厌烦。

克利斯朵夫坐在乐队中间，不敢向左右张望一下。他真想哭出来，同时也气得浑身哆嗦。他恨不得站起身子向大家喊：“你们多讨厌！多讨厌！……一齐替我滚罢！……”

听众稍为清醒了些，等着女歌唱家出场，那是他们听惯而捧惯的。刚才那些新作品等于一片大海，他们没有指南针，只能在那里彷徨；她可是稳固的陆地，决没有令人迷失的危险。克利斯朵夫看出大家的思想，轻蔑的笑了一笑。女歌唱家也知道群众在等她；克利斯朵夫去通知她上台的时候，她的神气就像王后。他们俩用着敌对的态度彼此望了一眼。照例克利斯朵夫应当挽着她手臂，但他竟双手插在袋里，让她自个儿出台。她气冲冲的走过去；他很不高兴的跟在后面。她一露脸，立刻来了个满堂彩；大家松了口气，脸上发出光来，有了精神；所有的手眼镜都一齐瞄准。她对自己的魔力很有把握的开始唱起歌来，不消说是照她自己的方式，全不遵从克利斯朵夫上一天的嘱咐。替她伴奏的克利斯朵夫脸色变了。这种捣乱他是预先料到的。一发觉她走腔，他立刻敲着钢琴，愤怒的说了声：

“不是这样的！”

可是她不理。他就在背后用着又重浊又生气的声音提醒她：

“不！不！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这些气愤愤的咕噜，虽然台下听不见，对乐队里的人可是句句分明；她一急，拚命把节奏拉慢，不该休息的地方也休息。他没有留意，自顾自的弹下去，终于歌和伴奏相差了一节。听众一点没觉得：他们久已认定克利斯朵夫的音乐既不会悦耳，拍子也不会准的；但克利斯朵夫并不这样想，他像疯子似的，脸都扭做一团，终于爆发了。他突然半中间停下来，直着嗓子嚷道：“得了吧！”

她一口气收不住，继续唱了半节，然后也停住了。

“得了吧！”他粗暴的又说了一遍。

全场为之楞了一楞。过了一忽儿，他又冷冷的说：“咱们再来！”

她愕然望着他，双手哆嗦着，真想把乐谱往他头上扔过去；事后她竟不懂当时怎么没有那样做。但她慑于克利斯朵夫的威严，只得重新开始。她把全部的歌唱完了，连一个拍子一个小地方也不加变动：因为她觉得克利斯朵夫绝对不会留情，而一想起要再受一次侮辱就吓得浑身发抖。

她唱完以后，台下掌声不绝。他们并不是捧她唱的歌，——（要是她唱别的作品，也可以博得同样的掌声，）——而是捧这位有名的老资格的女歌唱家：他们知道赞赏她是没有错的。同时大家还想补偿一下她受的侮辱。他们隐隐然觉得她刚才唱错了，但认为克利斯朵夫当场给她指出来简直不成体统。大家都喊着“再来一次”。克利斯朵夫可很坚决的把琴关上了。

她没有发觉这桩新的侮辱；她心里乱得很，根本不想再来一次。她急急忙忙下了台，躲在化妆室里把胸中郁积着的恼恨与愤怒一齐发泄了出来：又是哭，又是叫，把克利斯朵夫直骂了一刻钟……狂怒的叫声一直传到门外。据那些进去探望她的朋友出来说，克利斯朵夫对她的态度简直跟下等人一样。众人的议论在戏院中是传得很快的。所以克利斯朵夫重新踏上指挥台演奏最后一曲的时候，场子里颇有些骚乱的现象。但这个曲子不是他的，而是

奥赫的《欢乐进行曲》。听众既喜欢这曲平凡的音乐，便不必嘘斥克利斯朵夫而就有极简单的办法来表示他们的不满意：他们有心替奥赫捧场，热烈鼓掌要求作者露面了二三次；奥赫当然不肯放过机会。而这时音乐会也完了。

大公爵和宫廷方面的人，那些终日无聊而爱说短道长的内地人，对音乐会的情形当然知道得清清楚楚。和女歌唱家有交情的几家报纸，绝口不提那件不愉快的事，只一致恭维她歌唱的艺术，而在报告她所唱的作品的时候顺便提了提那些歌。关于克利斯朵夫其他的作品，只是寥寥几行，所有的报纸全是大同小异的论调：“……对位学很有功夫。风格非常繁琐。缺少灵感。没有旋律。纯粹是头脑的而非心灵的产物。缺乏真诚。只想独创一格……”——接下去的一段文字是讨论真正的独创，提出一般故世的大师，“不求独创一格而自然独创一格的”，如莫扎尔德、贝多芬、罗夫、修倍尔脱、勃拉姆斯等等的作品为证。——然后笔头一转又转到当地的戏院不久要重演克罗采的作品，就手把那出“永远清新永远美丽的歌剧”长篇累牍的描写了一番。

总之，便是对克利斯朵夫最有好感的批评家也完全不了解他的作品；而绝对不喜欢他的人自然更表现出阴险的仇视态度；——至于大众，既没有批评家，不管是好意的或恶意的批评家领导，只能一声不出。让大众自己去思想的时候，他们就干脆不思想。

克利斯朵夫灰心到了极点。

其实他的失败不足为奇。他的作品不讨人喜欢的理由不止一个，而有三个。第一，它们还不够成熟。第二，它们还太新鲜，不能教人一下子就懂得。第三，把这肆无忌惮的青年教训一顿是大家都高兴的事。——可是克利斯朵夫头脑不够冷静，不肯承认他的失败是势所必然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长时期的被人误解以后，看惯了人类无可救药的愚蠢，会变得心胸开朗；而克利斯朵夫还谈不到这一点。他相信群众，相信成功，以为那是一蹴即几的，既然他具备着成功的条件：这种幼稚的信心现在可是被粉碎了。有敌人，他倒认为稀松平常。但他觉得奇怪的是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了。凡是他认为可靠的，一向对他的音乐感到兴趣的人，从那次音乐会以后，再没一句鼓励他的话。他想法去试探他们，他们总是闪烁其辞。他再三追问，要知道他们真正的思想：结果是一般最真诚的人把他从前的作品，早年的幼稚的东西，提出来作比较。——接连好几次，他听到人家拿他的旧作做标准，说他的新作不行，——可是几年以前，在那些作品还是簇新的时候，他们也认为不好的。新的就是不好的：这是一般的原则。克利斯朵夫可不懂这一套，便大惊小怪的叫起来。人家不喜欢他也可以，他不但容许，甚至还欢迎，因为他并不想做每个人的朋友。可是人家喜欢他而又不许他长大，硬要他一辈子做个小孩子，那可不像话了！在十二岁上是好的作品，到二十岁上便不行了；他希望你不要老是停留在那个阶段上，希望要变，变，永远的变下去……想阻遏一个人的生命不让它发展的，岂非混蛋！……他童年的作品所以有意思，并非在于它幼稚无聊，而是在于有股前程无限的力潜伏在那里！而这前程！他们竟想把它毁掉！……可知他们从来没懂得他，也从来没爱过他；他们所喜欢的只是他的庸俗，只是他跟庸俗的人没有分别的地方，而并非真正的他：他们的友谊其实是误解……

也许他把这些情形夸张了些。一般老实人不能爱好一件新的作品，但它有了二十年的寿命，他们就会真诚的爱好：这是常有的现象。新生命的香味太浓了，他们虚弱的头脑受不住，必须由时间来把这味道减淡一点才行。艺

术品一定要积满了成年累月的油垢，方始有人了解。

但克利斯朵夫不允许人家不了解现在的他，而等他成为过去之后再了解他。他宁可人家干脆不了解他，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形之下都不了解他：所以他气愤之极。他痴心妄想的要人了解，替自己说明，跟人家辩论；这才是白费气力：那不是要把整个时代的口味都改过来吗？但他自信很强，决心要把德国人的口味彻底洗刷一番，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其实他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要说服一个人决不是几次谈话所能济事；他说话的时候既找不到适当的字，又是对大音乐家，甚至对谈话的对方取着狂妄傲慢的态度，结果只多结了几个冤家。殊不知他先得从从容容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好了，才能强迫人家听他的……

而他的星宿，他的坏星宿，恰好来给了他说服人家的机会。

他在戏院的食堂里和乐队里的几个同事围着一张桌子坐着，他们听了他的艺术批评驳坏了。他们的意见也并不一致，但对他放肆的言论都大不乐意。低音提琴师老克罗斯是个忠厚人，很好的音乐家，一向是真心喜欢克利斯朵夫的；他装着咳嗽，想等机会说一句双关的笑话把话题扯开去。克利斯朵夫可完全没注意，倒反越说越有劲，教克罗斯灰心了：

“他干么要说这些话呢？真是天晓得！一个人尽管心里这么想，可用不着说啊！”

最奇怪的是，他也“这么”想过；至少他怀疑过这些问题，克利斯朵夫的言论把他心里的许多疑惑挑了起来，但他没有勇气承认，——一半是怕冒不韪，一半是因为谦虚，不敢相信自己。

吹号角的韦格尔可是一句话也不愿意听；他只愿意赞美：不论什么东西，不论好的坏的，天上的星或地下的煤气灯都一律看待；他的赞美也没有什么等差，只知道赞美，赞美，赞美。这是他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受到限制就要痛苦的。

但大提琴师哥赫痛苦得更厉害：他全心全意的爱好下品的音乐。凡是被克利斯朵夫嘻笑怒骂的，痛诋的，都是他最心爱的；他本能的挑中一些最陈腐的作品，心中装满着浮夸的，动辄落眼泪的感情。但他的崇拜一切虚伪的大人物完全是出于真心。唯有他自以为崇拜真正的大人物时才是扯谎，——而这扯谎还是无邪的。有些勃拉姆斯的信徒，以为在他们的上帝身上可以找到过去的天才们的气息：他们在勃拉姆斯身上爱着贝多芬。哥赫却更进一步，他爱贝多芬的倒是勃拉姆斯的气息。

可是对克利斯朵夫的怪论最表愤慨的还是吹低音笛子的史比兹。他的音乐本能所受的伤害，还不及他天生的奴性所受的伤害。某个罗马大帝是连死也要站着死的。他可非合扑在地下死不可，因为扑在地下是他天生的姿势；在一切正统的，大家尊重的，成功的事物前面匍匐膜拜，他觉得其乐无穷；他最恨人家不许他舔泥土。

于是，哥赫唉声叹气，韦格尔做着绝望的姿势，克罗斯胡说八道，史比兹大叫大嚷。但克利斯朵夫不慌不忙比别人喊得更响，说着许多对德国与德国人最难堪的话。

在旁边一张桌子上，有一个青年听着克利斯朵夫的话捧腹大笑。他长着一头乌黑的卷发，一对聪明秀美的眼睛，大鼻子到了快尽头的地方不知道在左边去还是右边去，便同时往两边摊开了，底下是厚嘴唇；他神情不定，可是不俗。听着克利斯朵夫的话，对每个字都又同情又俏皮的留着神，他笑得

连脑门，太阳穴，眼角，鼻孔，腮帮，到处都打起皱来，有时还要浑身抽搐。他并不插嘴，可是把每句话都听在耳里。克利斯朵夫的高论说到一半，忽然楞住了，给史比兹奚落之下，更气得结结巴巴的，最后才找到了像块大石头般的字儿把敌人打倒：看到这情形，那青年格外高兴。而当克利斯朵夫冲动之极，越出了他思想的范围，突然说出些骇人听闻的胡话，使在场的人都大声怪叫的时候，邻座的青年更乐不可支了。

最后各人对于这种自以为是的争辩也起腻了，彼此分手了。剩下克利斯朵夫最后一个想跨出门口，那个听得津津有味的青年便迎上前去。克利斯朵夫一向没注意到他。但那青年很有礼貌的脱下帽子，微笑着通报自己的姓名：“弗朗兹·曼海姆。”

他对于自己在旁窃听这种冒昧的行动，先表示了一番歉意，又把克利斯朵夫大刀阔斧痛击敌人的气魄恭维了一阵。想到这点，他又笑了。克利斯朵夫挺高兴的望着他，可是还不大放心：“真的吗？”他问，“你不是取笑我吗？”

那青年赌着咒否认。克利斯朵夫脸上顿时有了光彩。“那末你认为我是对的，是不是？你同意我的主张了？”“老实说，我不是音乐家，完全是门外汉。我所喜欢的唯一的音乐，——绝对不是恭维，——是你的音乐……至少这可以表明我的趣味不算太坏……”

“唔！唔！”克利斯朵夫虽然还有些怀疑，究竟被捧上了，“这还不能算证据。”

“哎，你真苛求……得了罢！……我也跟你一样想：这算不得证据。所以你对德国音乐家的意见，我决不敢大胆批评。但无论如何，你对一般的德国人，老年的德国人，批评得太中肯了；那些糊涂的浪漫派，那种腐败的思想，多愁多病的感情，人家希望我们赞美的陈言俗套，真叫做‘这不朽的昨日，亘古不灭的昨日，永久长存的昨日，因为它是今日的金科玉律，所以也是明日的金科玉律！……’”

他又念了一段席勒诗中的名句：

“……亘古常新的昨天，永远是过去的也永远会再来……”“而他就是第一个该打倒的！”曼海姆又加上一句按语。“谁？”克利斯朵夫问。

“写下这种句子的老古董喽。”

克利斯朵夫不懂他的意思。曼海姆接着又说：

“第一，我希望每隔五十年大家把艺术和思想做一番大扫除的工作，只要是以前的东西，一样都不给它剩下来。”“那可过分了些，”克利斯朵夫笑了笑。

“一点儿都不过分，我告诉你。五十年已经太长了，应当是三十年，或者还可以少一些！……这才是一种卫生之道。谁会把祖宗的旧东西留在家里呢？他们一死，我们就恭恭敬敬的把他们送出去放在一边，让他们去烂，还得堆上几块石头，使他们永远不得回来。软心的人也会放些花上去。那我不反对，我也无所谓。我只要求他们别跟我来麻烦。我就从来麻烦他们。活的在一边，死的在一边：各管各的。”

“可是有些死人比活人更活！”

“不！不！要是说有些活人比死人更死倒更近于事实。”“也许是罢。不管怎么样，有些老人的确还年轻。”

“假使他还年轻，我们自己会发觉的，……可是我不信这个话。从前有

用的，第二次决不会再有用。只有变才行。第一先得把老人丢开。在德国，老人太多了。得统统死掉才好！”

克利斯朵夫聚精会神听着这些古怪的话，费了很大的劲讨论；他对其中一部分的见解有同感，也认出有好多思想跟自己的一样，只是听到别人用夸张可笑的口吻说出来，觉得有点刺耳。但因为他相信人家和他一样的严肃，便认为那些话或许是这个似乎比他更有学问更会讲话的青年根据了他的原则，按照逻辑推演出来的。多少人不能原谅克利斯朵夫的刚愎自用，其实他往往谦虚得有点孩子气，极容易受一般教育程度比他高的人愚弄，尤其在他们不是为了避免讨论难题而拿自己的教育做挡箭牌的时候。曼海姆故意以发表怪论为乐，一问一答，话越说越野，自己听了也在暗笑。他从来没碰到一个人拿他当真的，如今看到克利斯朵夫费尽心力想讨论，甚至想了解他的胡说八道，不由得乐死了；他一边嘲笑克利斯朵夫，一边因为克利斯朵夫对他这么重视而很感激，觉得他又可笑又可爱。

他们分手的时候已经变成好朋友；可是过了三小时，克利斯朵夫在戏院预奏会中看见曼海姆在乐队的小门里伸出头来，笑嘻嘻的对他做着鬼脸，仍不免有点奇怪。预奏完毕，克利斯朵夫过去找他。曼海姆很亲热的抓着他的胳膊说：

“你有功夫吗？……你听我说。我有个主意在这儿，也许你觉得是胡闹……你不想抽个空，把你对音乐和对那些无聊的音乐家的感想写下来吗？与其跟乐队里四个只会吹吹笛子拉拉提琴的傻瓜白费口舌，直接向大众说话不是有意思多吗？”

“你问我这样做是不是有意思得多？……是不是我愿意？……嘿，可是我写了文章送到哪儿去呢？你倒说得好，你！……”

“我不是说过有个主意吗？……我跟几个朋友：亚达尔培·洪·华特霍斯，拉斐尔·高特林，亚陶尔夫·梅，吕西安·哀朗弗尔，——办了一份杂志，这是本地唯一有见解的杂志，名字叫做酒神——你一定知道的吧？……我们都佩服你，很想请你加入我们的团体。你愿意担任音乐批评吗？”

克利斯朵夫听了这话受宠若惊，恨不得马上接受；他就是怕不够资格，不会写文章。

“放心，”曼海姆说，“你一定会写的。何况一朝做了批评家，你尽可以为所欲为。别顾虑什么群众。你才想不到他们多蠢呢。做个艺术家算得什么！谁都可以嘘他。可是批评家有权利向大家说：‘替我嘘这个家伙！’场子里的听众，反正把思想这件麻烦事儿交给你了。你爱怎么想都可以，只要你装做在思想。那些傻蛋只求塞饱肚子，不管是什么。他们没有不吃的东西。”

克利斯朵夫终于答应了，非常感动的道谢。他只提一个条件，就是文字的内容绝对不受限制。

“自然罗，自然罗，”曼海姆回答。“绝对自由！咱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晚上散戏的时候，他又第三次去钉着克利斯朵夫，把他介绍给亚达尔培·洪·华特霍斯和其余的朋友。他们都对他很诚恳。

除了华特霍斯是本地的旧世家出身，余下的尽是犹太人，都很有钱：曼海姆的父亲是银行家；高特林的是有名的葡萄园主；梅的是冶金厂经理；哀

朗弗尔的是大珠宝商。这些父亲全是老派的以色列族，勤俭苛刻，永远守着他们的民族精神，不惜千辛万苦的攒钱，而对自己的毅力比对财富更得意。但那些儿子似乎生来要把父亲挣起来的家业毁掉；他们取笑家庭的成见，取笑那种像蚂蚁般苦苦熬，惨淡经营的生活；他们学着艺术家派头，假作瞧不起财产，把它从窗里扔出去。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多大手面，尽管荒唐胡闹，也不会昏了头，忘了实际。并且做父亲的也很留神，把缰绳拉得很紧。最会挥霍的是曼海姆，真心想把家私大大方方的花个痛快；可是他一无所有，只能在背后直着嗓子骂父亲吝啬，心里倒也满不在乎，还认为父亲的办法是对的。归根结蒂，唯有华特霍斯一个人财产自主，拿得出钱，杂志便是由他出钱维持的。他是诗人，写些亚尔诺·霍兹和瓦尔特·惠特曼一派的“自由诗”，一句长一句短的，所有的点，逗号，三点，横划，静默，大写字，斜体字，底下加线的字等等，都有一种极重要的作用，不下于叠韵和重复的辞句。他用各国文字中的字，各种没有意义的声音属在诗里。他自命——（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诗歌方面做一个塞尚纳。的确，他很有想象力，对枯燥无味的东西很有感觉。他又是感伤又是冷淡，又是纯朴又是轻浮，偏要把加工雕琢的诗句装做名士派。在时髦人物心目中，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好诗人。可惜杂志上，沙龙里，这等诗人太多了；而他还想做到只此一家。他一味充作没有贵族偏见的王爷，其实他这种偏见比谁还要多，只是自己不承认。他有心在他主持的杂志周围只安插一批犹太人，为的教他的反犹太家属骇怪，同时向自己证明他的思想自由。他对同人说话的口吻很客气很平等，骨子里是不动声色的瞧不起他们。他明知他们利用了他的姓氏和金钱非常得意，却也由他们去，因为这样他才能自得其乐的轻视他们。

而他们也瞧不起他听让他们利用，因为知道他有利可图。其实他们是互相利用。华特霍斯拿出姓氏和金钱；他们拿出文才和做买卖的头脑，同时也带来一批主顾。他们比他聪明得多，并不是更有个性，那也许比他还少呢。但在这个小城里，像在无论哪里无论什么时候一样，——因为种族的关系而孤立了几百年，刻薄的眼光给磨练得格外尖锐，——他们的思想往往最前进，对于陈旧的制度与落伍的思想的可笑感觉得最清楚。可是他们的性格不像他们的头脑来得洒脱，所以尽管挖苦那些制度跟思想，还是想从中渔利而并不愿意改革。他们虽自命为在思想上独往独来，实际和那位贵族出身的华特霍斯同样是内地的冒充时髦的朋友，同样是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把文学当作消闲打趣的玩艺儿。他们喜欢装出一副刽子手的神气，可是并不凶，拿来开刀的无非是些不相干的人，或是他们认为对自己永远不足为害的人。他们绝对没有心思去得罪一个社会，知道自己早晚要回到社会，跟大家过一样的生活，接受他们早先排斥的偏见的：而当他们一朝冒着危险去对一个当代的偶像——已经在动摇的偶像，——大张挞伐的时候，他们也决不破釜沉舟，为的是一有危急立刻可以上船。而且不问厮杀的结果如何，一场完了，必须等好些时候才会再来一次。非利士人尽可放心，那些新大卫派的党徒只是要人

今欧洲人统称希伯莱族为以色列人或犹太人。

亚尔诺·霍兹（1863—1929）为德国新现实派的诗人兼剧作家。瓦尔特·惠特曼（1819—1892）为美国民主诗人。

塞尚纳（1839—1906）为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为二十世纪初期的野兽派立体派之先驱。

德国大音乐家舒曼早年曾集合爱美爱真的同志，创立一秘密音乐团体，号称“大卫党”，因古代以色列

家相信他们发起狠来非常可怕；——可是他们并不愿意发狠。他们更喜欢和艺术家们称兄道弟，和女演员们一块儿吃宵夜。

克利斯朵夫在这个环境中很不舒服。他们最爱谈论女人跟马，而谈得毫无风趣。他们都很呆板。华特霍斯说话慢腾腾的，声音清楚而没有音色，那种细到的礼貌显得他又无聊又讨人厌。编辑部秘书亚陶尔夫·梅是个臃肿笨重的家伙，缩着脑袋，神气很凶横，老是认为自己没有错的：他事事武断，从来不听人家的回答，好似非但瞧不起对方的意见，压根儿就瞧不起对方。艺术批评家高特林，有种神经性的抽搐，一刻不停的眨巴着眼睛，戴着副大眼镜，——大概为了模仿他来往的那些画家，特意留着长头发，默默的抽着烟，嘟嘟囔囔的说个一言半语，永远没有完整的句子，用大拇指在空中莫名其妙的乱划一阵。哀朗弗尔是个秃顶的矮个子，堆着笑容，留着淡黄色的胡子，一张细腻而没有精神的脸，弯弯的鼻子，在杂志上写些关于时装和社交界的消息。他声音软绵绵的说些挺露骨的话；人很聪明，可是阴险，往往还很卑鄙。——这般富家子弟全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是再恰当也没有了：一个人丰衣足食的时候来反对社会是最奢侈的享受，因为可以把得之于社会的好处一笔勾销，正像路劫的强盗把一个行人搜刮光了，对他说：“你还呆在这儿干什么？去你的吧！我用不着你了！”

克利斯朵夫在这一群人里头只对曼海姆抱有好感。当然他是五个人中最有生气的一个，他对自己说的话和旁人说的都觉得好玩；他结结巴巴的，嘟嘟囔囔的，嘻嘻哈哈的，老说着混话，既不能有条有理的讨论什么，也不大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可是他很和气，没有野心，对谁都不记恨。其实他并不十分老实，常常扮着一种角色，但不是有意的，而且是与人无害的。他会醉心于一切荒诞不经的——往往是救世济人的——理想，但凭他那种精明的头脑与玩世不恭的态度，他决不完全相信；便是兴奋的时候他也能保持冷静，永远不至于为了实行理论而找麻烦。但他需要有点儿东西让他风魔，那对他是一种游戏，时时刻刻要变换的。目前他风魔的是慈悲。不用说，他觉得仅仅做人做得慈悲是不够的，非要显得慈悲不可；他宣传慈悲，同时又指手划脚的加以表现。因为故意要闹别扭，反对家里的人那种刻板而辛苦的生活，反对礼教，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德国人的市侩气，所以他是托尔斯泰的信徒，相信涅槃，相信福音，相信佛教，——他自己也弄不大清究竟信些什么，——总之是宣扬一种软绵绵的，没有骨头的，婆婆妈妈的，宽大为怀的道德；它很乐意原谅一切罪恶，尤其是肉的罪恶，并不讳言对这一类罪恶的偏心，可不大能容忍所有的德性，——这种道德所标榜的简直是：共同寻欢，如有盟约，彼此娱乐，仿佛结社，而最后还要放上一个圣洁的光轮才觉得高兴。这中间颇有点小小的虚伪，那味道在感觉细致的人是不大好闻的，甚至还是恶心的，如果拿它当真的话。可是曼海姆并不拿这一套当真，只是玩玩而已。这种下流无耻的基督教是随时准备让位的，无论什么偶像都可以来取而代之：暴力也好，帝国主义也好，什么古怪的野兽也好。曼海姆是在做戏，真心的做戏；在他没有跟别人一样恢复老老实实的犹太人面目和犹太精神之前，他把自己所没有的各种情操轮流试过来。他是一个可爱而又极可厌的人。

王大卫曾征服非利士人，而非利士人又为十九世纪德国大学生对一般商人市侩的轻蔑的称呼，舒曼更以非利士人称呼音乐界中的俗物与顽固分子。

在某一时期内，克利斯朵夫成为他风魔的对象之一。曼海姆什么都相信他，到处把他的名字挂在嘴上，在家人前面把他恭维备至。据他说来，克利斯朵夫是个天才，是个了不起的人，写着古怪的音乐，关于音乐的议论尤其精妙，才思焕发，——并且是一表人材：一张秀美的嘴，一副漂亮的牙齿。他还补上一句，说克利斯朵夫很佩服他。——终于有一晚他把克利斯朵夫带到家里来吃饭了。而克利斯朵夫也就见到了这位新朋友的父亲，银行家洛太·曼海姆，和弗朗兹的妹妹于第斯。

这是他第一遭踏进一个犹太人的家庭。这民族虽然在小城里人口不少，并且以它的财富，团结，智慧，在当地占着重要地位，可是跟别的社会很少往来。民间一向对它抱着牢不可破的成见，暗中有点敌意，有种近于侮辱的怜悯。克利斯朵夫家里的人就存着这种心。当年祖父是不喜欢犹太人的；——不料命运跟他开玩笑，他两个最好的学生——（一个成了作曲家，一个成了有名的演奏家）——偏偏是以色列人；这一下老人家可为难了：因为有时他真想拥抱这两位优秀的音乐家，但又记起他们曾经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他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矛盾。临了他还是把他们拥抱了，相信上帝看在他们爱好音乐面上会原谅他们的。——克利斯朵夫的父亲曼希沃自命为自由思想者，决不会挣了犹太人的钱而心里起什么疙瘩，还认为是极应该的；但他时常取笑他们，瞧不起他们。——至于他的母亲，可不敢断定她偶然替犹太人当厨娘是不是一桩罪过。他们对她很傲慢：但她并不记恨，她对谁也不记恨，反而对这般被上帝罚入地狱的可怜虫非常同情。在她去帮忙的人家，看见主人的女儿走过，或听见孩子们快乐的笑声，她就不由得要这样想：

“多美丽的姑娘！……多好看的孩子！……真可惜！……”

听到克利斯朵夫说晚上要去曼海姆家吃饭，她一句话也不敢说，心里可不大好过。她以为人家说犹太人的坏话固然不该相信，——（所有的人都被人说坏话的）——老实人是到处有的，但犹太人管犹太人，基督徒管基督徒，各管各的，究竟是更好更得体。

克利斯朵夫完全没有这些成见，因为永远要跟周围的人闹别扭，所以反而受这个异族的吸引。可是他对它并没有什么认识。他有过来往的几个犹太人只是最粗俗的一批，无非是些小商人和猬集在莱茵河与大教堂中间的几条街上的平民。他们以人类共有的群居本能，正在把那个区域变做犹太人居留地。克利斯朵夫偶然上那儿去闲逛，用着好奇而善意的目光，随便瞧瞧那些腮帮陷下去的女人，嘴唇和颧骨都很突出，堆着神秘的笑容，稍微有点下流神气，恬静的面部表情的和谐，不幸被粗俗的谈吐与粗野的笑声给破坏了。但便是在下层阶级中，在这些脑袋特别大，眼睛没有神，神气浑浑噩噩，又矮又臃肿的人身上，在这最高贵的民族的没落的后裔身上，甚至在那些臭秽的渣滓中间，也有几点微弱的光在那儿闪闪砾砾，好似在沼泽上空飘荡的磷火：那是一些奇妙的眼神，灵光四射的智慧，从污泥之中发射出来的微妙的电流，使克利斯朵夫看了有些着迷，有些惶惑。他想其中必有些高尚的灵魂在挣扎，必有些伟大的心灵想从泥淖中超拔出来；他很想能碰到他们，帮助他们；虽然没认识他们，而且心里还有些害怕，他已经喜欢他们了。但他从来没有跟一个犹太人有过什么亲密的关系，更没机会接近犹太社会里的优秀分子。

因此，上曼海姆家吃饭对他颇有一种新鲜的，甚至像禁果一般的诱惑力。而把禁果递给他的夏娃使禁果显得更有味道。一进门，克利斯朵夫眼里只看

见于第斯·曼海姆一个。她跟他至此为止所认识的女人完全不同。高大，轻灵，虽然长得结实，个子还是细瘦的；脸庞四周的黑头发并不多，可是很浓，部位很低，遮着太阳穴和瘦骨嶙峋的黄澄澄的脑门；眼睛有点近视，眼皮很厚，眼珠稍微突出了一点，高鼻子底下的鼻孔很大；腮帮清瘦，下巴厚重，皮色相当红润；美丽的侧影轮廓很分明，很有性格；正面的表情比较含糊，复杂；两只眼睛和两旁的面颊都是不相等的。在她身上，你可以感觉到一个很强的种族，感觉到杂凑在这个种族的模子里的许多成分，乱七八糟的，有极美的，也有极恶俗的。她的美，特别在于那张不大说话的嘴巴，在于那双因近视而显得更深沉，因四周的黑影而显得更阴气的眼睛。

对于这双不只是个人的而是整个种族的眼睛，必须一个比克利斯朵夫更有经验的人，才能透过它们湿漉漉而火刺刺的眼帘，看出这个女人的真正的心。而这一对又热烈又沉闷的眼睛里头，他所发见的便是整个以色列族的灵魂，为她本人并没意识到的。克利斯朵夫一见之下，可搅糊涂了。直要再过很多时候，常常在这种眼睛里迷失以后，他才能在这个东方的大海上看出一点头绪来。

她望着他，清明眼神毫无骚乱的现象；似乎这基督徒的灵魂被她全部看透了。他也感觉到。他觉得在她迷人的目光下面有股刚强，明白，冷静的意志，毫不客气的在那里搜索他的内心；虽是毫不客气，可并无恶意。她只是拿他一把抓住了。有种卖弄风情的女人对谁都要施展一下迷人的魔力；于第斯可并不是这种作风。卖弄风情，她比谁都厉害；但她知道自己的力量，只让本能去施展她的力量，——尤其对一个像克利斯朵夫那样容易征服的俘虏，更犯不上多费气力。她更感兴趣的是要认识她的敌人——（凡是男人，陌生人，对她都是敌人，——以后遇到相当的机会也可能跟他们携手）。人生是一场赌博，唯有聪明人才能赢；所以第一要看清敌人的牌而不能泄露自己的牌。能够做到这一步，她就感到胜利的快意。她并不在乎胜利能否给她什么好处。她这么做是为了好玩。她热心的对象是聪明，但并非那种抽象的聪明，虽然她头脑相当扎实，研究无论什么学问都可以成功，要是她愿意的话，而且比她的哥哥更配继承银行家洛太·曼海姆的事业；然而她更喜欢活泼活泼的，对付人的那种聪明。她最喜欢参透一个人的灵魂，估量它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她和麦西的犹太女人称金洋一样仔细）；——她靠着奇妙的感觉，能够在一霎眼之间看破别人的弱点与污点，从而找到了心灵的秘钥，把它抓住：这便是她控制人的手段。但她并不恋恋于她的胜利，也绝对不利用她的俘虏。好奇心与骄傲一朝满足之后，她就将俘虏丢过一边，注意别的对象去了。她这种力完全是虚耗掉的。在一颗这么活泼的灵魂中有一股死气。好奇与无聊这两个特点，在于第斯是兼而有之的。

因此，克利斯朵夫瞧着她，她也瞧着克利斯朵夫。她不大说话，但只要嘴角上露出一丝不可捉摸的笑影，就可把克利斯朵夫催眠。笑影掠过以后，又是一副冰冷的面孔，淡漠的眼睛；她招呼晚饭，冷冷的和仆人说话，似乎不再听客人的话了。然后，她眼睛又亮起来，插几句话，清楚明白，表示她什么都听到，什么都懂得。

她把她哥哥对克利斯朵夫的评语冷静的检讨了一下：她素来知道弗朗兹夸大的脾气；一看到克利斯朵夫，她那个喜欢挖苦的性格正好有了用武之地；她哥哥不是在她面前夸说克利斯朵夫长得如何漂亮如何体面吗？——似乎弗朗兹有种天赋，专门会看到事实的反面，或是故意以此为乐。但把克利斯朵

夫仔细研究之下，她也承认弗朗兹说的并非完全虚妄；而她一步一步推究进去的时候，发见克利斯朵夫的确有一种力，虽然还没固定，还没平衡，但是很厚实很大胆。她看了很高兴，因为她比谁都明白力量多么难得。她有本领教克利斯朵夫说话，教他自动透露思想，显出他智力的限度与缺点。她要他弹琴。她不喜欢音乐，可懂得音乐，并且能辨别出克利斯朵夫的音乐的特色，虽然毫不感动。始终保持着冷淡而有礼的态度，她只用几句简短，中肯，而没有一点夸奖意味的话，表示她对克利斯朵夫的关切。

克利斯朵夫感觉到这一点，非常得意；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判断是有价值的，她的赞许是难得的。他毫不掩藏他有征服她的意思，而因此所表示的天真教三位主人都为之微笑：他只对于第斯说话，也只为了于第斯说话；对其余两个，他简直不理，仿佛根本没有那两个人。

弗朗兹瞧着他，嘴唇和眼睛都跟着克利斯朵夫说话而扯动，神气有点佩服又有点俏皮。他跟父亲和妹子丢着眼风，不由得笑了出来。妹子却不动声色，只装看不见。

洛太·曼海姆是个高大结实的老人：背有点儿驼，皮色鲜红，灰色的头发梳得根根向上，像刷子一样，须和眉毛都很黑；一张笨重的脸很有气魄，神气是喜欢挖苦人的。他用着老奸巨猾的和善的态度，也在研究克利斯朵夫；而他也立刻辨别出这个青年的确“有点儿东西”。但他既不关心音乐，也不关心音乐家：那不是他的一行，他一点不懂，而且非但不隐瞒，还为此自鸣得意：——像他这种人肯承认有什么事不懂，是为的表示骄傲。——克利斯朵夫很不客气而并无恶意的，明白表示用不着银行家先生奉陪，只要有于第斯小姐和他谈天就不会寂寞了；老人家听了觉得怪有意思，便去坐在火炉旁边读报，心不在焉的，含讥带讽的，听着克利斯朵夫的废话和他古怪的音乐，想到竟会有人懂得这一套而觉得有趣，不由得暗中好笑；后来他也不愿意再留神他们的谈话，把估量生客这件差事交给女儿去了。而她也的确不辱使命。

克利斯朵夫走了以后，洛太问于第斯：

“嗯，你居然套出了他的真话；你觉得这个艺术家怎么样？”

她笑了笑，想了一会，作了个总结：“他有点儿糊涂，可并不傻。”

“对，”洛太接着说，“我也觉得这样。那末他是会成功的了？”

“我相信他会成功。他是个强者。”

“好，”只有对强者才感兴趣的洛太用着一种强者的逻辑回答，“那就该帮助他了。”

克利斯朵夫回去也很佩服于第斯·曼海姆，但并不动心。对这一点于第斯是看错了。一个是由于感觉灵敏，一个是由于本能（那为他是代替机智的），两人彼此都误会了。她脸上那个谜和头脑的活跃，的确把克利斯朵夫迷住了；但他并不爱她。他的眼睛和精神是受了诱惑，心可是并不。——为什么呢？——倒不容易说。因为在她身上看到了什么暧昧不明的或令人不安的性格吗？但在别的情形之下，这反而多了一个刺激爱情的因素：一个人不怕自讨苦吃的时候，才是爱情最强的时候。克利斯朵夫的不爱于第斯，跟他们本人都不相干的。真正的理由，使他们俩都觉得有点屈辱的理由，是他和最近一次的恋爱还隔得太近。他并不是吃一次亏，学一次乖。但他在热爱阿达的时候消耗了多少的信心，多少的精力，多少的幻象，现在剩下来的已不够培植一股新的热情。要希望冒起另外一朵火焰，必需在心中另外烧起一堆火来：在旧火已熄，新火未燃的期间，只能有些转眼即灭的火星，有些上次大火中

留下来的残灰余烬，发出一道明亮而短促的光，因为缺乏燃料而马上熄灭的。再过六个月，他或许会盲目的爱上于第斯。现在他只把她当朋友看待，——当然是一个乱人心意的朋友；——但他努力驱除这种骚乱：因为这会引起他对于阿达的不愉快的回忆。于第斯对他的吸引力，是在于她跟别的女人不同的地方，而非在于跟别的女人相同的地方。她是他见到的第一个聪明女子。聪明，是的，她浑身上下都是聪明。便是她的美，——她的举止，动作，面貌，嘴唇的曲线，眼睛，手，清瘦典雅的身段，——也反映出她的聪明；她的身体就是靠聪明塑成的；没有了聪明，她就会显得丑了。这聪明使克利斯朵夫非常喜欢。他以为她胸襟如何宽大，如何洒脱，其实她并没到这个程度；他还不知道她令人失望的地方呢。他渴想向于第斯推心置腹，把自己的思想让她分担一些。他从来没有能找到一个关切他的思想的人：得一知己是多么快乐啊！他小时候常常抱怨没有姊妹，认为一个姊妹应当比一个兄弟更能了解他。见到了于第斯，友谊那个虚幻的希望又复活了。他根本没想到爱情。因为没有爱情，所以他认为和友谊相比之下，爱情简直太平凡了。

克利斯朵夫这种微妙的心理，于第斯不久就感觉到了，大为气恼。她并不爱克利斯朵夫；而且为她颠倒的年轻人已经有过不少，都是本地有钱而有身分的子弟，即使克利斯朵夫对她倾心，也不见得会使她怎么得意。但知道他竟无动于衷，她可心中有气了。眼看自己只能在理智方面对他发生影响，未免太委屈了；女人要能使男人失掉理智才觉得更有意思！何况她并没用什么理智去影响人家，根本是克利斯朵夫一厢情愿，凭空造出来的。于第斯脾气很专横。她平素把她认识的一般青年的软弱的思想支配惯了。既然他们庸庸碌碌，她认为控制他们也没多大意思。对付克利斯朵夫可困难得多，所以也有趣得多。她压根儿不理睬他的什么计划，但很高兴去支配那个簇新的头脑，那股犷野的力，使它们成器，——当然是照她的而不是照她不屑了解的克利斯朵夫的办法。但她立刻发觉要做到这一步非经过一番斗争不可；克利斯朵夫有的是各种各样的成见，有的是她认为过激而幼稚的思想：那都是些败草，她决意要拔掉的；可是一根都没拔掉。她的自尊心一点没得到满足。克利斯朵夫倔强得厉害。既然不动爱情，他用不着在思想上对她让步。

她不服气。在某一个时期内想要征服他。克利斯朵夫那时虽然头脑清楚，也差点儿重蹈覆辙。男子只要有人奉承，使他的骄傲与欲望获得满足，就极容易上当；而富于幻想的艺术家更容易受骗。于第斯不难把克利斯朵夫诱入恋爱的陷阱，把他再毁一次，也许毁得更彻底。可是她照例很快就不耐烦了，认为犯不上费那么大的劲去征服这样的一个人；克利斯朵夫已经使她腻烦；她已经不了解他了。

他一过了某种限度，她就不能了解。至此为止，她是完全懂得他的。再要往前，就不能单靠她出众的聪明了；那需要一点热诚，或者暂时可以刺激热诚的幻想，就是说：爱情。她很了解克利斯朵夫对人对事的批判，认为很有意思，相当中肯；她自己也不是没有这么想过。她所大惑不解的是，在实行这些思想可能碰到危险或麻烦的时候，为什么要把思想去影响自己的实际生活。克利斯朵夫对所有的人取着反抗态度是不会有结果的：他总不见得自命要改造社会吧？……那末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自己把脑袋往墙上撞吗？一个聪明人尽可批判别人，暗地里嘲笑别人，轻视别人；但他的行事是跟他们一样的，仅仅略胜一筹罢了：这才是控制人的唯一的办法。思想是一个世界，行动又是一个世界。何苦做自己思想的牺牲品呢？思想要真实：那

当然！可是干么说话也要真实呢？既然人类那么蠢，担当不是真理，干么要强迫他们担当？忍受他们的弱点，面上迁就，心里鄙薄，觉得自己无挂无碍：你岂不得意？要说这是聪明的奴隶的得意也可以。但反正免不了做奴隶，那末即以奴隶而论，还是逞着自己的意志去做奴隶，不必再作那些可笑而无益的斗争。最要不得的是做自己思想的奴隶而为之牺牲一切。一个人不该上自己的当。——她清清楚楚看到，要是克利斯朵夫一意孤行，走着和德国艺术德国精神的偏见反抗到底的路，一定会使所有的人跟他作对，连他的保护人在内，结果是一败涂地。她不懂为什么他要跟自己过不去，要把自己毁灭而后快。

要懂得这一点，先要懂得他的目的不在于成功而在于信仰。他信仰艺术，信仰他的艺术，信仰他自己，把这些当作不但是超乎一切利害的，而且是超乎他的生命的现实。等到她的批评使他不耐烦了，他用着天真的夸大的口气说出这些理由时，她先是耸耸肩膀，不拿他当真，她认为他只是唱高调，像她哥哥那样，每隔多少时候总得宣说一番又荒唐又伟大的决心而决不冒冒失去实行的。后来看见克利斯朵夫真是为这些空话着了迷，她便认为他是疯子，对他不感兴趣了。

从此她不再费心表现自己的长处，只拿出她的本相来了：她骨子里是个十足地道的德国人，远过于你一开头所看到的，也远过于她自己所想象的。——大家错怪以色列人，说他们不属于任何民族，在欧洲无论哪一个地方都保存着他们清一色的民族性，不受当地民族的影响。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比犹太人更容易感染土著的气息；法国犹太与德国犹太之间固然有不少共同点，但从他们居留的国家得来的不同点更多；他们接受异族的思想习惯特别快，并且接受的还是习惯多于思想。而所谓第二天性的习惯，在大多数人竟是独一无二的天性，所以一个地方的土著根本没资格责备犹太人缺少深刻而经过思考的民族性，因为这特性在土著身上连影子都找不到。

女人原来对外界的影响比较感觉灵敏，对生活情况也适应得更快，更能随遇而安，而全欧洲的犹太女人尤其能把当地的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风气学得维妙维肖，往往还过分，——同时仍保存着他们的轮廓，保存他们的民族特有的那种乱人心意的，浓烈的，经久不散的魅力。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为惊异。他在曼海姆家遇到那些姑母，堂表姊妹，和于第斯的女朋友们。其中有几个虽然极不像德国人，热烈的眼睛和鼻子离得很近，鼻子又和嘴巴离得很近，轮廓分明，暗黄色的皮肤长得很厚，虽然她们整个的外表都不像德国女人，可是比真正的德国女人更彻底的德国化：谈话，装束，都跟德国女人一般无二，甚至还要过火。于第斯比她们这一批都高明；你比较之下就能看出她的智力有哪些过人的地方，她的人品有哪些是自己修养得来的。可是别人所有的大多数缺点，她也一样具备。在思想方面她比别人自由得多，差不多完全独往独来，但她的行事并不比人家更大胆；至少她实际的利害观念在这儿代替了她独往独来的精神。她相信社会，相信阶级，相信偏见，因为通盘计算之下，她觉得这些对她还是有利的。她徒然嘲笑德国气质，她自己就是亦步亦趋的追随着德国潮流。她很感觉到某个知名的艺术家的平庸，但照旧尊敬他，因为他是知名的；而假使她和他有来往，她更要佩服他，让自己的虚荣心满足一下。她不大喜欢勃拉姆斯的作品，暗中还疑心他不过是个第二流的艺术家；但他的荣名使她肃然起敬；又因为收到过他五六封信，她更毫不迟疑的断定他是当代最大的音乐家。克利斯朵夫的价值，副官长弗雷希的

愚蠢，都是她确认的事实；但弗雷希的追求她的财富，比克利斯朵夫纯粹的友谊使她更得意：因为不管他多么傻，一个军官终究是另一阶级的人物；而一个德国的犹太女子比别的女子更难踏进这一个阶级。她并不相信这些无聊的封建观念，也很明白假使她嫁给副官长弗雷希，倒是她给了他面子，然而她还是拚命想勾引他，不惜卑躬屈膝对这个傻瓜做着媚眼，逢迎吹拍，唯恐不至。这个骄傲的犹太姑娘，有资格骄傲的姑娘，银行家曼海姆的聪明而眼高的女儿，平素多么瞧不起德国的小布尔乔亚妇女的，竟想降低身分去学她们的样。

这一次的经验，时间并不久。克利斯朵夫对于第斯的幻想很快就消灭了，差不多和幻想来的时候一样快。说句公道话，这是应该由于第斯负责的，因为她一点不想法使他保留幻想。像这种性格的女子一朝把你批判定了，把你在心中丢开之后，你就不存在了，她心目中已经没有你这个人，会对着你毫无顾忌的暴露她的灵魂，不以为羞，好似不怕在猫狗前面赤身露体一样。克利斯朵夫看到了于第斯的自私，冷酷，性格的平庸。幸而时间还短，他没有完全为她着迷。但他的发见已经使他痛苦，使他烦躁。他虽不爱于第斯，可爱着于第斯可能成就的——应该成就的人物。她美丽的眼睛使他感到一种痛苦的诱惑，难以忘怀；尽管他现在知道了这双眼睛里面只有一颗萎靡不振的心灵在那儿睡着，他仍旧把它们看做先前所看到的，他愿意看到的那个样子。这是没有爱情的爱的幻觉。一般艺术家不完全耽溺在自己作品里的时候，那种幻觉在他们心中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的。无意中碰到的一张脸就会使他们有这个境界；他们能看出它所有的美，为本人不觉得的，不以为意的；而因为本人不以为意，所以艺术家更爱那个美。他们有如爱一件快要死灭而无人赏识的美妙的东西。

这也许是他自己看错了，于第斯这个人说不定早已定局，不能再有什么发展。但克利斯朵夫有过一个时候是相信她有前途的；这个幻觉始终存在，所以他不能用客观的眼光去判断她。他觉得她所有美好的地方都是她独有的，她本身整个儿都是美好的；她所有的庸俗，应当让德国与犹太这个双重的民族性去负责，尤其是德国，因为他自己为了德国性格受过更多痛苦。既然别个民族他还一个都不认识，他就把德国气质作为负罪的羔羊，拿世界上所有的罪过一齐教它担当。于第斯给他的幻灭，使他又多了一项攻击德国气质的理由，认为它摧残了这样一颗灵魂的热情是不能原谅的。

这便是他和以色列族初次相遇的情形。他本希望在这个刚强而孤立的民族中间找到一个奋斗的盟友，而今一切都成泡影。热情冲动的直觉原是极不稳定的，常常使他从这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因此他立刻断定，犹太民族并没像一般所说的那么坚强，而接受外来影响也太容易了。它除了本身的弱点之外，还要加上它到处蒐罗得来的弱点。他在这儿非但找不到一些倚傍来支持他的艺术，反而有跟这个民族一同陷在沙漠里的危险。

一边发觉了危险，一边又没冲过危险的把握，他便突然不上曼海姆家去了。人家请了他好几回，他都谢绝了，也不说明理由。至此为止，他一向是殷勤得有点过分的，这一下突然之间的改变当然引起了注意：大家认为这是他的“怪僻”，但曼海姆一家三个人，都相信跟于第斯不无关系；洛太和弗朗兹在饭桌上常常把这个问题作为取笑的资料。于第斯耸耸肩，说征服一个男人弄到这个局面也太妙了，接着又冷冷的要求她的哥哥别老跟她开这种玩笑。可是她也不放过逗引克利斯朵夫回来的机会。她写信给他，借口问他一

个只有他能解答的音乐问题，未了很亲切的提到他近来很少去而大家渴望见他的话。克利斯朵夫复了信，回答了她的问題，推说事情忙，始终不去。有时，他们在戏院里碰到。克利斯朵夫眼睛老向着别处，避免看到曼海姆家的包厢；于第斯存心想给他一个最动人的微笑，他却装做连于第斯这个人谁都没看见。她也不坚持。对他既无所谓，她觉得这个起码艺术家让她白费心血也不应该。他要愿意回来，他自个儿会回来的！要不然也就算了！……

结果真的算了；没有他，曼海姆家里晚上也并不怎么寂寞。可是于第斯不由自主的恨着克利斯朵夫。他在的时候她不把他放在心上，她倒认为很平常，他要因之而不高兴也可以；但要不高兴到绝交的程度，那她觉得简直是狂妄，骄傲，只有自私而没有热情。——同样的缺点只要不在自己身上而在别人身上，于第斯就觉得不能容忍。

然而她对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和行事倒反更注意。她不动声色的逗他的哥哥提到这些问題，把他白天和克利斯朵夫的谈话讲出来，然后她含讥带讽的评论几句，凡是可笑的地方一桩都不放过，使弗朗兹对克利斯朵夫的热情不知不觉的降低下去。

在杂志方面，先是一切都很好。克利斯朵夫还没看出那些同事的庸俗；他们也因为他是自己人而承认他有天才。最初发见他的曼海姆还没读到他一个字，就已经在到处宣扬，说克利斯朵夫是个出色的批评家，他当作曲家是走错了路，最近才由曼海姆把他点醒的。他们在杂志上用着神秘的措辞替他的文章做预告，大大的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他第一篇评论披露的时候，在这个人心麻木的小城里好似一块大石头掉在鸭塘里。题目叫做：音乐太多了！

“音乐太多了，吃的东西太多了，喝的东西太多了！大家不饥而食，不渴而饮，不需要听而听，只是为了狼吞虎咽的习惯。这简直和斯特拉斯堡的鹅一样。这民族竟是害了贪食症。你给他随便什么都可以。华葛耐的《德利斯当》也好，《萨勤耿的吹号手》也好，贝多芬也好，玛斯加尼也好，赋格曲也好，两拍子的军队进行曲也好，阿唐，罢哈，普岂尼，莫扎尔德，玛希纳，都好。他连吃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只要有得吃。甚至吃了也不觉得快乐。瞧瞧他在音乐会里的神气罢。有人还说什么德国式的狂欢！其实什么叫做欢乐他们就不知道：他们永远是狂欢的！他们的狂欢和他们的悲哀一样是像雨水般随便流的：贱如泥土的欢乐，没有精神也没有力。他们楞头傻脑的笑着，几小时的吸收声音，声音，声音。他们一无所思，一无所感，只像一些海绵。真正的欢乐与真正的痛苦，——力，——决不会像桶里的啤酒般流上几小时的。它掐住你的咽喉，使你惊心动魄的慑服，以后你不会再想要别的：你已经醉了！”

“音乐太多了！你们糟蹋自己，糟蹋音乐。你们糟蹋自己是你们的事；可是音乐，别胡来了吧！我不许你们糟蹋世界上美，把圣洁的和声跟恶浊的东西放在一只篮里，把《巴西法》的《序曲》插在《联队女儿》的杂奏曲和萨克风喇叭的四重奏中间，或是把贝多芬的 Adagio 跟美洲土人舞乐或雷翁加伐罗的无聊作品放在一起。你们自命为世界上最大的音乐民族，你们自命为爱音乐。可是爱哪一种音乐呢？好的还是坏的？你们不论好坏都同样的拍手喝彩。你们先挑一下行不行？究竟要哪一种？你们不知道，不愿意知道：你们怕决定，怕闹笑话……你们这种谨慎小心，替我见鬼去罢！——你们说，你们在一切偏见之上，是不是？——其实你们是被压在一切偏见之下……”

于是他引了高脱弗烈特·凯勒的两句诗，——那是一个祖利克地方的布

尔乔亚，他的光明磊落，勇于战斗的态度，本地风光的生辣的气息，是克利斯朵夫非常爱好的：

得意扬扬自命为超乎偏见之上的人，
其实是完全在偏见之下。

他又继续写道：“你们应当有勇气保持你们的真！应当有勇气不怕显得丑！假如你们喜欢恶劣的音乐，就痛痛快快的说出来。把你们的本相拿出来。把你们灵魂上的不清不白的胭脂花粉统统抹掉吧，用水洗洗干净吧。多少时候你们没有在镜中照照你们这副丑相了呢？让我来照给你们看罢。作曲家，演奏家，乐队指挥，歌唱家，还有你们，亲爱的听众，你们可以彻底明白你们是什么东西了……你们爱做什么人物都可以，但至少要不真！要不真，哪怕艺术和艺术家因之而受到损害也没关系！假使艺术不能和真理并存，那末就让艺术去毁灭吧！真理是生，谎言是死。”

这番激烈的血气方刚的话，再加那种不雅驯的态度，自然使大家叫起来了。可是对于这篇每个人都包括在内而没有一个人清清楚楚受到攻击的文字，谁也不愿意认为针对自己。每个人都是，都自以为，自称为真理的朋友，所以那篇文章的结论决不致受人非难。人家不过讨厌它的语气，一致认为失态，尤其是出之于一个半官方艺术家之口。一部分的音乐家开始骚动了，愤懑的抗议了：他们料到克利斯朵夫决不会这样就算了的。另外一批人自以为更聪明，去恭维克利斯朵夫有勇气，可是对他以后的文字也同样在那里惴惴不安。

抗议也好，恭维也好，结果总是一样。克利斯朵夫已经冲了出去，什么都拦不住他了；而且依着他早先说的活，作家和演奏家都免不了受到攻击。

第一批开刀的是乐队指挥。克利斯朵夫决不限于对指挥乐队的艺术作一般性的讨论。他把本城或邻近诸城的同事一一指出姓名，或者用着极明白的隐喻，令人一复而知说的是谁。譬如，每个人都能认出那个毫无精神的宫廷乐队指挥，阿洛伊·洪·范尔奈，小心谨慎的老人，一身载满了荣誉，什么都害怕，什么都要敷衍，不敢对乐师们有何指摘，只知道俯首帖耳的跟着他们的动作。除了有过二十年的声誉，或至少经过学士院的什么大老盖过官章的作品以外，他决不敢把新作随便排入节目。克利斯朵夫用着挖苦的口吻恭维他的大胆，称赞他发见了迦特，特伏夏克，恰各夫斯基；恭维他的乐队演奏准确，节拍不差毫厘，表现得细腻入微；他提议在下次音乐会中可以替他吧邱尼的《速度练习曲》配成器乐来演奏，又劝他不要过于疲劳，过于热情，得保重身体。——再不然，克利斯朵夫对他指挥贝多芬《英雄交响乐》的作风发出愤怒的叫喊：

“轰啊！轰啊！给我轰死这些家伙罢！……难道你们全不知道什么叫做战斗，什么叫做对于人类的荒谬与野蛮的战斗，——还有那个一边欢笑一边

法、意两国，凡负责及指挥某一教堂的音乐节目的，称为教堂乐长（*maître de chapelle*）。在德国，十九世纪及以前，诸侯宫廷中的教堂乐长，亦称 *Kapellmeister*，近代用义更广，不论教堂的、民间的、剧院的乐队指挥，均统称为 *Kapellmeister*，比英文中的 *Conductor* 多一点尊称的意味。

邱尼（*Czerny*）为十九世纪钢琴家兼作曲家，所作尤为为学生练习指法用的曲子。《速度练习曲》为此种练习曲之一。

把它们打倒在脚下的力吗？嘿，你们怎么会知道呢？它所攻击的就是你们！你们的英勇是在于能够听着，或忍着呵欠而演奏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因为这个曲子使你们厌烦……那末老实说出来罢，说那个曲子使你们厌烦，厌烦得要死！）——你们的英勇还有什么表现？大概是光着脑袋，驼着背，忍着过路风而恭迎什么大人物吧。”

对于这些音乐院的长老演奏过去的名作时所用的“古典”风格，他只嫌冷嘲热讽的字不够用。

“古典！这句话把什么都包括了。自由的热情，像学校的课本一样被删改修正了！生命，这片受着长风吹打的广大的平原，——也给关在古典学院的院子中间！一颗颤动的心的狂野威武的节奏，被缩成钟锤的摆动，安安静静，规规矩矩的，按着四拍子前进，在重拍上加强一下！……你们要把大海装入小玻璃缸，放些金鱼，才能鉴赏大海。你们要把生命扼杀之后才懂得生命。”

他对这般他称为“打包匠”式的乐队指挥固然不客气，但对“马戏班骑手”式的名指挥尤其严厉，——他们周游各地，教人家欣赏他们手舞足蹈的姿势，爬在大名家的背上显本领，把人尽皆知的作品弄得面目全非，难于辨识，在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中表现他们的身手矫捷。克利斯朵夫把他们当做卖弄风情的老妇，走江湖的吉普赛，走绳索的卖技者。

演奏家也是给他嘲弄的好材料。他批判他们卖弄手法的音乐会时，声明自己是外行，说这些机械的练习是属于工艺学院的范围的：时间的长短，音符的数目，耗费的精力等等，只有画成图表才能显示，才能估量它们的价值。有时，一个著名的钢琴家堆着笑脸，头发掉在眼角上，在两小时的音乐会中解决了技术上最大的困难，克利斯朵夫说他根本还不能把莫扎尔德的一曲简单的Andante弹得像个样。——当然，他并非不知克服困难的乐趣。他自己也体味过来：这是人生一乐。但只看见作品的物质的一方面，认为艺术上的英勇壮烈就只有这一点，那他觉得又丑恶又可耻了。什么“钢琴之狮”，“钢琴之豹”，他都不能原谅。——同时他对那般在德国很出名的老学究也不大客气，因为他们苦心孤诣要保存名作的原文，便加意压制思想的奔放，并且像亨斯·洪·皮罗那样，表演一阕热情的朔拿大的时候，简直像教大家上一堂朗诵台词的课程。

歌唱家们也有挨骂的份儿。克利斯朵夫对于他们粗俗笨重的歌唱和内地式的浮夸的腔派，心中真有千言万语要说。这不但因为他记得和那位蓝衣太太的争执，而且许多使他受罪的表演更加强了他的恨意。他竟说不清他的眼睛跟耳朵哪一样更难受。至于舞台面的恶俗，服装的难看，颜色的火暴等等，克利斯朵夫因为缺少比较的材料，还不能充分的批评。他所厌恶的，尤其在于人物、举动、态度的粗俗，歌唱的不自然，演员的不能感染剧中人的精神，漠不关心的从一个角色换唱另一个角色，只要音域相仿。那些身发财发，好不得意的妇人，不管是唱伊索尔特是唱嘉尔曼，只知道卖弄自己。安福太斯居然变了斐迦罗！……但克利斯朵夫感觉得最清楚的，当然是歌唱的恶劣，

亨斯·洪·皮罗为德国十九世纪最大的钢琴家之一，此处批评其演技，系作者本人亲聆（皮罗去世在一八九四年）以后的评语。

伊索尔特为华葛耐歌剧《德利斯当与伊索尔特》中的女主角，嘉尔曼为法国皮才所作歌剧《嘉尔曼》的女主角。两部作品的风格，女主角的性格，完全不同。安福太斯为华葛耐歌剧《巴西法》中的角色，斐迦

特别是以旋律的美为主的古典作品。德国已经没人会唱十八世纪末期的那种完美的音乐，也没人肯费心去研究了。葛吕克和莫扎尔德的清朗明净的风格，与歌德的一样，好似浴着意大利的阳光的，到韦勃已经染上狂乱颤动的气息而开始变质，到曼伊贝又给笨重的漫画手法变得可笑，而到华葛耐风靡一世的时候更被完全压倒了。尖声怪叫的华尔基利在希腊的天空飞过。斯干地那维的神话掩蔽了南国的光明。现在再没有人想到唱音乐，只想到唱诗。细节的疏忽，丑恶的地方，甚至错误的音符，都被认为无关宏旨，藉口说唯有作品的全体才重要，唯有思想才重要……

“思想！好，就谈思想吧。仿佛你们是懂得思想的！……可是不管你们懂不懂，至少得尊重思想所挑选的形式。第一得让音乐成其为音乐！”

而德国艺术家自命为对于表情与深刻的思想的关心，在克利斯朵夫看来简直是开玩笑。表情吗？思想吗？是的，他们到处都用上了，——到处，而且是一律的。一双羊毛靴子，跟一座弥盖朗琪罗的雕像，他们一样的会在其中找到思想，——不多也不少。不论演奏哪一个作家，哪一件作品，用的老是同样的精力。在多数人心目中，音乐的要素只是音量，只要不是杂声而是音乐的声音就得了。德国人对唱歌的兴趣那么浓，其实只是为了声带经过了运动以后的快感。主要是尽量的鼓起气来，尽量的放射出去，要有力，持久，按着拍子。克利斯朵夫称赞某个有名的女歌唱家，说可以送她一纸健康证书。

他吆喝了艺术家还不算，更要从台上跳到台下，把那些张着嘴巴看他开刀的群众教训一顿。群众被他呵斥之下，觉得啼笑皆非。那真要令人呼冤叫屈了，因为他们一向很留神，不加入任何艺术论战，小心翼翼的跟一切棘手的问题都站得老远，而且唯恐自己犯错误，所以对一切都拍手叫好。但克利斯朵夫认为拍手就是他们的罪状！……对恶劣的作品拍手吗？——那已经该死了！可是克利斯朵夫更进一步，说他们最不应该对伟大的作品拍手。

“轻薄的家伙！你们想教人相信你们竟这样热烈吗？……得了罢！这恰恰证明完全相反。要拍手，等热闹的开始来的时候再拍手吧，那些段落原来是像莫扎尔德说的为‘驴子耳朵’写的。在这儿，你们尽管尽兴吧：人家是准备你们大叫大嚷的，那也是音乐会中应有的一套。可是在贝多芬的《弥撒祭乐》以后鼓掌……你们不是该死吗！……那明明是最后之审判。荣耀归主那一章，惊心动魄的气势像海洋上的狂风暴雨，大力士般的猛烈的意志好比一阵飓风，忽然停在云端里，双手攀着深渊，然后又奋力向太空飞去……狂风怒号。在最惊险的关头，突然来了一段转调。一种抖动的声音透过乌云从天上直落到颜色惨白的海上，像一片光。这是到了结束的阶段。死神那种疯狂的飞翔冷不防停了下来，它的翅膀被三道闪电钉住了。周围的一切还在发抖，迷糊的眼睛还在发花。心忐忑的跳着，气息仅属，四肢瘫痪……而最后

罗为莫扎尔德歌剧《斐迦罗之婚礼》中的角色，性质迥异，声部亦不同（一为男中音，一为男低音）。

以上一段均系批评华葛耐歌剧对近代音乐的不良影响。华葛耐对歌剧另有一套理论，意欲融音乐、诗歌、哲学、神话、戏剧于一炉。而其歌剧的歌唱风格亦另辟蹊径，此处即攻击此种风格的弊病。

神话载，弗里基弥达斯因不喜阿波罗所奏的竖琴，被阿波罗将其耳朵变为驴耳。今以此语喻不懂音乐的人。

贝多芬的《弥撒祭乐》共分五大颂曲：（一）吾主怜我，（二）荣耀归主，（三）我信我主，（四）圣哉圣哉，（五）神之羔羊。而第二部《荣耀归主》本身又分成三章，以下所描写的是第一章的境界。

所谓三道闪电系指第一章将结束时由大喇叭用特别强的声量（fff）奏出的三个和弦。

一个音符还在振动的时候，你们已经在高兴了，乐了，你们叫着，笑着，议论纷纷，拍手了！……难道你们一无所见，一无所闻，一无所感，一无所悟吗？一个艺术家的痛苦为你们原来只是一出戏，认为贝多芬临终的血泪给描写得非常精细！你们对耶稣上十字架竟喊着‘再来一次！’这个超凡入圣的人在痛苦中挣扎了一辈子，结果只给你们这批愚夫愚妇消磨一个钟点！……”

这样，他无意之间诠释了歌德的两句名言；不过他没有达到歌德那种清明高远的境界罢了：

“大众把崇高伟大当作游戏。要是他们看到了崇高伟大的面目，那就连望一望的勇气也没有了。”

克利斯朵夫还不肯就此罢休。热情冲动之下，他跳过了群众，像一颗炮弹似的去轰那个圣坛，那个禁地，那个庸才俗物的避难所——批评界了。他把同业骂得体无完肤。其中有一个胆敢攻击当时最有天才的作曲家，最前进的乐派的代表，哈斯莱。他写过许多标题交响乐，虽然不免偏激，究竟是才气纵横的作品。克利斯朵夫小时候见过他，为了纪念当时的情绪，始终对他很感激。现在看到一个不学无术的愚蠢的批评家竟然敢教训这样的天才，不禁气愤到极点，大叫起来：

“反了！反了！难道你除了王法以外，不知道还有别的法纪吗？天才决不给你拖上庸俗的老路的。他创造法纪，他的意志会成为大家的规律。”

在这一段傲慢的开场白以后，克利斯朵夫抓住了倒楣的批评家，把他近来所写的荒谬的文字痛加批驳，淋漓尽致的训了一顿。

整个批评界都觉得受了侮辱。他们一向对论战置身事外，不想冒冒失失的去碰钉子；他们对克利斯朵夫认识很清楚，知道他内行，也知道他没有耐性。至多他们之中有几个很含蓄的表示，一个这样优秀的作曲家越出了本行去乱撞未免可惜。他们不论意见怎么样（在他们能有个意见的时候），总还尊重他跟他们一样享有批评家的特权，可以批评一切而自己不受批评。但看到克利斯朵夫突然把同行之间的默契破坏以后，他们立刻把他看做国民公敌了。他们一致认为，一个青年胆敢冒犯那些为国增光的宗师真是岂有此理，就开始对他作剧烈的攻击。他们并不写什么长文章来一套有系统的辩论；——（虽然新闻记者有种特殊的本领，用不着顾到对方的论证，甚至毋须一读，照旧能进行他的论战，此刻也不愿意跟一个实力充足的敌人在这种阵地上对垒。）——凭着多年的经验，他们知道报纸的读者总是相信他的报纸的，报纸而一有辩论的口吻就会减低自己的声望；还不如直截了当的肯定一切，或更好是否定一切。否定比肯定加倍有力。这是可以从重心律直接推演出来的：把一颗石子从上面丢下来，不是比往上抛更容易吗？因此他们宁可用一些阴险的，挖苦的，侮辱的短文，逐日刊登在显著的地位，把傲慢的克利斯朵夫形容得非常可笑，从来不指出他的姓名，但一切都描写得十分明显。他们把他的言论改头换面，弄得荒谬绝伦；又讲他的轶闻秘史，往往事出有因而一大半是凭空捏造的，而且编得非常巧妙，刚好能挑拨克利斯朵夫跟城里人的，尤其是宫廷方面的感情。他们也攻击他的外表，面貌，服装，勾勒出一幅漫画。因为听到再三再四的说，大家终于觉得克利斯朵夫真是这副模样了。

克利斯朵夫的朋友们对这些都可以满不在乎，倘使他们的杂志在论战中挨打。其实外边的攻击不过是种警告；人家并不想把它牵入漩涡，而是有心把它和克利斯朵夫撇清，但这份杂志怎么不怕它的声誉受到影响未免令人奇怪；他们暗示，倘若它再不检点，就顾不得遗憾与否，对编辑部其余的

人也要下手了。亚陶尔夫·梅和曼海姆开始受到的攻击虽然并不猛烈，已经使窠里的人张皇起来。曼海姆只是笑笑：以为那可以教他的父亲，伯叔，堂兄弟，以及无数的家族着恼，他们自命对他的行为举止有监护之责，一定要因之大为愤慨的。但亚陶尔夫·梅把事情看得非常严重，责备克利斯朵夫连累了杂志。克利斯朵夫老实不客气把他顶回去了。其余几个因为没有挨骂，倒认为这个老是向他们说大话的梅代他们吃些苦也挺有意思。华特霍斯暗中很高兴；他说不砍破几个脑袋就不成其为厮杀。自然，他意思之中决不是说砍破自己的脑袋；他自以为靠着他的门第与社会上的关系，处于绝对安全的地位，至于他的犹太同志们吃些亏也没有什么害处。至此为止还没轮到的高特林和哀朗弗可不怕攻击，他们俩会回敬的。他们觉得不愉快的倒是克利斯朵夫那种死心眼儿，使他们跟所有的朋友，尤其是跟所有的女朋友弄得很僵。看到最初几篇文字，他们乐死了，以为这玩笑开得很妙：他们佩服克利斯朵夫捣乱的劲，同时以为只要一句话就能使他斗争的热情降低一点，至少对他们所指定的某些男女朋友留些情分。——可是不行。克利斯朵夫什么话都不听，什么请托都不理会，只像疯子一样的蛮干。要是让他搅下去，简直没法在地方上过活了。他们的腻友已经哭哭啼啼，怒气冲冲的到社里来闹过几场，他们用尽手段劝克利斯朵夫在某些地方笔下留情；克利斯朵夫完全不理。他们生气了，克利斯朵夫也生气了；但他的态度还是照旧。华特霍斯看着这些朋友着急觉得好玩，绝对不动心，并且故意袒护克利斯朵夫使他们更气。他也许比他们更能赏识克利斯朵夫的勇敢的蛮劲，佩服他不留退路也不为将来着想，只低着头逢人便撞。至于曼海姆，对这番大锣大鼓的吵架看得高兴极了，自以为把一个疯子带到这群循规蹈矩的人里去的确是开了个大大的玩笑；眼看克利斯朵夫跟人家一拳来一脚去，他笑弯了腰。虽然他受着妹子的影响，开始相信克利斯朵夫真有点疯头疯脑，他倒反更喜欢他；他需要在他喜欢的人身上找出些可笑的地方。所以他和华特霍斯两人在别的朋友前面替克利斯朵夫撑腰。

他头脑很实际，虽然竭力自以为不实际；因此他认为替朋友着想，最好把他的利害关系和当地最前进的音乐团体的利害关系打成一片。

像大多数的德国城市一样，这里也有一个华葛耐友谊会，代表反抗保守派的新思想。如今各处对华葛耐的声望已经公认了，作品也排入了德国所有歌剧院的戏码，替华葛耐辩护当然不会再有什么危险。可是华葛耐的胜利是硬争取得来的，而非由于人家的心悦诚服；骨子里大众仍旧很固执的抱着保守心理，尤其像这儿一样的小城市，跟时代的潮流完全隔绝，只知道仗着古老的名气自命不凡。德国人天生的对新思想新潮流有种疑虑，凡是真实的强烈的东西，没有经过几代的人咀嚼的，他们都懒得去体会：这种情形在这里比别的地方更厉害。固然华葛耐的作品已没有人敢非难，但一切受华葛耐思想感应的新作品，大家都不大乐意接受：这就充分证明了上面所说的民族性。所以倘若一切的华葛耐友谊会能够热心保护艺术界新兴的杰出的力量，那末它们很可以做些有益的事。有时它们的确尽过这种责任，勃罗格耐与雨果·伏尔夫就受到某些华葛耐会的支持。但大宗师的自私自利往往使门徒也跟着自私自利；巴哀埒脱既然成了崇拜独一无二的上帝之所，巴哀埒脱所有的小支

勃罗格耐（1824—1896）与雨果·伏尔夫（1860—1903）生前受勃拉姆斯党徒排挤。

德国巴伐利亚邦巴哀埒脱城的华葛耐剧院，为华葛耐亲自设计监造，绝对不演他人作品。

部也成为信徒们永远礼拜同一个上帝的小教堂。充其量，他们只在正殿旁边的小祭坛上供奉几个忠实信徒的神位，而还得这些信徒对那位独一无二的，多才多艺的神明，音乐、诗歌、戏剧、玄学各方面的祖师，表示五体投地的崇拜，对他神圣的主义能够一字一句的遵守勿渝才行。

本地的华葛耐友谊会就是这种情形。——可是它还装点门面，想结纳一批可为己用的有才气的青年，已经在暗中对克利斯朵夫留意了很久。它不着痕迹的向他表示好感，他根本不觉得；因为他不需要跟人家联络，他不懂为什么他的同胞一定要组织团体挨在一块儿，仿佛单枪匹马就什么事都做不了：唱歌，散步，喝酒，都是不行的。他讨厌所有的社团。但比较起来，他对华葛耐友谊会还容易接受，它至少办些美妙的音乐会；而华葛耐派的艺术主张，他虽然不全部赞同，究竟比别的音乐团体跟他接近得多。单看它对勃拉姆斯和勃拉姆斯党跟他一样激烈，似乎他和这个党派之间的确还能找到一些共同的立场。因此他就听人拉拢了。居间的是曼海姆，他是没有一个人不认识的。虽非音乐家，他也是华葛耐会的会员。——会中的领袖们早就留意克利斯朵夫在杂志上掀起的论战。他打发敌人的某些作风被认为很有力量，大可加以利用。固然克利斯朵夫对他们神圣的偶像也很不恭敬的刺过几下，但他们宁可装做看不见：——而且这几下最初的，并不如何猛烈的攻击，对于他们急于要趁克利斯朵夫未作更进一步的攻击之前就去加以笼络，也许不为无因，虽然他们并不承认。他们很殷勤的征求他同意，可不可以拿出他几支歌参加华葛耐会主办的音乐会。克利斯朵夫听了很得意，便答应了。他上他们会里去，又禁不住曼海姆的怂恿，马上入了会。

当时领导这个华葛耐友谊会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公认为权威的作家，一个是权威的乐队指挥。两人都是对华葛耐信仰极坚的。前者名叫姚西阿·葛林，写过一部《华葛耐辞典》，可以使人随时随地了解大师的思想，可知者无所不知，可解者无所不解，真是他一生的杰作。他在饭桌上能够整章整卷的背出来，不下于法国内地的中产阶级熟读《毕塞尔诗歌》。他也在《巴黎公报》上发表讨论华葛耐与阿利安精神的文字。当然，他认为华葛耐是纯种阿利安典型，德国民族在阿利安种内是抵抗拉丁的塞米气息的中流砥柱，尤其能抵抗法国的塞米气息的坏影响。他宣告高卢族淫靡的风气已经给打倒了，但他仍旧天天不断的拚命攻击，仿佛那个永久的敌人始终还有威胁的力量。他对法国只承认有一个大人物，高皮诺伯爵。葛林是个矮小的老人，很有礼貌，像处女一样动不动会脸红的。——会中另一个台柱名叫哀利克·洛贝，四十岁以前是一家化学厂的经理；然后丢掉了一切去做乐队指挥。他的

此处所称大宗师，独一无二的上帝，神明，祖师，均指华葛耐。

《毕塞尔诗歌》为服尔德所作讽刺圣女贞德的长诗，纯粹是反宗教的，曾风行一时。

阿利安族，源出中亚细亚，经由印度而移殖欧洲，征服土著，并与土著混台。而纯种阿利安族究由现代何种民族代表，言人人殊，或谓日耳曼族，或谓拉丁族。塞米气息系指塞米族的性格。塞米族指今之阿拉伯人，叙利亚人，犹太人。

高皮诺伯爵（1816—1882）为法国外交家兼文学家。著有《种族不平等论》一书，认为阿利安族为最优秀的人种；而最纯粹的阿利安种在今日为日耳曼人（但并非德国人，因德国人已与高卢族及斯拉夫族混血），即住居英、比及法国北部、斯干地那维半岛的淡色头发，脑壳长度大于宽度四分之一的人。此项学说被德国学者利用，并转指德国人为纯种阿利安人，作为大日耳曼主义之根据。尼采与华葛耐等的主张，皆与高皮诺的学说有关。

能够达到目的，一半是靠他的意志，一半是靠他的有钱。他是巴哀埒脱的狂热的信徒：据说他曾经穿了朝山的布鞋从慕尼黑步行到巴哀埒脱。奇怪的是，这位博览群书，周游大地，做过各种不同的行业而处处显出性格坚强的人，在音乐方面竟会变成一头巴奴越的绵羊。他所有的那些特出的性格，一到这儿只使他表现得比别人更蠢。因为在音乐方面太无把握，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所以他指挥华葛耐作品的时候，完全依照在巴哀埒脱注册过的艺术家和指挥的演奏法。他要把演出的场面与五颜六色的服装，照式照样的摹仿，迎合华葛耐小朝廷里的幼稚而低级的口味。他很像那种风魔弥盖朗琪罗的人，临画的时候把原作的霉点都要摹写下来，因为霉点沾在神圣的作品上，所以也是神圣的了。

克利斯朵夫对这两个人物原来不会怎么钦佩的。但他们是交际场中的人物，和蔼可亲，相当博学；而洛贝只要谈到音乐以外的问题也不无趣味。再加他是个糊涂虫，而克利斯朵夫就不讨厌糊涂虫：觉得他们不像明白人那么庸俗可厌。他还不知天下最可厌的莫过于说废话的人，也不知在大家误称为“怪物”的人身上，所谓特色比其余的人更少。因为这些“怪物”其实只是疯子，他们的思想已经退化到跟钟表的动作相仿。

葛林和洛贝为了笼络克利斯朵夫，对他非常敬重。葛林写了篇文章把他恭维了一阵；洛贝指挥他作品的时候完全听从他的吩咐。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为感动。不幸这些殷勤的效果给那般献殷勤的人的不聪明完全糟蹋了。他不可能因为人家佩服他而对他们发生幻象。他很苛求；别人佩服他的地方倘使跟他的真面目相反，他就不容许；凡是把他认识错了而做他朋友的，他差不多会认为仇敌。所以他极不满意葛林拿他当做华葛耐的信徒，在他的歌和华葛耐的《四部曲》中找共同点，——实际是除了一部分音阶相同以外根本渺不相关。而听到自己的作品给排在一个华葛耐学者的无聊的仿制品旁边，——两头又放着永远少不了的华葛耐的两件大作，他也并不愉快。

不用多少时候他就觉得在这个小党派里头透不过气来。这又是一个学院，跟那些老的学院一样窄，而且因为它在艺术上是个新生儿，所以气量更小。克利斯朵夫对于艺术形式或思想形式的绝对价值，开始怀疑了。至此为止，他以为伟大的思想到一处就有一处光明，而今他发觉思想尽管变迁，人还是一样；而且归根结蒂，主要还在于人：有怎么样的人，就有怎么样的思想。假如他们生来是庸俗的，奴性的，那末便是天才也会经由他们的灵魂而变得庸俗，奴性；而英雄扭断铁索时的解放的呼声，也等于替以后的几代签下了卖身契。——克利斯朵夫忍不住把这种意思说出来。他痛诋艺术上的拜物教，说什么偶像，什么古典的大师，都用不着；只有瞧不起华葛耐，敢把他踩在脚下，扬着脸前进，永远看着前面不看后面的人，敢让应该死的死而跟人生保持密切关系的人，才配叫做华葛耐思想的承继者。葛林的胡说乱道惹恼了克利斯朵夫。他挑出华葛耐作品里的错误或可笑的地方。华葛耐的信徒们免不了说这是他妒忌他们的上帝，而且是荒唐可笑的妒忌。至于克利斯朵夫，他相信那些在华葛耐死后拚命崇拜华葛耐的人，一定就是在他生前想把他扼杀的人：这可冤枉他们了。像葛林与洛贝一流的人，也有受着灵光照耀的时间；二十年前他们也站在前锋，然后像多数的人一样留在那儿不动

典出法国拉勃莱名著《邦太葛吕哀》：巴奴越受羊贩邓特诺诟辱，乃购其一羊驱之入海，群羊见之均起而效尤，纷纷投海，卒至羊贩邓特诺于抢救时亦溺死海中。今以巴奴越绵羊喻盲从之群众。

了。人的力量太薄弱了，上山只爬了第一段就不济事而停住了，唯有极少数的人才会有充分的气力继续趱奔。

克利斯朵夫的态度使那些新朋友很快的跟他疏远了。他们的好感是桩交易：要他们站在他一起，必须他站在他们一起；而克利斯朵夫显而易见连一点成见都不肯抛弃：他不愿意加入他们的一党。人家就对他冷淡了。他所不愿意送给大小神明的谀辞，人家也不愿意送给他。他的作品不像从前那样受到欢迎；有人还抗议他的名字在节目单上出现得太多。大家在背后嘲笑他，批评的话也多起来了，葛林和洛贝的不加阻止，似乎表示赞成他们的意见。可是会里的人还不想跟克利斯朵夫决裂：第一因为莱茵河畔的民族喜欢骑墙派的作风，喜欢用不了了之的办法使不上不下的局面尽拖下去；第二因为大家还希望克利斯朵夫就范，即使不能被说服，至少可能因疲劳而让步。

克利斯朵夫却不给他们有这种时间。他一发觉人家对他抱着反感而不愿意明白承认，还想自欺欺人的和他维持友好的关系，他就非要对方明白他是敌人不可。有一晚他在华葛耐友谊会中看出了大家的虚情假意，便直截了当的向洛贝表示退会。洛贝莫名其妙；曼海姆赶到克利斯朵夫家里想调停。克利斯朵夫才听了几个字就嚷起来：

“不，不，不，不！别跟我再提这些家伙。我不愿意再看见他们了……我受不了，受不了……我对他们讨厌死了，对他们连一个都不能看。”

曼海姆哈哈大笑。他这时忘了劝克利斯朵夫平平气，倒是想看热闹了：

“我知道他们要不得，”他说，“可也不是从今天起的：又出了什么新的事呢？”

“没有什么新的事。我就是受够了……好，你笑吧，笑我吧：没有问题，我是疯子。谨慎的人是照着理性行事的。我可不是这样，我是凭冲动的。我身上的电积得太多的时候，它就需要发泄，不惜牺牲；要是别人受到痛苦，就算他们倒楣！也算我倒楣！我生来不是过集团生活的。从今以后，我只管我自己了。”

“你总不成对谁都不理吧？”曼海姆说。“你不能赤手空拳演奏你的音乐。你需要男的女的歌唱家，需要一个乐队，一个指挥，需要听众，需要啦啦队……”

“不！不！不！”克利斯朵夫嚷着；听到最后一句他更跳起来：“啦啦队！你不害臊吗？”

“不是出钱收买的啦啦队，——虽然老实说，除此以外，要群众明白一件作品的价值还找不出第二个方法。——可总得有人捧场，有个组织严密的小团体；这是每个作家都有的：朋友的用处就在这等地方。”

“我不要朋友！”

“那末你得给人家嘘。”

“我愿意给人家嘘！”

这一下，曼海姆可乐死了：

“给人嘘这种福气你也保持不久的。将来人家会根本不奏你的作品。”

“不奏就不奏！你以为我非成个名人不可吗？……是的，我过去一个劲儿想达到这个目的……真是无聊！发疯！愚蠢！……仿佛满足了最庸俗的骄傲，就能补偿种种的牺牲：烦闷，痛苦，羞愧，耻辱，卑鄙无耻，讨价还价，所有这些拿去收买光荣的代价！假使我还打着这种算盘，我真是见了鬼了！这一套再也不来了！我不愿意再跟群众和宣传发生关系。宣传简直是无耻的

玩艺儿。我要关起门来，只为了自己而生活，为了我喜欢的人而生活……”

“对啦，”曼海姆用着讥讽的口气说。“可也得有个行业。你干么不学做鞋子呢？”

“哎！要是我像那个妙人萨克斯一样是个靴匠的话！我的生活才多快乐呢！平时是靴匠，星期日是音乐家，而且是个自得其乐的，在小圈子里跟两三个知己玩玩的音乐家！这才像一种生活！……牺牲了我的时间跟心血，让那些混蛋批评我，我不是发疯吗？有几个老实人喜欢你了解你，不是比教成千上万的傻子来听你，瞎说一阵，吹拍一阵好多吗？……什么骄傲，什么成名的欲望，这些魔鬼休想再抓住我了：这是你可以相信我的！”

“一定相信，”曼海姆说着，心里在想：“要不了一个钟点，他会说出完全相反的话的。”于是他若无其事的加上一个结论，说道：那末行啦，华葛耐友谊会的事就归我去料理了？”

克利斯朵夫不由得举起胳膊嚷起来：“我舌敝唇焦的跟你说了个钟头，竟是白费的吗？……我告诉你，我再不踏进那个会里去的了！我恨透了这些华葛耐会，所有的会，所有的羊圈，一定要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才能会齐了声音咩咩的叫。替我去告诉那些绵羊：我是一只狼，我有牙齿，我不是生来啃草根的！”

“好，好，我跟他们说去，”曼海姆一边走一边觉得这早晨过得挺有意思，心里想：“他是个疯子……疯得该锁起来了……”

他急急忙忙去告诉妹妹，她耸耸肩膀说：“疯吗？他要教人家这么想就是了！……其实他是愚蠢，并且骄傲得可笑……”

可是，克利斯朵夫在华特霍斯的杂志上继续发表他激烈的批评文章。并非他感到什么趣味：他觉得批评这一行很讨厌，差不多想丢掉了。但因为人家拚命要他住嘴，所以他有心固执，不肯露出让步的神气。

华特霍斯有点不放心了。只要拳头不落在自己身上，他永远会毫不动心的站在云端里看厮杀。但几星期以来，别的报纸似乎忘了他的不可侵犯的身分，对他作家的自尊心居然开始攻击了，而且刻薄得厉害；倘若华特霍斯精明一些的话，很可以看出那是朋友放的冷箭。的确，那些攻击是哀朗弗尔和高特林两人暗中唆使出来的：他们认为唯有这个办法才能使他阻止克利斯朵夫的笔战。而他们果然看准了。华特霍斯立刻公开的说克利斯朵夫使他厌烦，接着也不袒护他了。从此，杂志里的人就想尽方法要他住嘴。可是要他住嘴，等于想把口罩去套在一头正在咬东西的狗嘴上！人家对他说的话反而刺激他。他把他们叫做胆怯鬼，声明他是什么话都要说的，——凡是他有权利说的都要说。他们要撵走他，尽管把他撵走吧，那可以教城里人知道他们跟别人一样没种；要他自动离开可办不到。

他们听了面面相觑，狼狈不堪，抱怨曼海姆送了他们这样的一件礼物，一个疯子。老是嘻嘻哈哈的曼海姆，夸口说他自有办法制服克利斯朵夫；他打赌从下一期起，克利斯朵夫就会在酒里掺些清水。他们表示不信；但事实证明曼海姆并没夸口。克利斯朵夫的下一篇文章，虽谈不上怎么殷勤，可是对谁也没有不客气的话了，曼海姆的方法挺简单，说穿了，大家都奇怪怎么早没想到。克利斯朵夫从来不把他发表的东西再看一遍，看校样也极快极马虎。亚陶尔夫·梅屡次用婉转的口气责备他，认为有一个错字就是丢了杂志

萨克斯为十六世纪德国诗人，早年曾为鞋匠。

的脸。克利斯朵夫原来不把批评当作一种艺术，便回答说挨骂的人不会看不懂的。曼海姆就抓住机会说克利斯朵夫有理，校对是印刷所监工的事；他愿意代劳。克利斯朵夫感激得有点不好意思了。但大家一致告诉他，这种办法可以免得损失时间，倒是帮了杂志的忙。于是克利斯朵夫把校样交给曼海姆，请他仔细的改。曼海姆自然不肯马虎：那对他简直是种游戏。开场他只是很小心的改几个字，删掉一些令人不快的形容词。后来看到事情很顺利，他便胆子大起来，更进一步了：他把整个句子重新写过，改动意义，着实显出一点本领。这玩艺儿是在于大体上保持句子的轮廓，保持克利斯朵夫特有的笔调，同时把意义改得和克利斯朵夫的恰恰相反。曼海姆为了删改工作所花的心血，远过于他自己写一篇；他一辈子也没用过这样的苦功。但他看着结果很得意：一向被克利斯朵夫挖苦的某几个音乐家，看到他态度慢慢的缓和，终于恭维他们的时候，不禁大为诧异。杂志里的人都喜欢极了。曼海姆把他呕尽心血的杰作高声朗诵，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有时哀朗弗尔对曼海姆说：“小心点儿！你太过分了！”

“呕，没有危险的，”曼海姆回答。

于是他变本加厉的干下去。

克利斯朵夫什么都没觉察。他到社里来丢下原稿就不顾问了。有时他还把曼海姆拉到一边说：

“这一回，我对他们才不客气呢，这些下流东西！你念吧……”

曼海姆便拿来念了。

“嗯，你觉得怎么样？”“凶极了，朋友，简直不留余地！”

“你想他们会怎么说？”

“啊！一定是大叫大嚷罗！”

可是毫无动静。相反，在克利斯朵夫周围，人家的脸色反而好看起来；他痛恨的人居然在街上向他行礼。有一回，他拧着眉毛，叽里咕噜的跑到社里来，把一张名片往桌上一丢，问：“这算什么意思？”

这是最近被他痛骂了一顿的一个音乐家的名片，下面写着“感激不尽”几个字。

曼海姆笑着回答：“他是说的反话呀。”

克利斯朵夫马上松了口气：“嘿！我就怕我的文章使他高兴呢。”

“他气死了，”哀朗弗尔说，“可是他不愿意表示出来，想装得满不在乎的一笑置之。”

“一笑置之？……混蛋！”克利斯朵夫气愤愤的说。“让我再写一篇。要最后笑的人才笑得痛快呢！”

“不，不，”华特霍斯听了克利斯朵夫的话不大放心。“我不相信他是笑你。我看倒是屈服的表示，他是个真诚的基督徒；人家打了他左边的嘴巴，他就把右边的送上来。”

“那更妙了！”克利斯朵夫说。“嘿！胆怯鬼。既然他要，我就赏他一顿板子吧！”

华特霍斯还想插几句，可是别人都笑起来了。

“让他去罢……”曼海姆说。

“对，”华特霍斯忽然镇静了。“也不在乎多一篇少一篇！……”

克利斯朵夫走了。同事们手舞足蹈的狂笑了一阵。等到大家静了一些，华特霍斯对曼海姆说：“笑尽管笑，究竟差点儿闯祸……我求你还是小心些

吧。你要教我们倒楣了。”“呕，别急！”曼海姆回答。“日子还长呢……再说，我也替他放了好多交情。”

第二部 陷 落

正当克利斯朵夫改革德国艺术的经验到了这一阶段，城里来了个法国戏班子。说准确些，那是一群乌合之众，因为照例是不知从哪儿蒐罗得来的一般穷光蛋，和只要能做戏就不管人家剥削的青年演员。班首是一个有名的过时的女戏子。她这一回到德国来巡回表演，路过这小小的省城就做三天戏。

华特霍斯的一般同文为这件事轰得很热闹。曼海姆和他的朋友们对巴黎的文坛和社交界是熟很的，或自命为很熟的；他们把从巴黎报纸上看来的似解非解的谣言，逢人便说。他们在德国是法国派的代表。这就教克利斯朵夫不想再去多了解什么法国精神。曼海姆赞美巴黎的话使克利斯朵夫听腻了。他上巴黎去过几次；那儿也有他的一部分家族；——那是普及整个欧罗巴的，他们到一处都得到一处的国籍，得到一处的高官厚爵：在英国有个男爵，在比国有个参议员，在法国有个部长，在德国有个议员，另外还有一个教皇册封的伯爵。他们以犹太人而论彼此很团结，很重视共同的根源，同时也诚心诚意的做了英国人，比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教皇的臣属；他们的骄傲使他们认为自己所选择的国家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唯有曼海姆喜欢发怪论，有心把一切别的国家看得比他自己的更可爱。所以他常常很热烈的提到巴黎；但他称赞巴黎人的时候，总把他们形容做荒唐胡闹，大叫大嚷的疯子，一天到晚不是闹革命就是寻欢作乐，从来没有一本正经的时间。所以克利斯朵夫对于这个“拜占廷式的，颓废的，伏越山那一边的共和国”并不觉得可爱。他想象中的巴黎，仿佛最近出版的德国艺术丛中某一册卷首的插画：前景是巴黎圣母院的一个妖怪俯瞰着城中的屋顶，令人想到那个传说：

永恒的肉欲，有如永不厌足的吸血鬼，
在伟大的都市上面，看着嘴边的食物馋涎欲滴。

以纯粹的德国人性格，克利斯朵夫瞧不起那些放浪的法国人和他们的文学；关于法国，他只知道一些粗俗的滑稽作品，只看过《哀葛龙》与《没遮拦太太》，还有是咖啡店音乐会里的小调。小城市里趋奉时髦的习气，一般最无艺术趣味的人到戏院去争先定座的情形，使克利斯朵夫对那个走码头的女角儿格外表示冷淡与轻视。他声言决不劳驾去听她的戏。加以票价贵得惊人，他也花不起，所以更容易说到做到。

法国剧团带到德国来的戏码，除了两三出古典剧以外，大部分是无聊的，“专门用来出口的”巴黎货色：因为越是平庸的东西越是国际化。第一晚上演的《多斯加》是克利斯朵夫熟识的；他看过翻译本的演出，照例带点儿德国内地剧院所能加在法国作品上的轻松趣味。所以看着朋友们上戏院的时候，他冷冷的笑着说他用不着去再听一遍倒落得耳目清静。但第二天他仍不免伸着耳朵听他们热烈谈论昨晚的情形，而且因为自己没有去，不能驳他们的话，他又气极了。

预告的第二出戏是法译本的《哈姆雷德》。对于莎士比亚的戏，克利斯

巴黎圣母院屋顶四周，有许多中世纪的雕刻，表现妖魔鬼怪。

《哀葛龙》为法国洛斯的戏剧，于一九〇〇年在巴黎上演。《没遮拦太太》为法国萨杜与莫洛合作的戏剧，一八九三年在巴黎初演。剧中女主角说话毫无忌讳，故名为没遮拦太太。

《多斯加》为萨杜所作五幕剧，于一八八七年在巴黎上演，后普岂尼又以之谱成歌剧。

朵夫是一向不肯放过机会的。在他心目中，莎士比亚和贝多芬都是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生命的灵泉。而在他最近所经过的烦闷惶惑的时期内，《哈姆雷德》更显得可贵。虽然怕对这面神奇的镜子把自己的本相再照一遍，他还是有点动心，在戏院的广告四周转来转去，很想去定一个座。可是他那么固执，因为对朋友说过了那些话，不愿意食言。要不是回去的路上碰到了曼海姆，他那晚一定像第一天一样守在家里的。

曼海姆抓着他的胳膊，气愤愤的，可是照旧很俏皮的告诉他，有个老混蛋的亲戚，父亲的姊妹，不早不晚带着大队人马撞了来，使他们不得不在家里招待。他想往外溜；可是父亲不答应他在家族的礼数和对长辈的敬意方面开玩笑；而他这时候因为要刮一笔钱，不能不敷衍父亲，只有让步，不上戏院去。

“你们已经有了票子吗？”克利斯朵夫问。

“怎么没有！一个挺好的包厢；而且临了还得拿去，（我此刻就为这个出来的，）送给那该死的葛罗纳篷，爸爸的股东，让他带着妻子女儿去摆架子。这才有趣呢！……我非把他们挖苦一下不可。可是他们决不会放在心上，只要我送了他们票子，——虽然他们更希望这些戏票变成钞票。”

他突然停住，张着嘴瞪着克利斯朵夫：

“噢！……行了行了！……有办法了！……”他咽咽的叫了几声。

“克利斯朵夫，你看戏去吗？”

“不去。”

“哦，你去罢，帮我一次忙。你不能拒绝的。”

克利斯朵夫莫名其妙：“可是我没有位置啊。”

“位置在这儿！”曼海姆得意非凡的说着，把戏票塞在他手里。

“你疯了，你父亲吩咐你的事怎么办呢？”

曼海姆捧着肚子大笑：“他一定要大发雷霆了！……”

他抹了抹眼睛，说出他的结论：

“明儿一起床我就向他要钱，趁他还蒙在鼓里的时候。”

“既然知道他要不高兴，我就不能接受你的，”克利斯朵夫说。

“知道？你什么都不用知道，也什么都没知道，那跟你毫不相干。”

克利斯朵夫捻开票子：“我一个人拿了四个座儿的包厢怎么办？”

“随你怎么办。你可以睡在里头，可以跳舞，要是你高兴。还可以带些女人去。你总有几个吧？要不然向人家借也借得到。”

克利斯朵夫把戏票递还给曼海姆：“我不要，真的不要。你拿回去吧。”

“我才不拿回来呢，”曼海姆往后退了几步。“你要不耐烦去，我也不强迫；可是我决不收回。你把票子扔在火里也好，拿去送给葛罗纳篷也好，你这个道学先生！我管不了。再见吧！”

他说完就走，让克利斯朵夫抓着票子呆在街上。

克利斯朵夫真是为难了。他想照理应当把戏票送给葛罗纳篷去，可是没有这个劲。他三心两意的回家；等到想起看一看钟点，只有穿起衣服来上戏院的时间了。糟掉这张票子当然太傻。他劝母亲一块儿去，母亲却宁可睡觉。于是他出发了，像小孩子一样的高兴，可是一个人享受这样的乐趣总有点不舒服。对曼海姆的父亲和被他抢掉位置的葛罗纳篷，他倒不觉得过意不去，只对于可能和他分享的人抱歉；为一般像他一样的青年，那不是天大的乐事吗？他想了好久也想不出请谁一同去。而且时间已经很晚，得赶紧的了。

他进戏院的时候走过售票房，看见窗子关上，挂着客满的牌子。好些人都在懊丧的退出去，其中有一个姑娘还舍不得就走，带着艳羡的神气看着进去的人。她穿着黑衣服，非常朴素，个子不十分高大，一张瘦瘦的脸非常秀气；他没注意她长得好看不好看。他在她前面走过，停了一会，忽然转过身来，脱口而出的问：“小姐，你没买到票吗？”

她脸一红，回答说：“没有，先生。”她说话是外国口音。

“我有个包厢不知怎么办。可不可以请你一起去？”

她脸更红了，一边道谢一边表示不能接受。克利斯朵夫被她一拒绝，心里一慌，也跟着道歉，同时又继续邀请，可是说来说去她总不肯答应，虽然她心里很愿意。他急起来了，忽然下了决心说：“好吧，我有个办法。你把票子拿去。这出戏我早已看过，——（那是夸口。）——我不在乎，你一定比我更感兴趣，请你拿了罢，我完全是诚心的。”

那姑娘被他这种真诚的态度感动了，差点儿连眼泪都涌上来。她结结巴巴的道谢，表示决不愿意他作这样的牺牲。“那不是得了吗？咱们进去吧，”他笑着说。

他的神气那么善良，那么坦白，她觉得刚才就不应该拒绝。便不好意思的回答说：“那末多谢你了。”

他们进去了。曼海姆的包厢在戏院的中央，突出在外面，毫无隐蔽的。他们一进场就被大家注意了。克利斯朵夫请那少女坐在前面，自己坐得靠后面一点，免得她发窘。她正襟危坐，羞得连头也不敢转动一下，心中懊悔不该接受他的邀请。克利斯朵夫为了让她定一定神，同时也为了无话可说，假装望着别处。但他不论望到哪儿，都觉察为了自己带着一个陌生女子混在漂亮的包厢客人中，旁人都在大惊小怪，议论纷纷。他向大家瞪着眼睛，觉得他不去顾问别人而别人老是来顾问他，真是岂有此理。他没想到那种冒昧的好奇心尤其是针对他的同伴，而众人对她的目光也更露骨。为了表示不把旁人的思想议论放在心上，他便探着身子和她搭讪。可是他一开口，她更惊慌得厉害，觉得要回答他的话真是件苦事；她低着头，好容易才说出一个是或否。克利斯朵夫看她怕羞得可怜，也就缩在包厢的尽里头不理她了。幸而台上的戏也开场了。

克利斯朵夫没有看广告，也不关心那有名的女演员扮什么角色。他像那些天真的人一样，到戏院来是看戏而非看戏子的。他根本不去猜那名角儿是扮奥弗丽还是扮王后；并且即使他要猜，以两个剧中人的年龄来说，也一定以为她是扮王后，而万万想不到她会扮哈姆雷德的。一看到这个角色出现，一听见这个像玩具的娃娃似的机械的音色，他竟老半天的不敢相信……

“这是谁呢？是谁呢？”他轻轻的问着自己。“总不成是……”

等到他不得不承认那的确是哈姆雷德的时候，不由得开口骂了一句；那位女伴是外国人，没有懂，但左近的包厢里已经听到，马上气愤愤的把他喝住了。他便缩在包厢的尽里头，好称心如意的咒骂一顿。他气极了。要是他能公平一点，对于化装的漂亮，把一个六旬老妇变成青年男子，甚至还显得俊美（至少在一般捧角的人心里）的艺术上的“解数”，可能表示敬意。但她压根儿就讨厌“解数”，讨厌一切违反自然的现象。他喜欢女是女，男是男。（这种事现在就不大可能。）贝多芬的雷沃诺那种幼稚可笑的化装，他

已经觉得不舒服。女扮男装的哈姆雷德更荒谬绝伦了。把一个结实，肥胖，苍白，易怒，思想太多，见神见鬼的丹麦人变成一个女子，——连女子也算不上，因为女人扮的男人永远是个妖怪，——把哈姆雷德弄成一个太监，一个不雌不雄的家伙……那真要当时的人懦弱到极点，批评界无聊到极点，才会让他出台而不把他噓下去！女戏子的声音使克利斯朵夫怒不可遏。她那种歌唱式的，念一个字像敲一下锤子似的说白，平板单调的朗诵，似乎从香曼莱以来就被世界上最无诗歌感觉的民族奉为至宝。克利斯朵夫气得不知怎么办了，干脆背对着舞台，怒容满面，朝着包厢的板壁，好似一个孩子受着面壁的处罚。幸而他的同伴不敢向他望，要不然一定会把他当做疯子的。

克利斯朵夫脸上古怪的表情突然停止了。他一动不动，声息全无。一种优美的富有音乐味的声音，一个女性的沉着而温柔的音乐响亮起来。克利斯朵夫竖起耳朵，一边听着台上的话一边转过身子，好不诧异的想瞧瞧有这等天籁的究竟是何等人物。原来是奥弗丽。当然这奥弗丽跟莎士比亚的奥弗丽一点不相干。她是个美丽的姑娘，高大，壮健，身段窈窕，像希腊的雕刻一样，浑身上下都极有生气。虽然为了她的角色竭力压制自己，她仍旧有股青春与欢乐的力在皮肤里，举动里，和笑眯眯的深色的眼睛里闪耀。美丽的身体的魔力，居然使一刹那前对于哈姆雷德的表演那么愤懑的克利斯朵夫，不觉得这个人物跟他意想中的奥弗丽不符有什么遗憾；而且他满不在乎的把自己意想中的奥弗丽为这个台上的奥弗丽牺牲了。和热情冲动的人一样，他凭着无意的自欺欺人的心理，认为剧中人贞洁而骚乱的心头应当有这股青春的热情。而使他更着迷的，还有她那神奇的声音，纯粹，温暖，醇厚：每个字都像一个美丽的和弦；而在音母四周，更有那种轻快的南方口音，活泼松动的节奏，好比一阵茴香草与野薄荷的香味在空中缭绕。一个南欧的奥弗丽不是奇观吧？……她带来了金黄的太阳和法国南部的季候风。

克利斯朵夫忘了他的同伴，竟移到包厢前排，坐在她的身旁，眼睛直盯着那个不知名姓的女演员。可是一般并非来听一个无名女戏子的群众，完全不注意她；直要等女扮男装的哈姆雷德开口，他们才决心鼓掌。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为生气，低声骂着“蠢驴！”使十步以内的人都听见了。

到幕间休息的时候，克利斯朵夫才记起了他的同伴；看她始终那么羞怯，他一边笑一边想到她一定给他粗野的举动吓坏了。——不错：这年轻的姑娘，和他萍水相逢而相处几小时的少女，的确拘谨得近乎病态：刚才要不是在特别兴奋的情形之下，她决不会接受他的邀请。而她一接受就后悔，恨不得找个机会溜掉。更糟的是她成了众目睽睽的目标，而同伴在背后——（她连转过头去望一望都不敢）——低声咒骂，咕噜不已，越发使她慌张得厉害。她以为他什么都会做出来的；他一坐到前面来，她简直吓得身子都凉了：知道他还有什么古怪的行动呢？她真想钻下地去。她不知不觉退后了一些，生怕碰到他的身子。可是在休息时间听到他和善的说话，她又放了心。“我是个挺不愉快的同伴，是不是？请你原谅。”她望着他，看见他挺和气的笑着，就像刚才才使她决意接受邀请的时候的笑容。

他接着又说：“我不能隐藏我的思想……可是那也太不成话了！……这个女人，活了那么一把年纪的女人！……”他脸上又做了个厌恶的表情。

节使然，与此处演哈姆雷德而女扮男装完全不同。

香曼莱为十七世纪法国女演员，以演拉西纳的悲剧见称于史。

她微微一笑，轻轻的回答：“说是这么说，究竟是很美的。”他注意到他的外国口音，就问：“你是外国人吗？”“是的。”

“是教员吗？”他一边看着她朴素的衣服一边又问。“是的。”她红着脸回答。

“请问是哪一国的人？”

“法国人。”

他做了个惊讶的姿势：“法国人？真想不到。”

“为什么？”她胆怯的问。

“你这样的……严肃！”

（她以为这句话在他嘴里不完全是恭维。）

“法国像我这样的也有的是，”她说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他瞧着她那张小小的忠厚的脸，鼓起的脑门，笔直的小鼻子，四周簇拥着栗色头发的瘦瘦的腮帮。可是他视而不见，心里只想着那美丽的女演员，再三说：

“怪了，你是法国人！……真的吗？你跟那个奥弗丽是一个国家的？简直教人不能相信。”

他静默了一会又说：“她多美啊！”

他这么说着，完全没觉得这个话仿佛把奥弗丽跟这个女伴作了个不大客气的比较；她明明感觉到了，可并不怪克利斯朵夫，她自己也认为奥弗丽美极了。他想从她那儿打听一些关于那个女戏子的消息，她却一点不知道；显而易见她对剧坛的情形很隔膜。

“听到台上说法国话，你一定很愉快吧？”他问。

这句话他是随口说的，不料正说到了她的心里。

“啊！”她那种流露真情的口吻使他很注意，“我真高兴。在这儿我闷死了。”

这一回他可对对她仔细瞧了瞧：她的手微微拘挛着，好似感到压迫的样子。但她立刻想起这种话可能得罪他：“噢！对不起，”她说，“我不知道说些什么。”

他老老实实的笑了：“得了吧，不用客套！你说得很对。在这儿，不一定要法国人才堵得慌，嘿！”

他耸起肩膀呼了口气。

可是她觉得说出了心里的话很难为情，从此不作声了。同时她也注意到，隔壁几个包厢里有人在偷听他们的谈话：他也发觉了，大为愤怒。他们俩就这样打断了话。休息的时间还没完，他便走到戏院的回廊里去溜溜。少女的话还清清楚楚在他耳朵里，他可心不在焉，脑子里全是奥弗丽的形象。在以后的几幕中，她更把他完全抓住了；等到奥弗丽发疯的一场，唱着那一段爱与死的凄凉的歌，她的声音那么动人，使克利斯朵夫惊心动魄，快要放声大哭了。他恨自己这样软弱，——（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家是不应该哭的，）——又不愿意让人家看到，便突然从包厢里走出去。回廊里，大厅上，都没有人。他心慌意乱的走下楼梯，不知不觉出了大门。他需要呼吸一下晚上凉爽的空气，在黑洞洞的荒凉的街上迈开大步走一会。他走到运河边上，把肘子靠着栏杆，望着静静的水，看街灯的倒影在那里摇晃。他的心情也跟这个一样：含糊，激动；除了一大片欢乐在表面上飘荡，什么都看不见。报告时刻

的大钟响了，他不可能再回到戏院去看戏剧的结束。去看福丁勃拉的胜利？他没有这兴致。谁会羡慕这个胜利的人？看饱了人生的可笑与残酷，谁还愿意当他这个角色呢？整个作品是对人生的可怕的控诉。可是剧中的生命力多么强烈，以至连悲伤也成为欢乐，惨痛也令人陶醉了……

克利斯朵夫回到家里，把那个被他丢在包厢内而连姓名也没知道的少女完全忘了。

第二天早上，他到一家三等旅馆去访问女演员。剧团的经理把她和其余的伙伴安顿在这儿，那个名角儿住的却是城里的第一家旅馆。克利斯朵夫被带进一间杂乱的小客厅，打开着的钢琴上放着残余的早餐，还有些夹头发的针和又脏又破烂的乐谱。奥弗丽在隔壁屋子直着嗓子唱，像个只想弄些声音闹哄一下的孩子。人家去通报的时候，她停了一下，问话的声音挺高兴，也不管客人会不会听到：

“他找我有什么事，那位先生？他叫什么名字？……克利斯朵夫……姓什么？……克拉夫脱！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多怪的姓！”

她重复了两三遍，念到 R 的时候拚命的卷舌头。

“不像个姓，倒像个赌咒的字……”接着她真的赌了一个咒。

“他是个年轻人还是个老头儿？……讨人喜欢吗？……——行，我就来。”

于是她又唱起来：

再没有比我的爱情更甜蜜的了……

同时他在房里搜索，咒骂那支躲在乱东西里找不到的贝壳别针。她不耐烦了，吼了几声，表示火气很大。克利斯朵夫虽然看不见，也能想象出她隔壁的举动，不由得笑了。终于他听到脚步声走近，奥弗丽气势汹汹的打开了门，出现了。

她还没完全穿好衣服，只裹着件浴衣，宽大的袖子里露出一对赤裸的手臂，头也没梳，一卷卷的头发掉在眼睛和腮帮上。美丽的深色眼睛，嘴巴，面颊，下巴上那个可爱的酒窝，一古脑儿都堆满着笑意。她用着沉着而歌唱般的声音，对自己的衣著略微表示一下歉意。她明知道用不着道歉，客人只会欢迎她这副打扮。她以为他是来访问的新闻记者。但听到他说是专诚为她，为钦慕她而来的，她非但没有失望，反觉得十分高兴。她心地很好，很殷勤，最得意的是能够讨人喜欢，也不把这一点瞒人。克利斯朵夫的访问和热心使她快乐极了，——她还没给人宠坏呢。她的动作，态度，都那么自然，连她小小的虚荣心，和因为能讨人喜欢而表示的高兴，也是自然的，所以他一点不发窘。两人立刻像老朋友一样。他说几句不成文法的法文，她说几句不成文法的德文；要不了一小时，两人把所有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她完全没有送客的意思。这个壮健快活的南方女子，又聪明，又活泼，在那些无聊可厌的伙伴中间，在这个不通语言的地方上，要不是天生的性情快乐，早就闷死了；现在有个人谈谈，当然喜出望外。至于克利斯朵夫，跟本地一般狭窄虚假的小市民混腻了，遇到这个无拘无束的，很有平民气息的南方女子，也觉得说不出的痛快。他还不知道这一类的性格也有做作的地方，跟德国人不同的是他们除了外面所表现的那些，心里就没有别的，甚至连面上所表现的那些也没有。可是她至少是年轻的，活泼泼的，想什么说什么，直截了当；她

福丁勃拉为挪威亲王，因哈姆雷德及丹麦王等先后惨死而获登王位。

对一切都要批评，用着新鲜的眼光，毫无顾虑；她身上的气息就像那种扫除云雾的南方的季候风。她很有天分，没有教育，也不会思索，对一切美的好的东西随时随地都能感觉到，并且真的非常感动；但过了一会又哈哈大笑。不用说，她喜欢搔首弄姿，喜欢做媚眼，在敞开了一半的梳妆衣下面露出她的胸脯，很想教克利斯朵夫着迷：但这纯粹是出于本能。她毫无心计，更喜欢说说笑笑，跟人家随随便便的，一来就熟，没有拘束也没有客套。她和他讲着戏班子里的内幕，她的苦闷，同事之间无聊的猜忌，奚撒贝——（她这样的称呼那个名角儿）——的耍手段，不让她出头。他和她说出对德国人的不满，她听了拍手附和。她心很好，不愿意说谁的坏话，可是不能因之而不说；她一边取笑别人，一边埋怨自己缺德，而说话之间又显出南方人特有的那种观察力，滑稽而中肯：她压制不了自己，形容一个人的时候说话非常刻薄。她乐死了，嘻开着苍白的嘴唇，露出一副小狗般的牙齿；脸上的血色给脂粉遮掉了，只有围着黑圈的眼睛在那里发亮。

他们忽然发觉已经谈了一小时。克利斯朵夫向高丽纳——（这是她在戏班里的名字）——提议下午再来，带她到城里去溜溜。她听了快活极了；两人约定吃过中饭就见面。

时间一到，他就来了。高丽纳坐在旅馆的小客厅里，捧着一个本子高声念着。她用笑眯眯的眼睛招呼他，只管念下去，念完了一句，才做手势要他坐在大沙发上，挨着她：

“这儿坐吧。别说话。我得把台词温一遍。一刻钟就完了。”

她用指尖点着脚本，念得又快又草率，像个性急慌忙的小姑娘。他提议替她背一遍。她就把脚本递给他，站起来背了。她不是吞吞吐吐，就是把一句的结尾念上三四遍才能想到下一句。她脑袋摇摇摆摆，把头发针都掉在地下。碰到一个固执的字不肯回到记忆中来，她便像野孩子一样的暴躁起来，说出古里古怪的赌咒的话，甚至很粗野的字眼，——其中有一个很粗野很短的，是她用来骂自己的。克利斯朵夫看她那么有才气又那么孩子气，觉得很奇怪。她把声音的抑扬顿挫调动得很准确，很动人；可是她聚精会神的念到一段，半中间竟不知所云的胡诌起来。她的背功课活像一头小鸚鵡，完全不问其中的意义，那时就变成可笑的胡言乱语了。她可一点不着急：一发觉就捧腹大笑。最后，她喊了一声“算啦！”便从他手里抢过脚本往屋角一扔，说：

“放学了！时间到了！……咱们走吧！”

他可替她的台词有些担心，问：“你想你这样行了吗？”

“当然罗，”她肯定的回答。“并且还有那提示的人，要他干么的？”

她到房里去戴帽子。克利斯朵夫因为等着她，便坐在钢琴前面按了几个和弦。她听了在隔壁屋里喊起来：“噢！这是什么？你再弹呀！那多好听！”

她跑来了，随手把帽子往头上一套。他弹完了，她要他再弹，嘴里还来一阵娇声娇气的赞叹；那是法国女子的习惯，不管是为了《德利斯当》或是为了一杯巧克力。克利斯朵夫笑了：这对他的确换了一种口味，和德国人张大其辞的派头完全不同。其实是一样的夸张，不过是两个极端罢了：一个是把一件小骨董说得山样大，一个是把一座山说得小骨董样小：还不是一样可笑！可是他那时觉得后面的一种比较可爱，因为是从他心爱的嘴里说出来的。高丽纳问他弹的是谁的作品；一知道是他的大作，她又叫了起来。他早上已经告诉过她，他是个作曲家，但她根本没注意。她挨着他坐下，硬要他把全

部作品弹一遍。散步的事给忘了。这不但表示她有礼，而且因为她极喜欢音乐，她靠着奇妙的本能补足了教育的缺陷。他先还不拿她当真，只弹些最浅的曲子。但他无意中奏了一段自己比较看重的作品而她居然更喜欢，虽然他并没告诉她什么，他就又惊又喜了。一般德国人遇到懂音乐的法国人，都会表示一种天真的诧异，克利斯朵夫就是这样：

“怪了！想不到你鉴赏力很高！……”

高丽纳冷笑了一声。

这样以后，他弹着越来越难懂的作品，想瞧瞧她究竟懂到什么程度。可是大胆的音乐似乎并没有把她搅糊涂；而在一阕因为从来没有被德国人了解，连克利斯朵夫自己也开始怀疑的，特别新颖的曲调之后，高丽纳竟要求他再来一遍，而且还站起身子背出调子来，几乎一点没错；那时克利斯朵夫的诧异更是可想而知了。他转过身来对着她，非常感动的握着她的手，嚷道：“噢！你倒是个音乐家！”

她笑了，说她早先在一个外省的歌剧院中唱过，但有个剧团经理在跑码头的时候碰到她，认为她有演韵文剧的才具，劝她改了行。

“多可惜！”他说。

“为什么？诗也是一种音乐啊。”

她要他把歌的意义给解释了；他又用德文把歌词念给她听，她马上跟着学，像猴子一样容易，连他抿嘴唇挤眼睛的动作都学上了。后来她背着唱的时候可错误百出，闹了很多笑话，背不出的地方就随口造些古怪的声音填上去，把两人都笑死了。她毫不腻烦的要他尽弹，他也毫不腻烦的听着她美丽的声音；她还不懂歌唱这一行的诀窍，像小姑娘一样尖着喉咙，但自有一种说不出的清脆动人的味道。她说话爽直，想什么说什么。虽然她没法解释为什么她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但她的判断骨子里的确有个理由。奇怪的是，逢到那些最规矩的，在德国最受赏识的作品，她反而最不惬意，只为了礼貌而恭维几句，但人家明明看出她不感兴趣。因为她没有音乐素养，所以不会像那些鉴赏家与艺术家一样，对“耳熟”的东西不知不觉的感到愉快，也不会在一件新的作品中去爱好在前人的作品中爱好过的形式或公式。同时他并不像德国人那么喜欢优美悦耳的感伤情调，（至少她的感伤情调是另外一种，而克利斯朵夫还没发觉这一种感伤的缺点）；在德国最受欢迎的靡靡之音，她不会对之出神；她完全不赏识克利斯朵夫作的一个最平庸的歌，——而那正是克利斯朵夫恨不得毁掉的，因为朋友们觉得好容易才有个机会捧他，老跟他提到这件作品。高丽纳天生能把握一切戏剧情绪，她喜欢的作品是要能清清楚楚表现出某一种热情，而且表现得很率直的，这也正是他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可是有些和声的生辣，克利斯朵夫觉得挺自然，她对之并无好感：那给她一个非常突兀的感觉，使她唱不下去；她停下来问：“难道真是这样的吗？”他回答说是的，她就想法勉强唱下去，但终于扮了个鬼脸，被克利斯朵夫看在眼里。往往她宁可跳过那一节，他却在琴上再弹一遍，问：“你不喜欢这个吗？”

她皱皱眉头说：“我觉得它不自然。”

“怎么不自然？”他笑着说。“你想想它的意思吧。在这儿听起来难道会不真吗？”他指了指心窝。

“也许对那儿是真的……可是这儿觉得不自然，”她扯了扯自己的耳朵。从极轻忽然吊到极响的德国派朗诵，她也觉得刺耳：

“干么他要这样大叫呢？又没有别人在场，难道怕邻居听不见吗？他真有点儿这种神气……（对不起！你不会生气吧？）……他好像远远的招呼一条船。”

他并不生气，倒是真心的笑了，认为这种见解不无是处。她的议论使他听了好玩；从来还没人和他讲过这一套呢。结果他们都同意：用歌唱表现的朗诵最容易把很自然的说话变得不成调子，像一条越来越大的虫。高丽纳要求克利斯朵夫替她写一样戏剧音乐，用乐队来为她的说白作伴奏，偶然穿插几段歌唱。他听了这个主意很兴奋；虽然场面的安排极不容易，但他觉得为了高丽纳的嗓子值得一试；于是他们想着许多将来的计划。

等到他们想出门，已经快五点了。在那个季节里，天很早就黑的。散步是不可能了。晚上高丽纳还要参加排戏，那是谁也不准参观的，所以她约他明天下午来带她出去，完成今天的计划。

第二天差点儿又跟上一天一样。他发见高丽纳骑在一张高凳上，吊着腿，照着镜子，正在试一副假头发。旁边有服侍她上装的女仆和理发匠，她嘱咐理发匠要把一卷头发给弄得高一些。她一边照着镜子，一边望着站在背后微笑的克利斯朵夫，吐吐舌头。理发匠拿着假头发走了，她便挺高兴的转过身来说：“你好，朋友！”

她把腮帮迎上去让他亲吻。他不防她有这种亲热的表示，可也不肯错过机会。其实她并不把这举动看得怎么了不起，仅仅当做招呼的一种方式罢了。

“噢！我真快活！”她说，“今晚上可行了，行了。——（她说的是假头发。）——我真急死了！要是你早上来，就可以看到我可怜得什么似的。”

他追问什么缘故。原来巴黎的理发匠包装的时候搅错了，替她放了一副跟她的角色完全不配的假头发。

“完全是平的，笔直的往下挂着，难看死了。我一看就哭了，哭得昏天黑地。可不是吗，台齐莱太太？”

“我进来的时候，”那女仆接着说，“太太把我吓坏了。太太脸色白得像死人一样。”

克利斯朵夫笑了，高丽纳在镜子里看到了，愤愤的说：“你好笑吗，没心肝的！”可是她也跟着笑了。

她问他昨晚排戏的情形怎么样。——据说一切都很好。但她很希望人家把别的演员的台词多删掉一些，可别删掉她的……两人谈得那么有劲，把一个下午又虚耗了一半。她慢条斯理的穿着衣服，征求克利斯朵夫对她装束的意见。克利斯朵夫称赞她漂亮，天真的用他不三不四的法文说从来没见过比她更“淫乱”的人，——她先是愕然瞪着他，然后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我说了什么啊？”他问。“不该这么说的吗？”

“不错！不错！”她简直笑弯了腰。“你说得正对。”

终于出门了。她的花花绿绿的服装和咕咕呱呱的说话，引起了大家的注目。她看一切都用着俏皮的法国女子的眼光，完全不想隐藏自己的感想。看到时装店陈列的衣衫，卖画片的铺子里乱七八糟的样品，有的是谈情说爱的镜头，有的是滑稽或肉麻的照片，有的是当地的妓女，有的是皇族，有穿红衣服的皇帝，穿绿衣服的皇帝，还有穿水手装的皇帝，把着日耳曼号的船舵向天睥睨的神气：她简直为之笑倒了。对着饰有华葛耐那副生气模样的头像

的餐具，或是理发店橱窗里的蜡人头，她又高声狂笑。便是在表现忠君爱国的纪念像前面，对着穿着旅行外套，头戴尖盔的老皇，前呼后拥的还有普鲁士，德意志各邦的代表，和全身裸露的战神：她也毫无体统的嘻嘻哈哈。路上碰到什么人，只要面貌，走路的架式，说话的腔调，有什么可笑的地方，都被她作为当场打趣的资料。被她挖苦的人看她狡猾的眼光就明白了。她猴子般的本能会使她不假思索的，用嘴唇鼻子学他们或是缩做一团或是大张嘴脸的怪样子。她鼓起腮帮，摹仿随便听来的一句话，因为她觉得那声音挺滑稽。他很高兴的跟着她笑，绝对不因为她放肆而发窘，他自己也不比她安分。幸而他的名誉已经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了；否则光是这一次的散步就能使他声名扫地。

他们去参观大教堂。高丽纳虽然穿着高跟鞋和长袍子，还是要爬上塔顶，衣摆在踏级上拖着，在扶梯的一只角上给勾住了；她可不慌不忙，痛快把衣服一扯，撕破了，然后毫无顾忌的把衣裾提得老高，继续往上爬。她差点儿把大钟都要敲起来。到了塔顶，她大声念着雨果的诗句，——克利斯朵夫一个字都不懂，——又唱着一支通俗的法国歌。随后，她学着回教祭司的模样高叫了几声。——天快黑了。他们回到教堂里，浓厚的黑影正沿着高大的墙壁上升，正面的花玻璃像神幻的瞳子一般闪闪发光。克利斯朵夫瞥见那天陪他看《哈姆雷德》的少女跪在侧面的一个小祭堂里。她一心一意的在那儿祷告，没看见他，但她痛苦而紧张的脸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很想和她说几句话，至少跟她打个招呼；但他被高丽纳拉着往前直奔。

他们不久就分手了。她得准备上台；根据德国的习惯，戏院是很早开场的。但他才回家，就有人打铃，送来一张高丽纳的便条：

好运气！奚撒贝病了！停演一天！万岁啊万岁！……朋友！你来吧！咱们一起吃晚饭！——别忘了多带些乐谱来！……

高丽纳

他一时看不懂。等到弄明白了，他和高丽纳一样快活，马上到旅馆去了。他担心吃饭的时候要碰到整个戏班子的人，不料一个都没看见。甚至高丽纳也失踪了。最后他听见屋子尽里头有她很响很高兴的声音；他跟着去找，终于在厨房里找到了。她忽发奇想的要做一盘别出心裁的菜，放着大注香料，使满街满巷都闻到的南方菜。她和旅馆里的胖子老板娘混得好极了，两人咕咕呱呱说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又有德文，又有法文，又有野人话，简直不知道是什么话。她们互相尝着她们的出品，哈哈大笑。克利斯朵夫的出现使她们闹哄得更厉害了。她们不许他进去，他偏要进去，也尝到了那盘名菜，扯了个鬼脸：于是她说他是个德国蛮子，真犯不上为他费心。

他们一起回到小客厅，饭桌已经摆好：只有他和高丽纳两个人的刀叉。他不由得问戏班子里的同伴在哪儿。

“不知道，”高丽纳做了个满不在乎的手势。

“你们不一起吃饭吗？”

“没那回事！在戏院里碰见已经够受了！……还得一块儿吃饭吗？……”

这一点和德国习惯大不相同，他听了又好奇又羡慕。“我以为你们是个很会交际的民族呢！”

“那末，”她回答说，“难道我不会交际吗？”

“交际的意思是过集团生活。我们这儿是要大家混在一起的！男的，女的，小的，从出生到老死，都是团体的一分子。什么事都得跟大家伙儿一起做：跟大家一起吃饭，一起歌唱，一起思想。大家打嚏，你也跟着打嚏；要不是跟大家一块儿，我们连一杯啤酒都不喝的。”

“那可好玩喽，”她说。“干么不在一只杯子里喝呢？”“你不觉得这表示友爱吗？”

“滚它的蛋，友爱！我跟我喜欢的人才友爱，决不跟所有的人友爱……吓！这还像什么社会，简直是个蚂蚁窝！”“像我这样跟你一样思想的人，在这儿过的有趣日子，你可知道了吧？”

“那末上我们那儿去呀！”

那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他问她关于巴黎和法国人的情形。她告诉了他许多事情，可并不完全准确。除了南方人喜欢吹牛的习气，她还本能的想教听的人入迷。据她说，在巴黎谁都是自由的；并且巴黎人个个聪明，所以大家都运用自由而不滥用自由；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爱信什么就信什么，爱什么就爱什么，不爱什么就不爱什么：决没有人多句话。那儿，决没人干预旁人的信仰，刺探旁人的心事，或是管人家的思想。那儿，搞政治的决不越出范围来干涉文学艺术，决不把勋章，职位，金钱，去应酬他们的朋友或顾客。那儿，决没有什么社团来操纵人家的声名和成功，决没有受人收买的新闻记者，文人也不相轻，也不互相标榜。那儿，批评界决不压制无名的天才，决不一味捧成名的作家。那儿，成功不能成为不择手段的理由，一帆风顺也不一定就能博得群众的拥戴。人情风俗都那么温厚，那么亲切，那么诚恳。人与人间没有一点儿不痛快。从来没有毁谤人家的事。大家只知道互相帮助。新来的客人，不管是谁，只要真有价值，可以十拿九稳的受到人家欢迎，摆在他面前的尽是康庄大道。这些不计利害的，豪侠大度的法国人心中，全是纯粹的爱美的情绪。他们唯一的可笑是他们的理想主义，为了这个，他们虽然头脑清楚，仍免不了上别的民族的当。

克利斯朵夫听着，连嘴都合不拢来了；那真教人听得出神呢。高丽纳自己也听得飘飘然；至于昨天向克利斯朵夫说她过去的的生活如何艰苦等等，她完全忘了，而他也一样的记不起。

可是高丽纳并非单单要教德国人喜欢她的国家；她同样关心的是要人家喜欢她本人。倘使一个晚上没有一些调情打趣的玩艺儿，她会觉得沉闷而可笑的。她免不了逗弄克利斯朵夫，可是白费；他简直没觉得。克利斯朵夫压根儿不懂什么叫做调情。他只知道爱或不爱。他不爱的时候无论怎么也想不到爱情方面去。他对高丽纳的感情只是热烈的友谊，他从来没领教过这种南方女子的性格；她的魔力，风度，快活的心情，敏捷的理解力，开旷的胸襟，他都体会到；这些已经大大的超过了爱情所需要的条件；可是“爱情之来是不可捉摸的”，这一回它偏不来；至于没有爱情而玩爱情的游戏，他连想也没想到过。

高丽纳看着他一本正经觉得好玩。他在钢琴上弹着他带来的音乐，她挨在他身旁，把裸露的手臂绕着克利斯朵夫的脖子，并且为了看乐谱，她身子往前探着，几乎把脸靠着他的脸。他觉得她的睫毛掠在他的脸上，看见她眼梢里带着俏皮的意味，也看到那张可爱的脸撇着嘴唇笑着，等着。——她的确等着。克利斯朵夫可不懂这暗示，只觉得高丽纳使他弹琴不方便，他不知

不觉挣脱了身子，把坐椅挪动了一下。过了一会，他回过头去想跟高丽纳说话，发觉她拚命想笑，她的酒涡已经在笑了，可还抿着嘴忍着。

“你怎么啦？”他很奇怪的问。

她望了他一下，禁不住哈哈大笑。

他完全莫名其妙：“你笑什么？难道我说了什么古怪的话吗？”

他越钉着问，她越笑。快歇住了，一看他那副发呆的神气，她又大笑起来。她站起身子，跑去倒在屋子那一头的大沙发上，把脸埋在靠枕里，让自己笑个痛快，她全身都跟着抽动。他也被她引得笑起来，走过去拍着她的背。等到她称心如意的笑够了，才抬起头来，抹着眼泪，对他伸着手：

“哎啊！你多老实！”她说。

“不见得比别人更坏吧？”

她抓着他的手还在格格的笑：“法国女人不正经是不是？”

（她学着他古怪的法文读音。）

“你这是嘲笑我啊。”他也兴致挺好的回答。

她温柔的望着他，用力摇着他的手，问：“咱们是朋友吗？”

“当然！”他照样摇着她的手。

“高丽纳走了，你会想起她吗？你不恨她吗，这个不正经的法国女人？”

“德国蛮子这么傻，你也不恨他吗？”

“就为他傻才喜欢他呢……你会上巴黎去看我吗？”

“一定的……你会跟我通信吗？”

“我可以赌咒……你也得赌咒。”

“行，我就赌咒。”

“不是这样的。得伸出手来。”

她学着古代罗马人发誓的模样。她要他答应写一个剧本，一出通俗的歌剧，将来译成法文，让她在巴黎上演。下一天她就得跟着剧团走了。他约定后天上法兰克福去看她，剧团要在那边公演。他们又谈了些时候。她送给克利斯朵夫一张照片，上半身差不多是裸体的。两人高高兴兴的分手了，像兄妹似的拥抱了一番。自从高丽纳看出克利斯朵夫很喜欢她而不是爱她以后，她也真的喜欢他，不动爱情而把他当做好朋友。

他们都睡得很好，谁也不做乱梦。第二天他早上有预奏会，不能送她。可是第三天他把事情安排妥当，上法兰克福赴约去了。那只是两三个钟点火车的路程。高丽纳并不以为他真能说到做到；他可把约会看得很认真，剧院开场的时候已经到在那里了。他在休息时间上化装室去找她，她一看见就又惊又喜的叫起来，扑上他的脖子。他来赴约使她非常感激。克利斯朵夫觉得不痛快的是，法兰克福很多聪明而有钱的犹太人，能够赏识她眼前的美貌，料到她将来的走红，都争着来恭维她。时时刻刻有人上化装室来，全是些眼睛挺有神而面团团的家伙，用着生硬的口音说些无聊的奉承话。高丽纳当然搔首弄姿的跟他们卖俏；以后跟克利斯朵夫说话也不由得拿腔作调，带着逗弄的口吻，使他大不高兴。她毫无顾忌的在他面前化装，他可一点不感兴趣；眼看她把胳膊、胸脯、脸搽脂抹粉，他只觉得讨厌。他想等戏完了马上就走，不再来找她。他向她告别，抱歉的说不能参加终场以后人家请她的宵夜餐，她就非常真诚的表示难过，使他的决心动摇了。她叫人把火车表拿来，证明他能够有，应当有时间多陪她一会。他当然很乐意接受她的劝告，便参加了宵夜餐；他对于人们的胡闹跟高丽纳对随便什么混蛋都敷衍的手段，居然也

不过分显出心中的厌恶。对她是没法记恨的。那么纯朴的姑娘，没有什么道德观念，懒洋洋的，肉欲很强，喜欢玩儿，像孩子一样撒娇，同时又那么正直，那么善良，连她所有的缺点也是自然的，健康的，只能教人发笑，甚至还会喜欢。她说话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坐在她对面，望着她生动的脸，精神奕奕的美丽的眼睛，有点儿臃肿的下巴，像意大利人那样的笑容，和善，细腻，可是缺少清秀和灵气：他这一下才把她仔细看清楚了。有些地方使他想起阿达：举动，目光，带点粗俗的卖弄风情的手段；女人总脱不了女人的性格！但他喜欢的是那种南方人的心情，慷慨豪爽，尽量施展她天赋的优点，绝对不装出交际场中的漂亮和书本式的聪明，完全保存着她的和谐。她的身心好像生来就是为在阳光中舒展的。——他走的时候，她特意站起来和他到一边去道别。两人又拥抱了一下，把通信和再见的话重复了几遍。

他搭最后一班火车回去。在一个中间站上，对面开来的火车已经先等在那儿。克利斯朵夫在对方列车的三等车里，——正对着他的车厢，——看见那个陪他看《哈姆雷德》的法国少女。她也看到了克利斯朵夫，认得是他。两人都楞了一楞，不声不响行了个礼，一齐低下头去，连动都不敢动。可是他一眼之间已经看见她戴着一顶旅行便帽，身边放着一口旧提箱。他没想到她离开德国，以为是出门几天。他不知道应不应当和她说话，迟疑了一会，心里盘算着和她说些什么，正当他要去放下车窗招呼她的时候，忽然听到开车的讯号，就放弃了说话的念头。列车开动之前又过了几秒钟。他们俩面对面望着。彼此的车厢里都没有别人，他们把脸贴在车窗上：透过周围沉沉的黑夜，四只眼睛碰在一起。双重的车窗隔着他们。要是伸出胳膊，还可以碰到呢。咫尺，天涯。车子开动了。她始终望着他，在这个分离的一刹那，她不觉得胆小了。两人望得出了神，连最后一次点点头都没想到。她慢慢的远去了，不见了；他眼看她的列车在黑夜里消失。像两个流浪的星球似的，他们俩走近了一下，又在无垠的太空中分开了，也许是永久的分开了。

等到看不见她了，他才感到自己心里给那道陌生的目光挖了一个窟窿；他不明白为什么，可是明明有个窟窿。半阖着眼皮，朦朦胧胧的靠在车厢的一角，他觉得自己眼睛里深深的印着那一对眼睛的影子；别思想都静了下来，让他仔细体会那个感觉。高丽纳的形象在心房外面转动，好比一只飞虫扑着窗子；但他不让她进来。

等他下了车，呼吸着夜晚凉爽的空气，在万籁无声的街上走动之下，精神一振，又看到了高丽纳的影子。他回想到那个可爱的女戏子，自个儿微笑着，又高兴又气恼，因为一忽儿想到她亲热的举动，一忽儿想到她粗俗的调情。

他怕惊醒睡在隔壁屋子里的母亲，不声不响的脱着衣服，一边轻轻的笑着脸道：

“这些古怪的法国人！”

可是那天晚上在包厢里听到的一句话又回到他的记忆里：

“像我这样的也有的是。”

他第一次跟法国接触就看到了它双重的性格。但像所有德国人一样，他根本不想去解答这个谜。回想到车厢里那个少女，他只随便对自己说了句：

“她不像一个法国人。”

仿佛怎么样才能算法国人倒要一个德国人来决定似的。像法国人也罢，不像法国人也罢，总而言之他想着她；因为他半夜惊醒过来，心里一阵难过；

原来他记起了放在少女身边的箱子，忽然明白那姑娘是一去不回的了。其实他早该想到而竟没想到。这一下他却隐隐约约有点儿伤感。但他在床上耸了耸肩想道：“那跟我有什么相干？想它干什么！”于是他又睡着了。可是第二天他出门第一个就碰到曼海姆，叫他勃罗希，问他可有意思去征服整个法兰西。他从这个有脚告示嘴里，知道包厢的事闹大了，出乎曼海姆的意料之外：

“你真是个大人物，”曼海姆嚷着说，“我甘拜下风了！”“我又没做什么，”克利斯朵夫回答。

“你真了不起！老实说，我嫉妒你。一手抢掉了葛罗纳篷的包厢，还清了他们的法国女教师去代替他们，嘿嘿！那太妙了，我就没这个本领！”

“她是葛罗纳篷家的女教师吗？”

“对，你尽管装不知道，只做是无心的，我也劝你这么办！……爸爸简直不肯罢休。葛罗纳篷一家都气死了！……可是事情很快就有了解决，他们把那姑娘撵走了。”

“怎么！”克利斯朵夫叫起来，“他们把她歇了！……为了我把她歇了？”

“你没知道吗？她没跟你说吗？”

克利斯朵夫表示很难受。

“好家伙，别烦恼了，”曼海姆说，“那也没关系。而且你早该想到的，只要葛罗纳篷他们一发觉……”

“什么？发觉什么？”克利斯朵夫嚷着。

“发觉她是你的情妇罗！”

“可是我连认识都不认识她，连她是谁也不知道。”

曼海姆微微一笑，意思是说：“你把我当作傻子了。”

克利斯朵夫气恼之下，一定要曼海姆相信他的话。曼海姆便道：“那就更怪了。”

克利斯朵夫骚动起来，说去找葛罗纳篷，把事实告诉他们，替少女洗刷明白，曼海姆劝他不必：“朋友，你越跟他们解释，他们越不信。何况也太晚了。现在那女孩子已经不知在哪儿了。”

克利斯朵夫难过到极点，竭力想寻访女孩子的踪迹，想写信向她道歉。可是谁也不知道她的事。他上葛罗纳篷家去问，碰了个钉子；他们不知道她上哪儿去的，并且也不关心这种事。克利斯朵夫一心想着自己害了人，悔恨不已。除了悔恨，还有那双眼睛的神秘的魔力，像一道光似的悄悄的照着他的心。岁月的洪流，新的念头，似乎把那魅力与悔恨一齐淹没了，盖掉了；可是它们暗中老在他心底里。克利斯朵夫始终忘不了他所谓他的牺牲者。他发誓要把她找到。明知道机会很少，他却有把握能够和她再见。

至于高丽纳，她从来没复他的信。过了三个月，他不再存什么希望了，忽然收到她一通四十字长的电报，用着怪高兴的语调给他许多亲密的称呼，问“大家是否还相爱”。后来，杳无音讯的差不多隔了一年，又接到一封短信，像小孩子似的把字写得挺大挺潦草，装着贵妇人的口吻，一共只有寥寥几句，都是亲热而古怪的话。以后，又没消息了。她并没忘了他；只是没功夫想到他。

目前，高丽纳的印象还很新鲜，两人交换的计划老在心中盘旋，克利斯朵夫便打算写一阕戏剧音乐给高丽纳去演，其中夹几段她可以唱的调子，一

勃罗希（1742—1819）为德国将军，曾数次带领普鲁士军队进攻法国。

—大概是一种诗歌杂剧的形式。这一门艺术从前在德国极受欢迎，莫扎尔德曾经热烈称赏；贝多芬，韦勃，孟特尔仲，舒芒，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有制作；但从华葛耐派的艺术得势，以为替戏剧与音乐找到了一个确切不移的公式之后，诗歌体杂剧就衰落了。华葛耐派的学究，不单排斥一切新的杂剧，还要把以前的杂剧彻底清除：他们费尽心血把歌剧中所有语体对白的痕迹删掉，替莫扎尔德，贝多芬，韦勃等补上他们自出心裁的吟咏体；他们很虔诚的把垃圾堆在杰作上面，自以为把大师们的思想给补足了。

高丽纳的批评使克利斯朵夫对于华葛耐派的朗诵体格外觉得笨重，甚至难听；他考虑到在戏剧中把说白与歌唱放在一处，用吟咏体把它们合在一起，是不是无聊，是不是违反自然：因为那好比把一匹马和一只鸟拴在同一辆车上。说白与歌唱各有各的节奏。一个艺术家为了他所偏爱的一种艺术而牺牲另一种，那是可以了解的。但要在两者之间求妥协，就非两败俱伤不可：结果是说白不成其为说白，歌唱不成其为歌唱。歌唱的壮阔的波澜，势必受狭窄单调的河岸限制；而说白的美丽的裸露的四肢，也要包上一层浓艳厚重的布帛，把手势与脚步都给束缚了。为什么不让它们俩自由活动呢？就像一个美丽的女子，沿着一条小溪轻快的走着，幻想着，给潺潺的水声催眠着，步履的节奏不知不觉与溪水的歌声相应。这样，音乐与诗歌都自由了，可以并肩前进，把彼此的幻梦融和在一起。当然不是任何音乐任何诗歌都能这样结合的。一般粗制滥造的尝试和恶俗不堪的演员，往往使反对杂剧的人振振有辞。克利斯朵夫也久已跟他们一样存着厌恶之心：演员们依着乐器的伴奏念那些语体的吟诵的时候，并不顾到伴奏，并不想把他们的声音与伴奏融合为一，只想教人听到他们的声音：这种荒谬的情形确使一切有音乐感觉的耳朵受不了。可是从他听到了高丽纳和谐的声音，听到了她流水似的，纯净的声音，像一道阳光照在水里那样在音乐中动荡，和每句旋律的轮廓化成一片，成为一种更自由更流畅的歌声，他仿佛看到了一种新艺术的美。

他或许看得很对；但这一类的艺术倘使要真有价值，可以说是所有的体裁中最难的，像克利斯朵夫那样没有经验的人去贸然尝试，决计免不了危险。尤其因为这种艺术有一个主要条件：就是诗人，艺术家，演员，三方面的努力必须非常调和。克利斯朵夫完全不理睬这些，就冒冒失失的去尝试只有他一个人感觉到它的法则的新艺术。

最初他想采取莎士比亚的一出神幻剧 或《浮士德》后部中的一幕来配制音乐。但戏院方面并无意作这种尝试，认为费用既不贲，而且是荒唐的试验。大家承认克利斯朵夫对音乐是内行，但看到他胆敢对戏剧也有所主张，就觉得好笑而不把他当真了。音乐与诗歌，好似两个漠不相关而暗中互相仇视的世界。要踏进诗歌的领域，克利斯朵夫必须和一个诗人合作；而这诗人是不容许他选择的，连他自己也不敢选择：因为他不敢信任自己的文学趣味。人家说他完全不懂诗歌，事实上他对于周围的人所赞赏的诗歌，的确完全不懂。

杂剧 (Mélodrame) 有两种：一是通俗戏剧，以惊心动魄的紧张场面为主，属杂悲剧与喜剧的成分，间亦用音乐作穿插。另一称为音乐部分极占重要的戏剧，但与歌剧不同，歌唱与说白兼而有之，而说白又有音乐伴奏。历史上著名的例子有贝多芬的《哀格蒙》，孟特尔仲的《仲夏夜之梦》，皮才的《阿莱齐安娜》等。

神幻剧 (féerie) 是音乐部分极占重要的一种戏剧，形式上与杂剧相似，但神幻剧内容多以希腊神话或著名诗歌为题材，不似杂剧之比较通俗。

凭着他那种老实与固执的脾气，他费了不少苦心去领略这一首诗或那一首诗的妙处，始终没有成功，他不胜惶愧，承认自己没有诗人的素质。其实他很爱好某几个过去的诗人；这一点使他还有点安慰。但他爱好那些诗人的方式大概是不对的。他发表过奇特的见解，说唯有把诗译成了散文，甚至译成了外国文的散文而仍不失其为伟大的诗人才算伟大，又说文辞的价值全靠它所表现的心灵。朋友们听了都嘲笑他。曼海姆把他当做俗物。他也不敢辩白。只要听文人谈论音乐，就可知道一个艺术家一旦批评他外行的艺术就要闹笑话。这种例子他天天有得看到，所以他决意承认（虽然心里还有点怀疑），自己对诗歌真是外行，而对那些他信为更在行的人的见解，闭着眼睛接受了。杂志里的朋友们给他介绍了一个颓废派诗人，史丹芬·洪·埃尔摩德，说他写了出别出心裁的《依斐日尼》。当时的德国诗人和他们的法国同行一样，正忙着把古希腊的悲剧改头换面。埃尔摩德的作品就是半希腊半德国式的那一种，把易卜生，荷马，甚至王尔德的气息混在一起，当然也没忘了查看一下考古学。他所写的阿迦玛农是个神经衰弱病者，阿希尔是个懦弱无用的人：他们互相怨叹自己的处境；而这种怨叹当然也无济于事。全剧的重心都在依斐日尼一个人身上：她又是一个神经质的，歇斯底里的，迂腐的依斐日尼，教训着那些英雄，狂叫怒吼，对着大众宣说尼采派的厌世主义，结果是醉心于死而在狂笑中自刎了。

这部狂妄的作品，完全代表一个穿着希腊装束的没落的野蛮民族，与克利斯朵夫的精神根本是不相容的。但周围的人都异口同声的说是杰作。他变得懦弱了，也信了他们的话。其实他脑子里装满了音乐。念念不忘的是音乐而非剧本。剧本只等于一个河床，给他用来宣泄热情的巨流的。真正为诗歌配制音乐的作家必需懂得退让，放弃自己的个性，克利斯朵夫可绝对办不到。他只想到自己，没想到什么诗歌；而他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自以为了解诗人的作品：殊不知他所了解的根本不是原作的意义。像小时候一样，他脑子里编了一个脚本，跟摆在眼前的那个毫不相干。

等到排演的时候，他可发见了作品的真面目。有一天他听着其中的一幕觉得荒谬之极，以为是演员们把它改了样；他不但当着诗人向演员解释剧本，还对那个替演员们辩护的诗人解释。作者不服气了，怪不高兴的说他总该明白自己所要表白的东西吧。克利斯朵夫一口咬定埃尔摩德完全不了解剧本。众人听了哄堂大笑，克利斯朵夫才觉得自己闹了笑话。他住了嘴，承认那些诗句究竟不是自己写的。于是他看出了剧本的荒谬，大为丧气；他不懂怎么早先会误解的。他骂自己糊涂，扯着自己的头发。他想聊以自慰，暗暗的说：“好吧，我根本没懂。别管剧本，只管我的音乐吧！”——可是剧中人的举动，姿势，说话的无聊，装腔作势的激昂，不必要的叫喊，使他受不了，甚至在指挥乐队的时候连棍子都举不起来，恨不得去躲在提示人的洞里。他太坦白，太不懂世故了，没法掩藏自己的感想，使朋友，演员，剧作者，每个人都感觉得清清楚楚。

“是不是你不喜欢这个作品？”埃尔摩德冷笑着问。

据希腊神话，依斐日尼为米赛纳斯王阿迦玛农之女。希腊人欲在奥利港口航海，为逆风所阻。卜者加尔加斯谓当以依斐日尼祭献与阿德密斯神，方能挽回风向。阿迦玛农乃遣于里斯往迎其女，伪称欲以嫁与米米同斯王阿希尔。及依斐日尼至，将行祭礼时，神示忽称可以牝鹿代供牺牲。此项情节自古希腊以来，剧作者多采作题材。

克利斯朵夫鼓着勇气回答：“说老实话，我不喜欢。我不懂。”

“那末你写音乐以前，没把剧本念过一遍吗？”

“念过的，”克利斯朵夫天真的说，“可是我误会了，把作品了解错了。”

“可惜你没有把你所了解的自己写下来。”

“唉！我要能自己写才好呢！”克利斯朵夫说。

诗人气恼之下，为了报复，也批评他的音乐了。他埋怨它繁重，使人听不到诗句。

诗人固然不了解音乐家，音乐家也固然不了解诗人，演员们却是对他们俩都不了解，而且也不想了解。他们只在唱辞中找些零星的句子来卖弄自己的特长。他们绝对不想把朗诵去适应作品的情调和节奏：他们和音乐分道扬镳，各自为政，仿佛他们永远没把音唱准似的。克利斯朵夫气得咬牙切齿，拚命把一个一个的音符念给他们听：可是他叫他的，他们唱他们的，根本不懂他的意思。

要不是为了已经排演到相当程度，怕取消了会引起诉讼，克利斯朵夫早就放弃这个戏了。曼海姆听到他灰心的话，满不在乎的说：

“怎么啦？事情很顺当啊。你们彼此不了解吗？呕！那有什么关系？除了作家本人，谁又懂得一件作品？作家自己能懂，已经算了不起了！”

克利斯朵夫为了诗的荒谬非常担心，说是会连累他的音乐的。曼海姆当然知道那些诗不近人情，埃尔摩德也是个无聊家伙；可是他觉得无所谓：埃尔摩德请客的时候饭菜挺好，又有一个美丽的太太：批评界对他还能要求什么呢？——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说他没有功夫听这种轻薄话。

“哪里是轻薄话！”曼海姆笑着说。“他们都是些老实人！完全不知道人生中什么是重要的。”

他劝克利斯朵夫别为埃尔摩德的事那么操心，得想到自己的事。他鼓励他做些宣传工作。克利斯朵夫不胜愤慨的拒绝了。一个新闻记者来问到他的身世，他憋着气回答：“跟你有什么相干！”

又有人代表一个杂志来向他讨照相，他直跳起来，说谢谢老天，他没有做德皇，用不着把照片摆在街上给路人瞧。要他跟当地最有势力的沙龙有所联络简直不可能。他不接受人家的邀请；便是不得不接受了，临时又忘了去，或是心绪恶劣的去，好像存心跟大家呕气。

而最糟的是，上演的前两天，他和杂志方面的人也闹翻了。

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曼海姆继续篡改克利斯朵夫的文字，把批评的段落毫无顾忌的整行整行的删掉，写上恭维的话。

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在某个沙龙里遇见一个演奏家，——一个被他痛骂过的小白脸式的钢琴家，嘻开着雪白的牙齿向他道谢。他厉声回答说用不着谢。那钢琴家依旧絮絮叨叨的表示感激。克利斯朵夫直截了当的打断了他的话，说要是他满意他的批评，那是他的事，可是写的人决不是想使他满意的；说罢他转过身不理了。演奏家以为他好人歹脾气，便笑着走开了。克利斯朵夫可记起不久以前收到另一个被他痛骂的人的谢启，突然起了疑心，便出去到报亭里买了份最近期的杂志，找出他那篇的文字读了一遍……当时他竟以为自己疯了。过了一会，他恍然大悟，便气得什么似的奔到社里去。

华特雷斯与曼海姆正在那儿跟一个相熟的女演员谈天。他们用不着问克利斯朵夫的来意。他把杂志往桌上一摔，连喘口气都等不及，就气势汹汹的对他们破口大骂，又是叫又是嚷，说他们是坏蛋，是无赖，是骗子，抓着一

张椅子使劲往地板上乱捣。曼海姆还想嘻嘻哈哈：克利斯朵夫要飞起脚来踢他的屁股。曼海姆逃在桌子后面捧腹大笑。华特霍斯可是对他一脸瞧不起的样子，拿出尊严沉着的气派，竭力在喧闹声中表示不答应人家对他用这种口气，教克利斯朵夫等他的消息；一边把名片递给他。克利斯朵夫拿来扔在他脸上，叫道：

“摆什么臭架子！……用不着你的名片，我早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了……你是个流氓，骗子！……你想我会跟你决斗吗？……哼，你只配给人家揍一顿！……”

他的声音直闹到街上，连走路人都停下来听。曼海姆赶紧关起窗子。那女客吓坏了，想溜，可是克利斯朵夫把房门堵住了。华特霍斯脸色发了青，连气都透不过来：曼海姆涎皮赖脸地笑着，两人嘟嘟囔囔的想跟他争。克利斯朵夫可绝对不让他们开口，把所能想象到的最不中听的话对他们说尽了，直到无可再骂，连气都塞住了才走掉。而华特霍斯和曼海姆等他走了才能说出话来。曼海姆马上又活泼了：他挨了骂不过像鸭子淋了阵雨。可是华特霍斯愤怒到极点，他尊严受了伤害；而且当着别人受辱，他尤其不能原谅。同事们也跟着附和他。社里所有的同人中唯有曼海姆不恨克利斯朵夫：他拿他耍弄够了，觉得听几句粗话不能算划不来。那是怪有趣的玩艺儿，假使这种事临到他，他自己就会先笑的。所以他准备跟克利斯朵夫照常来往，好像根本没那回事。克利斯朵夫可记在心上，不管对方怎样来迁就他，始终拒绝。曼海姆也无所谓：克利斯朵夫是个玩具，已经给他称心如意的玩够了；他又在进攻另一个傀儡了。从此他们断绝了关系。但曼海姆在人家提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依旧说他们是好朋友。也许他的确这样想。

吵架以后两天，《依斐日尼》公演了。结果是完全失败。华特霍斯的杂志把剧本恭维了一阵，对音乐只字不提。别的刊物可快活极了。大家哄笑，喝倒彩。戏演了三场就停了，众人的笑骂可并不跟着停止：能有个机会说克利斯朵夫坏话真是太高兴了；连续好几个星期，《依斐日尼》成为挖苦的资料。大家知道克利斯朵夫再没自卫的武器，就尽量利用机会，唯一的顾忌是他在宫廷里的地位。虽然他跟那位屡次责备他而他置之不理的大公爵很冷淡，他仍不时在爵府里走动，所以群众认为他还得到官方的支持，——有名无实的支持。——而他还要把这最后一个靠山亲自毁掉。

他受了批评。它不但针对他的作品，还牵涉他那个新的艺术形式，那是人家不愿意了解的，可是要把它歪曲而使它显得可笑倒很容易。对于这种恶意的批评，最好是置之不理，继续创作：但克利斯朵夫还没有这点儿聪明。几个月以来，他养成了坏习惯，对一切不公平的攻击都要还手。他写了一篇把敌人们丑诋一顿的文章，送给两家正统派的报馆，都被退回了，虽然退稿的话说得很婉转，仍带着讥讽的意味，克利斯朵夫固执起来，非想法登出来不可。他忽然记起城里有一份社会党的报纸曾经想拉拢他。他认识其中的一位编辑，有时和他讨论过问题的。克利斯朵夫很高兴能找到一个人，敢毫无忌讳的谈到当局，军队，和一切压迫人的古老的偏见。可是谈话的题目也至此为止，因为那社会主义者说来说去脱不了马克思，而克利斯朵夫对他就没有兴趣。他觉得那个思想自由的人物，除了一套他不大喜欢的唯物主义以外，还有刻板的教条，思想方面的专制，暗中崇拜武力，简直是另一极端的军国

西俗：两人吵架时一边把名片递给对方是表示愿意决斗。

主义；总之他的论调和克利斯朵夫在德国每天听到的并没多大分别。

虽然如此，他被所有的编辑封锁之后，他所想到的还是这位朋友和他的报纸。他很知道他的举动会骇人听闻：那份报纸素来很激烈，专门骂人，大家都认为要不得的；但克利斯朵夫从来不看它的内容，所以只想到那些大胆的思想（那是他不怕的），而没想到它所用的卑鄙的口吻（那是他看了也要厌恶的）。并且别的报纸暗中联合起来打击他，使他恨无可泄，所以即使他知道报纸的内容，也不见得会顾虑。他要教人知道要摆脱他没这么容易。——于是他把那篇文章送到社会党报纸的编辑部，大受欢迎。第二天，文章就给登出来了，编者还加上一段按语，大吹大擂的说他们已经约定天才青年，素来对劳工阶级的斗争极表同情的克拉夫脱同志长期执笔。

克利斯朵夫既没看到自己的文章，也没看到编者的按语；那天是星期日，天没亮他就出发往乡下散步去了。他兴致很好，看着太阳出来，又笑又叫，手舞足蹈。什么杂志，什么批评，一古脑儿丢开了！这是春天，大自然的音乐，一切音乐中最美的音乐，又奏起来了。黑洞洞的，闷人的，气味难闻的音乐厅，可厌的同伴，无聊的演奏家，都给忘得干干净净！只听见喁喁细语的森林唱出奇妙的歌声；令人陶醉的生气冲破了地壳，在田野中激荡。

他给太阳晒得迷迷糊糊的回家，母亲递给他一封信，是他不在的时候爵府里派人送来的；信上用的是公事式的口气，通知克拉夫脱先生当天上午就得到府里去一次。上午早已过了，时间快到一点，克利斯朵夫可并不着急。

“今儿太晚了，”他说，“明儿去吧。”

可是母亲觉得不妥：“不行，亲王找你去，你得马上去，或许有什么要紧事儿。”

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要紧事儿？那些人会跟你谈什么要紧事儿吗？……还不是说他那一套关于音乐的见解，教人受罪！……只希望他别跟西格弗烈特·曼伊哀比本领，也写一曲什么颂歌！那我可不客气喽。我要对他说：你干你的政治吧！你在政治方面是主人，永远不会错的，可是艺术，替我免了吧！谈到艺术，你的头盔，你的羽饰，你的制服，你的头衔，你的祖宗，统没有啦；……我的天！试问你没有了这些，你还剩什么？”

把什么话都会当真的鲁意莎举着手臂喊起来：

“怎么能说这个话！……你疯了！你疯了！……”

他看母亲信以为真，更故意跟她玩儿，尽量唬吓她。鲁意莎直到他越来越荒唐了才明白他在逗她，便转过背去说：“你太胡闹了，孩子！”

他笑着拥抱她。他兴致好极了：散步的时候有个美丽的调子在胸中蹦呀跳的，好似水里的鱼儿。他肚子饿得很，必要饱餐一顿才肯上爵府去。饭后，母亲监督着他换衣服；因为他又跟她淘气，说穿着旧衣衫和沾满了灰土的鞋子，也没有什么不体面。但临了他仍旧换了一套衣服，把鞋子上油，嘴里噙着哨子打着唢呐，学做各式各样的乐器。穿扮完了，母亲给检查了一遍，郑重其事的替他把领带重新打过。他竟例外的很有耐性；因为他对自己很满意，——而这也不是常有的事。他走了，说要去拐走阿台拉伊特公主。那是大公爵的女儿，长得相当美，嫁给德国的一个小亲王，此刻正回到母家来住几个星期。克利斯朵夫小时候，她对他很好；而他也特别喜欢她。鲁意莎说他爱着她，他为了好玩也装做这个样子。

他并不急于赶到爵府，一路瞧瞧铺子，看到一条像他一样闲荡的狗横躺着，在太阳底下打呵欠，就停下来把它摩一会。他跳过爵府广场外面的铁栏——里头是一大块四方形的空地，四面围着屋子，空地上两座喷水池有气无力的在那儿喷水；两个对称的没有树荫的花坛，中间横着一条铺着沙子的小路，像脑门上的一条皱纹，路旁摆着种在木盆里的橘树；场子中央放着一座不知哪一个公爵的塑像，穿着路易·腓列伯式的服装，座子的四角供着象征德性的雕像。场中只有一个闲人坐在椅子上拿着报纸打盹。府邸的铁栏前面，等于虚设的岗位上空无一人。徒有其名的壕沟后面，两尊懒洋洋的大炮似乎对着懒洋洋的城市打呵欠。克利斯朵夫看着这些扯了个鬼脸。

他走进府第，态度并不严肃，至多是嘴里停止了哼唱，心却照旧快活得直跳。他把帽子往衣帽间的桌上一扔，毫不拘礼的招呼他从小认识的老门房。——当年克利斯朵夫跟着祖父晚上第一次到府里来看哈斯莱，他已经在这儿当差了：——老头儿对于他嘻嘻哈哈的说笑一向不以为忤，这一回却是神色傲慢。克利斯朵夫没注意。更往里走，他在穿堂里又碰到一个秘书处的职员，平素对他怪亲热，话挺多的，这回竟急急忙忙的走过了，避免和他搭讪，克利斯朵夫看了很奇怪。可是他并不拿这些小节放在心上，只管往前走，要求通报。

他进去的时候，里头刚吃过中饭。亲王在一间客厅里，背靠着壁炉架，抽着烟和客人谈天；克利斯朵夫瞥见那位公主也在客人中间抽着烟卷，懒洋洋的仰在一张靠椅中，和四周的几个军官高声说着话。宾主都很兴奋；克利斯朵夫进门就听到大公爵一片粗豪的笑声。可是亲王一看见克利斯朵夫，笑声马上停止。他咕噜了一声，直扑过来嚷道：

“嘿！你来啦！你终于赏光到这儿来啦！你还想把我要弄下去吗？你是个坏东西，先生！”

克利斯朵夫被这当头一棒打昏了，呆了好一会说不上话来。他只想着他的迟到，那也不至于受这样的羞辱啊，他便结结巴巴的说：“亲王，请问是怎么回事？”

亲王不理他，只顾发脾气：“住嘴！我决不让一个坏蛋来侮辱我。”

克利斯朵夫脸色发了白，喉咙抽搐着发不出声音；他挣扎了一下，嚷道：

“亲王，您既没告诉我是什么事，也就没权利侮辱我。”

大公爵转身对着他的秘书，秘书马上从袋里掏出一份报纸。他生那么大的气，不光是因为性子暴躁，过度的酒也有相当作用。他直跳到克利斯朵夫面前，像斗牛士拿着红布一般，抖开那张打皱的报纸拚命挥舞，怒不可遏的叫着：

“瞧你的脏东西，先生！……你就配人家把你的鼻子揷在里面！”

克利斯朵夫认出那是社会党的报纸；“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说。

“怎么！怎么！你那样的无耻！……这份混帐的报纸！那般流氓天天侮辱我，说着最下流的话骂我！……”

“爵爷，我没看过这个报。”

“你扯谎！”

“我不愿意您说我扯谎，”克利斯朵夫说。“我没看过这个报，我只关心音乐。并且，我自自有爱在哪儿发表文章就在哪儿发表的权利。”

“你什么权利也没有，唯一的权利是不开口。过去我待你太好了。我给

了你跟你的家属多少好处，照你们父子两个的行为，我早该跟你们断绝了。我不准你再在跟我捣乱的报上发表文字。并且将来不经我的许可，也不准你再写什么文字。你为音乐掀起的笔墨官司，我也看够了。凡是有见识有心肝的人，真正的德国人所看重的东西，我不准一个受我保护的人去加以攻击。你还是作些高明一点的曲子吧，要是作不出，那末练习练习你的音阶也好。我不要音乐界里来一个社会党，搅些诋毁民族的光荣，摇动人心的玩艺儿。谢谢上帝！我们知道什么是好东西，用不着你来告诉我们。所以，还是弹你的琴去吧，先生，别跟我们捣乱！”

肥胖的公爵正对着克利斯朵夫，把恶狠狠的眼睛直瞪着他。克利斯朵夫脸色发了青，想说话，扯了扯嘴唇，嘟囔着说：

“我不是您的奴隶，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他气都塞住了，羞愤交迸，快要哭出来；两条腿在那里发抖。他动了动胳膊，把旁边家具上的一件东西撞倒了。他觉得自己非常可笑，也的确听见有人笑着；他模模糊糊的看到公主在客厅那一头和几个客人交头接耳，带着可怜他和讥讽他的意味。从这时起，他就失了知觉，不知道经过些什么情形。大公爵嚷着。克利斯朵夫嚷得更凶，可不知道自己说些什么。秘书和另一个职员走过来要他住嘴，被他推开了；他一边说话一边无意中抓着桌上的烟灰碟子乱舞。他听见秘书喊着：

“喂，放下来，放下来！……”

他又听见自己说着没头没脑的话，把烟灰碟子往桌边上乱捣。

“滚出去！”公爵愤怒之极，大叫起来。“滚！滚！替我滚！”那些军官走过来想劝公爵。他好像脑充血似的突着眼睛，嚷着要人家把这个无赖赶出去。克利斯朵夫心头火起，差点儿伸出拳头去打公爵的脸；可是一大堆矛盾的心理把他压住了：羞愧，忿怒，没有完全消灭的胆怯，日耳曼民族效忠君王的性格，传统的敬畏，在亲王面前素来卑恭的习惯，都在他心头乱糟糟的混在一起。他想说话而不能说话，想动作而不能动作；他看不见了，听不见了，让人家把他推了出来。

他在仆役中间走过。他们声色不动的站在门外，把吵架的情形都听了去。走出穿堂的二三十步路，他仿佛走了一辈子。回廊越走越长，似乎走不完的了！……从玻璃门里望见的外边的阳光，对他像救星一样……他踉踉跄跄的走下楼梯，忘了自己光着脑袋，直到老门房叫他才回去拿了帽子。他拿出全身的精力才能走出府第，穿过院子，回到家里。路上他把牙齿咬得格格响。一进家里的大门，他的神气跟哆嗦就把母亲吓坏了。他推开了她，也不回答她的问话，走进卧房，关了门倒在床上。他抖得那么厉害，竟没法脱衣服，气也透不过来，四肢也瘫痪了。……啊！但愿不再看见，不再感觉，不必再支撑这个可怜的躯壳，不必再跟可羞可鄙的人生挣扎，没有气没有思想的倒下去，不要再活，脱离世界！……——他费了好大的劲才脱下衣服，乱七八糟的摔在地下，人躺在床上，把眼睛蒙住了。屋子里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他的小铁床在地砖上格格的响。

鲁意莎贴在门上听着，敲着门，轻轻的他：没有回音。她等着，听着房里寂静无声好不揪心，然后她走开了。白天她来了一两次，晚上睡觉之前又来了一次。一天过去了，一夜过去了：屋子里始终没有一点声音。克利斯朵夫忽冷忽热，浑身哆嗦，哭了好几回；半夜里他抬起身子对墙壁晃晃拳头。清早两点左右，发疯似的一阵冲动使他爬下了床，半裸着湿透的身子，想去

杀死大公爵。恨与羞把他折磨着，身心受着火一般的煎熬。可是这场内心的暴风雨在外面一点都不表现出来：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声音。他咬紧牙齿，把一切都压在肚里。

第二天他照常下楼：精神上受了重伤，一声不出，母亲也一句不敢动问。她已经从邻居那边知道了原委。整天他坐在椅子上烤火，跟哑巴一样，浑身发烧，驼着背像老头儿。母亲不在的时候，他就悄悄的哭。

傍晚，社会党报纸的编辑来找他。自然，他已经知道了那件事而来打听细节。克利斯朵夫很感激，天真的以为那是对他表示同情，是人家为了连累他而来向他道歉。他要挣面子，对过去的事一点不表后悔，不觉把心上的话全说了出来：跟一个像自己一样恨压迫的人痛痛快快地谈一谈，他觉得松了口气。那编辑逗他说话，心里想即使克利斯朵夫不愿亲自动笔，至少可以供给材料，让他拿去写篇骇人听闻的文章。他预料这位宫廷音乐家受了羞辱，一定会把他高明的笔战功夫，和他所知道的宫廷秘史（那是更有价值的），贡献给社会党。他认为用不到过分的含蓄，便老老实实把这番意思对克利斯朵夫说了。克利斯朵夫跳起来，声明他一个字都不能写：由他去攻击大公爵，人家会看做他报私仇；过去他发表自己的思想是冒着危险的，现在他一无束缚之后，反而需要谨慎了。那编辑完全不了解这些顾虑，认为克利斯朵夫没出息，骨子里还是个吃公事饭的，他尤其以为克利斯朵夫是胆小。

“那末，”他说，“让我们来：由我动笔。你什么都不用管。”

克利斯朵夫求他不要写，但他没法强制他不写。而且对方告诉他这件事不单和他个人有关，连报纸也受到侮辱，他们有权利报复的。这一下克利斯朵夫无话可说了，他充其量只能要求别滥用他的某些心腹话，那是拿他当作朋友而非当作新闻记者说的。对方一口答应下来。克利斯朵夫仍旧不大放心：他这时候才明白自己的莽撞，可是已经太晚了。——客人一走，他回想起说过的话不禁害了怕，立刻写信给编辑，要求他无论如何不能和盘托出；——可怜他在信里把那些话又重复了一部分。

第二天，他急不及待的打开报纸，在第一版上就看到了他全部的故事。他上一天所说的一切，经过新闻记者那种添枝接叶的手段，当然是夸大得不成样子了。那篇文章用着卑鄙而激烈的语调把大公爵和宫廷骂得淋漓尽致。某些细节明明只有克利斯朵夫知道，很可以令人疑心通篇是他的手笔。

这一个新的打击可是中了克利斯朵夫的要害。他一边念一边直淌冷汗，念完之后简直吓昏了。他想跑到报馆去；但母亲怕他闯祸，——而这也不无理由，——把他拦住了。他自己也怕；觉得要是去了，说不定又会闹出什么傻事来；于是他待在家里，——做了另外一件傻事。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痛责记者的行为，否认那篇文章里的事实，表示跟他们的一党决绝了。这篇更正并没登出来。克利斯朵夫再写信去，一定要他们披露他的信。人家把他发表谈话那晚的第一封信抄了一份副本寄给他，问他要不要把这封信一起发表。他这才觉得给他们拿住了。以后他不幸在街上又碰见那位冒失的记者，少不得把他当面骂一顿。于是第二天报上又登出一篇短文，说那些宫廷里的奴才，即使被主子撵走了还是脱不了奴性；再加上几句隐射最近那件事的话，使大家都明白是指的克利斯朵夫。

赶到谁都知道克利斯朵夫连一个后台也没有了的时候，他立刻发觉自己的敌人多得出乎意料之外。凡是被他直接或间接中伤过的人，不问是个人受到批评的，或是思想与识见受到指摘的，都马上对他反攻，加倍的报复。至于

一般的群众，当初克利斯朵夫振臂疾呼，想把他们从麻痹状态中唤醒过来的人，现在看着这个想改造舆论，惊扰正人君子的好梦的狂妄的青年受到教训，也不禁暗暗称快，克利斯朵夫掉在水里了。每个人都拚命把他的头揷在水底下。

他们并不是一齐动手的。先由一个人来试探虚实，看见克利斯朵夫不还手就加紧攻势。然后别的人跟着上前，然后大队人马蜂拥而来。有些人把这种事看作有趣的玩艺儿，好似小狗喜欢在漂亮地方放屁：那都是些外行的新闻记者，好比游击队，因为一无所知，只把胜利的人捧一阵，把失败的骂一顿，教人忘掉克利斯朵夫。另外一批却搬出他们的原则来作猛烈的攻击。只要一经过他们的手，世界上就可以变得寸草不留：那是真正的批评界，制人死命的批评界。

幸而克利斯朵夫是不看报的。几个忠实的朋友特意把诬蔑最厉害的几份报寄给他。可是他让它们堆在桌上，不想拆阅。最后有一篇四周用红笔勾出的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说他所作的歌像一头野兽的咆哮，他的交响乐是疯人院里的出品，他的艺术是歇斯底里的，他的抽风似的和声只是遮掩他心灵的枯索与思想的空虚。那位很知名的批评家在结论里说：

“克拉夫脱先生从前以记者的身分写过些东西，表现特殊的文笔与特殊的口味，在音乐界中成为笑谈。当时大家好意劝他还是作他的曲子为妙。他的近作证明那些劝告虽然用心甚好，可并不高明。克拉夫脱先生只配写那种文章。”

看了这一篇，克利斯朵夫整个上午不能工作；他又去找别的骂他的报纸，预备把失意的滋味饱尝一下。可是鲁意莎为了收拾屋子，老喜欢把所有散在外面的东西丢掉，那些报纸早给她烧了。他先是生气，随后倒也安慰了，把那份留下来的报递给母亲，说这一份也早该一起扔在火里的。

可是还有使他更难受的侮辱呢。他寄给法兰克福一个有名的音乐会的一阕四重奏，被一致的否决了，而且并不说明理由。科仑乐队有意接受的一阕前奏曲，在他空等了几个月之后也给退回来，说没法演奏。但最难堪的打击是出于当地的某音乐团体。指挥于弗拉脱是个很不差的音乐家，但和多数指挥一样，一点没有好奇心；他有那种当指挥的特有的惰性：凡是已经知名的作品，他可以无穷尽的重复搬弄，而一切真正新颖的艺术品却被视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他永不厌倦的组织着贝多芬，莫扎尔德，或是舒芒的纪念音乐会：在这些作品里头，他只要让那些熟悉的节奏把自己带着跑就是了。反之，现代的音乐就教他受不住。但他不敢明白承认，还自命为能够赏识有天才的青年；实际是这样的：假如人家给他一件仿古的作品，——仿一件五十年前算是新的作品，——他的确极表欢迎，甚至会竭力教大众接受。因为这种东西既不妨害他演奏的方式，也不会扰乱大众感受作品的方式。可是一切足以危害这美妙的方式而要他费力的作品，他都深恶痛绝。只要开辟新路的作家一天没有成名，他鄙薄的心就一天不会消失。假使这作家有成功的希望，他的鄙薄就一变而为憎恨，——直到作家完全成功的那一天为止。

克利斯朵夫当然谈不到有成功的希望，那才差得远呢。所以他间接知道于弗拉脱先生很愿意演奏他的作品，不禁大为诧异。这位指挥是勃拉姆斯的好朋友，也是被克利斯朵夫在杂志上痛诋过的别的几个音乐家的朋友，因此

外国通例，凡作家投寄新作于音乐团体请其演奏时，当先由乐队董事会投票表决。

克利斯朵夫更觉得他的表示出乎意外。但他自己是好人，以为他的敌人也像他一样的宽宏大度。他猜想他们是看到他受到攻击，特意要表示他们决不作小心眼儿的报复：想到这点，他竟为之感动了。他送了一阕交响诗给于弗拉脱，附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对方教乐队秘书复了信，措辞冷淡，可是很有礼貌，声明他的曲子已经收到，但照会章规定，作品在公开演奏之前必须提交乐队先行试奏。章程总是章程：克利斯朵夫当然没有话说。而且这纯粹是种手续，免得一般讨厌的鉴赏家多所议论。

两三个星期以后，克利斯朵夫接到通知，说他的作品快要试奏了。照规矩，这种试奏是不公开的，连作家本人也不能旁听。事实上所有的乐队都容许作家到场，他只是不公然露面罢了。每个人都知道他在这儿，而每个人都装做不知道。到了那天，一个朋友来把克利斯朵夫带进会场，拣着一个包厢坐下。他很奇怪的发觉，这个不公开的预奏会居然差不多会客满，至少在楼下：大批的时髦朋友，有闲阶级，批评家，都在那里咕咕呱呱，非常兴奋。乐队照例是装做不知道有这些人的。

开场是勃拉姆斯采用歌德冬之默想里的一段所作的杂曲，有女中音独唱和男声合唱，由乐队伴奏的。克利斯朵夫早就讨厌这件作品的浮夸的感伤情调，以为这或许是勃拉姆斯党一种挺客气的报复，因为他从前很不恭敬的批评过这个曲子，特意强迫他听一遍。他想到这点不由得笑了，而听到以后又紧接着被他攻击过的两个别的作家的东西，他认为更有意思了：可见他猜得不错，他们的用意不是很显明了吗？他一边装着鬼脸，一边想这究竟是挺公平的斗争：他虽不欣赏那音乐，可很能欣赏这种玩笑。群众对着勃拉姆斯和同一派的作品热烈鼓掌的时候，克利斯朵夫也俏皮的附和几下。

终于轮到克利斯朵夫的交响乐了。乐队和听众之间都有人向他的包厢瞟几眼，证明大家知道他在场。他尽量的躲起来。他等着，心跳得很厉害。音乐像河水般悄悄的集中在一处，但等指挥的棍子一动就马上决破堤岸：在这种情形之下，每个作曲家都会觉得惴惴不安。他自己还从来没听到这个作品演奏的效果。他所幻想的生灵究竟是什么面目呢？声音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觉得它们在他心中轰轰的响：他靠在音响的深渊之上浑身哆嗦，急于要知道出来的是什么。

出来的却是一种无名的东西，一片不成形的混沌。明明是支撑高堂大厦的结实的梁柱，出来的可没有一组站得住的和弦，它们相继瓦解，好似一座只有断垣残壁的建筑物，除了灰土瓦砾之外，一无所有。克利斯朵夫竟不敢相信奏的是他的作品。他找不到他思想的线条和节奏，根本认不出自己的思想了：只觉得它嘟嘟囔囔，摇摇晃晃，好比一个扶墙摸壁的醉鬼；他羞死了，仿佛自己就在当众表现这副醉鬼的模样。他明知他写的不是这种东西，可是没用：一个荒唐的代言人把你的话改头换面的变了样，你自己也会当场糊涂起来，弄不清你对这种荒谬的情形应不应当负责。至于群众，他们可不理会这些：他们相信表现的人，歌唱的人，相信他们听惯的乐队，正如相信他们读惯的报纸一样：他们是决不会错的；要是他们说了荒唐的话，一定是作者荒唐。这一回群众尤其不会起疑，因为他们原来就要相信作者可笑。克利斯朵夫还以为指挥也觉察到这种混乱的情形，会教乐队停下来重新开始的。各种乐器都失去了联络。号角手插进来的时候，落后了一拍子，又继续吹了好几分钟，才若无其事的停下来倒去口水。有几段木笛的部分竟消灭得无影无踪。哪怕是最精细的耳朵也没法找到乐思的线索，甚至不能想象它有什么线

索可言。变化很多的配器法，滑稽的穿插，都给恶俗的演奏变得可笑了。作品显得荒谬绝伦，简直是一个白痴，是一个完全不懂音乐的人开的玩笑。克利斯朵夫扯着自己的头发，竟想跑出去阻断乐队的演奏；可是陪着他的朋友把他挡住了，说指挥先生自会辨别出演奏的错误而全部纠正的，——何况克利斯朵夫根本不该出头露面，他的指摘只有把事情弄得更糟。他把克利斯朵夫硬留在包厢里。克利斯朵夫听他摆布，只是把拳头敲着自己的脑门；而每次听到一段太不像话的表演，就又愤怒又痛苦的咕噜几声：“孽障！孽障！……”他一边呻吟，一边咬着手不让自己叫出来。

那时除了错误的音符，群众也开始骚扰，有了声音。先还不过是一种震颤的音浪；不久克利斯朵夫分明听到他们在笑了。乐师给他们暗示，有几个竟老实不客气表示忍俊不禁。群众明白了作品真的可笑时，便捧腹大笑起来，全场的人都乐死了。赶到一个节奏很强的主题又在低音大提琴上出现，而给表现得特别滑稽的时候，大家更乐不可支。只有指挥一个人在喧闹声中不动声色的继续打着拍子。

曲子终于奏完了：——（世界上最得意的事也要结束的。）——那才轮到大众开口：他们高兴之极，闹哄了好几分钟。有的怪声嘘叫，有的大喝倒彩：更俏皮的人却喊着“再来一次！”花楼中有人用男低音摹仿那个可笑的主题。别的捣乱分子跟上来争奇斗胜。还有人嚷着：“欢迎作家！”——这些风雅人士好久没有这样的乐了。

等到喧闹声稍微静了一些，乐队指挥若无其事的把大半个脸对着群众，可是仍装做不看见群众，——（因为乐队是始终认为没有外人在场的，）——一向乐队做了一个记号表示他要说话。有人嘘了一声，全场静默了。他又等了一忽儿才用着清楚，冷静，斩钉截铁的声音说：

“诸位，我一定不会让这种东西奏完的，要不是为了把胆敢侮辱勃拉姆斯大师的那位先生给大家公断一下的话。”

说完了，他跳下指挥台，在大众的欢呼声中走了出去。掌声继续到一二分钟之久，但他竟不再出场。乐队里的人开始散了。群众也只能走了。音乐会已经告终。

大家总算过了一天快乐的日子。

克利斯朵夫已经出了包厢。他一看见指挥走下台，便立刻冲出去，三脚两步的奔下楼，要去打指挥的嘴巴。陪他来的朋友在后面追着，想拦住他。克利斯朵夫把他一推几乎跌下楼梯：——（他很有理由相信这位朋友也是做这个圈套的一分子。）——还算是于弗拉脱的运气，也是克利斯朵夫的运气，后台的门关着，尽管他用拳头乱敲也敲不开。而群众已经从会场里出来，克利斯朵夫不得不赶快溜了。

他当时的情形真是没法形容：他漫无目地的走着，舞动着手臂，骨碌碌的转着眼珠，大声的自言自语，活像一个疯子；愤慨与狂怒的叫声越来越响了。街上差不多没有什么人。音乐会场是上年在城外新盖的；克利斯朵夫不知不觉穿过荒地，向郊外走去；荒地上东一处西一处有几所板屋和正在建造的屋子，四周都有篱垣。他心中起了杀性，竟想把那个侮辱他的人杀死……可是即使杀了他，那些百般耻笑他的人，——他们笑声至今还在他耳朵里响着，——会把兽性改掉一点吗？他们人数太多了，简直无法可想，他们在多少事情上都意见分歧，但在侮辱他压迫他的时候却联合起来了。那不止是误解，而且还有一般怨毒在里头。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呢？他心中的

确藏着些美妙的东西，教人愉快教人幸福的东西；他想说出来，让别人一同享受，以为他们也会像他一样的快乐。即使他们不能欣赏，至少也得感激他的好意，充其量可以用友好的态度指出他错误的地方；但他们因之而怀着恶意取笑他，把他的思想歪曲，诬蔑，踩在脚下，把他变成小丑来制他死命，真是从何说起！他气愤之下，把人家的怨毒格外夸大了，过分的当真了：其实那般庸碌的人压根儿没有什么当真的事。他嚎啕大哭的嚷着：“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呢？”他闭住了气，觉得自己完了，像童年第一次看到人类凶恶的时候一样。

这时他向周围和脚下看了看，原来他走到了磨坊邻近的小溪旁边，几年以前父亲淹死的地方。投水自杀的念头立刻在他脑中浮起，他想马上往下跳了。

正当他站在岸上，俯瞰着清澈恬静的水光感到幻惑的时候，一只很小的鸟停在近边的树枝上开始唱起来，唱得非常热烈。他不声不响的听着。水在那里啁语。开花的麦秆在微风中波动，簌簌作响；白杨萧萧，打着寒噤。路旁的篱垣后面，园中看不见的蜜蜂散布出那种芬芳的音乐。小溪那一边，眼睛像玛瑙般的一头母牛在出神。一个淡黄头发的小姑娘坐在墙沿上，肩上背着一只轻巧的稀格的藤篓，好似天使张着翅膀，她也在那儿幻想，把两条赤裸的腿荡来荡去，哼着一个全无意义的调子。远远的，一条狗在草原上飞奔，四条腿在空中打着很大的圆圈……

克利斯朵夫靠在一株树上，听着，望着春回大地的景象：这些生灵的和平与欢乐的气息把他感染了……他忘了一切……突然他拥抱着美丽的树，把腮帮贴着树干。他扑衣地下，把头埋在草里，浑身抽搐的笑了，快乐之极的笑了。生命的美，生命的温情，把他包裹了，渗透了。他想到：

“为什么你这样的美，而他们——人类——那样的丑？”

可是不管这些！他爱生命，觉得自己永远会爱生命，无论如何不会跟它分离的了。他如醉若狂的拥抱着土地，拥抱着生命：

“我抓住你了！你是我的了。他们决不能把你抢走的。他们爱怎办就怎办罢！便是要我受苦也无妨！……受苦，究竟还是生活！”

克利斯朵夫鼓起勇气重新工作。什么名副其实的文人，有名无实的文人，多嘴而不能生产的人，新闻记者，批评家，艺术界的商人和投机分子，他都不愿意再跟他们打交道。至于音乐家，他也不愿再白费光阴去纠正他们的偏见与嫉妒。他们讨厌他是不是？好吧！他也讨厌他们。他有他的事业，非实现不可。宫廷方面恢复了他的自由：他很感激。他感激人们对他的敌意：因为这样他才能安心工作了。

鲁意莎完全赞成他的意见。她毫无野心，没有克拉夫脱的脾气，她既不像父亲，也不像祖父。她完全不指望儿子成就什么功名，当然，要是儿子有钱有名望，她心里也喜欢的；可是倘若名利要用多少不如意去换来，那她宁可不提此话。克利斯朵夫和宫廷决裂以后，她的悲伤并不是为了那件事情本身，而是因为儿子受到很大的痛苦。至于他和报纸杂志方面的人绝交，她倒很高兴。她对于字纸，像所有的乡下人一样抱着反感，以为那些东西不过使你浪费时间，惹是招非。有几回她听到杂志方面的几个年轻人和克利斯朵夫谈话：她对于他们的凶恶觉得可怕极了；他们诽谤一切诬蔑一切，而且坏话越说得越多，他们越快活。她不喜欢这批人。没有问题，他们很聪明，很博学，可决不是好人。所以克利斯朵夫和他们断绝往来使她很安慰。她非常通达

理：他跟他们在一起有什么好处呢？至于克利斯朵夫自己，他是这样想的：

“他们喜欢把我怎么说，怎么写，怎么想，都由他们罢；他们总不能使我不成其为我。他们的艺术，思想，跟我有何相干！我都否认！”

能否认社会固然很好，但社会决不轻易让青年人说说大话就把它否认了的。克利斯朵夫很真诚，可是还抱着幻想，没有把自己认识清楚。他不是一个修道士，没有遁世的气质，更没到遁世的年龄。最初一个时期他还不大痛苦，因为他一心一意浸在创作里头；只要有工作可做，他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欠缺。但旧作已完，新作还没在心中抽芽的期间，精神上往往有个低潮：他彷徨四顾，不禁对自己的孤独寒心。他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作。正在写作的时候是不会有这种问题的：写作，就因为应当写作，那不是挺简单吗？等到一件作品诞生了，摆在面前之后，先前把作品从胸中挤压出来的那个强烈的本能就不出声了，而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要产生这件作品了，不大认得它了，几乎把它看作一件陌生的东西，只想把它忘掉。可是只要作品没印出来，没演奏过，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独立生存过，我们就忘不了它。因为在这个情形之下，作品还是个与母体相连的新生儿，连在血肉上的活东西；要它在世界上存活，必得把它切下来。克利斯朵夫制作越多，越受这些从他生命中繁衍出来的东西压迫；因为它们无法生存，也无法死灭。谁替他来解放它们呢？一种模糊暧昧的压力在鼓动他那些思想上的婴儿；它们竭力想和他脱离，想流布到别的心中去，像活泼的种子乘着风势吹遍世界一样。难道他得永远被封锁起来，没法生长吗？那他可能为之发疯的。

既然所有的出路（戏院，音乐会）都已经断绝，而他也无论如何不肯再低首下心去向那些拒绝过他的指挥们钻谋，那末除掉把作品印出来以外别无办法；但要找一个肯捧他出场的出版家，也不比找一个肯演奏他作品的乐队更容易。他试了两三次，手段都笨拙到极点，结果他觉得够受了；与其再碰一次钉子，或是和出版商讨价还价，看他们那种长辈面孔，他宁可自己出钱印刷。那当然是胡闹。过去靠了宫廷的月俸和几次音乐会的收入，他积了一点儿钱；但收入的来源已经断绝，而要找到一个新的财源还得等好些时候，照理他应当小心谨慎的调度这笔积蓄，来度过他刚踏进去的难关。现在他非但不这样做，反因为原有的积蓄不够对付印刷费而再去借债。鲁意莎一句话都不敢说；她觉得他没有理性，同时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为了要把姓名印在书上愿意花这么一笔钱。但既然这是一种方法使他肯耐着性子，肯留在她身边，她也就挺高兴了。

克利斯朵夫拿出去问世的，并非他作品中比较通俗的，不费人家精神的那一类，而是一批最有个性而自己最重视的作品，都是些钢琴的曲子，其中也夹几只歌，有的很简短，调子很通俗，有的规模很庞大，差不多有戏剧情调的。这些作品合起来是一组或悲或喜的印象，衔接得很自然，有时用钢琴独奏来表现，有时用独唱或是钢琴伴奏的歌唱来表现。“因为，”克利斯朵夫说，“我幻想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形式：我只是痛苦，快活，没有说话可以形容；但忽然我觉得需要说话了，就不假思索的唱起来：有时只是些意义不大明确的字，断断续续的句子。有时是整篇的诗；然后我又沉入幻想。日子便这样的过去了；而我的确想描写一天的情绪。为什么一定要印一部纯粹是歌或纯粹是序曲的集子呢？那不是很勉强很不调和吗？让心灵自由活动不是更好吗？”所以他把集子题做：一日，集中各部分还有小题目，简括的指出内心的梦也有先后的程序。克利斯朵夫又加上神秘的献词，缩写

的字母，日子，只有他自个儿懂得，而能够回想起诗意盎然的时间或是心爱的面貌的，例如满面笑容的高丽纳，不胜慵懶的萨皮纳，还有那不知名姓的法国少女。

除了这些作品，他又选了三十阙歌，都是自己最喜欢的，所以是群众最不喜欢的。他绝对不选入他“最悦耳”的曲子，而选了最有特点的。——（一般老实人最怕“特点”，凡是没有性格的东西，他们认为高明多了。）

这些歌的诗句是十七世纪西莱西州诗人的作品，克利斯朵夫偶尔在一部通俗丛书里读到这些诗篇，很喜欢它们真挚的气息。其中有两个作家尤其使他心折，那是像两兄弟般的，都在三十岁上天折的短命天才。一个是富有风趣的保尔·弗莱门，高加索和伊斯巴芬一带的流浪者，在战争的残暴，人生的苦难，黑暗腐败的环境中，仍旧保持着一颗纯洁，慈悲，恬静的灵魂。另外一个则是抑郁痛苦，沉湎酒色，佯狂玩世的天才约翰·克利斯丹·耿脱，克利斯朵夫所取材于耿脱的是反抗压迫的挑战的呼声，是巨人被困时狂怒的诅咒，把雷电霹雳回击上天的号叫；取材于弗莱门的则是像鲜花一样柔和的情诗，像群星旋舞似的，清明欢悦的心的舞曲；他的一首悲壮而又静穆的十四行诗，题目叫做《自献》的，尤其为克利斯朵夫当作早祷一般讽咏不已。

虔诚的保尔·琪哈脱的乐天气息，同样使克利斯朵夫心向往之，在悲哀之后得到一种安息。他喜欢他在上帝身上看出来的大自然的景象：新鲜的草原上，小溪在沙上流着，发出幽密的歌声，鹤鸟在百合花和白水仙中间庄严的散步，燕子和白鸽在明净的空气中掠过，雨后的阳光显得无限欢畅，明亮的天色在云层的空隙中微笑，黄昏时一切都有股清明肃穆的情调，森林，羊群，城市，原野，都安息了。克利斯朵夫把这些至今还在新教教堂里唱着的圣诗谱成音乐，可并不保存原有的赞美歌性质，那是他最厌恶的。他给圣诗一种自由活泼的表辞，例如流浪的基督徒之歌，某些段落被加上了高傲的气息，夏日之歌原来像平静的水波，此刻被异教徒式的狂欢一变而为汹涌的急流。这些改变都会使原作者琪哈脱为之骇然的。

乐谱终于付印了，当然一切都做得不合情理。为克利斯朵夫代印代售的出版家，除了是个邻居以外，根本没有别的资格。他不配做这一类重要的工作，因此拖了好几个月，又花了很多钱改正错误。全盘外行的克利斯朵夫让他多算了三分之一的账，费用大大的超过了预算。赶到大功告成之后，克利斯朵夫捧着一册硕大无朋的乐谱，不知道怎么办。那出版家是没有什么主顾的，也一点不设法推销作品。虽然他做事全无精神，和克利斯朵夫的态度倒配搭得正好。为了良心上有个交代，他要求克利斯朵夫拟一段广告，克利斯朵夫回答说：“用不着；倘若作品是好的，那末它本身就是广告。”出版家完全尊重他的意思，把印好的乐谱藏在栈房的尽里头。要说保存，真是保存得太好了，因为六个月中间连一部也没卖掉。在没有主顾的期间，克利斯朵夫先得想法填补亏空；而他也不能苛求了，因为除了还债，还得维持生活。他不但债务超出了预算，并且积蓄也没早先计算的那么多。是他无意之中丢了钱

西莱西为中欧一大平原，居民为斯拉夫族。一七四五以前受奥帝国治下的小诸侯管辖，一七四五以后大部分并入普鲁士版图。两诗人生前，西莱西尚纯属奥帝国诸侯的统治。

伊斯巴芬为波斯古都。

弗莱门（1609—1640）与耿脱（1695—1723）均为德国十七世纪最大的抒情诗人。

琪哈脱（1606—1676）为德国最大的圣诗作者。

呢，还是把积蓄计算错了？——大概是算错的成分居多，因为他从来不能做一个准确的加法。不管钱是怎么短少的，总而言之是短少了。鲁意莎不得不流着血汗来帮助儿子。他看了难过极了，只想不惜牺牲赶快把债料清。尽管向人自荐和遭人拒绝是多么难堪，他还是到处去找教课的差事。可是大家已经对他完全冷淡，极不容易找到学生，所以听到某所学校里有个位置，他就很高兴的接受了。

那是个带点宗教气息的学校。校长为人精明，虽不是音乐家，很明白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只要花很少代价就能把克利斯朵夫派作多少用场，他面上很客气，钱却是出得很少。克利斯朵夫怯生生的指出这一点，校长便和颜悦色的笑着告诉他，没有了官衔，他就不能希望更多的报酬。

而且还是件苦差事！人家并非要他教学生音乐，而是要让家长以为他们的子弟会弄音乐，使学生也自以为会弄音乐。他最大的任务是教他们能够在招待外客的典礼中登台唱歌。至于用什么方法是无关紧要的。克利斯朵夫对这些情形厌恶透了；照理一个人尽了职务总觉得自己做了些有益的工作：可是他连这点儿安慰都没有，反而良心上受到责备，仿佛干了什么自欺欺人的事。他想给孩子们受点切实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并且爱好纯正的音乐；他们可满不在乎。克利斯朵夫没有方法教他们听话，171 他缺少威严；其实他也不配教小学生。他对他们结结巴巴的歌唱不感兴味，想立刻和他们解释乐理。上钢琴课的时候，他要学生和他一起在琴上弹一阕贝多芬的交响乐。那当然是办不到的；于是他大发雷霆，把学生从琴上拉下来，自个儿弹上半天。——对于学校外面的私人学生，他也是同样的作风：一点儿耐性都没有，譬如他对一个以贵族出身自豪的小姑娘说，她的琴弹得跟厨娘一个样；或是写信给学生的母亲表示不愿意再教了，说这样没出息的学生，要他再教下去，他会气死的。——这套办法当然只会把事情搅得更糟。绝无仅有的几个学生也跑掉了；他不能把一个学生留到两个月以上。母亲数说他，要他答应至少别跟学校闹翻；倘使丢了这个位置，他简直不知怎么糊口了。所以虽然心里厌恶，他只能勉强压着自己，从来没有迟到早退的事。可是一个蠢得像驴子似的学生在同一地方犯到第十次的错误，或是要他为下次的音乐会拿一段无聊的合唱一遍又一遍的教学生，（因为人家不放心他的鉴别力，连编排节目的权也不给他，）那他真不容易遮盖心中的思想。不用说他是不会热心的了。但他还是硬撑着，一声不出，皱着眉头，冷不防用拳头敲敲桌子，使学生们吓得直跳，算是发泄一下胸中的怒气。有时这种苦水实在太苦了，咽不下去了；他就在半中间拦着学生，嚷道：

“得啦得啦！这东西别唱了！还是让我来替你们弹弹华葛耐罢。”

他们正是求之不得。等他一转背，他们就玩起纸牌来。结果总有一个学生把这种情形报告校长；于是克利斯朵夫受到埋怨，说他在这儿的任务并非教学生爱好音乐而是教他们唱歌。他气哼哼的听着这些教训，终于忍受了：因为他不愿意决裂。——几年以前，当他的前程显得光明，可靠，但实际上还一无成就的时候，谁又敢说，等到他一朝有了点价值，就得受这样的委屈？在学校里担任教职而受到的许多屈辱中间，对同僚们必不可少的拜访也是件不容易受的苦事。他随便拜访了两个，心里就堵得慌，再没勇气去访问别的。那两位受到拜访的同事对他也并不满意，其余的更认为是对他们个人的侮辱。大家拿克利斯朵夫看得在地位上智慧上都比他们低，对他摆着一副老气横秋的神气。他们那种自信和把克利斯朵夫看透了的态度，使克利斯朵夫也

相信他们的见解是不错的，觉得和他们一比，自己的确非常愚蠢：他能有什么话和他们说呢？他们三句不离本行，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天地。他们不能算人。倘使是书本倒也罢了，但他们只是书本的注解，考据文字的诠释。

克利斯朵夫避免和他们在一起。但有时候非见面不可。校长按月招待一次宾客，时间定在下午；他要大家都到。第一次，克利斯朵夫规避了，连道歉的话也不说，只是无声无臭的装死，还一厢情愿的希望他的缺席没有被注意；可是第二天他就给话中带刺的说了几句。下一回，因为受到母亲责备，他只能抱着送葬般的心情去了。

到的有本校和当地别的学校的教员，带着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大家挤在一间太小的客厅里，依着各人的级位分成几个小组，对他理都不理。邻近的一组正谈着教学法和食谱。这些教员太太都有各式各样的烹饪秘诀，发挥得淋漓尽致。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也一样浓厚，也差不多一样内行。丈夫钦佩妻子治家的才具，妻子钦佩丈夫的博学多闻：彼此钦佩的程度也恰好相等。克利斯朵夫站在一扇窗子旁边，靠着墙，不知道怎么好，有时勉强装着傻笑，有时沉着脸，眼睛发呆，脸上的线条扭做一团，真是厌烦死了。离开他不远，有个没人理睬的少妇坐在窗槛上，也和他一样的在那里纳闷。两人只望着客室里的人物，彼此都没看到。过了一会，他们支持不住而转过头去打呵欠的时候，才互相注意到了。就在那一刹那时，两对眼睛碰在一起了。他们彼此会心的瞅了一眼。他往前走了一步。她轻轻的对他说：

“你觉得这儿有劲吗？”

他背对着众人，望着窗子，吐了吐舌头。她大声笑了出来，忽然精神一振，做个手势教他坐在旁边。他们通了名姓。原本她是本校生物学教员莱哈脱的妻子，新近到差，当地还没有一个熟人。她绝对谈不上好看，臃肿的鼻子，难看的牙齿，一点也不娇嫩，可是眼睛很灵活清秀，老带着天真的笑容。她像喜鹊一样的多嘴；他也兴致很好的和她对答；她的爽直教人看了好玩，又会说些发噱的话；他们大声交换着心中的感想，全不顾虑周围的人。而那些邻人，在他们孤独的时候偏不肯发发善心理睬他们，这时可对他们侧目而视了：当着众人这样的嘻嘻哈哈，大家认为太不雅观……但他们爱怎样想都可以，两个饶舌的人简直不放在心上：难道他们就不能痛快一下吗？

最后莱哈脱太太把她的丈夫给克利斯朵夫介绍了。他长得其丑无比，一张苍白的，没有胡子的，阴惨惨的脸，可是神气和善到极点。他的声音是在喉咙里进出来的，说起话来出口成章，又快又不清楚，常常在音母之间停下来。

他们结婚才只有几个月，这对丑夫妻倒是非常相爱：在大庭广众之间，彼此的眼风，说话，拉手，都有种特别亲热的方式，又可笑又动人。一个喜欢什么，另外一个也喜欢什么。他们马上约克利斯朵夫等这儿散了，上他们家去吃晚饭。克利斯朵夫先是用说笑话的方式辞谢，说今晚最好是各人回去睡觉：大家都累死了，好像走了几十里路。莱哈脱太太回答说，心里不快活就更不应该立刻睡觉：那是对身体有害的。克利斯朵夫终于让步了，他在孤独的环境中很高兴遇到这两个好人，他们虽然不大聪明，可是老实，殷勤。莱哈脱夫妇的家也像他们一样好客：礼数太多了一点，到处是标语。桌椅，器具，碗盏，都会说话，老是翻来覆去的表示欢迎“亲爱的来客”，问候他的起居，说着好多殷勤的和劝人为善的话。挺硬的沙发上放着一个小小的靠枕，在那里怪亲热的，悄悄的说：

“您再坐坐吧。”

人家端给他一杯咖啡，杯子又劝他：

“再来一滴吧！”

盘子碟子盛着很精美的菜，同时也借机会替道德作宣传。有的说：

“得想到全体：否则你个人也得不到好处。”

有的说：“亲热和感激讨人喜欢，忘恩负义使大家憎厌。”虽然克利斯朵夫不抽烟，壁炉架上的烟灰碟子也忍不住要勾引他：

“这儿可以让烧红了的雪茄歇一歇。”

他想洗手，洗脸桌上的肥皂就说：

“请我们亲爱的客人使用。”

还有那文绉绉的抹布，好似一个礼貌周到的人，尽管没有什么可说，也以为应当多少说一点，便说了句极有道理而不太合时的话：“应当早起享受晨光。”

临了克利斯朵夫竟不敢再在椅子上动一下，唯恐还有别的声音从屋子的所有的角儿跑出来招呼他。他真想和它们说：“住嘴罢，你们这些小妖怪！人家连说话都听不见了。”

他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推说是想起了刚才学校里的集会。他无论如何不愿意使主人难堪。并且他也不大容易发觉人家的可笑。这般人和这些东西的好意的噜苏，他不久也习惯了。你有什么事不能原谅他们呢？他们人都那么好，也不讨厌，即使缺少点儿雅趣，可并不缺少了解人的聪明。

他们来到这儿还没多久，觉得很孤独。内地人往往有种可厌的脾气，不愿意外乡人不先征求他们的同意——（那是规矩）——就随随便便闯到地方上来。莱哈脱夫妇对于内地的礼法，对这种新来的人对先住的人应尽的义务，没有充分注意。充其量，莱哈脱可能当做例行公事一般的去敷衍一下。但他的太太最怕这些苦役，又不喜欢勉强自己，便一天天的拖着。她在拜客的名单上挑了几处比较最不讨厌的人家先去；其余的都给无限期的搁在那儿。不幸，那些当地的要人就在这一批里头，对于这种失敬的行为大生其气。安日丽加·莱哈脱——（她的丈夫叫她丽丽）——态度举动挺随便，怎么也学不会那种一本正经的口气。她会跟高级的人顶嘴，把他们气得满面通红；必要时也不怕揭穿他们的谎言。她说话最直爽，非把心里想到的一齐说出来不可，有时竟是大大的傻话，被人家在背后取笑；有时也是挺厉害的缺德话，把人当场开发，结了许多死冤家。快要说的时候，她咬着嘴唇，想忍着不说，可是已经说出口了。她的丈夫可以算得最温和最谦恭的男人，对于这一点也怯生生的跟她提过几回，她听了就拥抱他，埋怨自己糊涂，认为他说得一点不错。但过了一忽她又来了，而尤其在最不该说的场合和最不该说的时候脱口而出：要是不说，她觉得简直会胀破肚子。她生性是和克利斯朵夫相投的。

在正因为不该说而说的许多混话中间，她时时刻刻要把德国怎么样法国怎么样作些不伦不类的比较。她自己是德国人，——（而且是德国气息最重的，）——可是生长在亚尔萨斯，和一般法国籍的亚尔萨斯人很有交情，受着拉丁文化的诱惑；那是归并地带的多少德国人都抗拒不了的，连表面上最不容易感受拉丁文化的人在内。也许因为安日丽加嫁了一个北方的德国

亚尔萨斯与洛兰两州在近代史上常为德法两国争夺之地。本书原作于本世纪初，而书中时代背景又在普法战争以后，亚、洛两州方归入在德国版图的时期，故言归并地带。

人，一朝处于纯粹日耳曼式的环境中而故意要表示与众不同，所以这种诱惑力对她格外强烈。

初次遇到克利斯朵夫的那天晚上，她就扯到她的老题目上来了。她称赞法国人说话多自由，克利斯朵夫马上做了她的应声虫。对于他，法国便是高丽纳：一对光彩焕发的眼睛，一张笑嘻嘻的年轻的嘴巴，爽直随便的举动，清脆可听的声音：他一心希望多知道些法国的情形。

丽丽·莱哈脱发觉克利斯朵夫跟自己这样投机，不禁拍起手来。

“可惜我那年轻的法国女朋友不在这儿了，”她说，“但她也撑不下去：已经走了。”

高丽纳的形象马上隐掉。好似一支才熄灭的火箭使阴暗的天空突然显出温和而深沉的星光，另外一个形象，另外一对眼睛出现了。

“谁啊？”克利斯朵夫跳起来问，“是那个年轻的女教员吗？”

“怎么？你也认识她的？”

他们把她的身材面貌说了一说，结果两幅肖像完全一样。

“原来你是认识她的？”克利斯朵夫再三说。“噢！把你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事统统告诉我吧！”

莱哈脱太太先声明她们俩是无话不谈的知交。但涉及细节的时候，她知道的就变得极其有限了。她们第一次在别人家里碰到，以后是莱哈脱太太先去跟那姑娘亲近，以她照例的诚恳的态度，邀她到家里谈谈。她来过两三次，彼此谈过些话。好奇的丽丽费了不少劲才探听到一点儿法国少女的身世：她生性沉默，你只能零零碎碎把她的话逼出来。莱哈脱太太只知道她叫做安多纳德·耶南，没有产业，全部的家族只有留在巴黎的一个兄弟，那是她尽心尽力的帮助的。她时时刻刻提到他，唯有在这个题目上她的话才多一些。丽丽·莱哈脱能够得到她的信任，也是因为对于那位既无亲属，又无朋友，孤零零的待在巴黎，寄宿在中学里的年轻人表示同情的缘故。安多纳德为了补助他的学费，才接受这个国外的教席。但两个可怜的孩子不能单独过活，天天都得通信；而信迟到了一点，两人都会神经过敏的着慌。安多纳德老替兄弟担心：他没有勇气把孤独的痛苦藏起来；每次的诉苦都使安多纳德痛彻心肺；她一想起兄弟的受罪就难过，还常常以为他害着病而不敢告诉她。莱哈脱太太好几次埋怨她这种没有理由的恐怖；她当时听了居然也宽慰了些。——至于安多纳德的家庭，她的景况，她的心事，莱哈脱太太却一无所知。人家一提到这种问题，那姑娘马上惊惶失措，不作声了。她很有学问，似乎早经世故，可是天真而老成，虔敬而没有丝毫妄想。在这儿住在一个既没分寸又不厚道的人家，她很苦闷。——怎么会离开的，莱哈脱太太也弄不大清。人家说是因为她行为不检。安日丽加可绝对不信；她敢打赌那是血口喷人，唯有这个愚蠢而凶恶的地方才会这样狠毒。可是不管怎么样，总是出了点乱子，是不是？

“是的，”克利斯朵夫回答的时候把头低了下去。

“总而言之她是走了。”

“她临走跟你说些什么？”“啊！”丽丽·莱哈脱说，“真是不运气。我刚巧上科仑去了两天：回来的时候……太晚了！……”她打断了话头对老妈子这么说，因为她把柠檬拿来太晚了，来不及放在她的茶里。于是，她拿出真正的德国女子动不动把家庭琐事扯上大题目的脾气，文绉绉的补充了两句：

“太晚了，人生遭遇，大多如此……”

（可不知道她说的是柠檬还是那打断的故事。）

随后她又接着说：“我回来发见她留给我一个字条，谢谢我帮忙她的地方。她说回巴黎去，可没留下地址。”“从此她再没写信给你吗？”

“没有。”

克利斯朵夫又看到那张凄凉的脸在黑夜中不见了；那双眼睛刚才只出现了一刹那，就像最后一次隔着车窗望着他的情形。

法兰西这个谜重新在他心头浮起，更需要解决了。克利斯朵夫老是向莱哈脱太太问长问短，因为她自命为熟悉那个国家，她从来没到过法国，可是仍旧能告诉他许多事情，莱哈脱是很爱国的，虽然对法国并不比太太认识得更清楚，心里却充满着成见，看到丽丽对法国表示过分热心的时候，不免插几句保留的话；而她反更坚持她的主张，莫名其妙的克利斯朵夫又很有把握的替她打边鼓。

对于他，丽丽·莱哈脱的藏书比她的回忆更有价值。她搜集了一小部分法文书：有的是学校里的教科书，有的是小说，有的是随便买来的剧本。克利斯朵夫既极想知道而又完全不知道法国的情形，所以一听到莱哈脱说他尽可以拿去看，就喜欢得像得了宝物似的。

他先从几本文选，——几本旧的教科书入手，那是丽丽或莱哈脱从前上学用的。莱哈脱告诉他，要想在这个完全陌生的文学里头弄出一些头绪，就该先从这些书着手。克利斯朵夫素来尊重比他博学的人的意见，便恭恭敬敬的听了他的话，当晚就开始看了。他第一想把所有的宝物着个大概。

他先认识了一大批法国作家，从第一流到不入流的都有，尤其是不入流的占到绝大多数。他翻了翻诗歌，从拉西纳，雨果，到尼凡诺阿，夏伐纳，一共有二十几家。克利斯朵夫在这座森林中迷失了，便改道走进散文的领域。于是又来了一大批知名与不知名的作家，例如皮伊松，梅里曼，玛德·勃仑，服尔德，卢梭，米尔博，玛萨特等。在这些法国文选中，克利斯朵夫读到德意志帝国的开国宣言；又读到一个叫做弗雷特烈-公斯当·特·罗日蒙的作家描写德国人的文字，说：“德国人天生的宜于过精神生活，没有法国人那种轻佻而喧闹的快乐脾气。他们富有性灵，感情温婉而深刻，劳作不倦，遇事有恒。他们是世界上最有道德的民族，也是寿命最长的民族。作家人才辈出，美术天赋极高。别的民族常以生为法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自豪，德国人却对于全人类都抱着一视同仁的热爱。而且以它位居中欧的地势来说，德国似乎就是人类的心和脑。”

克利斯朵夫看得累了，又很惊讶，阖上书本想道：

“法国人很有度量，可不是强者。”

他另外拿起一册。那是比较高一级的东西，为高等学校用的。缪塞在其中占了三页，维克多·杜吕哀占了三十页。拉马丁占了七页，蒂哀占了将近四十页。《西特》差不多全本都选入了，（只删去了唐·第爱格和洛特里葛的对白，因为太长，）朗弗莱因为极力为普鲁士张目而攻击拿破仑一世，所以在选本中所占的地位特别多，他一个人的文字竟超过了十八世纪全部的名作。左拉在小说《瓦解》中所写的一八七一年普法之役法国惨败的情形，被选了很多篇幅。至于蒙丹，拉·洛希夫谷，拉·勃吕伊哀，狄特洛，史当达，

巴尔扎克，弗洛贝，简直一个字都没有。反之，在别本书里所没有的柏斯格，本书里倒以聊备一格的方式选入了；因此克利斯朵夫无意中知道这个十七世纪的扬山尼派信徒“曾经参加巴黎近郊的保·洛阿依阿女子学院……”

克利斯朵夫正想把一切都丢开了，他头昏脑胀，只觉得莫名其妙。他对自己说：“我永远弄不清的了。”他没法整理出一些见解，把书翻来翻去，花了几个钟点，不知道读什么好。他的法文程度原来就不高明，而等到他费尽气力把一段文字弄明白了，又往往是毫无意义的空话。

可是这片混沌中间也有些闪烁的光明，击触的刀剑，暗噁叱咤的字眼，激昂慷慨的笑声。他从这一次初步的浏览上面慢慢的得到一些印象了，这也许也是编者带着偏见的缘故。那些德国的出版家，故意挑选法国人批评法国而推重德国的文章，由法国人自己来指出德国民族的优秀和法国民族的缺点。他们可没想到，在一个像克利斯朵夫那样思想独往独来的人心目中，这种衬托的办法倒反显出法国人自由洒脱的精神，敢于指摘自己，颂扬敌人。法国的史学家米希莱就很恭维普鲁士王弗雷特烈二世，朗弗来也颂扬德拉法迦一役中的英国人，十九世纪的法国陆军部部长夏拉赞美一八一三年代的普鲁士。拿破仑的敌人诋毁拿破仑的时候，还没有一个敢用这种严厉的口吻。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在这些刻薄的嘴里也不能幸免。在路易十四的时代，那些戴假头发的诗人也一样的放肆，莫利哀对什么都不留情。拉·风丹纳对什么都要嘲笑。鲍阿罗呵斥贵族。服尔德痛骂战争，羞辱宗教，谑弄祖国。伦理学家，作家，写讽刺文章的，骂人文章的，都在嘻笑怒骂上面用功夫。那简直是藐视一切。老实的德国出版家有时为之吓坏了，觉得需要求个良心平安；看到柏斯格把士兵跟厨子，小偷，流氓混为一谈的时候，他们便替柏斯格申辩，在附注里说他要是见到了现代的高尚的军队，决不会说这样的话。他们又赞扬莱辛的改作拉·风丹纳的《寓言》，原来是乌鸦受了吹拍而把嘴里的乳饼给狐狸吃了，莱辛却把乳饼改成一块有毒的肉，使狐狸吃了死掉：

“但愿你们永远只吃到毒药，可恶的谄媚的小人！”

出版家在赤裸裸的真理面前，好似对着强烈的阳光一样睁不开眼睛；克利斯朵夫却觉得非常痛快：他是爱光明的。但他看到有些地方也不免吃惊；一个德国人无论怎么样独往独来，总是奉公守法惯的，在他眼里，法国人那种毫无顾忌的放肆，的确有点儿作乱犯上的意味。而且法国式的挖苦也把他弄糊涂了，他把有些事看得太认真，至于真正否定的话，他倒认为是好笑的怪论。可是诧异也好，吃惊也好，总之他是慢慢的被迷住了。他不想再整理他的印象，只是随便从这个感想跳到另一个感想，生活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法国小说的轻松快乐的气息：——夏福，赛瞿，大仲马，梅里曼诸人的作品，使他非常痛快；而不时还有大革命的浓烈粗犷的味道一阵阵从书本中传出。

快天亮的时候，睡在隔壁屋里的鲁意莎醒来，从克利斯朵夫的门缝里看见灯还没熄。她敲着墙壁，问他是不是病了。一张椅子倒在地板上；她的房门忽然给打开了：克利斯朵夫穿着衬衣，一手拿着蜡烛，一手拿着书本出现了，做着庄严而滑稽的姿势。鲁意莎吓得从床上坐起，以为他疯了。他哈哈

以上所述，完全证明德国人选的法国文学集轻重倒置，不伦不类。

克利斯朵夫所看到的法国文学选集，一本是《中等学校适用法国文学选读》温杰拉德编，一九二二年第七版，斯特拉斯堡印行；另一本是《法国文学》，埃里格与蒲葛合编，丹特林改订，汉堡一九二四年版。

——原注

大笑，舞动着蜡烛，念着莫利哀剧本中的一段台词。他一句没念完又噗哧笑了起来，坐在母亲床角下喘气：烛光在他手里摇晃。这时鲁意莎才放了心，好意的嘀咕道：

“什么事呀？什么事呀？还不睡觉去！……可怜的孩子，难道你真的发疯了吗？”

他照旧痴痴癫癫的说：“你得听听这个！”

他说着坐在她床头，把那出戏从头再念起来。他仿佛看到了高丽纳，听到她那种夸张的声调。鲁意莎拦着他，嚷着：

“去吧！去吧！你要着凉了。讨厌！让我睡觉！”

他还是不动声色的念着，装着浮夸的声音，舞动着手臂，把自己笑倒了，他问母亲是不是妙极。鲁意莎翻过身去钻在被窝里，掩着耳朵说：

“别跟我起腻！……”

可是听到他笑，她也暗暗的笑了。终于她不作声了。克利斯朵夫念完了一幕，再三追问她意见而得不到回答的时候，俯下身子一看，原来她已经睡熟了。于是他微微笑着，吻了吻她的头发，悄悄的回到自己房里去了。

他又回到莱哈脱家去找书。所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他吞了下去。他多么想爱那个高丽纳与无名女郎的国家，他心中那么丰富的热情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便是第二流的作品，也有片言只语使他呼吸到自由的气息。他还加以夸张，尤其在满口赞成他的莱哈脱太太前面。她虽是毫无知识，也故意要把法国文化跟德国文化作对比，拿法国来压倒德国，一边是气气丈夫，一边因为在这个小城里闷死了，借此发发牢骚。

莱哈脱听了大为不平。他除掉本行的学科以外，其余的知识只限于在学校里得来的一些。在他看来，法国人在实际事务上很聪明，很灵巧，很和气，会说话，但不免轻佻，好生气，傲慢，一点都不严肃，没有强烈的感情，谈不到真诚，——那是一个没有音乐，没有哲学，没有诗歌（除掉鲍阿罗，斐朗日，高贝以外）的民族，是一个虚浮，轻狂，夸大，淫猥的民族。他觉得贬斥拉丁民族不道德的字眼简直不够用；因为没有更适当的名词，他便老是提到轻佻两个字，这在他的嘴里，像在大多数德国人嘴里一样，有种特别不好的意思，临了他又搬出颂扬德国民族的老调。——说德国是道德人的民族，（据埃尔特说，这就是跟别的民族不大相同的地方，）——忠实的民族，（其中包括真诚、忠实、义气、正直等等的意思，）——卓越的民族，（像斐希特说的，）——还有德国人的力，那是一切正义一切真理的象征，——德国人的思想，——德国人的豪爽，——德国人的语言，世界上唯一有特色的语言，和种族一样保持得那么纯粹的，——德国的女子，德国的美酒，德国的歌曲，……“德国，德国，在全世界德国都是高于一切！”

克利斯朵夫表示不服。莱哈脱太太跟着哄笑。他们三个一齐直着嗓子大叫大嚷，但还是很投机，因为他们知道彼此都是真正的德国人。

克利斯朵夫常常到这对新朋友家里去谈天，吃饭，和他们一起散步。丽丽·莱哈脱很宠他，替他做些很好的饭菜，很高兴能借此机会满足一下她自己的食欲。她在感情方面和烹调方面都体贴得不得了。庆祝克利斯朵夫生日的时候，她特意做了一块蛋糕，四周插着二十支蜡烛，中央用糖浇成一个希腊装束的肖像，手里抱着一束花，代表依斐日尼。克利斯朵夫虽然嘴里反对德国人，骨子里是十足地道的德国人，对她那股真情的不大高雅的表现大为感动。

至诚的莱哈脱夫妇还会想出更细腻的方法来证明他们的友情。只认识几个音符的莱哈脱，听了太太的主意，买了克利斯朵夫的二十本歌集，——（这是那出版家卖出的第一批货，）——分送给他各地教育界方面的熟人；他又教人寄了一部分给来比锡和柏林两地的书铺，那是他为了编教科书而有往来的。这种瞒着克利斯朵夫所做的又动人又笨拙的推销工作，暂时也并没一点儿效果。分散出去的歌集似乎不容易打出路来：没有一个人提到它。莱哈脱夫妇眼看社会这样冷淡非常伤心，觉得幸而没有把他们的举动告诉克利斯朵夫；否则非但不能使他安慰，反而要加增他的痛苦。可是实际上什么都会白费的，人生就不少这样的例子；任何努力决不落空。可能多少年的杳无音讯；忽然有一天你会发觉你的思想已经有了影响。克利斯朵夫的歌集就是这样的迈着小步，踏进了少数人士的心坎，他们孤零零的待在内地，或是因为胆小，或是因为打不起精神而没有对他说出他们的感想。只有一个人写信给他。在莱哈脱把集子寄出了三个月以后，克利斯朵夫收到一封挺客气的，热烈的，表示写的人非常感动的信，用的是老式的体裁，发信的地方是图林根邦的一个小城，署名是大学教授兼音乐导师彼得·苏兹博士。

那真使克利斯朵夫愉快极了，但他在莱哈脱家把搁在口袋里忘了好几天的信拆开来的时候，莱哈脱夫妇比他更愉快。他们一同看信。莱哈脱夫妇彼此丢着眼色，克利斯朵夫并没注意。当他时满脸春风，可是莱哈脱发见他把信念到一半忽而沉下脸来，停住了。

“嗯，干么你不念下去了？”他问克利斯朵夫。

克利斯朵夫把信往桌上一扔，愤愤的说：“嘿！岂有此理！”“怎么啦？”

“你去看吧！”

他背对着桌子，站在一边生气了。

莱哈脱和太太一起念着，看来看去全是些佩服到五体投地的话。

“怎么回事？我看不出呀……”

“你看不出？你看不出？……”克利斯朵夫嚷着，拿起信来送到他眼前，“难道你不识字吗？你没看出他也是个勃拉姆斯党吗？”

莱哈脱这才注意到：那位音乐导师的信里有一句话把克利斯朵夫的歌比之于勃拉姆斯的歌。克利斯朵夫叹道：“嘿！朋友！我总算找到了一个朋友……可是刚找到就失掉了！”

人家把他跟勃拉姆斯相比，他气死了。以他的脾气，他竟会马上写一封莽撞的复信去；最多在考虑之下，以为置之不理是最世故最客气的办法了。幸而莱哈脱一边笑他的生气，一边拦着他，不让他再胡闹。他们劝他写一封道谢的信。但这封信因为是不乐意写的，所以很冷淡很勉强。彼得·苏兹的热心可并不因之动摇，又写了两三封非常亲热的信来。克利斯朵夫对书翰一道素来不大高明；虽然感于对方的真诚而有点儿回心转意，他还是让他们的通信中断了。结果苏兹也没消息了。克利斯朵夫也忘了这件事。

现在他每天都看到莱哈脱夫妇，往往一天还看到好几次。晚上，他们差不多老在一起。孤独了一天之后，他生理上需要说些话，把心里想到的一齐倒出来，不管人家懂不懂，也需要嘻嘻哈哈笑一阵，不问笑得有理无理，他需要发泄，需要松动一下。

他弄点音乐给他们听：因为没有别的方法对他们表示感激，便几小时的坐在钢琴前面尽弹。莱哈脱太太完全不懂音乐，好不容易的压着自己，才不至于打哈欠；但因为她喜欢克利斯朵夫，也就装做很有兴趣。莱哈脱虽然并

不更懂，可对于某些音乐有种生理上的反应；那时他会受到剧烈的感动，甚至于眼泪都冒上来；他自己认为这种表示简直是胡闹。别的时候，可就毫无影响：他只听见一片喧闹的声音。一般而论，他为之感动的往往是作品中最平凡的部分，最无意义的段落。夫妻俩自命为了解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也很愿意这么相信。当然他常常存着俏皮的心跟他们开玩笑，弹些毫无价值的杂曲，教他们以为是他作的。等到他们大捧特捧的称赞完了，他才说出他的恶作剧。于是他们提防了；从此以后，只要他用着莫测高深的神气奏一个曲子，他们就疑心他又来捣鬼，便尽量加以批评。克利斯朵夫听任他们说，附和他们，说这种音乐的确不值一文，随后忽然哈哈大笑：

“哎，混蛋！你们说得一点不错！……这是我作的呀！”

他因为耍弄了他们而乐死了。莱哈脱太太有点儿生气，过来把他轻轻的打一下；但他那种天真的傻笑使他们也跟着笑起来。他们决不以为自己是不会错的。既然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他们就决定以后丽丽·莱哈脱永远管批评，她的丈夫永远管恭维：这样，他们可以有把握两人之中必有一个能合乎克利斯朵夫的意思了。

在他们眼里，克利斯朵夫的可爱倒并不在于他是音乐家，而是因为他忠厚老实，有点疯癫，可是诚恳，有朝气。人家说他的坏话反而增加他们对他的好感：他们像他一样给小城里的气氛闷得发慌，也像他一样的直爽，凡事要凭自己的头脑判断，所以他们拿他看做一个不懂世故的大孩子，吃了坦白的亏。

克利斯朵夫对两位新朋友并不抱什么幻想；他想到他们不了解——永远不能了解自己最深刻的一方面，觉得不胜怅惘。但他缺乏友谊而极需要友谊，所以他们能多少喜欢他已经使他感激不尽了。最近一年的经验告诉他不能再苛求。要是在两年以前，他决没有这种耐性。他想起对待可厌而善良的于莱一家多么严厉，不禁又后悔又好笑。哦！他居然学乖了！……他叹了口气，心里对自己说：“可是能有多久呢？”想到这个，他笑了笑，同时也觉得安慰了。

他多希望能有个朋友，一个懂得他而和他心心相印的朋友；可是他虽然年轻，对于社会已经有相当的经验，知道这种心愿是最不容易实现的，而他亦不能希求比以前的真正的艺术家更幸福。这一类的人的历史，他已经知道了一点。莱哈脱的藏书中，有一部分使他认识了十七世纪德国音乐家的艰苦的经历。那时战乱频仍，疫疾流行，家破国亡，整个民族受着异族的蹂躏，心灰意懒，既没有奋斗的勇气，对任何东西也没有兴趣，只希望早死以求安息；在这样的环境中，伟大的心灵——特别是英勇的旭兹，——始终不懈的趲奔着他的前程。克利斯朵夫想道：“看了这种榜样，谁还有抱怨的权利？他们没有群众，没有前途，只为了自己和上帝而写作。今天写的明天也许就会毁掉，可是他们继续写着；他们并不丧气，什么都不能动摇他们乐天的心情。他们只要能歌唱就满足了，只要能活着，能挣口苦饭，能把他们的思想在艺术上表现出来，找到两三个既不是艺术家，也不能了解他们的老实人真心的爱他们：除此以外对人生也就不再要求什么。——而他克利斯朵夫，怎么敢比他们更苛求呢？人生有个最低限度的幸福可以希冀，但谁也没权利存

按十七世纪正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时代，日耳曼各邦的政治情形极为混乱。

旭兹（1585—1672）在音乐史上被称为德国音乐的始祖。

什么奢望：你想多要一点幸福，就得由你自个儿去创造，可不能向人家要求。”

想到这些，他心平气和了，更喜欢那对老实的莱哈脱夫妇了。他万万没想到连这点儿最后的友情也得被人剥夺。

他没想到内地人的恶毒。他们的仇恨，因为是没有目标的，所以更消不掉。真有名目的仇恨，一朝达到了目的，恨意就会慢慢的解淡。但为了无聊而作恶的人是永远不肯罢休的，因为他们永远无聊。而克利斯朵夫便成了他们消闲的牺牲品。他固然被打倒了，但居然没有垂头丧气的表现。他固然不再麻烦人，但也不把人家放在心上。他一无所求，人家对他毫无办法。他和他的新朋友在一起很快活，会不理睬旁人对他作何感想，有何议论。这种情形教人看了有气。而莱哈脱太太教人更气。她不顾全城的清议而公然结交克利斯朵夫，就是和她平日的态度一样有心触犯舆论。丽丽·莱哈脱对人对事都没有惹是招非的意思；她不过独行其是，不问旁人的意见罢了。但这一点就是最可恶的挑衅。

大家暗中留神他们的行动。他们却毫不提防。克利斯朵夫是放肆惯的，莱哈脱太太是糊里糊涂的，他们一同出去的时候，或是晚上靠在阳台上谈笑的时候，都不知道顾忌。他们在举动方面非常亲热，不知不觉给了人造谣生事的材料。

一天早上，克利斯朵夫接到一封匿名信，卑鄙龌龊的说他是莱哈脱太太的情夫。他看着楞住了。他连跟她调情打趣的念头都从来没有；他太方正了，对奸淫像清教徒一样的痛恨，甚至想到这种事就受不了。欺侮朋友的妻子在他眼中是罪大恶极的行为；而对丽丽·莱哈脱，他尤其不可能犯这个罪：她长得一点儿不美，凭什么会引起他的热情呢？

他又羞又难堪的去看他的朋友，发觉他们也一样的局促不安。他们也每人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不敢说出来；三个人暗中互相留神，同时也留神自己，不敢随便有所动作，也不敢说话，慌慌张张的闹得很僵。要是丽丽·莱哈脱一时恢复了天真的本性，嘻嘻哈哈，胡说乱道的时候，她的丈夫或者克利斯朵夫会突然瞪他一眼，使她楞了一楞，马上想起匿名信的事而慌起来；克利斯朵夫和莱哈脱也跟着慌了。各人都在心里想：

“他们知道没有？”

他们彼此不露一点口风，竭力想过着从前一样的生活。

然而匿名信继续不断的来，而且措辞越来越下流，使他们骚乱不堪，屈辱得没法忍受。他们收到了就各自躲在一边，没有勇气原封不动的扔在火里，偏偏手指颤危危的拆开来，心惊肉跳的展开信纸，而一读到那些怕读到的字句，题目相同而内容略有变化的辱骂，——存心捣乱的人所造的荒唐无稽的谣言，都悄悄的哭了。他们想来想去也猜不出谁在那里跟他们缠绕不休。

有一天，莱哈脱太太痛苦得忍不住了，把她所受的迫害告诉了丈夫，而他也含着泪说他受着同样的痛苦。要不要告诉克利斯朵夫呢？他们不敢。可是总得通知他，要他谨慎一些才好。——莱哈脱太太红着脸才说了几个字，就大为奇怪的发觉，克利斯朵夫也一样的收到那些匿名信。人心险毒到这种死不放松的田地，使他们怕起来了。莱哈脱太太以为全城的人都在阴损他们。但他们非但不互相支持，反而都泄了气。他们不知道怎办。克利斯朵夫说要去砍掉那个人的脑袋。——但那个人是谁呢？而且也只能替造谣的人多添些资料……把那些信交给警察署罢，那更要把谣言传布出去……假作痴呆又不可能了。他们的友谊已经受了影响。莱哈脱绝对相信太太和克利斯朵夫都是

正人君子，可也不由自主的要猜疑了。他觉得这种猜疑是可耻的，荒唐的；他有心让太太和克利斯朵夫单独在一块儿。但他痛苦不堪；而丽丽也看得很明白。

在她那方面，情形可更糟。她和克利斯朵夫一样，从来没想到什么调情。然而那些谣言暗示她一种可笑的念头，以为克利斯朵夫也许真的爱着她；虽然他连一点儿表示都没有，她认为至少应当防卫一下，当然不是言语之间有什么明白的表示，而是用一些笨拙的方法；克利斯朵夫先还不懂，等到明白了，他可气坏了。那太胡闹了！说他会爱上这个又丑又平凡的小布尔乔亚！……而她竟相信这回事！……而他又没法辩白，没法对她和他的丈夫说：

“得了吧！你们放心！决没有这种危险的！……”

不，他不能得罪这一对好人。并且他觉得：她怕给他爱上，骨子里就因为她有点儿爱他的缘故；而这种荒唐的传奇式的念头，的确是那些匿名信种下的根。

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那么僵，那么难堪，继续不下去了。丽丽·莱哈脱只有嘴巴强，而没有坚强的性格，对着当地人士的阴险没了主意。他们想出种种藉口来避不见面，什么“莱哈脱太太不舒服……莱哈脱有事……他们上外埠去待几天……”等等，都是些笨拙的谎话，常常无意之中露出破绽来。

克利斯朵夫可比较痛快，他说：

“咱们分手吧，可怜的朋友们！咱们都不够强。”

莱哈脱夫妇一齐哭了。——但决绝之后，他们的确松了口气。

城里的人大可得意了。这一回克利斯朵夫的确是孤独了。大家剥夺了他最后呼吸到的一口气；——这口气便是温情，不论怎么淡薄，但少了它一个人的心就不能活的。

第三部 解 脱

他完全孤独了。所有的朋友都不见了。亲爱的高脱弗烈特，在艰难的时候帮助过他而他此刻极需要的，也一去数月，而且这一次是永远不回来的了。一个夏天的晚上，鲁意莎收到一封从很远的村子里寄来的信，字写得挺大，说她的哥哥死了，就葬在那边的公墓上。近年来他身体已经不行，可还是到处流浪，这一回就是在浪游的途中死在那个村上的。这个多有骨气而又多么恬静的人，原是克利斯朵夫最后一个朋友，他的温情——很可能给克利斯朵夫做个精神上的依傍的，——不幸被死亡吞掉了。他孤零零的守着只知道爱他而不了解他思想的老母。周围是德国的大平原，等于一片阴森森的海洋。他每次想跳出去，结果总是更往下沉。仇视他的小城眼睁睁的看着他淹在海里……

正在挣扎的时候，黑夜里忽然像闪电似的显出了哈斯莱的形象，那是他儿童时代多么爱慕，而现在已经名震全国的人物，他记起了当年哈斯莱答应过他的话，便立刻拚着最后的勇气想抓住那颗最后的救星。哈斯莱能够救他的，应当救他的！向他要求什么呢？不是援助，不是金钱，不是任何物质上的帮忙。只求他了解。哈斯莱像他一样的受过迫害。哈斯莱是个独往独来的人，一定能了解一个受着庸俗的德国人仇视与虐待的独往独来的人。他们都是一个阵营中的战士。

他一有这念头，便马上实行。他通知母亲要出门一星期，当夜就搭着火车往德国北部的大城出发，哈斯莱在那边当着乐队指挥。他不能再等了。这是为求生存的最后一次努力。

哈斯莱已经享了重名。他的敌人并没缴械；但他的朋友们大吹大擂的说他是古往今来最大的音乐家。其实拥护他的和否认他的都是一样荒谬的家伙。可是他没有坚强的性格，看到反对他的人他就气恼，看到捧他的人他就软化。他拿出全副精神专门做些伤害那般批评家和使他们痛心疾首的事，好比一个孩子专爱搅些捣乱的玩艺。但那些玩艺往往是最低级趣味的：他不但浪费天才在音乐上做些怪僻的东西，使德高望重的人发指；而且还故意采用荒唐的题材，暧昧的不雅的场面，总之只要是逆情背理的，伤害礼教的，他都特别喜欢。中产阶级疾首蹙额的一叫起来，他就乐了；而中产阶级永远识不破他的诡计。连那个像一般暴发户与诸侯那样喜欢冒充内行，干预艺术的德皇陛下，也把哈斯莱的享有盛名认为社会之羞，处处对他无耻的作品表示轻蔑与冷淡。哈斯莱看到帝王的轻蔑觉得又气又高兴，因为德国前进派的艺术界认为官方的反对就是证明自己的前进，所以哈斯莱捣乱得更有力了。他闹一次骇人听闻的事，朋友们就喝一次彩，说他是天才。

哈斯莱的帮口，主要是一般文学家，画家，颓废的批评家组成的，他们代表革命派对反动派——（它们在德国北部一向势力很雄厚）——的斗争，对冒充的虔诚和国定礼教的斗争，在这方面他们当然是有功的；但斗争的时候，他们独立不羁的精神往往过于激昂，不知不觉的到了可笑的地步；因为他们之中即使有些人不乏相当粗豪的才具，总嫌不够聪明，而见识与趣味尤其不高明。他们制造了虚幻的境界把自己关在里头跳不出来；并且和所有的艺术党派一样，结果对实际的人生完全隔膜了。他们替自己，替上百个读他们的出版物，盲目的相信他们的傻瓜，定下规律。这帮口的吹捧对哈斯莱是致命伤，使他过分的自得自满。他脑子里想到什么乐思，就不加考虑地接受；他暗中认为便是他写的东西够不上自己的标准，比别的音乐家已经高明多

了。固然他这种看法往往是不错的，但决不是一种健全的看法，同时也不能使他产生伟大的作品。哈斯莱骨子里是不分敌友，对谁都瞧不起，结果对自己对人生也取了这种轻视与冷嘲热讽的态度。因为他从前相信过不少天真与豪侠的事，所以一旦失望，他更加往讥讽与怀疑的路上走。既没有勇气保护他的信念不受时间一点一滴的磨蚀，也不能自欺欺人，自以为还相信他早已不信的东西，他便尽量嘲笑自己过去的信念。他有种德国南方人的性格，贪懒，软弱，担当不起极端的好运或厄运，太热与太冷，他都受不了，他需要温和的气候维持精神上的平衡。他不知不觉的只想懒懒的享受人生：好吃好喝，无所事事，想些萎靡不振的念头。他的艺术也沾染了这种气息，虽然因为他才气纵横，便是在迎合时流的颓废作品中也藏不住光芒。他对自己的没落比谁都感觉得更清楚。老实说，能感觉到的只有他一个人；而那种时间是少有的，并且是他竭力避免的。那时他就变得悲观厌世，心绪恶劣，只想着自私的念头，担忧自己的健康，——而对于从前引起他热情或厌恶的东西漠不关心了。

克利斯朵夫想来向他求一点鼓励的便是这样一个人物。在一个下着冷雨的早晨，来到哈斯莱住的城里的时候，克利斯朵夫抱着不知多大的希望。他认为这个人物在艺术界是独立精神的象征，指望从他那儿听到些友善的勉励的话，使自己能继续那毫无收获而不可避免的斗争，那是一切真正的艺术家和社会的斗争，一息尚存决不休止的斗争。席勒说过：“你和群众的关系，唯有斗争是不会使你后悔的。”

克利斯朵夫性急到极点，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旅店中丢下了行李，立刻奔到戏院去探问哈斯莱的住址。他住在离开城区相当远的地方，在郊外的一个小镇上。克利斯朵夫一边啃着一个小面包，一边搭上电车。快到目的地的时候，他的心不由得跳起来。

在哈斯莱所住的区域内，奇形怪状的新建筑触目皆是；现代的德国尽量在这方面运用渊博的学问，创造一种野蛮的艺术，以勾心斗角的人工来代替天才。在谈不到什么风光的小镇上，在笔直的平板的道路中，出人不意的矗立着埃及式的地窖，挪威式的木屋，寺院式的回廊，有雉堞的堡垒，万国博览会会场式的建筑；大肚子的屋子没头没脚的深深的埋在地下，死气沉沉的面目，睁着一只巨大的眼睛，地牢式的铁栅，那种潜水艇上的门，窗的栏杆上嵌着金字，大门顶上蹲着古怪的妖魔，东一处西一处的铺着蓝珧琅的地砖，都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五光十色的碎石拼出亚当与夏娃的图像，屋顶上盖着各种颜色的瓦；还有堡垒式的房屋，屋脊上砌着奇形怪状的野兽，一边完全没有窗，一边是一排很大的洞，方形的，矩形的，像伤疤一般，一堵空无所有的大墙，忽然有些野蛮人的雕像支着一座很大的阳台，上边只开一扇窗，阳台的石栏杆内探出两个有胡子的老人头，鲍格林画上的人鱼。在这些监狱式的屋子中间，有一所门口雕着两个其大无比的裸体像，低矮的楼上，外边刻着建筑师的两行题辞：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艺术家显示他的新天地！

克利斯朵夫一心一意想着哈斯莱，对这些只睁着惊骇的目光瞧了瞧，无心去了解。他找到了哈斯莱的住处，那是最朴实的一所屋子，加洛冷式的建

筑。内部很华丽，俗气；楼梯道有一股温度太高的气味；克利斯朵夫放着一座狭窄的电梯不用，宁可两腿哆嗦着，心跳动着，迈着细步走上四楼，因为这样可以定定神去见这位名人。在这短短的途中，从前和哈斯莱的相见，童年时代的热情，祖父的形象，都一一回到记忆中来，仿佛只是昨天的事。

他去按铃的时候已经快到十一点。应门的是一个精神抖擞的女仆，颇像管家妇模样，很不客气的把他瞧了一眼，先是说“先生不见客，他很累。”随后，大概是克利斯朵夫脸上那种天真的失望的神气使她觉得好玩，所以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之后，忽然缓和下来，让克利斯朵夫走进哈斯莱的书房，说她去想办法教先生见客。她说完眨了眨眼睛，关上门走了。

壁上挂着几幅印象派的画，和法国十八世纪的描写风情的镂版画：哈斯莱自命为对各种艺术都是内行，听了他小圈子里的人的指点，从玛奈到华多都有收藏。这种混杂的风格也可以从家具上看出来，一张极美的路易十五式的书桌周围，摆着几张“新派艺术”的沙发，一张东方式的半榻，花花绿绿的靠枕堆得像山一样高。门上都嵌着镜子；壁炉架中央摆着哈斯莱的胸像，两旁和骨董架上放着日本小骨董。独脚的圆桌上，一只盘里乱七八糟散着一大堆照片，有歌唱家的，有崇拜他的妇女们的，有朋友们的，都写着些警句和措辞热烈的题款。书桌上杂乱不堪；钢琴打开着；骨董架上全是灰。到处扔着烧掉一半的雪茄烟尾……

克利斯朵夫听见隔壁屋里有一阵不高兴的古噜声；女仆扯着尖嗓子在那里跟他拌嘴。那分明是哈斯莱不愿意见客，也分明是女仆非要他见客不可；她毫不客气的用着狎习的语气跟他顶撞，尖锐的声音隔着一间屋还能听到。她埋怨主人的某些话使克利斯朵夫听了很窘，主人可并不生气。相反，这种放肆的态度仿佛使他觉得好玩：他一边叽咕，一边逗那个女孩子，故意惹她冒火。终于克利斯朵夫听到开门声，哈斯莱拖着有气无力的脚步走过来了。

他进来了。克利斯朵夫忽然一阵难过。他认得是他。怎么会不认得呢？明明是哈斯莱，可又不是哈斯莱。宽广的脑门上依旧没有一道褶裥，脸上依旧没有一丝皱纹，像孩子的脸，可是头已经秃了，身上发胖了，皮色发黄了，一副瞌睡的神气，下嘴唇有点儿往下掉，撅着嘴巴，好似挺不高兴。他驼着背，两手插在打结的上衣袋里；脚下曳着一双旧拖鞋，衬衣在裤腰上面扭做一团，钮扣也没完全扣好。克利斯朵夫嘟囔着向他通报姓名，他却睁着没有光彩的倦眼瞧着他，机械的行了个礼，一声不出，对着一张椅子点点头教克利斯朵夫坐下；接着他叹了口气，往半榻上倒下身子，把靠枕堆在自己周围。克利斯朵夫又说了一遍：

“我曾经很荣幸的……你先生曾经对我一番好意……我是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哈斯莱埋在半榻里促膝而坐，右边的膝盖耸得跟下巴一样高，一双瘦削的手勾搭着放在膝盖上。他回答说：

“想不起。”

克利斯朵夫喉咙抽搐着，想教他记起他们从前会面的经过。要克利斯朵夫提到这些亲切的回忆原来就不容易，而在这种情形之下尤其使他受罪：他话既说不清，字又找不到，胡言乱语，自己听了都脸红了。哈斯莱让他支吾其词，只用着那双心不在焉的淡漠的眼睛瞪着他。克利斯朵夫讲完了，哈斯莱把膝盖继续摇摆了一会，仿佛预备克利斯朵夫再往下说似的。随后，他回

答：“对……可是这些话并不能使我们年轻啊……”

他欠伸了一会，打了个呵欠：“对不起……没睡好……昨天晚上，在戏院里吃了宵夜……”他说着又打了个呵欠。克利斯朵夫希望哈斯莱提到他刚才讲过的事；但哈斯莱对那些往事一点也不感兴趣，连一个字也没提，也不问一句克利斯朵夫的生活情形。他打完了呵欠，问：

“你到柏林很久了吗？”

“今天早上才到。”

“啊！”哈斯莱除了这样叫一声，也没有别的惊讶的表示。“什么旅馆？”说完他又不想听人家的回答，只懒懒的抬起身子，伸手去按电铃：

“对不起，”他说。

矮小的老妈子进来了，始终是那副放肆的神气。

“凯蒂，”他说，“难道你今天要取消我一顿早饭吗？”“您在会客，我怎么能端东西来呢？”她回答。

“干么不？”他一边说一边俏皮的用眼睛瞟了瞟克利斯朵夫。“他喂养我的思想；我喂养我的身体。”

“让人家看着您吃东西，像动物园里的野兽一样，您不害羞吗？”

哈斯莱非但不生气，反而笑起来，改正她的句子：“应当说像日常生活中的动物……”他又接着说：“拿来罢，我只要吃早饭，什么难为情不难为情，我才不管呢。”

她耸耸肩退出去了。

克利斯朵夫看到哈斯莱老不问起他的工作，便设法把谈话继续下去。他说到内地生活的苦闷，一般人的庸俗，思想的狭窄，自己的孤独。他竭力想把自己精神上的痛苦来打动他。可是哈斯莱倒在半榻上，脑袋倚着靠枕往后仰着，半阖着眼睛，让他自个儿说着，仿佛并没有听；再不然他把眼皮撑起一忽儿，冷冷的说几句挖苦内地人的笑话，使克利斯朵夫没法再谈更亲密的话。——凯蒂捧了一盘早餐进来了，无非是咖啡，牛油，火腿等等。她沉着脸把盘子放在书桌上乱七八糟的纸堆里。克利斯朵夫等她出去了，才继续他痛苦的陈诉，而那又是极不容易说出口的。

哈斯莱把盘子拉到身边，倒出咖啡，呷了几口；接着他用一种又亲热，又随便，又有点儿轻视的神气，打断了克利斯朵夫的话。“也来一杯吧？”

克利斯朵夫谢绝了。他一心想继续没有说完的句子，但越来越丧气，连自己也不知说些什么。看着哈斯莱吃东西，他的思路给扰乱了。对方托着碟子，像孩子一样拚命嚼着牛油面包，手里还拿着火腿。可是他终究说出他作着曲子，说人家演奏过他为赫白尔的《于第斯》所作的序曲。哈斯莱心不在焉的听着，忽然问：“什么？”

克利斯朵夫把题目重新说了一遍。

“啊！好！好！”哈斯莱一边说，一边把面包跟手指一齐浸在咖啡杯里。他的话只此一句。

克利斯朵夫失望之下，预备站起身来走了；但一想到这个一无结果的长途旅行，他又鼓起余勇，嘟囔着向哈斯莱提议弹几阕作品给他听。哈斯莱不等他说完就拒绝了：

“不用，不用，我对这个完全外行，”他说话之间大有咕噜，挖苦和侮辱人的意味。“并且我也没有时间。”

克利斯朵夫眼泪都冒上来了。可是他暗暗发誓，没有听到哈斯莱对他的

作品表示意见，决不出去。他又惶愧又愤怒的说道：

“对不起；从前你答应听我的作品；我为此特意从内地跑来的，你一定得听。”

没见惯这种态度的哈斯莱，看到这楞头傻脑的青年满脸通红，快要哭出来了，觉得挺好玩，便无精打采的耸耸肩，指着钢琴，用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气说：

“那末……来吧！”

说完他又倒在半榻上，仿佛想睡一觉的样子，用拳头把靠枕捶了几下，把它们放在他伸长的胳膊下面，眼睛闭着一半，又睁开来，瞧瞧克利斯朵夫从袋里掏出来的乐谱有多少篇幅，然后他轻轻叹了口气，准备忍着烦闷听克利斯朵夫的曲子。

克利斯朵夫看到这种态度又胆小又委屈，开始弹奏了。哈斯莱不久便睁开眼睛，竖起耳朵，像一个艺术家听到一件美妙的东西的时候一样，不由自主的提起了精神。他先是一声不出，一动不动；但眼睛不像先前那么没有神了，掀起的嘴唇也动起来了。不久他竟完全清醒过来，叽叽咕咕的表示惊讶跟赞许，虽然只是些闷在喉咙里的惊叹辞，但那种声音绝对藏不了他的思想，使克利斯朵夫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哈斯莱不再计算已经弹了多少，没有弹的还有多少。克利斯朵夫弹完了一段，他就嚷：

“还有呢？……还有呢？”

他的话慢慢的有了人味儿了：

“好，这个！好！……妙！……妙极了……该死！”他嘟囔着，非常惊讶。“这算什么呢？”

他坐起来，探着脑袋，把手托着耳朵，自言自语的，满意的笑着；听到某些奇怪的和声，他微微伸出舌头，好像要舔嘴唇似的。一段出其不意的变调使他突然叫了一声，站了起来，跑到钢琴前面挨着克利斯朵夫坐下，他仿佛不觉得有克利斯朵夫在场，只注意着音乐。曲子完了，他抓起乐谱，把刚才那页重新看了一遍，接着又看了以后的几页，始终自言自语的表示赞美和惊讶，好像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

“怪了！……亏他想出来的，这家伙！……”

他把克利斯朵夫挤开了，自己坐下来弹了几段。在钢琴上，他的手指非常可爱，又柔和，又轻灵。克利斯朵夫瞧着他保养得挺好的细长的手，带点儿病态的贵族气息，跟他身体上别的一部分不大调和。哈斯莱弹到某些和弦停住了，反复弹了几遍，眯着眼睛，卷着舌头发出的的笃笃的声音，又轻轻学着乐器的乐响，一边照旧插几个惊叹辞，表示又高兴又遗憾：他不由得暗中气恼，有种下意识的嫉妒，而同时也感到非常快乐。

虽然他老是个儿在说话，好像根本没有克利斯朵夫这个人，克利斯朵夫却高兴得脸红了，不免把哈斯莱的惊叹辞认为对自己发的。他解释他的旨趣。先是哈斯莱没留神他的话，只顾高声的自言自语；后来克利斯朵夫有几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就不作声了，眼睛老盯着乐谱，一边翻着一边听着，神气又像并不在听。克利斯朵夫越来越兴奋，终于把心里的话全说了出来：他天真的，激昂的，谈着他的计划和生活。

哈斯莱不声不响，又恢复了含讥带讽的心情。他让克利斯朵夫把乐谱从他手里拿了回去：肘子撑在琴盖上，手捧着脑门，望着克利斯朵夫，听他凭着少年人的热情与骚动解释作品。于是他想着自己早年的生活，想着当年的

希望，想着克利斯朵夫的希望和在前面等着他的悲苦，不禁苦笑起来。

克利斯朵夫老在那里说着，低着眼睛，生怕找不到话接上去。哈斯莱的静默使他胆子大了些。他觉得对方在打量他，一句不漏的听着他；仿佛他们中间冰冷的空气给他融化了，他的心放出光来了。说完之后，他怯生生的，同时也很放心的，抬起头来望望哈斯莱。不料他看到的又是一双没有神的，讥讽的，冷酷的眼睛在那里瞪着他，心中才开始的那点儿喜悦，像生发太早的嫩芽一般突然给冻坏了。他马上把话打住了。

默然相对了一会，哈斯莱开始冷冷的说话了。这时他又拿出另外一种态度，对克利斯朵夫非常严厉，毫不留情的讥讽他的计划，讥讽他的希望成功，好似自嘲自讽一样，因为他在克利斯朵夫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他狠命的摧毁克利斯朵夫对人生的信念，对艺术的信念，对自身的信念。他不胜悲苦的拿自己做例子，痛骂自己的近作：

“都是些狗屁不通的东西！为那般狗屁不通的人只配这种东西。你以为世界上爱音乐的人能有十个吗？唉，有没有一个都是疑问！”

“有我啊！”克利斯朵夫兴奋的嚷着。

哈斯莱瞧着他，耸耸肩，有气无力的回答说：

“你将来也会跟别人一样，只想往上爬，只想寻欢作乐，跟别人一样……而这个办法是不错的……”

克利斯朵夫想和他辩；可是哈斯莱打断了他的话，拿起他的乐谱，把刚才赞扬的作品加以尖刻的批评。他不但用难听的话指摘青年作家没留意到的真正的疏忽，写作的缺点，趣味方面或表情方面的错误；并且还说出许多荒谬的言论，和使哈斯莱自己受尽痛苦的，那般最狭窄最落伍的批评家说的一模一样。他问这些可有什么意思。他简直不是批评，而是否定一切了：仿佛他恨恨的要把先前不由自主感受的印象统统抹掉。

克利斯朵夫失魂落魄，不想回答了。在一个你素来敬爱的人的嘴里，听到那些令人害臊的荒唐的话，你又怎么回答呢？何况哈斯莱什么话都不愿意听。他站在那儿，手里拿着阖上的乐谱，睁着惘然失神的眼睛，抿着嘴巴。末了，他好似又忘了克利斯朵夫：

“啊！最苦的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了解你！”

克利斯朵夫激动到极点，突然转过身来把手放在哈斯莱的手上，抱着一腔热爱，又说了一遍：“有我呢！”

可是哈斯莱的手一动也不动；即使这青年的呼声使他的心颤动了一刹那，但瞅着克利斯朵夫的那双黯淡的眼睛并没露出一点儿光彩。讥讽与自私的心绪又占了上风。他把上半身微微欠动一下，滑稽的行了个礼，回答说：“不胜荣幸！”

他心里却想道：“哼！那我才不在乎呢！难道为了你，我就白活一辈子吗？”

他站起身来，把乐谱往琴上一丢，拖着两条摇晃不定的腿，又回到半榻上去了。克利斯朵夫明白了他的思想，感到了其中的隐痛，高傲的回答说，一个人用不着大家了解，有些心灵抵得上整个的民族；它们在那里代替民族思想；它们所想的東西，将来自会由整个民族去体验。——可是哈斯莱已经不听他的话了。他回复了麻痹状态，那是内心生活逐渐熄灭所致的现象。身心健全的克利斯朵夫是不会懂得这种突然之间的变化的，他只模模糊糊的觉得这一下是完全失败了；但在差不多已经成功的局面之后，他一时还不肯承

认失败。他作着最后的努力，想把哈斯莱重新鼓动起来：他拿着乐谱，解释哈斯莱所挑剔的某些不规则的地方。哈斯莱却埋在沙发里，始终沉着脸一声不出，他既不首肯，也不反对：只等他说完。

克利斯朵夫明明看到留下来没有意思了，一句话说了一半就停住。他卷起乐谱，站起身子。哈斯莱也跟着站起。胆怯而惶愧的克利斯朵夫嘟嘟囔囔的表示歉意。哈斯莱微微弯了弯腰，用着高傲而不耐烦的态度伸出手来，冷冷的，有礼的，送他到大门口，没有一句留他或约他再来的话。

克利斯朵夫回到街上，失魂落魄。他往前走着，糊里糊涂走过了两三条街，又到了来时下车的站头。他搭上电车，根本不知自己做些什么。他倒在凳上软瘫了，手臂，大腿，都好像折断了。不能思索，也不能集中念头：他简直一无所思。他怕看自己的内心。因为内心只有一片空虚。在他四周，在这个城里，到处都是空虚，他连气也喘不过来：雾气跟高大的屋子使他窒息。他只想逃，逃，越快越好，——仿佛一离开这儿就能丢下他在这儿遇到的悲苦的幻灭。

回到旅馆，还不到十二点半。他来到这个城里只有两小时，——那时他心里是何等光明！——现在一切都是黑暗了。

他不吃中饭，也不进房间，径自向店里要了帐单，付了一夜的租金，说要动身了：店主人听了大为奇怪，告诉他不用这么急，他要搭的火车还有几个钟点才开呢，不如在旅馆里等。他可执意要立刻上车站去搭第一班开的车，不管是什么车，在这儿连一小时也不愿意多待了。他花了一笔钱老远跑来，原想大大的乐一下的，除了访问哈斯莱，还想去参观博物院，上音乐会，认识几个人，——而今他唯一的念头只有动身两个字了……

他回到车站，正如人家告诉他的，他要搭的火车要三点钟才开。而且那班既非快车，（因为克利斯朵夫只能坐最低的等级，）——路上还要随时停留；还不如搭迟开两小时而中途赶上前一班的车。但要在这儿多留两小时，克利斯朵夫就受不住。他甚至在等车的期间也不愿意走出车站。——多凄凉的等待！在那些空荡荡的大厅上，闹轰轰的，阴沉沉的，全是些不关痛痒的陌生面孔，匆匆忙忙，连奔带跑的进进出出，没有一张认识的，友善的脸。黯淡的天色黑下来了。给浓雾包围着的电灯，在黑暗中好似一点点的污渍，使阴暗显得更阴暗。越来越闷塞的克利斯朵夫，等着开车的时间，五内如焚。他每小时要把火车表看上十多次，唯恐弄错了。有一次他为了消磨时间，从头至尾又看一遍，冷不防有一个地名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觉得这个地方是认得的，过了一会想起那是给他写过多亲热的信的苏兹的住处。他那时正心神无主，忽然想去拜访这位陌生朋友了。那地方并不在他回去的路上，而是要再搭一二小时的区间车，在路上过一夜，换两三次车，中间还不知要等多多少时候。克利斯朵夫可完全不计算这些，马上决定了：他的本能非要找些同情的慰藉不可，便不假思索，拟了一通电报打给苏兹，告诉他明天早上到。但电报才发出，他已经后悔了。他很懊恼的笑自己老是有幻想。干么再要去找新的烦恼呢？——可是事情已经定了，要改变主意也来不及了。

在最后一部分等车的时间，他就想着这些念头。车终于挂好了，他第一个上去；他的孩子气使他直等到车子开了，从车门里望见下着阵雨的灰色的天空下面，城市的影子慢慢在黑夜中消失了。方始能痛痛快快的呼吸。他觉得要是在这里住上一晚的话，简直会闷死的。

正在这个时候，——下午六点光景，——哈斯莱有封信送到克利斯朵夫

的旅馆。克利斯朵夫的访问惹起了他许多感触，整个下午都不胜懊丧的想着，他对于这个怀着一腔热情来看他，而竟受他那么冷淡的可怜的青年，并非没有好感。他后悔自己的态度。其实他是常常这样心血来潮的闹脾气的。为了挽救一下，他送了一张歌剧院的门票去，又附了一张便条，约他在完场以后见面。——克利斯朵夫对这些事当然一点不知道。哈斯莱看见他没来就心里想：

“他生气了。那末就算了！”

他耸耸肩，也不再往下追究。第二天，一切都忘了。第二天，克利斯朵夫和他已经离得很远，——远得连一辈子也不会再见了。而他们俩也永远的孤独下去了。

彼得·苏兹已经七十五岁。他身体非常衰弱，而且那么大一把年纪也不饶人的。个子相当高大，驼着背，脑袋垂在胸前，支气管很弱，呼吸很困难。气喘，鼻粘膜炎，支气管炎，老是和他纠缠不清；那张不留胡子的瘦长脸刻画着痛苦的皱褶，很鲜明的显出他和病魔苦斗的痕迹，半夜里常常需要在床上坐起来，身体向前弯着，流着汗，拚命想给他快要窒息的肺吸收些空气进去。他鼻子很长，下端有点儿臃肿。深刻的皱痕在眼睛下面就一道一道的从横里把腮帮分成两半，而腮帮也因为牙床骨瘪缩而陷了下去。塑成这张衰败零落的面具的，还不只是年龄与疾病；人生的痛苦也有份儿。虽然如此，他并不忧郁。神态安详的大嘴巴表示他是个仁厚长者。但使老人的脸显得和蔼可亲的，特别是那双清明如水的淡灰眼睛，永远从正面看着你，那么安静，那么坦白，没有一点儿隐藏，你仿佛可以看到他的心。

他一生没有经过多少事，独身已有多多年，太太早死了。她性情不太好，人也不大聪明，长得一点不美。但他想起她的时候，心里还是对她很好。她死了有二十五年：二十五年到现在，他每晚睡觉以前，总得和她默默的作一番凄凉而温柔的谈话，他每天都像是和她一起过活的。他没有孩子，那是他的终身恨事。他把感情移在学生身上，对他们的关切不下于父亲对儿子。人家可并没怎么报答他。老人的心很能接近年轻人的心，甚至自以为并不比他们的更老：他觉得所差的年岁根本算不了什么。然而年轻人并不这样想，认为老年人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并且他眼前需要操心的事太多了，本能的不愿意去看自己忙了一世以后的可悲的下场。偶尔有些学生，看到苏兹老人对他们的祸福那么关心，也不由得很感激，不时来问候他；离开了大学，他们还写信来道谢，有几个在以后几年中还跟他通信。然后，老人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只有在报纸上知道这个有了发展，那个有了成绩，觉得非常安慰，他们的成就仿佛就是他的成就。他也不怪怨他们不通音信：原谅他们的理由多的是，他决不怀疑人家的感情，甚至以为那些最自私的学生也有像他们对他们一样的感情。

但他精神上最好的避难所还是书本：它们既不会忘了他，也不会欺骗他。他在书本中敬爱的心灵现在已经超脱了时间的磨蚀，它们所引起而它们自己也似乎感受到的爱，还有它们像阳光一般布施给人家的爱，都是亘古常存，不会动摇的了。苏兹的美学兼音乐史教授，他好比一个古老的森林，在心中千啼百啭的全是禽鸟的歌声。这些歌有的是极远极远的，从几世纪以前传过来的，但亦不灭其温柔与神秘。有的对他比较更熟更亲切，那是些心爱的伴侣，每一句都使他想起悲欢离合的往事，所牵涉到的生活有的是有意识的，有的是无意识的：——（因为在太阳照耀的岁月下面，还有被无名的光照着

的别的岁月。)——最后还有些从来没听到过的,说着大家企待已久而极感需要的话:那时听的人就会打开心来欢迎它们,像大地欢迎甘霖一样。苏兹老人就是这样的在孤独生活中听着群鸟歌唱的森林,像传说中的隐士一般,被神奇的歌声催眠了,而岁月悠悠,慢慢的流到了生命的黄昏;可是他的心始终和二十岁的时候一样。

他精神上的财富不限于音乐。他也爱好诗人,——不分什么古人近人。他比较更喜欢本国的诗,尤其是歌德的,但也爱好别国的。他很博学,精通好几国文字。他思想上是和埃尔特与十八世纪末期的“世界公民”同时代的。他经历过一八七一年前后的艰苦的斗争,受过那时代波澜壮阔的思想的熏陶;但他虽然崇拜德国,可并不是一个“骄傲的人”。他像埃尔特一样的认为:“在所有骄傲的人里头,以自己的国家来炫耀的人尤其荒谬绝伦”,也像席勒一样的认为“只为了一个民族而写作是最可怜的理想”。他的思想有时候是懦弱的,但胸襟是宽大的,对于世界上一切美妙的东西随时都能热心接受。他也许对庸俗的东西过于宽容,但他的本能决不会错过最优秀的作品;要是他没有勇气指斥舆论所捧的虚伪的艺术家,可永远有勇气替那些公众不了解的杰出而强毅的人辩护。他往往受好心的累,唯恐对人不公平;大家喜欢的作品,他要是不喜欢的话,他一定认为错在自己,终于也把那作品爱上了。他觉得爱是世界上最甜蜜的事。他精神上需要爱,需要钦佩,比他可怜的肺需要空气更迫切。所以,凡是给他有个爱的机会的人,他真是感激到极点。——克利斯朵夫万万想象不到他的歌集对他所发生的作用。他自己写作的时候所感到的情绪,还远不及这位老人所感到的那么生动,那么真切。因为在克利斯朵夫,这些歌仅仅是内心的炉灶里爆发出来的几点火星而已,它还有别的东西要放射;可是苏兹老人等于忽然发见了整个的新天地,等他去爱的新天地。而这个天地的光明把他的心给照亮了。

一年以来,他不得不辞退大学教席;一天坏似一天的身体不容许他再继续授课。正当他躺在床上闹病的时候,书商华尔夫照例派人送来一包新到的乐谱,其中就有克利斯朵夫的歌集。他单身住着,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几个少数的家属久已死了,只有一个年老的女仆照料。而她欺他病弱,每样事都自作主张。两三个和他一样高年的朋友不时来瞧瞧他;但他们身体也不大行,气候不好的时节也躲在家里,疏于访问了。那时正是冬季,街上盖满着正在溶化的雪:苏兹整天没看到一个人。房里很黑,窗上蒙着一层黄色的雾,像幕一样的挡住了视线,炉子烧得挺热,教人累得很。邻近的教堂里,一座十七世纪的古钟每刻钟奏鸣一次,用那种高低不匀,完全不准的声音唱着赞美诗中的断片零句,快乐的气息听来非常勉强,尤其在你心里不高兴的时候。老苏兹背后垫着一大堆靠枕咳个不停。他拿着一向喜欢的蒙丹的集子想念下去,但今天念起来不像平时那么有味,就让书本在手里掉了下去。他喘着气,呼吸很困难,出神似的在那里幻想。送来的乐谱放在床上,他没勇气打开来,只觉得心里很悲伤。终于他叹了口气,仔细解开绳子,戴上眼镜,开始读谱了。但他的心在别处,老想着排遣不开的往事。

他一眼瞥见一支古老的赞美歌,那是克利斯朵夫采用一个诚朴虔敬的诗人的辞句,而另外加上一种新的表情的,原作是保尔·琪哈脱的基督徒流浪曲:

希望罢,可怜的灵魂,

希望之外还得强毅勇猛！

.....

等待啊，等待：

你就会看到

欢乐的太阳！

这些赞美歌的辞句是老苏兹熟悉的，但他从来没听见这种口吻.....那已经不是单调到使你心灵入睡的，恬淡而虔敬的情绪，而是像苏兹的心一样的心，比他的更年轻更坚强的心，在那里受着痛苦，存着希望，希望看到欢乐，而真的看到了。他的手索索的抖着，大颗的泪珠从腮帮上淌下。他又往下念：

起来罢，起来！跟你的痛苦，
跟你的烦恼，说一声再会！
让它们去罢，一切烦恼你的心灵，
使你悲苦的东西！

克利斯朵夫在这些思想中间渗入一股年轻的刚强的热情，而在最后几句天真而充满着信念的诗中，还有他的英雄式的笑声：

统治一切、领导一切的
不是你，而是上帝。
上帝才是君王，
才能统治一切，统治如律！

还有一节睥睨一切的诗句，是克利斯朵夫逞着少年的狂妄，从原诗中摘出来做他的歌的结论：

即使所有的妖魔反对，
你也得镇静，不要怀疑！
上帝决不会退避！
他所决定的总得成功，
他要完成的总得完成，
他会坚持到底！

.....然后是一片轻快的狂热，战争的醉意，好似古罗马皇帝的凯旋。

老人浑身打战，气吁吁的追随着那激昂慷慨的音乐，有如儿童给一个同伴拉着手往前飞奔。他心跳着，流着泪，嘟嘟囔囔的嚷着：

“啊！我的天！.....啊！我的天！.....”

他又哭，又笑。他幸福了，窒息了。接着来了一阵剧烈的咳呛。老妈子莎乐美跑来，以为老人要完了。他继续哭着，咳着，嘴里叫着：“啊！我的天！.....啊！我的天！.....”而在短促的换口气的时间，在两阵咳呛的过渡期间，他又轻轻的尖声笑着。莎乐美以为他疯了。等到她弄明白了这次咳呛的原因，就很不客气的埋怨他：

“怎么能为了这种鬼事而搅成这副模样！把这个给我！让我拿走。不准再看。”

但老人一边咳着一边不肯让步，大声叫莎乐美别跟他烦。因为她还是和他争，他就勃然大怒，发誓赌咒，闹得气都喘不过来。她从来没看见他生这么大的气，敢和她这样顶撞。她楞了一楞，不禁把手里抓着东西放下了；可是她恶狠狠的把他数说了一顿，拿他当老疯子看待，说她一向认为他是个有教养的人，现在才知道看错了，他居然说出连赶车的也要为之脸红的咒骂，眼睛差点儿从头里爆出来，倘使那是两支手枪的话，还不早要了她的命！……要不是苏兹气得从枕上抬起身子大叫一声“出去！”她尽可以这样的唠叨下去。可是主人那种斩钉截铁的口气，使她出去的时候把门大声碰了一下，说从此以后尽管他叫她，她也不愿意劳驾的了，他要死过去，她也不管了。

于是，一点点黑起来的屋子里又安静了。钟声在平静的黄昏中又响起来，依旧是那种平板的，可笑的声音。老苏兹对刚才的发怒有点惭愧，一动不动的仰天躺着，气吁吁的，等心里的骚动平下去；他把心爱的歌集紧紧搂在怀里，像孩子一般的笑着。

一连好几天，他好像出神了。他再也不想到他的疾苦，不想到冬天，不想到黯淡的日色，不想到自己的孤独。周围一切都是爱，都是光明。在行将就木的年龄，他觉得自己在一个陌生朋友的年轻的心中再生了。

他竭力想象克利斯朵夫的相貌，可始终不是他的真面目。他把克利斯朵夫想象得像他自己喜欢长的模样：淡黄的头发，瘦削的身材，蓝眼睛，声音很轻，好像蒙着一层什么似的，性格和平，温柔，胆小。并且不管他究竟长得怎么样，他总是预备把他理想化。凡是周围的人：学生，邻居，朋友，老妈子，他都把他们理想化。他的仁厚跟不会批评的脾气——一半也是故意的，因为这样才好减少烦恼，——在周围造成了许多清明纯洁的面目，跟他自己的一样。那是他的善心扯了谎，没有它，他就活不了。但他也并不完全受这些谎话的骗；夜里躺在床上时，他往往叹着气想到白天无数的小事情，都是跟他的理想抵触的。他明知莎乐美在背后跟邻舍街坊嘲笑他，在每周的账目上有规则的舞弊。他明知学生们用到他的时候对他恭而敬之，利用完了就把他置之脑后。他明知大学里的同事们从他退职以后把他完全忘了，他的后任剽窃他的文章而根本不提他的名字，或是提到他的名字而引他的一句毫无价值的话，挑他的眼儿：——这种手段在批评界中是惯用的。他知道他的老朋友耿士今天下午又对他扯了一个大谎，也知道另外一个朋友卜德班希米脱借去看几天的书是永远不会还他的了，——那对一个爱书本像爱真人一般的人是非常痛苦的。还有许多别的伤心事，新的旧的，都常常浮到他脑子里来；他不愿意去想；可是它们老在那里，他清清楚楚地感觉到。那些回忆有时竟使他痛苦得心如刀割，在静寂的夜里呻吟着：“啊！我的天！我的天！”——随后，他把不愉快的念头撩在一边，否认它们：他要保持自己的信心，要乐天知命，要相信别人，结果他便真的相信了。他的幻象已经被无情的现实毁灭了多少次——但他永远会生出新的幻象……没有幻象他简直不能过活。

素不相识的克利斯朵夫，在他的生活中成为一个光明的中心。克利斯朵夫给他的第一封措辞冷淡的复信，应当会使他难过的——（也许他的确是难过的）；——可是他不愿意承认，倒反喜欢得像小孩子一样。他那么谦虚，对别人根本没有多大要求，只要得到人家一点感情就足够做他爱人家感激人

家的养料。他从来不敢希望有福气看到克利斯朵夫，他太老了，不能再上莱茵河畔去旅行一次；至于请克利斯朵夫到这儿来，更是做梦也没想到的。

克利斯朵夫的电报送到的时候，他正坐上桌子吃晚饭。他先是弄不明白：发报人的名字很陌生，他以为人家送错了电报，不是给他的；他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慌乱中眼镜也戴不稳，灯光又不够亮，字母都在眼前跳舞。等到明白以后，他简直骚动得把晚饭都忘了。莎乐美提醒他也没用：没法再吞一口东西。他把饭巾往桌上一丢，也不像平时那样把它折好，便摇摇晃晃的站起身子，去拿了帽子和手杖往外就跑。好心的苏兹遇到一件这样快乐的事，第一个念头便是要把他的快乐分点给别人，把克利斯朵夫要来的消息通知他的朋友们。

他有两个朋友，都是像他一样爱好音乐的，也被他引起了对克利斯朵夫的热情：一个是法官萨缪尔·耿士，一个是牙医生兼优秀的歌唱家奥斯卡·卜德班希米脱。三个老朋友常在一起谈着克利斯朵夫，把所能找到的克利斯朵夫的作品统统演奏过了。卜德班希米脱唱着，苏兹弹着琴，耿士听着。然后，三个人几小时的低徊赞叹。他们弄着音乐的时候，不知说过多少次：“啊！要是克拉夫脱在这儿的话！”

苏兹在街上想着自己的快乐和将要使朋友们感到的快乐，自个儿笑了起来。天快黑了；耿士在离城半小时的一个小村上。可是天色还很亮：四月的黄昏多么柔和；夜莺在四下里唱歌。老苏兹快活得心都化开了，呼吸一点没有困难，两条腿像二十岁的时候一样。他轻快的走着，全不防在黑暗中常常绊脚的石子。遇到车辆，他就精神抖擞的闪在路旁，高高兴兴的和赶车的打招呼，对方在车灯底下看到是他，不由得很奇怪。

走到村口耿士家的小园子前面，天已经全黑了。他敲着门，直着嗓子叫耿士。耿士打开窗来，神色仓皇的出现了。他在暗中探望，问：“谁啊？叫我干什么？”

苏兹喘着大气，兴高采烈的嚷道：“克拉夫脱……克拉夫脱明天到……”

耿士莫名其妙，只认出了他的声音：“苏兹！怎么啊？这么晚赶来什么事啊？”

苏兹又说了一遍：“他明天到，明天早上！”

“什么？”耿士一点儿摸不着头脑。

“克拉夫脱！”

耿士把这句话想了一会，忽然很响亮的叫了一声，表示他明白了：

“我就来！”他喊道。

窗子重新关上。他在石阶上出现了，手里拿着灯，往园子里走过来。他是个身材矮小的老头儿，挺着大肚子，脑袋也很大，灰色头发，红胡子，脸上和手上都有雀斑。他衔着一个瓷器烟斗，迈着细步走来。这个和善而有点迷迷忽忽的人，一辈子从来不为什么事着急的。可是苏兹带来的新闻也不免使他一反常态，兴奋起来；他把短短的手臂跟手里的灯一齐舞动着，问：“真的？他到这儿来吗？”

“明天早上，”苏兹好不得意的扬了扬电报。

两位老朋友到凉棚底下坐在一条长凳上。苏兹端着灯。耿士小心翼翼的展开电报，慢慢的低声念着；苏兹又从他肩头上高声念着。耿士还看了电报四周的小字，拍发的时刻，到达的时刻，电文的字数。随后他把这张宝贵的纸还给了苏兹。苏兹得意的笑着，耿士侧了侧脑袋瞧着他说：“啊！好！……”

啊！好！”

耿士想了一会，吸了一大口烟又吐了出来，然后把手放在苏兹膝盖上，说道：

“得通知卜德班希米脱。”

“我去，”苏兹说。

“我跟你一块儿去，”耿士说。

他进去放下了灯，马上回出来。两个老人手挽着手走了。卜德班希米脱住在村子那一头。苏兹和耿士一路说着闲话，心里老想着那件事。忽然耿士停住脚步，用手杖往地上敲了一下：“啊！该死！……他不在这儿！……”

这时他才记起卜德班希米脱下午到邻近一个城里开刀去了，今晚要在那边过夜，而且还得待上一二天。苏兹听了这话慌了。耿士也一样的发急。卜德班希米脱是他们俩非常得意的人物；他们很想拿他来做面子的。因此两人站在街上没了主意。

“怎么办？怎么办？”耿士问。

“非教克拉夫脱听一听卜德班希米脱的唱不可，”苏兹说。

他想了想又道：“得打一个电报给他。”

他们就上电报局，共同拟了一个措辞激动的长电，简直教人弄不明白说的是什么。发了电报，他们走回来。

苏兹计算了一下：“要是他搭头班车，明天早上就可以到这儿。”

但耿士认为时间已经太晚，电报大概要明天早上才送到。苏兹摇摇头；两人一齐说着：“事情多不巧！”

他们俩在耿士门口分手了；耿士虽然和苏兹友谊那么深，可决不至于冒冒失失的把苏兹送出村口，回头再独自在黑夜走一段路，哪怕是极短的路。他们约定明天在苏兹家里吃中饭。苏兹又望望天色，不大放心的说：“明儿要能天晴才好！”

自命为通晓气象的耿士，郑重其事的把天色打量了一会，——（因为他也像苏兹一样，极希望克利斯朵夫来的时候能看到他们的地方多美）——说道：

“明儿一定是好天。”

这样，苏兹的心事才轻了一半。

苏兹回头进城，好几次不是踏在车辙里差点儿跌跤，就是撞在路旁的石子堆上、回家之前他先到点心铺定了一种本地著名的饼，快到家了，又退回去到车站上问明车子到达的时刻。到了家中，他和莎乐美把明天的饭菜商量了老半天。这样以后，他才筋疲力尽的上床；可是他像圣诞前夜的小孩子一样兴奋，整夜在被窝里翻来覆去，一刻儿都没睡着。到半夜一点，他想起来吩咐莎乐美，明天中午最好做一盘蒸鲤鱼，那是她的拿手菜。结果他并没去说，而且也是不说的好的。但他仍旧下了床，把那间预备给克利斯朵夫睡的卧室收拾一番：他十二分的小心，不让莎乐美听见声音，免得受埋怨。他提心吊胆，唯恐错过了火车的时刻，虽然克利斯朵夫在八点以前决不会到。他一大早就起身了，第一眼是望天：耿士说得不错，果然是大好的晴天。苏兹蹑手蹑脚的走下地窖，那是因为怕着凉，怕太陡的梯子而久已不去的；他挑出最好的酒，回上来的时候脑门在环洞高头重重的撞了一下，赶到提着满满的一篮爬完梯子，他以为简直要闭过气去了。随后他拿着剪刀往园子里去，毫不爱惜的把最美的蔷薇和初开的紫丁香一齐剪下。随后他回到卧室，性急慌

忙的刮着胡子，割破了两三处，穿扮得齐齐整整，动身往车站去了。时间还只有七点。尽管莎乐美劝说，他连一滴牛奶都不肯喝，说克利斯朵夫到的时候一定也没用过早点，他们还是回来一起吃罢。

他到站上，离开火车到的时候还差三刻钟。他好不耐烦的等着克利斯朵夫，而结果竟把他错过了。照理应该耐着性子等在出口的地方，他却是站在月台上，被上车下车的旅客挤昏了。虽然电报上写得明明白白，他却以为，天知道为什么缘故，克利斯朵夫搭的是下一班车；并且他也绝对想不到克利斯朵夫会从四等车厢里跳下的。克利斯朵夫到了好久，直接往他家里奔去的时候，苏兹还在站上等了半小时。更糟的是，莎乐美也上街买菜去了：克利斯朵夫发见大门上了锁。邻人受着莎乐美的嘱托，只说她一忽儿就回来的；除此以外，再没别的解释。克利斯朵夫既不是来找莎乐美的，也不知道莎乐美是谁，认为那简直是跟他开玩笑；他问到大学音乐导师苏兹在不在，人家回答说在，可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克利斯朵夫一气之下，走了。

老苏兹挂着一尺长的脸回来，从也是刚回家的莎乐美嘴里知道了那些情形，不禁大为懊恼，差点儿哭出来。他认为老妈子太蠢了，怎么在他出门的时候没有托人家请克利斯朵夫等着。他非常愤怒。莎乐美跟他一样气哼哼的回答说，她想不到他会那样的蠢，甚至把特意去迎接的客人都错过了。老人并不浪费时间和她争，立刻回头走下楼梯，依着邻人渺渺茫茫的指点，出发找克利斯朵夫去了。

克利斯朵夫撞在门上，没见到一个人，连一张道歉的字条都没有，很是生气。在等下一班火车开行之前，他不知道怎么办，看到田野很美，便散步去了。这是一座安静宜人的小城，座落在一带柔和的山岗底下；屋子四周全是园子，樱桃树开满了花，有的是碧绿的草地，浓密的树荫，年代并不悠久的废墟；青草丛里矗立着白石的柱子，上面放着古代公主们的胸像，脸上的表情那么温和，那么可爱。城的周围，只看见青葱的草原与小山。野花怒放的灌木丛中，山鸟叫得非常快乐，好比一组轻快响亮的木笛在那里合奏。要不了多少时候，克利斯朵夫恶劣的心绪消散了：他把苏兹完全给忘了。

老人满街跑着，向走路人打听，都一无结果。他直爬到山坡高头的古堡前面，正当他好不伤心的走回来的时候，他那双看得很远的尖锐的眼睛，忽然瞥见在几株树底下有个男人躺在草地上。他不认得克利斯朵夫，不能知道是不是他。那男子又是背着他，把半个头都埋在草里。苏兹绕着草地，在路上转来转去，心跳得很厉害：

“一定是他了……噢，不是的……”

他不敢叫他，可是灵机一动，把克利斯朵夫的歌里头的第一句唱起来：
赫夫！赫夫！……（起来罢！起来！）

克利斯朵夫一跃而起，像条鱼从水里跳出来似的，直着嗓子接唱下去。他高兴之极的回过身来：满面通红，头上尽是乱草。他们俩互相叫着姓名，向对方奔过去。苏兹跨过土沟，克利斯朵夫跳过栅栏。两人热烈的握着手，大声说笑着一同往家里走。老人把早上的倒楣事儿说了一遍。克利斯朵夫几分钟以前还决定搭车回家，不再去找苏兹，现在立刻感觉到这颗心多么善良多么纯朴，开始喜欢他了。还没走到苏兹家里，他们已经彼此说了许多心腹话。

一进门，他们就看到耿士；他听说苏兹出去找克利斯朵夫了，便悄悄停停的在那儿等着。老妈子端上咖啡跟牛奶。克利斯朵夫说已经在乡村客店用

过早点。老人听了大为不安：客人到了本地，第一顿饭竟没有在他家里吃，他觉得难过极了；像他那种至诚的心是把这些琐碎事儿看做天样大的。克利斯朵夫懂得他的心理，暗中觉得好玩，同时也更喜欢他了。为了安慰主人，他说还有吃第二顿早点的胃口，而且他马上用事实来证明了。

克利斯朵夫所有的烦恼一霎时都化为乌有：他觉得遇到了真正的朋友，自己又活过来了。讲到这次的旅行和失意的时候，他把话说得那么滑稽，好比一个放假回来的小学生。苏兹眉飞色舞，不胜怜爱的瞅着他，心花怒放的笑了。

不久，话题就转到三个人友谊的关键上去，他们谈着克利斯朵夫的音乐。苏兹渴望克利斯朵夫弹几阕他的作品，只是不敢说。克利斯朵夫一边谈话一边在室内来回踱着。他走近打开着的钢琴的时候，苏兹就留神他的脚步，心里巴不得他停下来。耿士也是一样的期望着。果然，克利斯朵夫嘴里说着话，不知不觉的在琴前坐下，眼睛望着别处，把手指在键盘上随便抚弄；这时两老的心都跳起来。不出苏兹所料。克利斯朵夫试了两三组琶音以后真的动了兴：一边谈着一边又按了几个和弦，接着竟是完整的乐句；于是不作声了，正式弹琴了。两个老人交换了一个得意的，会心的眼色。

“你们知道这个曲子吗？”克利斯朵夫奏着他的一阕歌问。“怎么不知道！”苏兹挺高兴的回答。

克利斯朵夫只顾弹着，侧着脸，说：“喂，你的琴不大高明了！”

老人非常懊丧，赶紧道歉：“是的，它老了，跟我一样了。”克利斯朵夫转过身子，望着这个好像求人原谅他老朽的苏兹，把他两只手一齐抓着，笑起来了。他打量着老人天真的眼睛，说：“噢！你，你比我还年轻呢。”

苏兹听了哈哈大笑，顺便说到自己衰老多病的情形。

“得了吧！”克利斯朵夫抢着回答，“那有什么相干？我知道我的话是不错的。是不是，耿士？”

（他已经省去“先生”二字了。）

耿士一连声的表示同意。

苏兹看到人家恭维他的年轻，也想让他的钢琴沾点儿光。“还有几个音很好听呢，”他胆怯的说。

他随手按了四五个相当明亮的音，在琴的中段，大概有半个音阶。克利斯朵夫懂得这架琴对他是个老朋友，便一边想着苏兹的眼睛一边很亲热的回答：

“不错，它还有很美的眼睛。”

苏兹脸上顿时有了光彩，对着钢琴说了些不清不楚的赞美的话，可是看到克利斯朵夫重新弹琴了，就马上住嘴。歌一支又一支的奏下去，克利斯朵夫用不高不低的声音唱着。苏兹眼睛水汪汪的，对他每一个动作都留着神。耿士交叉着手按在肚子上，闭着眼睛细细的吟味。克利斯朵夫不时得意扬扬的转过头来，对着两个听得出神的老头儿说：

“嘿！多美啊！……还有这个，你们觉得怎么样？……还有这个……那是顶美的一个……——现在我再给你们奏一个曲子，让你们快乐得像登天一样……”尽管他说话这么天真，两个老人决不会笑话他。

他才奏完一个如梦如幻的曲子，挂钟里的鹧鸪叫起来了。克利斯朵夫听了怒气冲冲的直跳直嚷。耿士被他惊醒了，睁大着眼睛骨碌碌的乱转。苏兹先是莫名其妙，直看到克利斯朵夫一边对着摇头摆尾的鹧鸪摩拳擦掌，一边

嚷着要人把这混账的鬼东西拿开的时候，苏兹才破题儿第一遭觉得这声音的确难受，端过一张椅子，想上去把煞风景的东西亲自摘下来。他差点儿摔跤，被耿士拦住了不让再爬。于是他叫莎乐美。莎乐美照例慢腾腾的走来，而不耐烦的克利斯朵夫已经把挂钟卸下，放在她的怀里了。她抱着钟楞在那里：

“你们要我把它怎么办呢？”她问。

“随你怎办。拿去就是了，只要从此不看见它！”苏兹说着，和克利斯朵夫一样的不耐烦。

他不懂自己对于这厌物怎么会忍耐了那么些年的。

莎乐美以为他们都疯了。

音乐重新开始。时间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莎乐美来报告说中饭已经开出来了。苏兹可教她住嘴。过了十分钟，她又来了；再过十分钟，她又来了：这一回她可气冲冲的，勉强装着镇静的神气，站在屋子中间，不管苏兹怎么样绝望的对她做着暗号，径自大声的说：

“诸位先生喜欢吃冷菜也好，喜欢吃热菜也好，对我都没关系；只要吩咐就是了。”

苏兹对于这种没有规矩的事很惭愧，想把女仆训斥一顿：可是克利斯朵夫大声笑了出来。耿士也笑了，终于苏兹也跟着笑了。莎乐美看到自己的话有了作用很得意，转过身来走了，神气活像一个皇后赦免了她的臣下。

“她真痛快！”克利斯朵夫离开了钢琴，站起来说。“她也没错。音乐会中间闯进个把人有什么大不了呢？”

他们开始吃饭了。饭菜挺丰富挺有味道。苏兹激起了莎乐美的好胜心，而她也巴不得找个机会来显显本领，决不辜负这种机会。两位老朋友非常好吃。耿士上了饭桌子简直变了一个人，眉开眼笑，像太阳一般，那模样大可以给饭店做个招牌。苏兹对好酒好菜的欣赏也不下于耿士，可惜为了病病歪歪的身子不能尽量。但他不大肯顾虑到这一点，因之常常要付代价。那他可绝对不抱怨；要是他病了，至少肚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和耿士一样，他也有家传的食谱。所以莎乐美是服侍惯一般内行的。可是这一次，她把所有的杰作都拿来排在一个节目上，仿佛是莱茵菜的展览大会，那是一种本色，保存原味的烹调，用着各式各种草本的香料，浓酽酽的沙司，作料丰富的汤，标准的清炖砂锅，其大无比的鲤鱼，酸咸菜烧腌肉，全鹅，家常饼，茴香面包。克利斯朵夫嘴巴塞得满满的，狼吞虎咽的得意极了。他跟他的父亲祖父胃口一样大，一次可以吞下整只的鹅。平时他能整星期的光吃面包和乳饼，而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吃得胀破肚子。苏兹又诚恳又殷勤，眼睛挺温柔的瞧着他，把他灌了许多莱茵名酒。满脸通红的耿士认为这一下才遇到了对手。莎乐美嘻开着大脸盘乐死了。——克利斯朵夫刚到的时候，她有点儿失望，苏兹事先对她把客人说得天花乱坠，所以她理想中的克利斯朵夫是个大官儿一样的人物，浑身都是头衔。见到了客人的面，她不由得肚里想着：

“原来也没什么大不了！”

在饭桌上，克利斯朵夫可得到了她的好感；像他那样大为赏识她的本领的人，她还是第一次碰到。所以她竟不回到厨房去而站在饭厅门口，看着克利斯朵夫一边说着傻话，一边东西照旧吃个不停；她把拳头插在腰里，哈哈

沙司为西菜中浇在鱼或肉类上面的酱汁，大概可分黑白两种，以牛肉汤和鸡汤为底，将牛油与面粉调和后，另加作料，做法各有巧妙不同。欧洲人对沙司之重视不下于正菜本身。

大笑。大家兴高采烈。美中不足的就是没有卜德班希米脱的座。他们几次三番的说：

“嘿！要是他在这儿，他才会吃，会喝，会唱呢！”

这一类赞扬的话简直说不完。

“要克利斯朵夫能听到他的唱才好呢！……大概是听得到的。今晚卜德班希米脱可以回来了，至迟也不会过今天夜里……”

“噢！今天夜里我早已不在这儿了，”克利斯朵夫说。

苏兹喜孜孜的脸立刻沉了下来。

“怎么不在这儿？”他声音发抖了。“你今天不会走吧？”

“要走的，”克利斯朵夫嘻嘻哈哈的回答，“搭夜车走。”

这一下苏兹可伤心了。他是预算克利斯朵夫在他家里住几天的，便嘟嘟囔囔的说：“那怎么行呢？……”

耿士也接着说：“还有卜德班希米脱怎么办呢？……”

克利斯朵夫把他们俩都瞧了瞧，两人友好的脸上那种失望的表情使他感动了，就说：“唉！你们多好！……那末我明天早上走，行吗？”

苏兹马上握着他的手：“啊！好极了！谢谢你！谢谢你！”

他跟小孩子一样把明天看得那么远，远得用不着去想。他只知道克利斯朵夫今天不走，今天一天，今天晚上，他们都可以在一起，他要睡在他的家里：除此以外，苏兹不愿意想得更远了。

大家又恢复了兴致，苏兹忽然神色庄严的站起来，预备为远来的贵客干杯，他用着感动而浮夸的措辞，说客人肯光临小城，枉顾寒斋，对他是极大的光荣和愉快；他祝颂他归途平安，祝颂他前程远大，祝颂他成功，祝颂他荣名盖世，也祝颂他享尽人世的幸福。接着他又为“高贵的音乐”干杯，——为他的老朋友耿士干杯，——为春天干杯，——最后也没忘了为卜德班希米脱干杯。耿士也起来为苏兹和另外几个朋友干杯；克利斯朵夫为结束这些干杯起见，便起来为莎乐美干杯，把她羞得涨红了脸。然后，他不等两位演说家致答辞，马上唱一支著名的歌，两个老人也跟着唱起来。一曲完了又是一曲，末了是一支三部合唱的歌，大意是称颂友谊，音乐和美酒：笑声与碰杯声，和歌声闹成一片。

离开饭桌的时间已经三点半，他们头脑都有点重甸甸的。耿士倒在一张沙发里，很想睡个中觉。苏兹经过了早上那种紧张的情绪，再加那些干杯，也支持不住了。两人都希望克利斯朵夫坐下来给他们弹上几小时的琴。可是那怪脾气的年轻人精神百倍，兴致好得很：他按了两三个和弦，突然把琴关上了，望望窗外，提议出去溜个半天。他觉得田野美极了。耿士表示不大热心，但苏兹立刻认为这主意妙极了，他本应当带客人去瞧瞧本地的公园。耿士皱了皱眉头，可也不表异议：因为他和苏兹一样愿意让克利斯朵夫欣赏一下他们的本地风光。

于是他们出去了。克利斯朵夫挽着苏兹的手臂走得很快，超过了老人的体力。耿士跟在后面抹着汗。他们很兴奋的谈着话。人家站在屋门口看见他们走过，都觉得苏兹教授今天的神气活像个年轻人。一出城，他们就往草原上走。耿士抱怨天气太热。一点不体恤人的克利斯朵夫可认为气候好极了。还算是两老运气，因为他们常常停下来讨论问题，而继续不断的谈话也令人忘了路程的遥远。他们进了树林。苏兹背着歌德和莫里克的诗句。克利斯朵夫很喜欢诗歌，可一首都记不得，他一边听一边恍恍惚惚的幻想起来，终于

音乐代替了字句，把诗完全给忘了。他佩服苏兹的记忆力。把他和哈斯莱比较之下，差别真是太大了！一个是又老又病，一年倒有一大半关在卧房里，差不多在这个内地小城中过了一辈子，可是他精神多么活跃！一个是又年轻又出名，住着艺术中心的大都市，举行音乐会的时候跑遍了欧洲，可是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什么都不愿意知道！克利斯朵夫所知道的现代艺术的潮流，苏兹不但全部熟悉，而且还知道无数关于古代与外国音乐家的事，为克利斯朵夫闻所未闻的。他的记忆仿佛是一口深不可测的蓄水池，凡是天上降下的甘霖都给它保存在那里。克利斯朵夫聚精会神的汲取它的宝藏；苏兹看见克利斯朵夫兴致这样浓厚也觉得不胜快慰。他有时碰到过一些殷勤的听众或温良恭顺的学生，可始终缺少一颗年轻而热烈的心来分享他多么丰富的热情。

直到老人冒冒失失的说出他对勃拉姆斯的钦慕为止，他们俩是世界上最知己的朋友。但一提到这个名字，克利斯朵夫立刻变了脸色，冷冷的生气了：他把苏兹的手臂放了下来，声色俱厉的说，凡是喜欢勃拉姆斯的人不能跟他做朋友。那简直是在他们的快乐上面浇了一盆冷水。苏兹胆子太小了，不敢争辩；又是太真诚了，不能扯谎，便支吾其辞的想解释一番。可是克利斯朵夫斩钉截铁的一句：“甭提了！”根本不容许对方再说下去。然后是一片难堪的静默。他们继续走着，两个老人低着头，彼此连望都不敢望。耿士咳了几声，想把话接下去，提到树林和美妙的天气；但克利斯朵夫气恼之下，除了几个单字，根本不答腔。耿士在这一方面不得回音，便转过来向苏兹谈话；可是苏兹喉咙梗塞着，竟没法开口。克利斯朵夫在眼梢里觑着他，想笑出来：他已经原谅他了。其实他并没真正的怀恨，甚至觉得自己使可怜的老人伤心未免野蛮；但他滥用威力，不愿意立刻取消前言。所以直到走出树林，三个人始终保持着这种态度：两个垂头丧气的老人拖着沉重的脚步，克利斯朵夫轻轻的打着唿哨，只装不看见他们。突然之间，他忍不住了，大声笑了出来，转身向着苏兹，伸出结实的手抓着他的胳膊：

“好朋友！”他亲热地望着他说，“你瞧，这多美啊！多美啊！……”

他说的是田野和天气；但他笑眯眯的眼睛仿佛是说：

“你是好人。我是蛮子。原谅我罢！我真爱你。”

老人的心化开来了，好像日蚀之后又出了太阳。但他直要过了一会儿才能开口。克利斯朵夫重新搀着他的手臂，格外亲热的和他谈着话；他一上劲，不知不觉加紧了脚步，没留意把两个同伴累得筋疲力尽。苏兹可并不抱怨；他满心欢喜，简直不觉得累。他知道今天这样的不保重，事后一定要付代价的。可是他想：“喝，明天，管它干么！反正他走了我尽可以休息。”

可是不像他那么兴奋的耿士已经落后了十几步，显得可怜巴巴的。终于克利斯朵夫也觉察了，不胜惶愧的道歉，提议在白杨底下的草坪上躺一会。苏兹当然赞成，没想到他的支气管会不会受影响。幸而耿士替他想起了；或者他至少觉得这么一说，自己不必浑身大汗的去躺在凉快的草地上。他建议到邻近的站上搭火车回去。大家立刻照办了。虽然很累，他们还得加紧脚步以免迟到；结果他们到站的时候，火车正好进站。

这时忽然有个胖子冲到车厢门口，大声叫着苏兹和耿士的名字，还加上一大串他们的头衔和赞扬他们德性的形容词，舞动着手臂像个疯子。苏兹和耿士也叫叫嚷嚷的，舞动着手臂回答他，一边扑向胖子的车厢，胖子也在人堆里推呀撞的奔过来。克利斯朵夫莫名其妙的跟着跑，问：“什么事啊？”

两人欣喜欲狂的喊道：“就是那卜德班希米脱呀！”

这名字对他并没多大意思。他早已忘了饭桌上的干杯。卜德班希米脱站在火车的月台上，苏兹和耿士站在踏级上，高声喧嚷，闹得人耳朵都聋了；他们觉得这一次的巧遇真是妙不可言。火车已经开动，他们赶紧爬上去。苏兹把大家介绍了。卜德希米脱行过礼，马上呆着脸，像根柱子一样站得笔直，先说了一大堆客套，然后抓着克利斯朵夫的手拼命的摇了五六下，好似要把它拉掉似的，接着又大声的嚷了。克利斯朵夫在他的叫喊声中听出来，他感谢上帝和他的本命星君使他能有这番奇遇。可是过了一忽儿他又拍着大腿诅咒那个倒楣运，使他从来不离开本城的人，偏偏在指挥先生光临的时候出了门。他看到苏兹的电报，早车已经开出一小时；送达的时候他还睡着，人家以为不该惊动他。他为此跟旅馆里的人发了一个早上的脾气，便是现在，他的气还没消呢。为了急于回来，他把他的主顾，看诊的约会，一古脑儿丢开了，马上搭着第一班车。不料这该死的车和干线上衔接的车脱了班，让卜德班希米脱在交叉站上等了三小时；在那边他把他字汇中所有的惊叹辞都用尽了，拿这件倒楣事儿向站上看门的和别的等车的旅客讲了几十遍。后来终于出发了。

他一路提心吊胆，唯恐赶不上贵客……幸而，谢谢上帝！谢谢上帝！……

他重新抓着克利斯朵夫的手，把它放在指头毛茸茸的大手掌里拼命的捏。他长得意想不到的胖，个子的高大也跟他的胖成为比例：方脑袋，红红的头发剪得很短，脸上不留胡子，长着许多小疱，大眼睛，大鼻子，厚嘴唇，双叠下巴，短脖子，背脊阔得异乎寻常，肚子像个酒桶，胳膊和身体离得老远，大手大脚，整个儿是一座山一般的肥肉，因为吃得过分，喝多了啤酒而变得不成样了，活像在巴维哀邦各乡各镇的街上摇来摆去，跟填鸭一样喂起来的那些胖子。为了高兴也为了天热，他浑身像一堆牛油似的发亮；两只手忽而放在分开着的膝盖上，忽而放在邻人的膝盖上，他一刻不停的说着话，卷着舌头把所有的子音在空中打转，像放连珠炮。有时，他笑得前仰后合，张着嘴巴，一迭连声的呵呵大笑，差点儿闭过气去。他笑得把苏兹和耿士都传染了，他们狂笑了一阵，擦着眼睛望着克利斯朵夫，神气之间仿佛是问他：“嗯，你觉得怎么样？”

克利斯朵夫一声不出，只是骇然的想着：“唱我的歌的难道就是这个怪物吗？”

他们回到苏兹家里。克利斯朵夫只希望能避免听卜德班希米脱的唱。虽然卜德班希米脱心痒难熬的想显本领而一再暗示，他可绝对不接下文。但苏兹和耿士一心一意要拿他们的朋友来献宝，克利斯朵夫这关是逃不过的了。他便没精打采的坐到钢琴前面，心里想：“好家伙，好家伙，你真不知轻重呢：小心点儿！我是对什么都不留情的。”

他想到等会要让苏兹伤心，不由得很难过；但他认为与其让这个法斯大夫糟蹋他的音乐，宁可使他老人家受些痛苦。可是这一点倒毋须他操心：胖子的声音美极了。一听最初几节，克利斯朵夫就做了个惊讶的动作，使眼睛老盯着他的苏兹吓了一跳，以为他不满意，赶到克利斯朵夫一边弹着一边脸色开朗起来，他才放下了心。于是老人的脸也给克利斯朵夫的快乐照出反光来了。一曲完了，克利斯朵夫转过身来嚷着说，他从来没听见一个人把他的歌唱得这样美的，那时苏兹的快乐简直无可形容；他的欢喜是比克利斯朵

夫的满意和卜德班希米脱的得意更甜蜜更深刻：因为他们俩所感到的不过是自己一个人的愉快，而苏兹是把两个朋友的愉快都感到了。音乐继续下去。克利斯朵夫高兴得叫了：他不懂这个又笨重又庸俗的家伙怎么会传达出他的歌的思想。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把所有细腻的地方都能准确的表现出来；可是他有克利斯朵夫从来没法使职业歌唱家完全感觉到的那种激动和热情。他望着卜德班希米脱，心里想：“难道他真有这样的感情吗？”

但他在胖子的眼里，除了虚荣心获得满足的表示，根本没看到什么热情。只有一股无意识的力在这个大块文章的身体中蠢动。这股盲目的，被动的力，好比一队士兵在那里厮杀，既不知道跟谁厮杀，也不知道为什么厮杀。一旦给歌的精神吸住之后，它便欢欣鼓舞的听让摆布：因为它需要活动，而要是让它自寻出路的话，它就永远不会知道怎么活动的。

克利斯朵夫心里想，在创造人类的那天，造物主并没为搭配人的四肢百体花过多少心血，只是随随便便的凑起来，不管它们放在一处是否相称。所以每个人都是被他用信手拈来的零件配成的；应该是一个人的各个部分，竟分配在五六个不同的人身上：脑子在一个人身上，心在另一个人身上，而适合这个心灵的身子又在第三个人身上；乐器在一边，奏乐器的人在另外一边。有些人好比极名贵的小提琴，只因为没人会拉，就给永远关在匣子里头，而那般生来配拉这种提琴的人，倒反终身只能抱着一些可怜的乐器。他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感慨，尤其因为他自恨从来不能好好的唱一个歌。他的嗓子是唱不准的，因为听了就讨厌。

可是卜德班希米脱得意忘形，开始在克利斯朵夫的歌曲里“加点儿表情”，就是说把他自己的表情代替了原作的表情。克利斯朵夫自然不会觉得自己的曲子因之而生色，便慢慢的沉下脸来。苏兹也发觉了。他是没有批评精神而只知道佩服朋友的，自个儿决不能发见卜德班希米脱的趣味恶劣。但他对克利斯朵夫的热情，使他感受到少年的思想中最微妙的地方：他的心已经不在自己身上而在克利斯朵夫身上了，所以他对卜德班希米脱浮夸的唱法也觉得受不了，想阻止他这种危险的倾向。可是要卜德班希米脱住嘴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唱完了克利斯朵夫的作品，接着想唱些教克利斯朵夫一听名字就要恶心的，庸俗的歌曲，苏兹费了不知多大的劲才把他拦住了。

幸而仆人来请吃晚饭，堵住了卜德班希米脱的嘴巴。一上饭桌，他有了另外一个显本领的机会。在这方面他也没有敌手的；克利斯朵夫经过了中午的一顿，此刻懒得再和他竞争了。

时间过得很快。三位老朋友围着饭桌望着克利斯朵夫，把他的话语句句咽在肚里。克利斯朵夫很奇怪：在这个偏僻的小城里，和这些从未一面的老人怎么会相处得比自己的家人还亲热。他想：一个艺术家倘使能知道自己的思想在世界上会交结到这些不相识的朋友，他将要感到多么幸福，——他的心会多么温暖，加增多少勇气……可是事实往往并不如此：各人都孤零零的活着，孤零零的死掉，并且感觉越深切，越需要互相倾诉的时候，越不敢把各人的感觉说出来。随便恭维人的俗物，说话是挺容易的。可是爱到极点的人非竭力强迫自己就不能开口，不能说出他们的爱。所以对于一般敢说出来的人，我们应该感谢：他们不知不觉的在那里帮助作者和他合作。克利斯朵夫非常感激苏兹。他决不把苏兹和其余的两位一般看待，感觉到他是这一小组朋友中的灵魂，是爱与慈悲的洪炉，其余两人不过是这口炉子射出的反光而已。耿士和卜德班希米脱对他的友谊是截然不同的。耿士是自私的家伙，

音乐给他的满足，只像一只猫受到人家抚爱。卜德班希米脱是一方面为了满足虚荣心，一方面为了练习嗓子有种生理上的快感。他们完全不想了解克利斯朵夫，唯有苏兹是真正的忘了自己，真正的爱着。

夜深了，两位客人都已经动身。屋子里只剩下克利斯朵夫和苏兹，他对老人说：

“现在我要为你一个人弹琴了。”

他坐在钢琴前面，——像对着心爱的人那样的弹奏。他弹着最近的作品，把老人听得出神了。他坐在克利斯朵夫旁边，眼睛老盯着他，屏着气。他那颗慈祥恺惻的心，连一点儿极小的幸福都不忍独享，他不由自主的反复说着：“唉！可惜耿士不在这儿！”

克利斯朵夫听了可有点儿不耐烦。

一个钟头过去了：克利斯朵夫老在那里弹着；他们一句话都不说。克利斯朵夫弹完了，他们还是不作声。一切都很静：屋子，街道，都睡熟了。克利斯朵夫转过身子，看见老人哭着，便站起来拥抱他。两人在恬静的夜里低声谈着。隔壁屋里的时钟，滴滴答答的声音隐约可闻。苏兹轻轻的说着手，抱着手，身子往前探着一点；因为克利斯朵夫问到，他便讲着他的身世，他的悲伤，他老防着自己，唯恐流露出叹苦的口吻，他心里真想说：“我错了……我不该抱怨的……大家都对我很好……”

事实上他并没抱怨，只是在他平平淡淡叙述孤独生活的时候，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惆怅的意味。他在最痛苦的叙述中参入某种很渺茫很感伤的理想主义，使克利斯朵夫听了不快而不忍加以反驳。其实，那在苏兹心中也不见得是一种坚定的信仰，只是需要信仰的一种热望，——一种渺茫的希冀，为他当做水面上的浮标一般抓着不放的。他瞧着克利斯朵夫，想在他的眼睛中间找些加强他信仰的表示。克利斯朵夫看到朋友的眼神对他那么信赖的老盯着，向他求救，同时也听到希望他怎么回答的暗示。于是克利斯朵夫说出了一番有勇气有信心，正是老人所希望听到而觉得非常安慰的。一老一少忘了年岁的差别，像年龄相仿而相爱相助的弟兄一般接近；弱的一个向强的一个求援：老人在青年的心中找到了依傍。

半夜过后，他们分手了。克利斯朵夫明天应当起早，他要搭的车就是他坐着来的那一班。所以他赶紧脱着衣服上床。老人把客房收拾得仿佛预备他住上几个月似的。桌上花瓶里插着几朵蔷薇和一枝月桂。书桌上铺着一张全新的吸水纸，当天早上他教人搬了一架钢琴进去，又在自己最珍视最心爱的书籍里挑了几册摆在近床的搁板上。没有一个小地方他没想到，而且都是一片诚心的想到的。可是一切都白费了：克利斯朵夫什么也没看见。他倒在床上，立刻睡熟了。

苏兹可睡不着。他再三回想着白天的快乐，同时已经在体验离别的悲哀。他把彼此说过的话温了一遍，想到亲爱的克利斯朵夫睡在他身旁，跟自己的床只隔着一堵壁。他四肢酸软，浑身瘫倒了，气也塞住了；他觉得在散步的时候着了凉，旧病快复发了；可是他只想着：“只要能支持到他动身就好了。”

他唯恐忽然来一阵咳呛把克利斯朵夫惊醒。他因为感激上帝，便作了一首诗，题材是根据西面的“主啊，如今你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那一段。他浑身是汗的起床，坐上书桌把诗句写下，仔细誊了一

莎士比亚的剧中人物（参看三七页注二），高大肥胖，异乎寻常；原文即借用此意。

遍，又题上一段情意恳切的献辞，署了姓名，填了日子和时刻；等到重新上床的时候，他打了个寒噤，整夜都不觉得温暖。

黎明来了。苏兹不胜惆怅的想起昨天的黎明。但他埋怨自己不该让这种思想把他最后几分钟的快乐给糟蹋了；他知道明天还要追悔今天这个时间呢；因此他竭力不让自己辜负眼前这段光阴。他伸着耳朵听隔壁屋子里的动静。可是克利斯朵夫声息全无。他睡的姿势还是晚上睡下去的姿势。六点半了，他还睡着。要使他错过开车的时间真是太容易了，反正他也不过一笑置之。可是老人没有得到对方同意，决不敢随便支配一个朋友。他心里想：

“那决不能说是我的错，而且跟我完全不相干。只要我不作声就行了。倘使他不准时起床，我还可以陪他一天。”

可是他又回答自己说：“不，我没有这权利。”

于是他以为应当把他叫醒了，去敲房门。克利斯朵夫并不就醒，还得再敲几下。老人心里很难过，想着：“啊！他睡得多甜！很可以睡到中午呢！……”

终于克利斯朵夫声音挺高兴的在里头答应了。他一知道钟点不由得叫了一声，接着就在屋子里忙起来，乱哄哄的梳洗，唱着断片的歌曲，还隔着墙和苏兹亲热的招呼，说些傻话把悲伤的老人也逗乐了。然后他开了门走出来，精神挺好，一团高兴，根本没想到自己使人家难过。其实他又没有什么事需要他赶回去，多待几天对他也毫无损失，而对苏兹却是莫大的愉快。但克利斯朵夫想不到这些。而且他不管对老人抱着多少好感，也很想告别了：昨天一天絮絮不休的长谈，那些拼着最后一点热情抓着他的人物，已经使他厌倦。何况他还年轻，以为来日方长，大家尽有重新聚首的机会：他现在也不是上什么天涯地角，——不比那老人，明知不久就要到比天涯地角更远的地方去，所以他瞧着克利斯朵夫的目光大有从此永诀的意味。

他虽然筋疲力尽，还是把克利斯朵夫送到车站。外边悄悄的下着寒冷的细雨。到了站上，克利斯朵夫打开钱袋，发觉钱已经不够买直达家乡的车票。他知道苏兹会非常高兴的借给他的，可不愿意……为什么？为什么不让一个爱你的人有个机会帮你的忙而快活一下呢？大概是为了不愿意打搅人，或是为了自尊心。他把车票买到中间站，决意从那儿走回家。

开车的时间到了。他们在车厢的踏级上拥抱。苏兹把夜里写的诗塞在克利斯朵夫手里，站在正对着他车厢的月台上。在已经告别而还没分手的情形之下，两人无话可说了。但苏兹的眼睛继续在那里说话，直到车子开动以后才离开了克利斯朵夫的脸。

火车在铁道拐弯的地方隐没了。苏兹孤零零的踏着泥泞的路回家，拖着沉重的脚步，突然之间觉得又累又冷，雨天的景色格外凄凉。他好不容易才挨到家里，爬上阶梯。一进卧房，一阵狂咳把他气都闭住了。莎乐美马上赶来了。他一边不由自主的哼着，一边反复不已的说：“还好！……居然能够撑到这个时候……”

他觉得非常不舒服，就睡下了。莎乐美请医生去了。一到床上，他的身子简直像一堆破絮。他没法动弹；唯有胸部在那里翕动，好比炉灶的风箱。脑袋重甸甸的，发着高烧，他整天温着昨日的梦，连一分一秒都不放过：他觉得万分惆怅，继而又责备自己，不该有了这样的幸福以后再抱怨。他合着手，一片热诚的感谢上帝。

克利斯朵夫往着家乡进发。经过了那么一天，他心绪安定了，老人的温情恢复了他的自信。到了中间站，他高高兴兴的下来赶路。离家还有六十里

地，他可不慌不忙，像小学生闲逛一样的走着。这时正是四月，田野里一切还没怎么长成。树叶像皮肤打皱的小手似的在苍黑的枝头展开来；稀疏的几株苹果树开着花，嫩弱的野蔷薇爬在篱笆上微笑。光秃的树林抽着嫩绿的新芽；林后高岗上，像枪尖一般矗立着一座罗曼式的古堡。浅蓝的天空飘着几朵乌云，影子在初春的田野中缓缓移动：骤雨过了，又出了大太阳，鸟在那儿唱着。

克利斯朵夫发觉自己怀念着高脱弗烈特舅舅，而且已经想了一忽儿；他好久没想起这可怜的人，为什么这一下忽然念念不忘了呢？他沿着水光荡漾的河边，在两旁种着白杨的路上走着的时候，舅舅的面貌简直形影不离的紧钉着他，以致到了一堵墙的拐角儿上，仿佛就要劈面撞见他了。

天阴了，一阵猛烈的暴雨夹着冰雹下起来了，远处还有雷声。克利斯朵夫刚走近一个村子，看到一些粉红的门面和深红的屋顶，周围还有几株树。他脚下一紧，奔到村口第一家人家的屋檐下去躲雨。冰雹下得很厉害，打在瓦上铮铮琮琮，掉在地下像铅丸似的乱蹦乱跳，车辙里的水直往四下里流着。在繁花满树的果园顶上，一条虹在暗蓝的云端里展开着鲜明的彩带。

一个年轻的姑娘站在门口打毛线。她很客气的请克利斯朵夫到里面去，他便跟着走进一间屋子，同时是做饭，吃饭，睡觉的地方。尽里头生着一堆很旺的火，上面吊着一支锅子。有个女人在那里剥着蔬菜，跟克利斯朵夫招呼了一声，叫他走到火边去烘干衣服。那姑娘去找了一瓶酒来给他喝。她坐在桌子对面继续打着毛线，同时照顾着两个彼此拿草塞在脖子里玩儿的孩子。她和克利斯朵夫搭讪着。过了一会，他才发觉她是个瞎子。她长得一点儿不美，个子很高大。红红的脸蛋，雪白的牙齿，手臂很结实，可是面貌不大端正，她跟多数的瞎子一样脸上堆着点笑容而没有表情，也和他们一样，谈到什么人和什么东西的时候，仿佛是亲眼目睹的。克利斯朵夫先听她说今天田野里风光很美，他气色很好，不由得楞了一楞，疑心她说笑话。他把瞎子姑娘和剥蔬菜的女人轮流地瞧了一会，觉得她们都没有什么惊讶的表示。两个妇女很亲热的问他从哪儿来，打哪儿过。瞎子那股说话的劲似乎有点儿夸张，她听着克利斯朵夫讲到路上和田里的情形，总得插几句嘴，议论一番。当然，这些议论往往跟事实完全相反。但她好像硬要相信自己和他看得一样清楚。

家里其余的人也回来了：一个三十岁光景的壮健的农夫和他年轻的女人。克利斯朵夫跟四个人东拉西扯的谈话，看了看慢慢开朗的天色，等候动身。瞎子一边打着毛线，一边哼着一个调子，使克利斯朵夫想起许多从前的事。

“怎么！你也知道这个？”他说。

（高脱弗烈特从前教过他这个歌。）

他接着哼下去。那姑娘笑起来了。她唱着每句歌词的前半句，他唱着后半句。他站起身子想去瞧瞧天气，在屋子里绕了一转，无意之间把每个角儿都打量了一下，忽然看到食器柜旁边有件东西，他不由得直跳起来。那是一根长而弯曲的拐杖，抓手的部分很粗糙的雕着一个小人弯着腰在那儿行礼。克利斯朵夫对这个东西真是太熟了，很小的时候就常常拿它玩儿的。他过去抓着拐杖，嘎着嗓子问：

“这是哪儿来的？……哪儿来的？”

男人瞧了瞧，回答：“是个朋友丢下来的；一个故世的老朋友。”

“是高脱弗烈特吗？”克利斯朵夫嚷起来。

“你怎么知道的？”大家转过身子问。

克利斯朵夫一说出高脱弗烈特是他的舅舅，全屋子的人都紧张起来。瞎子猛的站起，把毛线团掉在地下乱滚；她踩着她的活儿，过来抓着克利斯朵夫的手再三问：

“啊，你是他的外甥吗？”

大家七张八嘴的同时说话，闹成一片。克利斯朵夫却又问：

“可是你们……你们怎么会认识她的？”

“他就是死在这儿的，”那男人回答。

他们重新坐下；等到紧张的情绪稍微平静了一点，那母亲一边做活一边说，高脱弗烈特跟她们是多年的朋友了，他来来往往经过这儿的时候，总在她们家住。他最后一次来是去年七月，神气很累，他卸下了包裹，老半天没气力说话；可是谁也没留意，他每次来总是这样的，大家知道他容易气喘。他可不抱怨。他从来不抱怨的：无论什么不舒服的事，他总会找出一点儿安慰自己的理由。倘使做着件辛苦的工作，他会想到晚上躺在床上该多么舒服，要是害了病，他又说病好以后该多么愉快……——说到这里，老婆子插了几句闲话：

“可是，先生，一个人就不该老是满足；你自己不抱怨的话，别人也不可怜你了。所以我呀，我是常常诉苦的……”

因此当时大家没注意他，甚至还跟他开玩笑，说他气色很好。摩达斯太——（那是瞎子姑娘的名字），——帮他包裹卸下了，问他是不是要永远这样的奔东奔西不觉厌倦，像年轻人一样。他微微一笑算是回答，因为他没气力说话。他坐在门前的凳上。家里人都做活去了：男人到了田里去；母亲管着做饭。摩达斯太站在凳子旁边，靠在门上打毛线，和高脱弗烈特说着话。他不回答她，她也不要他回答，只把他上次来过以后家里的事讲给他听。他气吁吁的呼吸很困难；她听见他拚命要说话。她并没为之操心，只和她说：

“别说话。你先好好的歇一歇，等会儿再说吗……干么费这么大的劲？”

于是他不作声了。她还是说她的，以为他听着。他叹了口气，再没一点儿声音。过了一会，母亲出来，看到摩达斯太依旧在说话，高脱弗烈特在凳上一动不动，脑袋往后仰着，向着天，原来刚才那一阵，摩达斯太是在跟死人说话了。她这才懂得，可怜的人临死以前想说几句话而没有说成，于是他照例凄凉的笑了笑，表示听天由命，就这样的在夏季那个恬静的黄昏闭上了眼睛……

阵雨已经停止，媳妇照料牲口去了；儿子拿着锹在门前清除污泥淤塞的小沟。摩达斯太在母亲开始讲这一节的时候早已不见了。屋里只剩下克利斯朵夫和那个母亲；他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多嘴的老婆子耐不住长时间的静默，把她认识高脱弗烈特的经过从头至尾讲了一遍。那是年代久远的事了。她年轻的时候，高脱弗烈特爱着她，可是不敢和她说。大家把这件事当作话柄；她取笑他，大家都取笑他：——（他是到处被人取笑的，）——但高脱弗烈特还是每年一片诚心的来看她。他觉得人家嘲笑他是挺自然的，她不爱他也是自然的，她嫁了人，跟丈夫很幸福也是自然的。她那时太幸福了，太得意了；不料遭了横祸。丈夫暴病死了。接着她的女儿，长得挺美，挺壮健，人人称羡的女儿，正当要和当地最有钱的一个庄稼人结婚的时候，一不小心瞎了眼。有一天她爬在屋后大梨树上采果子，梯子一滑，把她摔了下来，

一根断树枝戳进了她脑门上靠近眼睛的地方。先是大家以为不过留个疤痕就完了；哪想到她从此脑门上老是像针刺一般的痛，一只眼睛慢慢的失明了，接着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千方百计的医治都没用。不必说，婚约是毁了；未婚夫没说什么理由就回避了。一个月以前为了争着要和她跳一次华尔兹而不惜打架的那些男子，没有一个有勇气——（那也是很可了解的）——再来请教一个残废的女子。于是，一向无愁无虑的，老挂着笑脸的摩达斯太，顿时痛不欲生。她不饮不食，从朝到晚哭个不休；夜里还在床上呜咽。大家不知道怎么办，只能和她一起悲伤；而她哭得更厉害了。结果人家不耐烦了，狠狠的埋怨了她一顿，她就说要去投河。有时牧师来看她，和她谈到仁慈的上帝，灵魂的不死，说她在这个世界上受的痛苦，可以在另外一个世界上得到幸福；可是这些话都安慰不了她。有一天高脱弗烈特来了。摩达斯太对他一向是不大好的。并非因为她心地坏，而是因为瞧他不起，再加她不用头脑，只想嘻嘻哈哈的玩儿：她没有一件缺德的事没对他做过。他一知道她的灾难就大吃一惊，可是对她一点儿不露出来。他坐在她身旁，绝口不提那桩飞来横祸，只是安安静静的谈着话，跟从前一样。他没有一句可怜她的话，仿佛根本没觉得她瞎了眼睛。他也不提她看不见的东西，而只谈她能听到的或是能感觉到的；这些他都做得非常自然，好像他自己也是个瞎子。她先是不听他的，照旧哭着。第二天，她比较肯听了，甚至也跟他说了几句话了……

“真的，”那母亲接着说，“我也不懂他跟她有什么可说的。我们要去割草，没空照顾她，可是晚上回来，我们看到她心平气和的在那里说话了。从此以后，她精神渐渐的好起来，似乎把痛苦给忘了。有时候她还不免想起，她哭着，或者和高脱弗烈特谈些伤心的事；但他只做不听见，若无其事的尽讲些使她镇静而她感到兴趣的话。她自从残废以后，不愿意再出家门一步，临了居然被他劝得肯出去溜溜了。他先带着她在园子里走一转，以后又带她到田野里去，走得远一点。如今她上哪儿都认得路，什么都分得出，就跟亲眼看见一样。连我们没注意到的东西，她也会觉察；从前她除了自身以外对什么都不大关心的，现在对一切都有兴趣了。那一回，高脱弗烈特待在我们家的时期特别长。我们不敢多留他，可是他自动的住下来，直到她比较安静的时候。有一天，我听见她在院子里笑了。那一笑给我的感觉，我简直说不上来。高脱弗烈特似乎也很高兴。他坐在我的身旁。我们彼此望了一眼，我可以不怕羞的告诉你，先生，我把他拥抱了，而且诚心诚意的拥抱了。于是他跟我说：‘现在，我想可以走了。这儿用不着我了。’我想留他。他回答说：‘不，现在我该走啦。我不愿意多留了。’大家知道他像流浪的犹太人，不能长住一个地方的；所以我们也没多劝他。他走了。可是从此以后，他经过这儿的次数比从前多了，而他每来一次，摩达斯太总是非常快活，她的精神也一次比一次好。她重新管起家务来了；哥哥结了婚，她帮着照顾孩子；现在她再也不抱怨了，神气老是那么快乐。有时我心里不由得想：她要是眼睛不瞎的话，是不是能像现在一样的快活。是的，先生，有些日子我觉得还是像她那样的好，可以不看见那些坏人那些坏事。世界变得不像话了，真是

按此系德国北部，居民多奉新教，克利斯朵夫生于德国南部，居民多奉旧教。

基督教传说，耶稣背负十字架，向一犹太人阿哈斯佛吕斯求宿，遭受斥逐，耶稣就说：你将来要永远流浪，直要到我再来的时候为止。于是此犹太人即莫名其妙的四处流精，无法定居。迄今此项传说成为犹太民族被罚远离祖国的象征。

一天坏似一天……可是我很怕好天爷把我的话当真；因为我呀，虽然世界那么坏，还是想睁着眼睛看下去……”

摩达斯太又走了出来，话扯到旁的事情上去了。天已经转晴，克利斯朵夫想动身；可是他们不许，非要他在这儿吃了晚饭过一夜不可。摩达斯太坐在他身旁。整个晚上都守着他。他同情她的遭遇，很想和她亲切的谈一谈。可是他不给他这种机会。她只向他打听高脱弗烈特的事。听到克利斯朵夫说出她所不知道的情形，她显得又快活又嫉妒。她自己提到高脱弗烈特的时候，哪怕是一点儿小事，心里也老大的不愿意：你明明觉得她有许多话藏着没说，或者说了出来马上后悔。凡是关于他的回忆，她都当作自己的私产，不愿意跟别人分享。她这种感情跟那些把土地看作性命似的乡下女人一样的顽强：想到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像她一样的爱着高脱弗烈特，她就受不了，而且也不信有这种事。克利斯朵夫窥破了这一点，就让她去自得其乐。他听着她的话，发觉她虽然当初看得见高脱弗烈特的时候眼光很苛刻，但从失明以后，她已经把他构成了一个与事实不同的形象，同时她心中那点儿爱情的渴望，也都集中在这个幻想人物的身上。而且什么也不会来阻挠她一厢情愿的玩艺儿。瞎子都有种坚强的自信力会把自己不知道的事若无其事的编造出来，所以摩达斯太竟会对克利斯朵夫说：“你长得跟他一个样。”

他懂得，多少年来她在一间窗户紧闭，真相进不去的屋子里混惯了。如今她学会了在黑影里看东西，甚至把黑影都忘了；倘使她的世界中射进一道光明，说不定她倒会害怕。在断断续续的，喜孜孜的谈话中，她和克利斯朵夫提到一大堆无聊的小事，都是跟他不相干的，使他听了很不痛快。他不明白一个受过这么多痛苦的人，竟没有在痛苦中磨炼出一点儿严肃，而只想着些琐琐碎碎的念头；他几次三番想扯到比较正经的问题，都得不到回音；摩达斯太不能——或是不愿意——把谈话转到这方面去。

大家去睡觉了。克利斯朵夫老半天的睡不着。他想着高脱弗烈特，竭力要从摩达斯太无聊的回忆中间去找出他的面貌，可是极不容易，不由得很气恼。想到舅舅死在这儿，遗体一定在这张床上放过：他觉得很悲伤。他拚命体会舅舅临死以前的苦闷：不能说话，不能使盲目的少女懂得他的意思，他就阖上眼睛死了。克利斯朵夫恨不得揭开舅舅的眼皮，瞧瞧那里头的思想，瞧瞧这一颗没有给人知道，或许连自己也没认识清楚而就此长逝的灵魂，究竟藏着什么神秘。舅舅自己就从来不想知道这个神秘；他所有的智慧是在于不求智慧，对什么都不用自己的意志去支配，只是听其自然的忍受一切，爱一切。这样他才感染到万物的神秘的本体；而瞎子姑娘，克利斯朵夫，以及永远不会发觉的多少其他的人，所以能从他那边得到那么些安慰，也是因为他并不像一般人那样说反抗自然的话，而只给你带来自然界的和平，恬静，跟乐天安命的精神。他安慰你的方式像田野与森林一样……克利斯朵夫想起和舅舅一起在野外消磨的晚上，童年的散步，黄昏时所讲的故事，所唱的歌。他又记起那个冬天的早上，他万念俱灰的时候和舅舅在山岗上最后一次散步的情景，不由得眼泪都冒上来了。他不愿意睡觉；他无意中来到这个小地方，到处都有高脱弗烈特的灵魂；他要把这转侧不寐的神圣的一夜细细的咂摸。可是他听着急一阵缓一阵的泉声，尖锐的蝙蝠的叫声，不知不觉被年轻人的困倦压倒了；他睡着了。

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很高，农家的人都上工去了。楼下的屋子里只有那个老婆子和几个孩子。年轻的夫妇下了田，摩达斯太挤牛奶去了；没法找到

她。克利斯朵夫不愿意等她回来，心里也不大想再见她，便推说急于上路，托老婆子对其余的人多多致意以后就动身了。

他走出村子，在大路的拐角儿上瞥见瞎子姑娘坐在山楂篱下的土堆上。她一听见他的脚声就站起身子，笑着过来抓着他的手，说：“你跟我来！”

他们穿过草原往上走，走到一片居高临下的空地，到处都是鲜花跟十字架。她把他带到一座坟墓前面，说：“就在这儿。”

他们一齐跪下。克利斯朵夫想起当年和舅舅一同下跪的另一座坟墓，心里想：

“不久就要轮到我了。”

他这么想着，可没有一点感伤的意味。一片和平从泥土中升起。克利斯朵夫向墓穴弯着身子，低声祷告说：“希望你进到我的心里来！……”

摩达斯太合着手祈祷，默默的扯动着嘴唇。随后，她膝行着在墓旁绕了一转，用手摸索着花跟草，像抚摩一般；她那些灵敏的手指代替了她的眼睛，把枯萎的枝藤和谢落的紫罗兰轻轻的拔去。她用手撑在石板上想站起来：克利斯朵夫看见她的手指偷偷的在高脱弗烈特几个字母上摸了一遍。她说：“今天的泥土很滋润。”

她向他伸出手来；他也伸手给她。她教他摸摸那潮湿而温暖的泥土。他握着她的手不放；彼此勾在一起的手指直掐到泥里。他拥抱了摩达斯太。她也吻了他的嘴唇。

他们站起身来。她把才摘下的一束新鲜的紫罗兰递给他，把一些枯萎的放在自己胸口。扑了扑膝盖上的泥土，两人默默无言的出了墓园。云雀在田里啾啾的叫。白蝴蝶在他们头上飞。他们坐在一块草地上。村子里的炊烟伴着雨水洗净的天空一直线的上升。平静的河水在白杨丛中闪闪发光。一片明晃晃的蔚蓝的水汽在草原与森林上面铺了一层绒毛。

静默了一会，摩达斯太低声讲着美好的天气，仿佛亲眼看见似的。她半开着嘴唇，深深的呼吸着，留神万物的声响。克利斯朵夫也知道这种音乐的价值，把她想到而说不出的代她说了出来。他又把草底下或空气中细微莫辨的叫声和颤动，指出了几种，她说：

“啊！你也懂得这些吗？”

他回答说是高脱弗烈特教他的。

“他也教你的吗？”她说话的神气有点儿懊丧。

他真想和她说：“你别嫉妒了吧！”

但他看见光明的世界在他们周围充满着笑意。他瞧着她那双失明的眼睛，觉得非常同情。他问：“那末，你也是跟高脱弗烈特学的了？”

她回答说是的，又说她现在比以前更能体会这些。（她不说在“什么”以前，她避免提到失明二字。）

他们相对无语的过了一会。克利斯朵夫不胜怜悯的瞧着她。她也觉得了。他真想告诉她，表示他的惋惜，希望她对他说了些心里话。

“你以前有过痛苦吗？”他很恳切的问。

她一声不出的僵在那里，拉下几根草放在嘴里乱嚼。过了一会，——（云雀唱着歌往高空飞去，）——克利斯朵夫讲到他自己也有过痛苦，高脱弗烈特安慰他。他说出他的悲伤，苦难，像在那里自言自语。瞎子姑娘留神听着，阴沉的脸色渐渐开朗了。克利斯朵夫仔细瞧着她，看见她预备说话了：她把身子挪动了一下想靠近他，向他伸出手来。他也往前挪动了一点，——可是

一刹那之间她又恢复了先前那种麻木的神态，他说完以后，她只回答几句极无聊的话。看她没有一丝皱痕的丰满的脑门，你可以觉得她有种乡下女人的固执，像石子一样的硬。她说得回家去招呼哥哥的孩子了，说话之间神色很从容，还带着几分笑意。

他问：“你觉得快乐吗？”

听他这么说着，她似乎更快乐了。她回答说是的，又把她觉得快乐的理由说了几遍；她竭力要他信服，谈着孩子，谈着家庭……

“是的，”她说，“我非常幸福！”

她站起身子预备走了，他也站了起来。两人告别的时候，语气都很轻快。摩达斯太的手在克利斯朵夫手里稍微抖了一下。他说：“今儿你上路，天气一定好的。”

她又嘱咐他在某处的三岔口上别走错了路。

于是他们分手了。他走下山岗。到了下面，他回头一看，她还站在老地方扬着手帕对他示意，像看见他似的。

对自己的残废这样一厢情愿的否认，那末勇敢那末可笑，使克利斯朵夫又感动又不痛快。他觉得摩达斯太多么值得怜悯，甚至也值得佩服；可是要和她在一起住两天，他就受不了。——他一边赶着路，（两旁都是开满野花的篱垣，）一边又想到可爱的苏兹老人，想起那双清朗而温柔的眼睛，面对着多少伤心事和难堪的现实而不愿意看。

“他把我又看成怎么样呢？”他问自己。“我跟他理想中的我多么不同！他所看到的我，只是他心里想看到的。一切都像他自己的面目，像他一样的纯洁，高尚。要是看到了人生的真相，他是受不住的。”

他又想起那个姑娘。包围在黑暗里面而否认黑暗，定要相信有者为无，无者为有。

于是他对以前痛恨的德国人的理想精神，看出了它的伟大；以前他恨的是这种理想精神被一般庸俗的心灵拿去搅出虚伪的荒唐事儿。如今他看到，这种信念之美是在于能在这个世界上另造一个世界，跟这个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好比海洋中间的一个小岛。可是他自己受不了这种信念，他不愿意逃到这个死人的岛上去……他要的是生命，是真理！他不愿意做一个说谎的英雄。也许没有了这种乐观的谎言一般弱者就活不成；倘使把支持那些可怜虫的幻象加以破灭，克利斯朵夫也要认为罪大恶极的暴行。然而他自己没法拿这个做藉口：与其靠了自欺欺人的幻想而活着，他宁可死的……可是艺术不也是一种幻想吗？——不，艺术不应当成为幻想，应当是真理！真理！我们得睁大眼睛，从所有的毛孔中间去吸取生命的强烈的气息，看着事实的真相，正视人间的苦难，——并且放声大笑！

一眨眼又是几个月。克利斯朵夫没希望离开家乡了。唯一能够帮助他的人，哈斯莱，不愿意帮助他。至于苏兹老人的友谊，是他才得到而马上就失掉的。

回家以后，他写过一封信去，跟着接到两封很亲热的来信；可是因为懒，尤其因为不善于用书信来表白情感，他把复信一天天的搁了下来。而正当他决心提笔的时候，忽然接到耿士一封短简，报告他的老友死了。据说苏兹从旧病复发的支气管炎变成肺炎，病中老惦念着克利斯朵夫，可不许人家惊动他。虽然他闹着多年的病，身体已经衰弱到极点，临终仍免不了长期残酷的痛苦。他托耿士把自己的死讯通知克利斯朵夫，说他到死都记念着他，感谢

他赐予他的幸福，只要克利斯朵夫在世一天，他就在冥冥中祝福他一天。——耿士可没有说出来，他旧病复发，终致不起的祸根，大概就在陪着克利斯朵夫的那天种下的。

克利斯朵夫悄悄的哭了一场。他这才感到亡友的价值，这才觉得自己原来多么爱他；像往常一样，他后悔没有把这一点和他说得明白些。如今可是太晚了。——他此刻还剩下些什么呢？仁慈的苏兹只出现了一刹那，而这一刹那反而使克利斯朵夫在朋友死后觉得更空虚。——至于耿士和卜德班希米脱，除了他们与苏兹那点儿相互的友谊以外，谈不到什么别的价值。克利斯朵夫和他们通了一次信，彼此的关系就告了一个段落。——他也试着写信给摩达斯太，她教人回了他一封很平淡的信，只讲些无关紧要的话。他不愿意再继续下去了。他不再给谁写信，而谁也不写信给他。

静默。静默。沉重的静默一天一天的压在他头上。仿佛一切都成了灰烬。仿佛生命已经到了黄昏；而克利斯朵夫才不过开始生活呢。他决不愿意就此听天由命！他还没到睡觉的时间，还得活下去……

可是他没法再在德国活下去。小城市的那种闭塞偏狭压着他的精神，使他气愤得对一切都不公平了。他的神经都暴露在外面，动不动就会受到伤害，会流血。他活像关在市立公园的笼子跟土洞里的可怜的野兽，受着苦闷煎熬。由于同情，克利斯朵夫有时候去看它们，打量着它们美妙的眼睛，看着那狂野而绝望的火焰一天天的黯淡下去。啊！那还不如痛痛快快地把它们一枪打死，倒是解放了它们呢！无论什么手段，也比那些人的不理不睬，教它们活不成死不得的态度要好一些！

克利斯朵夫最感压迫的，还不是一般人的敌意，而是他们变化无定的性格，既没有格局也没有内容的性格。他宁可跟那些死心眼儿的，头脑狭窄的，对一切新思想都不愿意了解的老顽固打交道！硬来，可以硬去；哪怕是岩石吧，可以用铁锹去开凿，用火药去炸毁。可是对付一块没有定形的东西，轻轻一碰就会像肉冻似的陷下去而不留一点痕迹的，你能有什么办法？一切的思想，一切的精力，掉在这种泥淖里都变得无影无踪：即使有块石头掉下去，深渊的面上也不会泛起多少皱纹；嘴巴才张开了一下，马上又闭了起来：刚才的面目早已消灭了。

他们可不能说是敌人。真是差得远呢！他们这种人，在宗教上，艺术上，政治上，日常生活上，都没有勇气去爱，去憎，去相信，甚至也没勇气不相信；他们耗费所有的精力，想把不可调和的事情加以调和。特别从德国战胜以后，他们更想来一套令人作恶的把戏，在新兴的力和旧有的原则之间觅取妥协。古老的理想主义并没被人唾弃，因为大家没有那个气魄敢坦坦白白的这样做，而只想把传统思想加以歪曲，来迎合德国的利益。头脑清明而两重人格的黑智尔，直等到来比锡与滑铁卢两仗以后，才把他的哲学立场和普鲁士邦的沆瀣一气：这是一个显著的榜样。——利害关系既然改变了，一切的原则也就跟着改变了。

吃败仗的时候，大家说德国是爱理想。现在把别人打败了，大家说德

所谓德国战胜系指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战争。

黑智尔（1770—1831）早年轻视普鲁士，称颂拿破仑；晚年则崇拜普鲁士，甚至于所著《历史哲学》的绪论中提到“绝对观念”时，隐含国家至上，尤其是普鲁士至上之意。来比锡一役（1813年）为拿破仑败于俄、奥、普联军之役。而来比锡与滑铁卢战争已为黑智尔晚年之事。

国就是人类的理想。看到别的国家强盛，他们就像莱辛一样的说：“爱国心不过是想做英雄的倾向，没有它也不妨事”，并且自称为“世界公民”。如今自己抬头了，他们便对于所谓“法国式”的理想不胜轻蔑，对什么世界和平，什么博爱，什么和衷共济的进步，什么人权，什么天然的平等，一律瞧不起；并且说最强的民族对别的民族可以有绝对的权利，而别的民族，就因为弱，所以对它绝对没有权利可言。它，它是活的上帝，是观念的化身，它的进步是用战争，暴行，压力，来完成的。如今自己有了力量，力量便是神圣的。力代表了全部的理想主义，全部的智慧。

实际上，德国几百年来都因为徒有理想没有实力而吃了大亏，所以在历经艰辛之后，不得不伤心的承认最要紧的是力：这一点是很可以原谅的。可是以埃尔特与歌德的后人而有这样的自白，其隐痛也可想而知。德国民族的胜利其实是德国理想的衰微与没落……可怜连最优秀的德国人也偏向于服从，所以要他们放弃理想是最容易不过的。一百年以前莫才就说：“德国人的特征是服从。”特·斯太埃夫人也说：“德国人是勇于服从的。他们会用一套自圆其说的哲学来解释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事，例如对强权的尊重，以自己的恐惧为软心肠，从而使尊重强权一变而为佩服强权。”

克利斯朵夫在德国最伟大的人物和最渺小的人物身上都发见这种心理。席勒笔下的威廉·泰尔，肌肉像挑夫一般的拿腔作调的布尔乔亚，就是一例，无怪那个直言不讳的鲍尔纳要批评他说：“为了使荣誉与恐惧不致抵触，他故意低着头走过奚斯莱的冠冕，表示他没看见冠冕而不行礼，可不是抗命。”小而言之，七十岁的老教授韦斯又是一个例子：他在克利斯朵夫城里是最有声望最受尊敬的学者，可是在街上一碰到什么少尉之流，会赶紧从人行道上闪到街心去让路。克利斯朵夫看到日常生活中这些琐碎的奴性表现，不由得心头火起。他为之痛苦极了，仿佛卑躬屈膝的便是他自己。他在街上眼看着军官们飞扬跋扈，暗中非常气愤，他故意不让路，一边还直瞪着眼回敬他们。好几回他差点儿闹事，仿佛有心寻衅似的。虽然他比谁都明白这一类惹是招非的举动的无聊跟危险，但他往往有些理智不大清楚的时间：因为他老是压着自己，再加那些日积月累，无处发泄的强壮的精力，使他烦躁不堪。在那种情形之下，他随时可以闯祸，他觉得要是在这儿再待一年，他就完了。他痛恨强暴的军国主义，好像压在自己的心上；他也恨那些拖在街面上铿锵作声的刀剑，在营门口摆着的仪仗，和对着城墙预备开放似的大炮。当时有一批喧腾众口的黑幕小说，揭穿各地军营里的腐败，把军官全描写成坏蛋，除了做个听人支配的傀儡以外，只晓得闲逛，喝酒，赌钱，借债，受人厮养，互相攻讦，从上到下的欺负下属。克利斯朵夫想到自己将来有一天要服从这种人，他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不，那他是受不了的，永远受不了的；他怎么能委屈自己去向他们低头，被他们羞辱呢？……他可不知道军人中间有一部分极高尚的人也在那里痛苦，因为他们眼看自己的幻想破灭了，多少的精力，

此处所谓“观念”，当即指黑智尔的“绝对观念”。又观念一词在此应视为形而上学中之“原理”。

莫才为德国十八世纪政论家。特·斯太埃夫人为法国浪漫运动的先驱人物，以反对拿破仑，流亡德国甚久，著有《论德国》一书有名于时，此处即引该书中语。

威廉·泰尔为传说中解放瑞士的民族英雄。相传（并非史实）十四世纪时奥皇所派统辖瑞士的总督奚斯莱在于莱城广场上置有冠冕，全市民经过均须鞠躬，独威廉·泰尔抗命，卒领导民众推翻奥国统治云云。德国诗人席勒曾根据此项传说写成诗剧。

青春，荣誉，信仰，不惜牺牲的热情，都给糟蹋了，浪费了，剩下的只有职业的无聊。——而当军人的要不拿牺牲做目标，他的生活就变了最没意思的活动，只摆着臭架子，仿佛没有信仰而成天念着经一样……

乡土对于克利斯朵夫已经显得太窄了。他像飞鸟一般，到了某个固定的季候，觉得有股无名的力，像海洋上的潮汐似的，突然在胸中觉醒，——那便是天南地北到处流浪的本能！在苏兹老人遗赠他的埃尔特与斐希德的著作里，他也发见和自己同样的心灵，——并非俯首帖耳，死守家园的“大地之子”，而是永远扑向光明的“精灵”，是“太阳之子”。

往哪儿去呢？他不知道。但他的眼睛望着南方的拉丁国家。第一是法兰西。法兰西永远是德国人彷徨无主的时候的救星。已经有过多少回了，德国的思想界一边诋毁它，一边利用它，被德国大炮轰得烟雾弥漫的巴黎，便是在一八七一年以后，对德国仍然有极大的魔力。各种形式的思想和艺术，从最革命的到最落伍的，在那儿都可以轮流，或是同时的，找到实际的例子或精神上的感应。像多少的德国音乐家在困苦绝望的时候一样，克利斯朵夫远远的瞻望着巴黎……关于法国人，他知道些什么呢？——不过两个女性的脸，和偶尔念过的一些书罢了。可是这已经足够他想象出一个光明，快乐，豪侠的国家。甚至高卢民族自吹自捧的习气，也和他年轻而大胆的精神非常投机。他相信这些，因为他需要相信，因为他满心希望法国是这样的。

他决意走了。——可是为了母亲而不能走。

鲁意莎老了。她疼爱儿子，他是她唯一的安慰；而他在世界上最爱的也只有母亲。但他们互相折磨，使彼此痛苦。她不大了解克利斯朵夫，并且不想了解，只知道一味的爱他。她头脑狭窄，胆子很小，思路不清，心肠挺好，那种爱人和被爱的需要令人感动，也令人喘不过气来。她敬重儿子，因为觉得他很博学；但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使他的性灵窒息的。她以为他一定会陪着她，终身住在这个小城里。两人一块儿过了多少年，她做梦也没想到这种生活方式将来会变化。既然她这样很幸福，他又怎么会不幸福呢？她的梦想不过是他将来娶一个当地小康人家的女儿，每星期日在教堂里弹着大风琴，永远陪着她。她把儿子老是当作只有十二岁，巴不得他永远不超过这个年龄。不幸儿子业已长大成人，在这个狭窄的天地中没法呼吸。而她竟无意中教可怜的人受罪。

做母亲的不了解什么叫做雄心，只知道有了天伦之乐，尽了平凡的责任，便是人生的全福；她这一套不假思索的哲学的确也有许多真理和伟大的精神在内。她那颗心是只知有爱不知有其他的。舍弃人生，舍弃理性，舍弃逻辑，舍弃世界，舍弃一切都可以，只不能舍弃爱！这种爱是无穷的；带着恳求意味的，同时是苛求的。她自己把什么都给了人，要求人家也什么都给她；她为了爱而牺牲人生，要被爱的人也作同样的牺牲。一颗单纯的灵魂的爱就有这种力量！像托尔斯泰那么彷徨歧途的天才，或是衰老的文明过于纤巧的艺术，摸索了一辈子，几世纪，经过了多少艰辛，多少奋斗而得到的结论，一颗单纯的灵魂，靠了爱的力量一下子便找到了！……可是在克利斯朵夫胸中激荡着的另外一个世界自有另外一批规则，需要另外一种智慧。

他久已想把自己的决心告诉母亲，但怕她难过，每次话到了嘴边又咽下去，想过一晌再说罢。有过两三次，他怯生生的露出要离家的意思；鲁意莎却不把这些话当真：——或许是她假装如此，为的要使他相信他自己也不过是说着玩儿的。于是他不敢再往下说了，但他沉着脸，担着心事，一望而知

有桩秘密压在心里。可怜的母亲虽然凭着直觉早已猜到这桩秘密，可老怀着鬼胎不愿揭穿。晚上他们俩一灯相对，默然无语的时候，她突然觉得他要说出来了；惊骇之下，她开始东拉西扯，把话说得很快，连自己也不知道说什么，可是无论如何非阻止他开口不可。通常她总本能的找到些使他开不得口的最好的话：怨自己身体不行，抱怨虚肿的手脚和关节不遂的腿；她把疾苦格外夸张，说自己是个老瘫子，完全不中用了。这些天真的手段其实也瞒不过他；他悲哀的望着母亲，似乎暗中埋怨她；过了一会，他站起身来，推说疲倦，睡觉去了。

但所有这些策略也不能把事情长此拖下去。一天晚上她又用到那套法宝的时候，克利斯朵夫鼓足了勇气，把手放在母亲手上，说道：“妈妈，你听着。我有事跟你说。”

鲁意莎吃了一惊，勉强笑着回答，喉咙已经在抽搐了：“什么事啊，孩子？”

克利斯朵夫嘟嘟囔囔的说要离家的意思。她竭力认为他是开玩笑，像往常一样设法把话扯开；但这一回他始终板着正经的脸说下去，神气的坚决和严肃使人没有怀疑的余地。于是她不作声了，血都停止了，浑身冰冷，眼睛吓得呆呆的，直瞪着克利斯朵夫。眼睛里那副痛苦的表情把他也噤住了开不得口；一时间他们俩都没有了声音。赶到她透过气来，便嘴唇哆嗦着说：“那怎么行呢！……怎么行呢！……”

两颗很大的眼泪沿着她腮帮淌下来。他丧气的转过头去，双手捧着脸。母子俩一齐哭了。过了一会，他进了卧室，直躲到明天。他们再也不提昨天的事；因为他不提，她勉强教自己相信他已经让步了。可是她始终担着心事。

他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太痛苦了。不管说出来是怎样伤心也非说不可了。因为痛苦，他变得自私，同时就忘了自己所能给人的痛苦。他把话一口气说完，躲着母亲的目光，唯恐搅乱了自己的心。他连动身的日子都定了，免得再费第二次口舌；他不知像今天这样可怜的勇气能不能再有第二次。鲁意莎嚷着：“别说了，别说了……”

他咬紧牙齿拿定了主意，继续说着。说完之后，——（她嚎啕大哭了，）——他握着她的手，想使她明白为了他的艺术，他的生活，到外地去待些时候是绝对必需的。她却不愿意听，只哭哭啼啼的说着：“不成，不成，……我不愿意……”

解释了半天一无结果，他走开了，以为过一夜或许她会想明白些。可是第二天他在饭桌上狠着心肠又提到那个计划的时候，她马上把嘴边的面包放下，用着悲痛的埋怨的口气说：“难道你一定要折磨我吗？”

他心软了一软，可是回答说：“妈妈，没有办法呀！”

“怎么没办法！……你这是要我痛苦……你简直疯了……”

他们俩都想说服对方，可都不听彼此的话。他懂得争辩是没用的，只能增加双方的痛苦；他就摒挡一切，公然作出发的准备。

鲁意莎看到无论怎么样哀求都拦不住他，就变得垂头丧气，抑郁到极点。她整天关在自己屋里，晚上也不点灯；她不说话，不吃东西，夜里还在床上哭。他听了像受着刑罚一样，终夜在床上翻来覆去，受良心责备，痛苦得差点儿叫起来。他多爱她！干么要使她痛苦呢？……可怜将来为他痛苦的还不止母亲一个人呢；那他也看得很明白……干么命运要给他完成某种使命的愿望和力量，使他所爱的人为之受苦呢？

“啊！”他心里想，“要是我能够自主，要是没有这股专横的力逼着我去完成使命，否则我就得羞愧以死的话，那末我一定会使你们——我所爱的人们——幸福！先让我生活，活动，奋斗，受苦；然后我将抱着更大的爱回到你们怀里！本来吗，我只希望能够爱，爱，除了爱以外什么都不管！……”

假使伤心的母亲能有勇气把抱怨的话忍着不说出来，他一定会软心的，可是不够坚强而又多嘴的鲁意莎，偏藏不住心里的痛苦而说给邻居听了，也说给其余的两个儿子听了。小兄弟俩看到有个好机会可以抓住克利斯朵夫的错处，怎么肯轻易放过呢？尤其是洛陶夫素来嫉妒长兄，——虽然克利斯朵夫目前的情形没有什么可教人嫉妒的，——只要听见一两句赞美克利斯朵夫的话就受不住，暗中还怕他将来会成功；尽管自己不敢承认有这种卑鄙的念头，但他的确担着心事。因为他相当聪明，感觉到哥哥的天才，并且怕别人也一样的感觉到。所以洛陶夫此刻能凭着优越的地位来压倒克利斯朵夫，真是高兴极了。他明知母亲手头拮据而自己很有力量帮助母亲，可永远把全部的责任放在克利斯朵夫一人身上。然而一听到克利斯朵夫的计划，他马上变成孝子了。他对于哥哥遗弃母亲的行为愤慨非凡，斥为自私自利的兽行。他居然当面跟克利斯朵夫这样说，用长辈的口吻教训他，仿佛对付一个该打的小孩子；他傲慢的叫克利斯朵夫别忘了对母亲的责任，和母亲为他所作的种种牺牲。克利斯朵夫气坏了，把洛陶夫连捶带踢的赶出门外，拿他看作小坏蛋，假仁假义的畜生。洛陶夫为了出气便去煽动母亲。鲁意莎被他一激，以为克利斯朵夫真是个性逆的儿子。她听见洛陶夫说克利斯朵夫没有离家的权利，觉得正中下怀。哭原来是她最有力量的武器，但光是哭哭啼啼她还不甘心，便说了些偏激的话埋怨克利斯朵夫，把他惹恼了。两人彼此说了些难堪的话；结果是至此为止还在犹豫的克利斯朵夫反而下了决心，加紧作出发的准备。他知道那般慈悲的邻居哀怜他的母亲，认为她是牺牲者而他是刽子手，便咬咬牙齿，再也不改变主意了。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克利斯朵夫和母亲简直不大说话了。他们非但不尽量享受这最后几天，反而生着无谓的气，把有限的光阴虚度了，把多少感情糟掉了，——两个相爱的人往往有这种情形。他们只在吃饭的时候见面，相对坐着，彼此不瞧一眼，不作一声，勉强吞几口东西，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免得发僵。克利斯朵夫费了好大的劲才从喉头迸出几个字：鲁意莎却置之不理；而等到她想开口的时候，又是他不做声了。母子俩都受不了这个局面；但这局面越延长，他们越没法摆脱。难道他们就这样的分手吗？那时鲁意莎可明白自己过去的偏枉和笨拙了；但她那么痛苦，不知道怎样去挽回她认为已经失掉的儿子的心，不知道怎样去阻止她绝对不允考虑的远行。克利斯朵夫偷觑着母亲苍白虚肿的脸，心里难过得像受着毒刑一样；但他已经下了必走的决心，而且知道那是自己生死攸关的大事，便只希望自己已经走了，免得受良心责备。

行期定在后天。他们照旧冷冰冰的，不声不响吃完了晚饭，克利斯朵夫回进卧房，手捧着头对桌子坐着，什么工作都不能做，他只是千思百想的磨着自己。夜深了，已经快到一点。他突然听见隔壁屋里响了一声，一张椅子翻倒了。他的房门给打开了，母亲穿着衬衣，光着脚，嚎啕着扑过来勾住他的脖子。她浑身滚热的拥抱着儿子，一边呜咽一边打着嗝：“别走呀！别走呀！我求你！我求你！孩子，你别走呀……！我会伤心死的……那我是受不住的，受不住的！……”

他惊骇之下，把她拥抱着，再三的说：“好妈妈，静静吧，静静吧，我求您。”

可是她又接着说：“我受不住的……我现在只有你了。你一走，我怎么办呢……我一定会死的。我死也要死在你面前，不愿意孤零零的死。等我死了再走罢！”

她的话使他心都碎了。他不知道说些什么来安慰她。对这种爱和痛苦的发泄，讲理有什么用？他把她抱在膝上，把她亲吻，说着好话。她慢慢的静下来，轻轻的哭着。看她比较安定了些，他就说：“去睡觉罢：别着了凉。”

她可老说着：“你别走呀！”

“我不走就是了。”他声音很轻的回答。

她浑身哆嗦了一下，抓着他的手：“真的吗？真的吗？”

他非常丧气的转过头去：“明儿，明儿再告诉您……现在您去吧，我求您！……”

她很柔顺的站起来，回到自己房里去了。

明天早上，她觉得半夜里神经病似的发作了一场好不惭愧，同时想起儿子等会不知怎么答复又非常害怕，她坐在屋子的一角等着，拿着打毛线的活儿，可是她的手不愿意拿，让活计掉在地下。克利斯朵夫进来了。两人轻轻招呼了一声，彼此都不敢抬起头来看一眼。他沉着脸站在窗前，背对着母亲不作一声。他心里在交战，可早已知道结果是怎么回事，故意想多挨一些时间。鲁意莎不敢和他说话，生怕引起那个她急于想知道而又怕知道的答复。她勉强捡起活儿，视而不见的做着，把针子都弄错了。外边下着雨。沉默了半晌，克利斯朵夫走到她身边来了；她一动不动，心忐忑的跳着。克利斯朵夫呆呆的望着她，然后突然跪下，把脸藏在母亲的裙子里，一句话也不说，哭了。于是她懂得他是不走了，心里的悲痛不由得减轻了许多；——可是她又立刻后悔，因为她感觉到克利斯朵夫为她所作的牺牲；她这时的痛苦，正和克利斯朵夫牺牲了她而决意出走的时候所受的痛苦一样。她弯下身子吻着他的额角和头发。他们俩一齐哭着，痛苦着。终于他抬起头来；鲁意莎双手捧着他的脸，望着他，眼睛对着眼睛。她真想和他说：“你走罢！”可是她没有勇气。

他真想和她说：“我留在家里很快活。”而他也没有勇气。

这种难解难分的局势，母子俩都没法解决。她叹了口气，表示她爱到极点，也痛苦到极点：“唉，咱们要能同生同死才好呢！”这种天真的愿望把他深深的感动了，擦了擦眼泪，强笑着说：“咱们会死在一块儿的。”

她紧跟着问：“一定吗？你不走了吗？”

他站起身来回答：“一言为定。甭提了。用不着再谈了。”

的确，克利斯朵夫是一言为定了：他不再提离家的话；但要心里不想不是他自己能作主的。他固然留在家了，但悒郁不欢与恶劣的心绪使母亲对于他的牺牲付了很大的代价。笨拙的鲁意莎，——明知自己笨拙而老做着不该做的事，——明知道他为什么抑郁，却偏偏要逼他亲口说出来。她用着婆婆妈妈的，惹人气恼的，纠缠不清的感情去磨他，使他想起他跟母亲的性情多么不同，而这一点原是他竭力要忘掉的。他屡次想和她说些心腹话。但正要开口的时候，他他之间忽然有了一道万里长城，使他立刻把心事藏起来。她猜到他的意思，可是不敢，或是不会去逗他说出来。万一她作这种尝试，结果倒反使他把闷在心里受不了而极想吐露的秘密格外的深藏。

还有无数的小事情，没有恶意的怪脾气，也使克利斯朵夫心中着恼，觉得和母亲格格不入。老年人免不了嘴碎，常常把街坊上的闲话翻来覆去的唠叨，或是用那种保姆般的感情，搬出他幼年时代的无聊事儿，永远把他跟摇篮连在一起。我们费了多大力量才从那里跳出来，长大成人，此刻居然由朱丽叶的乳母抖出当年的尿布，翻出那些幼稚的思想，教你想起受着冥顽的物质压迫的混沌时代！

在这方面，她感情表现得那末动人，——仿佛对付一个小孩子，——把他软化了；他只能听凭摆布，也把自己当做一个小孩子。

最糟的是两人从早到晚在一起生活，跟旁人完全隔离。心中苦闷的时候，因为有了两个人而且彼此爱莫能助，所以苦闷格外加强；结果各人又怪怨对方，到后来真的相信自己的痛苦是应该由对方负责的。在这种情形之下，还是孤独比较好，痛苦也只有一个人痛苦。

这样，母子俩每天都在受罪。要不是出了件偶然的事，出了件表面上很不幸，而骨子里是大幸的事，把他们不上不下的局面给解决了的话，他们竟永远跳不出这个互相争持的苦海。

十月里的一个星期日，下午四点光景。天气很好。克利斯朵夫整天躺在房里默想，咂摸着他的悲苦。

他忍不住了，觉得非到野外去走一程，消耗一点精力，用疲倦来阻断自己思想不可。

他从上一天起就跟母亲很冷淡。他差不多要辞而别的出去了。可是到了楼梯台上，他又想起这样的走掉，她独自在家一定要为之整个黄昏都不快活的，便重新回进屋子，推说忘了什么东西。母亲的房门半开着。他探进头去看到了母亲。一共是几秒钟的功夫……可是这几秒钟在他今后的生命中占着多重重要的地位！

鲁意莎刚做罢晚祷回来，坐在平时最喜欢的那个靠窗的角上。对面一堵开裂而乌七八糟的白墙挡着视线；但从她的一角，在右边可以望见邻家的两个院落，和院落那一边的一方像手帕大小的草坪。窗槛外面，一盆五龙爪沿着绳子往上爬，布满着纤巧的蔓藤，在斜阳中摇曳。鲁意莎坐在一张小椅子上，偻着背，膝上摆着本厚厚的圣经，可并不念。她把两手——血管隆起，指甲坚硬，方方的往下弯着，明明是做工的手——平放在书上，温柔的望着蔓藤和在蔓藤中透露出来的天空。阳光照着绿叶，间接的反映出她疲倦的脸，还洒上一些惨绿色的影子，白头发很细，可是不多，半开的嘴巴在那里微笑。她体味着这一忽儿的悠闲恬适。那是她一星期中最愉快的时间。她沉浸在所有痛苦的人觉得最甜蜜的，一无所思的境界里：迷离惝恍，只有一颗朦胧半睡的心在喁喁细语。“妈妈，”他说，“我想出去，上蒲伊那边溜溜，回来要晚一些。”

半睡半醒的母亲略微惊跳了一下，转过头来，用着慈祥和平的眼睛望着他：

“好，你去罢，孩子：你这主意很不错，别错过了好天气。”她向他笑笑。他也向她笑笑。他们俩彼此瞧了一会，然后点点头，眯了眯眼睛，表示告别了。

他轻轻的把门带上。她慢慢的又回到她的幻想中去了，儿子的笑容给她

的梦境照上一道明亮的反影，像阳光射在黯淡的五龙爪上一样。

于是，他离开了她，——永远的离开了她。

那天傍晚，温和的太阳颜色只是淡淡的。田野懒洋洋的仿佛快睡着了。各处村子上的小钟在静寂的原野里悠悠的响着。一缕缕的烟在阡陌纵横的田间缓缓上升。一片轻盈的暮霭在远处飘浮。白的雾铺在潮湿的地下，等着黑夜降临好往上升去……一条猎狗鼻子尽嗅着泥土在萝卜田里乱窜。成群的乌鸦在灰色的天空打转。

克利斯朵夫一边胡思乱想，一边茫无目的而不知不觉的向着一个目标走去。几星期来，他到城外散步老是以一个村子为中心，知道在那儿一定能遇到一个吸引他的美丽的姑娘。那不过是种吸引，可是很强烈的，有点乱人心意的吸引。要克利斯朵夫不爱什么人是不大可能的，他的心难得会空虚，其中永远有一个为它膜拜的偶像。至于那偶像是否知道他的爱，他完全不以为意；但他需要爱，心中不能有一忽儿没有光明。

这一回他热情的对象是个乡下姑娘，好似哀里才遇见利百加一样，也是在水边遇到的；但她并不请他喝水，倒反把水撩在他脸上。她跪在一条小溪的堤岸缺口的地方，在两株杨柳中间，树根在周围盘成岩洞一般：她精神抖擞的洗着衣服，嘴巴跟手臂一样的忙着，因为她和对岸洗衣服的同村女伴在那里大声说笑。克利斯朵夫躺在几步以外的草地上，两手支着下巴望着她们。她们毫不羞怯，照旧嘻嘻哈哈的，说话很放肆。他并不留神她们说些什么，只听着她们的嘻笑声，捣衣声，远处草地里的牛鸣声，目不转睛的盯着那漂亮的洗衣女郎出神了。——不久，那些女孩子发觉了他注视的对象，互相说些俏皮话；那姑娘也冷言冷语的刻薄他。因为他老呆着不动，她便站起身子把绞干的衣服晾到小树上去，顺便过来对他看个仔细。走近他身边的时候，她有心把衣服上的水洒在他身上，涎皮赖脸的望着他笑。她个子很瘦，很结实，尖尖的下巴往上抄起，鼻子很短：眉毛很弯，深蓝的眼睛光彩四射，带点儿凶相，神气很大胆，嘴巴很好看，厚嘴唇微微往前撅着，像个希腊面具，浓密的金黄卷发披在颈窝上，皮肤是紫铜色的。她头挺得笔直，无论说什么总带着讪笑的意味；走路像男人一样，把太阳晒得乌黑的两手甩来甩去。她一边晾衣服一边用挑拨的目光瞅着克利斯朵夫等他开口。克利斯朵夫也瞪着她，却没有意思跟她搭讪。末了，她朝着他哈哈大笑了一阵，回到同伴那儿去了。他始终躺着，直到薄暮时分，眼看她背着篓子，抱着胳膊，佝着背，咕咕呱呱的一路说笑一路回去。

过了两三天，他在城里的菜市上，在成堆的萝卜、番茄、黄瓜、青菜中间又碰见了她。他信步走去，望着那些女菜贩整整齐齐的站在菜篮后面，好似预备出卖的奴隶。警察局的职员一手拿着钱袋一手拿着一叠票子，向每个菜贩收一文小钱，给一张小票。卖咖啡的女人提着满篮的小咖啡壶绕来绕去。一个老虔婆，吃得肥肥胖胖的，挽着两只挺大的篮，嘴里老天爷长老天爷短的向人讨菜蔬，没有半点羞怯的神气。大家叫叫嚷嚷；古老的秤托着绿色的篮，的的笃笃的响个不停；拖着小车的大狗高高兴兴的叫着，自以为当着重要的角色而得意非凡。就在这片喧闹声中，克利斯朵夫瞥见了他的利百加，

《旧约·创世记》载：亚伯拉罕遣卜人哀里才为己子以撒娶妻。哀里才行至拿鹤城，在水井边祈祷，倘遇到第一个给他喝水的女人，就定聘为以撒之妻。后利百加先至，哀里才求水，利即与水，卒聘为以撒之妻。

——真名叫做洛金。——她在金黄色的发髻上戴着一张白里泛绿的菜叶，好似一个齿形的头盔，西前堆着金黄的蒜头，粉红的萝卜，碧绿的刀豆，鲜红的苹果。她坐在一只篓子上咬着苹果，一个又一个的尽吃，根本不在乎卖不卖，不时拿围裙抹抹下巴和脖子，用手臂撩撩头发，把面颊挨着肩头，或者把鼻子挨着手背，摩擦几下。再不然，她无精打采的抓着一把豌豆在两只手里倒来倒去。她东张西望，态度很悠闲，可是把周围的情形都瞧在眼里：凡是针对她的目光，她都不动声色的一一记着。她当然看到克利斯朵夫，便一边和买菜的主顾说话，一边拧着眉毛从他们的肩头上望出去，注意他。她面上做得非常庄严，心里却在暗笑克利斯朵夫。他的模样也的确很可笑：像木头人似的站在几步以外，死命用眼睛盯着她，过后又一言不发的走了。

他好几次到她的村子四周徘徊。她在院子里来来往往，他站在路上远远的望着。他不承认是为她而来的，其实也差不多是无意中走来的。他一心一意作曲的时候，常常像害了梦游病一样：心灵中有意识的部分贯注着乐思，其余的部分便让另外一个无意识的心灵占据了，那是只要他稍一分心就会起来控制他的。他对着这姑娘，往往被胸中嗡嗡作响的音乐搅得迷迷糊糊：眼睛望着她，心里依旧在沉思幻想。他不能说爱她，甚至想也没想过，只是喜欢看到她。他根本没注意自己有个欲望老是要来找她。

他这样的时常露面，当然引起人家的议论。农庄上后来知道了克利斯朵夫的来历，把他作为笑柄。可是谁也不以为意，因为他并不侵犯人家。一句话说完，他不过像个傻子，而他自己也不在乎是否像傻子。

那天正是村里的一个节日。儿童们掷着豌豆喊着“君皇万岁！”关在棚里的小牛在叫，酒店里传出唱歌的声音。尾巴像彗星似的风筝在田野的上空飘荡。母鸡在肥料堆中乱扒；风吹着它们的羽毛好似吹进老妇人的裙子。一头粉红色的肥猪好不舒服的横躺在地下晒太阳。

克利斯朵夫向着三王客店走去。一面小旗在红色的屋顶上飘荡，门前吊着成串的蒜头，窗上缀着红的黄的金莲花。他走进烟味浓烈的大厅，壁上挂的是发黄的石印图画，正中是皇帝的彩色肖像，四周扎着橡树叶。大家在跳舞。克利斯朵夫断定他漂亮的女朋友一定在内。果然，他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她。他拣着一个位置坐下，在那边可以安安静静的看到跳舞的人。他虽然留着神不让别人看见，可是洛金自会把他发现出来。她一边跳着没有完的华尔兹，一边从舞伴的肩头上向他丢了几个眼风，并且为了挑拨他，故意和村里的少年调情打趣，嘻开着大嘴傻笑，高声说些无聊的话。在这一点上，她和一般交际场中的姑娘并无分别：被人家一瞧，她们就以为非当众嘻笑骚动一阵不可。——其实她们并不见得怎么傻，因为知道大家是瞧她们而不听她们的。——克利斯朵夫肘子撑在桌上，拳头托着下巴，看着她装腔作势不禁从眼睛里表示出他的热情与愤怒：他头脑还算清醒，不至于看不出她的诡计，但已不够清醒到不上她的当；所以他时而愤愤的咕噜，时而耸耸肩膀，笑自己的受人愚弄。

此外还有一个人注意他：那是洛金的父亲。矮胖个子，大脑袋，短鼻子，光秃的头被太阳晒成了暗红色；四周剩下的一圈头发，从前一定是金黄的，如今变做一个个浓密的小卷儿，像丢勒画的圣·约翰；胡子剃得光光的，神色非常镇静，嘴角上挂着一根长烟斗：他慢腾腾的和别的乡下人说着闲话，眼梢里老注意着克利斯朵夫的表情，不由得在肚里暗笑。他咳了一声；灰色的眼中忽然闪出一道狡猾的光，他过来挨着克利斯朵夫坐下。克利斯朵夫挺

不高兴的向他掉过头来，正好碰上那双阴险的眼睛；老人却衔着烟斗，很随便的和他搭讪起来。克利斯朵夫一向认识他：认为是个老混蛋；可是对于女儿的好感使他对父亲也变得宽容了，甚至和他在一处还有种异样的快感：奸刁的老头儿看透了这一点。他先说了一阵天气，把那些俊俏的姑娘做题目说了几句俏皮话，再提到克利斯朵夫的不去跳舞，认为他这个办法真聪明，坐在桌子前面把杯独酌不是舒服得多吗？说到这里，他老实不客气向克利斯朵夫讨了一杯。老头儿一边喝着，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谈到他的小买卖，说什么生活艰难，天时不正，百物昂贵等等。克利斯朵夫听了全无兴趣，只在鼻子里随便哼几声，眼睛始终望着洛金。老人静了一会，等他回答；他置之不理，老人可又不慌不忙的说下去了。克利斯朵夫心里想这家伙来跟他鬼混，说那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结果他明白了。老人怨叹完毕，把话题换过一章，把他庄上出产的菜蔬，家禽，鸡子，牛奶，夸了一阵，突然问克利斯朵夫能否把他的出品给介绍到爵府里去。克利斯朵夫听了可直跳起来：“怎么会知道的？……难道他认识他吗？……”

“当然罗，”老人说。“什么事都会知道的。”

他心里还有一句话没说出来：“……尤其是我亲自出马探听的时候。”

克利斯朵夫暗自好笑的告诉他，虽然“一切都会知道”，但他们还没晓得他最近已经跟宫廷闹翻，即使他的话当初在爵府的总务处和厨房里有点儿作用，（而这还大有问题，）此刻也早已完了。老人听到这话，略微抿了抿嘴，但并不灰心，过了一会，又问克利斯朵夫能不能替他介绍某些家庭，接着就背出一切和克利斯朵夫有来往的人家的姓名，因为他在菜市上把什么都打听清楚了，要不是想到老人尽管那末狡猾也免不了上当，而不由得想笑出来的话，克利斯朵夫对这种间谍式的勾当早就气得直跳了，因为对方万万料不到克利斯朵夫的介绍非但不能替他招来几个新主顾，反而使他连老主顾都会保不住的。因为克利斯朵夫听凭老头儿枉费心机的去耍那些无聊的小手段，既不回答他一个是，也不回答他一个否。但那乡下人死钉不放，最后竟来进攻克利斯朵夫和鲁意莎了，硬要推销他的牛奶，牛油，和乳脂；他早就盘算好，即使找不到别的主顾，这两个总是逃不了的。他又补充说，既然克利斯朵夫是音乐家，那末每天早晚吞一个新鲜的生鸡子是保护嗓子最好的办法：他自命为能供给刚生下来的，暖烘烘的，最新鲜的蛋。克利斯朵夫一听到老人把他误认为歌唱家，不禁哈哈大笑。老头儿借此机会又叫了一瓶酒。然后，觉得眼前在克利斯朵夫身上再也弄不到别的好处，便掉头不顾的去了。

天已经黑了。跳舞的场面越来越热闹。洛金完全不理睬克利斯朵夫，只忙着勾引村里一个富农的儿子，所有的姑娘都争着要讨他的喜欢。克利斯朵夫很关切她们这种竞争；女孩子们彼此笑着，动手动脚，乐不可支。克利斯朵夫把自己忘了，一心希望洛金成功。但等到洛金真的成功了，他又有些悲哀。他立刻责备自己。他既不爱洛金，那么她喜欢爱谁就爱谁，不是挺自然的吗？——但感到自己这样孤独也不见得有趣。那些人都为了想利用他才关切他，而过后还得嘲笑他。洛金因为把她的情敌气坏了，格外快乐，人也显得更好看了：克利斯朵夫叹了一口气，望着她笑了笑，预备走了。时间已经九点：进城还得走好几里路。

他刚从桌边站起，大门里突然闯进十几个兵。他们一出现，全场的空气顿时冷了下来。大家开始交头接耳。几对正在跳舞的伴侣停住了，不安的望着那些新来的客人。站在大门口的几个乡下人假装转过身子和自己人谈话，

虽然表面上做得若无其事，暗中都小心翼翼的闪在一旁让他们走过。——整个地方上和城市四周炮台里的驻军已经暗斗了一些时候。大兵们烦闷得要死，常常拿乡下人出气，很下流的取笑他们，糟蹋他们，把乡间的妇女当作属地上的女人看待。上星期就有一批喝醉的兵去骚扰邻村的节会，把一个庄稼人打得半死。克利斯朵夫知道这些事，和乡下人一样的愤愤不平。此刻他便回到原位上，看有什么事发生。

那些兵根本不理会大众的恶感，乱哄哄的奔向坐满客人的桌子，硬挤下去。大半的人都咕噜着挪开身子。一个老头儿让得慢了些，被他们把凳子一掀，摔在地下，他们看了哈哈大笑。克利斯朵夫大为不平，站起来正想过去干涉，不料那老人费了好大的劲从地下爬起来，非但没有半句怨言，反而连声道歉。另外两个兵走向克利斯朵夫的桌子：他握着拳头看着他们过来。可是他用不着这么紧张。那不过是跟在惹是生非的坏蛋后面，想狐假虎威来一下的两个脓包罢了。他们被克利斯朵夫威严的神气镇住了；他冷冷的说了声：“这儿有人……”他们就赶紧道歉，缩在凳子的一头，唯恐惊动了。他说话颇有主子的口吻，而他们天生是奴才脾气。他们看出克利斯朵夫不是个乡下人。

这种屈服的态度使克利斯朵夫的气平了一些，观察事情也冷静了些。他一眼就看出这些大兵的主脑是个班长——眼睛凶狠的小个子，斗牛狗似的脸，卑鄙无耻的恶棍，就是上星期日闹事的主角之一。他坐在克利斯朵夫旁边的一张桌上，已经醉了。他凑到人家面前，说着不三不四的侮辱的话，而那些受辱的人只做不听见。他特别钉着跳舞的人，评头论足，用的全是脏话，引得他的同伴哈哈大笑。姑娘们红着脸，差不多要哭了；年轻的汉子气得暗暗的咬牙切齿。恶棍的眼睛慢慢的把全场的人一个一个看过来：克利斯朵夫看见他的目光扫到自己身上来了，便抓着杯子，握着拳头，预备他说出一句侮辱的话，就把酒杯劈面摔过去。他心里想。

“我疯了。还是走掉的好。我要被他们把肚子都切开了；再不然，也得给他们关到牢里去，那可太犯不上了。趁他们没有来惹我之前先走罢。”

但他骄傲的性格不让他走，他不愿意被人看出他躲避这些流氓。——对方那双阴狠凶横的眼睛盯住了他。克利斯朵夫浑身紧张，愤怒非凡的瞪着他。那班长把他打量了一会，被克利斯朵夫的脸打动了说话的兴致，用肘子撞着同伴，一边冷笑一边教他看克利斯朵夫，正要张开嘴来骂。克利斯朵夫迸着全身之力，预备把杯子摔过去了。——正在千钧一发的关头，一件偶然的小事救了他。醉鬼刚想开口，不料被一对跳舞的冒失鬼一撞，把他的酒杯打落在地下。于是他怒不可遏的转过身去，把他们狗血喷头的大骂一顿。目标转移了，他完全忘了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又等了几分钟，看见敌人无意再向他寻衅，方始站起，慢慢的拿着帽子，慢慢的向大门走去。他眼睛老盯着军官的桌子，要他明白他决不怕他。可是那醉鬼已经把他忘得干干净净：再没有人注意他了。

他握着门钮：再过几秒钟，他就可以身在门外了。但命中注定他这一天不能太平无事的走出去。大兵们喝过了酒，决心要跳舞了。但既然所有的姑娘都有舞伴，他们便把男的赶走，而那些男的也毫无抵抗的让他们驱逐。洛金可不答应。克利斯朵夫看中的那双大胆的眼睛和强项的下巴，的确有些道理。她正发疯般跳着华尔兹，不料那班长看上了她。过来把她的舞伴拉开了。洛金跺着脚，叫着嚷着，推开军官，说她决不跟像他这样的坏蛋跳舞。他追

着她，把那些被她当做屏风般掩护的人乱捶乱打。末了，她逃到一张桌子后面；在那个障碍物把对方暂时挡住的几秒钟内，她又喘过气来骂他；看到自己的抗拒完全没用，她气得直跳，想出最难堪的字眼，把他的头比做各种畜生的头。他在桌子对面探着脑袋，挂着阴险的笑容，眼中闪出愤怒的火焰。突然他发作起来，跳过桌子，把她抓住了。她拳打足踢的挣扎，像一个放牛的蛮婆。他身子原来就不大稳，差点儿倒下。愤怒极了，他把她按在墙上打了一个嘴巴。他来不及打第二下：一个人在他背后跳过来，使劲回敬了他一巴掌，又飞起一脚把他踢到了人堆里。原来是克利斯朵夫排开了众人，在桌子中间挤过来把他扭住了。军官掉过身来，气疯了，拔出腰刀，但来不及应用，又被克利斯朵夫举起凳子打倒了。这一架打得那么突兀，在场的观众竟没想到出来干涉。但大家一看那军官像牛一样的倒在地下了，立刻乱哄哄的骚动起来。其余的兵都拔着刀奔向克利斯朵夫。所有的乡下人又一齐扑向他们。顿时全场大乱。啤酒杯满屋的飞，桌子都前仰后合。乡下人忽然觉醒了：需要把深仇宿怨发泄一下。大家在地下打滚，发疯似的乱咬。早先和洛金跳舞的人是个庄子上结实的长工，此刻抓着刚才侮辱他的大兵的脑袋往壁上撞。洛金拿着一条粗大的棍子狠命的打。别的姑娘叫喊着逃了，两三个胆子大一些的却高兴到极点。其中有个淡黄头发的矮胖姑娘，看见一个高个子的兵——早先坐在克利斯朵夫旁边的，——把敌人按在地下用膝盖压着胸脯，她便赶紧往灶屋里溜了一转，回来把那蛮子的头往后拉着，用一把灼热的火灰摔在他眼里。他疼得直叫。她可得意极了，看他受了伤，听凭乡下人痛殴，不禁在旁百般诟辱。最后，势孤力弱的大兵顾不得躺在地下的两个同伴，竟自往外逃了。于是恶斗蔓延到街上。他们闯到人家屋里，嘴里一片喊杀声，恨不得捣毁一切。村民拿着铁叉追赶，放出恶狗去猛扑。第三个兵又倒下了，肚子上给锄子戳了个窟窿。其余的不得不抱头鼠窜，被乡人直追到村外。他们跳过田垄，远远的喊着说去找了同伴再来。

村民得胜之后，欣喜若狂的回到客店里；那是蓄意已久的报复，过去受的耻辱都洗雪了。他们还没想到闯了这个祸的后果呢。大家七张八嘴的争着说话，各人夸说自己的英勇。他们和克利斯朵夫表示亲热，他也因为能够跟他们接近而很高兴。洛金过来抓着他的手，握了好一会，嘻嘻哈哈的把他当面取笑了几句。那时她不觉得他可笑了。

然后大家检点受伤的人口。村民中间不过有的打落牙齿，有的伤了肋骨，有的打得皮肉青肿，都没什么了不起。士兵方面可不不然了。三个重伤：眼睛被灼坏的大家伙，肩膀也给斧头砍去了一半；戳破肚子的一个，喉咙里呼里呼鲁的好似快死了；还有是被克利斯朵夫打倒的那个班长。他们躺在炉灶旁边。三个之中受伤最轻的班长睁开眼来，满怀怨毒的目光把周围的乡下人看了好久。等他清醒到能想起刚才的情形，他便破口大骂，发誓要报复，把他们统统牵连在内；他愤怒到气都喘不过来，恨不得把他们一齐杀死。他们笑他，可是笑得很勉强。一个年轻的乡下人对他喊道：

“住嘴！要不然就杀死你！”

军官挣扎着想爬起来，杀气腾腾的眼睛瞪着那个说话的人：

“狗东西！你敢？人家要不砍掉你的脑袋才怪！”

他继续直着嗓子乱嚷。戳破肚子的那个像杀猪般尖声怪叫。另外一个直僵僵的躺着不动，像死了一样。一片恐怖压在这些村民心上。洛金和几个妇女把伤兵抬到隔壁屋里。班长的叫嚷和垂死者的呻吟都不大听得见了。乡下

人一声不响，站在老地方围成一圈，仿佛那些伤兵依旧躺在他们脚下；他们一动也不敢动，面面相觑的惊呆了。临了，洛金的父亲说了句：“哼！你们做的好事！”

于是场中起了一片无可奈何的，唧唧啾啾的声音：大家咽着口水。然后他们同时说起话来。先只是窃窃私语，像怕人在门外偷听似的；不久声音高起来，变得尖锐了：他们互相埋怨，这个说那个打得太凶，那个说这个下手太狠。争论变成口角，差不多要动武了。洛金的父亲把他们劝和了，然后抱着手臂，向着克利斯朵夫，抬起下巴指着他说：“可是这家伙，他到这里来干什么的？”

群众所有的怒气立刻转移到克利斯朵夫身上，有人喊道：“对啦！对啦！是他先动手！要不是他，决不会出乱子的！”

克利斯朵夫楞住了，勉强回答说：“我是为了你们，不是为我，你们很明白。”

但他们怒不可遏的反驳他：“难道我们不会保护自己吗？要一个城里人来告诉我们怎么做吗？谁请教过你的？谁请你到这儿来的？难道你不能待在自己家里吗？”

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膀，向大门走去。可是洛金的父亲把他拦住去路，恶狠狠的嚷着：“好！好！他给我们闯下了大祸，倒想一走了事。哼，可不能让他走。”

乡下人一齐跟着吼起来：“不能让他走！他是罪魁祸首，什么事都得归他担当！”

他们磨拳擦掌的把他团团围住。克利斯朵夫看见那些骇人的脸越逼越近：恐怖使他们变成疯狂了。他一声不响，不胜厌恶的扯了个鬼脸，把帽子往桌上一扔，径自坐到屋子的尽里头，转过背去不理他们了。

可是打抱不平的洛金直冲到人堆里，气得把俊美的脸扭做一团，涨得通红，粗暴的推开围着克利斯朵夫的人，喊道：“你们这些胆怯鬼！畜生！你们羞也不羞？你们想教人相信什么都是他一个人干的！以为没有人看到你们是不是？你们之中可有一个不曾拚命乱捶乱打的？……要是有谁在别人打架的时候抱着手臂不动，我就唾他的脸，叫他胆怯鬼！胆怯鬼！”

那些乡下人被她出其不意的一顿臭骂，呆住了，静默了一会，又叫起来：“是他先动手的！要不是他，什么事都不会有的。”

洛金的父亲竭力对女儿示意，可是没用；她回答说：“不错，是他先动手的！那对你们也没什么体面。要没有他，你们会听让人家侮辱，听让人家侮辱我们，你们这些脓包！没有骨头的东西！”

她又骂她的男朋友：“还有你，你一声不出，只会挤眉弄眼，把屁股送过去给人家的皮靴踢；对啦，你还会道谢呢！你不害臊么？……你们都不害臊么？你们简直不是人！胆子像绵羊似的，连头都不敢抬一抬！直要等到这城里人来给你们作榜样！——如今你们把什么都推在他头上！……哼，那可不行，老实告诉你们！他是为了我们打架的。你们要不把他放走，就得跟他一起倒楣：我决不放过你们！”

洛金的父亲拉她的手臂，气得直嚷：“住嘴！住嘴！……贱骨头，你还不住嘴！”

洛金把他一手推开，倒反嚷得更凶了。全场的人都直着嗓子叫，她比他们叫得更响，尖锐的声音几乎震破耳鼓：“我先问你，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你刚才把躺在隔壁的那个半死的兵乱踩，难道我没看见吗？还有你，把手伸出来看看！……还有血迹呢。你以为我没看见你拿着刀吗？我要把亲眼看到的统统说出来，要是你们敢伤害他的话。判起刑来，我教你们一个都逃不了。”

那些乡下人愤怒之极，气哼哼的把脸凑近洛金，对着她怒吼。其中有一个似乎要把她掌嘴了，洛金的男朋友便抓着他的衣领，互相扭做一团，预备大打出手了。一个老头儿和洛金说：“我们抵了罪，你也逃不了。”

“对，我也逃不了；我可不像你们这样没有种。”

于是她又叫嚣起来。

他们不知怎么办了，回头去找她的父亲：“难道你不能要她住嘴吗？”

老人懂得，一个劲儿的逼洛金不是个聪明办法。他对大众递了个眼色教他们静下来。赶到只有洛金一个人说话，没人跟她顶嘴的时候，好像火没有了燃料，她也停住了。过了一忽，父亲咳了一声，说道：“哎，那末你要怎么样呢？总不见得要断送我们吧？”

“我要你们把他放走，”她说。

他们都转起念头来了。克利斯朵夫始终坐在那里，凭着傲气兀然不动，仿佛没听见大家在讲他的事；但他对于洛金的义愤非常感动。洛金也好像不知道他在场，背脊靠着他的桌子，带着挑战的神气瞪着那些抽着烟，眼睛望着地下的村民。最后，她的父亲把烟斗在嘴里咬弄了一会，说道：“把他招出来也罢，不招出来也罢，——他要留在这儿，结果是不用说的了。那班长是认识他的，哪里肯放松！他只有一条路，就是马上逃，逃过边境去。”

他思索的结果，认为无论如何，还是克利斯朵夫逃走对他们有利：因为这样一来，他等于把罪名坐实了；而他既不能在这儿替自己申辩，他们就很容易把案子的重心推在他身上。这个意见，众人都表示同意。他们彼此心里都很明白。——一朝大家打定了主意，便巴不得克利斯朵夫已经走了。他们并不因为先前对克利斯朵夫说过许多难堪的话而觉得不好意思，倒反走拢来好似对他的命运非常关切。

“先生，一刻都不能耽误了，”洛金的父亲说。“他们马上会来的。半个钟点赶到营里，再加半个钟点就能赶回……现在只有快快溜了。”

克利斯朵夫站起身子。他也考虑过了。他知道倘使留着，自己一定是完的。可是走吗，不见一面母亲就走吗？……不，那又不行。他就说先回去一次，等半夜里再走，还来得及越过边境。但他们都大声叫起来。刚才大家拦着他不许逃；此刻却因为他不逃而表示反对了。回到城里毫无问题是自投罗网：他还没有到家，那边先就知道了；他会在家里被捕的。——他可执意要回去。洛金懂得他的意思，便说：“你要看你的妈妈是不是？……我代你去好了。”

“什么时候去？”

“今天夜里。”

“你准去吗？”

“准去。”

她拿着头巾包起来：“你写个字条给我带去……跟我来，我给你墨水。”

她把他拉到里边一间屋里。到了门口，她又掉过身来招呼她的男朋友：

“你先去收拾一下，等会由你带他上路。你得看他过了边境才能回来。”

“好罢，好罢，”他说。

他比谁都急于希望克利斯朵夫快点到法国，最好是更远一点，倘使可能

的话。

洛金和克利斯朵夫进到隔壁房里。克利斯朵夫还迟疑不决。他想到从此不能再拥抱母亲，痛苦得心都碎了。什么时候再能见到她呢？她已经那么老，那么衰弱，那么孤独！这一下新的打击会把她断送了的。他不在这里了，她怎么办呢？……可是倘使他不走，判了罪，坐上几年的牢，她又怎么办呢？那她不是更无倚无靠，没法过日子了吗？现在这样一走，不管走得有多远，他至少是自由的，还能帮助她，她也能上他那儿去。——他没有时间把思想整理出一个头绪来。洛金握着他的手，立在旁边瞧着他：他们的脸差不多碰到了；她把手臂绕着他的脖子，亲了亲他的嘴：

“快点儿！快点儿！”她指着桌子轻轻的说。

他便不再考虑，坐了下来。她在账簿上撕下一页划着红线的有格的纸。他写道：

“亲爱的妈妈：对不起！我要使您感到很大的痛苦。当时我是迫不得已。我并没干什么不正当的事，可是现在不得不逃了，不得不离乡别土了。送这张字条给你的人会把情形告诉您的。我本想跟您告别，可是大家不许，说我没有到家就会被捕。我痛苦已极，什么意志都没有了。我将越过边境，但没有接到您回信之前，我在靠近边境的地方等着；这次送信的人会把你的复信带给我的。请您告诉我该怎么办。不论您说什么，我一定依您。要不要我回来？那就叫我回来好了！我一想到把您孤零零的丢下，真是受不了。您怎么过日子呢？原谅我罢！原谅我罢！我爱您，亲吻您！……”

“先生，快点儿吧；要不然就来不及了，”洛金的朋友把门推开了一半，说。

克利斯朵夫匆匆签了名，把信交给了洛金：“你亲自送去吗？”

“是的，我亲自去。”她已经准备出发了。

“明天，”她又说，“我带回信给你；你在莱登地方等我，——（德国境外的第一站）——在车站的月台上相见。”（好奇的女孩子在他写的时候把信看过了。）

“你得把情形统统告诉我，她听了这个坏消息怎么样，说些什么，你都不瞒我吧？”克利斯朵夫用着恳求的口吻说。

“行，我都告诉你就是了。”

他们不能再自由说话了，洛金的朋友在门口望着他们。

“并且，克利斯朵夫先生，”洛金说，“我会常常去看她，把她的消息告诉你的；你放心好了。”

她像男人一样使劲握了握他的手。

“咱们走罢！”预备送他上路的乡下人说。

“走罢！”克利斯朵夫回答。

三个人一起出门。他们在大路上分手了。洛金往一边去，克利斯朵夫和他的向导往另外一边。他们一句话都不说。一钩新月蒙着水汽，正在树林后面沉下去。苍白的微光在田垄上飘浮。浓雾从低陷的土洼里缓缓上升，像牛乳一样的白。瑟索的树木浴着潮湿的空气……走出村子不到几分钟，带路的人突然往后退了一步，向克利斯朵夫示意教他停下。他们静听了一会，发觉前面路上有步伐整齐的声音慢慢的逼近。向导立刻跳过篱垣，往田野里走去。克利斯朵夫跟着他向耕种的田里直奔。他们听见一队兵在大路上走过。乡下人在黑暗中对他们晃晃拳头。克利斯朵夫胸口塞闷，好似一头被人追逐的野

兽。随后他们重新上路，躲开村子和孤独的农庄，免得狗叫起来泄露他们的行踪。翻过一个有树林的山头之后，他们远远的望见铁路上的红灯。依着这些灯光的指示，他们决意向最近的一个车站走去。那可不容易。一走下盆地，他们就完全被大雾包围了。越过了两三条小溪，又闯进一片无穷无尽的萝卜田和垦松的泥地：他们东闯西撞，以为永远走不出了。地下高高低低的，到处可以教你摔跤。两人被雾水浸得浑身湿透，摸索了半晌，突然看到几步之外，土堆高头就挂着铁路上的信号灯。他们俩便爬上去，不管会不会被人撞见，竟沿着铁道走了，直到将近车站一百公尺的地方才重新绕到大路上，到站的时候，离开下一班火车的到达还有二十分钟，那向导不顾洛金的吩咐，丢下克利斯朵夫先走了：他急于要回去看看村子里的情形和自己的产业。

克利斯朵夫买了一张到莱登的车票，在阒无一人的三等待车室里等着。车到时，早先躲在长凳上瞌睡的职员起来验过了票，开了门。车厢里一个人也没有。整个列车都睡熟了。田野也睡熟了。唯有克利斯朵夫，虽然累到极点，始终醒着。沉重的车轮慢慢的把他带近边界的时候，他忽然感到一股强烈的欲望，只想快快逃出魔掌。再过一小时，他可以自由了。但这期间，只消一句话他就会被捕……被捕！想到这个，他整个身心都反抗起来！受万恶的势力压迫吗？……他简直不能呼吸了。什么母亲，什么故乡，都被置之脑后了。自由一受到威胁，自私的心理使他只想挽救他的自由。是的，无论如何要挽救，不管付什么代价！甚至为此而杀人放火也在所不惜！……他埋怨自己不该搭火车，应该徒步越过边境才对。他原想争取几小时的时间，贪图便宜！哼，这才是送入虎口呢！没有问题，边境的车站上一定有人等着他；命令已经传到了……有一会儿他真想在到站之前跳下火车，连车厢的门都打开了；可是太晚了，已经到了。列车在站上停了五分钟，好像有一世纪之久。克利斯朵夫倒在车厢的尽里头，掩在窗帘后面，惊魂不定的望着月台：一个宪兵一动不动的站在那儿。站长从办公室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电报，向着宪兵立的地方匆匆忙忙走过去。克利斯朵夫想那准是关于他的事了。他想找一个武器；可是除了一把两面出锋的刀子以外再没旁的东西。他在衣袋里把它打开了。一个职员胸前挂着一盏灯，和站长迎面走过，沿着列车奔着。克利斯朵夫看他走近了，便把抽搐的手紧紧抓着刀柄，想道：“这一下可完了！”

他那时紧张的程度，竟会把那职员当胸扎上一刀，倘使那倒楣蛋过来打开他车厢的话。但职员开了隔壁的车厢，查看了一下一个才上车的旅客的票子。火车又开动了。克利斯朵夫这才把忐忑的心跳压下去。他一动不动的坐着，还不敢认为自己已经得救。只要车子没有过边境，他就不敢这么想……东方渐渐发白。树木的枝干从黑影里出现了。一辆车的奇奇怪怪的影子在大路上映过，睁着一只巨眼，丁丁铛铛的响着……克利斯朵夫把脸贴在车窗上，竭力辨认旗杆上帝国的徽号，那是统治他的势力终止的记号，等到火车长啸一声，报告到达比国境内的第一站时，他还在曙色中窥探。

他站起身子，打开车门，呼吸着冰冷的空气。自由了！整个的生命摆在他面前了！啊！生存的欢乐啊！……可是一片悲哀立刻压在他心上，想起离开的一切而悲哀，想起未来的一切而悲哀；而昨夜兴奋过后的疲倦又把他困住了。他倒在了凳上。那时离开到站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一分钟以后，站上的职员打开车厢，看见克利斯朵夫睡着了。被人推醒之下，他惶惶然以为已经睡了一个钟点。他步履蹒跚的下车，向着关卡走去；等到正式踏入外国境内，用不着再警戒的时候，他倒在待车室里的一条长凳上，伸着四肢昏昏入

睡了。

中午，他醒了。在两三点钟以前，洛金是不会到的。他一边等车，一边在月台上踱着，直踱到月台以外的草地上。天色阴沉沉的令人不欢，完全是冬天将临的光景。阳光睡着了。四下里静悄悄的好不凄凉，只有一辆交替的机车在那里哀鸣。到了边界近旁，克利斯朵夫在荒凉的田里站住了。前面有个小小的池塘，一泓清水映出黯淡的天空。四周围着栅栏，种着两株树。右边是一株秃顶的白杨在瑟索摇曳。后面是一株大胡桃树，黑黝黝的光秃的枝干像鬼怪似的。成群的乌鸦停在树上沉重的摇摆。枯萎的黄叶一张一张落在静止的水塘里……

他觉得这些都好像看见过的：这两株大树，这个池塘……——而突然之间他迷迷惘惘的一阵眩晕。那是过去常有的境界。仿佛时间有了一个空隙。你不知道身在何处，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不知道生在什么时代，也不知道这种境界已经有了几千百年。克利斯朵夫觉得那是早已有过的，现在的一切不是现在的，而是另一个时代的。他不复是他了。他从身外看着自己，从极远的地方看着自己；站在这儿的像是另外一个人。无数陌生的往事在他耳边嗡嗡作响；血管也在那里汹涌不已：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几百年的旧事在他胸中翻腾……

在他以前的多少克拉夫脱，都曾经受过像他今日这样磨难，尝过这逗留祖国的最后几分钟的悲痛。永远流浪的种族，为了独立不羁，精神骚乱而到处受到放逐，永远受着一个内心的妖魔播弄，使它没法住定一个地方。但它的确是个留恋乡土的民族，尽管给人驱逐，它自己倒轻易舍不得那块土地……

如今是轮到克利斯朵夫来经历这些途程了；他已经踏上前人的旧路。泪眼晶莹，他望着不得不诀别的乡土隐没在云雾里……早先他不是渴望离乡的吗？——是的，但一朝真的走了出来，又觉得心碎肠断。人非禽兽，怎么能远离故土而无动于衷呢？苦也罢，乐也罢，你总是跟它一起生活过来的；乡土是你的伴侣，是你的母亲：你在她心中睡过，在她怀里躺过，深深的印着他的痕迹；而她也保存着我们的梦想，我们的过去，和我们爱过的人的骸骨。克利斯朵夫又看到了他以往的岁月，留在那边地上地下的亲爱的形象。便是他的痛苦也和他的欢乐一样宝贵。弥娜，萨皮纳，阿达，祖父，高脱弗烈特舅舅，苏兹老人，——一霎时都在他眼前显现了。他总丢不开这些亡人，（因为他把阿达也算作死了）。想起他的母亲，他所爱的人中唯一活着的一个，如今也被遗弃在那些幽灵中间，他简直悲不自胜。他认为自己的逃亡太可耻了，几乎想越过边境回去。他已经下了决心：要是母亲的回信写得太痛苦的话，他便不顾一切的回去。倘若接不到回信，或是洛金见不到母亲，那末，他也准备回去。

他回到站上，无聊的等了一会，火车终于到了。克利斯朵夫准备看到洛金那张大胆的脸伸在车门外，因为他断定她决不会失约；但她竟没有露面。他不大放心的跑到每间车厢里去找，正在潮水般的旅客中挤来撞去的时候，忽然瞥见一张并不陌生的脸。那是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矮身量，脸蛋很胖，红得像苹果，往上翘起的鼻子又短又小，大嘴巴，头上盘着一根粗辫子。他仔细一看，发觉她手里拿着一只提箱好像是他的。她也在那里像麻雀似的打量他，看到他注意她，便向他走近了几步，但到了克利斯朵夫面前又停住了，睁着耗子似的小眼睛骨碌碌的望着他，一声不出。克利斯朵夫这一下可认出

来了：她是洛金家里放牛的女孩子。他便指着箱子问：“这是我的，是不是？”小姑娘站着不动，傻头傻脑的回答：“等一等。先要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

“蒲伊喽。”

“那末东西是谁给你送来的；”

“不是洛金是谁！得啦，给我罢！”

女孩把箱子递给他：“拿去罢！”

她又补上一句：“噢！我早认得是你。”

“那末你刚才等什么？”

“等你自己说出是你啊。”

“洛金呢？干么她没来？”

小姑娘不回答。克利斯朵夫懂得她不愿意在人堆里说话。他们先得到关卡上去验行李。验完了，克利斯朵夫把她带到月台的尽头。那时她的话可多了：

“警察来过了。你们一走差不多就到的。他们闯到人家屋里，每个人都受到盘问，沙弥那大汉子给抓去了，还有克里斯顿，还有加斯班老头。曼拉尼和琪脱罗特两个虽然不承认，也被逮走。她们都哭了。琪脱罗特还把警察打了一个嘴巴。大家尽管说是你一个人干的也没用。”

“怎么是我？”克利斯朵夫叫起来。

“自然罗，”女孩子若无其事的回答，“反正你走了，这么说也没关系，是不是？所以他们就到处找你，还派了人追你呢。”“那么洛金呢？”

“洛金那时不在家，她进城去了，过后才回来的。”“她看到我的母亲吗？”

“看到的。有信在这儿。她要自个儿来的，可是也被抓去了。”“那末你怎么能来的？”“是这样的：她回到村里，没有被警察看到；她正想动身上这儿来的时候，琪脱罗特的妹妹伊弥娜把她告发了，警察就来抓她。她看见警察来，就往楼上跑，喊着说换一件衣服就下来。我正在屋子后面的葡萄藤底下；她从窗里轻轻的喊我：‘丽第亚！丽第亚！’我上去了；她把你的提箱和你母亲的信交给我，要我到这儿来找你，又吩咐我快快的跑，别给人抓去。我就拚命的跑。这样我就来了。”

“她没有别的话吗？”

“有的。她教我把这方头巾交给你，证明我是她派来的。”克利斯朵夫认出那条绣花边的小红豆花的白围巾，就是昨夜洛金裹在头上的。她为了要送他这件表示爱情的纪念物而想出来的藉口，未免可笑，可是克利斯朵夫并不笑。“现在，”那女孩子说，“对面的火车到了。我得回去了。再会吧。”

“等一等，你来的路费怎么样的？”

“洛金给我的。”

“还是拿着罢，”克利斯朵夫把一些零钱塞在她手里。女孩子快走了，他又抓着她的胳膊：“还有……”他弯下身子亲了亲她的脸，她好似不大愿意。

“别挣扎呀，”克利斯朵夫说，“那不是为你的。”“噢！我知道，是为洛金的。”

其实他亲吻这个放牛女孩子的大胖脸还不光是为洛金，并且是为他整个的德国。

小姑娘一溜烟奔上正在开动的火车，在车门口对他扬着手帕，直到望不

见他为止。这个乡村使者给他带来了故乡和所爱的人的最后一缕气息，然后他又看着她去远了。

等到她的影子不见了，他是完全孤独了，这一回是真的孤独了，在异国的土地上举目无亲。他手里拿着母亲的信和爱人的围巾。他把围巾塞在怀里，想拆开信来。但他的手索索的抖个不住。里头写些什么呢？母亲有什么痛苦的表现呢？……不，他受不了那些仿佛已经听到的如泣如诉的责备：他势必回去的了。终于他拆开信来：

“可怜的孩子，别为了我难过。我自己会保重的。好天爷把我惩罚了。我不该自私自利把你留在家里的。你上巴黎去罢。也许这为你更好。别管我。我会想办法的。最要紧是你能够幸福。我拥抱你。

“能写信的时候随时写信来。

妈妈”

克利斯朵夫坐在提箱上哭了。

站上的职员正在招呼上巴黎去的旅客。沉重的列车隆隆的进站了。克利斯朵夫抹了抹眼泪，站起身子，心里想：“非这样不可。”

他朝着巴黎的方向看了看天色。阴沉的天空在那方面似乎格外的黑，像一个阴暗的窟窿。克利斯朵夫好不悲伤；可是他反复念着：“非这样不可。”

他上了车，把头伸在窗外继续望着远处可怕的天色，想道：

“噢，巴黎！巴黎！救救我罢！救救我罢！救救我的思想！”

黯淡的雾越来越浓。在克利斯朵夫后面，在他离别的国土之上，沉重的乌云中间露出一角淡蓝的天，只有一双眼睛那么大，——像萨皮纳那样的眼睛，——凄凉的笑了，隐灭了。火车开了。下雨了。天黑了。

卷四终

卷五·节场

卷五初版序

作者与克利斯朵夫的对话

作者：你是不是跟人家赌了东道才这么胡搅，克利斯朵夫？你简直教我跟所有的人都闹翻了。

克利斯朵夫：你不必假惺惺。一开场你就知道我要把你带到哪儿去的。

作者：你批评的事太多了。你惹恼了你的敌人，打搅了你的朋友。一个体面人家出了点不大光鲜的事，不去提它不是更雅吗？

克利斯朵夫：有什么办法？我根本不懂什么雅不雅。作者：我知道，你是个蛮子。你太傻了！他们要人相信你是大众的敌人。你在德国已经得了反德国的名气。你到法国来又要得个反法国的——或者更严重些——反犹太的名气。你小心点儿。别提到犹太人……你得到他们的的好处太多了，不能再说他们坏话。

克利斯朵夫：我认为是他们的好处跟坏处，干么不能全部说出来呢？

作者：你特别是说他们的坏处。

克利斯朵夫：好处在后面呢。对他们难道应当比对基督徒更敷衍吗？我给他们的分量重一些，因为他们有这个资格。在我们这个光明正在熄灭的西方；他们既然占了重要的地位，我就得给他们一个重要的地位。他们之中一部分人大有把我们的文明断送的可能。可是我并非不知道，也有一些人对于我们的行动与思想是股很大的力量。我知道他们的民族还有哪些伟大的地方。我知道他们之中有成千累万的人竭忠尽智，孤高澹泊，充满着爱，力求上进，凭着孜孜不倦的毅力，默默无声的在那里苦干。我知道他们心中有个上帝。因为这样，我才恨那些否认上帝的人，恨那些为了求名求福而自甘堕落，而玷辱他们民族的使命的人。打击这等人便是爱护他们的种族，正如我打击腐化的法国人是为了爱护法国。

作者：孩子，这是你多管闲事。别忘了那个挨揍的史迦那兰女人。别管旁人的家务……犹太人的事跟我们不相干。至于法国，它就像玛蒂纳，愿意挨打而不愿意人家说出它挨打。克利斯朵夫：可是非跟它说老实话不可，并且我越是喜欢它，越是非说不可。倘若我不说，谁会跟它说？——你当然不说的。你们大家都给社会关系，面子关系，多多少少的顾虑，束缚住了。我没有束缚，我不是你们圈子里的人。我从来没参加任何社团，任何论战。我用不着附和你们，也无须跟着你们心照不宣的不出声。

作者：你是外国人。

克利斯朵夫：对啦，人家会说一个德国音乐家没有权利来批判你们，也不会了解你们的，是不是？——好吧，我可能是错的。可是至少我能告诉你们，某些外国的大人物——你跟我一样认识的，——在过去的和活着的朋友中最伟大的人，对你们是怎么想的。——如果他们看错了，他们的见解也值得知道，对你们也无不帮助。而这一点也总比你们相信大家都在佩服你们强得多，比你们一忽儿佩服自己，一忽儿毁谤自己强得多。照你们的风气，你

莫利哀名剧《非做不可的医生》：主角史迦那兰殴辱妻子玛蒂纳，邻人闻声过户问讯，不料玛以被殴为人所知，恼羞成怒，与其夫同殴邻人。

们在某一个时期内大叫大嚷的自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在另一个时期内又说拉丁民族的颓废是无可救药的了，——过了一晌你们又说所有伟大的思想都是从法国来的，——然后又说你们除了给欧洲提供一些娱乐以外再没别的价值：试问这样的叫嚷有什么用？主要是不能对腐蚀你们的疾病闭上眼睛，也不能灰心，应当振作精神，为了你们民族的生存跟荣誉而奋斗。凡是感觉到这个不甘灭亡的民族还能抗拒疾病的人，就能够，而且应该，把民族的恶习和可笑的地方大胆的暴露出来，把它们铲除，——尤其要铲除那些利用这些缺点而靠它们过活的败类。

作者：即使为了爱护法国，你也不要再去碰法国。你会教安分守己的人着慌的。

克利斯朵夫：对啦，安分守己的人，看到人家认为一切都不大行，看到人家挖出这么些惨事丑事来，是要痛苦的！他们受着剥削，可不愿意承认。他们发见人家吃的苦已经受不了了，所以宁愿无知无觉的做牺牲品。他们要别人至少每天对他们说一次，在世界上最完满的国家内，一切都尽善尽美，而“……法兰西，始终在世界上占着第一位……”然后，那些老实人心定神安，回头去睡觉了，让别人去为所欲为……这种老实人真是太好了！我使他们痛苦，将来我还要使他们更痛苦。我请他们原谅……可是即使他们不愿意有人帮助他们反抗压迫的人，至少也得知道别人跟他们一样受着压迫而不像他们那么逆来顺受，没有他们那种自欺欺人的本领，——还得知道另外有些人，就是被这种逆来顺受和自欺欺人的心理断送了，给压迫者随意摆布。而这批人是多么痛苦！你记住罢！我们受过多少罪！眼看气压一天天的加重，四周都是腐败的艺术，不道德的无耻的政治，萎靡不振而甘心乐意趋于虚无的思想：唉，跟我们一同受罪的人有多少！……我们目击心伤，彼此紧紧的挤在一起……啊！我们一块儿过了多么艰苦的岁月。我们的前辈，万万想不到我们的青春在他们的影子底下苦苦挣扎的惨痛！……我们是抵抗过了。我们是得救了……难道我们不能救别人吗？让他们受着同样的折磨，不伸出手去援助他们吗？不，他们的命运跟我们是分不开的。我们在法国有成千累万的人，心里所想的跟我明明白白说出来的完全一样。我意识到我是代他们说话。不久，我也要提到他们。我急于要给人看到真正的法兰西，被压迫的法兰西，深深的埋在底下的法兰西：——犹太人，基督徒，还有不论抱着什么信仰不论属于什么血统的自由灵魂。——可是要接触到这个法兰西，先得从封锁大门的守卫中间打出一条路来。但愿美丽的囚犯从麻痹中振作起来，推倒她牢狱的墙壁！她还没知道自己的力量和敌人的无用呢。

作者：你说得不错，我的灵魂。可是不管你做些什么，千万不能恨。

克利斯朵夫：我心中绝对没有恨。便是想起最凶恶的人的时候，我也知道他们是人，跟我们一样受着痛苦而有一天会死的。可是我非打倒他们不可。

作者：斗争，哪怕是为了行善的斗争，总是伤害人的。你自以为能使那些美丽的偶像——艺术，人类——得到的好处，是不是抵得上一个活人所受的痛苦呢？克利斯朵夫：要是你这样想，那末你把艺术放弃吧，把我也放弃吧。

作者：不，你不能离开我！没有了你，我怎么办呢？——可是什么时候才会有和平呢？

克利斯朵夫：等到你争取到和平的时候。不久……不久……你瞧，春天的燕子不是已经在咱们头上飞了吗？

作者：美丽的飞燕，报告美丽的季节已经临到，我也已经看到。克利斯朵夫：别幻想了，你抓着我的手，跟我来吧。

作者：我的影子，我的确非跟着你走不可。

克利斯朵夫：咱们两个究竟谁是谁的影子？

作者：啊，你长得多么大了！我认不得你了。

克利斯朵夫：那是太阳往下落了。

作者：我更喜欢你孩子的时候。

克利斯朵夫：来吧！白天快完了，咱们只剩几个钟点了。

罗曼·罗兰
一九〇八年三月

第一部 节 场

一切是有秩序中的无秩序。有的是衣衫不整，态度亲狎的铁路上的职员。也有的是抱怨路局的规则而始终守规则的旅客。——克利斯朵夫到了法国了。

他满足了关员的好奇心，搭上开往巴黎的火车。浸饱雨水的田野隐没在黑夜里。各个站上刺目的灯光，使埋在阴影中的无穷尽的原野更显得凄凉。路上遇到的火车越来越多，呼啸的声音在空中震荡，惊醒了昏昏入睡的旅客。巴黎快到了，

到达之前一小时，克利斯朵夫已经准备下车：他戴上帽子，把外衣的钮扣直扣到脖子，预防扒手，那据说在巴黎是极多的；他几十次的站起来，坐下去，几十次的把提箱在网格与坐凳之间搬上搬下，每次都笨手笨脚的撞着邻座的人，招他们厌。

列车正要进站的当口，忽然停下了，四周是漆黑一片。克利斯朵夫把脸贴在玻璃上，什么都瞧不见。他回头望着旅客，希望有个对象可以搭讪，问问到了什么地方。可是他们都在瞌睡，或是装做瞌睡的模样，又厌烦又高兴，谁也不想动一下，追究火车停留的原因。克利斯朵夫看了这种麻木不仁的态度很奇怪，这些傲慢而无精打采的家伙，和他想象中的法国人差得多远！他终于心灰意懒的坐在提箱上，跟着车子的震动摇来摆去，也昏昏入睡了，直到大家打开车门方始惊醒……巴黎到了！车厢里的人都纷纷下车了。

他在人群中挤来撞去的走向出口，把抢着要替他提箱子的夫役推开了。像乡下人一样多心，他以为每个人都想偷他的东西。把那口宝贵的提箱扛在肩上，也不管别人对他大声嚷嚷的招呼，他径自在人堆里往外挤，终于到了泥泞的巴黎街上。

他一心想着自己的行李，想着要去找个歇脚的地方，同时又被车辆包围住，再没精神向四处眺望一下。第一得找间屋子。车站四周有的是旅馆，煤气灯排成的字母照得雪亮。克利斯朵夫竭力想挑一家最不漂亮的：可是寒酸到可以和他的钱囊配合的似乎一家也没有。最后他在一条横街上看到一个肮脏的小客店：楼上兼设着小饭铺，店号叫做文明客店。一个大胖子，光穿着衬衣，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抽着烟斗，看见克利斯朵夫进门便迎上前来。他完全不懂他说的杂七杂八的话，但一看就知道是个楞头磕脑的，未经世故的德国人，第一就不让别人拿他的行李，只顾用着不知哪一国的文字说了一大堆话。他带着客人走上气息难闻的楼梯，打开一间不通空气的屋子，靠着里边的天井。他少不得夸了几句，说这间屋如何安静，外边的声音一点儿都透不进来：结果又开了一个很高的价钱。克利斯朵夫话既不大听得懂，也不知道巴黎的生活程度，肩膀又给行李压坏了，急于想安静一会，便满口答应下来。但那男人刚一走出，屋子里肮脏的情形就把他骇住了；为了排遣愁闷，他用满着灰土的，滑腻腻的水洗过了脸，赶紧出门。他尽量不见不闻，免得引起心中的厌恶。

他走在街上。十月的雾又浓又触鼻，有股说不出的巴黎味道，是近郊工厂里的气味和城中重浊的气味混合起来的。十步以外就看不清。煤气街灯摇

巴黎好几个车站都在城中心，到站前一大段路程均系在隧道中行驶，故“四周一片漆黑”。

晃不定，好似快要熄灭的蜡烛。半明半暗中，行人像两股相反的潮水般拥来拥去。车马辐辏，阻塞交通，赛如一条堤岸。马蹄在冰冷的泥浆里溜滑。马夫们的咒骂声，电车的喇叭声和铃声，闹得震耳欲聋。这些喧闹，这些骚乱，这股气味，把克利斯朵夫楞住了。他停了一停，马上被后面的人潮拥走了。他走到斯特拉斯堡大街，什么也没看见，只是跌跌撞撞的碰在走路人身上。他从清早起就没吃过东西。到处都是咖啡店，可是看到里面挤着那么多人，他觉得胆小而厌恶了。他向一个岗警去问讯，但每说一个字都得想个老半天，对方没耐性听完一句话，便耸耸肩膀，掉过头去了。他继续像呆子似的走着。有些人站在一家铺子前面，他也无意识的站定了。那是卖照相与明信片的铺子，摆着一些只穿衬衣或不穿衬衣的姑娘们的像片，和尽是些淫猥的笑话的画报。年轻的女人和孩子们都若无其事的瞧着。一个瘦小的红头发姑娘，看见克利斯朵夫在那里出神，便过来招呼他。他莫名其妙的对她望着，她拉着他的手臂，傻头傻脑的笑了笑。克利斯朵夫挣脱着走开了，气得满脸通红。鳞次栉比的音乐咖啡店，门口挂着恶俗的小丑的广告。人总是越来越多；克利斯朵夫看到有这么些下流的嘴脸，形迹可疑的光棍，涂脂抹粉而气味难闻的娼妓，不禁吓坏了，心都凉了，疲乏，软弱，越来越厉害的厌恶，使他头晕眼花，他咬紧牙齿，加紧脚步。快近塞纳河的地带，雾气更浓。车马简直拥塞得水泄不通。一匹马滑跌了，横躺在地下；马夫狠命的鞭它，要它站起来：可怜的牲口被缰绳纠缠着，挣扎了一会，又无可奈何的倒下，一动不动，像死了一样。这个极平凡的景象引起了克利斯朵夫极大的感触：大家无动于衷的眼看着那可怜的牲口抽搐，他不禁悲从中来，感到自己在这茫茫的人海中的空虚；——一小时以来，他对于这些芸芸众生，这种腐败的气氛，竭力抑捺着心中的反感，此刻这反感往上直冒，把他气都闭住了。他不由得呜呜咽咽的哭了出来。路上的行人看见这大孩子的脸痛苦得扯做一团，大为惊异。他往前走着，腮帮上挂着两行眼泪，也不想去抹一下。人们停住脚步，目送他一程。这些被他认为胸中存着恶意的群众，倘若他能看到他们心里去的话，也许会发觉有些人除了爱讥讽的巴黎脾气之外，还有一点儿友好的同情；但他的眼睛被泪水淹没了，什么都瞧不见。

他走到一个广场上，靠近一口大喷水池。他在池中把手和脸都浸了浸。一个小报贩好奇的瞅着他，说了几句取笑的话，可并无恶意；他还把克利斯朵夫掉在地下的帽子给捡起来。冰冷的水使克利斯朵夫振作了些。他定一定神，回头走去，不敢再东张西望，也不再想吃东西：他不能跟人说一句话，怕为了一点儿小事就会流泪。他筋疲力尽，路也走错了，只管乱闯，正当他自以为完全迷失了的时候，不料已经到了旅馆门口：——原来他连那条街的名字都忘了。

他回到那间丑恶的屋子里，空着肚子，眼睛干涩，身心都麻木了，倒在屋角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两个钟头，一动也不能动。终于他在恍恍惚惚的境界中挣扎起来，上床睡了。但他又堕入狂乱的昏懵状态，时时刻刻的惊醒，以为已经睡了几小时。卧室的空气非常闷塞。他从头到脚的发烧，口渴得要死；荒唐的恶梦老钉着他，便是睁开眼睛的时候也不能免；尖锐的痛苦像刀子一般直刺他的心窝。他半夜里醒来，悲痛绝望，差点儿要叫了；他把被单堵着嘴巴，怕人听见，自以为发疯了。他坐在床上，点着灯，浑身是汗，起来打开箱子找一方手帕，无意中摸到了母亲放在他衣服中间的一本破旧的圣经。克利斯朵夫从来没怎么看过这部书；但这时候，他真感到说不出的安慰。那

是祖父的，祖父的父亲的遗物。书末有一页空白，前人都在上面签着名，记着一生的大事：结婚，死亡，生儿育女等等的日子。祖父还拿铅笔用那种粗大的字体，记录他披览或重读某章某节的年月；书中到处夹着颜色发黄的纸片，写着老人天真的感想。当初这部书一向放在他床头高头的搁板上；夜里大半的时候他都醒着，把圣经捧在手里，与其说是念，还不如说是和它谈天。它跟他做伴，直到他老死，正如从前陪着他的父亲一样。从这本书里，可以闻到家中一百年来悲欢离合的气息。有了它，克利斯朵夫就不太孤独了。

他打开圣经，正翻到最沉痛的几段：

“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是一场连续不断的战争，他过的日子就像雇佣兵的日子一样……”

“我睡下去的时候就说：我什么时候能起来呢？起来之后，我又烦躁的等着天黑，我不胜苦恼的直到夜里……”

“我说：我的床可以给我安慰，休息可以苏解我的怨叹；可是你又拿梦来吓我，把幻境来惊扰我……”

“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肯放松我呢？你竟不能让我喘口气吗？我犯了罪吗？我冒犯了你什么呢，噢，你这人类的守护者？”

“结果都是一样：上帝使善人和恶人一样的受苦……”

“啊，由他把我处死罢！我永远对他存着希望……”

庸俗的心灵，决不能了解这种无边的哀伤对一个受难的人的安慰。只要是庄严伟大的，都是对人有益的，痛苦的极致便是解脱。压抑心灵，打击心灵，致心灵于万劫不复之地的，莫如平庸的痛苦，平庸的欢乐，自私的猥琐的烦恼，没有勇气割舍过去的欢娱，为了博取新的欢娱而自甘堕落。克利斯朵夫被圣经中那股肃杀之气鼓舞起来了：西乃山上的，无垠的荒漠中的，汪洋大海中的狂风，把乌烟瘴气一扫而空。克利斯朵夫身上的热度退净了。他安安静静的睡下，直睡到明天。等到他睁开眼睛，天色已经大亮。室内的丑恶看得更清楚了；他感到自己困苦，孤独；但他敢于正视了。消沉的心绪没有了，只剩下一股英气勃勃的凄凉情味。他又念着约伯的那句话：

“神要把我处死就处死罢，我永远对他存着希望……”

于是他就起床，非常沉着的开始奋斗。

当天早上他就预备作初步的奔走。他在巴黎只认识两个人，都是年轻的同乡：一个是他以前的朋友奥多·狄哀纳，跟他的叔父在玛伊区合开着布店；一个是玛扬斯地方的犹太人，叫做西尔伐·高恩，在一家大书铺里做事，但克利斯朵夫不知道他的地址。

他十四五岁的时候曾经跟狄哀纳非常亲密，对他有过那种爱情前期的童年的友谊，其实已经是爱情了。当时狄哀纳也很喜欢他。这个羞羞答答的呆板的小孩，受着克利斯朵夫犷野不羁的性格诱惑，很可笑的摹仿他，使克利斯朵夫又气恼又得意。那时他们有过惊天动地的计划。后来，狄哀纳为了学生意而出门了，从此两人没再见过；但克利斯朵夫常常从当地和狄哀纳通信

按下列各节，见《旧约·约伯记》。约伯为古代长老，以隐忍与坚信著称。

西乃为阿拉伯半岛地名，又为山脉名，圣经载，上帝于西乃山上授律于摩西。

参看卷二：《清晨》。——原注

的人那儿听到他的消息。

至于和西尔伐·高恩的关系，又是另外一种了。他们是从小在学校里认识的。小狷狷似的家伙老是耍弄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上了当就揍他一顿。高恩毫不抵抗，让他打倒在地下，把脸揷在土里；他假哭了一阵，过后又立刻再来，刁钻古怪的玩艺儿简直没有完，——直到有一天克利斯朵夫非常当真的说要杀死他方始害了怕。

克利斯朵夫那天清早就出门了，路上在一家咖啡店里用了早餐。他压着自尊心，决不放过讲法文的机会。既然他得住在巴黎，也许要住几年，自然应当赶快适应巴黎生活，消灭自己那种厌恶的心理。所以尽管侍者带着嘲笑的态度听着他不成腔的法国话，使他非常难受，他还是硬要自己不以为意，并且毫不灰心的花了很大的劲造出一些四不像的句子，翻来覆去的说，直说到别人听懂为止。

吃过早点，他就去找狄哀纳。照例，他有了一个念头，对周围的一切都会看不见的。根据这第一次散步所得的印象，他觉得巴黎是一个市容不整的旧城；克利斯朵夫看惯了新兴的德意志帝国的城市，它们很古老同时又很年轻，因为有股新生的力量而很骄傲；如今看到巴黎残破的市街，泥泞的路面，行人的拥挤，车马的混乱，——有古老的驾着马匹的街车，有用蒸汽的街车，用电气的街车，形形色式，不一而足，——人行道上搭着板屋，广场上堆满着穿礼服的塑像，放着给人骑着玩的旋转的木马，总而言之，克利斯朵夫看见这个受着民主洗礼而始终没有脱掉破烂衣衫的中世纪城市，不由得诧异不置。昨夜的雾到今天变了濛濛的细雨。虽然时间已经过十点，多数的铺子还点着煤气灯。

克利斯朵夫在胜利广场四周迷宫似的街道中摸索了一阵，终于找到了那个银行街上的铺子。一进门，他仿佛瞥见狄哀纳和几个职员在很深很黑的铺子的尽头整理布匹。但他有些近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它们的直觉难得错误。克利斯朵夫对招待他的店员报了姓名，里头的人忽然骚动了一下；他们交头接耳的商量过后，人堆里走出一个青年来，用德文说：“狄哀纳先生出去了。”

“出去了？要好久才回来吗？”

“大概是吧。他才出门。”

克利斯朵夫想了想，说：“好。我等着罢。”

店员不禁呆了一呆，赶紧补充：“也许他要过两三个钟点才回来呢。”

“噢！没关系，”克利斯朵夫不慌不忙的回答，“反正我在巴黎没事，哪怕等上一天也行。”

那青年望着他楞住了，以为他开玩笑。可是克利斯朵夫已经把他忘了，消消停停的拣着一个角儿坐下，背对着街，似乎准备老呆在那里了。

店员回到铺子的尽里头，和同事们轻轻的说着话，慌忙的神气非常可笑，他们商量用什么方法把这个讨厌家伙打发走。

大家含糊了一会，办公室的门开了。狄哀纳先生出现了。宽大红润的脸盘，腮帮和下巴有个紫色的伤痕，淡黄的胡子，紧贴在脑壳上的头发在旁边分开，戴着金丝眼镜，衬衫的胸部扣着金钮子，肥胖的手指上戴着几只戒指。他拿着帽子和雨伞，若无其事的向克利斯朵夫走过来。坐在椅上胡思乱想的克利斯朵夫冷不防吃了一惊，马上抓着狄哀纳的手粗声大气的表示亲热，使店员们暗笑，使狄哀纳脸红。这个庄严的人物自有不愿意与克利斯朵夫重续

旧交的理由；他决心第一次相见就拿出威严来不让克利斯朵夫亲近。可是一接触克利斯朵夫的目光，他觉得自己仍旧是个小孩子，不由得羞愤交集，赶紧嘟嘟囔囔的说：“到我办公室去罢……说话方便些。”

克利斯朵夫又看出了他谨慎小心的老习惯。

进了办公室，把门关严了，狄哀纳并不忙着招呼他坐，只是站着，很笨拙的解释：

“高兴得很……我本来要出去……人家以为我已经走了……可是我非出去不可……咱们只能谈一分钟……我有个紧急的约会……”

克利斯朵夫这才明白刚才店员是扯谎，而那个谎是和狄哀纳商量好了把他拒之门外的。他不由得冒了火，可是还按捺着，冷冷的回答说：“忙什么！”

狄哀纳把身子往后一仰，对这种放肆的态度非常愤慨。“怎么不忙！有桩买卖……”

克利斯朵夫直瞪着他又说了声：“不忙！”

大孩子把眼睛低了下去。他恨克利斯朵夫，因为自己在他面前这样没用。他支吾其辞的说着。克利斯朵夫打断了他的话：“你知道……”

（一听到这个你字，狄哀纳就心中有气；他一开头使用了客套的您字，表示疏远，不料竟是白费。）

“……你知道我为什么到这儿来的？”

“是的，我知道。”

（本国的来信已经把克利斯朵夫出了乱子而被通缉的事告诉狄哀纳。）

“那末，”克利斯朵夫接着说，“你知道我不是来玩儿，而是亡命。我一无所有，得想法子生活。”

狄哀纳等他提出要求。他一边接见他，一边觉得又得意又难堪：——得意，因为可以在克利斯朵夫面前显出自己的优越；难堪，因为不敢称心如意的教克利斯朵夫感觉到他的优越。“啊！”他神气俨然的说，“那可是糟啦，太糟啦。这儿生活艰难，百物昂贵。我们开支浩大，再加这么多的店员……”克利斯朵夫觉得他可鄙，截住了他的话：“放心，我不问你要钱。”

狄哀纳着了慌。克利斯朵夫接着又说：“你生意好吗？主顾不少吗？”

“是的，还不坏，托上帝的福……”狄哀纳很小心的回答。（他提防着。）

克利斯朵夫愤愤的瞪了他一眼，又道：“这儿的德国人中间，你熟人很多吧？”

“是的。”

“那末，你给我说说。他们大概都喜欢音乐吧。他们有孩子。我可以找些教课的事。”

狄哀纳神气很为难。

“怎么办呢？”克利斯朵夫问。“难道你不放心，认为我不够资格教人吗？”

他要人帮忙，倒像是他帮人家的忙。而狄哀纳倘使不能教克利斯朵夫觉得欠了自己的情，是永远不肯出一分力的；所以他打定主意不为克利斯朵夫高抬贵手。

“怎么不够！你真是大才小用了……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事情很难，很难，你不明白吗，为了你的处境？”“我的处境？”

“是啊……那件事，那个案子……要是大家知道的话……我可为难了，那对我是很不利的。”

他看见克利斯朵夫脸色变了，便赶紧声明：“并不是为了我……我并不怕……啊！要是只有我一个人就好办了！……可是为了我的叔叔……我知道铺子是他的，没有他，我就毫无办法……”

克利斯朵夫的脸色和快要发作的怒气使他越来越害怕，他急忙补上一句——（他心并不坏；吝啬和要面子的心理在他胸中交战：他很愿意帮助克利斯朵夫，可是要用惠而不费的办法）：“我给你五十法郎怎么样？”

克利斯朵夫脸发了紫。他向着狄哀纳走过去的神气，使狄哀纳马上退到门口，开着门预备叫人了。但克利斯朵夫只是满面通红的凑近去，大叫一声：“畜生！”他一手推开了他，从许多店员中间出去了。走到门口，他不胜厌恶的吐了一口唾沫。

他大踏步在街上走着，气得发了昏，直到淋着雨才醒过来。上哪儿去呢？他不知道。他一个人也不认识。走过一家书店，他停着脚步预备想一想，茫然望着橱窗里陈列的书。忽然一本书的封面上有个出版家的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不懂为什么要注意。过了一会，他才记起那是西尔伐·高恩办事的一家书店，便把地址记了下来……记了有什么用呢？他又不会去的……为什么不去？狄哀纳那个混蛋当初还是他的好朋友尚且这样；现在对这个从前受过他糟蹋而势必恨他的家伙，又有什么可希望？再去受不必要的羞辱吗？一想到这个，他心火就上来了。——但大概是从基督教教育来的悲观主义，反而使他想把一般人的卑鄙彻底领教一下。

“我不能再拿什么架子了。要饿死，也先得把所有的路都走完了。”

他心里又补上一句：“并且我也决不会饿死的。”

他把地址复看了一遍，找高恩去了。他决意只要高恩有一点儿傲慢的神气，就打烂他的脸。

那家出版公司在玛特兰纳区；克利斯朵夫走上二楼的客厅，说要找西尔伐·高恩。一个穿制服的仆人回答说“没有这个人”。克利斯朵夫诧异之下，以为自己读音不清，便又说了一遍；那仆人留神细听以后，说公司里的确没有这个姓名的人。克利斯朵夫狼狈不堪，道了歉，预备走了，不料走廊尽头的门打开了，出来的便是高恩，送着一位女客。克利斯朵夫才碰了狄哀纳的钉子，便以为大家都在耍弄他。他一转念当作高恩在他进门的时候已经看不见了，特意吩咐仆人挡驾的。这种岂有此理的举动使他气都喘不过来。他愤愤的已经往外走了，忽然听见人家跟他招呼。原来高恩尖利的目光老远就把他认出了，堆着笑容奔过来，伸着手，亲热得不得了。

西尔伐·高恩是个矮胖子，胡子剃得精光，完全是美国式，皮色太红了一点，头发太黑了一点，一张又阔又大的脸，肥头胖耳，打皱的小眼睛老在那里东张西望，嘴巴稍微有点歪，挂着一副呆板而狡猾的笑容。他穿得非常讲究，尽量要掩饰身段的缺陷，把太高的肩膀和太粗的腰身给遮起来。他觉得美中不足的就只有这几点；要是身体能再高二三寸，腰围再细几分，他哪怕给人踢几脚也是愿意的。至于别的一部分，他自己非常满意，以为别人一看见他就会着迷的。而妙就妙在果真如此。这矮小的德国犹太人，这个伧夫俗物，居然做着巴黎的时装记者与时装批评家。他写一些无聊的，把肉麻当有趣的通讯。他是鼓吹法国风格，法国风雅，法国风流，法国精神的人，——脑子里全是摄政王时代，红靴跟，洛尚那一类的玩艺儿。大家嘲笑他，但他

摄政王时代指路易十五未成年时由斐列伯·特·奥莱昂摄辅的时代（1715—1723），以风气淫靡著称。

照旧很出风头。凡是说“在巴黎，可笑是你的致命伤”的人，其实是不认识巴黎：“可笑”非但没有害死人，并且还有人靠它过活；在巴黎，“可笑”能使你获得一切：光荣，艳福，都不成问题。所以西尔伐·高恩对每天凭着装腔作势的肉麻话得来的钦慕已经不希罕了。

他口音重浊，逼尖着喉咙，完全用假嗓子说话。

“啊！真想不到！”他一边高高兴兴的喊着，一边用皮肤绷紧指头短而臃肿的手抓着克利斯朵夫的手拚命的摇，仿佛遇到了最知己的朋友似的，他竟舍不得放下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愣住了，心里想高恩是不是跟他开玩笑。可是并不。或者即使他存心嘲弄，也不超过他平时的分量。高恩太聪明了，决不作睚眦必报的打算。克利斯朵夫当年的欺侮早已被置之脑后；便是想起，他也不大在乎，倒很高兴教从前的同伴看看他现在的地位和典雅的巴黎风度。他所表示的惊讶也是真的；他万万想不到克利斯朵夫这个突如其来的访问。而且他虽然那么机灵，立刻猜到克利斯朵夫此来必有目的的，也极愿意招待他，因为克利斯朵夫的有求于他，就等于对他的权势表示敬意。

“你从家乡来吗？妈妈身体怎么样？”那种亲昵的口吻，克利斯朵夫平时听了也许会讨厌，但此刻在一个外国的城里听到，他的确非常快慰。

“可是，”克利斯朵夫心里还有点儿猜疑，“怎么刚才人家回答我说这里没有高恩先生呢？”

“这里的确没有高恩先生，”西尔伐·高恩笑着说。“我改姓哈密尔顿了。”

他忽然说了声“对不起”，把话打住了。

有位女太太在旁边过，高恩笑脸相迎的上去跟她握了握手。然后他回来，说那是一个以写肉感小说写得火刺刺出名的女作家。这位现代的萨芙 胸口缀着紫色丝带，身材肥胖，淡黄头发带点儿红色，涂脂抹粉的脸大有志得意满之概；她用那种男性的嗓子，带着法国东部的乡音说些夸口的话。

高恩又向克利斯朵夫问长问短，提到一切家乡的人，打听这个，打听那个，故意表示对谁都没忘记。克利斯朵夫忘了自己的反感，又感激又诚恳的告诉他许多细节，都是跟高恩渺不相关的。而高恩又说了声“对不起”，打断了克利斯朵夫的话，去招呼另外一个女客。

“啊！”克利斯朵夫问，“难道法国只有女人会写文章吗？”高恩听着笑了，神气俨然的回答说：“告诉你，好朋友，法国是女性的。你要想成功，就得走女人的路子。”

克利斯朵夫根本不听对方的解释，只顾说自己的话。高恩为结束他的谈话起见，便问：“可是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嘿！”克利斯朵夫心里想，“他还没知道呢。怪不得这么亲热。事情揭穿了，他要不改变态度才怪！”

他可觉得为了自己的面子，非把跟大兵的打架，当局的通缉，自己的逃亡等等一齐说出来不可。

高恩听着笑弯了腰，嚷着：“妙哪！妙哪！真够劲儿！”他热烈的握着

红靴跟为君主时代出入宫廷的贵族所穿的。洛尚为路易十四、十五两朝的幸臣。此处所用三典故，系泛指法国十八世纪的轻浮佻 的习气。

萨芙为纪元前七世纪至六世纪时希腊女诗人，相传其私生活极为风流。

丝带为得最低级荣誉团勋章，紫色的属于大学院（即教育界）范围的，男子系于左衣襟上角的钮孔内，女子则佩于胸前。

克利斯朵夫的手。只要是跟官方开玩笑，他听了就乐不可支；何况这一次的许多角色是他认识的，事情更显得滑稽而有趣了。

“听我说，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你赏个脸吧……咱俩一起吃饭去。”

克利斯朵夫感激不尽的接受了，暗暗的想：“倒是个好人。我把他看错了。”

他们一同出去。克利斯朵夫一路走一路说出了他的来意：“现在你知道我的处境了。我到这儿来想找些工作，在大家还没知道我的时候先教教音乐。你能替我介绍吗？”“怎么不能！你要我介绍哪一个都可以。这儿我全是熟人。只要你吩咐就得了。”

他很高兴能表示自己多么有声望。克利斯朵夫慌忙道谢，觉得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

他在饭桌上狼吞虎咽，十足表现他两天没吃过东西。他把饭巾扣在脖子里，把刀伸到嘴边，那种贪嘴和土气十足的举动使高恩-哈密尔顿讨厌极了。克利斯朵夫却并没注意到高恩信口雌黄的可厌。高恩竭力想夸耀自己的交游和艳遇，可是白费：克利斯朵夫根本没听，还随便把他的话说开去。此刻他也打开了话匣子，非常亲狎。感激之余，他很天真的把自己的计划噜噜苏苏的说给高恩听。高恩尤其头疼的是克利斯朵夫时时刻刻非常感动的从桌上伸过手去握他的手。他还要来一下德国式的碰杯，说着多情的话祝福故乡的人，祝福莱茵河；那简直是火上加油，使朋友气恼到极点。高恩一看他要唱起歌来了，更为之骇然。邻桌的人正用着讥讽的目光瞅着他们。高恩急忙推说有件要紧事儿，站了起来。克利斯朵夫却死抓着他，要知道什么时候能介绍他去见什么人，什么时候能开始授课。

“我一定想办法，白天不去，晚上准去，”高恩回答。“你放心，等会我就去找人。”

克利斯朵夫紧钉着问：“什么时候可以有回音呢？”

“明天……明天……或是后天。”

“好罢。我明天再来。”

“不用，不用，”高恩抢着说。“我会通知你，你不必劳驾。”“噢！跑一趟算得什么！……反正我眼前没事。”

“见鬼！”高恩心里想着，——又高声说：“不，我宁可写信给你。这几天你找不到我的。把你的地址告诉我罢。”

克利斯朵夫告诉了他。

“好极了，我明儿写信给你。”

“明儿吗？”

“明儿，一定的。”他挣脱了克利斯朵夫的手，急急忙忙溜了。

“嘿！”他对自己说，“讨厌死了！”

他回去吩咐办公室的仆役，下次那“德国人”再来，就得挡驾。——再过十分钟，他把克利斯朵夫完全忘了。克利斯朵夫回到小旅馆里，非常感动。

“真是个好人在！”我心里想。“我小时候给他受了多少委屈，他居然不恨我！”

他为此责备自己，想写信给高恩，说从前对他误会了，觉得很难过；凡是得罪他的地方，务请原谅。他想到这些，眼泪都冒上来了。但他写信远不及写整本的乐谱容易；所以他把旅馆里那些要不得的笔跟墨水咒骂了一顿，涂来涂去，撕掉了四五张信纸以后，终于不耐烦了，把一切都扔了。

这一天余下的时间过得真慢，但克利斯朵夫因为昨夜没睡好，当天又奔了一个早晨，疲倦不堪，在椅子上打盹了。他睡到傍晚才醒，醒后就上床睡觉，一口气睡了十二小时。

明天从八点起，他已经开始等回音了。他相信高恩决不会失约，唯恐他去办公以前会来看他。便守在房里寸步不移，中午教楼下的小饭铺把中饭端上来。饭后他又等着，以为高恩会从饭店里出来看他的。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一忽儿坐下，一忽儿站起来踱步，楼梯上一有脚步声立刻打开房门。他根本想不到巴黎城中去溜溜，免得心焦。他躺在床上，一刻不停的想着母亲；而她也在那里想他，——世界上也只有她一个人想他。他对母亲抱着无限的温情，又为了把她孤零零的丢下而非常不安。可是他并不写信，他要能够告诉她找到了工作的时候再写。母子俩虽然那么相爱，彼此都没想到写一封简单的信把这点感情说出来。他们认为一封信是应该报告确切的消息的。——他躺在床上，把手枕在脑后，胡思乱想。卧室跟街道尽管离得很远，巴黎的喧闹照旧传进来，屋子也常常震动。——天黑了，毫无消息。

又是一天，跟上一天没有什么区别。

克利斯朵夫把自己关在屋里关到第三天，憋闷得慌了，决意出去走走，但从初到的那晚起，不知为什么他就讨厌巴黎。他什么都不想看，对什么都没好奇心；他太关切自己的生活了，再没兴致去关切旁人的生活：什么古迹，什么有名的建筑，他都不以为意。才出门，他就觉得无聊得要命，所以虽然决意不等满八天不再去找高恩，也情不自禁的一口气跑去了。

受过嘱咐的仆人说哈密尔顿先生因公出门了。克利斯朵夫大吃一惊，嘟囔着问哈密尔顿先生什么时候回来。仆役随便回答了一句：“总得十天八天吧。”

克利斯朵夫失魂落魄的回去，在房里躲了好几天，什么工作都不能做。他骇然发觉那点儿有限的钱——母亲用手绢包塞着在他箱子底下的，——很快的减少下去，便竭力紧缩，只有晚上才到楼下小饭铺里吃一顿。饭店里的客人不久也认识他了，背后叫他“普鲁士人”或是“酸咸菜”——他花了好大的劲，写信给几位他隐隐约约知道姓名的法国音乐家。其中一个已经死了十年。他在信里要求他们听他弹弹他的作品：别字连篇，用了许多倒装句子，再加一大串德国式的客套话。信上的抬头写着“送呈法国通儒院宫邸”之类。——那些收信人中只有一个把信看了一篇，跟朋友们大笑一阵。

过了一星期，克利斯朵夫又回到书店里。这一回，运气帮了他的忙。他走到门口，高恩正好从里面出来。高恩眼见躲避不了，便扮了个鬼脸；克利斯朵夫快活之极，根本没觉察。他以那种惹人厌的习惯抓住了对方的手，挺高兴的问：

“啊，你前几天出门去了？旅行很愉快吗？”

高恩回答说是的，但仍旧愁眉不展。克利斯朵夫接着又说：“你知道我来过罢，……人家跟你说过了是不是？……有什么消息没有？你跟人提起我了吗？人家怎么说？”

高恩越来越愁闷。克利斯朵夫看他发僵的态度很奇怪：那简直是换了一个人。

“我提过你了，”高恩说；“可还不知道结果；我老是没空。上次跟你

分手以后，我就忙不过来：公事堆积如山，简直不知道怎么对付。真累死人。我非病倒不可了。”

“你是不是身体不行？”克利斯朵夫很焦心很关切地问。

高恩狡狴的瞥了他一眼：“简直不行。这几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非常不舒服。”

“啊！天哪！”克利斯朵夫抓着他的手臂说。“你得保重身体！好好的休息。我真抱歉，还要给你添麻烦！得老实告诉我呀。究竟是怎么样的不舒服呢？”

他把对方的推托那么当真，高恩一边拚命忍着不笑出来，一边也被他的憨直感动了。犹太人是最喜欢挖苦人的——（在这一点上，巴黎多少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只要对方给他们一个取笑的机会，哪怕他是厌物，是敌人，他们都会特别宽容。并且高恩看到克利斯朵夫对他的健康这样关切，也不由得感动了，决意帮助他。

“我有个主意在这里，”高恩说。“既然暂时找不到学生，你能不能先做点儿音乐方面的编辑工作？”

克利斯朵夫马上答应了。

“那就行啦！”高恩接着说。“有个巴黎最大的音乐出版家，但尼·哀区脱，我跟他很熟。我介绍你去；有什么事可做，你临时看着办罢。你知道我，在这方面完全外行。但哀区脱是个真正的音乐家。你们一定谈得拢的。”

他们约定第二天就去。高恩能够一方面帮了克利斯朵夫的忙，一方面把他摆脱了，觉得挺高兴。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到书店去和高恩会齐了。他依着他的嘱咐，带了几部作品预备给哀区脱看。他们到歌剧院附近的音乐铺子里把他找到了。客人进门，哀区脱并不起身相迎；高恩跟他握手，他只冷冷的伸出两个手指；至于克利斯朵夫恭恭敬敬的行礼，他根本不理。直到高恩要求，他才把他们带到隔壁屋里，也不请他们坐下，自己背靠着没有生火的壁炉架，眼睛望着墙壁。

但尼·哀区脱年纪四十左右，个子高大，态度冷淡，穿著很整齐，腓尼基人的特点很显明，一望而知是聪明而脾气很坏的，脸上仿佛老是在生气，须发全黑，长胡子修成方形，像古代的阿叙王。他差不多从来不正面看人，说话又冷又粗暴，便是寒暄也像跟人顶撞。他外表的傲慢无礼，固然是因为瞧不起人，但也是一种手足无措的表现。这样的犹太人很多；大家讨厌他们，认为这个强直的态度是目中无人，实际是他们的精神与肉体都发僵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高恩有说有笑的用着夸张的口吻和吹捧，把克利斯朵夫介绍了。——他却是被主人那种招待窘住了，只顾拿着帽子和乐谱摇摆不定的站在那儿。哀区脱似乎至此为止根本不知道有克利斯朵夫在场，等到高恩说了一阵，才傲慢的转过头来，眼睛望着别处，说：“克拉夫脱……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姓名。”

克利斯朵夫仿佛当胸挨了一拳，气得满面通红的回答：“你将来会听见的。”

哀区脱不动声色，继续冷静的说着，当做没有克利斯朵夫一样：“克拉夫脱？……没听说过。”

像哀区脱那一等人，对一个姓名陌生的人就不会有好印象。

他又用德文接着说：“你是莱茵流域的人吗？……真怪，那边弄音乐的人这么多！没有一个不自称为音乐家的。”

他是想说句笑话而不是侮辱；但克利斯朵夫觉得是另外一个意思，他马上想顶回去了，可是高恩抢着说：“啊！请你原谅，你得承认我是外行。”

“你不懂音乐，我倒觉得是值得恭维的呢。”哀区脱回答。

“假如要不是音乐家你才喜欢，”克利斯朵夫冷冷的说，“那末很抱歉，我不能遵命。”

哀区脱始终把头掉在一边，神情淡漠的问：“你已经在作曲了吗？写过什么东西？总是些歌吧？”

“有歌，还有两个交响曲，交响诗，四重奏，钢琴杂曲，舞台音乐，”克利斯朵夫很兴奋的说着。

“你们在德国东西写得真多，”哀区脱的话虽然客气，颇有点儿鄙薄的意味。

他对于这个新人物的不信任，尤其因为他写过这么多作品，而他，但尼·哀区脱，都没知道。

“那末，”他说，“或许我能给你一些工作，既然你是我的朋友哈密尔顿介绍来的。我们此刻正在编一部少年丛书，印一批浅易的钢琴谱。你能不能把舒芒的《狂欢曲》编得简单些，改成四手，六手，或八手的钢琴谱？”

克利斯朵夫跳起来：“你叫我，我，做这种工作吗？……”

这天真的“我”字使高恩大笑起来；可是哀区脱沉着脸生气了：“我不懂你为什么听了这话奇怪：那也不是怎么容易的工作，你要觉得胜任愉快，那末再好没有！咱们等着瞧罢。你说你是出色的音乐家。我应然相信。但我究竟不认识你呀。”

他暗中想道：“听这些家伙的口气，他们比勃拉姆斯都高明。”

克利斯朵夫一声不出，——（因为他决心不让自己发作，）——把帽子一戴，往门口走了。高恩笑着把他挡住了说：“别那么急呀！”

他又转身向哀区脱：“他带着几部作品，预备给你瞧瞧。”

“啊！”哀区脱表示不大耐烦，“那么拿来瞧瞧。”

克利斯朵夫一言不发，把稿本递给了他。哀区脱漫不经心的翻着。

“什么呢？啊，《钢琴组曲》……（他念着：）《一日》……老是标题音乐……”

虽然面上很冷淡，其实他看得很用心。他是个优秀的音乐家，关于本行的学识，他都完备，可是也至此为止；看了最初几个音符，他就明白作者是怎样的人。他不声不响，一脸瞧不起的翻着作品，对作者的天分暗中觉得惊奇；但因为生性傲慢，克利斯朵夫的态度又伤了他的自尊心，所以他一点儿都不表示出来。他静静的看完了，一个音都没放过，“嗯，”他终于老气横秋的说：“写得还不坏。”

这句话比尖刻的批评使克利斯朵夫更受不了。

“用不着人家告诉我才知道，”他气极了。

“可是我想，”哀区脱说，“你给我看作品，无非要我表示一点儿意见。”

“绝对不是。”

“那么，”哀区脱也生了气，“我不明白你来向我要求什么。”

四手，六手，八手的琴谱乃系供二人在一架钢琴上合奏，或三人四人在二架钢琴上合奏之谱。

“我不要求别的，只要求工作。”

“除了刚才说的，眼前我没有别的事给你作。而且还不一定。我只说或者可以。”

“对一个像我这样的音乐家，你不能分派些别的工作吗？”

“一个像你这样的音乐家？”哀区脱用着挖苦的口气说。“至少跟你一样高明的音乐家，也没觉得这种工作有损他们的尊严。有几个，我可以说出名字来，如今在巴黎很出名的，还为此很感激我呢。”

“那因为他们都是些窝囊废，”克利斯朵夫大声回答，他已经会用些法文里的妙语了。“你把我当做他们一流的人，你可错了。你想用你那种态度，——不正面瞧人，说话半吞半吐的——来唬吓我吗？我进来的时候对你行礼，你睬都不睬……你是什么人，敢这样对我？你能算一个音乐家吗？不知你有没有写过一件作品？而你居然敢教我，教一个以写作为生命的人怎么样写作！……看过了我的作品，你除了教我篡改大师的名作，编一些脏东西去教小姑娘们做苦工以外，竟没有旁的更好的工作给我！……找你那些巴黎人去罢，要是他们没出息到愿意听你的教训。至于我，我是宁可饿死的！”

他这样滔滔不竭的说着，简直停不下来。

哀区脱冷冷的回答：“随你罢。”

克利斯朵夫一路把门震得砰砰甸甸的出去了。西尔伐·高恩看着大笑，哀区脱耸耸肩对高恩说：“他会跟别人一样回来的。”

他心里其实很看重克利斯朵夫。他相当聪明，不但有看作品的眼光，也有看人的眼光。在克利斯朵夫那种出言不逊的，愤怒的态度之下，他辨别出一种力量一种他知道很难得的力量，——尤其在艺术界中。但他的自尊心受伤了，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自己的错。他颇想给克利斯朵夫一点儿补尝，可是办不到，除非克利斯朵夫向他屈服。他等克利斯朵夫回头来迁就他：因为凭着他悲观的看法和阅世的经验，知道一个人被患难磨折的结果，顽强的意志终于会就范的。

克利斯朵夫回到旅馆，火气没有了，只有丧气的分儿。他觉得自己完了。他的脆弱的依傍倒掉了。他认为不但跟哀区脱结了死冤家，并且把介绍人高恩也变了敌人。在一座只有冤家仇敌的城里，那真是孤独到了极点。除了狄哀纳与高恩，他一个人都不认识。他的朋友高丽纳，从前在德国认识的女演员，此刻不在巴黎，到外国演戏去了，这一回是在美国，不是搭班子，而是自己做主体：因为她已经很出名，报纸上常常披露她的行踪。至于那个被他无意中打破饭碗的女教师，他常常难过而决心到了巴黎非寻访不可的女子，如今来到巴黎之后，他可忘了她的姓氏，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他只记得她名字叫做安多纳德。其余的还得慢慢的回想，而且在茫茫人海中去寻找一个可怜的女教员，又是谈何容易！

眼前先得设法维持生活，越早越好。克利斯朵夫身边只剩五法郎了，他不得不抑捺着厌恶的心理，去问问旅馆的胖子老板，街坊上可有人请他教钢琴。老板对这个一天只吃一顿而又讲德文的旅客，原来就不瞧在眼里，现在知道他只是个音乐家，更失去了所有的敬意。他是老派的法国人，认为音乐是贪吃懒做的人的行业，所以就挖苦他：

“钢琴？……你弄这个玩艺儿吗？失敬失敬！真怪。竟有人喜欢干这一行！我吗，我听到无论什么音乐就跟听到下雨一样……也许你可以教教我吧。喂，你们诸位觉得怎么样？”他转身对一般正在喝酒的工人嚷着。

大家哄笑了一阵。

“这行手艺倒是怪体面的呢，”其中有一个说。“又干净，又能讨女人喜欢。”

克利斯朵夫不大懂得法文，尤其是取笑的话：他正在找话回答，也不知道该不该生气。老板的女人倒很同情他，对丈夫说：“得了吧，斐列伯，别这么胡说八道。”——她又转身向克利斯朵夫：“也许有人会请教你的。”

“谁呀？”丈夫问。

“就是葛拉赛那个小丫头。你知道，人家为她买了一架钢琴呢。”

“啊！你说的是他们，那些摆臭架子的！不错，那是真的。”

他们告诉克利斯朵夫，说那是肉店里的女儿：她的父母想把她装成一个大家闺秀，答应她学琴，哪怕借此招摇一下也是好的。结果是旅馆的主妇答应替克利斯朵夫说去。

第二天，他回报克利斯朵夫，肉店的女主人愿意先见见他。他便去了，看见她坐在柜台后面，四周全是牲畜的尸首。那个皮色娇嫩，装着媚笑的漂亮女人，一知道他的来意，立刻扮起一副俨然的面孔。她开口就提到学费，声明她不愿意多花钱，因为弹琴固然是有趣的玩艺，但并非必需的，她每小时只能给一法郎。之后，她又不大放心的盘问他是否真懂音乐。等到知道他不但会演奏，还会写作，她似乎安心了，态度也显得殷勤了些：她的自尊心满足了，决意向街坊们说她的女儿找到了一个作曲家做老师。

下一天，克利斯朵夫发见所谓钢琴是件旧货店里买来的破烂东西，声音像吉他；——而肉店里的小姐用着又粗又短的手指在键盘上扭来扭去，连这个音和那个音的区别都分不出，神气似乎不胜厌烦，不到几分钟就当着人打呵欠；——母亲还在旁监视，发表她那套对音乐与音乐教育的意见：——克利斯朵夫委屈之极，连发怒的气力也没有了。他垂头丧气的回去，有几晚连饭都吃不下。仅仅是几星期的功夫，他已经到了这田地，将来还有什么下贱的事不能做？当初也何必那么愤愤不平的拒绝哀区脱的工作？他现在做的事不是更丢人吗？

一天晚上，他在卧室中不由得流下泪来，无可奈何的跪在床前祈祷……祈祷什么呢？他能祈祷什么呢？他已经不信上帝，以为没有上帝了……但还是得祈祷，向自己祈祷。只有极平凡的人才从来不祈祷。他们不懂得坚强的心灵需要在自己的祭堂中潜修默炼。白天受了屈辱之后，克利斯朵夫在他静得嗡嗡作响的心头，感觉到他永恒的生命。悲惨生活的浪潮在生命的底下流动：但这悲惨生活跟他生命的本体又有什么关系呢？世界上一切的痛苦，竭力要摧毁一切的痛苦，碰到生命那个中流砥柱就粉碎了。克利斯朵夫听着自己的热血沸腾，仿佛是心中的一片海洋，还有一个声音在那里反复说着：

“我是永久，永久存在的……”

这声音，他是很熟悉的：不论回想到如何久远，他始终听到它。有时他会几个月的把它忘掉，想不起内心有它强烈单调的节奏；可是实际上他知道那声音永远存在，从来没停过，正如海洋在黑夜里也依旧狂啸怒吼。如今他又找到了那种镇静与毅力，像每次沉浸到这音乐中的时候一样。他心定神安的站了起来。不，他的艰苦的生活一点没有可羞的地方；他咬着面包用不着脸红；该脸红的是那些逼他用这种代价去换取面包的人，忍耐罢！终有一

天……

可是到了明天又没耐性了；他虽是竭力抑制，终于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因为那混账而放肆的小丫头嘲笑他的口音，故意捣乱，不听他的指导，他气得大发雷霆。克利斯朵夫怒吼着，小姑娘怪叫着，因为一个由她出钱雇用的人胆敢对她失敬而大为骇怒。克利斯朵夫把她手臂猛烈的摇了几下，她就嚷着说他打了她，母亲像雌老虎般的跑来，拚命的吻着女儿，骂着克利斯朵夫。肉店老板也出现了，说他决不答应一个普鲁士流氓来碰他的女儿。克利斯朵夫气得脸色发白，羞愤交加，一时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把那个男人，女人，小姑娘，一齐勒死，便在咒骂声中溜了。旅店的主人们看他狼狈不堪的回来，立刻逗他说出经过情形，使他们嫉妒邻居的心借此痛快一下。但到了晚上，街坊上都传说德国人是个殴打儿童的蛮子。

克利斯朵夫又到别的音乐商那里奔走了几次，毫无结果。他觉得法国人不容易接近；他们那种漫无秩序的忙乱把他头都闹昏了。巴黎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受着专制傲慢的官僚政治统治。

一天晚上，他因为一无收获而垂头丧气在大街上溜达的时候，忽然看见西尔伐·高恩迎面而来。他一心以为他们已经闹翻了，便掉过头去，想不让他看见。高恩可是招呼他：“哎！你怎么啦？”他一边说一边笑。“我很想来看你，可是我把你的地址丢了……天哪，亲爱的朋友，那天我竟认不得你了。你真是慷慨激昂。”

克利斯朵夫望着他，又是诧异又是惭愧：“你不恨我吗？”

“恨你？干么恨你？”

他非但不恨，还觉得克利斯朵夫把哀区脱训斥一顿挺好玩呢；他的确大大的乐了一阵。哀区脱和克利斯朵夫两个究竟谁是谁非，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估量人是把他们给他的乐趣多少为标准的；他感到克利斯朵夫可能供应大量的笑料，想尽量利用一下。

“你该来看我啊，”他接着说。“我老等着你呢。今晚你有事没有？跟我一块儿吃饭去。这一下我可不让你走啦。吃饭的都是咱们自己人：每半个月聚会一次的几个艺术家。你应当认识这些人。来罢。我给你介绍。”

克利斯朵夫拿衣冠不整来推辞也推辞不掉。高恩把他拉着走了。

他们走进大街上的一家饭店，直上二楼。克利斯朵夫看见有三十来个年轻人，大概从二十岁到三十五岁，很兴奋的讨论着什么。高恩把他介绍了，说他是刚从德国牢里逃出来的。他们全不理睬，只管继续他们热烈的辩论。初到的高恩也立刻卷了进去。

克利斯朵夫见了这些优秀分子很胆怯，不敢开口，只尽量伸着耳朵听。但他不容易听清滔滔不竭的法文，没法懂得讨论的究竟是什么重大的艺术问题。他只听见“托辣司”“垄断”，“跌价”，“收入的数目”等等的名词，和“艺术的尊严”与“著作权”等等混在一起。终于他发觉大家谈的是商业问题。一部分参加某个银团的作家，因为有人想组织一个同样的公司和他们竞争而愤愤的表示反对。一批股东为了私人利益而带着全副道具去投靠新组织，更加使他们怒不可遏。他们一片声的嚷着要砍掉那些人的脑袋，说什么“失势……欺骗……屈辱……出卖……”等等。

另外一批可不攻击活人而攻击死人，——因为他们没有版权的作品充塞

市场。缪塞的著作最近才成为公众的产业，据他们看来，买他著作的读者太多了。他们要求政府对从前的名作课以重税，免得它们低价发行。他们认为，已故作家的作品以廉价倾销的方式跟现存艺术家的作品竞争是不光明的行为。

他们又停下来，听人家报告昨天晚上这一出戏和那一出戏的收入。大家对某个在欧美两洲出名的老戏剧家的幸福羡慕得出神，——他们非常瞧不起他，但嫉妒的心尤甚于瞧不起的心。——他们从作家的收入谈到批评家的收入，说某个知名的同文，只要大街上某戏院演一出新戏，——（一定是谣言吧？）——就能到手一笔不小的款子作为捧场的代价。据说他是个诚实君子：一朝价钱讲妥了，他总是履行条件的，但他最高明的手段——（据他们说），——是在于把捧场文章写得使那出戏在最短期间不再卖座而戏院不得不常排新戏。这种故事教大家发笑，但谁都不以为奇。

这些议论中夹着许多冠冕堂皇的字；他们谈着“诗歌”，谈着“为艺术而艺术”。这种名词，和钱钞混在一起无异是“为金钱而艺术”。而法国文坛上新兴的掮客风气，使克利斯朵夫尤其着恼。因为他对金钱问题完全不感兴趣，所以他们提到文学——其实是文学家——的时候，他已经不愿意往下听了。可是一听到维克多·雨果的名字，克利斯朵夫又留了神。

问题是要知道雨果是否戴过绿头巾。他们絮絮不休的讨论雨果夫人与圣·伯甫的恋爱。过后，他们又谈到乔治·桑的那些情人和他们的价值。那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最关切的题目：它把大人物家里一切都搜检过了，翻过了抽斗，看过了壁橱，倒空了柜子，最后还得查看他们的卧床。批评家非要学洛尚当年伏在路易十四和蒙德斯朋夫人的床下，或是类乎此的方法，才算无负于历史与真理。——他们那时都是崇拜真理的。和克利斯朵夫同席的一般人都自命为真理狂：为了探求真理，他们孜孜不倦。他们对于现代艺术也应用这个原则，以同样渴求准确的热情，去分析时下几个最负盛名的人的私生活。奇怪的是，凡是平常决没有人看到的生活细节，他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仿佛那些当事人为了爱真理的缘故，自己把准确的材料提供出来的。

愈来愈发僵的克利斯朵夫，想跟邻座的人谈些别的事。但谁也不理睬他。他们固然向他提出了几个空泛的关于德国的问题，——但那些问题只使克利斯朵夫非常诧异的发觉，那些似乎很博学的漂亮人物，对他们本行以内的东西（文学与艺术），一越出巴黎的范围，就连最粗浅的知识都没有；充其量，他们只听说过几个大人物的名字，例如霍德曼，舒特曼，李勃曼，史脱洛斯（是达维特·史脱洛斯呢，约翰·史脱洛斯呢，还是理查·史脱洛斯？）他们搬弄这些人名的时候非常谨慎，唯恐闹笑话。并且，他们的询问克利斯朵夫也只是为了礼貌而非为了好奇心，那是他们完全没有的；至于他的回答，

作家的继承人于作家死后仍可享有著作权若干年（年限由各国法律规定），满期后即无所谓版权，出版家均可自由翻印，等于公共产业。

蒙德斯朋夫人之有宠于路易十四，得力于洛尚侯爵；洛尚乃囑蒙德斯朋代向路易要求炮兵总监之职。此处谓洛尚在朝中弄权窃柄，出入宫闱。

霍德曼与舒特曼均为近代德国大小说家兼剧作家。李勃曼为近代德国大画家，地位相当于法国之玛奈。达维特·史脱洛斯为十九世纪德国神学家，以倡导耶稣仅能称为哲学家之说有名于世。约翰·史脱洛斯为十九世纪奥国作曲家，以轻松的华尔兹舞曲著称。理查·史脱洛斯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的德国最大的作曲家，地位远在约翰·史脱洛斯之上。

他们压根儿就不大想听，急于要回到那些教全桌的人都开心的巴黎琐事上去。

克利斯朵夫怯生生的想谈谈音乐。可是这些文人中没有一个音乐家。他们心里认为音乐是一种低级的艺术。近年来音乐风行一时，未免使他们暗中着恼；但既然它走了运，他们也就装做很关心。有一出最近的歌剧，他们尤其谈得上劲，差不多认为有了这歌剧才有真正的音乐的，至少也得说是开了音乐的新时代。他们的愚昧无知与冒充风雅的脾气最适宜接受这种思想，因为那可以使他们无须再知道下文。歌剧的作者是巴黎人，——克利斯朵夫还是初次听到他的名字，——有几个人说他把以前的东西全部推翻了，把音乐整个儿革新了，重新创造过了。克利斯朵夫听了直跳起来。他巴不得真有天才出现。可是这种一举手就把“过去”推翻了的天才，那还了得！好厉害的家伙！怎么能有这等神通呢？——他要人家解释给他听。那些人既说不出理由，又给克利斯朵夫问个不休，便把他交给他们一群中的音乐家，那位大音乐批评家丹沃斐·古耶。而他立刻和克利斯朵夫提到七度音程九度音程一类的名词。古耶懂的音乐实际和史迦那兰所懂的拉丁文差不多……

“……你不懂拉丁文吗？”

“不懂。”

“(兴高采烈的) Cabricias ,arci thuram ,catalamus ,singulariter..... bonus , bona , bonum.....”

一朝遇到了一个“真懂拉丁文”的人，他就小心谨慎的躺到美学中去了。在那个不可侵犯的盾牌后面，他把不在这桩公案以内的贝多芬，华葛耐，和所有的古典音乐都攻击得体无完肤。（在法国，要恭维一个音乐家，非把一切跟他不同的音乐家尽行打倒，做他的牺牲不可。）他宣称新艺术已经诞生，过去的成规都被踩在脚下了。他提到一种音乐语言，说是巴黎音乐界的哥仑布发现的；这新语言把全部古典派的语言取消了，因为一比之下，古典音乐已经成为死语言了。

克利斯朵夫一方面对这个革命派音乐家暂时取保留的态度，预备看过了作品再说；一方面也对大家把全部音乐作牺牲而奉为音乐之神的家伙大为怀疑。他听见别人用褻渎不敬的语气谈论昔日的大师，非常愤慨，可忘了自己从前在德国说过多少这一类的话。他在本乡自命为艺术叛徒，为了判断的大胆与直言无讳而激怒群众的，一到法国，一听最初几句话，就发觉自己头脑冬烘了。他很想讨论，但讨论的方式很不高雅，因为他不能像一般绅士那样只提出论证的大纲而不加说明，却要以专家的立场探讨确切的事实，拿这些来跟人麻烦，他不惮进一步的作技术方面的研究；而他愈说愈高的声音只能教上流社会听了头痛，提出的论据与支持论据的热情也显得可笑。那位批评

近代音乐之和声，除常用四度五度和弦外，亦多用七度九度；故此处讥人侈言七度九度为表示自己懂得近代音乐。

典出莫利哀喜剧《非做不可的医主》。史迦那兰之妻被夫殴辱，蓄意报复。适有富家仆二人防求能治哑疾之名医，史妻即诳言其夫固为医生，且系国手，但生性怪僻，非痛受笞辱决不自承为医。二仆闻言，往请史迦那兰治病，史以己非医生为辞。二仆即加以鞭撻，史疼痛难忍，不得不诬服自承，冒充医师，至病家诊断时支吾搪塞，知主人不懂拉丁文，乃信口胡诌令人骇服。而其所说之拉丁文，首四字纯出杜撰：后数字（原文不止此一行）则从初级拉丁课本上随意拾缀而来，根本不成句，无意义可言。此处所引为原剧。二幕第四景说白。此典在法文中已为家喻户晓之成语。“你懂拉丁文吗？”一语，常为讹诈外行之意。

家赶紧插一句所谓俏皮话，结束了冗长可厌的辩论，克利斯朵夫骇然发觉原来批评家对所谈的问题根本外行。可是大家对这个德国人已经有了定论，认为他头脑冬烘，思想落伍；不必领教，他的音乐已经被断定是可厌的了。但二三十个眼神含讥带讽的，最会抓住人家可笑的地方的青年，那时又都回头来注意这个怪人，看他挥着瘦小的胳膊和巨大的手掌做出许多笨拙而急激的动作，睁着一双愤怒的眼睛，尖声尖气的嚷着。原来西尔伐·高恩特意要教朋友们看看滑稽戏。

谈话离开了文学，转移到女人身上去了。其实那是同一题材的两面：因为他们的文学总脱不了女人，而他们所说的女人也老是跟文学或文人纠缠不清。

大家正谈着一位在巴黎交际场中很出名的，贞洁的太太，最近把女儿配给自己的情夫，借此羁縻他的故事。克利斯朵夫在椅子上扭来扭去，疾首蹙额的表示不胜厌恶。高恩发觉了，用肘子撞撞邻座的人，说这个话题似乎把德国人激动了，大概他很想认识那位太太吧。克利斯朵夫红着脸，嘟囔了一阵，终于愤愤的说这等妇女简直该打。这句话立刻引起了哄堂大笑；高恩却装着甜美的声音，抗议说女人是绝对不能碰的，便是用一朵花去碰也不可以……（他在巴黎是个风流豪侠的护花使者。）——克利斯朵夫回答说，这种女子不多不少是条母狗，而对付那些下贱的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拿鞭子抽一顿。众人听了又大叫起来。克利斯朵夫说他们向女人献殷勤是假的，往往最会玩弄女子的人才口口声声尊敬女人；他对于他们所讲的丑史表示深恶痛绝。他们回答说那无所谓丑史，而是挺自然的事；大家还一致同意，故事中的女主角不但是个极有风韵的女子，并且是十足女性的女子。德国人可又嚷起来了。高恩便狡猾的问。照他的理想，“女人”应该是怎么样的。克利斯朵夫明知对方在逗他上当；但他生性暴躁，自信很强，照旧中了人家的计。他对那些轻薄的巴黎人宣说他对于爱情的观念。他有了意思没有字，好不为难的找着，终于在记忆中搜索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名辞，说了很多笑话教大家乐死了；他可是不慌不忙的，非常严肃，那种满不在乎，不怕别人取笑的态度，也着实了不得，因为说他没看见人家没皮没脸的耍弄他是不可能的。最后，他在一句话中愣住了，怎么也说不出下文，便把拳头往桌上一击，不作声了。

人家还想逗他辩论；他却拧着眉毛，把肘子撑在桌上，又羞又愤，不理睬了。直到晚餐终席，他一声不出，只顾着吃喝。他酒喝得很多，跟那些沾沾嘴唇的法国人完全不同。邻座的人不怀好意的劝酒，把他的杯子斟得满满的，他都毫不迟疑，一饮而尽。但虽然他不惯于饱餐豪饮，尤其在几星期来常常挨饿的情形之下，他却还支持得住，不至于像别人所希望的那样当场出彩。他只坐着出神；人家不再注意他了，以为他醉了。其实他除了留神法文的对话太费劲以外，只听见谈着文学也觉得厌倦：——什么演员，作家，出版家，后台新闻，文坛秘史，仿佛世界上就只有这些事！看着那些陌生的脸，听着谈话的声音，他心里竟没留下一个人或一缕思想的印象。近视的眼睛，茫茫然老是像出神的模样，慢慢的往桌子上扫过去，瞅着那些人而又似乎没看见。其实他比谁都看得更清楚，只是自己不觉得罢了。他的目光，不像巴黎人或犹太人的那样一瞥之间就能抓住事物的片段，极小极小的片段，马上把它剖析入微。他是默默的，长时间的，好比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人物的印象，把它们带走。他似乎什么都没瞧见，什么都想不起。过了很久，——

几小时，往往是好几天以后，——他独自一人观照自己的当口，才发觉原来把一切都抓来了。

当时他的神气不过是个蠢笨的德国人，只管狼吞虎咽，唯恐少吃了一口。除了听见同桌的人互相呼唤名字以外，他什么也没听到，只像醉鬼一样固执的私忖着，怎么有这样多的法国人姓着外国姓：又是法兰德的，又是德国的，又是犹太的，又是近东各国的，又是英国的，又是西班牙化的美国姓……

他没发觉大家已经离席，独自坐在那里，想着莱茵河畔的山岗，大树林，耕种的田，水边的草原，和他的老母。有几个还站在饭桌那一头谈着话，大半的人已经走了。终于他也决心站起，对谁都不瞧一眼，径自去拿挂在门口的大衣跟帽子。穿戴完毕，他正想不别而行的时候，忽然从半开的门里瞧见隔壁屋里摆着一件诱惑他的东西：钢琴。他已经有好几星期没碰过一件乐器了，便走进去，像看到亲人似的把键子抚弄了一会，竟自坐下，戴着帽子，披着外套，弹起来了。他完全忘了自己在哪儿，也没注意到有两个人悄悄的溜进来听：一个是西尔伐·高恩，极爱好音乐的，——天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完全不懂，好的坏的，一律喜欢；另外一个音乐批评家丹沃斐·古耶。他倒比较简单，对音乐既不懂也不爱，可是很得劲的谈着音乐。原来世界上只有一般不知道自己所说的东西的人，思想才最自由；因为这样说也好，那样说也好，他们都无所谓。

丹沃斐·古耶是个胖子，腰背厚实，肌肉发达，黑胡子，一簇很浓的头发卷儿挂在脑门上，脑门颇有些粗大的皱痕，却毫无表情，不大端正的方脸仿佛在木头上极粗糙的雕出来，短臂，短腿，肥厚的胸部：看上去像个木商或是当挑夫的奥凡涅人。他举动粗俗，出言不逊。他的投身音乐界完全是为了政治关系；而在当时的法国，政治是唯一的进身之阶。他发见跟一个当部长的某同乡有点儿远亲，便投靠在他门下。但部长不会永久是部长的。看到他的那个快下台的时候，丹沃斐·古耶赶紧溜了，当然，凡是能捞到的都已经捞饱，特别是国家的勋章，因为他爱荣誉。最近他为了后台老板的劣迹，也为了他自己的劣迹，受到相当猛烈的攻击，使他对政治厌倦了，想找个位置躲躲暴风雨；他要的是能跟别人找麻烦而自己不受麻烦的行业。在这种条件之下，批评这一行是再好没有了。恰好巴黎一家大报纸的音乐批评的职位出了缺。前任是个颇有才具的青年作曲家，因为非要对作品和作家说他的老实话而被辞掉的。古耶从来没弄过音乐，全盘外行：报馆却毫不踌躇的选中了他。人们不愿意再跟行家打交道；对付古耶至少是不用费心的：他决不会那么可笑，把自己的见解看做了不起；他永远会听上面的指挥，要他骂就骂，要他捧就捧。至于他不是个音乐家，倒是次要的问题。音乐，法国每个人都相当懂的。古耶很快就学会了必不可少的诀窍。方法挺简单：在音乐会里，只要坐在一个高明的音乐家旁边，最好是作曲家，想法逗他说出对于作品的意见。这样的学习几个月，技术就精通了：小鹅不是也会飞吗？当然，这种飞决不能像老鹰一样。古耶大模大样的在报纸上写的那些胡话，简直是天晓得！不管是听人家的话，是看人家的文章，都一味的缠夹，什么都在他蠢笨的头脑里搅成一团糟，同时还要傲慢的教训别人。他把文章写得自命不凡，夹着许多双关语和盛气凌人的学究气；他的性格完全像学校里的舍监。有时他因之受到猛烈的反驳，便哑口无言，装假死。他颇有些小聪明，同时也是鄙俗的侏儒，忽而目中无人，忽而卑鄙无耻，看情形而定。他卑躬屈膝的谄媚那般“亲爱的大师”，因为他们有地位，或是因为他们享有国家的荣誉：

(他认为估量一个音乐家的价值,这是最可靠的方法。)其余的人,他都用鄙夷不屑的态度对付;至于那些饿肚子的,他就尽量利用。——他为人的确不傻。

虽然有了权威有了声名,他心里明白自己对于音乐究竟是一无所知,也明白克利斯朵夫的确很高明。他自然不愿意说出来,可是少不得有点儿敬畏。——此刻他听着克利斯朵夫弹琴,努力想了解,专心一意,好像很深刻,没有一点杂念;但在这片云雾似的音符中完全摸不着头脑,只顾装着内家的模样颠头耸脑,看那个没法安静的高恩挤眉弄眼的意义,来决定自己称许的表情。

终于克利斯朵夫的意识慢慢从酒意和音乐中间浮起来,迷迷糊糊的觉得背后有人指手划脚,便转过身来,看见了两位鉴赏家。他们俩立刻扑过来,抓着他的手使劲的摇,——西尔伐尖声的说他弹得出神入化,古耶一本正经的扮着学者面孔说他的左手像罗宾斯丹,右手像巴特洛夫斯基,——(或者是右手像罗宾斯丹,左手像巴特洛夫斯基。)——两人又一致同意的说,这样一个天才决不该被埋没;他们自告奋勇要教人知道他的价值,可是心里都打算尽量利用他来替自己博取荣誉和利益。

第二天,高恩请克利斯朵夫到他家里去,挺殷勤的把自己一无所用的一架很好的钢琴给他使用。克利斯朵夫因为胸中郁积着许多音乐,烦闷之极,便老老实实接受了。

最初几天,一切都很好。克利斯朵夫能有弹琴的机会快活极了;高恩也相当知趣,让他安安静静的自得其乐。他自己也的确领略到一种乐趣。这是一种奇怪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观察到的现象:他既非音乐家,亦非艺术家,而且是个最枯索,最无诗意,没有什么深刻的感情的人,却对于这些自己莫名其妙的音乐感到浓厚的兴趣,觉得其中有股迷人的力量。不幸他没法静默。克利斯朵夫弹琴的时候,他非高声说话不可。他像音乐会里冒充风雅的听众一样,用种种浮夸的辞句来加按语,或是胡说八道的批评一阵。于是克利斯朵夫愤愤的敲着钢琴,说这样他是弹不下去的。高恩勉强教自己不要作声,但那竟不由他作主:一忽儿他又嘻笑,呻吟,吹嘘,拍手,哼着,唱着,摹仿各种乐器的音响。等到一曲终了,要不把他荒唐的见解告诉给克利斯朵夫听,他会胀破肚子的。

他那个人是个古怪的混合品:有日耳曼式的多情,有巴黎人的轻薄,也有他喜欢自吹自捧的天性。他一忽儿酸溜溜的下些断语,一忽儿不伦不类来一个比较,一忽儿说出粗野的,淫猥的,不健全的,荒谬绝伦的废话。在颂赞贝多芬的时候,他竟看到作品中有猥褻的成分,有淫荡的肉感。明明是忧郁的思想,他以为有浮华的辞藻。《升C小调四重奏》,对于他是英武而可爱的作品。《第九交响乐》中那章崇高伟大的Adagio,使他想起羞人答答的希吕彭。听到《第五交响乐》最初的三个音符,他就喊:“不能进去!里面有人!”他非常叹赏埃尔邓兰尔彭的《战争》,因为他在其中认出有汽车的呼噜声。他会到处找出这些幼稚而不雅的形象来形容乐曲,教人奇怪他怎么

安东·罗宾斯丹为十九世纪俄国大钢琴家兼作曲家,巴特洛夫斯基为近代波兰钢琴家兼作曲家,政治家。

以上各曲均贝多芬作品。《升C小调四重奏》为一首痛苦的诗歌。《第九交响乐》的第三章Adagio,富于恬淡隐忍,虔敬和平的情调。关于《第五交响乐》(俗称《命运交响乐》)开始第一句的sol-sol-sol-mi,贝多芬曾言:“命运就是这样的来敲门的”,故高恩有此戏谑语。所谓三音符即指sol-sol-sol三字。

会爱好音乐。然而他的确爱好；对于某些段落，他用最荒唐最可笑的方式去领会，同时也真的会流眼泪。但他刚受了华葛耐的某一幕歌剧的感动，会立刻在钢琴上弹一段奥芬白赫摹仿奔马的音乐；或是在《欢乐颂歌》之后马上哼一节咖啡店音乐会中的滥调。那可使克利斯朵夫气得直嚷了。——但最糟的还不是在高恩这样胡闹的时候，而是当他要说些深刻的微妙的话向克利斯朵夫炫耀的时候，以哈密尔顿而非西尔伐·高恩的面目出现的时候。在那种情形之下，克利斯朵夫便对他怒目而视，用冷酷的挖苦的话伤害哈密尔顿：钢琴夜会往往闹得不欢而散。可是第二天，高恩已经忘了；克利斯朵夫也后悔自己不该那么粗暴而仍旧回来。

这些都还没有关系，只要高恩不约朋友来听克利斯朵夫弹琴。但他需要拿他的音乐家向人卖弄，所以邀了三个小犹太人和他自己的情妇，——一个浑身都是脂肪的女人，其蠢无比，老说些无聊的双关语，谈着她所吃的东西，自以为是音乐家，因为她每天晚上在多艺剧院的歌舞中展览她的大腿。克利斯朵夫第一次发见了这些人物，脸色都变了。第二次，他直截了当告诉高恩，说不再到他家里弹琴了。高恩赌咒发誓的说，以后决不再邀请任何人。但他暗中照旧继续，把客人藏在隔壁屋里。自然，克利斯朵夫结果也发觉了，气愤愤的掉头便走，这一次可真的不回来了。虽然如此，他还是得敷衍高恩，因为他带他上各国侨民的家里，为他介绍学生。

另一方面，丹沃斐·古耶过了几天也上克利斯朵夫的小客店去访问他。古耶看见他住得那么坏，一点不表惊异，倒很亲热的说：

“我想，请你听音乐你一定觉得高兴吧；我到处都有入场券，可以带你一起去。”

克利斯朵夫快活极了。他觉得对方非常体贴，便真心的道谢。那天古耶完全变了一个人，和他第一晚见到的大不相同。跟克利斯朵夫单独相对的时候，他一点没有傲慢的态度，脾气挺好，怯生生的，一心想学些东西。唯有当着别人，他才会立刻恢复那种居高临下的神气与粗暴的口吻。此外，他的求知欲也老是有个实际的目的。凡是与现下的时尚无关的东西，他一概不发生兴趣。眼前，他想把最近收到而无法判断的一本乐谱征求克利斯朵夫的意见：因为他简直不大能读谱。

他们一同到一个交响乐会去。会场的大门是跟一家歌舞厅公用的。从一条蜿蜒曲折的甬道走到一间没有第二出口的大厅：空气恶浊，闷人欲死；太窄的座椅密密的挤在一起；一部分听众站着，把走道都壅塞了；——法国人是不讲究舒服的！一个似乎烦恼不堪的男人，在那里匆匆忙忙的指挥着贝多芬的一支交响乐，仿佛急于奏完的神气。隔壁歌舞厅里的音乐和《英雄交响乐》中的《葬礼进行曲》混在一块儿。听众老是陆陆续续的进来，坐下，擎着手眼镜东张西望，有的才安顿好，已经预备动身了。克利斯朵夫在这个赶节一样的地方聚精会神的留意乐曲的线索，费了好大的劲终于得到一点儿快感；——（因为乐队是很熟练的，而克利斯朵夫也久已没听到交响乐；）——不料听了一半，古耶抓着他的手臂说：“咱们得走了，到另外一个音乐会去。”

克利斯朵夫皱了皱眉头，一声不出的跟着他的向导。他们穿过半个巴黎

十九世纪的奥芬白赫（原籍德国，后入法国籍）以所作喜歌剧红极一时，实则仅为第二三流作家。《欢乐颂》系指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中最后一章合唱，歌辞为德国诗人席勒原作。

城，到一间气味像马房似的大厅；在别的时间，这儿是上演什么神幻剧或通俗戏剧的：——音乐在巴黎像两个穷苦的工人合租一间房：一个从床上起来，一个就钻进他的热被窝，——空气当然谈不到：从路易十四起，法国人就认为这种空气不卫生；但戏院里的卫生和从前凡尔赛宫里的一样。是教人绝对喘不过气来的那种卫生。一个庄严的老人，像马戏班里驯服野兽的骑师一般，正在指挥华葛耐乐剧中的一幕：可怜的野兽——歌唱家——也仿佛马戏班里的狮子，对着脚灯楞住了，直要挨了鞭子才会记起自己原来是狮子。一般假作正经的胖妇人和痴騃的小姑娘，堆着微笑看着这种表演。等到狮子把戏做完，乐队指挥行过了礼，两人都被大众拍过了手，古耶又要把克利斯朵夫带到第三个音乐会去。但这一回克利斯朵夫双手抓住了座椅的靠手，声明再也不走了：从这个音乐会跑到那个音乐会，这儿听几句交响乐，那儿听一段协奏曲，他已经够受了。古耶白白的跟他解释，说音乐批评在巴黎是一种行业，并且是看比听更重要的行业。克利斯朵夫抗议说，音乐不是给你坐在马车上听的，而是需要凝神壹志的去领会的。这种炒什锦似的音乐会使他心里作恶，他每次只要听一个就够了。

他对于这种音乐方面的漫无节制觉得很奇怪。像多数的德国人一样，他以为音乐在法国占着很少的地位；所以他意想中以为能听到分量少而质地很精的东西。不料一开场，七天之内人家就给他十五个音乐会。一星期中每个晚上都有，往往同时有两三个，在不同的区域里举行。星期日一天共有四个，也是在同一时间内。克利斯朵夫对于这等其大无比的音乐胃口不胜钦佩。节目的繁重也使他吃惊。他一向以为只有德国人听音乐才有这等海量，那是他从前在国内痛恨的；此刻却发现巴黎人的肚子还远过于德国人。席面真是太丰盛了：两支交响乐，一支协奏曲，一支或二支序曲，一幕抒情剧。而且来源不一：有德国的，有俄国的，有斯干地那维国家的，有法国的；仿佛不管是啤酒，是香槟，是糖麦水，是葡萄酒，——他们能一齐灌下，决不会醉。巴黎那些小鸟儿的胃口竟这么大，克利斯朵夫简直看呆了。他们却若无其事，好比无底的酒桶，尽管倒进许多东西，实际上可点滴不留。

不久，克利斯朵夫又发觉这些大量的音乐其实内容只有一点儿。在所有的音乐会中他都看到同样的作家，听到同样的曲子。丰富的节目老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贝多芬以前的差不多绝无仅有，华葛耐以后的也差不多绝无仅有。便是在贝多芬与华葛耐之间，又有多少的空白！似乎音乐就只限于几个著名的作家。德国五六名，法国三四名，自从法俄联盟以来又加上半打莫斯科的曲子。——古代的法国作家，毫无。意大利名家，毫无。十七十八世纪的德国巨头，毫无。现代的德国音乐，也毫无，只除掉理查·史脱洛斯一个，因为他比别人乖巧，每年必定到巴黎来亲自指挥一次，拿出他的新作品。至于比国音乐，捷克音乐，更绝对没有了。但最可怪的是：连当代的法国音乐也绝无仅有。——然而大家都用着神秘的口吻谈着法国的现代音乐，仿佛是震动世界的东西。克利斯朵夫只希望有机会听一听；他毫无成见，抱着极大的好奇心，非常热烈的想认识新音乐，瞻仰一下天才的杰作。但他虽然费尽心思，始终没听到；因为单是那三四支小曲，写得相当细腻而过于冷静过于雕琢的东西，并没引起他的注意，他也不承认它们便是现代的法国音乐。

至第一次大战为止，巴黎交响乐音乐会的场子均极可怜。巴特罗乐队租用冬季马戏场，拉摩乐乐队租用水塔戏院及天野大道旁的夏令马戏场。

克利斯朵夫在自己不能表示意见之前，先向音乐批评界去讨教一下。

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批评界里谁都有主张，谁都有理由。不但各个音乐刊物都以互相抵触为荣，便是一个刊物的文字也篇篇矛盾。要是把它们全部看过来的话，你准会头脑发昏。幸而每个编辑只读他自己的文章，而群众是一篇都不读的。但克利斯朵夫一心要对法国音乐界有个准确的概念，便一篇都不肯放过；结果他不禁大为佩服这个民族的镇静功夫，处在这样的矛盾中间还能像鱼在水里一样的悠然自得。

在这纷歧的舆论中，有一点使他非常惊奇：就是批评家们的那副学者面孔。谁说法国人是什么都不信的可爱的幻想家呢？克利斯朵夫所见到的，比莱茵彼岸所有的批评家的音乐知识都更丰富，——即使他们一无所知的时候也显得如此。

当时的法国音乐批评家都决意要学音乐了。有几个也是真懂的：那全是一些怪物；他们居然花了番心血对他们的艺术加以思考，并且用自己的心思去思考。不必说，这般人都不大知名，只能隐在几个小杂志里，除了一二个例外是踏不进报馆的。他们诚实，聪明，挺有意思，因为生活孤独而有时不免发些怪论，冥思默想的习惯使他们在批评的时候不大容忍，倾向于唠叨。——至于其他的人，都匆匆忙忙学了些初步的和声学，就对自己新近得来的知识惊奇不置，跟姚尔邓先生学着文法规则的时候一样高兴得出神：

“D, a, Da, F, a, Fa, R, a, Ra……啊，妙极了！……啊！知道一些东西多有意思……”

他们嘴里只讲着主旋律与副旋律，调和音与合成音，九度音程的连系与大三度音程的连续。他们说出了某页乐谱上一组和音的名称，就忙着得意洋洋的抹着额上的汗：自以为把整个作品说明了，几乎以为那曲子是自己作的了。其实他们只像中学生分析西赛罗的文法一般，背一遍课本上的名词罢了。但是最优秀的批评家也不大能把音乐看做心灵的天然的语言；他们不是把它看作绘画的分支，就是把它变成科学的附庸，仅仅是一些拼凑和声的习题。像这样渊博的人物自然要追溯到古代的作品。于是他们挑出贝多芬的错误，教训华葛耐，至于裴辽士和葛吕克，更是他们公然讪笑的对象。依照当时的风气，他们认为除了赛白斯蒂安·罢哈与特皮西之外，什么都不存在。而近年来被大家乱捧的罢哈，也开始显得迂腐，老朽，古怪。漂亮人物正用着神秘的口吻称扬拉摩和哥波冷了。

这些学者之间还要掀起壮烈的争辩。他们都是音乐家，但所以为音乐家的方式各各不同；各人以为唯有自己的方式才对，别人的都是错的。他们互诋为假文人，假学者；互相把理想主义与唯物主义，象征主义与自然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加在对方头上。克利斯朵夫心里想，从德国跑到这儿来再听一次德国人的争辩，岂不冤枉。照理，他们应该为了美妙的音乐使大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去享受而表示感激，可是他们非但没有这种情绪，还不允许别人用一种和他们不同的方式去享受。当时的音乐界正为了一场新

莫利哀的喜剧《冒充贵族》写一个鄙俗的市侩姚尔邓想做贵族，请了音乐教师，舞蹈教师，哲学教师来教育自己。此处所引系第二幕第四场姚尔邓与哲学教师的对白的节略。

西赛罗为纪元前一世纪罗马帝国时代的大演说家，大文豪。其选集为今法国中学生读拉丁文时必修之书。

拉摩（1683—1764）与哥波冷（1668—1732）均为法国大作曲家，但其真正的价值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方始被人赏识。近代法国音乐家如特皮西，如拉凡尔，均尊奉前二人为法国音乐的创始者。

的争执而分成两大阵营，厮杀得非常猛烈：一派是对位派，一派是和声派。一派说音乐是应当横读的，另外一派说是应当直读的。直读派口口声声只谈着韵味深长的和弦，溶成一片的连锁，温馨美妙的和声：他们谈论音乐，仿佛谈论一个糕饼铺。横读派却不答应人家重视耳朵：他们认为音乐是一篇演说，像议院的开会，所有发言的人都得同时说话，各人只说各人的，决不理会旁人，直到自己说完为止；别人听不见是他们活该！他们尽可在明天的公报上去细读：音乐是给人读的，不是听的。克利斯朵夫第一次听见横读派与直读派的争议，以为他们都是疯子。人家要他在连续派与交错派两者之间决定态度，他就照例用箴言式的说话回答：

“ 诸位，此党彼党，我都仇视！ ”

但人家紧自问个不休：“ 和声跟对位，在音乐上究竟哪一样更重要？ ”

“ 音乐最重要。把你们的音乐拿出来给我看看！ ”

提到他们的音乐，他们的意见可一致了。这些勇猛的战士，在好斗那一点上互相争胜的家伙，只要眼前没有什么盛名享得太久的古人给他们攻击，都能为了一种共同的热情——爱国的情——而携手。他们认为法国是个伟大的音乐民族。他们用种种的说辞宣告德国的没落。——对于这一点，克利斯朵夫并不生气。他自己早就把祖国批驳得不成样子，所以平心而论，他不能对这个断语有何异议。但法国音乐的优越未免使他有些奇怪：老实说，他在历史上看不出法国音乐有多少成绩。然而法国音乐家一口咬定，他们的艺术在古代是非常美妙的。为了阐扬法国音乐的光荣，他们先把上一世纪的法国名人恣意取笑，只把一个极好极纯朴的大师除外，而他还是个比国人。做过了这番扫荡工作，大家更容易赞赏古代的大师了：他们都是被人遗忘的，有的是始终不知名而到今日才被发掘出来的。在政治上反对教会的一派，认为什么都应当拿大革命时代做出发点；音乐家却跟他们相反，以为大革命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山脉，应当爬上去观察山后的音乐上的黄金时代。长时期的消沉过后，黄金时代又要来了：坚固的城墙快崩陷了；一个音响的魔术师正变出一个百花怒放的春天；古老的音乐树上已经长出新枝嫩叶；在和声的花坛里，奇花异卉眯着笑眼望着新生的黎明；人们已经听到琤琮的泉声，溪水的歌唱……那境界简直是一首牧歌。

克利斯朵夫听了这些话，欢喜极了。但他注意一下巴黎各戏院的广告的时候，只看到曼依贝，古诺，和玛斯奈的名字，甚至还有他只嫌太熟的玛斯加尼和雷翁加伐罗。他便问他的那般朋友，所谓迷人的花园是否就是指这种无耻的音乐，这些使妇女们失魂落魄的东西，这些纸花，这些香粉铺。他们却大为生气的嚷起来，说那是颓废时代的余孽，谁也不加注意的了。——可

连续派与交错派即横读派与直读派，亦即对位派与和声派。

十四十五两世纪文艺复兴时代，法—比学派在音乐史上极占重要，十六世纪的法国音乐尤其盛极一时。但这种情形直至二十世纪初年方被学者逐渐发见，向世人披露。

此系指赛查·法朗克，生于比国而久居巴黎，终入法国籍，为十九世纪最大作曲家之一，对近代法国音乐之再生运动极有影响。

曼依贝（1791—1864）为德国歌剧作家，生前在欧洲红极一时，今日音乐史上的定论则仅是一个庸俗肤浅的作家。下文提到的《乌格诺》即曼氏作品。古诺（1818—1893）对法国近代歌剧的创立极有贡献，但并非第一流的作曲家，最著名的作品即下文提到的《浮士德》。玛斯奈（1842—1912）为法国歌剧作家，其作品偏于甜俗，做作，缺乏真情实感。玛斯加尼（1863—1945）与雷翁加伐罗（1858—1919）均意大利

是实际上乡村骑士正高踞着喜歌剧院的宝座，《巴耶斯》在歌剧院中雄视一切；玛斯奈和古诺的作品风靡一时：《弥依》，《乌格诺》，《浮士德》这三位一体的歌剧都声势浩大，超过了一千场的纪录。——但这都是无关紧要的例外，用不着去管它。一种理论要是遇到不客气的现实给它碰了钉子，最简单的就是否认现实。所以法国批评家们否认那些无耻的作品，否认那般捧这些作品的群众；并且用不着别人怎么鼓动，他们也快要把乐剧整个儿的抹煞了。在他们心目中，乐剧是一种文学作品，所以是不纯粹的。（他们自己都是文人，却偏不承认是文人。）一切有所表现，有描写，有所暗示的音乐，总之，一切想说点儿什么的音乐都被加上一个不纯粹的罪名。——可见每个法国人都有劳白斯比哀的气质，不论对什么东西对什么人，非戕贼其生命，就不能使这个人或物净化。——法国的大批评家只承认纯粹音乐，其余的都是下劣的东西。

克利斯朵夫发现自己的趣味不高明，很是惭愧。但看到那些瞧不起乐剧的音乐家没有一个不替戏院制作，没有一个不写歌剧，他又感到一点儿安慰。——当然，这种事实仍不过是无关紧要的例外。既然他们提倡纯粹音乐，所以要批评他们是应当把他们的纯粹音乐做根据的。克利斯朵夫便访求他们这一类的作品。

丹沃斐·古耶把他带到一个宣扬本国艺术的团体中去听了几次音乐会。一般新兴的名家都在这儿经过长时期的锻炼与孵育的。那是一个很大的艺术集团，也可以说是有好几个祭堂的小寺院。每个祭堂有它的祖师，每个祖师有他的信徒，而各个祭堂的信徒又互相菲薄。在克利斯朵夫看来，那些祖师根本就没有多大分别。因为一向弄惯了完全不同的艺术，所以他完全不了解这种新派音乐，而他的自以为了解使他反而更不了解。

他觉得所有的作品永远浸在半明半暗的黑影里，好像一幅灰灰的单色画，线条忽隐忽现，飘忽无定。在这些线条中间，有的是僵硬，板滞，枯索无味的素描，像用三角板画成的，结果都成为尖锐的角度，好比一个瘦妇人的肘子。也有些波浪式的素描，像雪茄的烟圈一般袅袅回旋。但一切都是灰色的。难道法国没有太阳了吗？克利斯朵夫因为来到巴黎以后只看见雨跟雾，不禁要信以为真了；但要是没有太阳，艺术家的使命不就是创造太阳吗？不错，他们的确点着他们的小灯，但只像萤火一般，既不会令人感到暖意，也照不见什么。作品的题目是常常变换的：什么春天，中午，爱情，生之欢乐，田野漫步等等；可是音乐本身并没跟着题目而变，只是一味的温和，苍白、麻木，贫血，憔悴。那时音乐界中一般典雅的人，讲究低声说话。而那也是对：因为声音一提高，就跟叫嚷没有分别：高声与低声之间没有中庸之道。要选择只有低吟浅唱与大声呐喊两种。

歌剧作家，即前文所称自然主义之代表人物，以描写人生的强烈而迅速的印象为主，作品光华灿烂而流于浅薄。玛斯加尼最流行之作品为《乡村骑士》，雷翁加伐罗的为《巴耶斯》。

此处系隐射法国的民族音乐协会（Société Nationale de Musique），于一八七一年由国立音乐院教授皮西纳与圣·桑斯发起，目的为专门演奏当代法国作家的音乐，以培养法国新兴音乐为主。参加的有法朗克，玛斯奈，福莱，杜巴克，拉罗，杜蒲阿等。尔后无形中分成若干小组，各奉一知名作家为领袖，最重要的即法朗克一派与圣·桑斯一派的对立。故本文中称有好几个祭堂的寺院。但事实上，在一八七一至一九一三年的三十年中所有法国近代音乐的名作都是由这个团体首先演奏，公诸于世的。故该会可称为现代法国乐坛的温床。

克利斯朵夫快要昏昏入睡了，硬打起精神来看节目；他感到奇怪的是，这些在灰色的天空飘浮的云雾，居然自命为表现确切的题材。因为，跟他们的理论相反，他们所作的纯粹音乐差不多全是标题音乐，至少都是有个题目的。他们徒然诅咒文学，结果还得拿文学做拐杖。好古怪的拐杖！克利斯朵夫发觉他们勉强描写的尽是一些幼稚可笑的题材，又是果园，又是菜园，又是鸡埘，真可说是音乐的万牲园与植物园。有的把卢佛宫的油画或歌剧院的壁画作成交响乐或钢琴曲，把荷兰十七世纪的风景画家，动物画家，法国歌剧院的装饰画家的作品，取为音乐的题目，加上许多注释，说明哪是神话中某个神明的苹果，哪是荷兰的乡村客店，哪是白马的臀部。在克利斯朵夫看来，这是一些老小孩的玩艺：喜欢画而又不会画，便信手乱涂一阵，挺天真的在下面用大字写明，这是一所屋子，那是一株树。

除了这批有眼无珠，以耳代目的画匠以外，还有些哲学家在音乐上讨论玄学问题。他们的交响曲是抽象的原则的斗争，是说明某种象征或某种宗教的论文。他们也在歌剧中间研究当时的法律问题与社会问题，什么女权与公民权等等。至于离婚问题，确认亲父问题，政教分离问题，他们都津津乐道。他们之间分成两派：就是反对教会的象征派和拥护教会的象征派。收旧布的哲学家，做女工的社会学家，预言家式的面包师，使徒式的渔夫，都在剧中直着嗓子唱歌。从前歌德已经说起他那时的艺术家想“在故事画中表现康德的思想”。克利斯朵夫这时代的作家却是用十六分音符来表现社会学了。左拉，尼采，梅特林克，巴莱斯，姚莱斯，芒台斯，《福音书》，红磨坊等等，无一不是歌剧和交响乐的作者汲取思想的宝库。其中不少人士，看着华葛耐的榜样兴奋起来，大声嚷着：“我吗，我也是诗人呀！”——于是他们很有自信的在自己的乐谱上写起或是有韵或是无韵的东西来，那风格不是跟小学生的一样，就像那些颓废派的日报副刊。

所有这些思想家和诗人都是纯粹音乐的拥护者。但他们对这种音乐更喜欢议论而不喜欢制作。——偶然他们也写一些，但完全是空洞的东西。不幸，他们居然常常成功：内容却一无所有，——至少克利斯朵夫认为如此。——的确他也不得其门而入。

要懂得一种异国的音乐，先得学习它的语言，并且不该自以为已经知道这个语言。克利斯朵夫可是像一切头脑单纯的德国人一样，自以为早就知道了。当然他是可以原谅的。便是法国人也有许多不比他更了解。正如路易十四时代的德国人，因为竭力说法文而忘掉了本国的语言，十九世纪的法国音乐家也久已忘了自己的语言。以致他们的音乐竟变成了一种外国方言。

直到最近，才有一种在法国讲法国话的运动。他们并不都能够成功：习惯的力量太强了；除了少数的例外，他们说的法文是比国化的或是日耳曼化的。那就难怪一个德国人要误会了，难怪他要凭着武断的脾气，以为这仅仅是不纯粹的德文，而且因为他全然不懂而认为毫无意义。

克利斯朵夫的看法便是这样。他觉得法国的交响乐是一种抽象的辩证

巴莱斯（1862—1923）为法国大小说家，提倡以自我分析的方式认识人与土地，自然，及国家社会的关系。姚莱斯（1859—1914）为法国社会党领袖，《人道报》的创办人。芒台斯（1841—1909），为法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

红磨坊为巴黎有名的舞场，创立于一八八九年；一九一五年后改为杂耍歌舞场（music-hall）。

此系指当时的法国音乐不是受法朗克的影响，便是受华葛耐的影响。

法，用演算数学的方式把许多音乐主题对立起来，或是交错起来；其实，要表现这一套，很可以用数字或字母来代替。有的人把一件作品建筑在某个音乐的公式之上，使它慢慢的发展，直到最后一部分的最后一页才显得完全，而作品十分之九的部分都像不成形的幼虫。有的人用一个主题作变奏曲，而这主题只在作品末了，由繁复渐渐归于简单的时候才显出来。这是极尽高深巧妙的玩艺儿，唯有又老又幼稚的人才会感到兴趣。作者为此所费的精力是惊人的，一支幻想曲要多少年才能写成。他们绞尽脑汁，求新的和弦的配合，——为的是表现……表现什么呢？管它！只要是新的辞藻就行了。人家说既然器官能产生需要，那末辞藻也会产生思想的：最要紧的是新。无论如何要新！他们最怕“已经说过的”辞句。所以最优秀的人也为之而变成瘫痪了。你可以感到他们老是在留神自己，准备把所写的统统毁掉，时时刻刻问着自己：“啊！天哪！这个我在哪儿见过的呢？”……有些音乐家，——特别在德国，——喜欢把别人的句子东拣西拾的拼凑起来。法国音乐家却是逐句检查，看看在别人已经用过的旋律表内有没有同样的句子，仿佛拚命搔着鼻子，想使它变形，直要变到不但不像任何熟人的鼻子，而且根本不像鼻子的时候方始罢休。

这样的惨淡经营仍瞒不了克利斯朵夫。他们徒然运用一种复杂的语言，装出奇奇怪怪的姿态兴奋若狂，把乐队部分的音乐弄得动乱失常，或是堆砌一些不连贯的和声，单调得可怕，或是萨拉·裴娜式的说白，唱得走音的，几小时的嘞嘞不已，好似骡子迷迷忽忽的走在险陡的坡边上。——克利斯朵夫在这些面具之下，认出一些冰冷的毫无风韵的灵魂，搽脂抹粉，涂了一脸，学着古诺与玛斯奈的腔派，还不及他们自然。于是他不禁引用当年葛吕克批评法国人的一句不公平的话：

“由他们去罢。他们弄来弄去逃不出那套老调。”

可是他们把那套老调弄得非常艰深。他们拿民歌作为道貌岸然的交响乐的主题，像做什么博士论文一样。这是当代最时髦的玩艺。所有的民歌，不论是本国的是外国的，都依次加以运用。他们可以用来作成《第九交响乐》或是法郎克的《四重奏》，但还要艰深得多。要是其中有一小句意思非常显明的话，作者便赶紧插入一句毫无意义的，把上一句毫不留情的破坏掉。——然而大家还把这些可怜虫认为极镇静，精神极平衡的人呢！……

演奏这类作品的时候，一个年轻的乐队指挥，仪表端庄而态度狰狞的家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着跟弥盖朗琪罗画上的人物一样的姿势，仿佛要鼓动贝多芬或华葛耐的队伍似的。听众是一般厌烦得要死的时髦人物，以为尝尝这种烦闷的滋味是有面子的事；还有是年轻的学徒，因为能够把学校里的一套在此引证一番，在某些段落中去找点儿本行的诀窍而很高兴，情绪之热烈不亚于指挥的姿势和音乐的喧闹……

“喝！那不是痴人说梦吗……！”克利斯朵夫说。

（因为他此刻已经会用巴黎人的俗语了。）

然而懂得巴黎的俗语究竟比懂巴黎的音乐容易。克利斯朵夫无处不用他的热情，又跟一般的德国人一样，天生的不了解法国艺术：他的判断就是以这种热情与不了解做根据的。但他至少是善意的，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只要人家给他指出来。所以他并不肯定自己的见解，预备让新的印象来改变

萨拉·裴娜（1844—1923）为法国近代最伟大的女演员。

他的意见。

便是目前，他也承认这种音乐极有才气，有很好的材料，节奏与和声方面有奇特的发现，好似各种各样美妙的布帛，柔软，光亮，五光十色，竭尽巧思。克利斯朵夫觉得很好玩，便尽量采取它的长处。所有这些小名家都比德国音乐家头脑开通得多；他们很勇敢的离开大路，扑到森森中去摸索，想教自己迷失。但他们都是挺乖的小孩子，怎么样也不会迷路。有的走了一二十步，又绕到大路上来了。有的才走了一忽儿就累了，不管什么地方就停下来。有的差不多快摸到新路了，可并不继续前进，而坐在林边，在树下闲逛了。他们所最缺少的意志，是力；一切的天赋他们都齐备，——只少一样：就是强烈的生命。尤其可惜的是他们那些努力仿佛是乱用的，在半路上消耗掉了。这些艺术家难得会清清楚楚的意识到自己的天性，难得会锲而不舍的把他们所有的精力配合起来去达到预定的目标。这是法国人胸无定见的最普通的后果：多少的天才和意志都因为游移不定与自相矛盾而浪费了。他们的大音乐家如裴辽士，如圣·桑斯，——只以最近代的来说，——能够不至于因缺少毅力，缺少信心，缺少精神上的指南针而陷落而颠覆的，几乎一个都没有。

克利斯朵夫跟当时的德国人一样存着鄙薄的心，想道：

“法国人只知道浪费精力去求新发明，而不会利用他们的新发明。他们始终需要一个异族的主宰，要一个葛吕克或是一个拿破仑，才能使他们的大革命有点儿结果。”

他想到要是再来一次拿破仑式的政变，该是怎么一个局面，不禁微微的笑了。

但在混乱状态中，有一个团体竭力想替艺术家把秩序与纪律恢复过来。一开始它取了个拉丁名字，纪念一千四百年以前，高卢人与万达人南侵时代盛极一时的一种教会组织。克利斯朵夫奇怪为什么要追溯到这样久远。一个人能够高瞻远瞩，不囿于所生的时代，固然很好；但一座十四个世纪的高塔难免不成为一座不大方便的瞭望台，宜于仰观星象而不宜于俯视当代的人群的。可是克利斯朵夫不久就放心了，因为他看见那般圣·葛莱哥阿的子孙，难得留在高塔上，只在鸣钟击鼓的时候才攀登。其余的时间，他们都在底下的教堂里。克利斯朵夫参与过几次他们的祭礼，先还以为他们属于新教的某个小宗派，后来才发觉他们是基督旧教中人。在场的都是些匍匐膜拜的群众，虔诚的，偏执的，喜欢攻击人的信徒。为首的是个极纯粹极冷静的人，性情

葛吕克（1714—1784）为德国大音乐家，居留法国甚久，在近代歌剧史上为极重要的复兴运动者，对十八世纪的法国歌剧影响极大，俨然为一时重镇。拿破仑出生地为地中海上的高斯岛，岛民原非法国种族。故作者指其与葛吕克同为“异族的主宰”。

此系指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十日之政变。从此拿破仑登台为三执政之一，而以后称帝之基业亦于此奠定。

一八九六年，法兰克的大弟子鲍台斯与文桑·但第在巴黎创办一音乐学院，以拉丁文取名为 Schola Cantorum（意义为宗教音乐歌唱学校），以纪念六世纪时教会歌唱组织。但此歌唱学校不久即教授乐理，音乐史，一切器乐，与一般音乐院无异。法国近代名家十之七八均出身于该校。

初期的基督教圣诗歌唱，调式（mode）驳杂不一，经六世纪时教皇葛莱哥阿一世整理统一，至今于基督旧教某些宗派（例如本多派）的寺院中歌唱，称为《素歌》（plainchant）。文桑·但第辈认为制作宗教音乐必须以《素歌》的精神为基础。故此处称此派的人为“圣·葛莱哥阿的子孙”。

固执而带几分雅气，在那里维护宗教、道德，艺术方面的主义，向少数选民用抽象的词句解释他那部音乐的福音书，谴责“骄傲”与“异端邪说”。他把艺术上所有的缺隐，和人类所有的罪恶都归咎于上面两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今日的犹太教，他都等量齐观，认为是骄傲与异端的表现。音乐界中的犹太人都被执行了火刑。巨人亨特尔也受到了鞭挞。唯有赛白斯蒂安·罢哈一个人，靠了上帝的面子，被认为“误入歧途的新教徒”而获免。

这座圣·雅各街的庙堂做着布道事业，有心拯救人类的灵魂与音乐。他们很有系统的传授天才的法则。许多勤奋的学生辛辛苦苦的，深信不疑的拿这些秘诀来付诸实行。他们似乎想用虔诚的艰苦来补赎祖先们轻佻的罪过：例如奥贝与阿唐之流，还有那人也风魔，音乐也风魔的裴辽士。现在人们抱着了不起的热情和虔敬，为一般众所公认的大师努力宣扬。十几年中间，他们的成就确是可观；法国音乐的面目居然为之一变。不但是法国的批评家，并且连法国的音乐家也学起音乐来了。从作曲家到演奏家如今都知道罢哈的作品了！——他们尤其努力破除法国人闭关自守的积习。法国人平日老躲在家里，轻意不肯出门；所以他们的音乐也缺少新鲜空气，有股闭塞的，陈腐的，残废的气息。这和贝多芬不问晴雨的在田野里跑着，在山坡上爬着，手舞足蹈，骇坏了羊群的那种作曲方式完全相反。巴黎的音乐家决不会像篷城的大熊一般，因为有了灵感而吵吵嚷嚷的惊动邻居。他们制作的时候是在自己的思想上加一个低音调节器的；并且也挂着重重的帷幕，使外面的声音透不进来。

歌唱学校这一派竭力想更换空气；它对“过去”开了几扇窗子。但也仅仅对着“过去”。这是开向庭院而非临着大街的窗子，没有多大用处。何况窗子才打开，百叶窗又关上了，好似怕受凉的老太太。从百叶窗里透进来的有些中世纪的作品，有些罢哈，有些巴莱斯德利那，有些民歌。可是这又算得什么呢？屋子里霉腐的气味依旧不减。其实他们觉得这样倒是挺舒服的，对现代的大潮流反而怀有戒心。固然，他们知道的事情比旁人多。但一笔抹煞的也一样的多。在这种环境里，音乐自然会染上一股迂腐之气，而不是给精神的一种慰藉了；他们的音乐会不是等于历史课，说是含有鼓励作用的举例。凡是前进的思想都做变成学院化。气势雄伟的罢哈被他们供奉到庙堂里去的时候，也变得循规蹈矩了。他的音乐完全被一般学院派的头脑改了样子，正如温馨浓艳的圣经被英国人的头脑改装过了一样。他们所称扬的是一种贵族派的折衷主义，想把六世纪至二十世纪中间的三四个伟大音乐时代的特点汇集起来。这个理想倘若实现的话，那末其成绩一定像一个印度总督旅行回

谓罢哈是“误入歧途的新教徒”一语，是文桑·但第一派的袁特迦·蒂奈说的，言下认为罢哈的精神是旧教徒的精神。

巴黎宗教歌唱学校（简称歌唱学校）校址在拉丁区圣·雅各街。

奥贝（1782—1871）为法国第二流歌剧作家，以浮华的典雅红极一时。阿唐（1803—1856）的歌剧，品质仅次于奥贝。裴辽士（1803—1869）为法国近代最大的交响乐作家，生前死后均不甚得意。其对法国音乐的贡献，直至二十世纪初方渐渐被人发见，本书作者罗曼·罗兰对之尤为称赏，认为世界第一流的音乐天才。

贝多芬的故乡为德国篷城，故称其为“篷城的大熊”。

该校举步的音乐会最初只演奏古代大师巴莱斯德利那，罢哈，蒙德凡第，拉摩，葛吕克等的作品。

英国十七世纪的清教徒，对圣经的了解及其偏执，狭窄，严峻，有如极端派的加尔文主义。

来，把在地球上各处蒐罗得来的宝贝凑成的一座聚宝盆。可是以法国人的通情达理，结果并没闹出学究式的笑柄；大家决不实行他们的理论，而对付理论的办法也只好比莫利哀对付医生一样，拿了药方而并不配服。最有性格的走他们自己的路去了。其余的只做些繁复的练习和艰深的对位学，名之为朔拿大，四重奏，或交响乐……——“朔拿大啊，你要怎么办呢？”——它不要什么，只要成为一阕朔拿大而已。作品中的思想是抽象的，无名的，勉强嵌进去的，毫无生趣的东西。那很像一个高明的公证人起草文书的艺术。克利斯朵夫先是因为法国人不喜欢勃拉姆斯而很高兴，如今却看到法国有着无数的小勃拉姆斯。所有这些出色的工人，既勤谨，又用心，真是具备了各种的德性。克利斯朵夫从他们的音乐会里出来，非常得益，但是非常厌烦。

嘿，外边的天气多好啊！

然而巴黎的音乐家中究竟有几个无党无派的独立的人。唯有这般人才能引起克利斯朵夫的注意。也唯有这般人能使你衡量一种艺术的生机。学派与社团只表现一种浮面的潮流或硬生生制造出来的理论。深思默想的超然人士，却有更多的机会能发见他们当代的与民族的真精神。但就因为这一点，一个外国人对他们比对旁人更难了解。

克利斯朵夫初次听到那个鼎鼎大名的作品的时候，便是这种情形。为了那作品，法国人不知说了多少胡话，有一部分的人说是十个世纪以来最大的音乐革命。——（世纪对他们是不值钱的！他们又不知道什么天高地厚）……

丹沃斐·古耶和西尔伐·高恩把克利斯朵夫带到喜歌剧院去，听《悲莱阿斯与梅丽桑特》，他们把这件作品介绍给他觉得光荣极了，仿佛是他们自己作的，并且告诉克利斯朵夫，说他这一回保证会发见奇迹。歌剧已经开幕了，他们还嘤嘤不休的在旁解释。克利斯朵夫止住了他们的话，伸着耳朵细听。第一幕演完，高恩眉飞色舞的问：

“喂，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他反问他们：“以后是不是老是这样的？”

“是的。”

“那末根本没有什么东西罗。”

高恩可叫起来了，认为他外行。

“没有东西，”克利斯朵夫继续说。“没有音乐，没有发展。前后不相衔接，简直站不住。和声很细腻。配器的效果颇有些很美的花腔，格调很高。但内容是空无所有，空无所有……”

他又听下去。慢慢的，作品露出一点儿光来了；他开始在半明半暗中发见一些东西了。不错，他看到作者存心要求素雅，一反华葛耐那种用音乐的浪潮来淹没戏剧的理想；但他不禁带着点挖苦的心思追问：他们有这种牺牲的理想，骨子里是否把自己没有的东西牺牲。在这件作品里，他感到颇有些贪逸恶劳的意味，想以最低限度的疲劳来获得效果，因为懒惰而不愿意费力去建造华葛耐派的巨制。至于唱辞之单纯，简洁，朴素，声音的微弱，虽然他觉得单调，而且因为他是德国人而认为不真实，但也同样感到惊异。——

（他认为歌辞愈求真切，愈令人感到法国语言的不适宜于谱成音乐，因为它太合逻辑，太分明，轮廓太固定；语言本身固然完美，但没法跟旁的东西融和。）然而这种尝试毕竟是有意思的，在它一反华葛耐派的铺张浮夸这一点

上，克利斯朵夫是赞成的。那位法国音乐家似乎很俏皮的讲究含蓄，要用低声囁语来表白热情。爱既没有欢呼，死也没有哀号。只有旋律的线条微微颤动一下，乐队像嘴唇轻轻一抵似的打个寒噤，你才感觉到在剧中人心里波动的情绪。仿佛作家战战兢兢的怕流露真情。他的艺术的格调真是高极了，——除非法国民族固有的那种取悦感官，喜欢做作的倾向在他胸中突然觉醒的时候。那时你才会发见有些头发太黄的，嘴唇太红的，第三共和以后的小家碧玉所扮演的大情人。但这种情形是难得的，是作者过于克制自己的反响，是需要松动一下的表现；整个作品的风格是一种精炼到极点的单纯，并不单纯的单纯，刻意追求得来的单纯，是古老的社会的一朵精美纤巧的花。年少犷野如克利斯朵夫，当然不能充分欣赏这种境界，他尤其讨厌那剧本，那些诗。他以为看到了一个半老的巴黎女人，装着小孩子，要人讲童话给她听。这当然不是华葛耐派的懒洋洋的角色，不是又肉麻又蠢笨的莱茵姑娘；但一个法兰西与比利时的混血种的懒洋洋的人物，装腔作势的“沙龙”气派，喊着“小爸爸啊”“白鸽啊”那一套给交际场中的太太们应用的神秘气息，也未必高明。巴黎女人却对着这出戏出神了，因为在这面镜子里照见了她们多愁多病，才子佳人的腔派而顾盼自怜。意志两字完全谈不到。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做些什么。

“那可不是我的过失啊！那可不是我的过失啊！……”这些大孩子都这样的呻吟着。整整的五幕——森林，岩穴，地窖，死者的卧室，——都在黯淡的微光中演出，荒岛上的小鸟简直没有挣扎。可怜的小鸟！美丽，细巧……它们多么害怕太强的光明，太剧烈的动作，太剧烈的说话，多么怕热情，怕生命！……生命并不曾精炼过，你不能戴着手套去抓握的……

克利斯朵夫听见隐隐的炮声在响了，快要把这垂死的文明，这一息仅存的小小的希腊轰倒了。

虽然如此，克利斯朵夫对这件作品依旧抱着好感；是不是因为他有点儿又轻视又怜悯的缘故呢？总之，他对它的关切远过于他口头的表示。他走出戏院回答高恩的时候，尽管口口声声说着“很细腻，很细腻，可是缺少奔放的热情，音乐还嫌不够”，心里却绝对不把《悲莱阿斯》和其余的法国音乐一般看待。他被大雾中间的这盏明灯吸住了。他还发见有些别的光亮，很强的，很特别的，在四下里闪耀。这些磷火使他大为错愕，很想近前去瞧瞧是怎么样的光，可是不容易抓握。克利斯朵夫因为不了解而更觉得好奇的那般超然派的音乐家，极难接近。克利斯朵夫所不可或缺的同病，他们完全不需要。除了一二个例外，他们都不看别人的作品，知道得很少，也不想知道。他们几乎全部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由于故意，由于骄傲，由于落落寡合，由于憎厌人世，由于冷淡，而把自己关在小圈子里。这等人虽为数不多，却又分成对立的小组，各不相容。他们的小心眼儿既不能容忍敌人和对手，也不能容忍朋友，——倘使朋友敢赏识另外一个音乐家，或是赏识他们而用了一种或是太冷淡，或是太热烈，或是太庸俗，或是太偏激的方式。要使他们满足真是太难了。结果他们只相信一个得到他们特许的批评家，一心一意坐在偶像的脚下看守着，决不能去碰这种偶像。——他们固然不求别人了解，他们对你自己也不怎么了解。他们受着奉承，被盟友的意见和自己的评价改

即隐指《悲莱阿斯与梅丽桑特》的歌剧作者特皮西。

因戏剧的原作者梅特林克是比国人，音乐的作者特皮西是法国人。

了样，终于对自己的艺术和才具也弄模糊了，一般凭着幻想制作的人自以为是改革家，纤巧病态的艺术家自命为与华葛耐争雄。他们差不多全为了抬高声价而断送了自己；每天都得飞跃狂跳，超过上一天的纪录，同时也要超过敌人的纪录。不幸这些跳高的练习并不每次成功，而且也只对几个同行才有点儿吸引力。他们既不理睬群众，群众也不理睬他们。他们的艺术是没有群众的艺术，只从音乐本身找养料的音乐。但克利斯朵夫的印象，不论这印象是否准确，总觉得法国音乐最需要音乐以外的依傍。这株体态婀娜的蔓藤似的植物简直离不开支柱：第一就离不开文学。它本身没有充分的生命力，呼吸短促，缺少血液，缺少意志，有如弱不禁风的女子需要男性扶持。然而这位拜占庭式的王后，纤瘦，贫血，满头珠翠，被时髦朋友，美学家，批评家，这些宦官包围了。民族不是一个音乐的民族；二十余年来大吹大擂的捧华葛耐，贝多芬，罢哈，特皮西的热情，也仅仅限于一个阶级。越来越多的音乐会，不惜任何代价鼓动起来的、声势浩大的音乐潮流，并不是因为群众的趣味真正发展到了这个程度。这是一种风起云从的时髦，影响只及于一部分优秀人士，而且也把他们搅昏了。真正爱好音乐的人屈指可数，而最注意音乐的人如作曲家批评家，并不就是最爱好的人。在法国，真爱音乐的音乐家太少了！

克利斯朵夫这么想着，可忘了这种情形是到处一样的，真正的音乐家在德国也不见得更多，在艺术上值得重视的并非成千成万毫无了解的人，而是极少数真爱艺术而为之竭忠尽智的孤高虔敬之士。这类人物，他在法国见到没有呢？不论是作曲家或批评家，最优秀的都是远离尘嚣而在静默之中工作的，例如法朗克，例如现代一般最有天分的人；多少艺术家过着没世无闻的生活，让以后的新闻记者争着以最先发见他们，做他们的朋友为荣；还有少数勤奋的学者，毫无野心，不求名利，一点一滴的把法兰西过去的伟大发掘出来；另外一批则是献身于音乐教育，为法兰西未来的光荣奠定基础。其中有多少聪明才智之士，性灵的丰富，胸襟的阔大，兴趣的广博，一定能使克利斯朵夫心向往之，要是认识他们的话。但他无意之间只瞥见了二三个这种人物，而他所了解的，见到的，又是他们被人改头换面的思想。克利斯朵夫只看到作者的缺点，被那些摹仿的人和新闻界的掬客抄袭而夸大的缺点。

克利斯朵夫对那些音乐界的俗物尤其感到恶心的，是他们的形式主义。他们之间只讨论形式一项。情操，性格，生命，都绝口不提！没有一个人想到真正的音乐家是生活在音响的宇宙中的，他的岁月就等于音乐的浪潮。音乐是他呼吸的空气，是他生息的天地。他的心灵本身便是音乐；他所爱，所憎，所苦，所惧，所希望，又无一而非音乐。一颗音乐的心灵爱一个美丽的肉体时，就把那肉体看作音乐。使他着迷的心爱的眼睛，非蓝，非灰，非褐，而是音乐；心灵看到它们，仿佛一个美妙绝伦的和弦。而这种内心的音乐，比之表现出来的音乐不知丰富几千倍，键盘比起心弦来真是差得远了。天才是要用生命力的强度来测量的，艺术这个残缺不全的工具也不过想唤引生命罢了。但法国有多少人想到这一点呢？对这个化学家式的民族，音乐似乎只是配合声音的艺术。它把字母当作书本。克利斯朵夫听说要懂得艺术先得把人的问题丢开，不禁耸耸肩膀。他们却对于这个怪论非常得意：以为非如此不足以证明他们有音乐天分。像古耶这等糊涂蛋也是这样。他从来不懂一个人如何能背出一页乐谱，——（他曾经要克利斯朵夫解释这个神秘，）——如今却向克利斯朵夫解释，说贝多芬伟大的精神和华葛耐刺激感官的境界，

对于音乐并不比一个画家的模特儿对于他所作的肖像画有更大的作用！

“这就证明，”克利斯朵夫不耐烦的回答说，“在你们眼里，一个美丽的肉体并没有艺术价值！一股伟大的热情也没有艺术价值！唉，可怜虫！……你们难道没想象到一张妩媚的脸为一幅肖像画所增加的美，一颗伟大的心灵为一阕音乐所增加的美吗？……可怜虫！……你们只关心技巧是不是？只要一件作品写得好，不必问作品表现些什么，是不是？……可怜虫！……你们仿佛不听演说家的词句，只听他的声音，只莫名其妙的看着他的手势，而认为他说得好极了……可怜的人啊！可怜的人啊！……你们这些糊涂蛋！”

克利斯朵夫所苦恼的不单是某种某种的理论，而是一切的理论。这些清谈，这些废话，口口声声离不开音乐而只会谈音乐的音乐家的谈话，他听厌了。那真会教最优秀的音乐家深恶痛绝。克利斯朵夫跟摩索斯基一样的想法，以为音乐家最好不时丢开他们的对位与和声，去读几本美妙的书，或者去得点儿人生经验。光是音乐对音乐家是不够的：这种方式决不能使他控制时代而避免虚无的吞噬……他需要体验人生！全部的人生！什么都得看，什么都得认识。爱真理，求真理，抓住真理，——真理是美丽的战神之女，阿玛仲纳的女王，亲吻她的人都会给她一口咬住的！

音乐的座谈会已经太多了，制造和弦的铺子也太多了！所有这些像厨子做菜一般制造出来的和声，只能使他看得到些妖魔鬼怪而绝对听不见一种有生命的新的和声。

于是，克利斯朵夫向这批想用蒸馏器孵化出小妖魔来的博士们告别，跳出了法国的音乐圈子，想去访问巴黎的文坛和社会了。

像法国大多数的人一样，克利斯朵夫最初是在日报上面认识当时的法国文学的。他因为急于要熟悉巴黎人的思想，同时补习一下语言，便把人家说是最地道的巴黎型的东西用心细读。第一天，他在骇人的社会新闻里，——叙述和特写一共占了好几长行，——读到一篇报导一个父亲和十五岁的亲生女儿睡觉的新闻：字里行间仿佛认为这种事情是极自然的，甚至还相当动人。第二天，他在同一报纸上读到一件父子纠纷的新闻，十二岁的儿子和父亲同睡一个姑娘。第三天，他读到一桩兄妹相奸的新闻。第四天，他读到姊妹同性爱的新闻。第五天……第五天，他把报纸丢了，和高恩说：

“嘿！这算是哪一门？你们都发疯了吗？”

“这是艺术啊，”高恩笑着回答。

克利斯朵夫耸了耸肩膀：“你这是跟我开玩笑。”

高恩笑倒了，说：“绝对不是。你自己去瞧罢。”

他给克利斯朵夫看一个最近发刊的“艺术与道德”的征文特辑，结论是“爱情使一切都变得圣洁”，“肉欲是艺术的酵母”，“艺术无所谓不道德”，“道德是耶稣会派教育所倡导的一种成见”，“最重要的是强烈的欲望”等等。——还有好些文章，在报纸上证明某部描写开妓院的人的风俗小说是纯洁的。执笔作证的人中颇有些鼎鼎大名的文学家和严正的批评家。一个信仰旧教，提倡伦常的诗人，把一部描绘希腊淫风的作品赞扬备至。那些极有抒

摩索斯基（1839—1889）为创立近代俄国乐派的五大家之一。

阿玛仲纳相传为古希腊时代居于小亚细亚的女性部落，以好战著称。

耶稣会派是基督旧教的一个宗派，由西班牙人雷育拉于十六世纪时创立，以排斥异端，对抗宗教革命为主旨。十七世纪时在法国政治上一度极有势力。

情气息的文章所推重的小说，尽量铺陈各个时代的淫风：罗马的，亚历山大的，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和法兰西文艺复兴时代的，路易十四时代的……简直是部完备的讲义。另外有一组作品以地球上各处的性欲问题为对象：态度认真的作家们，像本多派教士一样耐性的研究着五大洲的艳窟。在这批研究性欲史的专家中间，颇有些出众的诗人与优秀的作家。要不是他们学问渊博，旁人竟分辨不出他们与别的作者有什么两样。他们用着确切精当的措辞叙述古代的淫风。

可悲的是，一般笃厚的人和真正的艺术家，法国文坛上名副其实的权威，也在努力干这种非他们所长的工作。有些人还费尽心机写着猥亵的东西，给晨报拿去零零碎碎的登载。他们这样有规律的生产，像下蛋一样，每星期两次，成年累月的继续下去。他们生产，生产，到了山穷水尽，无可再写的时候，便搜索枯肠，制造些淫猥怪异的新花样：因为群众的肚子已经给塞饱了，佳肴美味都吃腻了，对最淫荡的想象也很快的觉得平淡无奇：作者非永远加强刺激不可，非和别人的刺激竞争，和自己以前制造的刺激竞争不可；——于是他们把心血都呕尽了，教人看了可怜而又可笑。

克利斯朵夫不知道这个悲惨职业的种种内幕；但即使他知道了，也不见得更宽容：因为他认为，无论什么理由也不能宽恕一个艺术家为了三十铜子而出卖艺术……

“便是为了维持他所亲所爱的人的生活也不能原谅吗？”

“不能。”

“你这是不近人情啊。”

“这不是人情不人情的问题，主要是得做一个人！……人情！……喝！你们这套没有骨头的人道主义真是天晓得！……一个人不能同时爱几十样东西，不能同时侍候好几个上帝！……”

克利斯朵夫一向过着埋头工作的生活，眼界不出他那个德国小城，没想到像巴黎艺术界这种腐败的情形差不多在所有的大都市里都不可避免。德国人常常自以为“贞洁”，把拉丁民族看做是“不道德的”：这种遗传的偏见慢慢的在克利斯朵夫心中觉醒了。高恩提出柏林的秽史，德意志帝国的上层阶级的腐化，蛮横暴烈的作风使丑行更要不得等等，和克利斯朵夫抬杠。但高恩并没意思袒护法国人；他把德国的风气看得和巴黎的一样平淡。他只是玩世不恭的想道：“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习惯”；所以他对自己那个社会里的习惯也恬不为怪。克利斯朵夫却只能认为是他们的民族性。于是他未免像所有的德国人一样，把侵蚀各国知识分子的溃疡，看作是法国艺术特有的恶习和拉丁民族的劣根性。

这个和巴黎文学的初次接触使克利斯朵夫非常痛苦，以后直要过了相当的时间才能忘掉。不是专门致力于那些被人肉麻当有趣的称为“基本娱乐”的著作，并非没有。但最美最好的作品，他完全看不到。因为它们不求高恩一流的人拥护；它们既不在乎这般读者，这般读者也不在乎这种读物：他们都是你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你的。高恩从来没对克利斯朵夫提过这等著作。他真心以为他和他的朋友们便是法国艺术的代表；除了他们所承认的大作家之外，法国就没有什么天才，没有什么艺术了。为文坛增光，为法国争荣的诗人们，克利斯朵夫连一个都不知道。在小说方面，他只看到矗立在无数俗

此系埃及的名城 Alexandrie，纪元前四世纪时由亚历山大大帝建立，故名。

流之上的巴莱斯和法朗士的几部作品。可是他语言的程度太浅，难于领略前者的思想分析和后者幽默而渊博的风趣。他好奇的瞧了瞧法朗士花房里所培养的橘树，以及在巴莱斯心头开发的娇弱的水仙。在意境高远而不免空洞的天才梅特林克之前，他也站了一会，觉得有股单调的，浮华的神秘气息。他抖擞了一下，不料又卷进浊流，被他早已熟识的左拉的溷浊的浪漫主义搅得头昏脑胀；等到他蹶身跃出的时候，一阵文学的洪流又把他完全淹没了。

而这片水淹的大平原还蒸发出一股浓烈的女性气息。那时的文坛正挤满了女性和女性化的男人。女人写作原来是很有意思的，只要她们能够真诚，把任何男性不能完全了解的方面——女子隐秘的心理——描写出来。可是很少女作家敢这么做；她们多半只为了勾引男子而写作：在书中如在客厅里一样的扯谎，搔首弄姿，和读者调情。自从她们没有忏悔师可以诉说她们的私情丑事以后，就把私情丑事公诸大众。这样便产生了像雨点那么多的小说，老是撒野的，装腔作势的，文字又如小儿学语一般的含糊不清，令人读了如入香粉铺，闻到一股俗不可耐的香味与甜味。所有这类作品都有这个气息。于是克利斯朵夫像歌德一样的想道：“女人们要怎样写诗，怎样写文章，都可以。但男子决不能学女人的样！那才是我最讨厌的。”不三不四的卖弄风情，存心为一般最无聊的人玩弄虚伪的情感，又是撒娇又是粗野的风格，恶俗不堪的心理分析，教克利斯朵夫看了不由得心里作恶。

然而克利斯朵夫明白自己还不能下判断。节场上喧闹的声音把他耳朵震聋了。美妙的笛音也被市器掩住，没法听见。正如晴朗的天空之下展开着希腊岗峦的和谐线条，这些肉感的作品中间的确也有不少才气，不少丰韵，表现一种生活的甜美，细腻的风格，像班吕琪和拉斐尔画中的不胜慵困的少年，半阖着眼，对着爱情的幻梦微笑。这一切，克利斯朵夫完全没看到。没有一点儿端倪使他能感觉到这股精神的暗流。便是一个法国人也极不容易摸出头绪。他眼前所能清清楚楚见到的，只有满坑满谷的出版物，泛滥洋溢，差不多成了公众的灾害。仿佛人人都在写作：男人，女人，孩子，军官，优伶，社交界的人物，剽窃抄袭的人，无一不是作家。那简直是一种传染病。

暂时克利斯朵夫不想决定什么意见。他觉得像高恩那样的向导只能使他越来越迷路。从前在德国和文学团体的来往使他有了戒心，对于书籍杂志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谁知道这些出版物不是少数有闲者的意见，甚至除了作者以外再没别的读者？戏剧才能使你对社会有个比较准确的观念。它在巴黎人的日常生活中占着那么重要的地位：好比一家巨人的饭铺来不及满足二百万人的食量。即使各区的小剧场，音乐咖啡馆，杂耍班等等一百多处夜夜客满的场所不计在内，巴黎光是大剧院也有三十多家。演员与职员的人数多至不可胜计。四个国家剧场就有上三千的员役，每年需要一千万法郎开支。整个巴黎都挤满着起码角儿。他们的照相，素描，漫画，触目皆是，令人想起他们装腔作势的鬼脸；留声机上传出他们咿咿唔唔的歌唱，日报上披露他们对于艺术和政治的妙论。他们有他们特殊的报纸，刊载他们可歌可泣的或是日常猥琐的回忆。在一般的巴黎人中，这些靠互相摹仿过日子的大娃娃俨然是主子，而剧作者做着他们的扈从侍卫。于是克利斯朵夫要求高恩带他到这个反映现实的国土里去见识一番。

一般读者仅知左拉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领袖，其实左拉的浪漫底克的幻想成分远过于他自称为“观察家与实验家”的性格。

但在这方面，高恩的向导也不见得比在出版界里高明。克利斯朵夫由他的介绍而对巴黎剧坛所得的第一个印象，使他厌恶的程度也不下于第一批读到的书籍。似乎到处都弥漫着精神卖淫的风气。

出卖娱乐的商人分做两派。一是旧式的国粹派，全是粗野的毫无顾忌的诙谐，把一切的丑恶和畸形的身体，作为说笑打诨的材料；那是臭肉一般的，淫猥的，大兵式的戏谑。他们却美其名曰“大丈夫的爽直”，自命为把放浪的行为与道德调和了，因为在一出戏里演过了四场淫秽的丑史以后，再把情节调动一下，使不贞的妻子仍旧回到丈夫的床上，——只要法律得以维持，道德也就得救了。把婚姻描写得百般淫乱而在原则上仍旧尊重婚姻的态度，大家认为就是高卢人派头。

另外一派是新式的，更细巧也更可厌。充斥剧坛的巴黎化的犹太人（和犹太化的基督徒），在戏剧中拿情操来玩种种花样，那是颓废的世界大同主义的特征之一。那般为了父亲而脸红的儿子，竭力否认他们的种族意识；在这一点上，他们真是太成功了。他们把几千年的灵魂摆脱之后，剩下来的个性只能拿别的民族的知识与道德的长处杂凑起来，合成一种混合品，自鸣得意。在巴黎剧坛称霸的人，最拿手的本领是把猥亵与感情混在一起，使善带一些恶的气息，恶带一些善的气息，把年龄，性别，家庭，感情的关系弄得颠颠倒倒。这样，他们的艺术便有一股特别的气味，又香又臭，格外难闻：他们却称之为“否定道德的主义”。

他们最喜欢采用的戏中人物之一是多情的老人。他们的剧本中很多这个角色的肖像，使他们有机会把种种微妙的局面描写得淋漓尽致。有时，六十岁的老头儿把女儿当作心腹，跟她谈着自己的情妇；她也跟他谈着她的情夫；他们互相参加意见，像朋友一般；好爸爸帮助女儿犯奸；好女儿帮助父亲去哀求那个爱情不专的情妇，要她回来和父亲重续旧欢。有时，尊严的老人做了情妇的知己，和她谈着她的情夫，怂恿她讲述她放浪的故事，听得津津有味。我们还看到一大批情夫，都是十足地道的绅士，替他们从前的情妇当经理，监督她们的交际与匹配的事。时髦女人朝三暮四。男人做着龟奴，女人谈着同性爱。而干这些事的都是上流社会，就是说资产社会，——唯一值得重视的社会。而那个社会允许人家借了高等娱乐的名义，孱些坏货色供应主顾。经过了装璜，坏货色也很容易销售，把年轻的妇女与年老的绅士逗得笑逐颜开。但是其中有股死尸的气息跟娼家的气息。

他们戏剧风格之混杂也不下于他们的感情。他们造出一种杂揉的土话，把各阶级各地方迂腐而粗俗的口语，把古典的，抒情的，下流的，做作的，幽默的，胡说八道的，不雅的，隽永的话，统统凑在一处，好像带着外国口音。他们天生的会挖苦人，滑稽突梯，可是很少天趣；但他们凭着乖巧的手法，能仿着巴黎风气制造出一些天趣。虽然宝石的光泽不大美，镶工未免笨重繁琐，放在灯火下面至少会发亮：而只要有这一点就足够了。他们很聪明，观察很精密，却有些近视；几百年来在柜台上磨坏了的眼睛是要用放大镜来检视感情的，他们把小事扩大了好几倍，而看不见大事；他们因为特别喜欢假珠宝的光彩，所以除了他们暴发户心目中的典雅的理想以外，什么都不会描写。那简直是极少数游手好闲的人和冒险家争夺一些偷来的金钱与无耻的

高卢人为古罗马人称一部分凯尔特族的名字。法国人常自称为高卢人。而日常语言中尤以“高卢人派头”形容快乐，兴奋，轻薄的性格。

女性。

有时，这些犹太作家真正的天性，由于莫名其妙的刺激，会从他们古老的心灵深处觉醒过来，那才是多少世纪多少种族的一种古怪的混合物；一阵沙漠里的风，从海洋那边把土耳其杂货铺的臭味吹到巴黎人的床头，带来闪烁发光的沙土，奇怪的幻象，醉人的肉感，剧烈的神经病，毁灭一切的欲念，——似乎希伯莱的勇士撒姆逊，从几千年的长梦中突然像狮子一般的醒过来，挟着疯狂的怒气把庙堂的支柱推倒了，压在他自己和敌人身上。

克利斯朵夫掩着鼻子，对高恩说：

“这里头力量是有的；可是发臭。够了！咱们去看看别的东西罢。”

“你要看什么？”

“法国啊。”

“这不就是法国吗？”高恩说。

“不是的，”克利斯朵夫回答，“法国不是这样的。”

“怎么不是？还不是跟德国一样吗？”

“我绝对不信。这样的民族活不了二十年的：此刻已经有股霉味儿了。一定还有别的东西。”

“再没有更好的了。”

“一定有的，”克利斯朵夫固执地说。

“噢！我们也有很高尚的心灵，”高恩回答，“也有配他们胃口的戏剧。你要看这个吗？有的是。”

于是他把克利斯朵夫带到法兰西剧院去。

那天晚上，演的是一出现代的语体喜剧，讨论某个法律问题的。

一听最初几句对白，克利斯朵夫就不知道这剧情发生在哪个世界上。演员的声音异乎寻常的宏大，沉着，迟缓，做作，每个音母都咬得非常清楚，好像教朗诵的功课，又像永远念着十二缀音格的诗，夹着些痛苦的打嗝。姿势那么庄严，差不多跟教士一般。女主角披着古希腊大褂式的寝衣，高举着手臂，低着脑袋，活像神话里的女神，调弄着美妙的低音歌喉，迸出最深沉的音，脸上永远挂着苦笑。高贵的父亲踏着剑术教师般的步子，道貌岸然，带着阴森森的浪漫色彩。年轻的男主角很冷静的尖着嗓子装哭声。剧本的风格是副刊式的悲剧：通篇都是抽象的字眼，公事式的修辞，学院派的纡说。没有一个动作，没有一声出人不意的呼号。从头至尾像时钟一样呆板，只有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个剧本的雏形，一副空洞的骨架，外边却毫无血肉，只是一些书本式的句子。那些想要显得大胆的讨论，其实只表示鳃鳃过虑的思想，和那种矜持的小市民精神。

剧中叙述一个女子嫁了个卑鄙的丈夫，生了个孩子；她离了婚，又嫁给一个他心爱的老实人。作者想借此说明，便是在这等情形中，离婚不独为一般成见所不许，抑且为人类天性所不容。要证明这一点是再方便没有了：作者设法使前夫在某次意外的情形中和离婚的妻子团聚了一次。这样以后，那女的并不继之以悔恨或羞惭。要说天性，这才是正常的反应。可是不，她反而更爱那个诚实的后夫。据说这是一种英勇的意识，出乎人情之外的表现！

非力士人囚囚撒姆逊，一日将其带往祭神大会，意欲当众加以羞辱。撒姆逊默祷上帝赐还神力（此神力被爱人达利拉潜割头发后丧失）。乃推倒庙堂，与非力士王及在场群众同归于尽。

法兰西剧院（亦称法兰西喜剧院）为法国四大国家戏院之一。

法国作家对于道德的确太生疏了：一提到它就会变得过火，令人难以置信。大家看到的仿佛尽是高乃依式的英雄，悲剧中的帝王。——而这些百万富翁的男主角，在巴黎至少有一所住宅和二处宫堡的女主角，岂非真是帝王吗？在这等作家眼里，财富竟是一种美，几乎也是一种德。

但克利斯朵夫觉得观众比戏剧本身更可怪。不管是怎么不合理的情节，他们看了都若无其事。遇到发噱的地方，应该教人哄笑的对白，由演员预先暗示大家准备的地方，他们便哄笑一阵。当那般悲壮的傀儡照着一定的规矩打呃，叫吼，或是晕过去的时候，大家便擤鼻涕，咳嗽，感动得下泪。

“哼！有人还说法国人轻佻！”克利斯朵夫离开场子的时候说。

“轻佻和庄严，各有各的时候，”西尔伐·高恩带着嗤笑的口气说。“你不是要道德吗？你现在可看到法国也有道德了。”

“这不是道德而是雄辩！”克利斯朵夫嚷道。

“我们这儿，”高恩说，“舞台上的道德总是很会说话的。”

“这是法庭上的道德，”克利斯朵夫说，“只要是多嘴的人就会得胜。我压根儿讨厌律师。难道法国没有诗人吗？”

于是西尔伐·高恩带他去见识诗剧。

法国并非没有诗人，也并非没有大诗人。然而戏院不是为他们而是为胡诌的音韵匠设的。戏院跟诗歌的关系，有如歌剧院跟音乐的关系，像裴辽士说的变了一种“荡妇卖笑”的出路。

克利斯朵夫所看到的，有一般以卖淫为荣的圣洁的娼妇，据说她们和上加伐山受难的基督一样伟大；——有一般为爱护朋友而诱奸朋友之妻的人；——有相敬如宾的三角式的夫妇；——有成为欧洲特产的，英勇壮烈的戴绿头巾的丈夫。——克利斯朵夫也看到一般多情的姑娘徘徊于情欲与责任之间：依了情欲，应该跟一个新的情夫；依了责任，应该守着原来的情夫，一个供给她们金钱而被她们欺骗的老人。结果，她们很高尚的挑了责任那条路。——克利斯朵夫觉得这种责任和卑鄙的利害观念并没分别；可是群众非常满意。他们只需要听到责任二字，根本不在乎实际；俗语说得好：扯上一面旗，船上的货物就得到保护了。

这种艺术的极致，是在于用最奇特的方式把性的不道德与高乃依式的英雄主义调和起来。这样就能使巴黎群众的荒淫的倾向，和口头上的道德同时得到满足。——可是我们还得说句公道话：他们对于荒淫的兴致还不及嚼舌的兴致。雄辩是他们无上的快乐。只要听到一篇美妙的说辞，他们便是给人抽一顿也是乐意的。不论是恶是善，是惊天动地的英勇的精神，是放荡淫佚的下流习气，只要像镀金似的加上些铿锵的音韵，和谐的字句，他们便一概吞下。一切都是吟诗的材料。一切都是咬文嚼字的章句。一切都是游戏。当雨果暴雷似的怒吼时，他们立刻加上一个低音调节器，免得小孩子受了惊吓！——在这种艺术里，你永远感觉不到自然的力量。他们把爱情，痛苦，死亡，都变成浮华浅薄。像在音乐方面一样，——而且更厉害，因为音乐在法国还是一种年轻的艺术，还比较天真，——他们最怕“已经用过的”字眼。最有才具的人很冷静的在标新立异上面做功夫。诀窍是挺简单的：只要挑一篇传说或神话，把它的内容颠倒过来就得了。结果就有了被妻子殴打的蓝胡子，或是为了好心而自己挖掉眼睛，为阿雪斯与迦拉德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卜里

番姆。而这一切，着重的还在形式。但克利斯朵夫（他还不是一个内行的批判者）觉得，这些重视形式的作者也不见得高明，只是一般抄袭摹仿的匠人，而非独创风格，从大处落墨的作家。

这类诗的谎言，到了悲壮的戏剧中简直是谬妄之极。它对于剧中的英雄有这样一种滑稽可笑的概念：

主要是有一颗美妙的灵魂，
有一双鹰眼，像门洞一样宽广高大的脑门，
有一副严肃坚强的神气，光彩焕发而动人，
再加一颗善于战栗的心，一双充满着幻梦的眼睛。

这样的诗句居然有人信以为真。在浮夸的大言，长长的翎毛，白铁的剑与纸糊的头盔之下，我们老是看到沙杜那一派的无可救药的轻薄，把历史当作木偶戏的大胆的俳剧演员。像西拉诺式的荒唐的英雄主义，在现实世界里代表些什么呢？这般作者从天上搅到地下，把帝王与扈从，护教团与文艺复兴期的冒险家，一切骚扰过世界的元恶大盗，从坟墓里翻出来：——为的是教大家看看一个无聊的家伙，杀人不眨眼的暴徒，拥着残忍凶暴的军队，后宫全是俘虏得来的美女，忽然为了一个十几年前见过一面的女子颠倒起来；——再不然是给你看到一个亨利第四为了失欢情妇而被刺！

这般先生就是这样的玩弄着室内的君王与英雄。所谓诗人就这样的讴歌着虚伪的，不可能的，与真理不相容的英雄主义……克利斯朵夫很奇怪的发觉，自命为千伶百俐的法国人竟不知可笑为何物。

但最妙的是宗教交了时髦运！在四旬节里，喜剧演员在快乐剧场用大风琴伴奏，朗诵鲍舒哀的《悼词》。犹太作家替犹太女演员写些关于圣女丹兰士的悲剧。鲍第尼戏院演着《殉难之路》，滑稽剧场演着《圣婴耶稣》，圣·马丁戏院演着《受难记》，奥狄安戏院演着《耶稣基督》，移植园里奏着关于基督受难的乐曲。某个有名的嚼舌专家，讴歌肉欲之爱的诗人，在夏德莱戏院举行一次关于“赎罪”的演讲。当然，在全部《福音书》中，这些时髦朋友所牢记在心的不过是比拉德与玛特兰纳。——而他们的马路基督，又染了当时的习气，特别饶舌。克利斯朵夫不禁喊道：

“这可比什么都糟了！扯谎竟扯成这个样！我透不过气来了。快快走罢！”

但在这批现代工商业化的出品中，伟大的古典艺术始终支撑着，好比今日的罗马，虽然满眼都是恶俗的建筑物，也还有些古代庙堂的废墟残迹。可

按蓝胡子原是布勒塔尼传说中的人物，杀过六个妻子。卜里番姆为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妒杀阿雪斯与迦拉德，终于被于里斯挖去双目。此处言法国诗剧作家专以传说与神话作翻案。

沙杜（1831—1908）为法国喜剧及历史剧作家，写的都是浪漫底克的英雄，热情的象征而非真正的热情，既无历史的真实，亦无人性的真实。但十九世纪末期沙杜称霸剧坛垂三十年。

《西拉诺》为洛斯当（1868—1918）所作韵文喜剧。作品红极一时，但艺术价值不高。故事系以十七世纪的诗人西拉诺为主，述西恋一女子名洛克萨纳，后知洛深爱克里斯蒂安·特·纽维兰德，西乃帮助此情敌，代写情书。后纽死于战役，而西将此秘密保存至临终时方始吐露。此处所谓荒唐的英雄主义即指此。

按法王亨利第四确于一六一一年被刺，但绝非为了失欢情妇。作者在此讽刺作家故意歪曲史实。

比拉德为判耶稣受刑的罗马帝国的犹太总督。玛特兰纳为受耶稣感化之卖淫女，在十字架下哭耶稣而第一个发见耶稣墓穴空无尸身之人。

是除了莫利哀以外，克利斯朵夫没有能力欣赏那些古典名著。他对于语言的微妙还不能捉摸，对于民族的特性也当然无从领会。他觉得最不可解的莫如十七世纪的悲剧；——在法国艺术中，这是外国人最难入门的一部，因为它是法国民族的心脏。他只觉得那种剧本冷冰冰的，沉闷，枯索，其迂阔和做作的程度足以令人作呕。动作不是贫乏就是过火，人物的抽象有如修词学上的论证，空洞无物有如时髦女子的谈话。整个剧本只是一幅古代人物与古代英雄的漫画：长篇累牍的铺张的无非是理性，理由，妙语，心理分析，过时的考古学。议论，议论，议论，永远是法国人的那些唠叨。克利斯朵夫存着讥讽的心思不愿意断定它美还是不美，他只觉得毫无趣味。《西那》里面的演说家所持的理由如何，未了是哪个饶舌的家伙得胜，克利斯朵夫全不理睬。

可是他发见法国的群众并不和他一般见解，倒是非常热烈的喝彩。这也不能消除他的误会，因为他是从观众身上去看这种戏剧的；而他觉得现代的法国人就有些性格是古典的法国人遗传下来的，不过是变了形。正如犀利的目光会在一个妖冶的老妇脸上发见她女儿脸上的秀美的线条：那当然不会使你对老妇发生什么爱情！……法国人好像每天相见的家属一样，决不发觉彼此的相似。克利斯朵夫可一看见便怔住了，并且格外加以夸张，临了竟只看见这一点。当代的艺术无异是那些伟大的祖先的漫画，而伟大的祖先在他心目中也显得像漫画中的人物。克利斯朵夫再也分辨不出，高乃依和一般摹仿者中间有何区别。拉西纳也被末流的巴黎心理学家，成天在自己心中掏来摸去的子孙们弄得鱼目混珠了。

所有这些幼稚的人从来跳不出他们的古典作家的圈子。批评家老是拉不断扯不断的讨论着《太丢狒》与《法特儿》，不觉得厌倦。年纪老了，他们还在津津有味的搅着幼年时代心爱的玩艺。这情形可以拖到民族的末日。以崇拜远祖列宗的传统而论，世界上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和法国相比的。宇宙中其余的东西都不值他们一顾。除了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名著以外，什么都不读、什么都不愿读的人不知有多少！他们的戏院不演歌德，不演席勒，不演克莱斯脱，不演葛利巴扎尔，不演赫白尔，不演史脱林堡，不演洛泼，不演嘉台龙，不演任何别的国家的任何巨人的名作，只有古希腊的是例外，因为他们（如欧罗巴所有的民族一样）自命为希腊文化的承继人。他们偶然觉得需要演一下莎士比亚，那才是他们的试金石了。表演莎士比亚的也有两派：一是用布尔乔亚的写实手法，把《李尔王》当做奥依哀的喜剧那末演出的；一是把《哈姆雷特》编成歌剧，加进许多雨果式的卖弄嗓子的唱词。他们完全没想到现实可以富有诗意，也没想到诗歌对于一般生机蓬勃的心灵就是自然的语言。所以他们听了莎士比亚觉得不入耳，赶紧回头表演洛斯当。

可是二十年来，也有人干着革新戏剧的工作；狭窄的巴黎文坛范围扩大

《西那》为十七世纪高乃依的有名的悲剧。此处所称“演说家所持的理由”指第二幕罗马大帝奥古斯德倦于政治，意欲退休，征询西那与玛克辛的意见，两人在御前争持各人的理由。

《太丢狒》为莫利哀的喜剧；《法特儿》为拉西纳的悲剧。

克莱斯脱为十八世纪德国戏剧家，葛利巴扎尔（奥），赫白尔（德），史脱林堡（瑞典），均十九世纪戏剧家。洛泼（西），嘉台龙（西）为十七世纪戏剧家。

奥依哀（1820—1889）为十九世纪后期以中产阶级为主要观众的戏剧家，当时与小仲马分庭抗礼。

《哈姆雷特》由多玛谱成歌剧，由加勒与巴皮哀二人编歌词。首次于一八六八年在巴黎公演。

了，它装着大胆的神气向各方面去尝试。甚至有两三次，外界的战争，群众的生活，居然冲破了传统的幕。但他们赶紧把破洞缝起来。因为他们都是些娇弱的老头儿，生怕看到事实的真面目。随俗的思想，古典的传统，精神上与形式上的墨守成法，缺少深刻的严肃，使他们那个大胆的运动无法完成。最沉痛的问题一变而为巧妙的游戏；临了，一切都归结到女人——渺小的女人——问题上去。易卜生的英雄式的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福音书》，尼采的超人哲学，到了他们江湖派的舞台上只剩下那些巨人的影子，可笑而可怜！

巴黎的作家花了不少心血要表示在思索一些新的事情。骨子里他们全是保守派。欧洲没有一派文学像法国文学那样普遍的跳不出过去的樊笼的：大杂志，大日报，国家剧场，学士院，到处都给“不朽的昨日”控制着。巴黎之于文学，仿佛伦敦之于政治，是防止欧洲思想趋于过激的制动机。法兰西学士院等于英国的上议院。君主时代的制度对新社会依旧提出它们从前的规章。革命分子不是被迅速的扑灭，就是被迅速的同化。而那些革命分子也正是求之不得。政府即使在政治上采取社会主义的姿态，在艺术上还是闭着眼睛让学院派摆布。针对学院派的斗争，大家只用文艺社团来做武器；而且那种斗争也可怜得很。因为社团中人一有机会就马上跨入学士院，而变得比学院派的人更学院派。至于当先锋的或是当后备员的，又老是做自己集团的奴隶，跳不出一党一派的思想。有的是囿于学院派的原则，有的是囿于革命的主张：归根结蒂，都是坐井观天。

为了要使克利斯朵夫提提精神，高恩预备带他到一种完全特殊的——就是说妙不可言的——戏院去。在那边可以看到凶杀，强奸，疯狂，酷刑，挖眼，破肚：凡是足以震动一下太文明的人的神经，满足一下他们隐蔽的兽性的景象，无不具备。那对于一般漂亮女子和交际花尤其特具魔力，——她们平时就有勇气去挤在巴黎法院的闷人的审判庭上消磨整个下午，说说笑笑，嚼着糖果，旁听那些骇人听闻的案子。但克利斯朵夫愤愤的拒绝了。他在这种艺术里进得愈深，觉得那股早就闻到的气息愈浓，先是还淡淡的，继而是持久不散的，猛烈的，完全是死的气息。

豪华的表面，繁嚣的喧闹，底下都有死的影子。克利斯朵夫这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开始就对某些作品感到厌恶。他受不了的倒并非在于作品的不道德。道德，不道德，无道德，——这些名辞都没有什么意义。克利斯朵夫从来没肯定什么道德理论；他所爱的古代的大诗人大音乐家，也并非规行矩步的圣人；要是有机会遇到一个大艺术家，他决不问他要忏悔单看，而是要问他：“他是不是健全的？”

关键就在于这“健全”二字。歌德说过：“要是诗人病了，他得想法医治。等病好了再写作。”

可是巴黎的作家都病了；或者即使有一个健全的，也要引以为羞，不让别人知道他健全，而假装害着某种重病。然而他们的疾病所反映于艺术的，并不在于喜欢享乐，也不在于极端放纵的思想，或是富于破坏性的批评。这

按此系指巴黎的大木偶戏院（Le Grand Guignol），创立于二一八九七年，所演的戏不是专门逗笑的，就是极端恐怖的。

旧教惯例，凡教徒向教士忏悔后，教士予以书面证明，称为忏悔单。今法国习惯，凡教徒结婚时，须向本堂神甫缴验忏悔单。

些特点可能是健全的，可能是不健全的，看情形而定；但绝对没有死的根苗。如果有的话，也不是由于这些力量本身，而是由于使用力量的人，因为死的气息就在他们身上。——享乐，克利斯朵夫也一样喜欢。他也爱好自由。他为了直言不讳的说出他的思想，曾经在德国惹起小城里的人的反感；如今看到巴黎人宣传同样的思想，他反倒厌恶了。思想还不是一样的思想？可是听起来大不相同。以前克利斯朵夫很不耐烦的摆脱古代宗师的羁轭，攻击虚伪的美学，虚伪的道德的时候，并不像这样漂亮朋友一般以游戏态度出之；他是严肃的，严肃得可怕：他的反抗是为了追求生命，追求丰富，藏有未来的种子的生命。但在这批人，一切都归结到贫瘠的享乐。贫瘠，贫瘠。这就是病根所在。滥用思想，滥用感官，而毫无果实。那是一种光华灿烂的，巧妙的，富有风趣的艺术；——当然是一种美的形式，美的传统，外边冲来的淤沙淹没不了的传统；——一种像戏剧的戏剧，一种像风格的风格，一批熟练的作家，很能写文章的文人；——是当年很有力量的艺术与很有力量的思想的骨骼，相当美丽的骨骼。可是也仅仅限于骨骼。铿锵的字眼，悦耳的句子，空空洞洞的互相摩擦的观念，思想的游戏，肉感的头脑，长于推理的感官；这一切除了自私自利的供自己享乐以外，毫无用处。那简直是往死路上走。而这个现象，和法国人口激减的情形相仿，是全欧洲不声不响的看在眼里而私心窃喜的。多少的聪明才智，多少的细腻的感觉，都浪费于无用之地，虚耗于下流可耻之事。他们自己可不觉得，只嘻嘻哈哈的笑着。但克利斯朵夫认为差堪安慰的也只有这一点：这些家伙还能够痛痛快快的笑，究竟不能算完全没希望。他们装做正经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倒更不喜欢他们了；他觉得最难堪的，莫过于那些文人一边把艺术当作寻欢作乐的工具，一边自命为宣扬一种没有利害观念的宗教。

“我们是艺术家，”高恩得意扬扬的说。“我们是为艺术而艺术。艺术永远是纯洁的；它只有贞操，没有别的。我们在人生中探险，像游历家一般对什么都感兴趣。我们是探奇猎艳的使者，是永不厌倦的爱美的唐·裘安。”

克利斯朵夫忍不住回答说：

“你们都是虚伪的家伙，原谅我这样告诉你。我一向以为只有我的国家是如此。我们德国人老把理想主义挂在嘴上，实际永远是追求我们的利益；我们深信不疑的自命为理想主义者，其实是一肚子的自私自利。你们却更糟：你们不是用‘真理’，‘科学’，‘知识的责任’等等来掩护你们的懦怯，（就是说，你们只顾自命不凡的研究，而对于后果完全不负责任，）便是用‘艺术’与‘美’来遮饰你们民族的荒淫。为艺术而艺术！……喝！多么堂皇多么庄严的信仰！但信仰只是强者有的。艺术吗？艺术得抓住生命，像老鹰抓住它的俘虏一般，把它带上天空，自己和它一起飞上清明的世界！……那是需要利爪，需要像垂天之云的巨翼，还得一颗强有力的心。可怜你们只是些麻雀，找到什么枯骨便当场撕扯，还要噉噉喳喳的你争我夺。……为艺术而艺术！……可怜虫！艺术不是给下贱的人享用的下贱的刍秣。不用说，艺术是一种享受，一切享受中最迷人的享受。但你只能用艰苦的奋斗去换来，等到‘力’高歌胜利的时候才能有资格得到艺术的桂冠。艺术是驯服了的生命，是生命的帝王。要做凯撒，先要有凯撒的气魄。他们不过是些粉墨登场的帝王：你们扮着这种角色，可并不相信这种角色。像那些以畸形怪状来博取荣名的戏子一样，你们用你们的畸形怪状来制造文学。你们沾沾自喜的培养你们民族的病，培养他们的好逸恶劳，喜欢享受，喜欢色欲，喜欢虚幻的

人道主义，和一切足以麻醉意志，使它萎靡不振的因素。你们简直是把民族带去上鸦片烟馆。结局是死；你们明明知道而不说出来。——那末，我来说了罢：死神所在的地方就没有艺术。艺术是发扬生命的。但你们之中最诚实的作家也懦弱得可怜：即使遮眼布掉下了，他们也装做看不见，居然还有脸孔说：不错，这很危险；里头有毒素；可是多有才气！”

那正像法官在轻罪庭上提到一个无赖的时候说：“不错，他是个坏蛋；可是多么有才气！”

克利斯朵夫心里奇怪法国的批评界怎么不起作用的。批评家并不缺少，他们在艺术界中非常繁殖。人数之多，甚至把他们的作品也给遮得看不见了。

一般的说，克利斯朵夫对于批评这一门是不怀好感的。这么多的艺术家，在现代社会里形成第四级第五级似的人物，克利斯朵夫已经不大愿意承认他们有什么用处，只觉得是表示一个时代的消沉，连观察人生都交给别人代理，把感觉也委托人家代庖了。尤其可耻的是，这个社会连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人生的反影都不能，还得借助于别的媒介，借助于反影之反影，就是说：依赖批评。要是这些反影之反影是忠实的倒也罢了。但批评家所反映的只有周围的群众所表现的犹豫不定的心理。这些批评好比博物院里的镜子，给观众拿着看天顶上的油画，结果镜子所反射出来的除了天顶以外就是观众的面目。

从前有一个时期，批评家在法国有极大的权威。群众恭而敬之的接受他们的裁判，几乎把他们看做高出艺术家，看做聪明的艺术家——（艺术家与聪明两个字平时仿佛是连不到一处的。）——以后，批评家高速度的繁殖起来：预言家太多了，他们那一行便不免受到影响。等到自称为“真理所在，只此一家”的人太多的时候，人们便不相信他们了；他们自己也不信自己了。大家都变得灰心：照着法国人的习惯，他们一夜之间就从这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从前自称为无所不知的人，现在声明一无所知了。他们还认为一无所知就是他们的荣誉，他们的体面。勒南曾经告诉这些萎靡不振的种族说：要风雅，必须把你刚才所肯定的立刻加以否定，至少也得表示怀疑。那是如圣·保禄所说的“唯唯否否”的人。法国所有的优秀人物都崇奉这个两栖原则。在这种原则之下，精神的懒惰和性格的懦弱都得其所哉了。大家再也不说一件作品是好是坏，是真真假，是智是愚，只说：

“可能如此如此……并非不可能如此如此……我不知道……我不敢担保……”

要是人家演一出猥亵的戏，他们也不说：“这是猥亵的。”而只说：“先生，你别这样说呀。我们的哲学只许你对一切都用犹豫不定的口气；所以你不该说：这是猥亵的，只能说：我觉得……我看来是猥亵的……但也不能一定这么说。也许它是一部杰作。谁知道它不是杰作呢？”

从前有人认为批评家霸占艺术，现在可绝对用不着这么说了。席勒曾经教训他们，把那些舆论界的小霸王老实不客气的叫做“奴仆”，说“奴仆的责任”是：

“第一要把屋子收拾清楚，王后快到了。拿出些劲来罢！把各个房间打扫起来。诸位，这是你们的责任。”

法国君主时代，社会分成贵族、教士、平民三级（ETAT），平民称为第三级作者在此借用此历史名辞，谓艺术家人数之多，几可自成一级，而为第四第五级。

勒南（1823—1892）为法国史学家兼哲学家。

“可是只要王后一到，你们这批奴才就得赶快出去！老妈子切不可大模大样的坐在夫人的大靠椅上！”

对今日这些奴仆得说句公平话：他们不再僭占夫人的大靠椅了。大家要他们做奴才，他们就真做了奴才，——但是挺要不得的奴才：根本不动手打扫，房子脏极了。他们抱着手臂，把整理与清除的工作都让主人去做，让当令的神道——群众——去做。

从某些时候以来，已经有了一种反抗这混乱现象的运动。少数比较精神坚强的人正为着公众的健康而奋斗，——虽然力量还很薄弱。但克利斯朵夫为环境所限，绝对看不见这批人。并且人家也不理会他们，反而加以嘲笑。偶尔有一个刚强的艺术家对时行的，病态的，空虚的艺术起而反抗，作家们就高傲的回答说，既然群众表示满意，便证明他们作者是对的。这句话尽够堵塞指摘的人的嘴巴。群众已经表示意见了：这才是艺术上至高无上的法律！谁也没想到，我们可以拒绝一般堕落的民众替诱使他们堕落的人作有利的证人，谁也没想到应当由艺术家来指导民众而非由民众来指导艺术家。数字——台下看客的数字和卖座收入的数字——的宗教，在这商业化的民主国家中控制了全部的艺术思想。批评家跟在作家后面，柔顺的，毫无异义的宣称，艺术品主要的功能是讨人喜欢。社会的欢迎是它的金科玉律：只要卖座不衰，就没有指摘的余地。所以他们努力预测娱乐交易所的市价上落，看群众对作品如何表示。妙的是群众也留神着批评家的眼睛，看他认为作品怎么样。于是大家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彼此只看见自己的犹豫不定的神气。

然而时至今日，最迫切的需要就莫过于大无畏的批评。在一个混乱的共和国，最有威势的是潮流，它不像一个保守派国家里的潮流，难得会往后退的：它永远前进；那种虚伪的思想的自由永远在变本加厉，差不多没有人敢抵抗。群众没有披露意见的能力，心里很厌恶，可没有一个人敢把心中的感觉说出来。假使批评家是一般强者，假使他们敢做强者，那末他们一定可以有极大的威力！一个刚毅的批评家（克利斯朵夫凭着他年轻专断的心思这样想），可能在几年之内，在控制群众的趣味方面成为一个拿破仑，把艺术界的病人一古脑儿赶入疯人院。可是你们已经没有拿破仑了……你们的批评家先就生活在恶浊腐败的空气里，已经辨别不出空气的恶浊腐败。其次，他们不敢说话。他们彼此都是熟人，都变了一个集团，应当互相敷衍：他们绝对不是独立的人。要独立，必须放弃社交，甚至连友谊都得牺牲。但最优秀的人都在怀疑，为了坦白的批评而招来许多不愉快是否值得。在这样一个毫无血气的时代里，谁又有勇气来这样干呢？谁肯为了责任而把自己的生活搅得像地狱一样呢？谁敢抗拒舆论，和公众的愚蠢斗争？谁敢揭穿走红的人的庸俗，为孤立无助，受尽禽兽欺侮的无名艺人作辩护，把帝王般的意志勒令那些奴性的人服从？——克利斯朵夫在某出戏剧初次上演的时候，在戏院走廊里听见一般批评家彼此说着：

“嘿，那不糟透了吗？简直一塌糊涂！”

第二天，他们在报上戏剧版内称之为杰作，再世的莎士比亚，说是天才的翅膀在他们头上飞过了。

“你们的艺术缺少的不是才气而是性格，”克利斯朵夫和高恩说。“你们更需要一个大批评家，一个莱辛，一个……”

“一个鲍阿罗，是不是？”高恩用着讥讽的口气问。

“是的，也许法国需要一个鲍阿罗胜于需要十个天才作家。”

“即使我们有了一个鲍阿罗，也没有人会听他的。”

“要是这样，那末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鲍阿罗，”克利斯朵夫回答。“我敢向你保证：一朝我要把你们的真相赤裸裸的说给你们听的时候，不管我说得怎样不高明，你们总会听到的，并且你们非听不可。”

“哎哟！我的好朋友！”高恩嘻嘻哈哈的说。

他的神气好似对于这种普遍的颓废现象非常满足，所以克利斯朵夫忽然之间觉得，高恩对法国比他这个初来的人更生疏。

“那是不可能的，”这句话是克利斯朵夫有一天从大街上一家戏院里不胜厌恶的走出来时已经说过的。“一定还有别的东西。”

“你还要什么呢？”高恩问。

克利斯朵夫固执的又说了一遍：“我要看看法兰西。”“法兰西，不就是我们吗？”高恩哈哈大笑的说。克利斯朵夫目不转睛的望了他一会，摇摇头，又搬出他的老话来：

“还有别的东西。”

“那末，朋友，你自己去找罢，”高恩说着，愈加笑开了。是的，克利斯朵夫大可以花一番心血去找。他们把法兰西藏得严密极了。

第二部

当克利斯朵夫把酝酿巴黎艺术的思想背景逐渐看清楚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更强烈的印象：就是女人在这国际化的社会上占着最高的，荒谬的，僭越的地位。单是做男子的伴侣已经不能使她厌足。便是和男子平等也不能使她厌足。她非要男子把她的享乐奉为金科玉律不行。而男子竟帖然就范。一个民族衰老了，自会把意志，信仰，一切生存的意义，甘心情愿的交给分配欢娱的主宰。男子制造作品；女人制造男子——（倘使不是像当时的法国女子那样也来制造作品的话）；——而与其说她们制造，还不如说她们破坏更准确。固然，不朽的女性对于优秀的男子素来是一种激励的力量；但对于一般普通人和一个衰老的民族，另有一种同样不朽的女性，老是把他们往泥洼里拖。而这另一种女性便是思想的主人翁，共和国的帝王。

由于高恩的介绍，又靠着演奏家的才具，克利斯朵夫得以出入于某些沙龙。他在那些地方，很好奇的观察着巴黎女子。像多数的外国人一样，他把他对两三种女性的严酷的批判，推而至于全部的法国女子。他所遇到的几种典型，都是些年轻的妇女，并不高，没有多少青春的娇嫩，身腰很软，头发是染过色的，可爱的头上戴着一顶大帽子；照身体的比例，头是太大了一些，脸上的线条很分明，皮肤带点虚肿；鼻子长得相当端正，但往往很俗气，永远谈不到什么个性；眼睛活泼而缺少深刻的生命，只是竭力要装得有神采，睁得越大越好；秀美的嘴巴表示很能控制自己；下巴丰满，脸庞的下半部完全显出这些漂亮人物的唯物主义：一边勾心斗角的谈爱情，一边照旧顾到舆论，顾到夫妇生活。人长得挺美，可不是什么贵种。这些时髦女人，几乎都有一种腐化的布尔乔亚气息，或是凭着她们的谨慎，节俭，冷淡，实际，和自私等等这些阶级的传统性格，极希望成为腐化的布尔乔亚。生活空虚，只求享乐。而享乐的欲望并非由于官能的需要，而是由于好奇，意志坚强，但意志的本质并不高明。她们穿得非常讲究，小动作都有一定的功架。用手心或手背轻轻巧巧的整着头发，按着木梳，坐的地位老是能够对镜自照而同时窥探别人，不管这镜子是在近处还是在远处，至于晚餐席上，茶会上，对着闪光的羹匙、刀叉、银的咖啡壶，把自己的倩影随便瞅上一眼，她们更觉得其乐无穷。她们吃东西非常严格，只喝清水，凡是可能影响她们认为理想的，像面粉般的白皮肤的菜，一概不吃。

和克利斯朵夫来往的人中，犹太人相当多；他虽然从认识于第斯·曼海姆以后对这个种族已经没有什么幻想，仍不免受他们吸引。在高恩介绍的几个犹太沙龙里，大家很赏识他，因为这个种族一向是很聪明而爱聪明的。在宴会上，克利斯朵夫遇到一般金融家，工程师，报馆巨头，国际掮客，黑奴贩子一流的家伙，——共和国的企业家。他们头脑清楚，很有毅力，旁若无人，挂着笑脸，貌似豪放，其实非常深藏。克利斯朵夫觉得这些坐在供满鲜花与人肉的餐桌四周的人物，冷酷的面目之下都隐伏着罪恶的影子，不管是过去的或将来的。几乎所有的男人全是丑的。女人大体上都很漂亮，只要你不从太近的地方看：脸上的线条与皮色缺少细腻。可是她们自有一种光彩，显得物质生活相当充实；美丽的肩膀在众目睽睽之下像鲜花般傲然开放，还有把她们的姿色，甚至她们的丑恶，变做捕捉男人的陷阱的天才。一个艺术家看到了，一定会发见其中有些古罗马人的典型，尼罗或哈特里安皇帝时代

“不朽的女性”一语，见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不朽的女性带着我们向上。”

的女子。此外也有巴玛岛民式的脸蛋，淫荡的表情，肥胖的下巴埋在颈窝里，颇有肉感的美。还有些女人头发很浓，拳得厉害，火刺刺而大胆的眼睛，一望而知是精明的，尖利的，无所不为的，比其余的女子更刚强，但也更女性。在这些女人中，寥寥落落的显出几个比较有性灵的。纯粹的线条，其来源似乎比罗马更古远，直要追溯到圣经时代的希伯莱族：你看了感到一种静默的诗意，荒漠的情趣。但克利斯朵夫走近去听希伯莱主妇与罗马皇后谈话时，发觉那些古族的后裔也像其余的女人一样，不过是巴黎化的犹太女子，而且比巴黎女子更巴黎化，更做作，更虚假，若无其事的说些恶毒的话，把一双像圣母般美丽的眼睛去揭露别人的身体与灵魂。

克利斯朵夫在东一堆西一堆的客人中间徘徊，到处格格不入。男人们提到狩猎的时候那么残忍，谈论爱情的口吻那么粗暴，唯有谈到金钱才精当无比，出之以冷静的，嘻笑的态度。大家在吸烟室里听取商情。克利斯朵夫听见一个衣襟上缀有勋饰的小白脸，在太太们中间绕来绕去，殷勤献媚，用着喉音说道：“怎么！他竟逍遥法外吗？”

两位太太在客厅的一角谈着一个青年女伶和一个交际花的恋爱。有时沙龙里还举行音乐会。人们请克利斯朵夫弹琴。女诗人们气吁吁的，流着汗，朗诵苏利·普吕东和奥古斯丁·陶兴的诗。一个有名的演员，用风琴伴奏，庄严的朗诵一章“神秘之歌”。音乐与诗句之荒唐教克利斯朵夫作恶。但那些女子竟听得出神，露着美丽的牙齿笑开了。他们也串演易卜生的戏剧。

一个大人物反抗那些社会柱石的苦斗，结果只给他们作为消遣。

然后，他们以为应当谈谈艺术了。那才令人作呕呢。尤其是妇女们，为了调情，为了礼貌，为了无聊，为了愚蠢，要谈易卜生，华葛耐，托尔斯泰。一朝谈话在这方面开了头，再也没法教它停止。那像传染病一样。银行家，掮客，黑人贩子，都来发表他们对于艺术的高见。克利斯朵夫竭力避免回答，转变话题，也是徒然：人家硬要跟他谈论音乐与诗歌。有如裴辽士说的：“他们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那种不慌不忙的态度仿佛谈的是醇酒妇人，或是旁的肮脏事儿。”一个神经病科的医生，在易卜生剧中的女主角身上认出他某个女病人的影子，可是更愚蠢。一个工程师，一口咬定《傀儡家庭》中最值得同情的人物是丈夫。一个名演员——知名的喜剧家——吞吞吐吐的发表他对于巴采与卡莱尔的高见；他告诉克利斯朵夫，说他不能看到一张范拉士葛——当时最走红的画家——的画而“不是大颗大颗的泪珠直淌下来”。但他又真诚的告诉克利斯朵夫，虽然他把艺术看得极高，但是把人生的艺术——行动，看得更高：要是他能够挑选一个角色来扮演的话，他一定挑俾斯麦。有时，这种场合也有一个所谓高人雅士。他的谈吐可也不见得如何高妙。克利斯朵夫常常把他们自以为说的内容，和实际所说的核对一下。他们往往一言不发，挂着一副莫测高深的笑容：他们是靠自己的声名过活的，决不拿声名来冒险。当然也有几个话特别多的，照例总是南方人。他们无所不谈，可是毫无价值观念，把一切都等量齐观，某人是莎士比亚，某人是莫利哀，某人是耶稣基督。他们把易卜生和小仲马相比，把托尔斯泰和乔治·桑并论；而这一切，自然是为表明法国已经无所不备。他们往往不通任何外国语文，

按易卜生的《傀儡家庭》为吾国读者所熟悉的一出戏。娜拉的丈夫是一个庸俗，狭小，自私的男人。

卡莱尔（1795—1881）为英国史学家及论文家。

范拉士葛为十七世纪西班牙画家。

但这一点对他们并无妨碍。听的人完全不问他们说的是否对的，主要是说些有趣的事，尽量迎合民族的自尊心。什么责任都可以撩在外国人头上，除了当时的偶像：因为不论是葛里格，华葛耐，是尼采，是高尔基，是邓南遮，总有一个当令的，但决不会长久，偶像早晚要被扔入垃圾桶的。

眼前的偶像是贝多芬。贝多芬变了时髦人物，谁想得到？至少在上流社会与文人中间是这样：因为法国的艺术趣味是像天平秤一样忽上忽下的，所以音乐家们早已把贝多芬丢开了。法国人要知道自己怎么想，先得知道邻人怎么想，以便采取跟他一样的或是相反的思想。看到贝多芬变得通俗了，音乐家中最高雅的一派便认为贝多芬已经不够高雅；他们永远自命为舆论的先驱而从来不追随舆论，与其和舆论表示同意，宁愿跟它背道而驰。所以他们把贝多芬当作粗声叫喊的老聋子；有些人还说他或许是个可敬的道德家，但是徒负虚名的音乐家。——这类恶俗的笑话绝对不合克利斯朵夫的脾胃。而上流社会的热心捧场也并不使克利斯朵夫更满意。倘若贝多芬在这个时候来到巴黎，一定是个红人，可惜他死了一百年。他的走运倒并不是靠他的音乐，而是靠他的多少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那是被感伤派的传记宣扬得妇孺皆知的。粗犷的相貌，狮子般的嘴脸，已经成为小说中人的面目。那些太太对他非常怜爱，意思之间表示，如果她们认识了他，他决不至于那么痛苦；她们敢这样慷慨，因为明知贝多芬决不会拿她们的话当真……这老头儿已经什么都不需要了。——因此，一般演奏家，乐队指挥，戏院经理，都对他表示十二分虔敬；并且以贝多芬的代表资格领受大家对贝多芬的敬意。票价高昂，规模宏大的纪念音乐会，使上流社会能借此表现一下他们的善心，——偶然也能使他们发见几阙贝多芬的交响乐。喜剧演员，上流社会，半上流社会，共和政府特派主持艺术事业的政客，组织着委员会，公告社会说他们就要为贝多芬立一个纪念碑：除了几个被人当作通行证用的好好先生以外，发起人名单上有的是那些混蛋——倘使贝多芬活着的话一定会把贝多芬踩在脚下的。

克利斯朵夫看着，听着，咬着牙齿，免得说出难听的话。整个晚上，他全身紧张，四肢抽搐。他既不能说话，也不能不说话。并非为了兴趣或需要，而是为了礼貌，为了非说些什么不可而说话，使他非常难堪。把真正的思想说出来罢，那是不行的。信口胡诌罢，又办不到。他甚至在不开口的时候也不会保持礼貌。倘使他望着旁边的人，就是眼睛直勾勾的瞪着人家，不由自主的研究对方，教人生气。要是他说话，就嫌语气太肯定，又使大家——连他自己在内——听了刺耳。他觉得自己不得其所；而且他既有相当的聪明，能够感觉到自己把这个环境的和谐给破坏了，当然对自己的态度举动和主人们一样气恼。他恨自己，恨他们。

等到半夜里独自一人走到街上的时候，他烦闷到极点，竟没气力走回去了；他差不多想躺在街上，好像他儿时爵府里弹了琴回家的情形，有时，即使那一个星期的全部存款只剩了五六个法郎，他也会花两法郎雇一辆车。他急急忙忙的扑进车厢，希望赶快溜走；他一路上在车子里呻吟不已。回到寓所，上床睡觉了，他还在呻吟……然后又猛的想起一句滑稽的话而放声大笑，不知不觉做着手势，把那句话重说一遍。第二天，甚至过了好几天，独自散步的时候，他又突然咆哮起来，像野兽一样……干么他要去看这些人呢？干么要再上那些地方去看他们呢？干么勉强自己去学别人的模样，手势，鬼脸，装做关心那些并不关心的事？——他是不是真的不关心呢？——一年以

前，他绝对不耐烦跟他们来住的。现在他觉得他们又好气又好笑了。是不是他也多少沾染了巴黎人满不在乎的脾气？于是他很不放心的怀疑自己的性格不及从前强了。但实际是相反：他倒是更强了。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他精神比较自由得多。他不由自主的要睁着眼睛看人类的大喜剧。

并且不管他喜欢不喜欢，只要他希望巴黎社会认识他的艺术，就得继续过这种生活。巴黎人对作品的兴趣，要看他们对作者认识的深浅而定。要是克利斯朵夫想在这些市俗中间找些教课的差事来糊口，他尤其需要教人家认识。

何况一个人还有一颗心，而心是无论如何必须有所依恋的；如果一无依傍，它就活不了。

克利斯朵夫的女学生中有一个叫做高兰德·史丹芬，她的父亲是个很有钱的汽车制造商，入了法国籍的比国人；母亲是意大利人。她的祖父是英美的混血种，卜居在盎凡斯，祖母是荷兰人。这是一个十足地道的巴黎家庭。在克利斯朵夫看来，——像别人看来一样，——高兰德是个典型的法国少女。

她才十八岁，丝绒般的黑眼睛对年轻的男人特别显得温柔，像西班牙姑娘的瞳子，水汪汪的光彩把眼眶填满了，说话的时候，那个古怪而细长的小鼻子老是在翕动。乱蓬蓬的头发，一张怪可爱的脸，皮肤很平常，搽着粉，粗糙的线条，有点儿虚肿，神气像头瞌睡的小猫。

她个子非常小，衣服很讲究，又迷人，又淘气，举止态度都带几分撒娇，做作，痴騃；她装着小女孩的神气，几个钟点的坐在摇椅里晃来晃去；在饭桌上看到什么心爱的菜，便拍着手小声小气的叫着：“噢！多开心啊！……”在客厅里，她燃着纸烟，在男人面前故意做得跟女友们亲热得不得了，勾着她们的脖子，摩着她们的手，咬着她们的耳朵，说些傻话，或是娇滴滴的说些凶狠的话，说得很巧妙，偶然也会若无其事的说些挺放肆的话，——而更会逗人家说这种话，——一忽儿她又扮起天真的憨态，眼睛挺亮，眼皮厚厚的，又肉感，又狡猾，从眼梢里看人，留神听着人家的闲话，很快的把粗野的部分听在耳里，想法吊几个男人上钩。

这些做作，像小狗般在人前卖弄的玩艺，假装天真的傻话，对克利斯朵夫全不是味儿。他没有闲功夫来注意一个放荡的小姑娘耍手段，也不屑用好玩的心情瞧那些手段。他得挣他的面包，把他的生命与思想从死亡中救出来。他的关心这些客厅里的鸚鵡，只在于她们能够帮助他达到目的。拿了她们的钱，他教她们弹琴，非常认真，紧蹙着眉头，全副精神贯注着工作，免得被这种工作的可厌分心，也免得被像高兰德·史丹芬一类轻佻的女学生的淘气分心。所以他对于高兰德，并不比对高兰德的十二岁的表妹更关切；那是个幽静而胆怯的孩子，住在史丹芬家和高兰德一起学琴的。

高兰德那么机灵，决不会不发觉她所有的风情对他都是白费。而且她那么圆活，很容易随机应变的迎合克利斯朵夫的作风。那根本不用她费什么心，而是她天赋的本能。她是女人，好比一道没有定形的水波。她所遇到的各种心灵，对于她仿佛各式各样的水瓶，可以由她为了好奇，或是为了需要，而随意采用它们的形式。她要有什么格局，就得借用别人的，她的个性便是不保持她的个性。她需要时常更换她的水瓶。

她的受克利斯朵夫吸引有许多理由。第一是克利斯朵夫的不受她吸引。其次因为他和她所认识的一切青年都不同；形式这样粗糙的瓶，她还没有试用过。何况估量各种水瓶各种人物的价值，她天生的特别内行；所以她明白

克利斯朵夫除了缺少风雅以外，人非常厚实，那是巴黎的公子哥儿所没有的。

跟一切有闲的小姐一样，她也弄音乐；她为此花的功夫可以说很多，也可以说很少。这是说：她老是在弄音乐，而实际是差不多一无所知。她可以整天的弹琴，为了无聊，为了装腔，为了求麻醉。有时，她的弹琴像骑自行车一样。有时她可以弹得很好，有格调，有性灵——（只要她设身处地的去学一个有性灵的人，她就变得有性灵了）。——在认识克利斯朵夫以前，她可以喜欢玛斯奈，葛里格，多玛。认识克利斯朵夫以后，她就可以不喜欢他们。如今她居然把罢哈和贝多芬弹得很像样了——（这倒不是恭维她的话）；——但最奇怪的是她居然喜欢他们。其实她并不是爱什么贝多芬，多玛，罢哈，葛里格，而是爱那些音符，声响，在键盘上奔驰的手指，跟别的弦一样搔着她神经的琴弦的颤动，以及使她身心舒畅的快感。

在她贵族化住宅的客厅里，——铺着浅色的地毯，正中放着一个书架，供着壮健的史丹芬夫人的肖像，那是个时髦画家的作品，把她表现得多愁多病，好比一朵没有水分的花，奄奄一息的眼睛，身子像螺旋般扭做几段，似乎非如此就不能表现这富家妇珍贵的心灵；——大客厅一面全是玻璃门，可以望见盖满白雪的老树，克利斯朵夫发见高兰德坐在钢琴前面，反复不已的弹着些同样的乐句，听着几个柔靡的不协和弦出神。

“啊！”克利斯朵夫一进门叫道。“猫儿又在打鼾了！”“你又来缺德了！”她笑着回答……

（说着她向他伸出潮腻腻的手。）

“……你听呀。难道这不美吗？”

“美极了，”他口气很冷淡。

“你根本没有听！……你听一听行不行？”

“我早听到了……老是这一套。”

“啊！你不是音乐家，”他有点儿恼了。

“仿佛你搅的这个真是音乐似的！”

“怎么！……这不是音乐是什么，请问你？”

“你自己很明白！我可不能告诉你，说出来是不雅的。”“那更要你说了。”

“要我说话吗？……——那是你活该了！……你知道你坐在钢琴前面做些什么？……你是在调情。”

“这像什么话！”

“一点不错。你对钢琴说着：亲爱的钢琴，亲爱的钢琴，跟我说些好话呀，抚摩我呀，给我一个亲吻呀！”

“别说了行不行？”高兰德半笑半恼的说。“你竟一点儿不顾体统。”

“我就是不顾体统。”

“你真是蛮不讲理……再说，倘使这真正是音乐的话，我这种方式不就是真正爱好音乐的方式吗？”

“噢！我求你，别把这种东西和音乐搅在一起。”“可是这就是音乐啊！一个美妙的和弦等于一个亲吻。”“我没教你这么说。”

“难道不是吗？……干么你耸肩膀？干么你扯鬼脸？”“因为我讨厌这种话。”

“你越说越妙了！”

“我讨厌人家用淫荡的口吻谈论音乐……噢！这也不是你的错，是你的

社会的错。你周围那些无聊的人把艺术看做一种特准的淫乐……得啦，别说废话了！把你的朔拿大弹给我听吧。”

“不忙。我们再谈一会罢。”

“我不是来谈天而是给你上钢琴课的……来罢，开步走！”“瞧你多有礼貌！”高兰德有点儿气恼了，心里却觉得这样碰一下钉子也痛快。

她非常用心的弹她的曲子；因为灵巧，所以成绩很过得去，有时还相当的好。胸中雪亮的克利斯朵夫暗里笑着这个淘气的女孩子“居然这样伶俐，虽然对弹的曲子一无所感，弹得倒像真有所感”。然而他不免因此对她抱着好感。高兰德竭力找机会跟他说话，觉得谈天比上课有趣得多，克利斯朵夫白白的拒绝，表示他不能回答，因为一说出心里的话就会得罪她；她却总有方法使他说出来；而且他的话越唐突，她越不觉得唐突：那对她是种游戏。精灵乖巧的姑娘知道克利斯朵夫最喜欢真诚，所以她大着胆子跟他一味顶撞，很固执的和他争论。而两人争论完了，一点不伤和气。可是克利斯朵夫对这种沙龙里的友谊决不会存什么幻想，他们中间也永远谈不到什么亲密，要不是有一天，高兰德一半突如其来，一半出于勾引男人的本能而向克利斯朵夫推心置腹的话。

头天晚上，她父母在家里招待宾客。她有说有笑，像疯子一般大大的卖弄了一番风情；但第二天早上克利斯朵夫去上课的时候，她累死了，形容憔悴，脸色苍白，头胀得厉害。她无精打采的连话都不愿意说，坐在钢琴前面有气无力的弹着，逢到快的段落都脱落了，改了几次也没弹好，便突然停下来说：“我弹不下去了……对不起……等一忽儿好不好？”他问她是否不舒服。她回答说。他心里想：

“她不大上劲……她有时就是这样的……虽然可笑，但也不能怪她。”

于是他提议改天再来；但她一定要留着他：

“只要一忽儿……过一下就会好的……我真胡闹，是不是？”他觉得她的态度不大正常，可不愿意问，故意把话扯开去：“哦，这是因为你昨天晚上风头太足了啊！你太辛苦了。”她含讥带讽的笑了笑：“嗯，对你倒是不能这样说。”他老实不客气笑开了。她又道：“我想你昨天连一句话都没说。”

“对。”

“可是颇有几个有意思的人呢。”

“是的，那些多嘴的家伙，那些才子！在你们这般没骨头的法国人中间，我简直搅糊涂了；他们什么都懂，什么都会解释，什么都能原谅，可是什么都没感觉到。他们几个钟点的谈着艺术啊，爱情啊，不教人恶心吗？”

“你不喜欢讨论爱情，那末对艺术总该有兴趣呀。”“这些事用不着讨论，要你去做。”

“要是不能做呢？”高兰德微微撅着嘴。

克利斯朵夫笑着回答：“那末让别人去做。艺术不是每个人都能搅的。”

“爱情也是这样吗？”

“也是这样。”

“我的天！那我们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管家罗。”

“谢谢罢！”高兰德恼了。

她把手放在琴上再来尝试，可照旧弹不起来；她便敲着键盘呻吟道：

“没有办法！……我简直一无所用。你说得不错。女人什么事都做不了。”

“能够这样说已经不坏了，”克利斯朵夫老老实实的回答。她望着他，好似小姑娘挨了骂一样的垂头丧气，接着说：“别这么冷酷啊！”

“我并不毁谤贤淑的妇女，”克利斯朵夫高高兴兴的回答。一个贤淑的女人是尘世的天堂……可是尘世的天堂……”“对啦，谁也没见过尘世的天堂。”

“我并不悲观到这种程度。我只说：我，我从来没见过；可是一定有的。只要有，我就决心去寻访。但是很不容易。世界上一个贤淑的女子和一个有天才的男人同样难得。”“除了他们以外，其余的男男女女都无足重轻了吗？”

“相反！社会上只着重这一批。”

“可是你呢？”

“对于我，这些人是有等于无。”

“噢，你多冷酷！”高兰德说。

“不错，我有点儿冷酷。但只要能对别人有些好处，也应当有几个冷酷的人！……倘若世界上不是东一处西一处有几颗石子的话，更要一团糟了。”

“你说得对，你很得意你是强者，”高兰德悲哀的说。“可是对那些不能成为强者的人，——尤其是女的，你别太严厉啊……你不知道我们的懦弱把我们磨得多苦。你看到我们嘻嘻哈哈，调情打趣，弄些可笑的玩艺，便以为我们脑子里空空如也，瞧不起我们。哪知道一般十五岁到十八岁中间的小女人，尽管在社会上交际，出风头，——可是跳完了舞，说完了废话，怪论，发完了牢骚，（人家看见她们笑也跟着笑，）当她们对一般混蛋透露了一些心腹，在每个人眼里想找些光明而找不到之后，——夜里回家，关在静悄悄的卧室里，给孤独的苦闷煎熬得扑在地下，啊！要是你能看到她们这个模样！……”

“有这样的事吗？”克利斯朵夫惊愕的说。“怎么！你们竟这样的痛苦吗？”

高兰德一声不出，可是眼泪涌上来了。她强作笑容，把手伸给克利斯朵夫。他感动的握着：

“可怜的孩子！既然你们痛苦，为什么不想法摆脱这种生活呢？”

“你要我们怎么办？简直无法可想。你们男人，你们可以摆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我们，我们永远被世俗的义务跟浮华享乐束缚着跳不出去。”

“谁限制你们，不许你们跟我们一样的摆脱一切，干一件你们心爱而又能保障你们独立的事业，——像保障我们的一样？”

“像保障你们的一样？可怜的克拉夫脱先生！你们所谓独立的保障也不见得怎么可靠！……可是那至少是你们喜欢的事业。我们可又配做些什么呢？没有一件事情使我们感到兴趣。——是的，我知道，我们现在什么都参加，假装关切着一大堆跟我们不相干的事；我们多么需要能关切一点儿什么！我跟旁人一样参加团体，担任慈善会的工作，到巴黎大学去上课，听伯格森和于尔·勒曼脱的讲演，听古代音乐会，古典作品朗诵会，还做着笔记，笔记……我自己也不知道记些什么！……我骗自己，以为这些是我所热爱的，或者至少是有用的。啊！我明明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我对什么都不在乎，对什么都腻烦！……我这样把每个人的思想老实告诉了你，你可不能瞧不起我。我并不比别的女人更蠢。可是哲学，历史，科学，究竟跟我有何相干？至少艺术，——你瞧——我乱弹一阵，东涂西抹，涂些莫名其妙的水彩画；——难

道这些就能使一个人的生活不空虚了吗？我们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嫁人。可是嫁给那些我跟你看得一样明白的家伙，你想是有趣的吗？唉，我把他们看透了。我没有你们德国多情女子的那种运气，会自己造些幻象……噢，太可怕了！看看周围的人，看看已经结婚的女子，看看她们所嫁的男人，想到自己也得跟她们一样，让身心变质，跟她们一样的庸俗！……我敢说，没有艰苦卓绝的精神决计受不了这种生活这种义务。而那种精神就不是每个女子都能有的……光阴如流矢，日月如穿梭，一眨眼青春就完了；可是我们心中究竟藏着些美的，好的东西，——只是永远不加利用，让它们一天天的死灭，结果还得拿去送给我们瞧不起，而将来也要瞧不起我们的蠢货！……并且没有一个人了解你！人家说我们是一个谜。那些男人觉得我们乏味，古怪，倒也罢了。女人应该是懂得我们的啊！她们是过来人，只要回想一下自己的情形就得了……事实可不是这样。她们决不给你一点帮助。便是做我们母亲的也不了解我们，也不真心想认识我们。她们只打算把我们嫁人。除此以外，死也罢，活也罢，都归你自己去安排！社会把我们完全丢在一边。”

“别灰心，”克利斯朵夫说。“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得由自己去体会的。如果你有勇气，一切都会顺利。想法到你的社会以外去找找罢。法国总该有些正派的男人。”

“有的。我也认识。可是他们多么可厌！……并且，我还得告诉你：我的社会虽然使我讨厌，可是我觉得，此刻我已经跳不出这个社会了。我已经习惯了。我需要相当的享受，相当高级的奢侈和交际，那不能单靠金钱得到，可也少不了金钱。这种生活当然谈不到什么光辉，我知道。可是我很有自知之明，我是弱者……请你别因为我告诉了你许多没勇气的话而跟我疏远。请你用慈悲的心肠听我说罢。跟你谈谈，我多么快慰！我觉得你是强者，是个健全的人：我完全信任你。给我一点儿友谊，你愿意吗？”

“当然愿意，”克利斯朵夫说。“可是我能帮你什么呢？”

“只要你听我说说，给我一些忠告，给我一些勇气。我常常烦闷得不得了！那时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对自己说：‘奋斗有什么用？烦闷有什么用？这个或那个。有什么相干？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那真是一种可怕的境界。我不愿意掉进去。你帮助我罢！帮助我罢！……”

她垂头丧气，似乎一下子老了十岁；她用着善良的，顺从的，哀求的眼睛，望着克利斯朵夫。他答应了她的要求。于是她又兴奋起来，笑了，快活了。

晚上，她照常有说有笑的卖弄风情。

从这天起，他们之间亲密的谈话变成有规律的了。他们单独在一起，她把心里的愿望告诉他：他很费了点心血去了解她，提供意见；她听着他的劝告，必要时还得听他埋怨，那副严肃与小心的神气活像一个怪听话的女孩子：那对她是种消遣，甚至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依傍；她用感激而风骚的眼神表示谢意。——但她的生活一点没有改变，只是多添了一桩娱乐罢了。

她一天的生活是一组连续不断的变化。早上起身极晚，总在十二点光景，因为她夜里失眠，要到天亮才睡熟。她成天的不作事，只渺渺茫茫的，反复不已的想着一句诗，一个念头，一个念头的片段，谈话的回忆，一句音乐，一个她喜欢的脸庞。从傍晚四五点钟起，她才算完全清醒。在此以前，她总是眼皮厚厚的，面孔虚肿，撅着嘴，不胜困倦的神气。要是来了一个像她一样饶舌，一样爱听巴黎谣言的知己的女朋友，她便马上活跃起来。她们絮絮

不休的讨论着恋爱问题。对于她们，恋爱心理学是和装束，秘史，诽谤这几件事同样谈不完的题目。她们也有一群有闲的青年，需要每天在裙边消磨二三个钟点；这些男人差不多自己也可以穿上裙子；因为他们的谈吐思想简直跟少女的一模一样。克利斯朵夫的出现也有一定的时间：那是忏悔师的时间。高兰德当场会变得严肃，深思。真像英国的史学家包特莱所说的那种法国少女，在忏悔室里“把她镇静的预备好的题意尽量发挥，眉目清楚，有条有理，凡是要说的话都安排得层次分明”。——忏悔过后，她再拚命的寻欢作乐。白天快完了，她可越来越年轻了。晚上她到戏院去；在场子里看到几张永远不变的脸便是她永远不变的乐趣；——因为上戏院去的愉快，并不在于戏剧，而是在于认识的演员，在于已经指摘过多少次而再来指摘一次的他们的老毛病。大家跟那些到包厢里来访问的熟人讲别的包厢里的人坏话，或是议论女戏子，说扮傻姑娘的角色“声带像变了味的芥子酱”，或者说那个高大的女演员衣服穿得“像灯罩一样”。——再不然是大家去赴晚会；到那儿去的乐趣是炫耀自己，要是自己长得俏的话：——（但要看日子而定；在巴黎，一个人的漂亮是最捉摸不定的；）——还有是把对于人物，装束，体格的缺陷等等的批评修正一番。真正的谈话是完全没有的。——回家总是很晚。大家都不容易睡觉（这是一天之中最清醒的时间），绕着桌子徘徊，拿一本书翻翻，想起一句话或一个姿势就自个儿笑笑。无聊透了。苦闷极了。又是睡不着觉。而半夜里，忽然之间来了个绝望的高潮。

克利斯朵夫只看到高兰德几个钟点，对于她的变化也只见到有限的几种，然而他已经莫名其妙了。他私忖她究竟什么时候是真诚的，——是永远真诚的呢还是从来不真诚的。这一点连高兰德自己也说不上来。她和大多数欲望无所寄托而无从发挥的少女一样，完全在黑暗里。她不知道自己是哪种人，因为不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因为她没尝试以前，根本无法知道自己要些什么。于是她依着她的方式去尝试，希望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冒最小限度的危险，同时摹仿周围的人物，假借他们的精神。而且她也不急于要选定一种。她对一切都敷衍，预备随时加以利用。

但像克利斯朵夫这样的一个朋友是不容易对付的，他允许人家不喜欢他，允许人家喜欢他所不敬重甚至瞧不起的人，却不答应人家把他跟那些人一般看待。各有各的口味，是的；但至少得有一种口味。

克利斯朵夫尤其不耐烦的，是高兰德仿佛挺高兴的搜罗了一批他最看不上眼的轻薄少年：都是些令人作呕的时髦人物，大半是有钱的，总之是有闲的，再不然是到什么部里挂个空名的人，——都是一丘之貉。他们全是作家——自以为是作家。在第三共和治下，写作变了一种神经病，尤其是一种满足虚荣的懒惰，——在所有的作品中，文人的工作最难检讨，所以最容易哄骗人。他们对于自己伟大的劳作只说几句很谨慎但是很庄严的话。似乎他们深知使命重大，颇有不胜艰巨之慨。最初，克利斯朵夫因为不知道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姓名而觉得很窘。他怯生生的打听了一下，特别想知道大家尊为剧坛重镇的那一位写过些什么。结果，他很诧异的发见，那伟大的剧作家只写了一幕戏，——还是一部小说的节略，而那部小说又是用一组短篇创作连缀起来的，而且还不能说是短篇，仅仅是他近十年来在同派的杂志上发表的一些随笔。至于别的作家，成绩也不见得更可观：只有几幕戏，几个短篇，几首诗。有几位是靠了一篇杂志文章成名的。又有几位是为了“他们想要写的”一部书成名的。他们公然表示瞧不起长篇大著。他们所重视的仿佛只在

于一句之中的字的配合。可是“思想”二字倒又是他们的口头禅：不过它的意义好似与普通的不一樣：他们的所谓思想是用在风格的细节方面的。他们之中也有些大思想家大幽默家，在行文的时候把深刻微妙的字眼一律写成斜体字，使读者绝对不致误会。

他们都有自我崇拜：这是他们唯一的宗教。他们想教旁人跟着他们崇拜，不幸旁人已经都有了崇拜的目标。他们谈话，走路，吸烟，读报，举首，行礼的方式，似乎永远有群众看着他们。装模作样的做戏原是青年人的天性，尤其在那些毫无价值而一无所事的人。他们花那么多的精神特别是为了女人：因为他们不但对女人垂涎欲滴，并且还要教女人对他们垂涎欲滴。可是遇到随便什么人，他们就得像孔雀开屏一样：哪怕对一个过路人，对他们的卖弄只莫名其妙的瞪上一眼的，他们还是要卖弄。克利斯朵夫时常遇到这种小孔雀，都是些画家，演奏家，青年演员，装着某个名人的模样：或是梵·狄克，或是累姆布朗特，或是范拉士葛，或是贝多芬，或是扮一个角色：大画家，大音乐家，巧妙的工匠，深刻的思想家，快活的伙伴，多瑙河畔的乡下人，野蛮人……他们一边走，一边眼梢里东张西望，瞧瞧可有人注意。克利斯朵夫看着他们走来，等到走近了，使特意掉过头去望着别处。可是他们的失望决不会长久：走了几步，他们又对着后面的行人搔首弄姿了。——高兰德沙龙里的人物可高明得多。他们的做作是在思想方面：拿两三个人做模型，而模型本身也不是什么奇人。再不然，他们在举动态度之间表现某种概念：什么力啊，欢乐啊，怜悯啊，互助主义啊，社会主义啊，无政府主义啊，信仰啊，自由啊等等；在他们心目中，这些抽象的名词仅仅是粉墨登场的时候用的面具。他们有本领把最高贵的思想变成舞文弄墨的玩艺儿，把人类最壮烈的热情减缩到跟时行的领带的作用一样。

他们的天地是爱情，爱情是他们专有的。凡是享乐所牵涉的良心问题，他们无不熟悉；他们各显神通，想出种种新问题来解决。那永远是游手好闲的人的勾当：没有爱情，他们便“玩弄爱情”，特别喜欢解释爱情。他们的正文非常贫弱，注解却非常丰富。最不雅驯的思想都加以社会学的美名，一切都扯上社会学的旗帜。一个人满足恶癖的时候，不管多么愉快，倘使不能同时相信自己是为未来的时代工作，总嫌美中不足。那是纯粹巴黎风的社会主义，色情的社会主义。

在此专谈恋爱问题的小团体中，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是男女在婚姻方面与爱情的权利方面的平等。从前有一般老实的青年，笃厚的，有些可笑的，崇奉新教的，——斯干地那维人或瑞士人，——主张男女道德平等：要求男子在结婚的时候和女子一样的童贞。巴黎的宗教道德学家可主张另外一种平等，淫乱的平等，说女子结婚的时候应该和男子一样的沾满污点，——这是情人权利的平等。巴黎人在幻想上和实际上把奸淫这件事做得太滥了，已经觉得平淡无味：于是文坛上有人发明一种处女卖淫的新玩艺儿，——有规律的，普遍的，端方的，得体的，家族化的，尤其是社会化的卖淫。——最近出版的一部很有才气的书，便是对这个问题的权威。作者在四百页的洋洋巨著中，用一种轻佻的学究口吻，依照经验派的推理方法，研究“处理娱乐的最好的方式”。那真是自由恋爱的最完美的讲义：老是提到典雅，体统，高尚，美，真，廉耻，道德，——可以说是求为下贱的少女们的宝典。——当时这部著作简直是《福音书》，为高兰德和她周围的人添了不少乐趣，同时成为她引经据典的材料。那些怪论里头也有正确的，观察中肯的，甚至合

乎人情的部分；但信徒们的脾气总喜欢把好处丢在一边而只记着最坏的。在这个诱人的花坛中，他们所采的老是最有毒性的花，——例如“肉欲的嗜好一定能刺激你工作的嗜好”；——“一个处女肉欲没有得到满足就做了母爱是最残忍的事”；——“占有一个童贞的男子，对女人是养成一个贤慧的母性最自然的准备”；——“母亲对于女儿的责任，是应该用着和保护儿子的自由同样细腻熨贴的精神，培养她们的自由”，——“必有一日，少女们和情夫幽会归来的态度，会像现在上了课或是参加了女朋友的茶会一样的自然。”

高兰德笑着说这些教训都是极合理的。

克利斯朵夫却痛恨这些论调。他把它们的重要性和害处都夸张了。其实法国人太聪明了，决不会把纸上空谈付诸实行的。他们虚张声势想学做第特洛，骨子里却是和他一样，在日常生活中跟布尔乔亚一样规矩，也和别人一样胆小。而且正因为他们在实际行动上那么胆小，才在思想上把行动推到极端。那是种毫无危险的游戏。

然而克利斯朵夫不是一个附庸风雅的法国人。

高兰德周围的年轻人中，有一个她似乎最喜欢，而在克利斯朵夫心目中不消说是最可厌的。

他是那种暴发户的儿子，搅些贵族派的文学，自命为第三共和治下的贵族。他叫做吕西安·雷维-葛，两只眼睛离得很远，眼神很尖锐，鼻子是往里勾的，金黄的须修成尖尖的，像画家梵·狄克的模样，头发已经未老先衰的秃落，但跟他的尊容很相配，说话很甜，举止潇洒，又细又软的手给人家握在手里仿佛会化掉的。他永远装得彬彬有礼，周到细腻，便是对心里厌恶而恨不得推下海去的人也是如此。

克利斯朵夫在第一次跟着高恩去参加的文人宴会上已经见过他，虽然没交谈，但一听他的声音已经讨厌，当时不懂为什么，到后来才明白。人与人之间有霹雳那样突如其来的爱，也有霹雳那样突如其来的恨，——或者说（为了不要使那些害怕一切热情的柔和的心灵害怕起见，我们且不用这个他们听了刺耳的“恨”字），是健康的人的本能，因为感觉到遇见了敌人而自卫的本能。

在克利斯朵夫面前，他代表那种讥讽与分化溶解的思想，他文文雅雅的，不动声色的，分解正在死去的上一个社会里的一切尊严伟大的东西：分解家庭，婚姻，宗教，国家；在艺术方面是分解一切雄壮的，纯洁的，健全的，大众化的成分；此外还摇动大家对思想、情操、伟人的信念，对一般人类的信念。这种思想实际只是以分析为乐，以冷酷的解剖来满足一种兽性的需要，侵蚀思想的需要，那是蛀虫一般的本能。同时又有一种女孩子的，特别是女作家的癖：因为到了他的手里，一切都是文学或变成文学。他的艳遇，他的和朋友们的恶癖，为他都是文学材料。他写了些小说和剧本，很巧妙的叙述他父母的私生活与秘史，还有朋友们的，他自己的；其中有一桩是他跟一个最知己的朋友的太太的秘史：人物的面目写得极高明，那朋友，那女的，和别的群众，都被描写得很准确。他决不能得到一个女人的青睐或听了她的心腹话而不在书中披露。——照理，这种孟浪的举动应当使他和“女同志们”不欢。事实可并不如此：她们抗议一下，遮遮面子；骨子里可并不发窘，还

因为给人拿去赤裸裸的展览而挺高兴呢；只要脸上留着一个面具，她们就不觉得羞耻了。在他那方面，这种说短道长的话并不表示他存心报复，也许连播扬丑史的用意都没有。他不比一般人更坏：以儿子来说不见得是更坏的儿子，以情夫来说不见得是更坏的情夫。在有些篇幅里，他无耻的揭露他父亲，母亲，和他自己的情妇的隐私；同时又有好些段落，他用着富有诗意的温情谈到他们。实际上他是极有家族观念的，但像他那等人不需要尊重所爱的人；反之，他们倒更喜欢自己能够轻视的人；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对象才跟自己更接近，更近人情。他们对于英勇的精神比谁都不了解，高洁二字尤其无从领会。他们几乎要把这些德性认作谎言，或者是婆婆妈妈的表现。然而他们又深信自己比谁都更了解艺术上的英雄，并且拿出倚老卖老的亲狎的态度批判他们。

他和一般有钱的，游手好闲的，布尔乔亚的堕落的少女最投机。她是她们的一个伴侣，等于一个腐化的女仆，比她们更放肆更机灵，有许多事能够教她们艳羨。她们对他毫无顾忌，尽可把这个任所欲为的，裸体的，不男不女的人仔细研究。

克利斯朵夫不明白一个像高兰德那样的少女，似乎性情高洁，不愿意受生活磨蚀的人，怎么会乐此不疲的跟这种人厮混……克利斯朵夫不懂心理学。吕西安·雷维-葛可深通此道。克利斯朵夫是高兰德的心腹。高兰德却是吕西安·雷维-葛的心腹。这一点就表示他比克利斯朵夫高明。一个女人最得意的是能相信自己在对付一个比她更弱的男子。那时不但她的弱点，便是她的优点——她的母性的本能，也得到了满足。吕西安·雷维-葛看准了这一点：因为使妇人动心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就是去拨弄这根神秘的弦。再加高兰德觉得自己相当懦弱，有些不甚体面但又不愿革除的本能，所以一听这位朋友的自白，（那是他很有心计的安排好的，）她就相信别人原来跟她一样的没出息，对于人类的根性不应当过事诛求，因之她觉得很快慰了。这种快慰有两方面：第一，她不必再把自己认为挺有趣的几种倾向加以抑制；第二，她发觉这样的处置很得当，一个人最聪明的办法是别跟自己别扭，应当对于没法克制的倾向采取宽容的态度。实行这种明哲的办法才不会使人感到一点儿痛苦。

在社会上，表面极端精炼的文明和隐藏在骨子里的兽性之间，永远有个对比，使那些能够冷眼观察人生的人觉得有股强烈的味道。一切的交际场中，熙熙攘攘的决不能说是化石与幽灵，它像地层一般，有两层的谈话交错着：一层是大家听到的，是理智与理智的谈话；另外一层是极少人能够感到的，是本能与本能，兽性与兽性的谈话。大家在精神上交换着一些俗套滥调，肉体却在那里说：欲望，怨恨，或者是好奇，烦闷，厌恶。野兽尽管经过了数千年文明的驯化，尽管变得像关在笼里的狮子一般痴呆，心里可念念不忘的老想着它茹毛饮血的生活。

然而克利斯朵夫的头脑还没冷静到这个程度：那是要年龄大了，热情消失以后才能办到的。他把替高兰德当顾问的角色看得很认真。她求他援助；他却眼看她嘻嘻哈哈的去冒险。所以克利斯朵夫再也不遮掩他对吕西安·雷维-葛的反感了。吕西安·雷维-葛对他先还保持一种有礼的，含讥带讽的态度。他也感觉到克利斯朵夫是敌人，但认为是不足惧的：他只是不动声色的把他变成可笑。其实，只要克利斯朵夫能对他表示钦佩，他就可以表示友好；但他就得不到这种钦佩，他自己也知道，因为克利斯朵夫没有作假的本领。

于是，吕西安·雷维-葛从完全抽象的思想的对立，不知不觉的转变实际的，不露形迹的暗斗，而暗斗的目的物便是高兰德。

她对两位朋友完全一视同仁。她既赏识克利斯朵夫的道德和才具，也赏识吕西安·雷维-葛的极有风趣的不道德和聪明；而且心里还觉得吕西安使她更愉快，克利斯朵夫老实不客气的教训她；她用着可怜巴巴的神气听着他，使他软化。她天性还算好的，但因为懦弱，甚至也因为好心而不够坦白。她一半是在做戏，假装和克利斯朵夫一样思想。她很知道像他这种朋友的价值，但她不肯为了友谊作任何牺牲；不但为了友谊，而且为了无论什么人什么事，她都不愿意有所牺牲；她只挑最方便最愉快的路走。所以她把和吕西安始终来往不断的事瞒着克利斯朵夫。她像上流社会的女子一样凭了从小就学会的本领，若无其事的扯谎；凭了这扯谎的本领，她们才能保持所有的男朋友，使他们个个满意。她替自己辩护说是为了免得克利斯朵夫伤心而不得不如此；其实是因为她明知克利斯朵夫有理而不敢使他知道，也因为她照旧想做她喜欢的事而不要跟克利斯朵夫闹翻。有时克利斯朵夫疑心她捣鬼，便粗声大气的闹起来。她可继续装做痛悔的，诚恳的，伤心的神气，对他做着媚眼，——女人最后的法宝。——她想到可能丧失克利斯朵夫的友谊，的确非常难过，所以竭力装出娇媚的和正经的态度，居然把他软化了一些时候。但那是早晚要爆发的。在克利斯朵夫的气恼里头，不知不觉已经有些嫉妒的成分。高兰德甘言蜜语的笼络也已经有了点儿，很少的一点儿，爱的成分。然而他们分裂的时候，来势倒反因之更猛烈。

有一天克利斯朵夫把高兰德的谎话当场揭穿了，老老实实提出条件来：要她在他跟吕西安之间挑选一个。她先是设法回避这问题，结果却声言她自有权利保留一切她心爱的朋友。不错，她说得对；克利斯朵夫也觉得自己可笑；但他知道他的苛求并非为了自私，而是为了真心爱护高兰德，非把她救出来不可，——即使因之而违拗她的意志也是应该的。所以他很笨拙的坚持着。看到她不回答了，他就说：

“高兰德，你是不是要我们从此绝交？”

“不是的，”她回答。“那我要非常痛苦的。”

“可是你为我们的友谊连一点儿极小的牺牲都不肯作。”

“牺牲！多荒唐的字眼！”她说。“干么老是要为了一件东西牺牲别一件东西？这是基督教的胡闹思想。你骨子里是个老教士，你自己不觉得就是了。”

“而很可能，”他说。“为我，总得挑定一个。善跟恶之间，绝对没有中间地位。”

“是的，我知道；就为这一点我才喜欢你。我告诉你，我的确很喜欢你；可是……”

“可是你也很喜欢另外一个。”

她笑了，对他做着最媚人的眼色，用着最柔和的声音说：“仍旧跟我做朋友罢！”

他差不多又要让步的时候，吕西安进来了，高兰德用同样甜蜜的媚眼同样柔和的声音接待他。克利斯朵夫不声不响的看着高兰德做戏。然后他走了，打定主意和她决裂了。他心里有些难过，老是有所依恋，老是上人家的当，真是太蠢了！

回到寓所，他心不在焉的整理书籍，随便打开圣经，看到下面的一段：

“……我主说：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胸，卖弄眼目，俏步徐行，把脚上的银圈震动得叮 作响，

所以主必使锡安的女子头长秃疮，又使她们赤露下体……”读到这里，他想起高兰德的装腔作势，笑了出来，便心情轻快的睡了。接着他又自以为跟巴黎腐败的风气已经同流合污到相当程度，才会读着圣经觉得好笑。但他在床上反复背着这伟大的恶作剧的审判者的判决，想象这种事要是临到高兰德头上的情景，不禁像孩子般哈哈大笑了一会，睡熟了。他已经不再想到他新的郁闷。多一桩也罢，少一桩也罢……他已经习惯了。

他照常到高兰德家上课，只避免跟她作亲密的谈话。她徒然表示难过，生气，玩种种花样：他始终固执着；两人都不高兴了；终于她自动想出理由来减少课程；他也找出藉口来回避史丹芬家里的晚会。

他已经尝够巴黎社会的味道，再也受不了那种空虚，闲荡，萎靡，神经衰弱，以及无理由、无目标、徒然磨蚀自己的、苛刻的批评。他不懂，一个民族怎么能在这种为艺术而艺术、为享乐而享乐的，死气沉沉的空气中过活。可是这民族的确活在那里，从前有过伟大的日子，此刻在世界上还相当威风；从远处看，它还能引起人家的幻象。它从哪儿找到它生存的意义呢？除了寻欢作乐，它又一无信仰……

克利斯朵夫正想着这些念头的时候，在路上突然撞见一群叫叫嚷嚷的青年男女，拉着一辆车，里面坐着一个老教士向两旁祝福。走了一程，他又看到一些兵拿着刀斧追打一所教堂的大门，门内是一批挂有国家勋章的先生挥舞着桌椅迎接他们。这时他才觉得法国究竟还有所信仰，——虽然他不知道是什么信仰。人家告诉他说，政府与教会共同生活了一百年之后，现在要分离了，可是因为宗教不甘心脱离，政府便凭着它的权利与武力把宗教撵出门外。克利斯朵夫觉得这种办法未免有伤和气；但是巴黎艺术家的那种混乱的玩票作风使他腻烦透了，所以遇到几个人为了什么公案——即使是极无聊的——而打得头破血流也觉得痛快。

他不久又发见这种人在法国为数不少。政见不同的报纸互相厮杀得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一般，天天发表鼓吹内战的文字。固然这不过是叫喊一阵，难得有人真会动手。但也并非没有天真的人把别人所写的原则付诸实行。于是就有奇奇怪怪的景象可以看到：什么某几个州府自称为脱离法国啦，几个联队闹兵变啦，州长公署被焚啦，征收员收税要大队的宪兵保护啦，乡下人烧了开水保卫教堂啦，自由思想者以自由的名义去攻击教堂啦，普渡众生的救主们爬在树上煽动葡萄酒省份去攻击酒精省份啦。东一处，西一处，几百万人磨拳擦掌，嚷得满面通红，结果真的动武了。共和政府先是巴结民众，然后又拔出刀来对付他们。民众却是把自己的孩子——军官与士兵——砍破脑袋。这样，各人都对别人证明自己理由充足，拳头结实。你在远处看，从报纸上看的时候，仿佛又回到了几个世纪以前去了，克利斯朵夫发见这法兰西——事事怀疑的法兰西——竟然是一个偏激若狂的民族。但他不知道究竟在哪方面偏激。为了拥护宗教呢还是反对宗教？为了拥护理性呢还是反对理性？为了拥护国家呢还是反对国家？——简直各方面都是。他们是为了喜欢偏激而显得偏激的。

一天晚上，他偶然和一个有时在史丹芬家碰到的社会党议员交谈。虽然不是初次谈话，他可绝对想不到这位先生的身分，因为他们一向只谈音乐。这一回他才不胜诧异的发觉这位交际家竟是一个激烈政党的领袖。

亚希·罗孙是个美男子，留着金黄的胡子，说话带着喉音，皮色很嫩，态度很诚恳，外表相当风雅，骨子里可是粗俗的，有时会不知不觉的流露出村野的举止：——譬如当众修指甲，跟人说话的时候像平民一样喜欢扯着别人的衣角，摇着别人的胳膊；——他能吃能喝，爱笑爱玩，胃口和兴致完全表示他是民间出身，只想掌握权势；人很灵活，能随着环境与对手随时改变态度，说话虽多，可是经过思索的；他懂得听人家的话，把听来的当场吸收；既有同情心，资质又聪明，对什么都感兴趣，——由于天性，由于社会的熏陶，也由于虚荣心；在某种限度以内他为人规矩诚实，就是说为他的利益用不着不诚实，或是不诚实有危险的时候，他是诚实的。

他有个相当好看的妻子，高大，匀称，非常壮健，身腰很美，艳丽的装束似乎太窄了些，把她肥胖的身体表露得过于明显；脸庞四周围着乌黑的卷发；又黑又浓的大眼睛；下巴微微往上抄起；胖胖的脸蛋很动人，可惜被个不停的近视眼和阔大的嘴巴破坏了。她走路的姿态不大自然，颠颠耸耸，像某几种鸟；说话很做作，但非常殷勤，亲热。她出身是个有钱的经商人家；思想自由，是那种所谓贤淑的女子：凡是上流社会的数不清的责任，她都像奉教一般的信守，另外还履行她自己找来的，艺术的与社会的义务：家里有个沙龙，在平民大学里宣扬艺术，参加慈善团体或研究儿童心理的机构，——可并不怎么热心，也没有浓厚的兴趣，——只是由于天生的慈悲心，由于充时髦，由于知识妇女的那种天真的学究气，仿佛永远背着一项功课，非记得烂熟就有失尊严似的。她需要干点儿事，却不需要对所干的事发生兴趣。这种紧张忙碌的活动，有如那些妇女手里老拿着毛线活儿，一刻不停的搬动着针，似乎救世大业就在这一件毫无用处的工作上。并且她也像编织毛线的女人一样，有那种良家妇女的小小的虚荣心，喜欢拿自己的榜样去教训别的女子。

那位当议员的丈夫心里瞧她不起，可是对她很亲热。他是为了自己的享乐与安宁而挑上她的；在这一点上说，他的确挑得很好。她长得很美，他为之挺得意：这就够了，他再没别的要求；她对他也别的要求。他爱她，同时也欺骗她。她只要他爱着她就算了，也许对于他的私情还觉得相当快慰。因为她生性安静，淫荡，完全是后宫中的妇女性格。

他们有两个美丽的孩子，一个五岁，一个四岁，她以贤妻良母的身分照顾他们，那种专心致志所表示的亲切与冷静，恰好跟她注意丈夫的政治与活动，注意最新的时装与艺术表现一样。在这个环境里，她把前进的理论，颓废的艺术，社交界的忙乱，和布尔乔亚的感情，一古脑儿放在一起，成为最古怪的炒什锦。

他们请克利斯朵夫上他们家去。罗孙太太是个优秀的音乐家，弹得一手好钢琴；手指轻巧而扎实，小小的头对准着键盘，两只手在上面跳来跳去，活像母鸡啄食的神气。她很有天分，比一般法国女子也更有音乐修养，但对

按平民大学于一八九八年创于巴黎，尔后遍及全国：由各界名流教授夜课。该时因特莱弗斯事件发生，一部分知识分子创此机构，意欲借思想的交流而与平民及工人阶级接近。此项运动至一九〇四年以后渐趋衰落，不久即告终止。

于音乐的深刻的意义是像笨蛋一样完全不关心的。那只是她听着的，或是背得一点不错的一组音符，一些节奏，一些微妙的调子罢了；她决不探求其中的心灵，因为她本身就不需要这个。这位可爱的，聪明的，朴实的，很愿意帮助人的太太，对克利斯朵夫像对别人一样很殷勤。可是克利斯朵夫并不感激，对她也没多大好感，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也许他还不知不觉的责备她，不该明知丈夫胡闹而甘心情愿的和那些情妇平分秋色。在所有的缺点中，俯首帖耳的听任摆布是克利斯朵夫最不能原谅的。

他和亚希·罗孙比较亲密。罗孙之爱音乐，正如爱别的艺术一样，方式虽然鄙俗，但很真诚。他爱好一阕交响乐的时候，仿佛恨不得和它睡在一起。他只有一些很浅薄的修养，但运用得很高明；在这一点上，他的妻子对他不无帮助。他对克利斯朵夫发生兴趣，是因为看到克利斯朵夫和他一样是个刚强的平民。并且他很想仔细观察一下这种怪物，——（观察人这件事，他永远不会厌倦的，）——打听一下他对于巴黎的印象。克利斯朵夫直率严厉的批评，使他觉得好玩。他看事情也取着相当的怀疑态度，所以能承认对方的批评是准确的。他不因为克利斯朵夫是德国人而有所顾虑，反而以超越成见自豪。总而言之，他是极富于人情的——（这是他主要的优点）；——凡是合乎人情的，他都表示好感。然而这也不能使他不抱另外一种深切的信念，以为法国人——古老的民族，古老的文明——总是优于德国人，所以他不能不嘲笑这个德国人。

在亚希·罗孙家里，克利斯朵夫又看到些别的政客，过去的或未来的阁员。要是这些名人肯屈尊，他倒很高兴和他们个别的谈谈。和流行的见解相反，他觉得跟这批人来往比他熟悉的文艺界更有意思。他们头脑比较活泼，对于人类的热情和公众的利益更关切。他们能言善辩，大半是南方人，非常爱风雅；个别而论，他们差不多和文人一样风雅。当然，他们欠缺艺术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关于外国艺术的；但他们自命为多少懂一些，而且往往是真的爱好。有些内阁颇像那些办小杂志的文会。阁员中有的写剧本，有的拉提琴，同时是华葛耐迷，有的涂几笔画。他们都蒐集印象派的画，看颓废派的书，有心惊世骇俗，对于跟他们的思想不两立的，同时是极端贵族派的艺术非常欣赏。这些社会党或急进社会党的阁员，代表饥寒阶级的使徒，居然对高级的享受自称为内行，使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不顺眼。当然这是他们的权利，但他觉得这种作风不大光明。

最奇怪的是，这些人物在私人谈话中是怀疑主义者，肉欲主义者，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而一朝有所行动的时候立刻会变成偏激狂。最风雅的人，才上了台就一变而为东方式的小魔王；他们染上了指挥一切干涉一切的瘾：精神上是怀疑派，天生的气质却是极端的专制。拿到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机构，——那是当年最伟大的专制君主一手建立的，——他们就忍不住要加以滥用了。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共和政体的帝国主义，近年来又接种似的加上一种无神论的旧教主义。

在某一个时期内，一般政客只想统治物质——财产，——他们差不多不干涉精神方面的事，因为那是不能变成货币的。而那些优秀的人也不理会政治；不是政治高攀不上他们，就是他们高攀不上政治；在法国，政治被认为工商业的一支，生利的，可是不大正当的；所以知识分子瞧不起政客，政客

也瞧不起知识分子。——可是近来政客和一般腐败的知识阶级始而接近，终于勾结了。一个簇新的势力登了台，自称为对思想界有绝对的支配权：那便是些自由思想家。他们和另一批统治者勾结起来，而这另一批统治者也认为他们是专制政治的完美的工具。他们主要的目的不在于打倒教会，而在于代替教会，事实上他们已经组成一个自由思想的教会，和旧有的教会一样有经典，有仪式，有洗礼，有初领圣餐，有宗教婚礼，有地方主教会议，有全国主教会议，甚至也有罗马的总主教会议。这些成千累万的可怜虫非成群结队就不能“自由的思想”，岂非可笑之尤！而他们所谓的思想自由，其实是假理智之名禁止别人的思想自由：因为他们的信仰理智，有如旧教徒的信仰圣处女，全没想到理智本身并不比圣处女更有意义，而理智真正的根源是在别处。旧教教会有无数的僧侣与会社，潜伏在民族的血管里散布毒素，把一切跟它竞争的生机都加以杀害。现在这反旧教的教会也有它的死党，有虔诚的告密者，每天从法国各地缮成秘密报告送到巴黎总会，由总会详细登记。共和政府暗中鼓励这些自由思想的信徒做间谍工作，使军队，大学，所有的政府机关都充满着恐怖；政府可不觉得他们表面上似乎为它出力，暗地里却在慢慢的篡夺它的地位，而政府也渐渐走上“无神论的神权政治”这条路，不比巴拉圭的那些耶稣会政权更值得羡慕。

克利斯朵夫在罗孙家见过这一派的教会中人。他们都是一个比一个疯狂的拜物教徒。目前，他们因为把基督从神座上摔了下来而大为高兴。打烂了几个木偶，他们便以为已经摧毁了宗教。还有一般人，把圣女贞德和她童贞女的旗帜从旧教手里夺过来，把圣女贞德独占了。新教会中一个教士，和旧教会的信徒作战的将军，发表了一篇反教会的，颂扬古高卢民族领袖范尔生依多利克斯的演说，同时一般自由思想的人给这位平民英雄立了一座像，认为他是法兰西对抗罗马（罗马教会）的第一人。海军部长为了整肃舰队，气气旧教徒，把一条巡洋舰命名为“欧纳斯德·勒南”。另外一批自由思想家则努力于净化艺术的工作。他们把十七世纪的古典文学加以消毒，不许有上帝这个名词褻渎拉·风丹纳的《寓言》。便是在古代音乐里，他们也不许有神的名字存在。克利斯朵夫听见一个老年的急进党员——（歌德说过：老年人而做急进党员是疯癫之尤。）——因为人家胆敢在一个通俗音乐会里排入贝多芬颂扬宗教的歌而大为愤慨，一定要人家把辞句更改过。

还有一般更急进的分子，要求把一切宗教音乐和教授宗教音乐的学校加以取缔。一个在当时那样不懂艺术的人中被认为鉴赏力极高的美术司长，竭力解释说，对于音乐家至少得教以音乐，因为“你派一个兵到军营里去的时候，你总得逐步逐步教他如何用枪，如何放射。年轻的作曲家的情形也是一样，脑子里装满了思想，可是没法安排”。然而这种解释是白费的：他对于自己的勇气也有点吃惊，所以每一句都得附带声明：“我是一个老自由思想家”，“我是一个老共和党人”，才敢接下去宣称：“我不问班尔葛兰西的作品是歌剧是弥撒祭乐；只问是不是人类艺术的产物。”——但对方面用着专

南美洲之巴拉圭，于一六七至一七六七年曾受基督旧教中的耶稣会派统治。

范尔生依多利克斯（纪元前72年至纪元后46年）为高卢族反抗凯撒大帝的领袖。此处言“法兰西对抗罗马（罗马教会）”，乃作者有意讽刺当时的反教会派牵强附会。文中所言立像，乃指一九〇三年立于法国南方格莱蒙-法朗城之范氏雕像。

按勒南早年为诚信的旧教徒，后研究哲学而不信宗教，著有《耶稣传》，认为耶稣只是一个非常的人。

断的逻辑回答这个“老自由思想家”，“老共和党人”说：“音乐有两种：一种是在教堂里唱的，一种是在教堂以外唱的。”前者是理智与国家的仇敌；为了国家的利益，非取缔不可。

要是这些混蛋后面没有一般真有价值而和他们一样——或许更甚——狂热的理智信徒做后盾，那么他们还不过是可笑而不致有多大危险。托尔斯泰曾经提到控制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的“传染病一般的影响”，这种“荒谬的影响，人们只有在摆脱之后才会发见它的疯狂，在受它控制的时期内始终认为千真万确，简直毋庸讨论”。例如对于郁金香的风魔，相信巫祝，误入歧途的文学风气等等。——理智的宗教也是这种疯狂之一。而且从愚蠢的到有知识的，从众议院的兽医到大学里最优秀的思想家，全染上了这种疯狂。而大学教授入迷比愚夫愚妇入迷更危险：因为这种风魔在没有知识的人还容易和一种愚妄的乐天气息相混，从而减少风魔的力量；知识分子的生命力可是被疯狂束缚住了，同时，偏激的悲观主义又使他们明白天性和理智是根本抵触的东西，所以更热烈的支持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正义”，抽象的“真理”，跟恶劣的天性斗争。这种态度骨子里就是加尔文派，扬山尼派，雅各宾党的理想主义，就是那个古老的信念，以为人类的邪恶是不可救药的，只能够、也应当由受到理智感应的，——就是得到神灵启示的——选民，凭着他们的高傲来消灭那种邪恶。那真是地道的法国人中的一种，代表聪明而不近人情的法国人。他像块石子，像铁一般硬，什么都钻不进去；而他碰到什么就砸破什么。

克利斯朵夫在亚希·罗孙家和这一类疯狂的理论家一谈之下，完全给搅糊涂了。他对于法国的观念也动摇了。他依着流行的见解，以为法国人是个冷静的，容易相处的，宽容的，爱自由的民族。不料他发见了一批狂人，没头没脑的死抓着抽象的观念和逻辑，为了自己的任何一套三段论法，老是预备把别人作牺牲品。他们嘴里一刻不停的说着自由，可是没有人比他们更不懂自由，更受不了自由的。无论哪里，你找不到比他们更冷酷更残暴的专制脾气，而这种专制纯粹是为了理智方面的风魔，或者是为了要表示自己永远是对的。

一个党派如此，所有的党派无不如此。只要越出了他们政治的或宗教的钦定程式，越出了他们的国家或省分，越出了他们的团体和他们狭隘的头脑，那就不管是在这方面的还是在那方面的，他们便一律不愿意看见。有一般反对犹太人的，痛恨一切有钱人的人，因为恨犹太人，就把自己所恨的人都叫做犹太人。有些国家主义者恨——（逢到他们心地慈悲的时候是瞧不起）——一切别的国家，便在本国之内把跟他们意见不合的人统称为外国人，叛徒，卖国贼。有些反对新教的人，相信所有的新徒都是英国人或德国人，恨不得把他们一齐逐出法国。有些西方人，对于莱茵河以东的，无论什么都要排斥；有些北方人，对于洛阿河以南的，无论什么都表示唾弃；有些南方人，认为洛阿河以北的都是野蛮的；还有以属于日耳曼族为荣的，以属于高卢族为荣的；而一切的疯子中最疯的，还有那些“罗马人”，以他们祖先的败北为荣；还有布勒塔尼人，荷兰人……总而言之，各人只承认自己的一套，“自己”

郁金香自十六世纪末流入欧洲后，种植郁金香成为民间极普遍的一种癖好。

扬山尼派为十七世纪旧教中的一个小宗派，盛行于法国，根据荷兰扬山尼主教人性本恶之学说，倡为一种极严格的道德及神学宗派。雅各宾党系指大革命时以劳白斯比哀为首的最左倾的一派。

简直是个贵族的头衔，绝对不答应别人跟自己不一样。对于这种民族是无法可想的：你跟他们讲什么理，他们都不理会；他们天生是要烧死别人，或是被别人烧死的。

克利斯朵夫心里想，这样一个民族幸亏采用了共和政体，使那些小型的暴君可以你消灭我，我消灭你。可是其中要有一个做了主的话，恐怕谁也没有多少空气可以呼吸了。

他不知道凡是多议论的民族自有一种德性来救他们，——就是矛盾。

法国的政客就是这样。他们的专制主义被无政府主义冲淡了；他们永远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要是他们在左边靠思想界的偏激狂作依傍，那末在右边一定靠思想界的无政府主义者作依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玩票式的社会主义者，猎取仅位的小政客，他们在仗没有打胜以前决不参加作战，可是追隨在“自由思想”的队伍后面，每逢它打了一次胜仗，便一齐扑在打败的人的遗骸上面。拥护理智的人并非为了理智而努力……“理智啊，这不是为了你”……乃是为那些国际化的渔利主义者；而他们兴高采烈的践踏本国的传统，摧毁一种信仰，也并非为了要代以另一种信仰，而是要把他们自己填补上去。

在此，克利斯朵夫又碰到了吕西安·雷维-葛。他得悉吕西安是社会党员的时候并不怎么惊奇，只想到社会主义一定是有了成功的希望，吕西安才会加入社会党。他可不知道吕西安神通广大，在敌党中同样受到优待，并且跟反自由色彩、甚至反犹太色彩最浓的政客与艺术家结为朋友。

“你怎么能容留这等人物在团体里的？”克利斯朵夫问亚希·罗孙。

罗孙回答说：“噢！他多有才干！而且他为我们工作，他毁坏旧世界。”

“不错，他是在毁坏，”克利斯朵夫说。“他毁坏得那么厉害，我不知道你们将来用什么来建设，你有把握留下的梁木足够建造你们的新屋子吗？蛀虫已经钻进你们的建筑工场了。”

然而社会主义的蛀虫不止吕西安一个。社会党的报纸上充满着这些小文人，这些“为艺术而艺术”的家伙，装点门面的无政府主义者，把所有的进身之阶都霸占了。他们拦着别人的路，在号称民众喉舌的报纸上，长篇累牍的宣传他们那套颓废的风雅论调，以及“为生存的斗争”。他们有了位置还不够，还得有荣誉。急急忙忙赶造起来的雕像，颂赞石膏天才的演说，其数量之多超过任何一个时代。一般以捧场为业的人，按期举行公宴来祝贺自己党派中的伟人，不是祝贺他们的工作，乃是祝贺他们的受勋：因为这才是他们最感动的。美学家，超人，外侨，社会党的阁员，都一致同意，受到拿破仑创立的勋位是应该庆贺的。

罗孙看到克利斯朵夫的诧异不由得笑开了。他并不以为这个德国人把他党里的人批评得过于苛刻。他自己和他们单独相处时也毫不客气。他们的胡闹与狡猾，他比谁都明白；但他照旧支持他们，因为要他们支持自己。他私下固然会用着轻蔑的辞句谈论民众，一登讲坛却立刻变了一个人。他提高了嗓子，逼尖着声音，带点儿鼻音，每个字都咬得清楚有力，很庄严的，一忽儿用颤音，一忽儿咩咩的像羊叫，做着大开大合，有点抖动的手势，像翅膀一样：活脱是个第一流的戏子。

克利斯朵夫想弄个明白，罗孙对他的社会主义究竟相信到什么程度。显

法国一般的勋位均称荣誉团勋位。此制创始于拿破仑。

而易见，骨子里他是完全不信，他怀疑主义的气息太重了。但他有一部分的思想是相信的；虽然他明知不过是一部分——（并且还不是顶重要的一部分），——他可把自己的生活与行为都根据了这一点来安排，因为这样对他更方便，这信仰不但跟他的实际利益有关，并且李涉到他生存的兴趣，生存与行动的意义。他的相信社会主义是把它当作一种国教的。——大多数的人都是过的这种生活。他们的生命不是放在宗教信仰上，就是放在道德信仰上，或是社会信仰上，或是纯粹实际的信仰上，——（信仰他们的行业，工作，在人生中扮演的角色，）——其实他们都不相信。可是他们不愿意知道自己不相信：为了生活，他们需要有这种表面上的信仰，需要有这种每个人都是教士的公认的宗教。

罗孙还不是顶要不得的一个。党里头拿社会主义或急进主义作工具的人不知有多少！——简直说不上是为了野心，因为他们的野心也是目光太短，只限于立刻捞钱和重新当选。那些人仿佛真相信有个新社会似的。也许他们从前是相信的；但事实上他们只扒在垂死的社会身上，靠它来养活自己。短视的机机会义替享乐的虚无主义当差。未来的社会福利，为了眼前的自私而被牺牲了。因为要博取选民的欢心，人们把军队支解了，还恨不得把国家都瓜分了。他们所缺少的决不是聪明：大家很知道应该怎么做，可是因为太费力而不去做。人人都想以事半功倍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上上下下的道德信条都是一样：花最少限度的气力博取最大限度的快乐。这种不道德的道德，便是政治混乱的社会中唯一的纲领。政府的领袖们做出无政府的榜样，政策是乱七八糟的，同时追求着十几只兔子，结果是一只一只的放弃了：外交部在主战，陆军部在高唱和平，还为了肃军而破坏军队，海军部长挑拨兵工厂工人，军事教官宣传非战论，此外是一般业余性质的军官，业余性质的推事，业余性质的革命党员，业余性质的爱国分子。政治风纪是普遍的解体了。人人希望国家给他们职位，养老金，勋位；国家也的确不忘记敷衍它的顾客，把大家眼红的荣誉和差事赠送当权的人的儿子们，侄子们，侄孙们，奴仆们。议员投票表决增加自己的俸给。国库，职位，头衔，国家所有的资源都被挥霍滥用了。——上面既然有了这种榜样，下面就像凄厉的回声一般发生许多怠工的现象：小学教员教人反叛国家，邮局职员焚烧电信，工人把砂土和金刚砂放在机器的齿轮里，造船所工人捣毁造船所，焚烧船舶，工人大规模的破坏自己工作的成绩，——不是损害有钱的人，而根本是损害社会的财富。

最后，一般优秀的知识阶级认为一个民族这样的自杀于法于理均无不合，因为人类爱怎样追求幸福就可怎样追求，那是他神圣的权利。一种病态的人道主义把善与恶的区别给取消了，认为罪犯是“不负责任的，并且是神圣的”，应该加以怜悯；它对罪恶完全表示妥协，把社会交给它摆布。

克利斯朵夫心里想：

“法国是被自由灌醉了。它发了一阵酒疯之后，不省人事的昏了过去。将来醒过来的时候，恐怕它已经给关在牢里了。”

对于这种笼络群众的政治，克利斯朵夫最气恼的是，那些最可恶的强暴的手段，竟是一般胸无定见的人很冷静的干出来的。他们那种游移不定的性格，和他们所做的或允许人家做的粗暴的行为，实在太不相称了。他们身上似乎有两种矛盾的元素：一方面是惶惑无主的性格，对什么都不信；一方面是喜欢推敲的理智，什么话都不愿意听而把人生搅得天翻地覆。克利斯朵夫不懂那些心平气和的布尔乔亚，那些旧教徒，那些军官，怎么受尽了政客的

欺侮而不把他们摔出窗外。既然克利斯朵夫什么都不能藏在肚里，罗孙便很容易猜到他的思想。他笑着说：

“当然，要是碰到了你跟我，他们的确是要被摔出去的。可是跟他们，决没有这个危险。那都是些可怜虫，没有勇气下什么决心，唯一的本领只有回骂几句。那些智力衰退的贵族，在俱乐部里混得糊里糊涂了，只会向美国人或犹太人卖俏，并且为了表示时髦，对于人家在小说和戏剧中给他们扮的那种可耻的角色，觉得挺有意思，还要把侮辱他们的人请去做上宾。至于容易生气的布尔乔亚，他们什么书都不读，什么都不懂，不愿意懂，只会平白地把一切批评得一文不值，话说得很尖刻，实际上一点儿效果都没有，——他们只有一宗热情：就是躺在钱袋上睡觉，痛恨扰乱他们好梦的人，甚至也痛恨那些作工的人；因为呼呼睡熟的时候有人动作，当然是打搅他们的！……如果你认得了这一般人，你就会觉得我们是值得同情的了……”

然而克利斯朵夫对这些人那些人同样的不胜厌恶；他不承认因为被虐待的人卑鄙，所以虐待人家的人的卑鄙就可以得到原谅。他在史丹芬家时常遇到那种有钱的，无精打采的，正如罗孙所形容的布尔乔亚：

……愁容惨淡的灵魂，
没有毁谤，也没有赞扬……

罗孙和他的朋友们不但十拿九稳的知道自己能支配这些人，并且十拿九稳的觉得自己尽有权力对他们为所欲为：这理由克利斯朵夫是太明白了。罗孙他们并不缺少统治的工具。成千成万没有意志的公务员，闭着眼睛由着他们指挥。谄媚逢迎的风气；徒有其名的共和国，社会党的报纸看到别国的君主来聘问就大为得意；奴才的精神，一见头衔、金钱、勋章，就五体投地：要笼络他们，只消丢一根骨头给他们咬咬，或是给他们几个勋章挂挂就得了。要是有个王肯答应把法国人全部封为贵族，法国所有的公民都会变成保王党的。

政客们的机会很好。一七八九年以来的三个政体：第一个被消灭了；第二个被废黜了，或被认为可疑；第三个志得意满的睡熟了。至于此刻方在兴起的第四个政府，带着又嫉妒又威胁的神气，也不准加以利用。衰微的共和政府对付它，就跟衰微的罗马帝国对付它无力驱逐的野蛮部落一样，用着招抚改编的方法，而不久他们也变了现政府最好的看家狗，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布尔乔亚阁员，很狡猾的把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分子勾引过来，加以并吞，把无产阶级党派弄成群龙无首，没有领袖的局面，自己则吸取平民的新血液，再把布尔乔亚的意识灌输给平民算做回敬。

在布尔乔亚并吞平民的许多方式中，最妙的一种是那些平民大学。那是“无所不通”的知识杂货铺。据课程纲要所载，平民大学所教的“包括各部门的知识，物理方面的，生物方面的，社会学方面的：天文学，宇宙学，人类学，人种学，生理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地理学，语言学，美学，伦

一七八九年以后的三个政体，当系指第一共和（即大革命以后的，1792—1804），第二共和（即路易·腓列伯下台以后，1848—1852），及第三共和（普法战争以后，1870年9月起直至二次大战被德国侵入为止）。此所谓第四个政权，当系暗指劳工及平民阶级的抬头。

理学……”花样之多，便是毕克·特·拉·弥朗台尔那样的头脑也装不下。

当然，平民大学初办的时候的确有一种真诚的理想，有个伟大的愿望，想把真、美、善普及大众；现在某些平民大学也还存着这个理想。工人们作了一天工之后，跑来挤在闷塞的讲堂里，表示他们求知的渴望胜过了疲劳：这是何等动人的景象。但人们又怎样的利用他们！除了少数聪明而有人性的真正的使徒，用意极好而不善于应付的善良的心以外，多多少少全是一般愚妄的，饶舌的，玩手段的家伙，没有读者的作家，没有听众的演说家，教授，牧师，钢琴家，批评家，拿自己的出品把民众淹没了。各人都在推销自己的货物。最能叫座的自然是那些卖膏药的，那些玄学大师，搬出许许多多老生常谈，未了再归结到一个社会的天堂。

极端贵族的唯美主义，例如颓废派的版画，诗歌，音乐，也在平民大学里找到了出路。大家希望平民对思想界发生一些返老还童的作用，促成民族的新生。可是人们一开头先把布尔乔亚所有雕琢纤巧的玩艺儿，像疫苗似的种在平民的血里！而平民也不胜贪馋的吸收进去，并非为了喜欢，而是因为那些都是布尔乔亚的东西。克利斯朵夫有一次跟着罗孙太太到一所平民大学会，在迦勃里哀·福莱的美妙的歌和贝多芬晚期的一阕四重奏之间，听她对着平民弹奏特皮西。他自己对贝多芬晚年的作品还是经过了许多年，趣味与思想起了许多变化方始了解的；这时他不禁怀着怜悯的心问一个邻座的人：“你竟懂得这个吗？”

那位邻人立刻把脖子一挺，像一只发怒的公鸡似的，回答说：“当然！干么我就不能像你一样的了解？”

为了证明他的了解，他更用着挑战的神气望着克利斯朵夫，哼着一段赋格曲。

克利斯朵夫吃了一惊，赶紧溜了，心里想这些畜生竟把民族的生机都毒害了；哪里还有什么平民！

“你才是平民！”一个工人对一个想创办平民戏院的热心人说。“我吗，我可是跟你一样的布尔乔亚！”

一个幽美的黄昏，软绵绵的天空罩在黑洞洞的都城上面，像一张强烈的色彩已经黯淡的东方地毯。克利斯朵夫沿着河滨大道从圣母寺往安伐里特宫走去。夜色苍茫中，大寺上面的两座钟楼仿佛摩西在战争中高举的手臂。小圣堂顶上的金箭，带着神圣的荆棘，高耸在万家屋舍之上。对岸，卢佛宫的窗子在夕照中闪出最后的微光，还显得有点儿生气。安伐里特广场的尽头，在威严的壕沟与围墙后面，在气概非凡的空地上，阴沉的金色穹窿高悬在那里，仿佛一阕交响乐，纪念那些年代久远的胜利。高岗上的凯旋门，像英雄进行曲似的，替帝国军团的行列开路。

克利斯朵夫忽然觉得这些很像一个已经死了的巨人，在平原上伸展着巨大的四肢。他心惊肉跳，停了下来，怅然望着这些其大无比的化石，想起那个已经绝迹的，地球上曾经听见它脚声的传奇式的种族，——安伐里特的穹窿好比它的冠冕，卢佛的宫殿好比它的腰带，大寺顶上无数的手臂似乎想

意大利的毕克·特·拉·弥朗台尔（1463—1494）为历史上有名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博学家。

按我特式建筑的教堂，正面钟楼上往往有下粗上细的极长的八角形柱作为结顶，末梢则为箭形。而八角形的长柱四周饰有树叶与枝条等作为装饰，此处称神圣的荆棘，乃言此种树叶枝条之装饰象征基督荆冠上之荆棘。小圣堂在今巴黎法院侧，建于十三世纪，与巴黎圣母院相距不远。

抓握青天，拿破仑凯旋门的两只威武的脚踏着世界，而如今只有一些侏儒在它的脚跟底下熙熙攘攘。

克利斯朵夫虽然自己不求名，却也在高恩和古耶带他去的巴黎交际场中有了点小名气。他的奇特的相貌，——老是跟他两位朋友之中的一个在新戏初演的晚上和音乐会中出现，——极有个性那种丑陋，人品与服装的可笑，举止的粗鲁，笨拙，无意中流露出来的怪论，琢磨得不够的，可是方面很广很结实的聪明，再加高恩把他和警察冲突而亡命法国的经过到处宣传，说得像小说一样，使他在这个国际旅馆的大客厅中，在这一堆巴黎名流中，成为那般无事忙的人注目的对象。只要他沉默寡言，冷眼旁观，听着人家，在没有弄清楚以前不表示意见，只要他的作品和他真正的思想不给人知道，他是可以得到人家相当的好感的。他没法待在德国是法国人挺高兴的事。特别是克利斯朵夫对于德国音乐的过激的批评，使法国音乐家大为感动，仿佛那是对他们法国音乐家表示敬意。——（其实他的批评是几年以前的，多半的意见现在已经改变了：那是他从前在一份德国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被高恩把其中的怪论加意渲染而逢人便说的。）——大家觉得克利斯朵夫很有意思，并不妨碍别人，又不抢谁的位置。只要他愿意，他马上可以成为文艺小圈子里的大人物。他只要不写作品，或是尽量少写，尤其不要让人听到他的作品，而只吸收一些古耶和古耶一流的人的思想。他们都信守着一句有名的箴言，当然是略微修正了一下：

我的杯子并不大；……可是我……在别人的杯子里喝。

一个坚强的性格，它的光芒特别能吸引青年，因为青年只斤斤于感觉而不喜欢行动的。克利斯朵夫周围就不少这等人：普通都是些有闲的青年，没有意志，没有目的，没有生存的意义，怕工作，怕孤独，永远埋在安乐椅里，出了咖啡馆，就得上戏院，想尽方法不要回家，免得面对面看到自己。他们跑来，坐定了，几个钟点的瞎扯，尽说些无聊的话，结果把自己搅得胃胀，恶心，又像饱闷，又像饥饿，对那些谈话觉得讨厌极了，同时又需要继续下去。他们包围着克利斯朵夫，有如歌德身边的哈叭狗，也有如“等待机会的幼虫”，想抓住一颗灵魂，使自己不至于跟生命完全脱节。

换了一个爱虚荣的糊涂蛋，受到这些寄生虫式的小喽啰捧场也许会很喜欢。可是克利斯朵夫不愿意做人家的偶像。并且这些崇拜他的人自作聪明，把他的行为看做含有古怪的用意，什么勒南派，尼采派，神秘派，两性派等等，使克利斯朵夫听了大为气愤。他把他们一齐撵走了。他的性格不是做被动的角色的。他一切都以行动为目标：为了了解而观察，为了行动而了解。他摆脱了成见，什么都想知道，在音乐方面研究别的国家别的时代的一切思想的形式和表情的方法。只要他认为是真实的，他都拿下来。他所研究的法国艺术家都是心思灵巧的发明新形式的人，殚精竭虑，继续不断的做着发明工作，却把自己的发明丢在半路上。克利斯朵夫的作风可大不相同：他的努力并不在于创造新的音乐语言，而在于把音乐语言说得更有力量。他不求新奇，只求自己坚强。这种富于热情的刚毅的精神，和法国人细腻而讲中庸之道的天才恰好相反。他瞧不起为风格而求风格。法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在他眼里不过是高等的巧匠。在巴黎最完美的诗人中间，有一个曾经立过一张“当代法国诗坛的工作表，详列各人的货物，出品或薪饷”；上面写的有“水晶烛台，东方绸帛，金质纪念章，古铜纪念章，有钱的寡妇用的花边，上色的

塑像，印花的珐琅……”同时指出哪一件是哪一个同业的出品。他替自己的写照是“蹲在广大的文艺工场的一隅，缀铺着古代的地毯，或擦着久无用处的古枪”。——把艺术家看作只求技术完满的良工巧匠的观念，不能说不美，但不能使克利斯朵夫满足。他一方面承认他职业的尊严，但对于这种尊严所掩饰的贫弱的生活非常瞧不起。他不能想象一个人能为写作而写作。他不能徒托空言而要言之有物。

“我说的是事实，你说的是空话……”

克利斯朵夫有个时期只管把新天地中的一切尽量吸收，然后精神突然活跃起来，觉得需要创作了。他和巴黎的格格不入，对他的个性有种刺激的作用，使他的力量加增了好几倍。在胸中泛滥的热情非表现出来不可。各式各样的热情都同样迫切的要求发泄。他得锻炼一些作品，把充塞心头的爱与恨一齐灌注在内；还有意志，还有舍弃，一切在他内心相击相撞而具有同等生存权利的妖魔，都得给它们一条出路。他写好一件作品把某一股热情苏解，——（有时他竟没有耐性完成作品，）——又立刻被另外一股相反的热情卷了去。但这矛盾不过是表面的；虽然他时时刻刻在变化，精神是始终如一。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走向同一个目标的路。他的灵魂好比一座山：他取着所有的山道爬上去；有的是浓荫掩蔽，迂回曲折的；有的是烈日当空，陡峭险峻的；结果都走向那高踞山巅的神明。爱，憎，意志，舍弃，人类一切的力兴奋到了极点之后，就和“永恒”接近了，交融了。所谓“永恒”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不论是教徒，无神论者，是无处不见生命的人，是处处否定生命的人，是怀疑一切，怀疑生亦怀疑死的人，——或者同时具有这些矛盾像克利斯朵夫一般的人。所有的矛盾都在永恒的“力”中间融和了。克利斯朵夫所认为重要的，是在自己心中和别人心中唤醒这个力，是抱薪投火，燃起“永恒”的烈焰。在这妖艳的巴黎的黑夜中，一朵巨大的火花已经在他心头吐放。他自以为超出了一切的信仰，不知他整个儿就是一个信仰的火把。

然而这是最容易受法国人嘲笑的材料。一个风雅的社会最难宽恕的莫过于信仰；因为它自己已经丧失信仰。大半的人对青年的梦想暗中抱着敌视或讪笑的心思，其实大部分是懊丧的表现，因为他们也有过这种雄心而没有能实现。凡是否认自己的灵魂，凡是心中孕育过一件作品而没有能完成的人，总是想：

“既然我不能实现我的理想，为什么他们就能够呢？不行，我不愿意他们成功。”

像埃达·迦勃勒 一流的，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他们暗中抱着何等的恶意，想消灭新兴的自由的力量；用的是何等巧妙的手段，或是不理不睬，或是冷嘲热讽，或是使人疲劳，或是使人灰心，——或是在适当的时间来一套勾引诱惑的玩艺……

这种角色是不分国界的。克利斯朵夫因为在德国碰到过，所以早已认识了。对付这一类的人，他是准备有素的。防御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先下手为强；只要他们来亲近他，他就宣战，把这些危险的朋友逼成仇敌。这种坦白的手段，为保卫他的人格固然很见效，但对于他艺术家的前程决不能有什么

帮助。克利斯朵夫又拿出他在德国时候的那套老办法。他简直不由自主的要这么做。只有一点跟从前不同：他的心情已经变得满不在乎，非常轻松。

只要有人肯听他说话，他就肆无忌惮的发表他对法国艺术界的激烈的批评，因之得罪了許多人。他根本不想留个退步，像一般有心人那样去笼络一批徒党做自己的依傍。他可以毫不费力的得到别的艺术家的钦佩，只消他也钦佩他们。有些竟可以先来钦佩他，唯一的条件是大家有来有往。他们把恭维这回事看做放债一样，到了必要的时候可以向他们的债务人，受过他们恭维的人，要求偿还。那是很安全的投资。——但放给克利斯朵夫的款子可变了倒账。他非但分文不还，还没皮没脸的把恭维过他作品的人的作品认为平庸鄙陋。这样，他们嘴里不说，心里却怀着怨恨，决意一有机会便如法炮制，回敬他一下。

在克利斯朵夫做的许多冒失事中间，有一桩是跟吕西安·雷维-葛作战。他到处遇到他，而对于这个性情柔和的，有礼的，表面上完全与人无损，反显得比他更善良，至少比他更有分寸的家伙，克利斯朵夫没法藏起他过于夸张的反感。他逗吕西安讨论，不管题目如何平淡，克利斯朵夫老是会把谈锋突然之间变得尖锐起来，使旁听的人大吃一惊。似乎克利斯朵夫想出种种藉口要跟吕西安拚个你死我活；但他始终伤不到他的敌人。吕西安机灵之极，即使在必败无疑的时候，也会扮一个占上风的角色；他对付得那么客气，格外显出克利斯朵夫的有失体统。克利斯朵夫的法文说得很坏，夹着俗话，甚至还有相当粗野的字眼，像所有的外国人一样早就学会而用得不恰当的，自然攻不破吕西安的战术了。他只是愤怒非凡的跟这个冷嘲热讽的软绵绵的性格对抗。大家都派他理屈，因为他们并看不出克利斯朵夫所隐隐约约感觉到的情形：就是说吕西安那种和善的面目是虚伪的，因为遇到了一股压不倒的力量而想无声无息的使它窒息。吕西安并不急，跟克利斯朵夫一样等着机会：不过他是等机会破坏，克利斯朵夫是等机会建设。他毫不费力的使高恩和古耶对克利斯朵夫疏远了，好似前此使克利斯朵夫慢慢的跟史丹芬家疏远一样。他使他完全孤立。

其实克利斯朵夫自己也在努力往孤立的路上走。他教谁都对他不满意，因为他不属于任何党派，并且还进一步反对所有的人。他不喜欢犹太人，但更不喜欢反犹太的人。这般懦怯的多数民族反对强有力的少数民族，并非因为这少数民族恶劣，而是因为它强有力；这种妒忌与仇恨的卑鄙的本能使克利斯朵夫深恶痛绝。结果是犹太人把他当做反犹太的；而反犹太的把他当做犹太人。艺术家则又认为他是个敌人。克利斯朵夫在艺术方面不知不觉把自己的德国脾气表现得特别过火。和某种只求感官的效果而绝不动心的巴黎乐派相反，他所加意铺张的是强烈的意志，是一种阳刚的，健全的悲观气息。表现欢乐的时候又不讲究格调的雅俗，只显出平民的狂乱与冲动，使提倡平民艺术的贵族老板大起反感。他所用的形式是粗糙的，同时也是繁重的。他甚至矫枉过正，有意在表面上忽视风格，不求外形的独创，而那是法国音乐家特别敏感的。所以他拿作品送给某些音乐家看的时候，他们也不细读，就认为它是德国最后一批的华葛耐派而表示瞧不起，因为他们是一向讨厌华葛耐派的。克利斯朵夫却毫不介意，只是暗中好笑，仿着法国文艺复兴期某个很有风趣的音乐家的诗句，反复念道：

.....

得了罢，你不必慌，如果有人说：
这克利斯朵夫没有某宗某派的对位，
没有同样的和声。
须知我有些别人没有的东西。

可是等到他想把作品在音乐会中演奏的时候，就发见大门紧闭了。人们为了演奏——或不演奏——法国青年音乐家的作品已经够忙了，哪还有位置来安插一个无名的德国人？

克利斯朵夫绝对不去钻营。他关起门来继续工作。巴黎人听不听他的作品，他觉得无关重要。他是为了自己的乐趣而写作，并非为求名而写作。真正的艺术家决不顾虑作品的前途。他像文艺复兴期的那些画家，高高兴兴的在屋子外面的墙上作画，虽然明知道十年之后就会荡然无存。所以克利斯朵夫是安安静静的工作着，等着时机好转；不料人家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帮助。

那时克利斯朵夫正跃跃欲试的想写戏剧音乐。他不敢让内心的抒情成分自由奔放，而需要把它限制在一些确切的题材中间。一个年轻的天才，还不能控制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真面目的人，能够定下界限，把那个随时会溜掉的灵魂关在里头当然是好的。这是控制思潮必不可少的水闸。——不幸克利斯朵夫没有一个诗人帮忙；他只能从历史或传说中间去找题材来亲自调度。

几个月以来在他脑中飘浮的都是些圣经里的形象。母亲给他作为逃亡伴侣的圣经，是他的幻梦之源。虽然他并不用宗教精神去读，但这部希伯莱民族的史诗自有一股精神的力，更恰当的说是有一股生命力，好比一道清泉，可以在薄暮时分把他被巴黎烟熏尘污的灵魂洗涤一番。他虽不关心书中神圣的意义，但因为他呼吸到犷野的大自然气息和原始人格的气息，这部书对他还是神圣的。诚惶诚恐的大地，中心颤动的山岳，喜气洋溢的天空，猛狮般的人类，齐声唱着颂歌，把克利斯朵夫听得出神了。

在圣经中他最向往的人物之一是少年时代的大卫。但他心目中的大卫并非露着幽默的微笑的翡冷翠少年，或神情紧张的悲壮的勇士，像范洛几沃与弥盖朗琪罗表现在他们的杰作上的：他并不认识这些雕塑。他把大卫想象做一个富有诗意的牧人，童贞的心中蕴藏着英雄的气息，可以说是种族更清秀，身心更调和的，南方的西葛弗烈特。——因为克利斯朵夫虽然竭力抵抗拉丁精神，其实已经被拉丁精神渗透了。这不但是艺术影响艺术，思想影响艺术，而是我们周围的一切——人与物，姿势与动作，线条与光——的影响。巴黎的精神气氛是很有力量的，最倔强的性格也会受它感化，而德国人更抵抗不了：他徒然拿民族的傲气来骄人，实际上是全欧洲最容易丧失本性的民族。克利斯朵夫已经不知不觉感染到拉丁艺术的中庸之道，明朗的心境，甚至也相当的懂得了造型美。他所作的《大卫》就有这些影响。

他想描写大卫和扫罗王的相遇，用交响诗的形式表现两个人物。

据圣经载，大卫为以色列的第二个王，年代约在纪元前一五五——一四四年，少年时为父牧羊，先知撒母耳为之行油膏礼，预定其继承扫罗王位。因以色列王扫罗为神厌弃，为恶魔所扰，致精神失常，乃从臣仆之言，访求耶西之子大卫侍侧弹琴。扫罗一闻琴声，即觉精神安定。事见《旧约·撒母耳记》上卷第十六章。此处将此故事略加改动，弹琴易为吹笛，访求改为偶遇。

在一片荒凉的高原上，周围是开花的灌木林，年轻的牧童躺在地下对着太阳出神。清明的光辉，大地的威力，万物的嗡嗡声，野草的颤动，羊群的铃声，使这个还没知道负有神圣使命的孩子引起许多幻想。他在和谐恬静的气氛中懒洋洋的唱着歌，吹着笛子。歌声所表现的欢乐是那么安静，那么清明，令人听了哀乐俱忘，只觉得是应该这样的，不可能不这样的……可是突然之间，荒原上给巨大的阴影笼罩了，空气沉默了；生命的气息似乎退隐到地下去了。唯有安闲的笛声依旧在那里吹着。精神错乱的扫罗王在旁边走过。他失魂落魄，受着虚无的侵蚀，像一朵被狂风怒卷的，自己煎熬自己的火焰。他觉得周围是一片空虚，自己心里也是一片空虚：他对着它哀求，咒骂，挑战。等到他喘不过气来倒在地下的时候，始终没有间断的牧童的歌声又那么笑盈盈的响起来了。扫罗抑捺着骚动不已的心绪，悄悄的走近躺在地下的孩子，悄悄的望着他，坐在他身边，把滚热的手放在牧童头上。大卫若无其事的掉过身子，望着扫罗王，把头枕在扫罗膝上，继续唱他的歌。黄昏来了，大卫唱着睡熟了；扫罗哭着。繁星满天的夜里又响起那个颂赞自然界复活的圣歌，和心灵痊愈以后的感谢曲。

克利斯朵夫写作这一幕音乐，只顾表现自己的欢乐，既没想到怎么演奏，更没想到可以搬上舞台。他原意是想等到乐队肯接受他的作品的时候在音乐会中演奏。

一天晚上，他和亚希·罗孙提起，又依着罗孙的要求，在钢琴上弹了一遍，让他有个概念。克利斯朵夫很诧异的发觉，罗孙对这件作品竟非常热心，说应该拿到一家戏院去上演，并且自告奋勇要促成这件事。过了几天，罗孙居然很认真的干起来，使克利斯朵夫更觉得奇怪；而一知道高恩，古耶，甚至吕西安·雷维-葛都表示很热心，他不但是诧异，简直给搅糊涂了。他只能承认他们为了爱艺术而把私人的嫌隙丢开了：这当然是他意想不到的。在所有的人中，最不急于表现这件作品的倒是他自己。那原来不是为舞台写的，拿去交给戏院未免荒唐。但罗孙那么恳切，高恩那么苦劝，古耶又说得那么肯定，克利斯朵夫居然动心了。他没有勇气拒绝。他太想听听自己作的曲子了！

为罗孙，什么事都轻而易举。经理和演员都争先恐后的巴结他。碰巧有家报馆为一个慈善团体募捐想办个游艺大会。他们决定在游艺会里表演《大卫》。一个很好的管弦乐队给组织起来了。至于唱歌的，罗孙说已经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人物来表现大卫。

大家便开始练习。乐队虽然脱不了法国习气，纪律差一些，可是第一次试奏的成绩还算满意。唱扫罗王的角色嗓子有点疲弱，却还过得去，技术是有根底的。表演大卫的是个高大肥胖，体格壮健的美妇人；但她声音恶俗，肉麻，带着唱通俗歌剧的颤音，和咖啡馆音乐会的作风。克利斯朵夫皱着眉头。她才唱了几节，他已经断定她不能胜任了。乐队第一次休息的时候，他去找负责音乐会事务的经理，那是和高恩一同在场旁听的。他看见克利斯朵夫向他走过来，便得意洋洋的问：“那末你是满意的了？”“是的，”克利斯朵夫说，“大概不至于有什么问题。只有一件事不行，就是那个女歌唱家。非换一个不可。请你客客气气的通知她；你们是搅惯这一套的……你总不难替我另外找一个吧？”

那位经理不由得楞住了，望着克利斯朵夫，似乎疑心他是开玩笑。

“噢！你这话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克利斯朵夫问。

经理跟高恩俩 了 眼睛，神气很狡猾：“她多有天分！”“一点儿天分都没有，”克利斯朵夫说。

“怎么没有！……这样好的嗓子！”

“谈不到嗓子。”

“人又多漂亮！”

“那跟我不相干。”

“可是也不妨事啊，”高恩笑着说。

“我需要一个大卫，一个懂得唱的大卫；不需要美丽的海伦，”克利斯朵夫说。

经理好不为难的搔搔鼻子：“那很麻烦，很麻烦……可是她确实是个出色的艺术家：——我敢向你担保。也许她今天不大得劲。你再试一下看看。”

“好吧，”克利斯朵夫回答；“可是这不过是白费时间罢了。”他重新开始练习。情形可是更糟。他几乎不能敷衍到曲子终了：他烦躁不堪，指点女歌手的口气先是还冷冷的不至于失礼，慢慢的竟直截了当，不留余地了；她花了很大的劲想使他满意，对他装着媚眼乞怜，只是没用。看到事情快要闹僵，经理就很小心的出来把练习会中止了。为了冲淡一下克利斯朵夫给人的坏印象，他赶紧去和女歌手周旋，大献殷勤；克利斯朵夫看了很不耐烦，神气专横的向他示意叫他过来，说道：

“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了。我不要这个人。我知道人家心里会不舒服；可是当初不是我挑的。你们去想办法罢。”经理神气很窘，弯了弯腰，满不在乎的回答：“我没办法。请你跟罗孙先生去说罢。”

“那跟罗孙先生有什么相干？我不愿意为这些事去麻烦他。”“他不会觉得麻烦的，”高恩带着俏皮的口气说。

接着他指了指刚在门外进来的罗孙。

克利斯朵夫迎上前去。罗孙一团高兴的嚷着：“怎么？已经完啦？我还想来听听呢。那末，亲爱的大师，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一切都很好，”克利斯朵夫回答。“我不知道向你怎么道谢才好……”

“哪里！哪里！”

“只有一件事不行。”

“你说罢，说罢。咱们来想办法。我非要使你满意不可。”“就是那个女歌唱家。咱们自己人，不妨说句老实话，她简直糟透了。”

满面笑容的罗孙一下子变得冷若冰霜。他沉着脸说：“朋友，你这个话真怪了。”

“她太不行了，太不行了，”克利斯朵夫接着说，“没有嗓子，唱歌没有品，没有技巧，一点儿才气都没有。幸亏你刚才没听到！……”

罗孙的态度越来越冷了，他截住了克利斯朵夫的话，声音很难听的说：“我对特·圣德-伊格兰小姐知道得很清楚。她是个极有天分的歌唱家，我非常佩服的。巴黎所有风雅的人都是跟我一样的见解。”

说罢，他转过背去，搀着女演员的手臂出去了。正当克利斯朵夫站在那儿发呆的时候，在旁看得挺高兴的高恩，过来拉着他的胳膊，一边下楼一边笑着和他说：“难道你不知道她是他的情妇吗？”

这一下，克利斯朵夫可明白了。他们想表演这个作品原来是为了她，不是为了克利斯朵夫，怪不得罗孙这样热心这样肯花钱，他的喽罗们又这样上

劲。他听高恩讲着那个圣德-伊格兰的故事：歌舞团出身，在小戏院里红了一些时候，就像所有她那一流的人一样，忽然雄心勃勃，想爬到跟她的身分更相当的舞台上唱戏。她指望罗孙介绍她进歌剧院或喜歌剧院；罗孙也巴不得她能成功，觉得《大卫》的表演倒是一个挺好的机会，可以教巴黎的群众领教一下这位新悲剧人材的抒情天才，反正这角色用不到什么戏剧的动作，不致于使她出丑，反而能尽量显出她身段的美。

克利斯朵夫听完了故事，挣脱了高恩的手臂，哈哈大笑，直笑了好一会。最后他说：

“你们真教我受不了。你们这些人都教我受不了。你们根本不把艺术放在心上。念念不忘的老是女人，女人。你们排一出歌剧是为了一个跳舞的，为了一个唱歌的，为了某先生或某太太的情人。你们只想着你们的丑事。我也不怪你们：你们原来是这样的东西，那末就这样混下去罢，挤在你们的马槽里去抢水喝罢，只要你们喜欢。可是咱们还是分手为妙：咱们天生是合不拢来的。再见了。”

他别了高恩，回到寓所，写了封信给罗孙，声明撤回他的作品，同时也不隐瞒他撤回的动机。

这是跟罗孙和他所有的徒党决裂了。后果是立刻感觉得到的。报纸对于这计划中的表演早已大事宣传，这一回作曲家和表演者的不欢而散又给他们添了许多嚼舌的资料。某个乐队的指挥，为了好奇心，在一个星期日下午的音乐会中把这个作品排了进去。这幸运对于克利斯朵夫简直是个大大的厄运。作品是演奏了，可是被人大喝倒彩。女歌唱家所有的朋友都约齐了要把这个傲慢的音乐家教训一顿；至于听着这阕交响诗觉得沉闷的群众，也乐于附和那些行家的批判。更糟的是，克利斯朵夫想显显演奏家的本领，冒冒失失的在同一音乐会里出场奏一阕钢琴与乐队合奏的幻想曲。群众的恶意，在演奏《大卫》的时候为了替演奏的人着想而留些余地的，此刻当面看到了作家就尽量发泄了，——何况他的演技也不尽合乎规矩。克利斯朵夫被场中的喧闹惹得心头火起，在曲子的半中间突然停住，用着挖苦的神气望着突然静下来的群众，弹了一段玛勃洛打仗去了，——然后傲慢的说道：“这才配你们的胃口。”说完，他站起身来走了。

会场里顿时乱哄哄的闹了起来，有人嚷着说这是对于听众的侮辱，作者应该向大家道歉。第二天，各报一致把高雅的巴黎趣味所贬斥的粗野的德国人骂了一顿。

然后是一片空虚，完全的，绝对的空虚。克利斯朵夫在多少次的孤独以后再重来一次孤独，在这个外国的，对他仇视的大城里，比什么时候都更孤独了。可是他不再像从前一样的耿耿于怀。他慢慢的有点儿觉得这是他的命运如此，终身如此的了。

他可不知道一颗伟大的心灵是永远不会孤独的，即使命运把他的朋友统统给剥夺了，他也永远会创造朋友；他不知道自己满腔的热爱在四周放出光芒，而便是在这个时候，他自以为永远孤独的时候，他所得到的爱比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还要丰富。

在史丹芬家和高兰德同时学钢琴的，还有一个年纪不满十四岁的女孩子。她是高兰德的表妹，叫做葛拉齐亚·蒲翁旦比，皮肤黄澄澄的，颧骨带

《玛勃洛》为通俗的儿童歌曲，其中的复唱句是：“玛勃洛打仗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

点粉红，脸蛋很饱满，像乡下人一样的健康，小小的鼻子有点往上翘，阔大的嘴巴线条很分明，老是半开半合的，下巴很圆，很白，神色安详的眼睛透着温柔的笑意，鼓得圆圆的脑门，四周是一大堆又长又软的头发，并不打卷，只像平静的水波一般沿着腮帮挂下来。宽大的脸盘，沉静而美丽的目光，活像安特莱·台尔·萨多画上的圣处女。

她是意大利人。父母差不多成年住在乡下，在意大利北部的一所大庄子里：那边有的是平原，草场，跟小河。从屋顶的平台上眺望，底下是一片金黄的葡萄藤，中间疏疏落落的矗立着一些圆锥形的杉树。远处是无穷尽的田野。四下里静极了。只听到耕田的牛鸣，和把犁的乡下人尖锐的叫喊：“吁嘻！……走呀！”

蝉在树上唱，青蛙沿着水边叫。夜里，银波荡漾的月光底下，万籁俱寂。远远的，不时有些看守庄稼的农人蹲在茅屋里放几枪，警告窃贼表示他们醒在那里。对于朦胧半睡的人们，这种声音跟在远处报时报刻的和平的钟声并没什么分别。过后，又是一片静寂包着你的心灵，好似一件衣褶宽博的软绵绵的大氅。

在小葛拉齐亚周围，生命似乎睡着了。人家不大理会她。她是在恬静的空气中自由自在的长大的。那么平静，那么从容。她性子懒懒的，喜欢东溜溜，西逛逛，没头没脑的尽睡。她会在园子里几小时的躺下去。她在静默中飘飘荡荡，好似一只苍蝇在夏日的溪水上轻轻拂弄。有时，她无缘无故的突然奔起来，奔着，奔着，像一头小动物，脑袋与胸脯微微向右边侧着，非常轻灵，自然。她简直是头小山羊，就为了喜欢蹦跳而在石子堆里溜滑打滚。她和小狗，青蛙，野草，树木，种田的人，院子里的鸡鸭，唠唠叨叨的说话。她疼爱周围的一切小生物，也很喜欢大人，可是不像对小东西那么毫无顾忌。她不大见到外界的人，庄子离城很远，完全是孤零零的。尘土飞扬的大路上，难得有个满面正经，拖着沉重的脚步的农夫，或是一个眼睛发亮，脸孔紫铜色的，美丽的乡下女人，昂着头，挺着胸，摇摇摆摆的走过去。葛拉齐亚在静悄悄的大花园里独自消磨日子：一个人也不看见，从来不厌烦，对什么也不怕。

有一次，一个流浪的汉子闯入冷落的田庄里想偷只鸡。他看见女孩子躺在草地上，一边哼着一支歌一边咬着一块长长的烤面包，不由得呆了一呆。她安闲的望着他，问他来做什么。他说：“给我一些东西，要不然我就吓你了。”

她把手里的面包递给了他，眼睛笑眯眯的说：“你别吓人啊。”

于是那浪人走了。

妈妈去世了。老爸爸心肠很好，很懦弱，是个世家出身的意大利人；他身子结实，性情快活，人很和善，就是有些孩子气，完全没能力管女孩子的教育。老蒲翁旦比的妹子，史丹芬太太，回来参加嫂子的葬礼，看见孩子那么孤单不由得很揪心，决意带她到巴黎去住些时候，让她忘记一下丧母的悲痛。葛拉齐亚哭了，老爸爸也哭了。可是史丹芬太太决定了什么事，大家只有服从的分儿，没有人能反抗的。她是一家之中最有决断的人；她在巴黎自己家里掌管一切：她的丈夫，她的女儿，她的情夫；——因为她对于责任和快乐能兼筹并顾，为人又实际又富于热情，——并且极喜欢交际，在外边非常活动。

移植到巴黎之后，幽静的葛拉齐亚对着美丽的高兰德表姊深深的钟情起

来，使高兰德看了好玩。人们把这个野生的和顺的小姑娘带到交际场和戏院去。大家继续拿她当孩子看待，她也自认为孩子，其实早已不是了。她颇有些自己藏得很紧而觉得害怕的感情，对于一个人一件东西常常会热情冲动。她暗中恋着高兰德，偷她一条丝带或一块手帕什么的；当着表姊的面，她往往一句话都说不出；而在等待的时候，知道就要看到表姊的时候，她又焦急又快活，简直会浑身颤抖。在戏院里，要是她先到了而后看见美丽的表姊穿着袒露的晚礼服走进包厢，受到众人注目的话，葛拉齐亚就满心欢喜的笑了，笑得那么谦卑，亲切，抱着一腔热爱；而高兰德和她一说话，她连心都为之化开了。穿着白色的长袍，美丽的黑发蓬蓬松松的散披在皮肤暗黄的肩上，把长手套放在嘴里轻轻咬着，又闲着没事把手指往手套里伸进一点，——她一边看戏一边时时刻刻回头看着高兰德，希望她对自己友好的瞧一眼，也希望把自己感到的乐趣分点儿给她，用褐色的明净的眼睛表示：“我真爱你。”

在巴黎近郊的森林中散步时，她形影不离的跟着高兰德，坐就坐在她脚下，走就走在她前面，替她拨开伸在路中间的树枝，在没法插足的污泥中放几块石头。有天晚上，高兰德在花园里觉得冷了，问她借用围巾，她竟快活得叫起来，——（过后却又难为情，觉得不应该叫的，）——因为那等于她的爱人和她拥抱了一下，而围巾还给她的时候又留下了爱人身上的香味。

也有些她偷偷看着的书，有些诗，——（因为人家还只给她看儿童读物）——使她感到一种慌乱的甜美的境界。还有某些音乐，虽然人家说她还不能领会而她也自以为不能领会，——她可感动得脸色发白，身上出汗。她那时的心情是谁都不知道的。

除此以外，她只是一个性情柔和的小姑娘：糊里糊涂的，懒洋洋的，相当贪嘴，动不动就脸红；有时几小时的不出声，有时咕咕呱呱的说个不休；容易哭，容易笑，会突然之间的嚎恸，也会像小孩子般纵声狂笑。一点儿毫无意思的小事就能使她乐，使她高兴。她从来不想装做大人，始终保存着儿童的面目。她尤其是心地好，绝对不忍心教人家难过，也绝对受不了别人对她有半句生气的话。她非常谦虚，老躲在一边；只要是她认为美与善的，她无有不爱，无有不钦佩；她往往一厢情愿的以为别人有如何如何的优点。

史丹芬家负责管她的教育，那是已经很落后的了。她跟克利斯朵夫学琴就是这样开始的。

她第一次看见他是在姑母家某次宾客众多的夜会上。跟无论哪种客人合不来的克利斯朵夫，尽弹着一阕没有完的 Adagio，把大家听得打呵欠：似乎快完了，又接了下去，使听的人以为是无穷无尽的了。史丹芬太太非常不耐烦，只是不便发作。高兰德却乐死了，觉得这可笑的局面挺有意思，也不怪克利斯朵夫感觉迟钝到这个地步；她只觉得他是一股力，而那股力使她很有好感，同时也认为很滑稽，但决不愿意为他辩护。唯有小葛拉齐亚被这音乐感动得眼泪都上来了。她躲在客厅一角。最后她溜走了，因为不愿意让人家发见她的骚动，也因为受不了大家背后拿克利斯朵夫取笑。

几天之后，史丹芬太太在饭桌上说要请克利斯朵夫教她学琴。葛拉齐亚听了心里一慌，羹匙掉在汤盆里，把汤水溅在她自己跟表姊身上。高兰德便说她还得先学一学吃饭的规矩。史丹芬太太马上补充说，那可不能请教克利斯朵夫了。葛拉齐亚因为和克利斯朵夫一同受到埋怨，非常高兴。

克利斯朵夫开始上课了。她身子又僵又冷，手臂胶在身上没法搬动；克利斯朵夫拿着她的小手校正手指的姿势，把它们一支一支放在键盘上时，她

竟要软瘫了。她战战兢兢，唯恐在他面前弹不好。但尽管练琴练到几乎害病，使表姊烦躁得叫起来，她当了克利斯朵夫的面总弹得不成样子：她喘不过气来，手指不是僵似木块，就是软如棉花；她把音弹糊涂了，重音也颠倒了；克利斯朵夫把她埋怨了一顿，生着气走了。那时她竟恨不得死掉才好。

他完全没注意她，只关心高兰德。葛拉齐亚看了表姊和克利斯朵夫的亲密很羡慕；虽然有些痛苦，但她那颗善良的小心毕竟替高兰德和克利斯朵夫欢喜。她认为高兰德远胜自己，所以大家的敬意归她一个人独占也是挺自然的。——直到后来她必须在表姊与克利斯朵夫两者之间挑选一个的时候，她才觉得自己的心已经不向着表姊了。她凭着小妇人的直觉咂摸出来，克利斯朵夫看了高兰德的卖弄风情和雷维-葛的拚命追求非常难过。她本能的不喜欢雷维-葛；而且从她知道克利斯朵夫厌恶他之后，她也厌恶他了。她不懂高兰德怎么能把雷维-葛放在和克利斯朵夫竞争的地位而引以为乐。她暗中开始用严厉的目光批判高兰德，一发觉她某些小小的谎话，便对表姊突然改变了态度。高兰德虽然觉得，可不明白为什么，以为那是小姑娘的使性。可是葛拉齐亚对她已经失掉信心是毫无疑问的了：高兰德从一桩小事情上可以感觉到。有天晚上，两人在园中散步，忽然来了一阵骤雨，高兰德有心表示亲热，想把葛拉齐亚裹在自己的大衣里面，免得她淋雨；要是在几星期以前，葛拉齐亚一定因为能够偎贴在亲爱的表姊怀里而感到说不出的欢喜，这一回她却冷冷的闪开了。并且高兰德说葛拉齐亚所弹的某支乐曲难听的时候，她还是照旧的弹，照旧的爱好。

从此她只关心克利斯朵夫。她的柔情使她有种直觉，能体会到他苦闷的原因。而以她那种孩子气的，多操心的关切，她也把他的痛苦大大的夸张了，她以为克利斯朵夫爱着高兰德，其实他对高兰德的关系仅仅是种苛求的友谊。她以为他很痛苦，所以她也为他而痛苦了。可怜她好心竟没得到好报：表姊把克利斯朵夫惹得冒火了，她就代表姊受过；他心绪恶劣，借小学生出气，在琴上改她错误的时候极不耐烦。有天早上，克利斯朵夫被高兰德惹得格外气恼，在钢琴旁边坐下来的态度那么暴躁，把葛拉齐亚仅有的一些小本领都吓得无影无踪：她手足无措；他怒气冲冲的责备她弹错音符，更把她骇昏了；他又生了气，拿着她的手乱摇，嚷着说她永远没希望把一个曲子弹得像个样，还是弄她的烹饪或女红去罢，她爱做什么都可以，可是天哪！切勿再弄什么音乐，弹些错误的音教人听了受罪！一说完，他掉转身子就走，课也没上完。可怜的葛拉齐亚把眼泪都哭尽了，那些难堪的话固然使她伤心，但更伤心的是她一心一意要使克利斯朵夫满意，结果非但没做到，反而搅出些糊涂事教自己心爱的人气恼。

后来克利斯朵夫不再上史丹芬家，葛拉齐亚就更痛苦了。她想回家乡去。这个连幻想都是那么纯洁的孩子，始终保存着朴实清明的心地，住在大都市里跟骚动狂乱的巴黎女子混在一起非常不惯。虽然不敢说出来，她已经把周围的人批判得相当准确。但她像父亲一样因为心好，因为谦虚，因为不敢信任自己而很胆小，懦弱。她让霸道的姑母和惯于支配一切的表姊摆布。虽然按期给父亲写着亲切的信，她可不敢告诉他说：“啊！爸爸，把我接回去罢！”

老爸爸虽然心里极愿意，却也不敢接她回去。因为他怯生生的露出一些口风，史丹芬太太立刻回答他说，葛拉齐亚在巴黎很好，比跟他一起好多了，并且为她的教育，也应当留在巴黎。

可是终于有一天，这颗南国的小灵魂再也受不了放逐的痛苦，必需向着

光明飞回去了。——那是在克利斯朵夫的音乐会之后。那天她和史丹芬一家一同在场，眼看那些群众以侮辱一个艺术家为乐，她心都碎了。……在葛拉齐亚眼里，艺术家就是艺术的化身，是生命中一切神圣的东西的化身。她想哭，想逃。但她非听完那些喧闹，嘘斥，与叫嚣不可；回到姑母家还得听那些刻薄的议论，听高兰德一边哄笑，一边和吕西安交换些可怜克利斯朵夫的话，她逃到房里，倒在床上痛哭了半夜：她自言自语的和克利斯朵夫说着话，安慰他，恨不得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因为毫无办法使他幸福而难过死了。从此，她不能再待在巴黎，求父亲接她回去。她说：

“我在这儿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了，要是你让我再多留一些时候，我要死了。”

父亲马上赶了来，虽然抗拒刚强的姑母在父女两人都是极不容易的事，这一回他们也拿出最后一点儿意志，鼓足勇气把她顶住了。

葛拉齐亚回到酣睡如故的大花园里，不胜欣慰的跟她喜爱的自然界和生灵重新相聚。在她受过创痛而才安静下来的心中，她带来了一些北国的哀愁，仿佛一层薄雾，此刻给阳光照着，慢慢的融化了。她偶然想起苦恼的克利斯朵夫。躺在草坪上听着熟悉的蛙声跟蝉声，或是坐在她比以前接触更多的钢琴前面，她悠然想着自己看中的朋友；她和他几小时的低声谈着话，觉得有朝一日他可能推开门走进来的。她写了一封不署名的信，迟疑了好久以后，终于在一个早晨，瞒着人，心儿乱跳，走到三里以外，在农田的那一边，丢入本村的信箱。——那是一封亲切动人的信，告诉他说他不是孤独的，劝他不要灰心，有人在思念他，爱他，在上帝面前为他祈祷，——可怜的信，糊里糊涂的中途遗失了，他始终没收到。

随后，这个远方的女友仍然过着她单纯而宁静的岁月。意大利那种和平、恬静、安乐、默想的精神，又回到那颗贞洁沉默的心中，——可是关于克利斯朵夫的印象继续在她的心灵深处燃烧，像一朵静止不动的火焰。

克利斯朵夫完全不知道有股天真的温情远远的在关切他，将来还要在他的生命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他也不知道就在他受辱的音乐会中，有一个将来成为他的朋友，成为他亲爱的伴侣，和他并肩携手，向前迈进的人。

他是孤独的。他自以为孤独的。可是志气一点儿不消沉。他再没有从前在德国时那种悲苦郁闷的心境。他更强了，更成熟了；他知道是应该这样的。他对巴黎的幻想已经没有了：“人到处都是一样的；应当忍受，不该一味固执，跟社会作无谓的斗争；只要心安理得，我行我素就行了。”像贝多芬所说的：“要是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力在人生中消耗了，还有什么可以奉献给最高尚最完善的東西？”他清清楚楚的体验到了自己的性格，也体验到了他从前批判得那么严厉的自己的种族。越受到巴黎气氛的压迫，他越觉得需要回到祖国，回到国魂所在的那些诗人与音乐家的怀抱中去。他一打开他们的书，仿佛满屋子都是阳光灿烂的莱茵的波涛，和那些被他遗弃的故人的亲切的微笑。

他曾经对他们多么无情无义！他们那种朴实的慈爱的宝藏，他怎么不早点儿发见的呢？他不胜羞愧的想起自己从前在德国对他们说过多少偏激与侮辱的话。那时他只看见他们的缺点，笨拙而多礼的举动，感伤的理想主义，小小的谎言，小小的懦弱。啊！这些缺点跟他们伟大的德性相比，真是太不足道了！可是他当初怎么对他们的弱点会那样苛刻的呢？此刻他反因之而觉得他们更动人，更近人情了。在这个情形之下，他现在最受吸引的人便是以

前被他用最蛮横的态度贬斥的人。对于修倍尔脱和罢哈，他有什么不客气的话没说过呢！如今他倒觉得跟他们非常接近。那些伟大的心灵，受过他的挑剔与讪笑的，对他这个亡命异国，举目无亲的人，笑容可掬的说着：

“朋友啊，我们在这里。你勇敢些罢！我们也受过非分的苦难！……可是临了我们还是达到了目的……”

于是他听见约翰·赛白斯蒂安·罢哈的心灵像海洋一般的呼啸着：风狂雨骤，掩盖生命的乌云都给扫荡了，——有极乐的，痛苦的，如醉如狂的民众，有慈悲与和平的基督在他们上空翱翔，——多少城市被守夜的人叫醒了，居民欢欣鼓舞的迎着神明走去，他的脚声把世界都震撼了，——无数的思想，热情，乐体英雄生活，莎士比亚式的幻想，萨伏那洛式的预言，牧歌式的，史诗式的，《启示录》式的幻象，蕴藏在这个歌唱教师身上！克利斯朵夫好像亲眼看到他这个人：双叠下巴，眼睛很小很亮，多褶的眼皮，往上吊的眉毛，性格阴沉而又快乐，有点可笑，脑子里充满着讽喻和象征，人是老派的，易怒，固执，心情高远，对人生抱着热情，同时又渴念着死……——在学校里，他是一个天才的学究，而那些学生是又脏又粗野，生着疮疖，像乞丐一般，唱歌的嗓子是哑的，他常常跟他们吵架，有时和他们扭殴……——在家里他有二十一个孩子，十三个都比他死得早，其中一个白痴；其余都是优秀的音乐家，替他来些小小的家庭音乐会……疾病，丧葬，争吵，贫困，侘傺不遇；——同时，他有他的音乐，他的信仰，解脱与光明，还有预感到的，一意追求而终于把握到的欢乐，——神明的气息锻炼着他的筋骨，耸动着他的毛发，在他嘴里放出霹雳般的声音……噢！力！力！力！像雷震一般的欢乐的力！……

克利斯朵夫把这股力尽量吞下。他觉得在德国人心中像泉水般流着的这种音乐的力对他很有好处。这力往往是平庸的，甚至是粗俗的，可是有什么关系？主要的是有这股力，而且能浩浩荡荡的奔流。在法国，音乐是用滤水器一点一滴的注在瓶口紧塞的水瓶里的。这些喝惯无味的淡水的人，一看到长江大河式的德国音乐，就要吹毛求疵，挑德国天才的错误了。

“这些可怜的孩子！”克利斯朵夫这么想着，可忘了自己从前也一样的可笑过来。“他们居然找出了华葛耐和贝多芬的缺点！他们需要没有缺陷的天才。仿佛狂风暴雨在吹打的时候会特别小心，一点都不扰乱世界上完整的秩序！……”

他在巴黎街上走着，对自己心中的力非常高兴。无人了解倒是更好！他可以更自由。天才的使命是创造，而要依着内心的法则创造一个簇新的有机体的世界，自己必须整个儿生活在里头。一个艺术家决不嫌太孤独。可怕的是，自己的思想反映到镜子里的时候被镜子把原来的形式改变了，缩小了。一件作品没有完成之前，不能告诉别人；否则你会没有勇气把作品写完；因为那时你在自己心中看到的已经不是你的，而是别人的可怜的思想。

罢哈作有《约翰福音所记的耶稣受难》与《马太福音所记的耶稣受难》两部圣乐，为音乐史上巨制。此段均系暗指两大圣乐中抒情的及戏剧化的境界，——又罢哈曾任莱布锡圣·多玛学校歌唱教师二十余年，故下文称其为“歌唱教师（Cantor）”。

萨伏那洛为意大利十五世纪时狂热的宗教家，曾于短时期内操纵翡冷翠的政局。

按所有罢哈的传记均称罢哈子女共二十人（前妻生七人，后妻生十三个），罢哈故世时（1750年）尚生存者共有子女九人。作者言其子女共二十一人，有十三个比罢哈早故，不知何所据。

如今他的梦想既不受任何外物的扰乱，就像泉水一样从他心灵的每一个角落，从他路上碰到的每一颗石子里飞涌出来。他所生活的境界像一个能见到异象的人的境界。他所见所闻的一切，在心中唤引起来的生灵与事物，跟实际的见闻完全不同。他只要听其自然，就能发觉他幻想中的人物都在周围活动。那些感觉会自动来找到他的。路人的目光，风中传来的语声，照在草坪上的阳光，停在卢森堡公园树上歌唱的小鸟，远处修道院里的钟声，卧室中瞥见的一角苍白的天空，一日之间时时变化的声音与风光：这些他都不用自己的而用着幻想人物的心灵去体会。——他觉得非常幸福。

可是他的情形比什么时候都更艰难。唯一的收入是靠几处的钢琴课，而那些差事都丢了。时方九月，巴黎人正在外省避暑，不容易找到新学生。他独一无二的学生是个又聪明又糊涂的工程师，在四十岁上忽发奇想，要做个提琴大家。克利斯朵夫的提琴拉得不十分好，但总比他的学生高明；所以在某个时期内，他以每小时两法郎的代价每周给他上三小时的提琴课。过了一个半月，工程师厌倦了，突然发现他主要的天赋还是在绘画方面。——他把这个发见告诉克利斯朵夫的那一天，克利斯朵夫不禁哈哈大笑；笑完了，他把存款点了点数，原来只剩那个学生刚才付给他的十二法郎了。他可并不急，只想到此刻非另谋生路不可，又得上出版商那儿去奔走了。那当然不是有趣的事……管他！……何必事先烦恼呢？今天天气很好，还不如上墨屯去玩儿。

他忽然想到要走路了。走路可以促成音乐的收获。他心中装满了音乐，好似蜂房中装满了蜜一样；他对着在心头嗡嗡作响的金黄的蜜蜂笑着。往往那是一种转调极多的音乐。节奏是蹦蹦跳跳的，反复不已的，能够使你白日做梦……喝！关在屋里迷迷糊糊的时候，你以为能创造节奏吗？那只能像巴黎人一样杂凑一些微妙而静止的和声！

走得疲倦了，他便在林间躺下。树木微秃，天色像雁来红一样的蓝。克利斯朵夫恍恍惚惚在那里出神，他的梦也渐渐染上从初秋的白云里漏出来的柔和光彩。他的血在奔腾。他听到自己的思潮在胸中湍泻。它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彼此冲突的新世界与旧世界，已往的心灵的片段，像一个城里的居民一般在他心头逗留过的、昔日的旅客。高脱弗烈特在曼希沃墓前说的话又给想起来了：他等于一座活的坟墓，多少亡人和多少不相识的人在其中蠢动。他听着这无量数的生命，很高兴让这几百年的森林像大风琴般的奏鸣，其中有的是妖魔鬼怪，宛如但丁笔下的森林。他不再像少年时代那样的怕它们了，因为他有了能控制它们的意志。他最快乐的莫过于挥着鞭子使野兽们咆哮，让自己清清楚楚的感到内心的动物园比以前更丰富了。他不是孤独的，也永远不会再孤独。他一个人等于整个的军队，几百年来那些快乐而健全的克拉夫脱都在他身上。跟仇视他的巴黎，跟一个种族对垒的时候，他也拿得出整个的种族，双方是势均力敌了。

他住的那个寒伧的旅馆，如今也嫌租金太贵而放弃了。他在蒙罗越区租了一间阁楼，虽然一无可取，空气倒很流通，过路风是不断的。好吧，他本来就需要畅快的呼吸。从窗里他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巴黎烟突。搬家的事一下子就办完了：一辆手推的小车已经足够，克利斯朵夫自己推着走。最贵重的家具，除了他的旧箱子以外，便是一个从那时起非常流行的贝多芬画像。

他把它包得非常仔细，仿佛是件极有价值的艺术品。他和它是老在一起的。在巴黎的茫茫人海中，这是他栖身的岛屿，也是测验他精神的气压表。他心灵的温度，在那个画像上比在他自己的意识上标得更清楚：一忽儿是乌云密布的天空，一忽儿是热情激荡的狂风，一忽儿又是庄严的宁静。

他不得不减少食粮，一天只在下午一点钟吃一顿。他买了一条粗大的香肠挂在窗上：每顿切着那么厚厚的一片，加上一大块面包，一杯自己发明的咖啡，就算是盛宴了。他还很想把那个量分做两顿吃。他恨自己胃口那么好，恶狠狠的骂自己像饿鬼似的，只想着肚子。其实他的肚子也不成其为肚子了，他比一条瘦狗还要瘦。至于身体上旁的部分倒很结实，骨骼像铁打的，头脑也始终很清楚。

他不大担忧什么明天的问题。只要有着当日的开支，他就不愿意操心。等到有一天不名一文了，他才决意再到出版商那里去转一转。可是到处都找不到工作。他两手空空的回来，路上走过高恩介绍过他的哀区脱的音乐铺子，他进去了，根本没记起以前在很不愉快的情形中来过这儿。他一进门便遇到哀区脱，来不及退出来，已经被哀区脱瞧见了。克利斯朵夫也不愿意露出退缩的神气，竟自向哀区脱走过去，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只预备必要的时候狠狠的顶他一下，因为他相信哀区脱对他一定还是傲慢的，事实可并不如此。哀区脱冷冷的伸出手来，说了几句普通的客套问他身体怎么样，并且不等克利斯朵夫要求，便指着办公室的门，自己闪在一旁让他进去。他对于这个意料之中而已经不再期待的访问，暗暗觉得欢喜。他表面上做得若无其事，实际上老在注意克利斯朵夫的行动；只要有办法听到他的音乐，他总去听。那次演奏《大卫》的音乐会，他也在场；对于群众的恶意，他一点儿不表惊奇，因为他素来瞧不起群众，而且他的确能感到作品的美。在巴黎，恐怕没有一个人比哀区脱更能赏识克利斯朵夫艺术的特色的了。可是他决不和克利斯朵夫说，不但为了克利斯朵夫得罪过他，并且也因为要他和蔼可亲根本不可能：那是他天生的缺陷。他真心预备帮克利斯朵夫的忙，却绝对不肯自动表示：他等着克利斯朵夫上门来请求。现在克利斯朵夫既然来了，照理他很可以宽宏大量的借此机会消除他们以前的误会，不必教克利斯朵夫再那么委屈的向他开口；但他更喜欢让克利斯朵夫把请求的话从头至尾说一遍，并且还决意要把克利斯朵夫拒绝过的工作交给他做，哪怕只做一次也是好的。他给他五十页乐谱，要他改编为曼陀铃跟吉他的谱。这样以后，哀区脱看他已经屈服，也就满足了，便再给他一些比较愉快的工作，态度可始终那么傲慢，令人没法感激。而克利斯朵夫也真要被生活压迫得无路可走了，才会再来找他。话虽如此，他宁愿靠这些工作糊口，——不管是多么气人的工作，——而不愿受哀区脱周济。那是哀区脱试过一次的，而且也是出于诚意。克利斯朵夫早已感觉到哀区脱先要屈辱他然后帮助他的用意，所以即使不得不接受哀区脱的条件，至少可以拒绝他的施舍。他很愿意为他工作：有来有往，清清楚楚，可决不肯欠他一丝一毫的情。不像为了艺术而到处求人的华耐葛，他绝对不把自己的艺术看得比灵魂更重；不是自己挣来的面包，他是咽不下去的。——有一回他把头天晚上做夜工赶起来的活儿送去的时候，哀区脱正在吃饭。哀区脱留意到他苍白的脸色和不由自主投向菜盘的目光，断定他还没吃东西，便邀他一起吃。用意是很好；但哀区脱那么明显的令人感到他是看出了人家的窘况，以致他的邀请也像是布施了：那是克利斯朵夫宁可饿死也不接受的。他不得不坐在饭桌前面——（因为哀区脱有话跟他说）；——但对于

盘里的菜丝毫不动，推说才吃过饭。其实他正是饿火中烧呢。

克利斯朵夫很想不去找哀区脱；可是别的出版商比哀区脱更要不得。——另外有一般有钱的音乐玩赏家，想出一句半句的音乐而不会写下来。便把克利斯朵夫叫去，对他哼着自己呕尽心血的结晶，说道：“你听，这多美啊！”

他们把这一句半句交给克利斯朵夫，要他拿去“发展”——（就是说把它写完篇）；——结果他们用自己的名字在一家大书铺出版。随后他们认为这件作品的确是自己写的了。克利斯朵夫就认得一个这样的人，旧家出身，手脚忙个不停的高个子，称他“亲爱的朋友”，抓着他的手臂，做出非常热心的表情，凑着他的耳朵嘻嘻哈哈，嘟嘟囔囔的说些胡话，不时还大惊小怪的叫几声：什么贝多芬啊，范尔仑啊，奥芬白赫啊，伊凡德·祁尔贝啊……他要克利斯朵夫工作，可不想给酬报：只请他吃几顿饭，拉几下手就算了。最后他送给克利斯朵夫二十法郎，克利斯朵夫居然还那么傻，为了交情而不肯收。而那天他袋里的钱连一法郎都不到，同时还得买一张二十五生丁的邮票寄母亲的信。那是鲁意莎的命名节，克利斯朵夫无论如何要去封信的：可怜的妇人把儿子的信看得太重了，怎么也少不了。虽然写信对她是桩苦事，最近几个星期她来信也比往常多了些，她受不了孤独的痛苦，又下不了决心到巴黎来住在儿子一起，她胆子太小，又舍不得她的小城，她的教堂，她的家；她怕出门。况且即使她愿意来，克利斯朵夫也没有路费给她；他自己过日子的钱也不是天天有呢。

使他非常高兴的是有一次洛金寄东西给他：克利斯朵夫为了她而跟普鲁士兵打架的那个乡下姑娘，写信来说她已经结婚了，附带报告他妈妈的消息，寄给他一篮苹果和一方喜糕。这些礼物来得正好。那天晚上他正守着饿斋，又是四季斋，又是封斋：拴在窗口钉子上的腊肠只剩一根绳子了。一收到这些礼物，克利斯朵夫自比为由乌鸦把食物送到岩上来的隐士。但那乌鸦大概忙着要给所有的隐士送粮，以后竟不再光顾了。

虽然情形这样苦，克利斯朵夫依旧不减其乐。他在面盆里洗衣服时，蹲在地下擦皮鞋时，嘴里老打着唿哨。他用裴辽士的话安慰自己：“我们应当超临人生的苦难，用轻快的声音唱那句欢乐的祷词：震怒的日子……”——他有时把这句唱到一半，停下来哈哈大笑，使邻人听了大为惊愕。

他过着非常严格的禁欲生活。正如裴辽士说的：“情人生涯是有闲和有钱的人的生涯。”克利斯朵夫的穷，谋生的艰苦，饮食极度的俭省，创造的热情，使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心绪去想到寻欢作乐。他不但表示冷淡，而且为了厌恶巴黎的风气，竟变了极端的禁欲主义者。他拚命要求贞洁，痛恨一切淫秽的事。那并非说他没有情欲。在别的时候，他也放纵过来。但他那时的情欲还是贞洁：因为他所追求的不是肉体的快乐，而是绝对的舍身忘我与丰满的生命。而当他一发觉不是那么回事的时候，就不胜气愤的排斥情欲。他认为淫欲不是普通的罪恶，乃是毒害生命的大罪恶。凡是心中还有些古老的基督教道德而不曾被外来的沙土完全湮没的人，凡是今日还能感到自己是强健的种族（就是凭着英勇的纪律而缔造四方文明的）的后裔的人，都不难了

伊凡德·祁尔贝为法国近代著名歌女，以善唱杂曲小调红极一时。

基督旧教会规定，每季之初的星期三、五、六应当守斋，谓之四季斋。复活节前的星期三至复活节（星期日）之间的守斋，称为封斋。

追思弥撒祭中有四段祷文，每段首句都是“震怒的日子……”。

解克利斯朵夫。他瞧不起那个国际化的社会把享乐当作独一无二的目标，独一无二的信条。——当然，我们应当求幸福，希望人类幸福，应当把野蛮的基督教义二千年来堆积在人类心头的悲观主义一扫而空。但我们必须存着造福人群的豪侠的信念。否则所谓求幸福是为的什么？不是极可怜的自私自利吗？少数的享乐主义者竭力想冒最少的危险去换最大的快乐，不管别人死活。——是的，他们这种沙龙里的社会主义，我们领教过了！——……他们的享乐主义只宜于“肥头胖耳”的民众，只宜于安富尊荣的“特殊阶级”，对于穷人却是一味致命的毒药：这些道理在提倡享乐主义的人不是比谁都明白吗？……

“享乐的生活是有钱人的生活。”

克利斯朵夫不是个有钱的人，而且天生他是不会有钱的。他挣了一些钱就花在音乐上面，省下饭食去买音乐会门票。他买着最便宜的座位，在夏德莱戏院最高的一层楼上。他心中充满了音乐，音乐代替了他的宵夜餐跟情妇。他那么渴望幸福，又那么容易满足，对于乐队的不够标准简直不以为意。他在两三个钟点以内快乐得迷迷忽忽，演奏的格调不高，音符的错误，只能使他泛起一点儿宽容的笑意：他踏进会场已经把批评精神丢开了；他这是为了爱而非为了批判来的。在他周围，群众也像他一样的一动不动，半阖着眼睛，在无边的梦境中载沉载浮。克利斯朵夫仿佛看见一群人掩在黑影里头，蜷做一堆，像一头巨大的猫，津津有味的体验着、培养着他们的幻觉。半明半暗的黄澄澄的光线中，很神秘的显出几张脸，那种无可形容的风度，悄然出神的姿态，引起了克利斯朵夫的注意与同情：他留恋它们，听着它们，终于和它们身心融成一片。有时那些心灵中也有一个会觉察到，双方在音乐会的时间内隐隐然起一种共鸣的作用，互相参透生命中最隐秘的部分，直到音乐会終了，沟通心灵的洪流才会中断。这种境界，是一般爱好音乐的人，尤其是年轻而尽情耽溺的人所熟知的：音乐的精华主要是由爱构成的，所以一定要在别人心中体验才能体验得完满；唯其如此，音乐会中常常有人不知不觉的四处窥探。希望能在人堆里找到一个朋友，来分享他自个儿担受不了的喜悦。

在克利斯朵夫为了要充分领略音乐的甜美而挑选的这批临时朋友中间，有一张在每次音乐会上都遇见的脸，特别吸引他。那是个风骚的女工，不懂音乐而极喜欢音乐的。她的侧影好像一头小野兽，一个笔直的小鼻子比她微微掀起的嘴和细巧的下巴只突出一点，往上吊的眉毛很细，眼睛很亮：完全是无愁无虑的女孩子，在她那个淡漠的恬静的外表之下，有的是爱笑爱快活的心情。这些轻佻的姑娘，年轻的女工，也许最能映出久已绝迹的清明之气，像古希腊雕像和拉斐尔画上所表现的。当然这境界在她们的生命中不过是一刹那，欢情觉醒的一刹那，很快就萎谢的。但她们至少有过一忽儿美妙的光阴。

克利斯朵夫望着她非常高兴：一张可爱的脸永远使他心里很舒服；他能够欣赏而不动欲念，只从中汲取欢乐，力，安慰，——甚至于德性。不必说，她很快就注意到他在看她；而他们之间也不不知不觉有了那种磁性的交流。并且因为差不多在每次音乐会中都坐着老位置，两人不久便熟悉了彼此的口味。听到某些段落，他们互相会心的瞧一眼；她要是特别喜欢某一句，就微微吐着舌头，好似要舔嘴唇的样子；要是她觉得某一句不对劲就不胜轻蔑的撇着嘴。这些小小的表情有点儿无心的做作，那是一个人知道自己被人注意的时候免不了的。有时听到严肃的作品，她颇想做出庄严的神气：侧着脑袋，

集中精神，脸上挂着点笑意，眼梢里觑着他是否注意她。他们俩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虽然从来没说过一句话，甚至也不想——（至少在克利斯朵夫方面）——在音乐会散场的时候见见面。

碰巧他们在某次晚上的音乐会中坐在一起。笑容可掬的迟疑了一会，两人终于友好的攀谈起来。她声音很好听，关于音乐说了许多傻话，因为她完全不懂而要装懂；但她确实非常喜欢。最坏的跟最好的，玛斯奈与华葛耐，她都爱好，只有那些平庸的东西她才厌烦。音乐为她是一种刺激感官的享乐，她全身的毛孔都在吸收，好似达娜哀的吸收黄金雨。《德利斯当》的前奏曲使她浑身发抖；《英雄交响乐》使她如临战阵，非常痛快。她告诉克利斯朵夫说贝多芬聋而且哑，但虽然这样，虽然他生得奇丑，要是她认识他，她一定会爱他。克利斯朵夫分辩说贝多芬并不怎么丑；于是他们讨论到美丑问题；她承认这是看各人口味而定的，这一个人认为美的，另一个人可以认为不美：“人不是金洋钱，没法讨每个人欢喜。”——克利斯朵夫宁可她不开口，那时倒更能听到她的内心。音乐会中奏到《伊索尔特之死》的那一段，她把汗湿的手递给他；他把它握着，直到乐曲終了；他们在勾连在一起的手指上感觉到交响乐的波流。

他们一同出场；快到半夜了。两人一边谈一边向拉丁区走去；她挽着他的胳膊，由他送回家；到了门口，她正想替他带路，他却告辞了，全没注意到她鼓励他留下的眼色。她当场不禁为之愕然，继而又大为气恼；过了一忽儿，她想到他这么蠢又笑弯了腰；回到房里脱衣服的时候，她又生起气来，终于悄悄的哭了。她在下次音乐会中碰到他，很想装出气恼，冷淡，使性的神气，但他那么天真朴实，使她的心软了下来。他们又谈着话，只是她的态度比较矜持了些。他很诚恳的，同时极有礼貌的和她谈着正经，谈着美妙的事，谈着他们所听的音乐和他们的感想。她留神听着，竭力要跟他一般思想。她往往捉摸不到他说话的意义，可照旧相信他。她对克利斯朵夫暗暗抱着一种感激的敬意，面上却差不多不露出来。由于一种不约而同的心理，他们只在音乐会场上谈天。有一回他看见她跟许多大学生在一起。他们俩很庄严的行了礼。她对谁都不提起他。她心灵深处有一个神圣的区域，藏着些美妙的，纯洁的，令人安慰的东西。

这样，克利斯朵夫用不着有所行动，光是有他这样一个人，就能给人一种心神安定的影响。他走到哪儿都不知不觉的留下一点儿内心的光。他自己可绝对想不到。在他身旁，就在他一座屋子里面，有些他从未见过的人，也在无意中慢慢的感受到他的嘉惠于人的光辉。

几星期以来，克利斯朵夫便是守斋也没有钱上音乐会去了；寒冬已届，在他那间最高层的屋子里，他冻僵了，不能再一动不动的坐在桌子前面。于是他下楼到巴黎街上乱跑，想靠走路来取暖。他常常会忘了周围熙熙攘攘的人，遁入无穷无极的时间中去。只要看到喧闹的街道之上，凄冷的明月挂在天空，或是白茫茫的雾里透出一轮红日，他就会觉得烦嚣的市声顿时消灭，整个的巴黎沉入了无垠的空虚，那些生活景象仿佛是久已过去的几百年以前的生活的影子……文明的外衣没有能完全遮盖了的，自然界中的犷野的生活；只要有点儿极细微的，平常人无从感知的征象，就能使克利斯朵夫窥到

希腊神话载：阿尔哥王阿克利西奥西斯因神示将被其生女达娜哀所杀，乃将达娜哀幽禁塔中。达娜哀为宙斯所恋，化身为黄金雨潜入塔中。

那生活的全豹。在街面的石板缝中长出来的青草，在荒瘠的大街上，在没有空气没有泥土的铁栏中抽芽的树木，跑过的一条狗，飞过的一头鸟，充塞于原始天地而被人类毁灭了的野兽的最后一批遗迹，一群飞舞的蚊蚋，侵蚀一个市区的无形的疫病：光是这些现象，已经能够使大地浩然之气冲出闭塞的人类暖室，吹在克利斯朵夫的脸上，鞭策他的生命力把它鼓动起来。

在这种长时间的散步中，——往往饿着肚子，几天的不跟任何人交谈，他可以无穷无尽的作着梦。饥饿与沉默更刺激了这种病态的倾向。夜里他睡眠不安，做着累人的梦，时时刻刻看到他的老家，看到儿时的卧室；音乐老是和他纠缠不清。白天，他又跟那些躲在他心中的人，亲爱的人，离别的与亡故的人谈着话，十二月里一个潮湿的下午，坚硬的草地上盖着冰花，灰色的屋顶与穹窿在大雾中变得一片迷糊，枝干裸露的树，瘦长的，畸形的，浴着水汽，好似海洋底下的植物，——克利斯朵夫从上一天起就老打着寒噤，无论如何不能使自己温暖，便走进了他不大熟识的卢佛宫。

至此为止，绘画没有使他怎么感动过。他太耽溺于内心的天地了，来不及再去把握色与形的世界。它们对他的影响仅限于它们跟音乐共鸣的部分，而那只能给他一种变了样的影子。当然，他也本能的隐隐约约的感到眼睛看的形式与耳朵听的形状，它们的和谐都受着同样的规则支配；他也感觉到心灵深处的水波便是色彩与声音两条巨川的发源地，只是在人生的分水岭上往两个相反的方向分了路，灌溉着两个不同的山坡。但他只认得两个山坡中的一个，到了要应用眼睛的王国内就迷路了。所以那眼神清朗，号称为光明世界的王后的法兰西，它最动人而也许最自然的魅力的秘密，克利斯朵夫始终没有发见。

即使克利斯朵夫对绘画感到兴趣，以他十足地道的德国人气息，也不容易接受一种这样不同的视觉的境界。有些风雅的德国人唾弃德国人的感觉而醉心于印象派，或是十八世纪的法国画，——有时还自命为比法国人了解得更深刻：克利斯朵夫可不是这样。跟他们比较，他也许是个野蛮人；但他老老实实做着野蛮人。蒲舍画上的粉红色的臀部；华多的下巴肥胖、多愁多病的才子，肌肉丰满的美人，胸衣高耸而精神完全是浮华空虚的人物；葛莱士的一本正经的眼风；弗拉高那的撩得很高的衬衣：所有这些富有诗意的裸体的玩艺儿给他的印象不过跟一份专讲色情的时髦报纸相仿。他完全没感觉到画上富丽堂皇的和谐。欧洲最精练的古文明的，那种绮丽的而有时也带点凄凉的梦境，对他是更生疏了。对于十七世纪的法国画，他也不见得更能赏识繁文缛节的虔诚，讲究气派的肖像；几个最严肃的大师的冷淡与矜持的态度，尼古拉·波生严峻的作品，和斐列伯·特·香班涅色彩不鲜明的人像上所表现的灰色的灵魂，正是教克利斯朵夫和法国古艺术无从接近的。此外，他根本不认识新派艺术；而即使认识了，恐怕也不免于认识错误。在德国的时候他受到相当诱惑的现代画家只有一个鲍格林，但这位作家也不会使克利斯朵夫了解拉丁艺术。克利斯朵夫所领会的是这个粗暴的天才的原始与粗野的气息。他的眼睛看惯了生硬的颜色，看惯了那个如醉如狂的野蛮人的大刀阔斧

蒲舍等四人均法国十八世纪画家。绘画采用妇女作题材，以法国十八世纪为最盛。

波生与特·香班涅均十七世纪法国画家。两人均为法国古典画派之宗。

鲍格林为十九世纪瑞士画家，以色彩强烈著称，兼有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作风。作品侧重于表现思想，时或失之晦涩费解。

的东西，当然不容易接受法国艺术的半明半暗的色调，与柔和纤巧的和谐。

但一个人生活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决不能无所沾染。环境多少要留些痕迹在你身上。尽管深闭固拒，你早晚会发觉自己有些变化的。

那天傍晚在卢佛宫一间间的大厅上溜达的时候，他就有些变化了。他又累，又冷，又饿；厅上只有他一个人。在他周围，荒凉的画廊罩着阴影，那些睡着的形象开始活动了。克利斯朵夫浑身冰冻，悄悄的在埃及的《斯芬克斯》，亚叙利的怪物，班尔赛巴里的公牛，巴利西的巨蛇中间走过。他觉得自己进了神话世界，心头有些神秘的激动。人类的幻梦，——心灵的各种奇异的花，——把他包裹着……

走进连尘埃都是黄澄澄的画廊，色彩灿烂的果园，没有空气的图画之林，像发烧一般而快要病倒的克利斯朵夫，精神上突然受到一个极大的震动。——他被饥饿，室内的温度，和五光十色的图画搅得昏昏沉沉，视而不见的走着：他头晕了。走到靠着塞纳河的画廊尽头的地方，他站在累姆布朗特的《善心的撒玛利亚人》前面，怕自己倒下，双手抓着画前的铁栏杆，把眼睛闭了一会。等到重新睁开眼来，看着那幅跟他的脸非常贴近的画的时候，他给迷住了……

日光将尽。它已经远去，已经死了。看不见的太阳往黑暗中沉没了。这个奇妙的时刻，心灵经过了一天的工作，困倦交加，入于麻痹状态，正好是精神的幻觉起来活动的时候。一切都寂静无声，只听见血在脉管里流动。无力动弹，气息仅属，心里头一片凄怆，没法自主了……只希望能投入一个朋友的怀里……只希望有奇迹出现，觉得它就要出现了……是的，它来了！昏暗的暮色中闪出一道金光射在壁上，射在背着垂死者的人的肩上，浸润着那些平凡的东西与卑微的人物，于是一切都显得和平甘美，有了神明的光辉。上帝亲自用他那双有力而仁爱的手臂紧紧搂着那些受难的、病弱的、丑陋的、贫穷的、肮脏的人，搂着那个袜子掉在脚跟上的仆人，那些蜂拥在窗下的畸形的脸，那些一言不发、心怀恐怖的麻木的生灵，——紧抓着累姆布朗特画上所有的可怜的人，那群除了等待、哆嗦、哭泣、祈求以外一无办法的，受着束缚的，微不足道的灵魂。——可是上帝就在这儿。我们并不看到他的本相，只看到他的光轮，和他照在众人身上的光影。

克利斯朵夫摇摇晃晃的走出卢佛宫，头痛欲裂，什么都看不见了。在街上，他竟不大注意到石板之间的水洼和在鞋子里直淌的雨水。天快黑了，塞纳河的上空一片昏黄，一朵内心的火焰却像一盏灯似的在那里照着。克利斯朵夫的眼睛始终还在着魔的状态。他觉得什么都不存在：车辆并没震动街道；行人湿透的雨伞并没撞着他的身体；他并没在街上走，也许是坐在家里，做着梦；也许他已经不存在了……突然之间——（他身子虚极了！）——他一阵头晕，觉得自己要像石块似的向前倒下去了……但那不过是一刹那的事：他紧了紧拳头，挺了挺腿，马上把身体撑住了。

正在那个时候，正当他的意识从深渊里浮起来的一刹那，他的目光冷不

按此系指卢佛宫底层的古代雕列陈列室。

此节所述的景象，均以累姆布朗特原作《善心的撒玛利亚人》画上的实景为主。据《新约·路加福音》第十章载，有一男子中途被盗，受伤垂死。一教士及一利未族祭司行经其旁，均不顾而去。素为犹太人痛恨之撒玛利亚人过而怜之，为之疗伤，以马载之而去。此乃耶稣为诠释“爱邻如爱自己”一语所说之故事。后世文人画家多以此为题材，累氏此作尤为知名。

防跟街道对面一道他很熟识而似乎在呼唤他的目光碰在了一处。他停下来，楞了一楞，心里想在哪儿见过的。过了一会他才认出这双凄凉而温柔的眼睛，原来就是那个被他在德国无意中砸了差事，他竭力想向她道歉而没有能找到的法国女教员。她也在喧闹的人群中站住了，望着他。他忽然看见她想排开众人，走下人行道，向他这边过来。他赶紧迎上前去；可是无数的车辆拥塞在一起，把他们隔离着；他还看见她在人墙那一边挣扎；他想不顾一切的冲过去，不料被一匹马撞了一下，在泥泞的柏油路上滑跌了，差点儿给压死；等到他浑身泥污的爬起来，好容易到了对面阶沿上，她已经不见了。

他想追着去找她。可是又来了一阵头晕，只得罢了。病已经发作，他明明觉得而不肯承认，还固执不肯就回去，反而绕着远路走。但这不过是自讨苦吃：临了他非认输不可；他手瘫脚软，好容易才回到家里。在楼梯上，他又透不过气来，只能坐在踏级上歇一歇。进了冰冷的卧室，他还硬撑着不睡，坐在椅子上，浑身浸透了雨水，脑袋重甸甸的，呼吸急促，昏昏然听着那些跟他一样困惫的音乐。《未完交响乐》的句子在他耳边掠过。可怜的修倍尔脱！他写这个曲子的时候也是孤独的，发着高热，神思恍惚，处于大梦以前的半麻痹状态，他坐在火边沉思遐想，懒洋洋的音乐在四面飘浮，好比不大流畅的水；他耽溺在那个境界里，仿佛一个半睡半醒的儿童对着自己编造的故事出神，翻来覆去的念着其中的一段；然后是睡眠来了……死神降临了……——而克利斯朵夫也听见另外一段音乐在耳边飘过，那境界像一个人双手滚热，眼睛紧闭，堆着一副憔悴的笑容，心里充满着叹息，正在想象那个解脱一切的死；那音乐便是罢哈的《冈大大》中第一段合唱：亲爱的上帝，我何时死？……多舒服！沉浸在这些波折柔缓的，刚健婀娜的乐句中，像朦胧一片的远钟……死，跟大地的和平恬静合而为一！……“然后连自己也化为尘土……”

克利斯朵夫振作了一下，排斥这些病态的思想，不让那个想把病弱的灵魂吞噬的女妖的笑影诱惑。他站起身子在房里走走，可是支持不住。他发冷发热，打着哆嗦，不得不躺上床去。他觉得这一回情形真是严重了，但他精神决不屈服，决不像一般害了病就让病魔摆布的人。他竭力挣扎，不愿意害病，尤其是打定主意不愿意死。他还有在家乡等着他的可怜的妈妈，他还有他的事业要干：他决不让疾病来致他死命。他咬紧着打战的牙齿；迸足着正在消失的意志；好似一个善于泅水的人和惊涛险浪搏斗。他时时刻刻往下沉：一片呓语，一堆杂乱的景象，或是故乡的或是巴黎沙龙的回忆；还有节奏与乐句的纠缠，无穷无尽的在那里打转，像马戏班中的马；还有《善心的撒玛利亚人》突然放出来的那道金光；黑影里的可怖的面貌；然后是深渊，是黑暗。过了一会，他重新浮起，撕破那些妖形怪相的云雾，拳头与牙床都在抽搐。他拚命抓着他现在和过去的一切所爱的人，抓着刚才瞥见的女友的脸影，抓着他疼爱的妈妈，抓着他永远不灭的自体，觉得那是大海之中的岩石：“死神吞噬不了的”……——可是岩石又被海水淹没了，一个巨浪把灵魂冲开了。克利斯朵夫重新在昏迷中挣扎，说着荒唐的呓语，他在指挥，在演奏，一个幻想的乐队：喇叭，锣鼓，铙钹，笛，低音大提琴……他发狂般的乱拉，乱吹，乱打，做出演奏各种乐器的动作。可怜他郁积着的音乐在胸中翻腾。几星期以来既不能听，又不能演奏，他像一口受着高压力的汽锅，差不多要爆裂了。某些纠缠不已的乐句像螺旋般钻进他的脑子，刺着耳膜，使他痛得直嚷。高潮过去以后，他倒在枕上，累得要死，浑身是汗，软瘫着，

上气不接下气的快窒息了。他在床前放着水瓶，常常喝几口。隔壁屋子的声响，顶楼上关门的声音，都把他吓得直跳。他在昏懵中痛恨那些四周的人物。但他的意志始终在奋斗，它吹起英勇的军号和魔鬼宣战……“即使世界上都是妖魔，即使它们要吞噬我们，我们也不怕……”

而在他翻滚不已的，火刺刺的，黑暗的海面上，忽然展开一片平静的境界，透出一些光明，小提琴与七弦琴静静的在那里低吟，喇叭与角笛庄严肃穆的吹出胜利的曲调，同时病人心头又奏起一阕不屈不挠的歌，好似抵御狂涛的一堵巨墙，好似约翰·赛白斯蒂安·罢哈的圣歌。

正当他发着高热和幽灵挣扎，胸部快要闷塞而竭力撑拒的时候，他迷迷糊糊的觉得房门打开了，有个女人拿着一枝蜡烛走进来。他以为又是一个幻象。他想说话而不能，又晕过去了。每隔一些时候，他神志清醒一些，觉得有人把他的枕头垫高了，脚上添了一条被，背后又有些热腾腾的东西；或是睁开眼睛来，看见床跟前坐着一个脸并不完全陌生的女子。随后他又看到另外一张脸，原来是个医生在替他看病。克利斯朵夫听不清他们的话，但猜到是说要把他送医院。他想跟他们争，想大声的嚷着说不愿意去，宁可孤零零的死在这儿；可是他嘴里只发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那女的居然懂得他的意思，代他拒绝了，回过来安慰他。他竭力想知道她是谁。等到他好不容易能迸出一句有头有尾的话的时候，他就提出这个问句。她回答说她是他顶楼上的邻居，因为听到他哼唧，就冒昧的进来了，以为他需要什么帮助。她恭恭敬敬的请他不要耗费精神说话。他听从了。并且刚才费了一点劲已经筋疲力尽，他只能躺着不动，一声不出，可是头脑继续在工作，拚命要把一些散乱的回忆归在一起。他在哪儿见过她的呢？……终于想起来了：不错，他是在顶楼的走廊里见过的；她是个帮佣的，叫做西杜妮。

他半阖着眼睛望着她，她可没有发觉。她个子很小，表情严肃，脑门鼓着，往后梳的头发把苍白的腮帮的上部和太阳穴都露在外边，骨头很显著，短鼻子，淡蓝眼睛，眼神又温和又固执，厚嘴唇抿得很紧，皮肤带点儿贫血，神气很谦卑，深藏，有点发僵。她非常热心的照顾着克利斯朵夫，可是不声不响，不表示亲密，从来不忘了她女仆的身分和阶级的区别。

等到他病势减轻而能聊天的时候，他的忠厚诚恳使西杜妮说话比较随便了些，但她始终提防着，有些事（他看得出来）她是不说的。她一方面很谦虚，一方面很高傲。克利斯朵夫只知道她是布勒塔尼人，本乡还有个父亲，她提到的时候说话很小心；可是克利斯朵夫不难猜到他是游手好闲的酒鬼，只管寻欢作乐而剥削女儿；她的傲气使她一声不出的让他剥削，经常把一部分工资寄给他；她肚里可完全明白。另外她还有个妹子正在预备受小学教师的鉴定试验，那是她觉得挺得意的。妹子的教育费差不多全部归她负担。她做活非常卖力。

“你现在的位置不坏吗？”克利斯朵夫问她。

“是的，可是我想离开。”

“为什么？是不是不满意主人？”

“噢！不是的；他们对我很好。”

“那末是工钱太少了？”

“也不是的……”

他不大明白，想要了解她，逗她说话。但她讲来讲去不过是她单调的生活，谋生的艰难，而她也不在乎这些：她不怕工作，那是她的一种需要，几

乎是种乐趣。她不说自己最感压迫的是无聊。他只是猜到。慢慢的，由于深切的同情所引起的直觉，而这直觉是因为疾病的刺激而变得更敏锐，因为想起亲爱的老母在同样生活中所受的苦难而变得更深刻的，他居然能看透西杜妮的心事。他仿佛身历其境的看到这种闷人的，不健康的，反自然的生活，——在布尔乔亚社会中，这是当仆人的最普通的生活；——他看到那些并不凶恶可是漠不关心的主人，有时除了差遣之外几天不跟她们说一句话。她整天坐在没法喘气的厨房里，一扇天窗也是被柜子挡着，望出去只看见一堵肮脏的白墙。所有的快乐就是主人们漫不经心的说一声沙司做得不错或是烤肉烤得恰到好处。幽禁的生活，没有空气，没有前途，没有一点欲念与希望的光，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最苦闷的时间是主人们到乡下过假期的时候。他们为了经济关系不帶她一块儿去，付了她工钱，可不给她回家的路费，让她自己有钱自己去。她既没有这个欲望，也没这个能力。于是她孤零零的呆在差不多空无一人的屋子里，不想出门，甚至也不跟别的仆役搭讪；她瞧不起她们，因为她们粗俗，不规矩。她不出去玩儿，生性很严肃，俭省，又怕路上碰到坏人。她在厨房或卧室里坐着：从卧室望出去，除了烟突之外，可以看见一所医院的花园里一株树的树顶。她不看书，勉强做些活儿，迷迷糊糊的，百无聊赖，烦闷得哭了；她能无穷无尽的尽哭，哭简直是她的一种乐趣。但是她烦恼到极点的时候，连哭都哭不出来，心像冻了冰一样。随后她竭力振作起来，或是自然而然的又有了主意。她想着妹子，听着远处的洋琴声，胡思乱想，老是计算要多少天做完某件工作，要多少天才能挣多少钱；她常常算错，便重新再算，终于睡着了。日子过去了。

除了这种特别消沉的情形，她也有像儿童般爱取笑的快活劲儿。她笑别人，笑自己。她对于主人们的行为并非见不到，心里也并非不加批判：例如他们因为无所事事而来的烦恼，太太的郁怒和发愁，所谓优秀阶级的所谓正经事儿，对一幅画，一曲音乐，一本诗集的兴趣。她只有健全而粗疏的判断力，既不像十足巴黎化的女仆那末充时髦，也不像内地老妈子那样只崇拜她们不了解的东西；她对于弹琴，谈天，一切文雅的玩艺儿，不但没用而且可厌的，在自欺欺人的生活中占着偌大位置的事，都抱着敬而远之的轻蔑态度。她不免把自己过的现实生活，和这种奢侈生活的虚幻的苦乐，似乎一切都由烦闷制造出来的苦乐，暗中比较一番。但她并不因此而愤愤不平。世界就是这么回事。她忍受一切，恶人，傻子，一律忍受。她说：“本来吗，各种人合起来才成其为世界。”

克利斯朵夫以为她有宗教信仰作支持；但有一天，她提起那些更有钱更快乐的人的时候，说：“归根结蒂，所有的人将来都是一样的。”

“将来？什么时候？”克利斯朵夫问。“社会革命以后吗？”

“革命！嘿！还远得很呢！我才不信那些傻话。反正将来大家都是一样的。”

“什么时候呢？”

“当然是死了以后喽！那时不是谁都完了吗？”

他对着这种心平气和的唯物主义的看法非常诧异，心里想：“要是没有来世，那末一个人过着像你这种生活而眼看别人比你更幸福，不是太可怕了吗？”

虽然他不说，她似乎猜到了他的意思；她很冷静的用着一种听天由命而游戏人生的态度继续说：“一个人总得认命。怎么能每个人都中头奖呢？我

们运气不好：话不是说完了吗？”

她甚至不想到外国（有人找她上美洲）去找一个多挣点儿钱的位置。她从来也没有离开本国的念头。她说：“天下的石子都是一样硬的。”

她骨子里有一种怀疑的玩世不恭的宿命观。她完全是那种法国乡下人，很少信仰，或竟全无信仰；不需要什么生活的意义，生命力却非常的强；——人很勤谨，对什么都很冷淡，对一切都不满意，可是很服从；不怎么爱人生，却又抓得很紧，也用不着空空洞洞的鼓励来保持他们的勇气。

从来没见过这等人的克利斯朵夫，看到这个诚朴的少女一无信仰，好不奇怪；他佩服她会留恋没有乐趣没有目标的人生，尤其佩服她不需要依傍而很坚强的道德意识。至此为止，他所认识的法国平民只是从自然主义派的小说和当代小名士的理论中看到的；这批人刚和十八世纪与大革命时代的风气相反，喜欢把没有教育的人描写成无恶不作的野兽，以便遮掩他们自身的罪恶……现在他才不胜惊异的发现了西杜妮这种不稍假借的诚实。那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本能与骨气的问题。她也有她贵族式的骄傲。我们倘若相信平民就是粗俗的同义字，那就大错特错了。平民之中有贵族，正如布尔乔亚中有下等阶级。所谓贵族，是指那些具有比别人更纯洁的本能，也许还有更纯洁的血统的人；他们也知道这一点，知道自己的身分而有不甘自暴自弃的傲骨的。这种人当然为数不多；但即使处于孤立的地位，大家仍然知道他们是第一流人物；只要有他们在场，别人就会有所顾忌，不得不拿他们做榜样，或者装做这样。每个省，每个村子，每个集团，它的面目多少是它的贵族的面目；这里的舆论严，那里的舆论宽，都看各该地方的贵族而定。虽然今日“多数人”的力量这样过分的膨胀，这批默默无声的少数分子的固有的权威还是没改变。比较危险的倒是他们离开本乡，散到遥远的大都市中去。但即使如此，即使他们孤零零的迷失在陌生的社会里，优秀种族的个性始终存在，没有被周围的环境同化。克利斯朵夫所看到的巴黎的一切，西杜妮几乎一点儿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报纸上肉麻而猥亵的文学，和国家大事同样对她不生关系。她甚至不知道有所谓平民大学；即使知道，她也不见得会比对宣道会更感兴趣。她做着自己的工作，想着自己的念头，没有意思借用别人的。克利斯朵夫为此赞了她几句。

“这有什么希奇呢？”她说。“我就跟大家一样。难道您没见过法国人吗？”

“我在法国人中间混了一年了；除了玩儿以外，或者学着别人玩儿以外还能想到别的事的，我连一个都没见过。”“不错，”西杜妮说。“您只看到有钱的人。有钱的人是到处一样的。其实您还什么都没看见。”

“好吧，”克利斯朵夫回答；“那末让我来从头看起。”他这才第一次见到法兰西民族，见到那使人觉得不朽，跟他的土地合而为一，像土地一样眼看多少征服它的民族、多少一世之雄烟消云散而它始终无恙的法国民族。

他慢慢的恢复健康，开始起床了。

他第一件操心的事是要偿还西杜妮在他病中垫付的款子。既然还不能出门去找工作，他便写信给哀区脱，要求预支一笔钱。哀区脱逞着那种又冷淡又慷慨的古怪脾气，过了十五天才回音，——在这十五天之内，克利斯朵夫拚命的折磨自己，对西杜妮端来的食物差不多动都不动，直要被逼不过，才吃一些牛奶跟面包，而过后又责备自己，因为那不是自己挣来的；然后他从哀区脱那儿接到了款子，并没附什么信；在克利斯朵夫害病的几个月里，

哀区脱从来不想来打听一下他的病状。他有种天赋，能够帮了人家的忙而教人家不喜欢他。因为他自己在帮忙的时候心里就没有什么爱。

西杜妮每天下午跟晚上来一下。她替克利斯朵夫预备晚餐：毫无声响的，很体贴的招呼他的事；看到他衣服破烂，她便一声不出的拿去补了。他们之间不知不觉增加了多少亲切的情分。克利斯朵夫唠唠叨叨的讲到他年老的母亲，把西杜妮听得感动了，她设身处地自比为孤苦伶仃的留在本乡的鲁意莎，对克利斯朵夫抱着慈母般的温情。他跟她说话的时候也努力想解解他天伦的渴望，那是一个病弱的人感觉得格外迫切的。和西杜妮在一起，他觉得精神上特别能够接近自己的母亲。他有时向她吐露一部分艺术家的苦闷。她很温柔的为他抱怨，同时看他为了思想问题而悲哀不免认为多此一举。这一点也使他想起他的母亲，觉得很快慰。

他想逗她说些知心话；但她不像他那样肯随便发表。他说笑似的问她将来要不要嫁人。她照例用着听天由命和看破一切的口气回答说：“给人当差的根本谈不到结婚：那会把事情搅得太复杂的。并且要挑到恰当；而这又不是容易的事。男人都是坏蛋。看你有权，他们就来追求；把你的钱吃光了，就掉过头去不理啦。这种榜样太多了，我还想去吃这个苦吗？”——她没说出她已经有过一次毁婚的事：未婚夫因为她把所挣的钱统统供给她的家属，就把她丢了。——看见她在院子里很亲热的和邻居的孩子们玩，在楼梯上碰见他们又很热烈的拥抱他们，克利斯朵夫不由得想起他认识的一位太太，觉得西杜妮既不傻，也不比别的女子丑，倘使处在那些太太们的地位，一定比她们高明得多。多少的生命力被埋没了，谁也不以为意。另一方面，地球上却挤满着那些行尸走肉，在太阳底下僭占了别人的位置和幸福！……

克利斯朵夫丝毫不提防。他对她很亲热，太亲热了；他像大孩子一样的惹人怜爱。

有些日子，西杜妮神气很颓丧；他以为是她太辛苦的缘故。有一回正谈着话，她推说有件事要做，突然站起身来走了。又有一回，克利斯朵夫对她表示得比往常更亲热了些，她便几天没有来；而再来的时候，她跟他的说话更拘束了。他寻思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她。他问她，她赶紧说没有；但她继续跟他疏远。又过了几天，她告诉他要走了：她辞掉工作，离开这儿了。她说些冷冷的，不大自然的话，感谢他对她的好意，祝他和他的母亲身体健康，然后和他告别了。她走得这样突兀，使他惊异到极点，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探听她离开的动机，她只是支吾其辞；他问她上哪儿去做事，她也置之不答，并且为了直截了当打断他的问话，竟站起身子走了。在房门口，他向她伸出手去，她兴奋的握了一握，但脸上仍旧没有什么表情；自始至终，她都是这副发僵的神气。她走了。

他永远不明白她为什么走的。

冬季长得很。潮湿，多雾，泥泞的冬季。几星期看不见太阳。克利斯朵夫的病虽然大有起色，还没完全好。右边的肺老是有一处地方作痛，伤口在慢慢的结疤，剧烈的咳呛使他夜里不能安眠。医生禁止他出门，甚至还想教他往东南海滨或大西洋上的加拿里群岛去疗养。但他非上街不可。要是他不去找晚饭，晚饭决不会来找他的。——人家又开了许多他没钱购买的药品。因此他干脆不去请教医生了：那不是白费钱吗？并且在他们面前，他老是很窘；他们彼此没法了解：简直是两个极端的世界。医生们对于这个自命为一个人代表整个天地、而实际是像落叶一般被人生的巨流冲掉的穷艺术家，抱

着一种带点讪笑与轻视的同情心。他被这些人瞅着，摸着，拍着，非常畏缩。他对自己病弱的身体好不惭愧。他想：“将来它死了，我才高兴呢！”

虽然受着孤独，贫病，和种种苦难的磨折，克利斯朵夫仍是很有耐性的忍受他的命运。他从来没有这样的耐性，连自己都为之诧异了。疾病往往是有益的。它折磨了肉体，可是把心灵解放了，净化了：日夜不能动弹的时候，平时害怕太剧烈的光明而被健康压在下面的思想抬头了。从来没害过病的人决不能完全认识自己。

疾病使克利斯朵夫心非常安静。它把他生命中最凡俗的部分剔净了。他用着比以前更灵敏的官能，感觉到那个富有神秘的力量世界，那是每人心中都有而被生活的喧扰掩盖得听不见的。他那天发着高热在卢佛宫中见到的景象，连最微末的回忆都深深的刻在心头；从此他就置身于和累姆布朗特的名作同样温暖，柔和，深沉的气氛中。那颗无形的太阳放射出来的光彩，他心中也一样的感受到。虽然绝对没有信仰，他仍觉得自己并不孤独：神明的手牵引着他，把他带到一个跟神相遇的地方。而他也像小孩子一样的信赖它。

多少年来第一次，他不得不休息。发病以前过度紧张的精神使他筋疲力尽，至今还没恢复，所以便是疗养时期的疲乏倦怠对他也是一种休息。克利斯朵夫几个月的提心吊胆，日夜警惕，如今才觉得自己老钉着一处的目光渐渐的松了下来。但他并不因之而减少他的坚强，只是变得更近人情。天性中那股强大而有点畸形的生命力往后退了一步；他使自己和别人一样，精神上的偏执和行为方面的残酷与无情都给去尽了。他再也不恨什么，再想不到可恼的事，即使想到，也不过耸耸肩膀；他对自己的痛苦想得比较少，而对别人的想得比较多了。自从西杜妮使他想起地球上到处都有谦卑的灵魂默默无声的熬着苦难，毫无怨叹的奋斗，他就为了他们而把自己忘了。素来并不感伤的他，这时也不禁有些神秘的温情，那是在一个病人心中开出来的花。晚上，靠着院子那边的窗，听着黑夜里神秘的声音……附近的屋子里有人唱着歌，远听更显得动人，一个女孩子天真的弹着莫扎尔德……他心里想：

“你们，我并不认识而都爱着的人，还没受过人生的烙印、做着些明知是不可能的美梦、跟敌对的世界挣扎着的人，——我愿意你们幸福！噢，朋友们，我知道你们在那儿，我张着臂抱等你们……是的，我们之中隔着一道墙。可是我会一块一块的把墙拆毁的；同时我自己也消磨完了。咱们能有一天碰在一起吗？在另外一道墙——死——没有筑起以前，我还来得及赶到你们前面吗？……管它！孤独就孤独罢，孤独一世罢，只要我为你们工作，为你们造福，只要你们以后能稍稍爱我，在我死了以后！……”

大病初愈的克利斯朵夫就这样喝着“爱与苦难”这两位保姆的乳汁。

在这个意志比较松懈的情形之下，他觉得需要和别人接近。虽然身体还十分软弱，出门还不大妥当，他往往清早或傍晚出去，那是群众像潮水般从人烟稠密的街上涌往工作场所，或是从那儿回来的时间。他要到人与人息息相通的气氛中去浸一下，提提神。他并不跟谁交谈，也没有这念头。他只要看人家走过，猜他们的心事，爱他们。他又亲切又同情的瞧着那些急急忙忙赶路的工人，不曾工作已经有了困倦的神气，——瞧着这些青年男女，脸色苍白，表情活泼，挂着一副古怪的笑容，——瞧着那些透明而活动的脸，隐隐然可以看到欲望，忧患，游戏人生的心理，像潮水般流过，——瞧着这批大都会里多么聪明的，太聪明的，有些病态的市民。他们都走得很快，男人们一边走一边读报，女人们一边走一边啃着月芽饼。一个乱发蓬松的少女在

克利斯朵夫身旁走过，脸睡得有点虚肿，像山羊一般迈着小步，显得烦躁，急促：克利斯朵夫恨不得牺牲自己一个月的寿命来使她多睡一二个钟点。噢，要是真有人跟她这么提议，她才不会拒绝呢！他真想把那些悠闲的有钱的妇女，养尊处优而烦闷的人，这时候还在重门深锁的寝室里高卧的，从床上拖起来，让这些灼热而困倦的身体，感觉新鲜、内心生活并不丰富、可是活泼而贪恋生命的人，去躺在他们床上，过一下那种安闲的生活。这般机灵而疲乏的小姑娘，又狡猾，又纯朴，那么无耻那么天真的贪快乐，而骨子里倒是诚实勤劳的女工：他现在看待她们非常宽容了。即使其中有几个当面讪笑他，或者对着他这个眼睛火刺刺的大孩子彼此示意，他也不生气了。

他也常在河滨大道上一边徘徊，一边沉思遐想。这是他最喜欢散步的地方。在这儿，他仿佛看到了心中渴念的，给他童年时代多少安慰的大河。当然，这不是莱茵河，既没有它浩浩荡荡的气势，也没有那辽阔的远景跟广大的平原，可以让他游目骋心。眼前这条河睁着灰色的眼睛，披着浅蓝的外衣，凭着它细腻而明确的线条，妩媚的姿态，柔软的动作，在浓艳的城市里懒懒的伸展着；桥梁是它的手钏，纪念建筑是它的项链；它像一个美女般对着自己的艳色微笑……这才显出了巴黎的光明！克利斯朵夫在这城里第一样喜欢的便是这条河；它一点一点的浸透了他的心，不知不觉把他的气质变换了。他认为这是最美的音乐，唯一的巴黎音乐。在暮色将临的时分，他几小时的在河滨流连，或是走进古法兰西的花园¹，欣赏着和谐的光线照在紫色的雾霭缭绕的大树顶上，照在灰色的雕像和花盆上，照在纪念建筑的满生苔藓的石头上；而那些建筑物都是王朝的遗迹，吸收了几百年的日光的。——这种微妙的气氛，是柔和的太阳与乳汁般的水汽融化成的，——银色的尘雾中就有欢乐的民族精神在漂浮。

一天傍晚，他靠在圣·米希桥附近的石栏杆上，一边看着流水，一边随便翻着冷摊上的旧书。他无意之间打开米希莱著作中的一册单行本。他读过几页这史家的作品：那种法国式的浮夸，自鸣得意的辞藻，过于跌宕的句法，他不大喜欢。可是那一天他才看了几行就被吸住了，那是圣女贞德受审的最后一段情形。他曾经从席勒的作品中知道这个奥莱昂的处女，一向认为她不过是个传奇式的女英雄，她的故事是大诗人给幻想出来的。不料这一回他突然看到了现实，被它紧紧的抓住了。他往下念着，念着；慷慨激昂的描写，悲惨的情节，使他心都碎了。读到贞德知道当晚就得给处决而惊死过去的时候，他的手抖了，眼泪涌上来了，只得停下。因为病后衰弱，他简直感情冲动到可笑的程度，自己也看了气恼。——他想把书念完，但时间晚了，书贩已经在收拾书籍。他决意买那本书；可是掏了掏口袋，只有七个铜子。穷到这样是常有的事，他并不着急；他刚才买了晚上吃的东西，预算下一天可以向哀区脱领到一笔抄谱的报酬。但要等到明天是太难受了！为什么把仅有的一些钱去买了食物呢？啊！要是能把袋里的面包跟香肠抵付书价的话，岂不是好！

第二天清早，他上哀区脱铺子去支钱，但走过圣·米希桥的时候，没有勇气不停下来。他在书贩的箱子里又找到了那部宝贵的书，花了两小时把它全部念完了。他为之错失了哀区脱的约会，又费了整天的功夫才见到他。最

¹古法兰西的花园系指卢佛宫前面的蒂勒黎花园。

²古法兰西的花园系指卢佛宫前面的蒂勒黎花园。

后，他终于接洽好了新的工作，领到了钱，马上去把那本书买了来。他怕给人捷足先登的买去。其实即使这样也不难再找一本；但克利斯朵夫不知道这本书是不是孤本；并且他要的是这一部而不是另一部。凡是爱好书的人都有些拜物狂。哪怕只是寥寥几页，脏的也罢，有污迹的也罢，只要是激动过他们的幻想的，便是神圣的。

克利斯朵夫回去在静寂的夜里把圣女贞德的历史重读了一遍。没有旁人在场，他不用再压制自己的感情，他对这个可怜的女子充满着温情，怜悯，与无穷的痛苦，似乎看到她穿着乡下女子的红颜色的粗布衣服，高高的个子，怯生生的，声音很柔和，听着钟声出神，——（她也跟他一样爱钟声，）——脸上堆着可爱的笑容，显得那么聪明那么慈悲，随时会流泪，——为了爱，为了怜悯，为了软心而流泪：因为她兼有男性的刚强和女性的温柔，是个纯洁而勇敢的少女。她把盗匪式的军队的野性给驯服了，又能够镇静的用她的头脑，用她女人的机灵，用她坚强的意志，在孤立无助而被大家出卖的情形之下，成年累月的应付那些像豺狼虎豹一般包围着她的，教会与司法界人士的奸计。

而克利斯朵夫最感动的尤其是她的慈悲心，——打了胜仗之后，她要为战死的敌人哭，为曾经侮辱她的人哭；他们伤了，她去安慰；他们临终，她去祈祷，便是对出卖她的人也不怀怨恨，到了火刑台上，火在下面烧起来的时候，她也不想到自己，只担心着慰勉她的修士，教他快走。“她在最剧烈的厮杀中还是温柔的，对最坏的人也是善良的，便是在战争中也是和平的。战争是表示魔鬼得胜，可是在战争中间，她有上帝的精神。”

克利斯朵夫看到这儿，想到了自己：“我厮杀的时候就没有这种上帝的精神。”

他把贞德的传记家笔下最美的句子反复念着：

“不论别人如何蛮横，命运如何残酷，你还得抱着善心……不论是如何激烈的争执，你也得保持温情与好意，不能让人生的磨难损害你这个内心的财宝……”

于是他对自己说着：“我真罪过。我不够慈悲。我缺少善意。我太严。——请大家原谅我罢。别以为我是你们的仇敌，你们这些被我攻击的人！我原意是为你们造福……可是我不能让你们做坏事……”

因为他不是个圣者，所以只要想到那些人，他的怨恨又觉醒了。他最不能原谅的是，一看到他们，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法国，就教人想不到这块土地上曾经长出这样纯洁的花，这样悲壮的诗。然而那的确是事实。谁敢说不会再有第二次呢？今日的法国，不见得比淫风极盛而竟有圣处女出现的查理七世时代的法国更糟。如今庙堂是空着，遭了蹂躏，一半已经坍塌了。可是没有关系！上帝在里面说过话的。

克利斯朵夫为了爱法国的缘故，竭力想找一个法国人来表示他的爱。

那时正到了三月底。克利斯朵夫不跟任何人交谈，不接到任何人的信，已经有几个月之久，除了老母每隔许多时候来几个字。她不知道他害病，也没把自己害病的事告诉他。他和社会的接触只限于上音乐铺子去拿他的活儿或是把做好的活儿送回去。他故意候哀区脱不在店中的时候去，免得和他谈话。其实这种提防是多余的：因为他只碰到一次哀区脱，而哀区脱对于他的健康问题也只淡淡的提了一二句。

正当他这样的无声无息，幽居独处的时候，忽然有天早上收到罗孙太太

的一封请柬，邀他去参加一个音乐夜会，说有个著名的四重奏乐队参加表演。信写得非常客气，罗孙还在信末附了几行恳切的话。他觉得那回和克利斯朵夫的争执对自己并不怎么体面。尤其因为从那时起，他和那位歌女闹翻了，他自己也把她很严厉的批判过了。他是个爽直的汉子，从来不怀恨他得罪过的人；倘若他们不像他那么宽宏大量，他会觉得可笑的。所以他只要高兴跟他们重新相见，就会毫不迟疑的向他们伸出手去。

克利斯朵夫先是耸耸肩，赌咒说不去。但音乐会的日子一天天的近了，他的决心一天天的跟着动摇了。听不见一句话，尤其是听不见一句音乐，使他喘不过气来。固然他自己再三说过永远不再上这些人家里去，但到了那天，他还是去了，觉得自己没有骨气非常惭愧。

去的结果并不好。一旦重新走进这个政客与时髦朋友的环境，他马上感到自己比从前更厌恶他们了：因为孤独了几个月，他已经不习惯这些牛鬼蛇神的嘴脸。这儿简直没法听音乐：只是亵渎音乐。克利斯朵夫决意等第一曲完了就走。

他把所有那些可憎的面目与身体扫了一眼。在客厅的那一头，他遇到一对望着他而立刻闪开去的眼睛。跟全场那些迟钝的目光相比，这双眼睛有一种说不出的天真朴实的气息使他大为惊奇。那是畏怯的，可是清朗的，明确的，法国式的眼睛，望起人来那么率直：它们自己既毫无掩饰，你的一切也无从隐遁。克利斯朵夫是认识这双眼睛的，却不认识这双眼睛所照耀的脸。那是一个二十至二十五岁之间的青年，小小的个子，有点儿驼背，看上去弱不禁风，没有胡子的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头发是栗色的，五官并不端正而很细腻，那种不大对称的长相使他的神气不是骚动，而是惶惑，可也有它的一种魅力，似乎跟眼神的安静不大调和。他站在一个门洞里，没人注意他。克利斯朵夫重新望着他；那双眼睛总是怯生生的，又可爱又笨拙的转向别处；而每次克利斯朵夫都“认得”那双眼睛，好像在另外一张脸上见过似的。

因为素来藏不住心中的感觉，他便向着那青年走过去；他一边走一边想跟对方说什么好；他走一下停一下，左顾右盼，好似随便走去，没有什么目标。那青年也觉察了，知道克利斯朵夫向自己走过来；一想到要和克利斯朵夫谈话，他突然胆小到极点，竟想往隔壁的屋子溜；可是他那么笨拙，两只脚仿佛给钉住了。两人面对面的站住了，僵了一忽儿，不知道话从哪儿说起。越窘，各人越以为自己在对方眼里显得可笑。终于克利斯朵夫瞪着那个青年，没有一句寒暄的话，便直截了当的笑着问：

“你大概不是巴黎人吧？”

对于这个意想不到的问句，那青年虽然局促不堪；也不由得笑了笑，回答说他的确不是巴黎人。他那种很轻的，像蒙着一层什么的声音，好比一具脆弱的乐器。“怪不得，”克利斯朵夫说。

他看见对方听着这句奇怪的话有些惶惑，便补充道：“我这话没有埋怨的意思。”

可是那青年更窘了。

他们又静默了一会。那年轻人竭力想开口：嘴唇颤动着，一望而知他有句话就在嘴边，只是没有决心说出来。克利斯朵夫好奇的打量着这张变化很多的脸，透明的皮肤底下显然有点颤抖的小动作。他似乎跟这个客厅里的人物是两个种族的：他们都是宽大的脸，笨重的身体，好像只是从脖子往下延长的一段肉；而他却是灵魂浮在表面上，每一小块的肉里都有灵气。他始终

没法开口。克利斯朵夫比较单纯，便接着说：“你在这儿，混在这些家伙中间干什么？”

他粗声大气的嚷着，那种不知顾忌的态度便是人家讨厌他的地方。那青年窘迫之下，不禁向四下里望了望，看有没有人听见。这举动使克利斯朵夫大为不快。随后那年轻人不回答他的问话，又笨拙又可爱的笑了笑，反问道：“那末你呢？”克利斯朵夫大声的笑了，笑声照例有点儿粗野。

“对啊，我又来干什么？”他高高兴兴的回答。

那青年突然打定了主意，喉咙梗塞着说：“我多喜欢你的音乐！”

随后他又停住了，拚命想克服自己的羞怯，可是没用。他脸红了，自己也觉得，以至越来越红，直红到耳边。克利斯朵夫微笑着望着他，恨不得把他拥抱一下。青年抬起眼来说：“真的，在这儿我不能，不能谈这些问题……”

克利斯朵夫抿着阔大的嘴暗暗笑着，抓着他的手。他觉得这陌生人瘦削的手在自己的手掌中微微发抖，便不由自主的很热烈的握着。那青年也发觉自己的手被克利斯朵夫结实的手亲热的紧紧握着。他们听不见客厅里的声音了，只有他们两个人了，觉得心心相印，碰到了一个真正的朋友。

但这不过是一刹那，罗孙太太忽然过来用扇子轻轻触着克利斯朵夫的手臂，说：

“哦，你们已经认识了，用不着我再来介绍了。这个大孩子今晚是专诚为您来的。”

他们俩听了这话，都不好意思的退后了一些。

“他是谁呢？”克利斯朵夫问罗孙太太。

“怎么！您不认识他吗？他是个笔下很好的青年诗人。非常的崇拜您。他也是个音乐家，琴弹得挺好。在他面前能不讨论您的作品：他爱上了您。有一天，他为了您差点儿跟吕西安·雷维一葛吵起来。”

“啊！好孩子！”克利斯朵夫说。

“是的，我知道，您对吕西安不大公平。可是他也很喜欢您呢。”

“啊！别跟我说这个话！他要是喜欢我，就表示我没出息了。”

“我敢向您保证……”

“不！不！我永远不要他喜欢我。”

“您那个情人跟你完全一样。你们俩都一样的疯癫。那天吕西安正在跟我们解释您的一件作品。那羞怯的孩子突然站起来，气得全身发抖，不许吕西安谈论您。您瞧他多霸道！……幸亏我在场，我马上哈哈大笑，吕西安也跟着笑了；结果他道了歉。”“可怜的孩子！”克利斯朵夫听得大为感动。

接着罗孙太太和他谈着别的事，但他充耳不闻，只自言自语的说：

“他到哪儿去了？”他开始找他。可是那陌生朋友已经不见了。克利斯朵夫又去找着罗孙太太，问：

“请您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

“谁啊？”

“您刚才跟我提到的那个。”

“您那个青年诗人吗？他叫做奥里维·耶南。”这个姓氏的回声，在克利斯朵夫耳中像一阕熟悉的音乐一般。一个少女的情影在他眼睛深处闪过。可是新的形象，新朋友的形象立刻把那个情影抹掉了。在归途中，克利斯朵夫在拥挤的巴黎街上走着，一无所见，一无所闻，对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知觉。他好似一口湖，四周的山把它跟其余的世界隔离了。没有一丝风，没有

一点声音，没有一点骚动。只是一片和平宁静。他再三说着：
“我有了一个朋友了。”

卷五终

